

571.14  
864  
C.2

# 後殖民主義

## ——歷史的導引

Postcolonialism: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Robert J. C. Young © 著

周素鳳、陳巨擘 © 譯

國立編譯館 © 主譯

國立編譯館與巨流圖書公司合作翻譯發行

Copyright © 2001 by Robert J. C. Young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5 Chu Liu Book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後殖民主義—歷史的導引／Robert J. C. Young 著；  
周素鳳、陳巨擘譯—初版.—台北市：巨流，2006  
〔民95〕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譯自：Postcolonialism: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ISBN：957-732-242-5（平裝）

1. 殖民 - 歷史

577.19

94023867

### 後殖民主義—歷史的導引

原書名：Postcolonialism: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作者：Robert J. C. Young

出版者：巨流圖書有限公司與國立編譯館合作翻譯發行

著作財產權人：國立編譯館

創辦人：熊嶺

總編輯：陳巨擘

主譯者：國立編譯館

譯者：周素鳳、陳巨擘

封面設計：曾瑞靖

地址：106台北市溫州街48巷5號1樓

電話：(02) 23695250 · 23695680

傳真：(02) 83691393

郵購：郵政劃撥帳號01002323

E-MAIL：chuliu@ms13.hinet.net

http：//www.liwen.com.tw

總經銷：麗文文化事業機構

地址：802高雄市苓雅區泉州街5號

電話：(07) 2261273

傳真：(07) 2264697

法律顧問：林廷隆

電話：(02) 29658212

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45號

ISBN：957-732-242-5

2006年01月初版一刷

定價60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 目錄

出版前言 I

前言 III

致謝 VII

1. 殖民主義與後殖民批判政治 001

第一篇 觀念的沿革 013

2. 殖民主義 015

一、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名詞定義 015

二、殖民與宰制 019

3. 帝國主義 025

一、「帝國主義」的法文來源 029

二、帝國意識形態和殖民系統的差異 030

三、英國帝國主義 034

四、大英國 036

五、美國帝國主義 042

4. 新殖民主義 045

一、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最後階段 047

二、發展與依賴理論 050

三、批判發展理論 053

5. 後殖民主義 059

一、國家 060

二、位置 063

三、知識 065

四、語言 068

## 第二篇 歐洲的反殖民主義 071

### 6. 從拉斯卡薩斯到邊沁 073

一、人道立場的反對 075

二、經濟立場的反對 082

### 7. 19世紀自由主義 089

一、法國19世紀反殖民主義：阿爾及利亞和開化使命 089

二、19世紀英國的反殖民主義 090

三、印度 096

四、愛爾蘭 098

五、霍卜生的《帝國主義研究》 100

### 8. 馬克思論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 105

一、馬克思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 105

二、馬克思理論與帝國主義 113

## 第三篇 從第一國際到第四國際 117

### 9. 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從第一國際到俄國革命 119

一、「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 119

二、「我不是俄羅斯人，我是立陶宛人，真正的德國人」：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 121

三、俄國大革命：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

### 10. 第三國際到東方民族的巴庫會議 131

一、「第三國際」的形成 131

二、第二次大會，1920年7月到8月 133

三、1920年9月「巴庫會議」 138

### 11. 婦女國際，第三國際和第四國際 145

一、各次國際和共產婦女運動 145

二、1921年6月到7月，「國際共產第三次大會」 148

三、1922年11月到12月，「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 149

四、1924年7月，「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 153

五、1928年「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和1935年「共產國際七次大會」 156

六、托洛斯基和「第四國際」 159

## 第四篇 自由鬥爭的理論實踐 163

### 12. 民族解放運動：導言 165

### 13. 馬克思主義與民族解放運動 173

一、阿布代·馬力克論馬克思主義和解放運動 175

二、第一階段：直到1928年 180

三、第二階段：1928到1945年 181

四、第三階段：1945年之後 184

### 14. 中國、埃及、萬隆會議 189

一、毛澤東與中國革命 189

二、毛澤東的矛盾 191

三、文化大革命 193

四、埃及 195

五、納瑟 195

六、1955年萬隆會議 197

### 15. 拉丁美洲（一）：馬力亞特吉、文化互化與文化依賴 199

一、拉丁美洲的馬克思主義 200

二、1910年的墨西哥 202

三、馬力亞特吉 203

四、文化依賴 206

### 16. 拉丁美洲（二）：古巴：格瓦拉、卡斯楚和三大洲 211

一、切·格瓦拉同志 212

二、新人類 216

三、三大洲 218

17. 非洲（一）：英語系的非洲社會主義 225
- 一、前共產主義時期的非洲反殖民主義 225
  - 二、非裔美國和非裔加勒比海激進派的影響 227
  - 三、非洲的共產黨活動 234
  - 四、南非 239
  - 五、潘得墨和詹姆士 241
18. 非洲（二）：恩克魯瑪和泛非洲主義 245
- 一、1945年曼徹斯特「泛非洲代表大會」 246
  - 二、非洲社會主義 248
  - 三、恩克魯瑪 251
  - 四、尼雷爾 255
  - 五、從「正面行動」到暴力 256
19. 非洲（三）：拉明·桑戈爾、立歐玻·桑戈爾和法語系非洲社會主義 261
- 一、兩次大戰之間的法國 263
  - 二、反殖民行動派：胡努、桑戈爾、加藍·庫雅特 264
  - 三、胡努和「全球黑人防衛聯盟」(LDRN) 265
  - 四、拉明·桑戈爾和「黑佬防衛委員會」(CDRN) 266
  - 五、家藍·庫雅特和「黑佬防衛同盟」(LDRN) 270
  - 六、文化轉向：黑人精神 273
  - 七、立歐玻·桑戈爾 276
20. 非洲（四）：法農／卡布拉爾 283
- 一、法農 283
  - 二、法農與法語系的非洲政治思想 284
  - 三、法農和阿爾及利亞 286
  - 四、法農和暴力 289
  - 五、卡布拉爾：以文化抵抗和解放 292
  - 六、理論武器 294
  - 七、文化的角色 297
21. 暴力的承受者／主體：阿爾及利亞、愛爾蘭 301
- 一、主體／從屬 (Subject, Subjection) 302
  - 二、暴力，侵犯 303
  - 三、令人焦慮不安的狀況 304
  - 四、愛爾蘭：同化和暴力 307
  - 五、愛爾蘭和後殖民理論 310
  - 六、「愛爾蘭敗了，不列顛『帝國』走」：康納利和1916年復活節叛變 311
22. 印度 I：馬克思主義在印度 317
- 一、印度獨立運動的獨特性 317
  - 二、印度的社會主義：從社會主義到全民福利 (Sarvodaya) 318
  - 三、馬克思主義在印度 320
23. 印度 II：甘地的抗現代性 327
- 一、文化民族主義 327
  - 二、不殺生 (AHIMSA)：暴力和非暴力 333
  - 三、甘地的另一種政治策略 335
  - 四、丹地大遊行 342
  - 三、甘地在蘭開夏 (Lancashire) 344
24. 印度 III：雜揉性和底層階級的能動性 347
- 一、甘地的低能見度 347
  - 二、親密的敵人 348
  - 三、衍生論述 353
  - 四、雜揉性：做為形式和策略 355
  - 五、Samas和雜揉性 357
  - 六、印度後殖民理論家的歷史的策略 359
  - 七、底層階級研究 361
  - 八、底層階級的底層階級：性別化新的歷史和政治 366
25. 婦女、性別與反殖民主義 369
- 一、反殖民運動中的女性角色 370
  - 二、女性主義與自由鬥爭意識形態之關係 378

- 三、社會主義 380
- 四、現代性 382
- 五、文化民族主義 387
- 六、獨立之後女性主義政治的問題 389

## 26. 薩依德與殖民論述 391

- 一、薩依德著作中的論述與權力 393
- 二、對「殖民論述」的反駁 397
- 三、語言學的論述 400

## 27. 傅柯在突尼西亞 403

- 一、傅柯的沉默：希底布薩伊德村以及《知識考掘學》的脈絡 403
- 二、傅柯談論述 406
- 三、論述形構 408
- 四、陳述 409
- 五、規則性、陳述過程的模態與對象的構成 411
- 六、論述的異質性 412
- 七、《性史》裡的論述與權力 414
- 八、傅柯模式的殖民論述 415

## 28. 主體性與歷史：德希達在阿爾及利亞 419

- 一、再談《白色神話》 419
- 二、擊碎舊殼 425
- 三、結構主義、「原始」理性與解構 427
- 四、鹽柱 430
- 五、馬拉諾：「小黑人，非常典型的阿拉伯猶太人，對它根本不瞭解」 432

尾聲 437

參考書目 439

索引 483

# 出版前言

Robert Young 的《後殖民主義——歷史的導引》是一本研究後殖民主義不可或缺的書，也是一本不容易翻譯的書。本書所涵蓋的時間達一個半世紀——從19世紀初期帝國主義的興起，到21世紀的後殖民情境。空間則包括共產國際的蘇聯、殖民帝國的英、法、德、日本，以及三大洲的被殖民國家，包括愛爾蘭。作者同時在這個時空的座標裡耙梳後殖民情境中眾多議題的發展脈絡和相互關係，例如民族主義和女性主義在殖民情境中的互助與矛盾，以及這種關係在後殖民情境中的發展，或是在反殖民抗爭中暴力與非暴力策略的發展與相互的辯證關係。作者同時也不忘以反殖民抗爭中的主要領導人物的理念和反抗策略，甚至心理狀態，做為他歷史導引鋪陳的軸線，例如卡布拉爾（Cabral）、康納利（Connolly）、法農、甘地、切·格瓦拉、恩克魯瑪（Nkrumah）、毛澤東、馬力亞特吉（Mariátegui）、桑戈爾（Senghor）等。譯者必須要在這樣複雜的脈絡中，不因眾多的地名、人名、事件和概念而迷失方向。因此，在翻譯的過程中有許多時間是花在搜尋和查閱資料上。同時譯者也在譯文中加入一些譯註，讓讀者節省搜尋資料的時間。但有些地方確實是超出譯者的能力所及，有錯誤和不足之處，也請方家不吝指正。原書也有幾處出現句子不完整或誤植的句子，譯者也盡量參考資料加以校正。

本書的前言到21章是由周素鳳翻譯，21至25章是由陳巨擘翻譯。26章到尾聲則邀請台大社會學研究所碩士黃克先幫忙譯出初稿，再由兩位譯者共同校訂和添加譯註。完稿之後由周素鳳再做全書的統整，以及索引的中譯和彙整。本書是由巨流圖書公司和國立編譯館合作出版，國立編譯館所聘請的外審極為認真、負責，提供給兩位譯者許多寶貴和深具啟發意義的建議。兩位譯者非常感激。

## 前言

又是在電影院裡。比上一回去看電影的時候還早一些，其實那是我有生首次到電影院。我們走出晚秋柔柔的陽光，帶著濃濃的興奮，邁入海藍色的裝飾藝術大樓，經過門廊的燈，踩著紅色的地毯，跌進一室巨大的漆黑中。包廂上的座位橫亙在我頭頂上；低頭看就是寬廣的銀幕躲在厚摺的布幕後面。關鍵的時刻，布幕就拉開，或者掩上。電影開演前先上映的是百代電影公司的新聞短片<sup>譯註1</sup>。銀幕突然出現巨幅的黑白畫面，布達佩斯的街頭，19世紀建築的公寓區，高聳於黑暗的樓房之間，光禿禿的樹枝點綴其中。坦克車沿著電車軌道行駛在鵝卵石的街面上；人們來回奔竄，孩童們將汽油彈丟向坦克車。那是1956年的11月。納吉（Imre Nagy）宣布匈牙利維持中立，但卻沒有一點作用，只好向西方求助。美國政府向俄國的赫魯雪夫（Khrushchev）保證美國不會介入，於是俄國進軍匈牙利，要將匈牙利人從他們本國人手中，以及他們所主張的民主自決中「解救」出來。鏡頭在這些殘忍絕望的場景停了一下，接著轉到埃及薩伊港（Port Said），燦爛的陽光把畫面的對比染的更白了。鏡頭轉向精煉廠熊熊的烈火時，天空一片漆黑。然後畫面上一條黑色的細條，從右上方一直蜿蜒到左下方：蘇伊士運河。英國和法國的軍隊進駐，為的是要拯救埃及，脫離納瑟（Nasser）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即使英國幾乎是十年之前便離開它所領導的印度。不管年輕或上了年紀，一旁英國的觀眾突然被權力的種種隱喻所帶動，主播透過清脆飽滿的聲音宣稱：「我們的軍隊已前往鎮壓民族主義者的叛亂，為的是拯救世界，免得落入英國首相伊登（Eden）所說的另一個希特勒的魔掌中」。兩段黑白新聞片中都是黝黑的軍隊，冷靜而木然地執行他們以武力宰制他人的任務。之後，正片開始了，亮麗鮮明的顏色，豐富悅耳的聲音。那是迪士尼的《小鹿斑比》。

寫這本書的時候，我的腦海中一直浮現兩張照片。黑白的五〇年代，我童年時期所經歷的同樣矛盾的歲月。兩張都是阿爾及利亞的照片，兩張照片具有一種跨越性別的顛覆力量，讓我對殖民勢力，以及殖民慘烈的真實狀況產生質疑。第一張照片在一本破舊的平裝本中，書名是《阿爾及爾之戰》（*La Bataille d'Ager*）。這是在一年在炎熱的夏日午後，我帶著小孩逛馬諾斯克（Manosque）的阿拉伯區偶然看

<sup>譯註1</sup> Pathé newsreel：二次大戰期間，美國百代公司製作五到10分鐘長的新聞影片，在電影院中播放，是最早定期發行電影新聞片的公司。

到的。這本書和同名的電影並沒有關係；這本書是法國拓居者——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拓居殖民者——在1957年4月所出版的宣傳品，當時「阿爾及爾戰爭」仍在進行。書中收了許多照片，以正面的角度彰顯法國軍隊和阿爾及利亞人民的關係。書的卷首插圖是一個微笑的士兵，背著步槍，一邊走，兩手握著兩名少女的手，其中年紀較大的一個戴著面紗。另一張照片中還是這名士兵，還是微笑，站在一個殘破的交通警告標示牌下面，牌子上面是一所學校，還畫著兩名學童正在過馬路。士兵和一名剛學會走路的幼童握手，幼童母親的臉完全被面紗覆蓋著，和另外兩個小孩站在後面，照片下的小字寫著：「我們回到學校了！謝謝你，先生」。但是真正讓我不忘懷的照片是另一張兩個比較大的女孩，我猜應該是十多歲，沒有戴面紗，她們的穿著顯然是西式的。兩個人並肩而站，眼睛向上看，似乎要看透照片，遠眺另一方。她們的眼神強烈堅決，非常嚴肅，但是在近距離的特寫鏡頭中，那種強烈的神情同時也散發些微的性感神韻。其中一名女孩頭髮盤起，有一點毛毛亂亂的，她的手放在雨衣的拉鍊上，手指將拉鍊往上拉，蓋住底下層層的衣服。她的雙唇緊閉，和她叛逆的眼神一樣地堅定。另一名女孩的頭髮散在肩上，戴著無邊眼鏡，圍巾整齊地繞住脖子，在大衣的衣領間。她的嘴唇略開，但是她的眼神同樣有一種不服輸的神情。照片下的文字寫著：「體育館的兩名放置炸彈者：朱莉葉（Juliette）般的年齡，卻有著和拉瓦肖爾（Ravachol）<sup>譯註2</sup>一樣邪惡的靈魂」。這兩個人應該就是艾可亨（Djouher Akhoro）和侯新娜（Baya Hocine）——1957年2月10日在首都阿爾及爾和愛貝荷（El-Biar）的體育館藏放炸彈而被逮捕的兩名少女。掀起阿爾及爾之戰的爆炸事件對拓居殖民者而言實在是一個很大的震撼，這意味著獨立戰爭是與他們做對，而且就爆發生在他們日常的生活。警察很快地就逮捕了這些被這本書稱為「一群惡劣的匪徒。其中的兩名女孩知道自己不會被搜查，所以負起攜帶炸彈到犯罪現場的任務」。該書作者還說，他們之中有四名經過軍事審判，在3月判處死刑。這兩名女孩在不在被處死的四名之中呢？她們是否也承受審訊過程和即決行刑（summary executions）（即使是在法國也只被當成「折磨」）？她們是否也和布帕恰（Djamila Boupacha）面臨了同樣的命運（de Beauvoir and Halimi 1962）？她們和書中卷首照片中微笑的孩子們多麼不同啊！她們嚴肅的臉龐加強了叛逆的味道，強烈的凝視顯示她們完全拒絕向逮捕她們的人屈服。阿爾及利亞真的掀開了面紗。從阿爾及利亞到肯亞，從印度到愛爾蘭，從越南到南非，有多少解放鬥爭的進行都有像她們一樣不肯妥協的婦女，勇敢地投身參與？

第一張照片是堅毅強悍的女性，第二張讓我無法忘懷的是一個女性化的男性。

<sup>譯註2</sup> Francois Ravachol (1859-1892)：法國人，認為以組織對抗資產階級根本無效，強力主張以暴力和殺人的手段才能消滅資產階級，被稱為「丟擲炸彈的無政府主義者」(bomb-throwing anarchist)。

我在阿爾及利亞戰爭史的第二冊（Courrière 1968-1971）看到的：我只是瞥了它一眼，從此就無法從我腦海中抹去。這張照片和下面另一張一堆屍體的照片中間寫著：「『大搜索』中罹難的穆斯林」。兩張照片都很小，對比不是很好，有點不夠清晰；業餘的作品。書裡放的照片有許多張顯示各種不同的殘酷暴行：屍體，無法辨認的屍塊，大人的、小孩的、穿衣服的、沒穿衣服的、被燒焦的，一具具橫在路面上。這些「不假修飾」的再現（representations）死亡面貌的照片，穿插了一張一眼看到就覺得完全不搭調的照片。四名歐洲人站在一片空地，對著鏡頭，有的微笑，有的大笑，顯然是興致高揚，他們四人將另外一個人高高舉起，好像是在玩「舉高衝」（the bumps）——同性運動員之間粗暴戲謔的遊戲。他們戴著寬寬的帽子，而他沒有戴帽子。他們手中抓的這個男生全身赤裸，明顯看的出來是阿爾及利亞人。他的雙腳被扒的開開的，高高舉在空中，割過包皮的生殖器毫無遮掩地裸露，像色情雜誌上扭曲的「雙腳張開的」鏡頭。他的臉流露出卑微的畏懼、痛苦和驚恐。但是他還是看著鏡頭，也許只是出於自動的反應，就好像是平常照相時對著鏡頭擺姿勢（如果他以前真的有照相擺過姿勢的話）。或者，他只是被那個鏡頭吸引，也想看清鏡頭後，藏在相機之眼後面攝影師的眼睛？在照片中他任人擺佈，那四個拓居移民會對他怎樣？這是不是就是生與死之間？可能性實在太明顯了，他的脆弱無助被戲劇化，太過於自覺地戲劇化，毫無疑問地，他的結局幾乎已經注定。

對我而言，這些意象一直就是後殖民的表徵。我看到個體所經歷的暴力、反抗、掙扎以及苦難，這些點點滴滴代表他們所奮力爭取的社群、平等、自決及尊嚴等各種政治理想，以及他們所奮鬥爭取的尊嚴。在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中，150萬阿爾及利亞人喪生。這張照片所記錄的只不過這其中的一個事件而已：暴力和殖民貶抑欺蔑的承受者／主體，無緣無故地被逼上毫無人性的死亡邊緣。

## 致謝

過去這些年來，本書各章曾以不同版本的論文形式在各地的演講、討論會和研討會中發表——我非常感謝在我思考這些議題時，所有的人給我的回應、批評和協助。羅德尼（Walter Rodney）在他的書——《歐洲如何低度開發非洲》（*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中的〈致謝〉說，書中如果有任何錯誤都不是他個人所應承擔的責任。我打算不像他這麼極端；我要感謝的是許多知識分子所匯集而成的、知識的結合力量——包括我個人的朋友、同事和學生；他們以許多方式幫助我，無論是一般的方式，還是特別的方式都有。使我受益最深切的就是討論，無論是針對大的議題抑或小的細節的討論。我誠摯地感謝 Isobel Armstrong、Nilanjana Banerji、Eitan Bar-Yosef、Geoffrey Bennington、Elleke Boehmer、Kingsley Bolton、Rosinka Chaudhuri、Ban Kah Choon、Arif Dirlik、Aida Edemariam、Maud Ellmann、Robin Fiddian、Kate Flint、Tadgh Foley、Giles Fraser、Indira Ghose、Luke Gibbons、Robbie Goh、John Gurney、Elaine Ho、Stephen Howe、Christina Howells、Christopher Hutton、Belinda Jack、Suvir Kaul、Douglas Kerr、Neil Lazarus、Gregory B. Lee、Ania Loomba、Matthew Meadows、Jon Mee、Bart Moore-Gilbert、Susheila Nasta、Bernard O'Donoghue、Lionel Pilkington、Bruce Robbins、Sara Salihv Rumina Sethi、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Harish Trivedi、Megan Vaughan、Gauri Viswanathan 以及 Wangui wa Goro。另外，Homi Bhabha、Lyn Innes、Lois McNay、Benita Parry、Rajeswari Sunder Rajan、Nicholas Royle 和 Else Vieira 曾經以他們各自專精的領域，針對特定的幾個章節提出詳盡的批評和指教，對我幫助甚大，特此致謝。我還要感謝我在編輯《介入》（*Interventions*）期刊時的同事們，尤其是 Alison Donnell、Ato Quayson 和 Rajeswari Sunder Rajan，他們是我的靈感、支柱和方針。我特別要感激的是鼓勵我開始著手寫這本書的 Anita Roy。書中所討論的許多議題都是我和 Ruvani Ranasinha 以行動政治和理論的角度不斷相互質詢激盪而產生，對此我要特別致上最深的謝意。Homi K. Bhabha 從一開始就和本書的計畫關係密切，一直以他特有的溫暖、敏銳以及對知識團結互助的的信念熱忱，給我許多意見——他真是一個志同道合的「夥伴」（*compañero*）。另外，我由衷感謝 Rita Kothari 促成我到印度做研究，幫我翻譯古吉拉特語（Gujarati），耐心地為我解答許許多多的問



題，必要的時候還得幫我糾正。尤其是書中有關甘地的分析，許多都是就教於她的成果，我要特別提的是有關‘*samas*’一詞的分析，都是仰賴她語言學的討論。我也感謝 Abhijit 的熱忱和 Shamini 的友情。在印度的時候，和一些朋友的討論使我收穫很多，包括 Siddharth Bhatt，Navajivan 出版社的 Jitendra Desai 和 Tridip Suhrud，他們花費了許多寶貴時間，以他們的專業提供許多幫助。我很幸運，一直能夠有 Andrew McNeillie 當我的編輯。我也要謝謝 Jack Messenger，他細心地為我核對校訂原稿。我還要謝謝 Badral Kaler 全心的支持和寬容，也謝謝我親愛的孩子 Maryyam、Yasmine 和 Iassc，他們在我寫書這段期間，總是大清早就來訪。

謝謝英國國家學院 (British Academy) 給我研究休假的機會，才能讓我完成這個大計畫。也謝謝牛津大學英文系和「國際新聞基金會」(News International Fund) 慷慨提供我到印度研究的經費。在本書撰寫期間，我有幸可以利用 Bodleian 圖書館的藏書；我要特別謝謝牛津大學 Rhodes House 和 Queen Elizabeth House 印度中心的館員，他們熱心幫我追蹤資料。另外，我要謝謝印度阿穆達巴 (Ahmedabad) 的甘地紀念館 (Sabarmati Ashram)，以及甘地所創辦的 Navajiva 出版社，還有新德里的「尼赫魯紀念館暨圖書館」、Teen Murti House、國立甘地紀念館等的主任和館員允許我使用他們的檔案和圖書收藏。最後，我要謝謝牛津大學 Wadham 學院的校長和同仁的支持，提供我良好的工作條件。

本書第 27 章的幾段曾經以不同的形式發表在《新規則》期刊第 25 期〔*New Formations* 25 (1995): 57-65〕的〈傅柯談種族與殖民主義〉(‘Foucault on Race and Colonialism’)。第 28 章的舊版本曾經發表在 Nicholas Royle 編著的《解構：使用指南》(*Deconstruction: A User's Guide*,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0)，頁 187-210，並經過出版社的同意，收錄在本書中。本書引文中以斜體強調之處均根據原始資料。

## 1.

## 殖民主義與後殖民批判政治

全球性組織「倖存」(Survival) 一向致力於協助部落民族的權益，該組織為了喚醒大家第一批歐洲人抵達巴西已歷經 500 週年的事實，在西元 2000 年 5 月展開為巴西印地安人爭取土地擁有權的運動。「倖存」在宣傳冊頁上將此運動題為「巴西：500 年的抗爭」，凸顯一個「憂鬱的熱帶」(*tristes tropiques*)<sup>譯註 1</sup>一段掠奪與種族絕滅的歷史：

葡萄牙人踏上巴西時，當時有五百萬原住民。然而隨著侵略者所帶來的疾病、奴隸制度和暴力，原住民族幾乎被完全消滅。現在，他們只剩下 33 萬人。

巴西原住民族現今仍必需面對被驅離自己土地的事實，還必需面對所有隨著伐木者、拓居者、挖金礦者以及有權勢的政客和商人為他們帶來的暴力和疾病。

當代的亞馬遜河淘金熱其實就是 19 世紀末亞馬遜橡膠熱潮的翻版。1910 年一位曾從事英國領事事務的凱斯曼 (Roger Casement) 爵士應英國政府的要求，著手調查秘魯亞馬遜公司 (Peruvian Amazon Company) 被指控對普圖馬約河 (Putumayo) 印地安人所做的殘暴行為。該公司是英國公司，當時在巴西和秘魯邊境從事橡膠的提煉。凱斯曼本身是愛爾蘭人，他和莫瑞爾 (E. D. Morel)<sup>譯註 2</sup> 早先曾協助揭發在所謂的「剛果自由邦」(Congo Free State) 的種種暴行，也就是康拉德 (Conrad) 在 1899 年的《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 所描述的景況。陶思格 (Michael Taussig) 有個觀點頗具說服力，他認為凱斯曼爵士總讓人聯想到《黑暗之心》中的寇茲 (Kurtz) 上校 (Taussig 1986)。在非洲的時候，凱斯曼對帝國主義宣稱教化非洲人民的說法抱持懷疑的態度，後來他在亞馬遜盆地所調查到的事實更加深了他的疑慮。

譯註 1 《憂鬱的熱帶》(*Tristes Tropiques*) 為法國結構人類學學者李維史陀 (Claude Lévi-Strauss) 在 1955 年的著作。李維史陀曾親訪亞馬遜河流域和巴西高地森林，從事土著的田野研究。

譯註 2 Edmund Dene Morel (1873-1877)：法國人，在 1900 年出版《剛果醜聞錄》(*Congo Scandal*)，揭發歐洲商人壓榨非洲人的行徑。



### 如何對待部落民族

這些人不只是被謀殺、鞭打，他們像野獸般被戴上鎖鍊、被到處獵殺，他們的住處被焚燒，妻子被強姦，他們的小孩淪為奴隸與罪犯，被毫無廉恥地交易。以上用字雖然強烈，但還不夠強烈。我相信這裡實際的情況是現在世界上最可恥、最無法無天、最不人道的。其腐敗與道德淪喪的程度遠遠超過剛果政權最橫行霸道的時候。……人民所承受的是可怕而兇殘的奴隸生活。……一想到所謂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文明所加諸於這些人民的痛苦，真叫人不寒而慄。（Casement 1997: 294-5）

凱斯曼返國後呈上一份報告，向英國政府證實了這些暴行。這整件事情的確是一個歷史的反諷：凱斯曼本屬被殖民者中的高雅之流，後來卻置身於「解放」後殖民的巴西原住民的運動的中心。而歷史的反諷在六年之後更加突出了，因為當初授與他爵士頭銜，說服他代表英國到巴西的英國政府，卻在1916年8月3日以叛亂罪將他處決。他是在搭乘一艘德國潛水艇返回愛爾蘭，在開瑞郡（Kerry County）的巴那海灘（Banna Strand）被捕，就在都柏林的「復活節起義」（Easter Rising）之前的幾個小時。由此可見，不只是拉丁美洲在殖民與後殖民的現代性尚未銜接的時差中運作。同時由這個事件也可看出，反殖民主義和後殖民主義之間在政治上不見得是斷裂的。後殖民主義已經和離散（diaspora）、跨國遷移、國際主義各方面互有關聯，但是反殖民主義卻往往具排他性，過分排除其他，只認同地方性的民族主義（provincial nationalism）。但是在波爾戰爭（Boer War）之後，它所採取的是民族的國際主義（national internationalism）的形式。反殖民主義和後殖民主義一樣，是因為離散而形成的，是本土固有元素和世界主義的元素，兩者革命性的混合，是地方性的知識和激進、普世的政治原則結合，形成複雜的組合，透過政黨細胞和組織的國際性網絡而建構、促進發展，並且和不同革命組織之間做廣泛的政治接觸，藉此互通實務上的訊息，彼此給予實質的協助，相互傳遞激進的政治和知識理念。這種去中心的（decentred）反殖民主義網絡不只涵蓋了「黑色大西洋」（Black Atlantic），它還包括全球所有具有革命性的黑人、亞洲人和西班牙裔，以其反現代性（counter-modernity）的動力而建構成形，藉此對抗全球的帝國主義，在對抗過程中為我們的時代證明「全球化」並不一定就是不可抗拒的總體化（totalization）。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帝國列強以占領或各種方式控制了地球表面十分之九的領土：世界的五分之一領土和四分之一的人口由英國管轄。列寧（Lenin）在1916年說：「這是第一次，世界已經完全被瓜分完了，因此，未來只有重新劃分的可能。」（Lenin 1968: 223）世界上已經沒有任何空間可以擴張領土，所以貪得無厭的帝國紛紛向內轉，企圖吞食彼此。第一次大戰之後，兩個鄰近的帝國——奧匈帝

國和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決裂，而德國失去了海外殖民地。隨後，德國企圖將歐洲變成它自己的殖民帝國，所以大舉將移民的殖民主義（migrationist colonialism）重新納入「生存空間論」（*Lebensraum*）的意識形態中：法屬殖民地馬提尼克島的大作家兼行動派政治家塞傑爾（Aime Césaire）是第一個指出法西斯主義其實是殖民主義的形式在歐洲內部實現（Césaire 1972; W. D. Smith 1986）。對殖民帝國而言，解放或打敗德國的代價就是他們的殖民帝國逐漸分崩離析，而戰敗的義大利在1945年失去其戰前所有的殖民地。日本先前為了爭奪東南亞和太平洋，而與同為帝國的列強——歐洲殖民勢力，特別對美國——勁敵競爭，後來也喪失了海外的領土。

除了屬於法西斯政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這兩國在大戰時維持技術性中立）的殖民地，以及採行愈來愈法西斯的種族隔離的南非政權，還有不斷擴張的蘇聯和美國兩大帝國之外，其他七個殖民列強（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丹麥、澳洲和紐西蘭）在1945年的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歷程相當迅速。1947年，隨著印度獨立開啓了歐洲各國的去殖民化的過程。到現在，去殖民可說是大部分已經完成了，即使殖民地、從屬國、託管地、海外部門（overseas departments）等諸如此類以某種形式存在，但仍含有殖民主地位意涵的名稱仍舊是長長的一大串，著實叫人驚訝〔現存的殖民地有各式各樣的名稱指涉它們仍屬依賴的地位，例如以從屬為名者包括：英屬直布羅陀（British Gibraltar）、福克蘭／馬爾維納斯群島（Falklands/Malvinas）以及其他十幾個島嶼；丹屬格陵蘭（Danish Greenland）；荷屬安地列斯群島（Dutch Antilles）；法屬圭亞那（French Guiana）、馬提尼克島（Martinique）、留尼旺島（Reunion）、聖皮埃爾和密克隆（St Pierre and Miquelon）、紐芬蘭（Newfoundland）；美屬波多黎各、薩摩亞（Samoa）、維京群島（Virgin Island）；西屬休達（Ceuta）、梅利亞（Melilla）、加那利群島（Canary Islands）〕。太平洋上的許多島嶼仍屬於法國和美國的殖民地。美國本身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根據艾許克洛特（Ashcroft）、葛瑞斐斯（Griffiths）和帝芬（Tiffin）（1989）的說法，美國其實可以技術性地稱自己是「後殖民」，但是它卻很快地變成了殖民列強之一。身為世界上最後一個重要的殖民勢力，美國不顧原本住民的意願，繼續控制著那些或因吞併而得來的領土（如在1898年所併入的夏威夷，以及在美國原住民眼中的整個美國），或於戰爭期間而得來的土地（加州、德州、內華達州、猶他州、亞歷桑那州的大部分、墨西哥州、科羅拉多州的一部分，以及懷俄明州、波多黎各、關島），或是購自其他帝國列強的領土，例如希臘要求大英博物館歸還他們的帕得嫩神廟埃爾金石雕（Elgin Marbles），當初石雕賣給埃爾金伯爵時，希臘在處外國勢力的控制之下，因此，美國所購買土地的種種交易不再合法（其他尚有：路易斯安那州在1803年，以1,500萬購自法國，1819年向西班牙購得佛羅里達州，1867年向俄帝政府以720萬買下阿拉斯加，在1916年以胡努

(Tovalou Houenou) 所形容的奴隸交易的現代形式，以2,500萬的代價從丹麥手中買下了維京群島以及當地的居民)。

4 現在的後殖民時代也有些可相互類比，但形式又不相同的反殖民抗爭，都是發生在近期被占據的國家：東帝汶 (East Timor) 在屬於葡萄牙的殖民地時被印尼侵占，經過長期的抵抗現在終於獨立；西藏被中國占據，台灣被中國國民黨政府所占，喀什米爾 (Kashmir) 被印度占據〔自從1947年與巴基斯坦開始互相爭奪這塊領土所有權，印度一直固執地拒絕聯合國的提議，不願意讓穆斯林 (Muslim) 人口占絕大多數的喀什米爾舉行公民投票，讓當地人決定喀什米爾是應該獨立，還是應該屬於印度或屬於巴基斯坦；印度持續以軍力占領該地，頑強地對抗當地激烈的抵抗〕；撒哈威民主阿拉伯共和國 (Sarhaoui Democratic Arab Republic) (西撒哈拉) 屬於摩洛哥，巴勒斯坦和西岸 (West Bank) 屬於以色列——以及羅汀生 (Rodinson 1973) 所主張的以色列國家 (state of Israel) 本身；那些致力於脫離統治國家的控制，尋求獨立的「原民國族」(First Nations) (加拿大、衣索比亞、紐西蘭，美國)，或是身處邊界地區，尋求獨立的原住民族〔如庫爾族 (Kurds)、塔米爾族 (Tamils)、唯吾爾族 (Uyghur)〕；或是那因去殖民化而尋求與鄰近的去殖民國家聯合的人民 (北愛爾蘭少數天主教徒期望結合成一個聯合的愛爾蘭)，或是那些只不過追求存活的部落民族，或是那些在殖民占據時被迫移居到殖民地的人，他們之中許多人希望返回自己的國家卻不得其門而入 (日本的韓國人)，或是那些要求基本的法律與社會平等權力的「第四世界」(fourth-world) 民族〔美國原住民、澳洲原住民、印度所謂的「撤除通知」(denotified) 譯註3 部落、孟加拉 (Bangladesh) 的山丘部落、日本的愛努族人 (Ainu)〕，或者那些被階級排除在外，長期忍受社會污名化的人〔印度的賤民 (Untouchables)、日本的部落民 (Burakumin)〕，或者那些在世界大部分的國家中居於劣勢的少數民族和赤貧階級。

上述的這些抗爭奮鬥同時進行著，而歐洲和去殖民化的國家還在嘗試面對這一段漫長的殖民主義暴力史。以象徵的角度來看，這段歷史已經超過500年，始於1492年，囊括了被奴隸的人，還有那些未被揭露、不計其數的、因壓迫或漠視致死的人，以及數百萬被迫遷徙、漂泊離散的人——非洲人、美洲人、阿拉伯人、亞洲人和歐洲人的歷史，也包括了領土或土地侵占史、種族主義的制度化、以及強制推行某一文化以消滅另一文化的歷史 (Chaliand and Rageau 1995; Ferro 1997)。後殖民文化批判就是要重新檢驗這段歷史，尤其是從那些受殖民之苦的人的角度來檢視，同時也要釐清它對當代社會和文化的衝擊。這就是為什麼後殖民的理論往往混

譯註3 印度某些部落民族沒有土地，不與當地人往來，居無定所。在1871年英國統治時期所頒布的「罪犯部落法案」將這些浪跡天涯的部落民族列為具有犯罪傾向的族群。該法案於1952年廢止，而這些人被冠以「撤除通知」(denotified) 部落之名。

合了過去與現在，為何它需要藉著掌握過去來研究現在各式各樣主動性的轉變 (active transformation) (Sardar, Nandy, Wyn Davies 1993)。後殖民並不特別眷顧殖民時期；它關注殖民歷史只因為這段歷史決定了現在權力結構的形成，因為世界上仍舊有許多人在承受殖民時期慘烈破壞的餘威，因為反殖民運動仍舊是後殖民政治的根源和啟發。如果殖民歷史，尤其是19世紀的殖民史，是一段帝國的侵占史，那麼，20世紀的歷史已經見證世界上各民族紛紛討回屬於他們自己的權力和掌控權。後殖民理論本身就是這段辯證過程的產物。

做為一個政治的論述，後殖民發聲的位置 (無論是用言說的形式或以出版的形式) 放在南半球的三個大陸，也就是「第三世界」。針對「第三世界」這個名詞，已經有許多論點詳述它的缺失。這個名詞一直受到批評，有的批評認為這個詞代表反馬克思 (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所建構的是「第二世界」)，有的批評認為「第三」的觀念含有負面的意味，在階層的劃分上是低於第一第二，以致於「第三」逐漸被聯想到貧窮、負債、飢荒和衝突 (Hadjor 1993: 3-11)。因此我在這本書中會盡量避免使用「第三世界」這個名詞，我將根據1966年阿布代·馬力克 (Anouar Abdel-Malek) 在哈瓦那 (Havana) 的「非、亞、拉美人民團結聯盟」(Organization of Solidarity of the Peoples of Africa, Asia and Latin America) 第一次大會上的用語，以地理、位置和文化角度描述的「三個大陸」或「三大洲」(指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這個用語避免了「第三世界」的問題，也避免隨意將「南半球」同質化，甚至也可避免「西方」和其餘的非西方世界之間，截然清楚的二分法所隱含的「非西方」的負面意涵——西方以外的其他地方是兩百多年來帝國主義幾乎不能認同的。最重要的是，「三大洲」一詞代表認同1966年哈瓦那的三洲聯合，它開啓了置身在這三個大陸上的人民第一次的全球結盟，共同對抗帝國主義，同時也在它所發行的期刊《三大洲》(Tricontinental) 中開始建立後殖民理論。「後殖民」這個名詞所引發的問題將在本書的第五章討論，現階段我想先指出：「三大洲主義」(tricontinentalism) 比「後殖民主義」更為貼切。「三大洲主義」精確地掌握其國際性的政治認同，以及對其認知的根源。

後殖民批判，或者說三大洲批判，是針對西方殖民主義的歷史及其後續發展而發，因為有共同的政治和道德的觀點而結合。它認為1492到1945年歐洲擴張並侵占地球上多數的大塊陸地，這一段過程特殊，而且有其爭議性。這一段歷史的殖民主義有其特殊性：不是任何舊式的壓迫，舊形式的不公平，或者一些舊式的連續戰爭和領土侵占。現代性理論家，如蓋爾納 (Ernst Gellner) 反對這樣的觀點，認為殖民主義不需要特別關注，因為殖民時期各種的壓迫形式和過去任何征服或權力的展現沒什麼兩樣，甚至和傳統社會或現代社會內部的實踐並無二致。蓋爾納主張：「西方近期對世界的宰制可被視為……主要是由新的科技、經濟和科學所帶來的一

個改變；由於這些新事物的散播並非平均普及，以致於剛好形成一個暫時性的不穩定、不均衡的勢力發展」（Gellner 1993: 3）。由這樣的觀點看，殖民主義只是因為現代性而產生的不幸的偶發事件，它唯一的問題就是西方誤把科技的先進和它所帶來的力量當做是文化的優越。無論如何，把殖民主義一股腦兒歸因於現代性，實在是一個信手拈來的偏差。首先，像這樣殖民主義的歷史有其特殊的全球面向，不只是因為在19世紀末期帝國的高峰期時，殖民的狀況遍及各地，而且是因為西方帝國勢力的全球化影響，將原本具有各種不同歷史傳統的許多社會熔在一段共同的歷史中，強迫他們依循相同的經濟途徑，除了在那一段由中央控制命令經濟的時期之外。現在，全世界的運作主要都是在西方所發展、控制的經濟系統之下。就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力量而言，西方此一經濟上的持續宰制賦予這段歷史持續衍生的意義。政治的解放並沒有帶來經濟解放——而沒有經濟的解放就不會有政治的解放。

6 西方列強對其擴張自有道德的辯解，宣稱他們為了其他國家的利益著想才將其納入統治，然而，這種以文明教化之名宣揚的各種價值現在受到有效的質疑。這個質疑的過程在20世紀以來一直持續著，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大戰的結果不只證明了帝國列強在軍事上的脆弱，特別是面對非西方的日本帝國的時候；另一方面，列強喪失了一直被拿來為他們的殖民主義辯護，不曾受到質疑的西方文明的道德優越感。此後，西方變成是相對的了：做為一個意識形態，西方的沒落是無可挽回了。或許像那些為它辯護的人所說的，殖民主義曾經帶來現代性的某些好處，但是就人類的角度來看，它也造成無比尋常的痛苦，對其觸及之當地文化尤其毀滅性。就這個部分來看，後殖民批判實在稱不上是第一個質疑殖民主義的道德性：反殖民主義確實和殖民主義的歷史一樣久遠。後殖民主義之所以會特出，是因為它的研究涵蓋廣泛，深入殖民主義長期以來對殖民和被殖民社會的文化和政治所造成的各種影響。另一方面，這也顯示殖民主義所滲透的層面實際上遠遠超過以前所認定，它廣泛地滲入一般文化的層面，包括學術文化。後殖民領域諸多活動的核心就是像考古學般地還原和重估。後殖民理論包括殖民主義文化史的政治分析，探討它對當代的西方和三大洲文化的影響，並且將過去和現在的政治加以連結。

後殖民研究認為，許多違反人性的的錯誤（如果不用「罪行」一詞來形容的話）是北半球對南半球的經濟宰制所帶來的。由此觀之，反殖民的抗爭歷史中，馬克思主義在後殖民思想的基本架構上仍然占據十分重要的歷史地位。後殖民理論一直藉助於馬克思主義批評，並且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傳承中運作，但是同時也依據一些來自三大洲、有開創性的偉大反殖民知識政治家的思想而有所轉變。在整個20世紀大多時候，唯有馬克思主義不斷強調整個帝國主義體系的影響，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宰制的權力結構，而在擘劃未來的藍圖時，它所描繪的是一個沒有宰制和剝削的

未來，大多數20世紀反殖民著作都是受到社會主義的各種可能性而有所啟發。三大洲理論家的貢獻就是調和馬克思革命理論中可以轉譯（translatability）的特性，以及某些特定的非歐洲歷史和文化脈絡中無法轉譯的特質。馬克思主義代表革命政治的一種形式，同時也代表人類歷史上最豐富、最複雜的理論和哲學運動之一；就某種意義而言，馬克思主義一直是反西方的，因為馬克思所批判的就是針對西方社會和經濟的實踐及其代表的各種價值。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總是把他們的革命認定為「東方的」。

7 如果說20世紀大部分反殖民主義的行動派和他們的書寫都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這多半都是因為馬克思主義一直注意到創造革命所代表的主觀情勢的意義；因此，馬克思主義在實踐時已經被修正成適合非西方的狀況，也就因此一點都不符合古典主流的馬克思主義。由於這段歷史過程，後殖民馬克思主義不一定是大家所認識的那些共通的西方形式——然而，具有彈性的馬克思主義能夠因應特殊的歷史狀況而不斷地轉變，從來就不是教條式的不可變通，但是它仍然貼近馬克思的精神，尤其是列寧。正如來自千里達的偉大社會主義者潘得墨（George Padmore）的觀察，在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後，列寧將「方針朝向亞洲和非洲，這樣的策略是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激進偏離（radical departure）」（Lenin 1988: 233; Friedland and Rosberg 1964: 225）。後殖民主義結合了在西方以外的地區所發展的馬克思主義，被西方普遍忽視的馬克思主義，變成一種因應非、亞、拉美三大洲各地狀況，而且具有彈性的馬克思主義。但是，我們不需要因此而將它稱為「後馬克思主義」——畢竟，資本主義本身也時常在變，但從來就沒有變成「後資本主義」（而且，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垮台，可是卻沒有因此被解讀為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終結）。後殖民主義文化批判把馬克思主義融合運用到國際性權利的政治，這麼一來，焦點就放在把馬克思主義視為政治哲學的核心問題；也就是說，如何用群眾歡迎的方式發展社會主義，而不是強制的形式。人權，包括各民族的權利，應該被視為屬於行動主義的範疇，不但補充並且支持馬克思政治理論的基本前提、目標，及其對人類正義的承諾。後殖民批判緊盯著壓迫史，這一段被所有非民主國家的各種政治信念——各種形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軍事主義、法西斯主義——所壓迫的歷史到現在才被承認，而另一方面，後殖民批判也注意其他被邊緣化的壓迫形式。

後殖民理論和正統的歐洲馬克思主義的不同在於，將客觀物質狀況的批判與對這些狀況主觀效應的詳細分析加以結合。因此，在當代政治、社會和歷史分析越來越走向文化主義時，後殖民理論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有些人認為這個文化的傾向是當代資本主義文化的典型徵候，而不是針對其潛在的動力提供一個分析的角度。就這樣的觀點看來，後殖民主義充其量就是描述了當代社會和經濟狀況的效應，鮮少能夠挖掘其中的緣由，甚或改變其基礎。無論如何，這個文化重點並非後殖民主

義獨有的：即使是西方馬克思主義也標記了法蘭克福學派和英國文化物質主義者與日遽增的興趣。就後殖民主義而言，這樣的發展其實不是最近才開始的。文化政治其實是文化革命這個觀念的產物，第三世界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康納利（Connolly）、馬力亞特吉（Mariátegui）、毛澤東、法農（Fanon）、卡布拉爾（Cabral）等人——最早將它發展成一個策略，以抵抗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的滲透。1944年毛澤東提出所謂的「文化工作的聯合陣線」，代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和階級政治對那些情況下的三大洲的社會顯然是不足的（Mao 1965, III: 185-7）。愛爾蘭知識分子在「蓋爾語文藝復興」（Gaelic revival）時提出非常具體可見的計畫，被視為是最早的文化政治，它所關注的重點是如何建構一個反資產階級的愛爾蘭的身分認同，而不是愛爾蘭的獨立（Foster 1988: 455）。但是這樣的文化政治的觀念隨後就被愛爾蘭和其他地方採用，做為發展反殖民意識的重要方式，以統合反殖民鬥爭。文化政治因為各地解放運動的不同而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廣泛推展。1960年代，受到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啟發，西方和三大洲的女性主義者和黑人運動的行動派就把文化革命當成政治的模式。例如，1969年在阿爾及利亞首都阿爾及爾舉辦「非洲團結組織」（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第一屆全非文化節（First All African Cultural Festival），在他們的宣言中強調，非洲文化在國家解放鬥爭中，以及非洲經濟、社會的發展占有重要地位：

文化始於人民的創造和改變環境，就最廣泛、最完備的意義來看，文化為人類的生活賦予形式；它不是自由承接，而是由人們建樹而成。……非洲的鬥爭提供了物質和精神的結構，在此結構中，非洲的文化得以發展，也因此證明民族的解放和文化有其自然的辯證關聯。對那些已獲得自由的非洲國家，以及正在和殖民列強武裝衝突的非洲國家而言，文化一直是，而且仍然會是武器。無論是什麼狀況，為解放而起的武力鬥爭從以前到現在顯然都是一件文化行為。（Lagnley 1979: 791-3）

文化政治觀念不需辯解——它一直是解放實踐的核心，而且，在發展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時候，文化政治在政治上所產生的效力，仍然有許多值得激進的行動派學習（Mazrui 1990）。對左派的人而言，尤其是在那些主要是從學術脈絡來做研究的人來看，文化主義似乎偏離比較直接的政治行動的範疇，但文化主義帶來許多正面的理論觀點：學術知識走向文化主義，代表它轉向考慮到個人的主觀經驗，以及團體和社群的社會化目標，這樣的文化趨向可補足只注意分析政治和社會系統的傳統模式，因為文化也是整個系統的一部分。知識和政治的文化走向也包含轉而注意到跨國的差異，以及性別文化的差異，並且體認到不同社群對知識有不同形式的意義。有了這樣的認知，才能開啓不同系統和觀點的提倡者之間的國際性政治對話，這是

前幾個年代裏鮮少發生的事（Robbins 1999）。舉例而言，主流的政治和經濟活動中的議題與實踐都已經開始改變，如在「發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裡，本土知識以及原住民的實踐往往被忽視，目前終於開始嚴肅地正視了（Munck and O'earn 1999）。

這樣的對話始於一種體認：帝國時代結束後，全球的勢力結構並沒有實質上的轉變。雖然這個事實似乎是不辯自明，但是這樣的說法恐怕忽略了兩個年代的相異之處，尤其是把「西方」和「三大洲」同質化了，同時也低估南半球和北半球在經濟、文化和離散各方面的現象有重疊之處。法農跟隨著沙特所翻譯的馬克思有關統治階級和勞工階級的辯證，經過列寧的被壓迫民族對抗施壓民族，走到殖民者和被殖民的辯證中。在後獨立（post-independence）的時代裡，這樣的辯證關係有時候已經被轉變成更進一步的全球對立：「第一世界」（主導的、宰制的——dominant）和「第三世界」（下屬的、底層的——subaltern）。「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之分不恰當，除了是因為「西方」還包括了數百萬的移民，其中有的是最近，有的不是最近移入的，更因為這種簡單化的劃分其實罔顧、無視於階級的區分在兩造都存在的事實：資本主義剝削西方的勞工，一如它剝削移民勞工，或者第三世界的工廠工人。後殖民批評家體認到，在當代資本主義核心地區，因階級或弱勢而受到壓迫的人，以北半球南半球來劃分並不會貶抑他們的鬥爭。殖民主義的運作往往是內部與外部並行，而且在社會上的階層之分仍舊持續的情況下。所有社會中屬同一階層的人應該享有基本的平等，此一激進的政治論點的核心概念就是〈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中，宏大而簡明的國際主義口號：「全世界的工人團結起來！」有了這個準則，馬克思和恩格斯主張採用一個共同的方式對抗壓迫，以免陷入民族主義的對立，也避免自戀地執著於民族和民族認同思想之間的小差異。他們強調全球底層階級的工人集體的行動主義。對抗殖民勢力的解放運動，和殖民帝國都會內的歐洲工人階級的鬥爭齊頭並進，一致行動，就像印度的階級鬥爭為殖民勢力和後獨立（post-independence）勢力之間的關係，提供一個歷史的範例和發展良好的實踐。

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政治實踐——工人必須有國際性的歷史性團結，以對抗資本主義的力量，這個理念目前依然持續（Cohen and Rai 2000; Sinha, Guy and Woollacott 1999）。然而這一點往往因為許多人過分簡化的假設而遭捨棄，認定「西方」以及身處西方的人（包括可能已經變成後殖民批評家的移民），通通是資本主義的化身；而「非西方」以及身處非西方的人（包括那些富有的新殖民菁英分子）都不屬於資本主義（Pasture and Verberckmoes 1998）。這樣的簡化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歷史敘述中尤其明顯，有時似乎就是認定所有的歐洲人事實上就是帝國主義者，而所有的非歐洲人都是帝國主義的犧牲品。事實上，美國是唯一的民主國家

從事殖民擴張行動 (Schneider 1982: xix)。在法國，女性一直到 1945 年才有投票權。而在英國，少數菁英分子成了領導的上層階級，控制英國人民和大英帝國，直到 20 世紀：英國和英國人民可說是這些上層階級的第一個帝國領域 (Riddell 1993: 69; Trotsky 1970)。正如牛津大學瑞吉爾斯講座 (Regius)，激進派的歷史教授高德溫·史密斯 (Goldwin Smith) 在 1863 年所說的，真正從帝國的勢力中獲得利益的不是英國的人民，而是英國國內有如寄生般的「帝國階級」(Smith 1863: 74)。英國在 1928 年才終於通過普遍的參政權，也就是英國允許其殖民地錫蘭有投票權的前三年，在歷史上剛好也是去殖民化的開始 (de Silva 1981: 422)。即使是我在撰寫此書的此時，英國在憲法上仍然不是民主國家：英國議會的上議院仍然包括了貴族，他們的對國家事務有投票的權利，只是因為他們碰巧生為「貴族」。在殖民時期，英國的統治階層對自己國家中的工人階級漠不關心，就像他們對待被殖民的人民一般：殖民帝國的工人和被殖民地的人民同樣經歷了自身的文化不斷地被貶抑，同樣地被當成工具般地利用，以創造私人財富。松頓 (A. P. Thornton) 曾問道：「英國在 1908 年人口 3,000 萬，其中只有 100 萬人的週薪超過三英鎊，而大約三萬的紳士擁有 96% 的土地。在這樣的情況下，除了帝國主義只注意這群最大多數的『本地族群』之外，英國人還會爲了什麼？」(Thornton 1985: 269)。殖民政權對被殖民者所做的壓迫的確無情而殘忍，但並不比屠殺數百萬被徵召的歐洲士兵更加殘酷——根據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的觀察，這種屠殺無異是「歐洲無產階級的大毀滅」，一起毀滅的還有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歐洲統治階級爲維護自己的利益，從非洲和亞洲徵召或募集成千上萬的殖民地士兵 (Carrère d'Encausse and Schram 1969: 145)。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掠奪和破壞而出現的布爾什維克革命，不但改變了歐洲階級政治的整個動力，帝國和殖民之間的關係也因此而有所改變：這是第一次，一個強國的政府，在原則上與實際行動上，公然反對西方帝國主義。1920 年列寧在「共產國際」中的〈論民族與殖民問題〉(‘Theses on the National and Colonial Questions’)，爲全球的去殖民化提出了第一個有系統的規劃。從此之後，大多數馬克思主義的國家都是位居歐洲以外的國家：在俄國、亞洲、非洲和南美洲。後殖民批判結合了兩大傳承，一是在反殖民鬥爭過程中，在非西方地區所發展出來的、融合的馬克思主義傳統，另一則是後來發展更進一步的解放形式時，爲了掙脫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所必需要進行的性別、族群和階級的解放。因此，從理論和歷史的觀點來看，後殖民批判在基本上是雜揉的 (hybrid)，是多種文化撞擊而生的產物；在理論方面它是跨學科、跨文化的，而且它所造成的影響也是如此 (Bhabha 1994)。因此，後殖民批判是一種行動主義的書寫形式，一方面回顧反殖民解放運動的政治作爲，從中得到啓發，一方面也體認到當時這些運動所發

生的狀況與現在大不相同。後殖民批判的方針根據現在政治的優先順序而有所變更，但是過去革命行動主義的根源提供了不變的基礎和啓發：它也同時也致力於將那些以往是歷史客體的人，改變成歷史的新主體。

本書的主要課題就是上述這些各種不同起源的歷史形成過程，以及其理論的產生。但是因爲其中材料範圍非常廣泛，這本書絕對不可能完備；充其量，只能說它爲進一步的研讀和研究提供了一些管道。想一窺這個革命性的反殖民歷史的全貌，這個過程仍有一段路要走。這些歷史牽涉到許多各自不同的敘述，是各種特殊情況和脈絡的產物。如果這些各具特性的歷史激發出類比的政治和理論論述，這是因爲外來勢力的宰制具有結構上的相似性。同時，在 20 世紀的過程中，反殖民革命者本身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不斷地相互接觸，因此在政治和理論有了匯集，爲「後殖民」的領域奠定了基礎。這段歷史中很清楚的一點就是：知識和政治的位置往往是針對當代當權者的鞏固權力；如果脫離了這樣針砭的立場，理論不一定會產生激進的政治實效。理論必須根據當時所處的特殊的可能位置，不斷被重新塑造、重新置放、重新導向。理論政治成爲行動主義的一個形式，往往就會介入或干涉某個特別的制度、社會或文化的架構，對抗對手的想法或政治。一旦這個狀況過去了，或者改變了，這個策略性介入的政治影響力大致就消失了。當然，理論也有它的歷史，而且，如果要理解其中的政治，一定要放在歷史的位置上去解讀。如果沒有這個方向，後殖民理論可能很容易淪爲反帝國主義的論點，成爲跨國資本主義中居主導地位的新意識形態中的一部分。如果把理論當成只是存在一個脫離現實的共時性層面中，好像它存在不受時間限制的空間裡，不需要考慮到它在某一特別的時候、特定的情況下所造成的衝擊，如果是這樣的話，理論就不能政治性地運作了。

後殖民批判把焦點放在當代世界中運作的壓迫力量和強迫性的宰制；是一個由反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種族、性別、民族主義、階級、族群特性等定義其範圍的政治。對過去壓迫史的關心將被引導到它和現在歷史的關係。就這層意義來看，後殖民理論的知識使命就是：永遠爲它所致力的理論工作尋求發展新的理論形式，期能開創具有動力的意識形態和社會的蛻變。正如卡布拉爾 (1969) 所定義的，它的目標是在達成政治獨立之後，追求解放。後殖民建構了一個具有方向的知識生產，尋求和各種不同形式的解放政治扣連 (articulate)，以綜合不同的工作，期能實現共同的目標，包括創造平等的管道讓大家都可得到各種資源：物質的、天然的、社會的和科技的；質疑各種宰制的形式，無論是經濟的、文化的、宗教的、族群的或性別的；扣連並維護政治和文化認同的各種形式。最重要的是，後殖民批判建立在這樣主張上：現今世界的知識應用以及行動主義有各種不同的形式，如果可以讓兩者發展出有意義的連結，就有可能在後殖民的學科範疇之內，甚至超越學科的範疇，產生有效的政治介入。

第一篇

觀念的沿革

*Concepts in History*

## 2.

## 殖民主義

## 一、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名詞定義

本書的論點是，後殖民批判（及其理論形成的歷史根據）乃是對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產物。雖然有些人指出，後殖民的「後」不只是歷史的標記，「後殖民」所包含的是任何對抗殖民主義的歷史形式（Ashcroft, Griffiths and Tiffin 1989），本書不採用那種無視於歷史年代脈絡的論點，除非是那些涉及歷史本身的非時序事件，如歐洲國家擴張而形成帝國主義鼎盛之前，許多南美殖民地就成為獨立的國家。在第一篇的四章中，我將以歷史的概念和角度，定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後殖民主義」等四個名詞。這些名詞所牽涉到的歷史知識對任何後殖民批判都十分重要。第八章將詳盡討論這幾個主義如何以廣泛的馬克思主義分析這些不同的類別。 15

如果說後殖民所代表的是針對任何一個時期的殖民主義而發的的批判，那麼它和帝國主義的關係是什麼？不採用「後帝國」，而採用「後殖民」一詞，這表示這兩者事實上是有區分的，但是，後殖民書寫中常常把「殖民的」（colonial）和「帝國的」（imperial）混在一起，好像這兩個詞是同義字。這種把兩者視為一體的傾向，在使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時尤其明顯，好像這兩者在實踐的層面上根本是同性質的。雖然很多人把重點放在不同被殖民文化的特殊性，但是這樣的傾向往往造成相對少量的歷史作品會注意到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多樣性，而事實上，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實踐最重要的就是兩者是異質的，而且往往是矛盾的。

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都牽涉到某群人從屬於另一群人的形式。這種宰制的歷史由來已久。傳統上，帝國多以擴張某一整片大土地為目標；例如，中華帝國，或者更引人注意的例子就是摩爾帝國（the empire of the Moors），其版圖在全盛時期從維也納擴張到西班牙北部——經過北非，繞一大圈。同樣的，被19世紀帝國主義者奉為模範，常常被拿來為他們的行為做道德辯解的羅馬帝國，以羅馬為中心向外擴張，勢力範圍龐大到一分為二，例如拜占庭帝國和神聖羅馬帝國，以一個整片土地為單位，化身為不同的兩個帝國。在16世紀時這種以地理做統合的形式，因為航海船隻的科技發展，以及源自海洋亞洲的航海輔助技術的使用，而有了巨大的改 16



變 (Scammell 1989)。對現代歐洲人而言，船是殖民化和帝國擴張的關鍵，藉此，帝國的觸角漸漸地伸到全世界。船不但使人口向外做地理上的拓展，而且讓這些人口得以和自己的故鄉聯繫。因此，例如臣屬於大英帝國，飄洋過海到美國的殖民者，和幾個世紀之前跨過巴林海峽 (Baring Straits) 的美國原住民，性質完全不同。最初的時候，像愛爾蘭這種英國的第一代，而且往往是特例的殖民地，幾乎都不會離帝國太遠，但是後來歐洲人能夠和遠在美洲的殖民者保持聯繫，展開一種迥異於早期移民不同的政治形式。也就是說，帝國不再拘泥於地理的統合性。就帝國而言，在中南美洲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國的運作根據兩個原則：榨取財富和改變當地住民的信仰。儘管西班牙帝國主義著眼於西班牙的大西洋經濟，但是它的基礎還是奧圖曼和羅馬帝國所採用的傳統模式，也就是朝貢的結構；而在印度的大英帝國年收入大多來自地租，某種程度而言，這也是依循同樣的模式。好戰的西班牙人極力要以基督教改變被殖民者，這其實是伊斯蘭的護教聖戰 (Jihad) 的翻版；當初摩爾帝國也同樣是為了宗教原因而殖民西班牙 (Burkholder and Johnson 1998)。另一方面，大英帝國在北美主要是為了拓居 (settlement)，則仍屬殖民，這一點可由美國仍然以「殖民時期」的名稱形容那個時段可以證明。這不是因為中央以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而建立殖民地，而是因為從 17 世紀以降，企圖掌控地方權威使之臣服於英國王權之下 (Bliss 1990)。在此情況下，一批「清教徒之父」<sup>譯註 1</sup> 逃離英國國教會 (the established church)，他們飄洋過海另覓生機，並不是肩負了帝國主義的任務。如此看來，歐洲各國——西班牙、葡萄牙、英國——在美洲的殖民各有不同的因由，因此在理論和專門術語方面，立即就需要區分開來。

好幾個世紀以來，「帝國」一詞使用廣泛，但它不一定就是指「帝國主義」。帝國之間有一個基本的不同：一類的帝國是由中央政府的官僚體制所掌控，這類的帝國因意識形態和經濟因素而發展，可以稱做是帝國主義的結構；另一類的帝國是個別的社群或者某個貿易公司，為了商業的目的而進行拓居移民，這樣的型態稱為殖民。殖民是基於實用性的考量，一直到 19 世紀，一般都是偶發地局部發展 (例如占領西印度群島島嶼)，而帝國主義基本上是受到以宗主國為中心的意識形態所驅使，只關心國家權力的確保與擴張 (例如法國侵略阿爾及利亞)。殖民主義的功能只是一個受經濟驅使，針對邊緣地帶的行動；從帝國政府的角度來看，有時候並不易掌控。而帝國主義是由中央所操作的國家政策，主要是為了擴大勢力的版圖。因此，帝國主義可以用概念來分析 (但這並不代表帝國主義沒有不同的概念)，而殖民主義主要需要以實踐的角度來分析，因此就很難將它做一個綜合性的歸納。

以歷史條件來界定，帝國主義有兩種主要的形式：一為羅馬帝國，奧圖曼帝國和西班牙帝國的模式，一為 19 世紀末的歐洲模式。殖民主義也有兩種形式：法國

<sup>譯註 1</sup> 1620 年乘坐「五月花號」(Mayflower) 到美國麻州的一批英國清教徒。

殖民主義理論家區分為殖民和宰制 (domination)，英國則分為自治領 (dominions) 與附屬地 (dependencies)，現代歷史家將之分為拓居殖民地和剝削殖民地 (Harmand 1910)。這樣截然清楚的區分說明殖民主義在實踐上有些基本的差異。也就是拓居和管轄之間的不同：以拓居為主而建立的殖民地，如英國所屬的北美、澳洲和紐西蘭、法屬阿爾及利亞、葡屬巴西同屬一類，另一類則是地處熱帶地區，直接 (或間接) 被統治管理的殖民地，主要為了經濟的剝削，不是為了拓居安頓的原因，如美屬菲律賓和波多黎各、英屬印度、荷屬東印度群島、法屬印度和新喀里多尼亞島 (New Caledonia)、德屬多哥 (Togo)，或者日據的台灣。奧斯特哈梅爾 (Jürgen Osterhammel) (1997) 以歷史角度針對殖民主義的不同型態做定義上的分析，主張增加第三個類別，他稱之為「海上領土」(maritime enclaves)，指的是那些因為全球的軍事和海軍運作的目的，或者有時是為了和某個大陸本土的貿易和商業往來而占領的據點，包括島嶼、港口、以及其他戰略點 (歷史上的例子包括美國的關塔那摩灣 (Guantánamo)，美國在古巴、關島和夏威夷 (仍在美國占據之中) 的海軍基地，英屬直布羅陀、香港、馬爾他和新加坡，荷屬巴達維亞 (Batavia)，法/英屬地模里西斯 (Mauritius)，以及葡屬的麻六甲 (Malacca)。然而，這些據點的商業活動越多，它們就越會發展成一個不同樣貌的宰制殖民地。由上述這一串各種不同的殖民地可看出，殖民主義所牽涉到的形式和實踐，因各地迥異的文化，且因為經過許多世紀而大不相同。例如，英國的殖民就有各種長短不同的時期：在印度某些地方統治達百 400 年之久，而在非洲某些地方如奈及利亞則不到 50 年。或者看看殖民列強各種不同系統的管轄，不同的意識形態而形成歷史和地理的差異 (英國有直接和間接的統治，法國有同化理論，以及直接強制推行宗主國文化)。就歷史和地理的角度來看，無論是一個單一殖民帝國在其各殖民地的實際運作，或者是某一個殖民地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連續經歷不同的殖民勢力的統治 (如斯里蘭卡)，都有十分不同的多樣性，不可能有一個總括性的理論可以一以蔽之。

強調殖民主義的多樣性是十分恰當的：是帝國主義構成一個全球的政治體系。但是，後殖民理論所質疑的是，在論述和意識形態的層次上，殖民主義是否能夠依循一般理論和論述的原則，形成一個可以被討論、被評估和被評論——或者可以被抵抗——的某種系統。薩依德 (Edward W. Said) 著作的重要性在於他的確提出這樣一個一般性理論 (Said 1978)；他證明了日常習慣的實際作為以及殖民主義對殖民地和人民的整個影響，可以用概念和論述的角度來分析。也就是因為如此，才會產生後殖民主義的領域，才能使後來的理論和歷史研究得以開拓。但是，就現在的脈絡來看，薩依德的問題是，他的論述包納性太大，未能區分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也沒有區分兩者所用的不同形式，而且沒能在他的理論模式中開啓反殖民抗爭的影響此一議題。

但是，如果因為這樣就把兩者被視為同質的觀念怪到薩依德，未免有失公允。這種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兩者不分的傾向，還有其他正當的歷史原因。除了薩依德之外，後殖民理論主要根據的是法農的作品，而且，法農分析殖民主義時，主張殖民主義只有一個形成過程（Fanon 1967）。就這一點而言，他是追隨著沙特的腳步，因為沙特在他 1952 年的文章中堅持這一點：「殖民主義就是一個系統」（Satre 1964）。他們兩人所說的都是法國的殖民主義；相較之下，法國的殖民主義的確是比較有系統的。另一方面，英國的殖民主義就不曾有系統，就像其他任何英國的機制一樣地怪異奇特，像英國的（不成文）的憲法般地異質交雜。廣義地說，後殖民理論的發展乃是根據一個部分源自法國的反殖民理論做為基礎，然後將它運用到一些以不同原則操作的大英帝國歷史上的例子。這種分析方式受到歷史學家的指責就會站不住腳，因為這只是總括性的分析，對殖民歷史中一些實際的特殊性缺乏歷史認知（Moore-Gilbert 1999）。但是從另一角度來看，這種英法相混的作法，反而為殖民主義的分析發展出一個新的學科領域和理論機制。

法農堅持殖民實踐的特異性，但是我們也不要忘記法農對殖民帝國的管轄方式所做的批評，他批評殖民者管轄多半都是將殖民地區域化，分割、區分，而後統治；現代歷史家所強調的是殖民主義的這一面，他們不願意冒險做一些總體性的陳述，這就顯示他們其實也只是重複殖民主義本身的策略。用一個比較戲劇性的方式來說，殖民主義所顯現的一致性或多樣性，主要是依據你的主體位置而定，看你站在殖民或被殖民的位置上。從統治的殖民國治理者，以及如麥肯齊（John MacKenzie）者流的英國殖民史學家的角度來看，英國的殖民地的取得和治理的方式看起來各有不同，而實際上也確實不同（MacKenzie 1995）。如上所言，大英帝國的特性就是異質的。但是，從被殖民的當地原住民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區分往往是學術性的。就他們而言，被殖民者就是生活在英國的強制統治之下，不會因為英國標榜「英國統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而改變對帝國意識形態的觀感。反殖民的實踐以文化的抗爭做為對抗帝國主義的宰制思想，激勵以批評分析各種再現（representation）的形式，以及知識形成的過程。就另一個層次來看，在 19 世紀末期，在愛爾蘭、南非和印度民族主義者之間所建立起來的聯繫，已發展成反殖民技術和策略的知識分享。攻擊愛爾蘭的某一個警察局，其作用和目標近似攻擊在印度的英國軍營。如果從反殖民革命策略來看的話，殖民歷史、統轄治理所實際採用的方式、或者憲法的地位——依據憲法，愛爾蘭在那時候是大英帝國的一部分，因此就技術層面而言，它也屬於操控印度的殖民勢力——這些之間差異其實是非常小。從反殖民的政治行動派的角度來看，大英帝國在每個地方看起來幾乎都一樣。一直到 1861 年，英國人沒有把印度看成是殖民地，但這一點對印度人不甚重要（Meerivale 1861）。後殖民批判傾向採用同樣的觀點，這是因為後殖民所認同的是

反殖民行動派的主體位置，不是因為後殖民批判無視於殖民者眼中殖民史的各種差異性。因此大致上說來，實證主義和後殖民史學家的差異就是認同不同的主體位置。針對歷史學家的反駁就談到此。

## 二、殖民與宰制

在宰制的整體結構之中，殖民主義的分析可依據上節所說的，有殖民和宰制兩個不同的形式，兩者的區別在於前者的動機為了拓展生存空間，後者則為了求取財富。因此，所有殖民列強都在其帝國範疇中建立了兩種不同的殖民地：拓居和剝削，白人與黑人，兩者之間的待遇有如天壤之別。以拓居為主的殖民地終究將走向自治領的形式，而在一些被視為已經建立起來的地區設定貿易港或交易所，就是計畫以宰制殖民地達到剝削的目的。「拓居」這個類別也被稱為「殖民」（colonial），和英文的「殖民者」（colonizer）容易混淆，無法區分拓居者或是統治者。法文字 *colon* 指殖民的拓居者或農人，現在已經變成英文字，如此就可以區分了。「拓居者」很快地變成介於中間的人：既不代表宗主國的政府——那個保護他們又壓迫他們的中心——也不是殖民地的原住民族——那些大部分會被「拓居者」屠殺、被驅離自己的土地、被剝削勞力的當地居民。從這些原住民的角度來看，「拓居者」等於是宗主國的政府。這就是為什麼到拓居殖民地定居的歐洲人後代，今天對自己的定位十分疑惑：現在在北美、南非、澳洲和紐西蘭等曾經是殖民地的非原住民，他們算是殖民者還是被殖民者（Mukherjee 1990）？現在，所有以前的拓居殖民地都處在雙重位置：一方面，這些是脫離祖國的殖民地，例如美國，或者（在憲法上仍非完全的）加拿大和澳洲。所以，現在屬於歐洲血統的美國人或澳洲人會說他們曾經被殖民過。就是「後殖民」這個標記讓過去這些比較傾向於認同殖民者的人，現在越來越傾向說他們是被殖民（這種認同其實在 1871 年成立的「本土澳洲人協會」（Australian Natives Association）的名稱上就已經有跡可尋了；該組織的成立就是要代表在澳洲本土出生的白種歐洲人的利益）。同時在另一方面，來到這些地方的拓居者——必須強調的是，他們通常是因為被迫害而被強迫遷居、或者因為貧窮而移居，卻變成了壓迫者，迫害原本就住在那片土地上的原住民：被迫害的少數人遷居到殖民地，然後搖身一變，迫害當地少數族群，這是司空見慣的殖民主義故事。那些原住民，例如澳洲原住民和托勒斯島民（Torres Strait Islanders），或紐西蘭的毛利人，仍然是被殖民者（Jacobs 1997; Rigney 1998）。後殖民與殖民是同時運作的，南美許多國家，如智利或秘魯，只不過是由一個內部的殖民主義的形式取代了西班牙的殖民統治，變成一個由歐洲拓居殖民的少數人以獨裁統治。

歐洲人最初使用「殖民」(colonization)一詞，不是指統治原住民，也不是榨取他們的財富，它主要是指爲了在經濟、宗教或政治上尋得較好的生活而遷居的社群，但他們依然忠於原有文化——有點像現在的移民環境。就這層意義來看，「殖民」指的是那些主要是爲了遷往他處定居的人，而不是爲了要統治他人。雖然有很多情況下，總會連帶地牽涉到統治之實，但這多半是拓居後所帶來的副產品，是人口「居住」(populated)——不是歐洲人所認定的「定居」的意義——在土地上的所帶來的結果。根據洛克(Locke)深具影響力的法則，那些沒有耕作土地的人無權擁有它；在1846年，羅巴克(Roebuck)仍然信心十足地把殖民地定義爲沒有原住民的土地，在這個土地上的居民把英國看成是他們的母國(Roebuck 1849)。後來，殖民者試圖保留殖民者和當地人之間的區分，而不像早期的移民，或是葡萄牙和某些西屬美洲，通常都是和當地居民結合發展，成爲混雜的克里奧(creole)社會。相較之下，在其他的方面，如美國和澳洲的西班牙和英國殖民者，比較喜歡採用滅絕原住民的方式，而不是統治他們，在這些地方獨立之後仍舊持續這樣的態度，例如在美國和阿根廷。而在其他地方，如果不是消滅原住民，就是把他們驅逐出先前所居的土地，非洲拓居殖民地，如阿爾及利亞、肯亞、羅得西亞(Rhodesia)、和南非就有此過程。因此，就像薩依德所強調的，由土地與空間的掠奪可看出，殖民主義在基本上就是地理上的暴力行爲，一種針對原住民和他們的土地權而實施的暴力(Said 1993: 1-15)。同時，農地的耕作需要勞力，而原住民不諳此道，所以就引進其他的人(大部分來自西非、印度和中國)來做奴隸或是契約工奴，他們幾乎毫無權力可言，他們不可能有任何的社會或政治的組織形式，相較之下，也就很容易控制，將他們隔離。

21 歐洲人往西擴張的最初動機，通常都被描述爲想要找出一條比較短的海路，通到具有偉大文明的印度、中國和日本。哥倫布當初想要向西航行的計畫，曾有一段時間得不到歐洲統治者的回應。一直到1492年，伊斯蘭徒在西班牙的最後一個據點格拉納達(Granada)陷落，費迪南(Ferdinand)國王和伊沙貝拉(Isabella)王后將摩爾人趕出格拉納達後，認爲反伊斯蘭聖戰勝利可期，可以藉此接觸到傳說中統治近東的約翰(Prester John)的基督王國，然後給敵人關鍵性的一擊，因爲他們在「光復戰爭」(Reconquista)中剛剛終結了伊斯蘭教對西班牙的殖民(Betrand and Petrie 1952: 163-5; Elliott 1970: 58; Williamson 1992: 6, 3; Sardar, Nandy and Wyn Davis 1993: 6-11)。但是摩爾人在當時仍然占據義大利的某些地方，這個計畫就遙不可及。但是，發現美洲大陸其實是意圖要進行最後一場聖戰而帶來的結果，這仍舊是個不爭的事實。哥倫布的航海之行，其財源來自費迪南和伊沙貝拉攻下格拉納達兩個月後，將猶太人和摩爾人驅逐後所獲取的財富。「天主教審判法庭」(Catholic Inquisition) 譯註<sup>2</sup>取代了幾世紀以來伊斯蘭教的多元文化主義，這個宗教

法庭的建立和殖民的擴張同時開始，這是一個徵兆。

除了這種聖戰的宗教動機(西班牙的遠征得到教皇的認可，爲了讓異教徒改信基督教)以外，科技的便利使現代的殖民得以藉助於航行大海的船隻，另外再加上經濟的驅使，這種經濟的動機源自大約在16世紀因商業革命而開始的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現今左派的歷史學家強調經濟是殖民主要的動機，這個觀點在當時應不會引起廣泛的爭論。羅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在圭亞那登陸時，他所尋找的是金子。早期歐洲著眼於探索和殖民，這樣的主張因爲美洲的金和銀而更強烈：歐洲內部的商業擴張，加上和東方的貿易赤字，在南歐引發資金流動性(liquidity)的問題，當時解決「金荒」(gold famine)不只是從美洲進口珍貴的金屬，更因爲這些金屬的主要接收者——西班牙，把這個戰利品用在歐洲的戰爭機器上，因此將這個新式現金快速地傳到各地(Elliott 1970: 269-70)。對金子的需求是15世紀末和16世紀初，積極地利用航海向東方和西方拓展領土的主要動機，這也是爲何哥倫布和韋斯普奇(Vespucci)到美洲探險後建立了殖民地；達迦瑪(Vasco da Gama)的艦隊爲了尋找一條通往印度的海路，在1497至1498年抵達印度，把海上探險推向高峰(Williamson 1992: 7)。對英國而言，建立具有戰力的海軍就是爲了搶奪戰利品，除了這個動機，就是在面對西班牙的領地，考慮到必須維持英國本身的戰略利益。一旦建立了某個殖民地，往往就可以主張爲了戰略利益需要更多的殖民地。談到英屬印度的安全，這個的邏輯就會被運用到極端。同樣地，和這些殖民地的貿易通常被認定是有利的，因爲貿易也能維持大批的海軍，並且訓練大批的船員。當這些人從海軍退伍之後，可以以他們的航海經驗更進一步地促進商業的海外拓展。

22 雖然英國和荷蘭不像西班牙一樣，開始的時候把基督教的使命拿來爲自己的殖民行爲辯護，但是在歐洲列強之間，新教與天主教的敵對也是建立或奪取殖民地的重要因素。殖民的行爲常常被聯想到文明開化或傳教任務，但是，除了西班牙和葡萄牙遠征中南美之外，這種文化的帝國主義真的是帝國主義在19世紀末的晚期的產物。對英國而言，比較重要的是人口的問題，而且，爲了經濟和政治的穩定，必須要將人口遷出。人口理論在殖民中的重要性一直被低估了，也許是因爲現在「第三世界」的人口控制仍是西方國家的一個主要議題。殖民地爲過剩的人口提供了一個出口，這個觀念是以經濟和政治爲出發點的考量。在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Malthus)之前的幾個世紀，英國認爲自己的經濟無法支撐如此龐大的人口，因此一般都認爲過剩的人口往外移有雙重優點，不但可以避免透支明顯日益乾涸的資源，還可以建立新的殖民地，好讓母國發展貿易。法國因爲長期人口少，殖民的問

譯註<sup>2</sup> 1469年，西班牙的兩個主要王國因伊沙貝拉和費迪南的結婚而統一，從此也以天主教統一西班牙。1487年成立了冷酷無情的「天主教審判法庭」(另譯「異端審判法庭」或「邪教裁判所」)，迫害、殺戮非天主教徒。

題更加棘手：法國北部的雅爾薩司—洛林（Alsace-Lorraine）在1871年落入德國人手中後，阿爾及利亞的拓居殖民才真正開始，法國本地的人口被迫遷移到阿爾及利亞（法國政府為進一步增加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口，擴大公民身分，包括來自西班牙、科西嘉島（Corsica）、薩丁尼亞島（Sardinia）、南義大利和馬爾他等地的人口在阿爾及利亞拓居都可成為法國公民。1871年，法國公民擴及當地的猶太人）。拓居的殖民地有部分是由各種不同的強迫遷移而生的產物，在馬爾薩斯描述過剩的人口所隱含的問題之後，這種遷移政策在英國變成制度化了。過剩的人口必須向外遷移，這個殖民的動機在1840年代的飢荒侵襲之下到達頂點，然後傳到下一個世紀，成了帝國主義最重要的辯護。就這樣的觀點來看，殖民被視為輸出社會衝突的一個方式，也因此糾結著經濟和政治的問題：列寧在1895年引述羅德士（Rhodes）對他的朋友斯特德（Stead）的評語：

「我昨天在倫敦的東區」（工人階級區）「參加了一個失業的會議。我聽著他們激烈的演講，其實只不過是一聲聲『麵包』、『麵包！』的吶喊。回家的路上，我回想這一幕，我發現自己比以前更加相信帝國主義的重要性了。……我這個可貴的念頭就是解決社會問題的一個方法。也就是說，為了拯救英國4,000萬居民，使他們免於一場血腥的內戰，我們這些殖民國的政治家必須極力主張取得新的土地，好讓過剩的人口往外拓居，還可以為英國工廠和礦坑所出產的物質開拓新的市場。就像我一直在強調的，帝國其實就是麵包與奶油的議題。如果你想要避免內戰，你必須變成帝國主義者。」（Lenin 1965: 93-4）

一直到1867年才停止的遣送罪犯，只不過是英國利用殖民的大政策除掉那些廣義的不受歡迎分子（最後一艘開往澳洲的罪犯船，載有60名愛爾蘭獨立運動的芬尼亞會員（Fenians）在船上（Shaw 1966: 358）。這也說明了在英法兩國，為何許多階級觀念強烈的勢利者，看不起白種人的「殖民地居民」。

23 拓居殖民之外，還有簡單的經濟動機：想要致富，獲取商業利益，此外，還有一種貿易平衡的焦慮。就歷史觀之，歐洲亟欲建立一個全球的貿易網路，其結果就是開拓可以宰制的殖民地。很多這類的殖民地並不是早期貿易公司規劃中產物；從15世紀開始，統治者准許許多私人企業擁有壟斷的專賣權，例如英國聯合證券公司（British Joint Stock Companies）的商人冒險家（Merchant Adventurers）、莫斯科威公司（Muscovy Co.）、拉凡特公司（Levant Co.）、維吉尼亞公司（Virginia Co.）、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皇家西非公司（Royal West Africa Co.）。由這一串名單可看出，其中一些公司的交易對象是某些永遠不會被殖民或控制的地區，如蘇俄，另外還有兩個變成真正殖民企業的公司。但是這兩個公司——維吉尼亞公

司和東印度公司——之間的差異，顯示早期不同性質的企業所帶來的結果：一個發展成北美的殖民地，一個變成印度帝國。

從早期一直到19世紀，殖民並非帝國政府所刻意採行的政策：例如，一直到1849年，韋克菲德（Wakefield）才提出一個有系統的拓居殖民系統（後來應用在南澳和紐西蘭）（Wakefield 1914）；殖民反而是商業利益和群體拓居的考量下的偶發性產物，這個過程使得奚禮（Seeley）在《英國的擴張》（*The Expansion of England*）（1883）中有感而發，寫下著名的評語：「我們在無心插柳的狀況下，似乎……已經征服半個世界，而且人口數也占了世界的一半」（Seeley 1971: 8）。但是，在18世紀之前，歐洲列強的競爭顯示那個世紀的許多戰爭其實就是爭奪殖民地，目的就是取得對方殖民地的利益，這個策略運用的特別成功就是英國——有時不免付出了代價。法國人被趕出加拿大，解除了英國13個殖民地的立即威脅，也鼓舞了這些殖民地的人尋求脫離英國獨立<sup>譯註3</sup>。雖然取得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就如貝爾和摩睿爾（Morrell）所說的：「英國歷史中能夠多年依循一貫的行政系統，並且指向某個明確目的的例子不多：舊的殖民系統就是其中之一例」（Bell and Morrell 1928: x1）。「航海法」（Navigation Laws）規定除了英國籍的船隻，不得攜帶任何物品到英國港口（來自歐洲的物品例外）。除此之外，來自外國殖民地的原料或製造品一律課以重稅，而殖民地製造商品不得進口到英國。因此，早期殖民經濟的型態——輸入糧食作物和戰略性的軍備——逐漸發展成一個有系統的貿易集團，進口原料，然後出口英國所製造的產品，銷售到殖民者壟斷的市場。但是，這種貿易必需加以監督，再加上期待殖民地對英國貨產生依賴（即使英國貨的價格高於世界的價格），這些所引發的困難，一直到20世紀都影響著英國對殖民和工業競爭的想法。直到1830年代，這樣系統才逐漸被廢棄，漸漸由自由貿易取代。但是在1880年代，它以一種不同的形式借屍還魂，成為新帝國主義採行系統中的一部分。

儘管歷史、地理、統轄模式各有不同，從被殖民的社會來看，所有形式的殖民 24 所帶來的同樣都是斷裂的後果。歷史學家認為殖民所造成的影響就是改變了當地原有的經濟——或者以德勒茲（Deleuze）和瓜達希（Guattari）的話來說，經歷了解碼和再編碼（decoding and recoding）——尤其是透過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意識形態的引入，影響了非資本主義社會，打破並改變非資本主義模式的生產，而這整個程序通常是需要占據領土。大部分以農業拓居的殖民都是在一些當地住民是游牧民族，或是相對比較少人居住的地方。從歐洲的角度來看，這些土地因為沒有開墾，沒有人定居，才會空蕩蕩的；耕作的引入就會讓原本的住民無法再繼續游牧的生活形

<sup>譯註3</sup> 1756至1763年，英法兩殖民國為爭奪加拿大而爆發七年戰爭，法國戰敗，在北美的勢力受到打擊，此役也讓英屬殖民地受到鼓舞，期待自己可以脫離對母國的依賴。

態。因此，在美洲所建立的農場經濟徹底重新改造了當地的經濟，並且開始有了壓迫性的社會經濟行爲，尤其是農奴制度。另一方面，那些已經有工業形式的非歐洲國家很少有拓居的殖民；根據上述的系統，這些殖民地原本的經濟反而因爲經濟結構的重整——通常是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而改變，陷入貧困。就像馬克思在1853年所指出的，因爲制度明顯有利於進口的英國布，印度的紡織工業經歷一種強迫性的毀滅，印度的經濟因而衰退。殖民地的經濟轉變完全以殖民列強的原料需求和開拓市場做爲優先考量；很少顧慮到是否能夠爲當地居民帶來文化和宗教的改變。印度一直到1813年都禁止傳教士的進入，而加勒比海的農場主人對傳教人士報以高度懷疑，因爲傳教士反對奴役，或者說因爲他們有拉斯卡薩斯（Las Casas）<sup>譯註4</sup>的傳統，有人文主義的改革信念。無論是拓居或是剝削，殖民者總有一套以歐洲人爲中心的價值觀強化殖民的理由；但是除了拉丁美洲，乃至其他的農奴經濟之外，這些殖民者並沒有以任何實質的形式將歐洲文化強行加諸於被殖民者〔也許是因爲他們漠不關心，或是開明的相對主義者，或者因爲種族歧視的原因，只想消滅當地住民，不想和他們有歸屬關係（affiliation）〕，殖民者也不會因爲要爲自己的行爲辯護而修正意識形態的理論根據，除非在非常必要的狀況下。殖民主要不是文化價值的移植；文化只是殖民真正的目的——貿易、經濟剝削、拓居——所帶來的副產品。

<sup>譯註4</sup> Bartolome Las Casas 神父（1474-1566），被認爲是哥倫布的繼任者，對西班牙在美洲大陸的惡行有詳實記載，以人權角度譴責西班牙的殘酷。

### 3. 帝國主義

征服土地多半就是掠奪他人的土地，從那些和我們有不同的膚色、鼻子稍微平一點的人手中奪走他們的地。如果你仔細檢視，這不是什麼光彩的事。能夠彌補的只有觀念，這個行爲背後的觀念。不是什麼感性的藉口，而是一個觀念；並且毫無私心地相信這個觀念——你可以將之建樹，趨前鞠躬，供奉犧牲。

25

康拉德，《黑暗之心》

這是馬羅（Marlow）在《黑暗之心》（1899）中出了名的含混模糊的評述，指的就是殖民地的真實狀況和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之間偌大、極端的差距：比利時人所謂的「剛果自由區」所存在的矛盾裂痕如此激烈，因此不久之後由莫瑞爾、凱斯曼爵士等人在英國媒體披露（Morel 1903, 1904a, 1904b, 1906）。讓康拉德汗顏的是，他並沒有點出「剛果自由區」的名字，但是他倒是證明現在被區分爲不同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到1899年已如何被混淆，殖民主義幾乎已經變成了帝國主義的實踐。如果真是如此，也是事件之後的一種回顧性的解釋。用帝國主義的「觀念」彌補殖民主義的掠奪，就是在掠奪已經延伸到霸權的世界政治系統時。但是，這個「觀念」真正涵蓋什麼就更難說清楚了；而且相對地，帝國主義本身也有各式各樣的風貌。就歷史的觀點來看，「帝國主義」一詞的意義和康拉德對它的態度一樣，幾乎無法確定。柯伯納（Koebner）和史密特（Schmidt）（1964: xii）認爲在1840到1960年之間，「帝國主義」的意義變化不下12次。就因爲這個原因，有些歷史學家根本拒絕使用這個詞（Bodelsen 1960）。無論如何，柯伯納和史密特所描繪的歷史對後殖民理論具有某些意涵。

「帝國」（empire）、「帝國的」（imperial）和「帝國主義」（imperialism）這三個字有不同的歷史和不同的政治迴響。西班牙人建立了第一個現代的歐洲帝國：西班牙征服者的帝國大計是以軍隊占領的方式搶奪美洲大陸的大部分土地。但這是一種前資本主義高度階層化形式的帝國統治，原本是羅馬和奧圖曼帝國的模式，透過軍隊和政治雙管齊下的控制，對居住在被占據土地的人民直接課稅，（後來變成利用印度的奴工來挖掘銀礦，獲取收入）。「大英帝國」（British Empire）一詞——由依莉莎白時期的理論家狄伊（John Dee）最先發明的名詞——比英國實質的帝國主

26

義早了好幾個世紀 (Hulme 1968: 90)。從依莉莎白時期以來的慣例就是稱「大英帝國」，但這只是一個描述性的詞彙，並非後來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整個意涵。當時的「大英帝國」在政治、經濟和行政各方面都不是一個整體建構的機器：一個涵蓋面廣泛、而且任何問題的討論和批評都可以以此為根據的實體。「大英帝國」一詞是狹義的，就是英國這個「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 的同義詞，暗示英國主權獨立的狀態，這樣的觀念普遍沿用到 1850 年代 (OED; Koebner and Schmidt 1964: 37-46)。但是這個詞從 18 世紀以後就被擴大，用來描述不列顛群島和所有海外的附屬地，尤其用在討論英國和拓居殖民地之間的關係，以及泛指所謂的「母國」和一般「殖民地」之間的關係所衍生的問題。即使是在當時，也鮮少將帝國視為一個整體的結構：在行政上，直到 1857 年英國的自治領才分為兩類：殖民地和印度帝國。

就「帝國的」(imperial) 這個字來說，此字被廣泛地用來指最高統治權力或超越一切，也就是具有最高的權威地位，或者被用來當做是「崇高」(magnificent) 的同義詞。相較之下，「帝國主義」(imperialism) 一字到 19 世紀末期才在英文中通行 (Hobsbawm 1987: 60)。

正如鮑姆加 (Baumgart) 所言，帝國主義是一個涵蓋多面的「雜揉之詞」(hybrid term)，泛指依據歷史的差異以及理論或組織的差異而形成的宰制和附屬的各種關係 (Baumgart 1982: 1)。帝國主義在英文中有兩個最主要的意義：原本是形容真正採取征服和占據行動之後的一種政治系統，但是到了 20 世紀開始之後，馬克思主義的意義漸增，指的是普遍的經濟宰制系統，連帶有直接的政治宰制，但不是必然附屬的 (Williams 1988)。以歷史的角度來看，這個區分正好是 19 世紀法國帝國主義以及 20 世紀美國帝國主義之間的不同，或者用 19 世紀末的英國人的懷舊心態來說，這就是舊帝國主義和新帝國主義的區別。人們原本用「帝國主義」描述領土被宰制時的政治系統，它的原本意涵不一定有批判的意味；但是相較之下，後來「帝國主義」變成廣義地指經濟宰制，這個新意義就隱含了批判的角度。這樣的轉變的確反映了帝國主義本身的態度起了全球性的變化。同樣地，「殖民主義」(colonialism) 首先在 1853 年出現在英文字中，當時是中性的意思，20 世紀初才被引入法文，然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反殖民的氛圍下，轉變成一個貶抑的詞，指的是殖民系統及其強行實施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政策 (Strausz-Hupé and Hazard 1958)。這個轉變背後所隱含的操作就是把焦點放在殖民主義，而不是帝國主義。在那個時候，「帝國主義」代表一種意識形態和經濟操控的系統，被看成等同於美國；而「殖民主義」所強調的是從屬人民在舊歐洲殖民列強政治控制之下的物質狀況。雖然現在「殖民主義」一詞（以及「殖民的」和「被殖民」）的意涵，益加趨近「帝國主義」長久以來所隱喻的模式，但大多時候，「殖民主義」一詞仍舊抗拒

這樣的字義擴張，而且它所指的通常都是根據直接的事實：在本書中使用這個詞就是採用這樣的本義。與此相關的一點就是「後殖民」一詞也是同樣直接的本義，將它當成一個歷史性的描述，其對象就是有獨立主權之名的國家在全球的政治情況。廣義的帝國主義仍然繼續在操作，這就足以解釋為何一般均採用「後殖民」一詞，而非「後帝國」：縱使有貝克 (Becker) 等人自鳴得意的主張 (Becker et al. 1987; Becker and Sklar 1999)，歷史還沒有走到「後帝國」時期。那一刻的來臨就是後殖民批判的終極目標。

帝國主義的特色就是權力的行使，或者透過直接的征服，或者（後來）透過實際上類似宰制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兩種手段都是藉助於制度或意識形態來實踐權力。這是一種典型的政治機器操作下，精心設計的產物，從中心控制，逐漸擴張到最遠可及的邊緣：想想看華盛頓的五角大廈和中央情報局，以及它們在世界各地的獨立國家如何用全球性的策略控制各種事件，為的就是要打擊共產主義或伊斯蘭教的對抗，增進美國的利益。因為這個原因，帝國主義同時也要承受這個它永遠無法掌握的世界的偏執。不同於殖民主義的是，帝國主義受到意識形態以及某個理論的驅使，在有些情況下的操作就和純粹為了經濟目的的論點一樣，其目的只是為了要對抗純粹經濟利益的主張。以剝削和拓居而建立的殖民地乃根據實際的需要，通常也根據商業或拓居者的利益來管轄，但是帝國主義其實是一個非常沒有效率的經濟剝削的形式。費德豪 (D. K. Fieldhouse) (1982) 駁斥他所稱的「經濟剝削的神話」，證明現代的帝國是其實無利可圖。費麗普絲 (Anne Phillips) 對此看法做了回應，她認為這並不表示帝國主義本身不是資本主義的產物，這引出進一步的問題：如果真是沒有利潤，為何「資本的利益如此不堪？」費麗普絲認為帝國主義不是成功的經濟剝削形式，因為帝國主義所有發展自由工資勞力市場的企圖都沒有成功，尤其是在非洲，而殖民地的行政人員和官員「在似乎是反資本主義的偏見中，過著奢華的生活，自認扮演了前資本主義次序的保護者角色而沾沾自喜」(Phillips 1989: 2-3)。這就可以解釋為何帝國主義沒有助長資本主義的擴張，反而衍生低開發的後果，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時，國際投資指向北美、南美，也同樣開始轉向殖民地的投資，因此資金紛紛從國內經濟的投資轉向國外，英國工業更加沒有競爭力 (Davis and Huttenback 1986)。帝國主義是一個矛盾的意識形態——現在被描述成是「紳士般的資本主義」的產物 (Cain and Hopkins 1993a 1993b)。但是這個問題永遠是：紳士不會是資本家，資本家也不會是紳士。歐洲帝國主義這個天生的弱點就是為何它驟然終結的主要原因，也是為何它留下了一個爛攤子的原因。

正如康拉德所指出的，帝國主義包含一個一般性的引導觀念，以及特定的歷史行為。因此，正如先前所言，它的操作通常是追溯式的，在事件發生之後，來一個誤導的、遲來的「事後性」(nachträglichkeit) 解讀，針對殖民主義的歷史實踐賦予

一個文化的意義 (Nandy 1983)。這就表示在 19 世紀時，帝國主義的發展和殖民主義的歷史就有一種完整的歷史持續性；殖民地仍然是殖民地。對那些已經是被殖民的人來說，帝國主義對他們日常生活並沒有帶來什麼不同，除了下列幾項改變之外：行政管轄更形式化，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區別加大，統治者的霸氣愈發明顯，殖民的紀念建築也相對激增，例如矗立在龐貝（孟買），被稱為「印度之門」的大拱門是爲了 1911 年威爾斯王子的造訪。這些改變也可以說是對象的改變：原本只有被殖民者，後來變成了被殖民者加上敵對的其他殖民勢力。帝國主義一直是全球權力政治的一個產物，而且一向致力於全球性的權力政治：歐洲幾個主要的殖民列強之間日積月累的敵對和軍事競爭，加上後來美國、德國和日本等帝國勢力加入；再加上帝國的觀念日益高漲：認爲國家民族的認同實際上和更偉大的大帝國認同密不可分，即使只是把這樣的認同當成是權宜之計，暫時止住國內的異議和社會改革的壓力；還有一種更大的需求：要系統化地操作殖民地的統轄，把它們當做是工業製造業的一個出口，以及原料的來源；除此之外獨占殖民地對政府本身是一個新的趨勢，以防有朝一日這些殖民地變成有用之地，同時也可防止其他帝國奪取這些殖民地。所有這一切都以基督教的傳教熱忱做爲藉口而得到正當性，帝國宣稱他們的使命就是要使世界其他各地受到西方文明的現代化薰陶，在此過程中趁便將所有國家納入西方資本主義的範疇。上述這一切因素助長殖民結構的系統化，變成帝國主義的主導意識形態。

帝國主義開始成爲帝國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其時間點約莫和殖民地最先發展實質的自由運動差不多同時。殖民地爭取自由的聲音愈大，帝國主義就更猛烈；的確，在有些地方，帝國主義是針對自由運動而發的防衛性反應。單就其意識形態而言，帝國主義立即被西方和東方的自由主義批評家和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大肆攻擊，後來更擴及三大洲。殖民地的批評家通常比較沒有那麼關注帝國主義本身，他們追求的是終結殖民地位。在某些特別的領土，殖民統治受到當地人民的挑戰，因爲那些被宰制的人民起身爲爭取自己的自由而戰，而這些當地的抗爭多半是聚焦於殖民統治的機制或軍事方面的事實。帝國主義本身並非反殖民抗爭的首要箭靶，一直到 1919 年「共產國際」組成後才改變。到了那時候，帝國主義才變成反殖民鬥爭中一個很有用的觀念，因爲它讓大家普遍意識到自己被宰制，因而可以結合各個不同的殖民地，爲一個共同的原因團結起來，對抗壓迫者。各殖民地可因此而依賴共同的反帝國政治資源，發展、協調，獲得不同地區的大眾支持，以便對侵占的帝國勢力施加更大的壓力。後來在冷戰時期，共產主義對抗西方和美國的全球宰制系統的意識形態之戰時，被經常拿來當攻擊箭靶的是帝國主義，而非資本主義。後殖民主義批判乃取材自對抗帝國主義和其他壓迫形式的這些歷史。同時，帝國主義的兩個獨特的不同形式足以證明，爲何後殖民和稍早的反殖民鬥爭雖然有共生的相關性，

但永遠不可能將二者簡化爲一，也不可能在政治上用相同的方式操作。

## 一、「帝國主義」的法文來源

拉金 (Philip Larkin) 說英國人在 1963 年才明白性<sup>譯註 1</sup>是怎麼回事，照這個講法，我們可以說英國人到了 1882 年才發現帝國主義。英國帝國主義可以說是在英政府決定進攻亞歷山大港 (Alexandria)，藉以入侵並占領埃及時，就正式開始了。其後，「帝國主義」一詞被用來描述歐洲殖民史上許多不同的階段。帝國主義者本身如何將帝國主義理論化？「帝國主義」的觀念在 19 世紀後半期的時候，開始變成一個特定的意識形態，這就表示「帝國主義」有比較明確的歷史軌跡。在英文中，這個字第一次出現在 1858 年，當時是獨裁 (despotism) 一字的同義詞，後來就變成貶抑之詞，描述拿破崙三世統治下的法國「第二帝國」的政治系統。一直到大約 1870 年，主要都是指這個含意 (OED; Kedourie 1971: 1; Koebner and Schmidt 1964: 10)。毫無疑問地，用帝國主義原本的法文含意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馬克思，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中，以「帝國主義」暗示路易·波拿巴的法國民族主義其實就是在向「第一帝國」的時代，以及拿破崙一世這個第一帝王看齊 (Marx 1973a: 157)。因此，馬克思使用這個詞完全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意涵，但是他還是很典型地辯稱，路易·拿破崙的政治系統乃是針對 1848 年革命時明顯的階級對立而採取的特定回應。因此，「帝國主義」最早的意涵是指法國的政治意識形態，是在 1851 年 12 月政變之後，由一個受愛戴的獨裁領導者帶來國內政治穩定和繁榮而形成的意識形態，後來逐漸變成隱喻透過征服和擴張海外領土以展現國威的政策。

法文中的帝國主義或許帶有恢復昔日榮威之意，但是不論馬克思當年怎麼想，大展國威的想法決不是空口白說的。法國帝國主義的基礎建立在一個理念上：積極發展，期使國家卓越。法國人亟欲恢復拿破崙帝國的光輝，也就是 1763 年的七年戰爭末期，法國痛失印度和北美的殖民地之後，在歐洲大陸建立帝國的光榮歷史 (在 1919 年德國痛失海外殖民地之後，20 世紀希特勒的法西斯帝國主義亦重複此一策略)。拿破崙三世並沒有企圖在歐洲重新建立一個法國帝國，但卻透過侵略阿爾及利亞和中南半島 (Indochina)，滿足法國的對帝國的野心。後來更是把領土的擴張鎖定非洲的馬格里布 (Maghreb)、南撒哈拉沙漠 (sub-Saharan Africa)、黎巴嫩 (Lebanon)、敘利亞 (Syria) 和波利尼西亞 (Polynesia)。新的帝國意識形態融合兩

<sup>譯註 1</sup> Philip Larkin (1922-1985)，英國詩人。此乃指 Larkin 的詩“Sexual intercourse began in nineteen sixty-three/(Which was rather late for me)/ Between the end of the Chatterley ban/And the Beatles' first LP.”

種歷史上的帝國主義，提出一個「大法國」(greater France)的新形象，宣稱要讓地中海流過的地方都屬於法國，就像塞納河流過法國本土一樣。「法國」就要這樣全球化。帝國主義藉助於科技的發展，如使用奎寧和蚊帳來對付瘧疾，以及使用格林手槍和麥克沁快速機關槍，帝國勢力大肆擴張，這樣貪得無厭的政策有「開化的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為其行為辯護，宣稱法國的使命就是要把法國文化、宗教和語言的好處傳達給世界上尚未開化的種族，這個簡便的藉口很快地被其他帝國勢力借用(因國情不同而各有調整)，變成帝國主義道德立論的重點(Curtin 1989)。文化和教育的帝國主義是帝國主義最重要的附屬品(Said 1993)。這個開化的使命有功能性的效用，成了帝國主義意識形態中的另一個重點，比經濟觀點更有力，變成說服當代反殖民主義者如畢吉歐(Bugeaud)、孔德(Comte)或巴斯夏(Bastiat)等人的一個法寶(Merle 1969)。

相較於其他帝國，法國的帝國意識形態中，開化的使命占比較重要的地位，因為法國的殖民原則是同化(*assimilation*)。但是正如「大法國」的形象所標榜的，無論殖民地有多麼遙遠，它們在行政管轄和觀念上，永遠被視為法國本土的一部分。法國人同化的殖民系統源自啓蒙時期的信念，經過法國大革命，法國人相信人類普遍應享有自由、平等和博愛。雖然從拿破崙到費利(Jules Ferry)，法國殖民政策有各式各樣的託詞，同化仍然是19世紀法國殖民政策最有效力的基礎；拋棄「同化」就等於放棄了開化使命的整個基本意識形態。在真正的實踐中，這個原則當然有許多個別的例外和修正，尤其是在中南半島和阿爾及利亞，但是一直到20世紀，同化仍然是法國殖民政策一個普遍的原則和公認的基礎(Betts 1961)。因此，法國殖民地有最好的教育和文化設備，但同時，法國人要求被殖民者放棄他們自己的文化和宗教，才能從法國人身上學習、進步。被殖民者有了機會接受教育，這就是為何這麼多主要反殖民的知識分子，從桑戈爾(Senghor)到法農，從塞傑爾到胡志明(Ho Chi Minh)，都是出身於法國殖民地。

## 二、帝國意識形態和殖民系統的差異

31 如果說19世紀形式的帝國主義基本上是法國的發明，其他那些進入全球競爭的經濟和政治系統的殖民帝國紛紛起而仿效這個形式。無論帝國主義者如何用開化使命為其意識形態辯護，19世紀帝國主義系統的真正目的就是透過征服的手段，結合國內政治經濟的穩定和具有國家威望的生產，以及國際場域上封閉的市場。雖然因為各國有其特殊的特色而形式各有不同，帝國主義的操作大抵根據這樣的模式，而且必須如此，因為帝國主義基本上是一個互相敵對的國際系統，不同勢力之間彼此對立，爭取某些領土的控制權和資源(Porter 1994)。這就是為何在1884年

至1845年惡名昭彰的「柏林會議」中，各帝國堂而皇之正式瓜分非洲，而且——比較不那麼引人注目地——對太平洋群島進行瓜分。這次會議同時也顯示首相俾斯麥(Bismarck)已從英國的自由貿易政策，轉變為帝國控制的貿易政策，也因此而開啓了歐洲帝國主義狂熱時期。因為這個系統需要持續地擴張海外領土以開拓新市場和資源，而地球上能夠被征服的領土有限，帝國列強之間往往因此而發生戰爭，各帝國亟欲擊敗對方，以便占有對方的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戰可說是這樣的帝國系統所引發的直接產物；在戰爭之初，法國和德國都有清楚特定的帝國目標(Andrew and Kanya-Forstne 1981)。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勝利國在凡爾賽瓜分戰利品——殖民地，英國和法國相互較勁，爭取中東和先前蘇俄在中亞的殖民地。帝國主義是一個動力的系統，從來就不是一個穩定的系統，並且會在國際的基礎上反映生產和消費擴張的過程，而這正是成熟的資本主義把它們引進世界的經濟結構。

所謂在國際的基礎上就表示它的作用是全球性的，但是不同的帝國依照不同的民族認同和意識形態來操作，即使像日本那些自覺地仿效其他帝國的國家，也有各自的身分認同。大致上，後殖民理論以大英帝國為焦點，另外在理論方面——如果不說是歷史方面——也注意到法國。雖然19世紀最主要的兩股帝國勢力就是法國和英國，但是要全面性瞭解帝國主義的現代政治形式，就必須針對19世紀和20世紀所有不同的帝國勢力的形式做一個比較評估，包括澳洲、比利時、英國、丹麥、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荷蘭、紐西蘭、葡萄牙、蘇俄、西班牙、土耳其和美國等國家，看看各國不同的經濟和政治的形式造成什麼特殊的殖民結構。但是這麼完備的大規模並非本書所要涵蓋的視野。在本書中，我大致上把重點放在三個主導帝國形式——英國、法國和美國——不只是因為這三者具有主導性，更因為它們為不同形式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提供了基本的模式。就歷史而言，對抗英國、法國和美國帝國主義的抗爭為後殖民的基礎提供了一個理論和政治的實踐。

32 法國和英國在殖民地的政權所運用的方式兩相對立，為20世紀的殖民系統和帝國政府提供了主要的選擇模式：美國(做為殖民者時期)、義大利、葡萄牙和蘇俄等，採行法國的同化系統，而荷蘭、德國和美國(做為帝國主義者時)採用英國的聯合系統(*system of association*)(Scammell 1989)。除了美國是拓居殖民地，又同時是帝國勢力，情況比較複雜之外，這些國家在意識形態和行政管轄上的差異大致反映出各個實踐者在經濟上有不同程度的發展，同時也反映出殖民的擴張由中央控制到何種程度，或是由私人公司發展到什麼地步(Anderson 1962)。正如前面所提，英法兩個主要的殖民強國把殖民地分為兩大類，端視殖民的目的是為了拓居，抑或為了現在被稱為剝削的目的——也就是說，在少有人居的地方進行拓居殖民，而占領殖民地主要是著眼於經濟的利益(印度是一個顯著的例子)。依照這個原則，法國人將這兩類直接了當地稱為殖民和宰制；而英國人——如果他們有想到這



一層——則比較古典地、文雅而委婉地在他們的希臘殖民地和羅馬殖民地做區分 (Adderley 1869: 191-5)。英法兩國在帝國的層面上有同樣的基本區分，但在其他方面，這兩個帝國的殖民系統則完全對立。大致上，就像大家所想得到的，法國人以同化的原則做為基礎，對殖民地採用一個理性而有理論依據的系統，法國的殖民地因此變成了「海外部門」(*départements d'outre mer*) 而併入法國，在技術上這些地方也就完全不是殖民地了。

法國的同化原則中隱含更深一層的弔詭：一方面，同化是所有帝國意識形態最進步的，因為它主張所有人類享有基本的平等，每一種族都具有一部分人類共同的人性，而且同化的原則認為無論這些人有多麼「自然」或「落後」，所有殖民地的當地民族一律將因為當代最先進的法國文化的灌輸而獲益。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這樣的觀念顯示法國模式對那些被殖民者的文化、語言和機制沒有一絲的尊重和同情——法國人只看到差異，只想到要將之同化——這種弔詭的邏輯可稱做是種族中心的平等主義。漸漸地，在19世紀中不斷有作家——如葛比諾 (Joseph Arthur Comte de Gobineau) 在他的《人種不平等論》(*Essai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 1853-1855*)，以及雷朋 (Gustave Le Bon) 在他的《民族進化的心理定律》(*Les Lois psychologiques de l'évolution des peuples 1894*)——相繼以科學的角度提出將種族分為不同的典型或族類；據此，各民族的差異被描述成是絕對的，這也就是說教育和其他文明的影響毫無效用，或者成效有限，因為這些原始民族在知識和文化上有極大的差異——也就是他們沒有能力。到了19世紀末，這些理論就發展成攻擊法國殖民政策的法寶，抨擊以法國人為中心的同化原則所發展的殖民政策的整個基礎；相較之下，法國的同化不如英國所施行的各種不同的寬鬆的聯合政策 (Getts 1961)。

33 英國的帝國時期在本質上也關聯到1860年代以來種族文化意識形態的發展 (Young 1995a)。帝國主義的思想以及開化使命的觀念都有先入為主的種族優越感，以文明和奴役之間的基本差異辯稱開化使命是正當而必要的，這種觀念認定白種人和非白種人之間有基本的區分，而且顯現在越來越常喜歡使用絕對性而且含有污衊詆毀之意的詞彙，例如越來越多人使用「黑佬」(*nigger*) 一詞指稱任何非歐洲的被殖民者。相對之下，英國人所採行的系統比較不干涉當地文化，在今天看來比較具有開明的精神。但是事實上，英國人的想法是，當地原住民無法藉由教育提昇到歐洲人的水準——換句話說，被殖民者需要永遠殖民統治。英國的聯合政策只是提供了自治的可能性 (對某些殖民地而言)，其實它同時也隱含了種族階級觀念，認為被殖民者就是比較低能的種族。

雖然英國人也有開化使命的觀念，但是他們比較喜歡拿羅馬帝國為自己的帝國使命辯護，即使他們同時承認兩者之間有一個不同：「現今大英帝國最大的難題

——羅馬帝國當年不存在的難題——膚色問題」(Lucas 1912, I: 309)。19世紀帝國的大淵源一直是羅馬帝國，羅馬人讓人民認同一個概念：帝國善意地將文明傳播到未開化的野蠻部落。正如馬羅在《黑暗之心》中，坐在幽暗的葛蓄夫桑德 (Gravesend)，說：「這裡一直是世界上黑暗的地方之一」(Conrad 1923: 48)。羅馬帝國為英國人 (就某個程度而言，也為歐洲人和美國人) 提供了一個可以為自己辯護的模式。以塔西特士 (Tacitus) 譯註<sup>2</sup>的話來說，為文明種族優勝於野蠻和奴隸的觀念開啓了一個重要的先例。這讓他們感覺傳播文明的開化任務是歷史和道德的職責。這也就是為何英國人毫無理性根據地持續使用古典文化的語言和歷史，做為許多英國學校和大學課程的基礎：古典作品被當成是灌輸帝國時期的帝國意識形態的方式。被派往東印度公司和殖民官員都被要求在牛津閱讀「偉大的著作」(也就是古典作品)，這種做法不是偶然的。英國的上層階級毫無羞愧地迷戀一千多年前征服他們的征服者的文化，並且在英國的文化生產和教育機制上模仿征服者。英國人是第一批的「學舌者」(*mimic men*) 譯註<sup>3</sup>。

法國人同化的殖民模式需要一個非常極端的階級中心化體系。而英國人的實踐——如果美其名為模式，即代表隱含有某種程度的理論性，這就很難為其辯解——其實是十分怪異。奚禮的評語說，大英帝國的形不成不過是「無心插柳」的結果 (這個講法呼應了卡爾納馮 (Carnarvon) 伯爵在1870年對著英國上議院所說的，帝國是「或因意外，或因錯誤而誕生」，兩者的說法同樣令人難以置信，只是奚禮的措辭比較優美)，這個委婉的說法美化了事實：大部分的英國殖民是由私人公司執行，後來政府才將之納入憲法或行政的脈絡：即使一般的殖民地都是由三個分立的政府部門管理 (殖民辦事處、印度辦事處、外國辦事處)，而且幾乎每一個殖民地都有不同的地位 (*status*)，然後根據各地的地位而有個別不同的管轄 (McIntyre 1977: 20-4)。英國有許許多多不同種類的殖民地。1999年在愛爾蘭西部的「高爾葦會議」上 (Galway) 提出的問題——愛爾蘭是不是一個殖民地？——表示在概念上做明確的定義是多麼的困難。即使愛爾蘭在1922年「愛爾蘭自由邦 (協定) 條款」[*Irish Free State (Agreement) Act*] 中，終於爭取到自治領的地位，英國政府中最明智的人還是無法定義什麼是自治領，除了只會解釋說，愛爾蘭的地位和加拿大一樣。這個條款不能只聲明愛爾蘭將成為自治領，因為不同的自治領有不同的制定和不同的權力。像羅德西亞等殖民地就是自治區 (*self-governing*)，但不是自治領 (Jenks 1937: 60)。正如大家所能想像的，即使建立了特殊古怪的系統，在實行的時候也無法前後一貫。

譯註<sup>2</sup> Comelius Tacitus：(約55-120)，古羅馬史學家。

譯註<sup>3</sup> *The Mimic Men*《學舌者》：原為V.S. Naipaul在1967年的長篇小說書名，諷刺自己的同胞印度人是最會模仿的人。

### 三、英國帝國主義

雖然英國是最大的殖民勢力，幅員最大的帝國，但是在1850年代和1860年代的時候，英國人認為帝國主義有違英國君主政體的模式，因為英國的君主制的統轄是一個以自由開明的建制為基礎的「類民主」(quasi-democratic)體系。帝國主義最初被視為是負面的、和民主政治敵對的一個模式；英國人對法國政府藉干涉政策(policy of involvement)而遂其擴張殖民版圖的野心很不以為然。英國人的「帝國主義」一詞隱含著對法國人的憎惡，最初是自由派用來抨擊狄斯瑞里(Disraeli)空洞浮誇的政策——「那個違反權利的系統是一個說大話、自大、強勢的可怕體系，畢康士非爵士(Lord Beaconsfield)譯註<sup>4</sup>等一千人還給它起了一個花俏的別名——帝國主義」，這是1898年的《每日新聞》(Daily News)上所寫的，以現在的角度回顧，那時正是帝國主義的顛峰時期(OED)。儘管英國在國內對殖民主義，尤其是帝國主義，有這樣的質疑和抗爭，(此點將在第七章詳述)，也不管有些政府官員，像葛拉斯登(Gladstone)譯註<sup>5</sup>當首相的時候，企圖克制，甚至削減大英帝國的版圖，英國在19世紀末期的殖民史就是不斷地擴張版圖。英國自1860年代以降，大肆擴展殖民地的版圖：1860到1900年，大英帝國所擁有的地理面積擴增了四倍之多(Porter 1991)。儘管在國內有抗爭，還有自由派人士的冷淡以對，大英帝國還是變成了一個去中心化的(decentralized)軍事和行政機器，越來越難以控制和克制。尤其在殖民冒險家——如南非的羅德士譯註<sup>6</sup>和詹姆森(Jameson)譯註<sup>7</sup>——而引發戰爭的期間，帝國不斷擴張版圖，但採用化整為零，以個別狀況或策略為基礎的方式進行(Bulter 1968)。

在英國殖民的漫長歷史中，有兩個日期對英國殖民和帝國的思想具有重大的影響：1776年和1857年。這兩個日期所發生的事件使理論和實踐產生了矛盾：英國和美國殖民地的戰爭在1781年結束，它所帶來的影響就是自由貿易的思想，以及建立一個由同種族的拓居者所組成，也就是由盎格魯撒克遜人(Anglo-Saxon)自治的自治領而形成的「聯邦」(federation)：大英國(Greater Britain)譯註<sup>8</sup>。相

譯註<sup>4</sup> Lord Beaconsfield就是狄斯瑞里(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英國政治家、小說家、英國首相(1868; 1874-1880)。

譯註<sup>5</sup> William E. Gladstone(1809-1898)：英國政治家、首相(1880-1885, 1886, 1892-1894)。

譯註<sup>6</sup> Cecil John Rhodes(1853-1902)羅德士：英殖民主義者、金融家。在南非挖到鑽石，逾1888年成立De Beers Consolidated Mining Company。在1890至1896年擔任Cape Colony行政長官。

譯註<sup>7</sup> Sir Leander Jameson(1853-1917)：羅德士統轄殖民地的得力助手。曾在1895年在南非東北部的德藍士瓦省(Transvaal)發動「詹森突襲」(Jameson Raid)，企圖推翻南非的波爾政府。

較之下，印度在1857年的「兵變」(Mutiny)終結了東印度公司的統治，帶來進步的改革政策，以及帝國政府從中央控制的機制，而中央的規條在必要時往往壓倒商業利益。因此，帝國主義的聯邦形式往往和一個非常不同形式——「附屬」(dependencies)——並存，對待「附屬」殖民地就是操控從屬的種族，而不是拓居的殖民(但是所有拓居的殖民者也操控從屬的種族)。對反殖民運動而言，這種內部的區分提供了一個方便的基礎——他們只要求在印度這類屬於被剝削殖民地的活動，能夠比照拓居殖民地般，有同樣自由的自主權。

大英帝國是二元化的，而兩者之間的分野常常把帝國推到裂解的邊緣，帝國要變成倍增的大業，還是要分裂，兩派永遠無法折衷。即使是在狂熱分子的圈子中，還是有很多地方無法一致，如狄斯瑞里等人主要以東方，也就是印度，來思考帝國主義，而狄爾克(Dilke)譯註<sup>9</sup>一派的人士則以大英國的角度來看，認為大英帝國應該是所有以英文為語言的殖民者共組的聯邦。帝國的形式有這兩種不同的主張，英國人的帝國主義的觀念大致就是兩股勢力嚴重拉扯的產物：要成為盎格魯撒克遜人結盟的帝國，或者成為各種不同從屬種族的統治者。愛爾蘭的社會主義者兼民族主義者康納利在他1916年被處死之前，如是說道：「大英帝國就是一個異質的集合，其中一小撮自治的社群，默默地看著絕大多數的從屬人民被武力強迫，臣服在專制獨裁的統治下」(Connolly 1988b: 159)。盧卡斯(C. P. Lucas)則早了四年，在1912年比較含蓄地寫著：「大英帝國重要的一大特色就是……它是由兩個截然不同的範疇所組成的：統治的範疇和拓居的範疇」(Lucas 1912, I: 309)。英國有兩種不同的殖民地，所以產生兩種帝國系統：不像早期的殖民時代以拓居或貿易來區分，而是以住民的種族來區分。

1880年代和1890年代，帝國主義一詞在英國文化上首度出現正面的含意，因為它和帝國聯邦的觀念相結合，主張帝國涵蓋所有居住在拓居殖民地的英國後裔，這麼一來就產生了新的民族認同，包含所有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盎格魯撒克遜的後裔。大英帝國最初的帝國主義的操控意涵，到此時變成了離散的英國人的結合，其願景就是一個不斷擴張的、更大的盎格魯撒克遜聯邦，終至涵蓋全球。這個大帝國的觀念因為美國在1776年獨立受到重大干擾：拓居殖民地不再能夠由倫敦直接統治，而且殖民地所追求的就是要變成自治的、自主的自治領。這個大英國的觀念頗具說服力地彰顯在兩本深具影響力的書中，一是狄爾克在1868年的《大英國》(Greater Britain)，另一本則是奚禮在1883年出版的《英國的擴張》(The Expansion

譯註<sup>8</sup> Greater Britain：大英國，指英國、英國的殖民地和自治領地。而Great Britain是大不列顛，指英格蘭、威爾斯和蘇格蘭。另有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則通稱為「大英國協」，在1949年前以英王為共主的領地所組成，包括英國本身以及其他曾為英國的殖民地、保護國或托管地所組成的國協。

譯註<sup>9</sup> Charles Dilke(1843-1911)：帝國主義的擁護者。

of England)。之後，積極熱衷派如佛勞德（Froude）在《海洋圈：英國及其殖民地》（*Oceana: or England and her Colonies 1885*）繼續強化這個觀點。除了這些之外，還有許多文學作品描述殖民的冒險故事，其中最著名的作家是哈賈德（Rider Haggard）<sup>譯註10</sup>和吉柏林（Kipling）<sup>譯註11</sup>。

#### 四、大英國

36 1886至1887年，在狄爾克以激進自由派在下議院取得席次的不久之前，他到北美和其他英語系的殖民地旅行<sup>譯註12</sup>——正如他自己所形容，就是到「世界各地的英國」。儘管他所造訪的人民在地理上散居各處，儘管他也注意到各地在經濟和政治上的關聯十分薄弱，狄爾克還是認為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同種人民之間，對他所認為共同的文化有一種民族的驕傲，這一點讓他深感驚訝。狄爾克將此稱為「大英國」，因而為散居在全球，仍然使用相同語言和機制的盎格魯薩克森族創造了一個有凝聚力的種族和政治結構的概念。狄爾克總是辯稱，大英帝國和美利堅合眾國的人民，「不只是種族和語言相同，在法律、宗教和其他許多感情方面也相同——實質上就是一家」（Dilke 1890: 3）。狄爾克因而以一個新的文化和種族的結合，取代當時廢除的「航海條例」<sup>譯註13</sup>下舊的重商主義者的連結，或對殖民地直接的政治統治。「大英國」第一次堂而皇之地在種族的基礎下區分帝國所屬。狄爾克所熱衷的只有和大英國有血緣的兄弟之邦，對英國以剝削為目的的熱帶地區殖民地毫無興趣。在1868年的時候，他應該會樂意支持英國放棄那些非盎格魯薩克森族的殖民地，以及豐厚產物的利益。事實上，他對香蕉有一種奇怪的、病態的厭惡，認為那是「特別的恐怖」；他陰森森地警告：「在佛羅里達洲和路易斯安那洲的香蕉林中，潛藏著對美國自由州（American free States）<sup>譯註14</sup>許多的麻煩和危險」（Jenkins 1965: 34）。到了1890年，他已經調適到能夠接受這些潛藏的危險，把大英國的概念延伸，進一步主張將帝國視為整體——這樣的發展可以具體而微地看到英

<sup>譯註10</sup> Sir Henry Rider Haggard (1856-1925)：英國小說家，最著名的作品有《所羅門王的寶藏》（*King Solomon's Mines*, 1885）、《她》（*She*）。

<sup>譯註11</sup> Rudyard Kipling (1865-1936)：作家、詩人，著名作品有《叢林奇談》（*Jungle Books*, 1894）、《基姆》（*Kim*, 1901）。190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sup>譯註12</sup> Charles Dilke 出版二書 *Greater Britain* (1868) 及 *Problems of Greater Britain* (1890)，記錄他到美國和澳洲、紐西蘭的旅行。

<sup>譯註13</sup> Navigation Acts：英國為發展海上霸權而頒布的貿易限制法案。主要是限制亞洲、非洲或美洲的商品必須使用英國船隻才能運入英國。此條例多半是為了壟斷英國和殖民地的貿易，維持殖民地對英國的依賴。1849年時，廢止了大部分的「航海條例」；到了1854年，外國商船可以從事英國的沿海貿易，正式終止了「航海條例」。

<sup>譯註14</sup> American Free States：指美國南北戰爭前，禁止奴隸制度的自由洲。

國帝國主義發展的軌跡。在1868年，狄爾克曾經很熱切地寫出他對於對待美國原住民的看法：「薩克森人是世界上唯一消滅他族的種族」（Dilke 1868, I: 233）。到了1890年，他嘗試對原住民的權益採取一個家長式的（paternalistic）關懷，以調和帝國種族之分的矛盾（Dilke 1890; Jenkins 1965: 397-399）。狄爾克重新調整對帝國的觀點，把它看成主要是種族的機制，而不是商業機制，這一點清楚地說明了一個基本的矛盾，而這個矛盾只能在帝國的意識形態中運用一種家長式的種族階級觀念，才能解決。就是這個觀念引導和發展，主導英國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具體顯現在張伯倫（Chamberlain）直接了當的積極外交政策。狄爾克結合自由主義和種族主義，形成帝國主義矛盾的核心，正如狄爾克自己所形容的，掙扎在「印度的絕對主義和南澳或加拿大安大略（Ontario）的民主之間」（Dilke 1890: 1）。他的方式就是結合反殖民的感情——完全支持海外的英屬的或英語化地區採行自治（self-governing）——以及對其他種族的專制（或「家長式」）的統治。如此一來，將原本贊成和反對殖民的兩種立場結合，也解決了其中的對立（Lucas 1912, I: 309）。

37 奚禮的《英國的擴張》原本是在他在牛津大學的一系列演講，奚禮以歷史的角度發展狄爾克的觀念，重寫英國的歷史，殖民活動因而成為歷史的中心，而不像以前只是邊緣的、附帶的。正如奚禮自己所寫的：「美國革命和印度的征服已經不只是偏離脫軌的事件，它們在英國歷史的主線上有其地位」（Seeley 1971: 242）。奚禮從全球的觀點看英國的歷史，認為大英帝國的地理面積足以和19世紀的兩個新帝國：蘇俄和美國比擬；而根據奚禮敏銳的觀察，這兩國將會是下一個世紀的兩股帝國的主流。奚禮以歷史的大角度為狄爾克所敘述的盎格魯薩克森全球種族霸權，增添了新的帝國視角。佛勞德的《海洋圈：英國及其殖民地》接著在1886年問世（這本書和《英國的擴張》一樣，在出版後的一年之內連續好幾刷），同樣地預告了一個由「相同的血緣、相同的興趣，和相同的驕傲」而結合的帝國。就是這種種族主義的帝國意識形態，奠定1880年代和1890年代的新帝國主義（Froude 1886: 10; Rich 1986）。

狄爾克對盎格魯薩克森的種族熱情凸顯了一個未解的議題，而奚禮的書之所以傑出，因為他正面看待這個問題：

當然，我們會立刻想到，偌大的印度人口不屬於大英國的一部分，他們和那些居住在不列顛群島之外、數以百萬計的英國人意義不同。後者與我們同一血統，因為血緣是最強固的連繫，我們因此而結合。前者是外來的種族，信奉外來的宗教，只是因為征服的關係而和我們有所關聯。（Seeley 1971: 11）

就這樣，狄爾克以種族為基礎歸納帝國的特點，事實上也揭顯露了英國帝國統轄的

矛盾：

殖民地和印度是兩個極端。無論用什麼政治準則，對這個最適用的準則，對另一個就最不適用。……一個國家如何在如此不同路線的雙線政策中而不感到困惑——在亞洲實施專制而在澳洲實施民主……？（Seeley 1971: 140-141）

奚禮認為這樣的矛盾能夠存在是因為大眾對「殖民和印度的問題」完全冷漠。正如麥考萊（Macaulay）早就觀察到的，對英國而言，這個主題「不但枯燥無味而且非常討厭」（Seeley 1971: 141-142）。歷史學家最近在爭論這個觀點：英國人一直都對他們的帝國採取相對比較冷漠的態度，直到奚禮時才改變。無論如何，殖民地的邊緣性偶爾盤據中央的意識，這更加凸顯帝國在英國人心中的邊緣性——光是一個玫森（Bertha Mason）<sup>譯註 15</sup>不足構成對帝國的關切。要觀察 1883 年之前英國對帝國的想

法，更好的地方就是股票市場和對外的移民。

奚禮的書以一半之多的長篇討論印度，針對專制和民主之間的矛盾，他的答案不是強調英國人和印度人之間的關係，而是調節「征服而形成的關係」。他認為這個狀況是一個歷史的意外。他寫道：「我們取得印度是盲目的結果。英國人所做的事情中，沒有任何一件偉大的事情像征服印度一樣，如此地不經意，如此的意料之外。……關於印度，我們計畫的目標是這個，但是結果卻是另外一回事」（Seeley 1971: 143）。貿易是計畫中的目標，取得其地是結果。奚禮有先見之明，觀察到印度民族主義可能會阻礙英國統治印度，因為印度人普遍具有民族主義的意識，它會滲透到英國統治者所依賴的「當地軍隊」，1857 年的「兵變」就是靠它的鎮壓：「大致上，這次兵變的平息是因為我們讓印度種族相互對立……當軍事叛變受到威嚇的時候，就不再只是叛亂而已了，而是一種共通的民族情感的表達。那時候我們所有的希望都會終結，想要讓大英帝國長存的希望也會終止。我們沒有真正征服印度，無法以征服者的姿態統治它」（Seeley 1971: 184-185）。印度軍隊的組成分子大多是當地印度人，而且被用來鎮壓「兵變」，奚禮觀察這個事實，精闢地分析指出，印度「就實際目的而言，並非是一個被征服的國家」。英國與印度的關係不是征服的關係，而是其他的關係：英國對印度的統治其實是「為我們強制加上許多龐

<sup>譯註 15</sup> Bertha Mason 為 Charlotte Brontë 的小說《簡愛》（*Jane Eyre*, 1847）中的一個角色。女主角 Jane 擔任家教時愛上男主人 Mr. Rochester。在兩人的婚禮中，一男子出現，當眾宣布 Rochester 已經和他的妹妹，克里奧（Creole）女子 Bertha Mason 結過婚。但 Bertha 因精神狀況不佳，被 Rochester 關在閣樓〔成了批評家所稱的「閣樓的瘋女」（*Madwoman in the Attic*）〕。經一番波折，Bertha 葬身火災，Jane 和 Rochester 有情人終成眷屬。100 多年之後，另一作家 Jean Rhys 以 Bertha Mason 做為主角，寫出反殖民的小說《夢迴藻海》（*Wide Sargasso Sea*, 1966），為被邊緣化的女性平反，讓 Bertha 開口說話，由她的敘述看到英國殖民的殘酷。

大而且幾乎無法承擔的責任」（Seeley 1971: 146）。奚禮將專制的統治轉變成一種道德責任的形式，因而解決了帝國政府的矛盾：不是文明開化任務，而是職責所在，是白人的負擔。對於那些和英國「不是共同的種族，沒有共同宗教信仰」的人民實施專制統治，奚禮在「幾乎無法承擔」的道德責任中找到正當性，這種論點以家長式的職責為帝國的意識形態找到藉口，助長了帝國進一步的擴張（Seeley 1971: 140）。

如果「職責所在」為帝國的矛盾找到解方，熱切支持帝國主義的人通常在另一個地方實際發揮更大的作用。有些比較極端的帝國主義者強烈主張盎格魯薩克森的白種人應該遍及全球，如狄爾克或羅德士，他們預見美國可能會以某種方式再進入帝國的圈子，如此一來就可以彌補奚禮所描述的可悲的「大英帝國裂痕」（Seeley 1971: 113）。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羅德士在他的遺囑中明確表示，美國將比大英帝國中其他的國家得到更多的「羅德士獎學金」<sup>譯註 16</sup>，他認為如果美國菁英到牛津讀書，他們就會體認到美國和盎格魯薩克森文明的大架構之間，有一種很深的關聯（基於同樣的種族原因，羅德士明確訂定德國人也列入獎助的對象，而當德國人的獎助因二次世界大戰而停止時，潘得墨提出了一個在當時被認為很激進的建議：既然羅德士在非洲賺大錢，他的獎學金應該提撥部分給非洲的黑人）（Padmore 1949: 47）。大英國的觀念，加上越來越多人依照韋克斐得<sup>譯註 17</sup>所提的殖民計畫到殖民地拓居，將彌爾<sup>譯註 18</sup>和其他自由派的人推到支持帝國主義的立場；而自由貿易的崩潰使帝國主義後來到了世紀末的時候，發展成張伯倫手下的自由派的新「帝國和商業」的帝國主義。

殖民的關係因此轉變成一個新的帝國夢想，期待一個英語民族的結合，一個由在倫敦的帝國議會所統轄的聯邦。聯邦的想法在 20 世紀初就被認真地討論，一直

39

<sup>譯註 16</sup> 「羅德士獎學金」（Rhodes Scholarship）Cecil Rhodes，羅德士於 1902 年逝世，捐出部分遺產當作獎學金，由牛津大學接受委託，每年挑選品格、學業優異的學生，提供二至三年的獎學金在牛津攻讀。遺囑中明確規定，獎學金的對象限於來自英國殖民地、美國和德國三地，「以促進這三股強大勢力之間的瞭解，避免戰爭」。

<sup>譯註 17</sup> 韋克斐得 Edward Gibbon Wakefield（1796-1862）：英國殖民政治家。鑑於殖民地日趨嚴重的貧窮和犯罪問題，Wakefield 提議有規劃地殖民，以一般公民，而非罪犯移入殖民地，此建議被稱為「韋克斐得拓居計畫」（Wakefield's Settlement）。

<sup>譯註 18</sup> 彌爾 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國哲學家 and 經濟學家，主張理論必須應用到實際，影響了 19 世紀的自由主義，以《論自由》（*On Liberty*, 1859）聞名。

變成自治 (self-governing) 的地區，仍舊是大英帝國廣義的聯邦中的一個自治領，就像愛爾蘭南部在 1922 年獨立，變成「愛爾蘭自由邦」(Irish Free State) 後，仍是大英帝國的自治領。1926 年在「帝國會議」(Imperial Conference) 創立的「大英國協」(Commonwealth) 其實就是最初的聯邦的構想的直接產物 (McIntyre 1977)。現在不斷強調國協具有多重文化的身分認同，有一部分其實是一種反作用力，是爲了緩和最初只有把白人歸入的歷史事實。

走向成立自治的政府 (self-government) 並不是一直那麼平順，即使對白種人的殖民地也是如此。在 19 世紀，當加拿大在 1867 年獲得自治領的地位時，澳洲殖民地最先拒絕葛雷 (Grey) 伯爵在 1840 年代末期所提出的成爲聯邦國家的提議，最後在 1901 年同意改變地位，因爲他們一方面面對法國、德國和美國在太平洋日趨頻繁的帝國活動，另一方面，對於英國政府拒絕支持昆士蘭 (Queensland) 要合併澳洲北部的幾內亞 (New Guinea) 深感憤怒 (英國政府阻止澳洲和紐西蘭依照「門羅主義」<sup>譯註 19</sup> 宣布他們在南太平洋的權力) (McIntyre 1977: 147)。相較之下，對任何想要自治的非白人來說，如西非或印度，「自治權」根本是無法達成。英國帝國系統中有不同的組成分子，它們之間的矛盾所產生的緊張關係在愛爾蘭的問題上變成最嚴重；愛爾蘭似乎很難符合上述這兩種類別的界定。葛拉斯登所領導的自由派政府不斷鼓勵愛爾蘭的自治，但是兩度因爲下議院那些靠世襲席次的保守派同僚的阻撓 (許多世襲議員的收入仰賴愛爾蘭的地租) 而敗北。他們阻撓的原因是愛爾蘭人並非純正的盎格魯薩克森人，所以不適合自治；也有人說他們已經享有自治的事實，因爲愛爾蘭也派代表進入下議院，還有人認爲讓愛爾蘭獨立就會讓整個英國在軍事策略上難以防守，然後造成各殖民地普遍興起反殖民的民族主義。而印度又是帝國系統中不同的一分子，而且在 19 世紀的整個過程中，英國在經濟方面對印度的依賴越來越深。從賀士丁 (Warren Hastings) <sup>譯註 20</sup> 被彈劾以後，有關印度自治的辯論就變成兩派，爭執的重點是：英國是不是只想統治印度以得取經濟利益，或者他們有更大的傳教或文明開化的目的。縱使有這樣的爭論，一直到 1857 年在公司法的管理之下，印度的特殊地位代表英國永遠可以把印度當成殖民統治形式的一個特例。但是，在 1857 年之後，印度的管轄由英國政府直接接手，由東印度公司發展出來的中央化帝國主義形式，漸漸變成了普遍的殖民統治的形式，以及

40

<sup>譯註 19</sup> Monroe Doctrine 「門羅主義」：美國第五屆總統門羅 (James Monroe, 1758-1831) 在 1823 年提出，是美國對外擴張政策的重要標記。美國從第三任總統 Thomas Jefferson 之後，積極擴張領土。門羅總統宣布美國不干涉歐洲列強的內部事務或它們之間的戰爭。美國承認，並且不干涉歐洲各國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但是歐洲各國不得再在南、北美洲開拓新的殖民地。歐洲國家在美洲擴張殖民地將被視爲對美國的敵對行動。美國當時的口號：「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

<sup>譯註 20</sup> Warren Hastings (1732-1818)：英國首任的孟加拉總督 (1773-1785)。

英國帝國主義階層化的基礎。

隨著東印度公司的結束<sup>譯註 21</sup>，從 1858 年開始，英國政府顯然同時以兩種形式統治殖民地：在世界上某些合適殖民的地方——就是被認定是空曠之地——採政治自由派的盎格魯薩克森族的殖民；對於從屬的種族，爲了經濟的利用，以文化和種族的優越感，採用專制的「家長式」統治，有限度地容許的內部或地方性的議會。這種雙重系統在艾爾<sup>譯註 22</sup>總督殘酷鎮壓 1865 年的「莫蘭特灣起義」(Morant Bay uprising) (85 人未經審判被處死，354 人經審判後處死，600 人被處以鞭刑) 後所引發的熱烈討論而更加確定。從此意見分爲兩大派，一派如彌爾、赫胥黎 (Huxley)、史賓塞 (Spencer)、達爾文 (Darwin)、史蒂芬 (Stephen) 等人，他們認爲艾爾總督對處死的刑罰，以及牽連的人處以鞭刑都是武斷的行爲，應接受英國司法的審判；另一派則認爲他的處置恰當，他們爲艾爾辯護，反對非白人在法律之前與英國後裔平等之說，並且堅持對這種挑戰殖民統治的行爲，總督所採取的行動純屬必要。雖然這個事件在議會和其他地方都被拿來討論，但是艾爾並沒有被起訴 (Semmel 1962)。這個事件實際上爲後來對於 1857 年印度士兵的叛變立下了一個基準，以軍隊鎮壓變成正當的回應方式。從此之後，英國的政策、司法和行爲各方面，實質上都以種族做爲分線，殖民地因此也有了區分。

不像狄爾克和奚禮那樣承認大英帝國的矛盾本質，這樣的區分導致後來的帝國主義理論家調和兩種不同形式的方式就是將它們分別放在不同的種族化的時間標度上。因此，白色人種就是準備就緒，可以立即操作他們自己的自治民主形式；而黑人在同一時間處在帝國的「託管」下，必需漫長地等待未來。或許，盧押勳爵 (Lord Lugard) 「雙重委任統治」(Dual Mandate) <sup>譯註 23</sup> 的想法微妙地呈現了這樣的矛盾：「一方面，世上那些熱帶地區豐厚的財富必需被發掘，以造福世人，但是另一方面，統治者身負重任，不只要保衛當地住民的物質權力，而且要提昇他們的道德和教育的進步」(Lugard 1922: 18)。帝國的職責到此時變成雙重的：首先，帝國是爲了他人的福祉 (「文明世界」) 而剝削那些可得的原料，否則那些原料就棄置不用，然後再引伸到可以爲被剝削的社會帶來文明的文化。無論如何，帝國表面上自由的價值，以及在印度和其他地方所採行的專制統治，兩者之間的矛盾在 1859 年時彌爾就清楚地指出其中的區別了；他認爲「文明國家」之間採用互不干涉 (non-

<sup>譯註 21</sup>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英屬東印度公司統理印度，一直到 1857 年印度士兵發動抗爭的「兵變」。由於此事件，1858 年英政府取消東印度公司的特權，從此由英國政府直接統治。

<sup>譯註 22</sup> Edward Eyre (1815-1901)：英國探險家，後任英國殖民官員。在擔任牙買加總督時，以殘忍手段鎮壓「莫特蘭灣起義」事件。

<sup>譯註 23</sup> Frederick Lugard (1858-1945)：英國人，軍人出身，參加過英國在阿富汗、蘇丹和緬甸的戰爭。1907 年擔任香港總督。著有《英屬熱帶非洲的雙重委任統治》(The Dual Mandate in British Tropical Africa)。

interference) 的原則，可是文明國家卻需要干涉「野蠻的鄰居」，兩者之間顯然有別，英國國內的自由派批評家，以及殖民地反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思想家越來越注意到這之間的矛盾。

到了1880年代，帝國主義在英國的體制上已經變成一個普遍認同的政策，也引導了英國對外政策的整體的策略。英國政府和歐洲列強，以及新興的帝國勢力，如日本和美國，開始以非經濟的，或是非策略的原因來掠奪新殖民地，有時候只是為了先馳得點，不讓別人取得，有時只為了瓜分屬於「他們的」部分。就像拿破崙三世最初的政策，這時候的帝國主義以廣義的大眾化方式操作，因為民眾被宣傳、殖民展覽之類的活動激勵鼓舞，對帝國有種愛國主義式的驕傲。這種策略對一般民眾奏效（至少對那些有投票權的男性），這一點由1895年的選舉可看出來。當時兩個對立的政黨首次都以帝國主義做為政策主張；但是，張伯倫轉向帝國主義所代表的意義是一般所說的「新帝國主義」，強調結合帝國和商業。張伯倫則辯稱，法國和德國不斷擴張勢力，必需由大英帝國組成一個大經濟體加以制衡，而這一個大經濟體是靠著帝國系統才能結合。面對全球帝國列強的競爭環伺，這樣的主張包含帝國主義素來的自負心態，加上為了尋求大眾消費而大舉征服的帝國遠征，例如1898年在貝南（Benin）所發動的惡名昭彰的突襲，英國因而越來越偏好新帝國主義所宣稱的經濟原因，追求工業帝國和專屬市場。代表經濟和商業利益延伸的帝國主義新面向，在過去——現在也是如此——通常被視為美國帝國主義的特色。以歷史的角度觀察，這正好也是自由派和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對帝國主義的經濟批評，也剛好是帝國主義的意義從直接的征服變成經濟的宰制，這個差別有時被稱為「正式」和「不正式」的帝國主義之間的不同（Louis 1976）。從此之後，尤其是隨著波爾戰爭（1899-1902）之後，大英帝國從顛峰慢慢走下坡<sup>譯註24</sup>，「帝國主義」變成一個濫用的詞，不只用來是攻擊1850年代和1860年代的法國，也攻擊英國和它所擊劃的更廣大的盎格魯薩克森世界，成了20世紀被納粹拿來充分利用的威脅。

## 五、美國帝國主義

對許多舊式帝國主義者而言，在當代實用的經濟世界中，帝國主義提供一個有啟發而且有超越性的選擇，因此他們對帝國主義轉向新式的美國帝國主義深感遺

<sup>譯註24</sup> 英國人和波爾人都垂涎新發現的金礦，因而引發戰爭。1899年英國勢力正處顛峰，本以為可以輕易擊敗波爾軍隊，不料波爾人以游擊方式繼續抵抗。此役之前，英國挾其軍備優勢，均能一舉擊潰組織渙散、武器簡陋的當地士兵。此役改變了英國在軍事上的絕對優勢，也使英國勢力走下坡。

憾；事實上，英國在南美洲實行這種新式帝國主義已達一個世紀之久。因此，殖民小說家兼加拿大的總督布肯（John Buchan）<sup>譯註25</sup>如此感嘆這樣的變化：

帝國主義的夢想——英國的種族更緊密地團結在一個非常平和而有系統的國協組織底下——喪失了它的光芒。它快要沈淪下去，變成一個種族沙文主義（race chauvinism）的形式，或者變成一個商業保護的計畫；曾經是那麼炙烈的夢想變成宴會的致詞；結合的機制已縮小成英國和自治領的大臣們敷衍了事的會議形式。（Buchan 1921-1922, I: 37）

這裡的「種族沙文主義」指的是歐洲種族之間才有的沙文主義。布肯為舊帝國主義傷嘆，但是我們回顧1903年打敗波爾人之後，他悍然拒絕讓「南非聯邦」（Federation of South Africa）享有社會和政治平等機制的提議（英國人其實可以這麼做），由此可明顯看出他意識形態的基礎，當時他的評語是「在白人和黑人之間，現在有一道無法跨越的鴻溝」。

美國帝國主義代表一個新時代，在麥金利（McKinley）<sup>譯註26</sup>和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sup>譯註27</sup>〔他就是在1907年童謠「泰迪熊的野餐」（The Teddy Bear's Picnic）中的泰迪，歌謠中的獵人顯現同情心，饒過了一隻小熊〕兩位總統熱心的領導下，一個先前的殖民地搖身變成帝國（Bull 1922: 156-83; Patouillet 1904）。從1898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帝國主義普遍瀰漫著好戰的心態，這段期間美國的政策從先前透過軍事化形式的拓居擴張，奪取並同化鄰近的領土，轉變成歐洲列強模式的直接掠奪海外殖民地，然後加以控制。1898年西美戰爭，美國得勝，因此接手幾乎所有西班牙的殖民地，最著名的是菲律賓、古巴、波多黎各〔西班牙手中的殖民地只剩下西屬摩洛哥，西屬幾內亞、里奧德奧羅（Rio de Oro）、伊夫尼（Ifni）、和費南多波島（Fernando Po）〕。那時候美國面臨波多黎各的反抗和菲律賓「新人民軍」以軍隊反抗美國統治。正如霍布森（J. A. Hobson）在1902年就觀察到的，他認為帝國通通都一樣，「古巴、菲律賓和夏威夷都只是前菜，是更加豐富的盛宴之前的開胃菜。」（Hobson 1938: 78）

奧斯特哈梅爾（Osterhammel）指出「美國是一個沒有一個主要殖民地的帝國」（Osterhammel 1997: 22）。這一點讓美國取得某些殖民地——美國從1850年代開始獲得非鄰近的領土，在1867年取得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島（the Aleutian）和中途島（Mdiway Islands），在1878至1899年取得美屬薩摩亞（American Samoa）、在

<sup>譯註25</sup> John Buchan（1875-1940）：小說家、政治家。最著名的小說是《三十九步》（*Thirty-nine Steps*），希區考克曾根據此小說改編成電影「國防大機密」。

<sup>譯註26</sup> William McKinley（1843-1901）：美國第25任總統（1897-1901）。

<sup>譯註27</sup> 羅斯福總統（1858-1919）：美國第26任總統（1901-09）；1906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Teddy乃Theodore的小名。

1898年取得關島（Guam）、菲律賓、波多黎各、夏威夷和威克群島（Wake Islands），1903年取得巴拿馬運河區，1917年得到維京群島（the Virgin Islands），然後在1903年到1915年占據尼加拉瓜、巴拿馬、古巴和多明尼加共和國，把它們當成是「保護領地」（protectorates）（Battistini 1955; Dennett 1963: Zavala and Rodriguez 1980），這同時也更精確地凸顯美國帝國主義主要是經濟的動機，後來美國帝國主義偏向間接統治和間接影響的形式，而不採用直接的殖民統治。當各殖民帝國開始轉向美國的形式，讓殖民地獨立，但維持經濟的影響或控制，這時候殖民主義有了新的名詞——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但是，這些以往的殖民列強所擁有的其實只是相對的自主性，因為美國帝國主義最獨特的一點就是，它具有霸權的（hegemonic）特性。

美國帝國主義的發展讓美國成爲一個特有的類別。它的矛盾立場在1931年巴黎舉行的「法國國際殖民博覽會」（French International Colonial Exhibition）中最能夠顯現出來。這個博覽會讓身在巴黎的人走在仿法國殖民地的街道上，一一參觀豪華的展示館，展示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法屬印度、天主教和新教的傳教佈道，中南半島、法屬西非和赤道非洲、摩洛哥、突尼西亞和阿爾及利亞（Miller 1998）。除此之外，還有展示區展示其他殖民國的勢力範圍，特別是比利時、荷蘭、義大利、葡萄牙以及美國。美國館完全依原尺寸仿造華盛頓（George Wahsington）在佛南山（Mount Vernon）的故居，一方面藉此象徵美國殖民的成就，同時也想要讓美國緊密地認同歐洲列強的殖民大業（Braun and Cie 1931）。

## 4.

## 新殖民主義

新殖民主義是……帝國主義最糟糕的形式。對那些實行者而言，它代表一種毋需負責的權力；對那些受苦的人而言，它是沒有補償的剝削。

44

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 1965: xi）

殖民地的自由抗爭可以說是弔詭地幫助新帝國主義掙脫舊系統。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帝國勢力漸漸走下坡，到了二次大戰更加沒落。1945年之後，歐洲各帝國所採行的直接操控已經行不通了——雖然各國經過了一、二十年後才接受這個事實。帝國的解體有三個原因：被殖民者的抗爭獲得蘇聯的積極支持，隨後又得到中國和古巴的支持；歐洲列強因戰爭精疲力盡，無力繼續維繫一個越來越昂貴的帝國體系，因為各地抗爭日益擴大；來自另一股超強勢力——美國——的施壓，因為美國把殖民地的貿易集團看成是自己經濟擴張的一個阻礙。但是事實上，取代舊系統的新帝國主義其實是舊系統的翻版，只是更加巧妙而間接。

依據上一章所談的觀念，最重要的一個重點是：「後殖民」的「後」就是發生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第一個意義——以直接統治的宰制——之後。無論如何，後殖民的「後」不是指帝國主義的第二個意義之後，也就是以經濟和政治宰制而形成的權力關係的體系之後。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開始第二個意義的帝國體系，其中的權力關係，以及如何抗拒或轉變的議題，激發各種不同的理論：左派的理論包括新殖民主義、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 theory）；而傾向資本主義的理論包括凱因斯主義（Keynesianism）、貨幣主義（monetarism）和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在眾多理論中，「發展」的概念具有調節的作用：在反殖民抗爭成功之後，普遍認為接下去就是要走向「發展」。只有發展才讓非、亞、拉美三大洲的社會具有某種形式的經濟能動性（economic agency）；世界上很多地區的發展計畫最初的形式沒有成功，這個失敗激發人們重新檢視它的基本論點，也開啓了運用後殖民批判的觀念。對於後殖民主義最核心的解放運動向來所倚重的馬克思主義中一些基本觀念，發展理論並沒有採納。發展理論的基本觀念就是批判歐洲中心主義，以及沒有以歐洲爲中心、沒有反身性的思想，並且透過建設性的對話促使政治或經濟更加激進，以順應各地地方文化狀況的特殊性。

45

弔詭的是，從殖民統治走到獨立，中間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消失了：能動性。反

殖民的抗爭是被殖民者抗拒他們生存的狀況，因此其中包含一種新層面的能動性。反殖民抗爭的目的就是要爭取獨立，其推論就是：獨立就可以完全實現自決（self-determination）的理想。但是事實往往沒有那麼簡單。例如，曾經改變加納（Ghana）的政治，對英國施壓，最後讓英國人不發一彈就撤離的恩克魯瑪<sup>譯註1</sup>，在加納獨立之後發現，在許多方面，他的權力只是名義上的權力：他有政治的權力，但是他並沒有取得經濟的控制權。正如布雷登（Bretton）所觀察：

不只是出口和進口的貿易、銀行業務、保險、運輸和通訊基本上都流落在外人（就是英國人）手中，連本國的外匯的主要來源——可可，都緊緊地套牢在國際融資、行銷和加工處理的迷宮中。（Bretton 1967: 16）

非洲原本是許多資源的來源地，例如可可、咖啡、鑽石、金子、木材或石油，但這類商品的市場由倫敦和紐約實施中央控管。奈及利亞的阿茲基韋（Dr. Azikiwe）發現自己的處境也和恩克魯瑪一樣；後來，新近獨立國家的許多領導人也面對了同樣嚴苛的現實。殖民地的獨立開始一種新的從屬形式，從屬於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在眾多理論中，只有社會主義理論扣連這一點。

做為一個分析的一般架構，新殖民主義早先的概念有時候成為後殖民批判之外的另一種可能的選擇。「新殖民主義」一詞的確適合用來描述後殖民時期的立即建立。雖然先前的殖民地漸漸獲得政治的主權，但是它們實際上還是受世界主要強國的控制，這些強國和以前的帝國勢力是相同的一群。「新殖民主義」隱含一種持續的經濟霸權，也就是說後殖民的國家仍舊依賴先前的主人，而先前的主人繼續以殖民者的角色對待以前的被殖民地。這是不是只有形式的改變，而非實質的改變？這樣分析起來，去殖民化就像葛蘭西（Gramsci）所說的，真的是剛好符合政治社會走到公民社會的轉變，也就是從一個由軍事力量所控制的社會，轉變到一個再也不需要這種有形的力量，因為統治階層的主導權已經在文化、意識形態、經濟和政治等各個層面充分建立起來，因此統治者運用聲望和主動的同意（active consent）就可以操作（Anderson 1976-1977; Gramsci 1971）。在新殖民主義中，由菁英構成的統治階層為了自己的利益，配合國際資本的需要來操作。有效的國際（就是美國的）控制藉由經濟手段維持，尤其是資本和科技的管道，加上控管世界性的財政組織，例如「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世界銀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或者「國際貨幣基

<sup>譯註1</sup> 恩克魯瑪（1909-1972）：加納首任首相，後成為總統。1948年組 Convention People's Party（CPP），鼓吹反殖民，並提出口號「現在就要自治」（Self-government Now），直接挑戰、威脅英國政府，導致1951年被捕入獄。但恩克魯瑪入獄後反而聲勢更大，反對勢力更強，最後英國人在壓力之下撤離，允其獨立。

金」（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在必要的時候，更以軍事力量輔佐經濟手段，例如在尼加拉瓜或薩爾瓦多（El Salvador），或以外力侵略（或逐漸加重砲彈轟炸），或典型地透過該國內部的軍警力量，以奈及利亞作家兼民權行動派薩羅瓦維羅（Ken Saro-Wiwa）所謂的「光怪陸離的國內殖民主義」的結構來掌控（Saro-Wiwa 1992）。由此觀之，這樣的情況所隱含的意義就是，國家主權實際上只是虛構；表面上自主的那些國家所採行的系統，實際上都是國際資本主義執行帝國控制的手段。

## 一、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最後階段

「新殖民主義」一詞最先在1961年出現，就在加納從殖民地變成第一個取得獨立的非洲的國家四年之後，加納領導人恩克魯瑪很快地以理論闡述「新殖民主義」。他在1965年出版《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最後階段》（*Neocolon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書中有許多分析為新殖民主義提供了基本的概念，同時也為後殖民理論界定了經濟權力的因素。恩克魯瑪主張：「新殖民主義的本質就是，新殖民主義的國家在理論上是獨立的，有國際上認為主權國家應有的所有外在條件。但是在實際上，它的經濟系統和政治政策是由外面的勢力主導」（Nkrumah 1965: ix）。因此獨立根本是個幌子。恩克魯瑪以歷史角度觀察，認為新殖民主義就像先前的殖民主義，就是資本國家社會衝突的外銷；尤其西方社會福利國家的需求，加上工人階級生活水準相對較高，所以將國內的階級衝突轉變成國際分工。國際分工變成後殖民時期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同時，由於它在國際財政資本占重要的地位，以及對全球性政治自主產生的效應，恩克魯瑪認為新殖民主義就是殖民主義的美國時期，也就是一個沒有殖民地的帝國。根據恩克魯瑪的說法，「所謂的第三世界」（這是恩克魯瑪自己所說的——在他1968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是最早攻擊「第三世界」這個用詞的評論之一）並沒有因為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之間的敵對而獲益（Nkrumah 1973: 435-8）。第三世界無能力抵抗第一和第二世界，反而因為接受軍援的提供而更加衰弱。恩克魯瑪認為，在非洲，抵抗新殖民主義要成功，必需等到非洲在經濟上獲得自由，在政治上能夠團結聯合。到時候，國際分工才會停止：

壟斷者將在自己的國家面對自己的工人階級，然後新的鬥爭會產生，在這樣的狀況下，帝國主義才會完全終止，完全崩盤。（Nkrumah 1965: 256）

我們今天來看恩克魯瑪這些文本，令人驚奇的是他對經濟的分析非常詳盡（雖然他的分析比不上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如阿敏（Amin 1973），而且他確信新殖民



主義不但危害了被剝削的殖民地，同時也傷害了剝削的國家：「新殖民主義對那些實踐的已開發國家是一個非常沈重的負擔。除非這些國家能夠擺脫新殖民主義，否則它們會被新殖民主義淹沒」。恩克魯瑪很樂觀地補充說道：「新殖民主義不是帝國主義力量的表徵，而是帝國主義在死前最後嚥下可憎的一口氣」（Nkrumah 1965: xvi, 253）。他所提出的抵抗方法就是社會主義和泛非洲主義（Pan-Africanism）。就我們前面所談到的帝國主義的區分，恩克魯瑪在他的文本中「帝國主義」一詞（第二個意義；也就是廣義的定義）和「新殖民主義」並用，多少令人困惑，讓人不禁要進一步問，如果二者之間有分別的話，到底它們的區分在哪裡。

恩克魯瑪書中的論點是，新殖民主義以另一種方式延續了傳統殖民統治。霍卜生把帝國主義描述成是一個經濟剝削的系統，位居中心的宗主國榨乾了邊緣，同時又在不公平、不均衡的交換系統下，鼓勵邊緣的人民消費中心所製造的產品，這就是帝國主義最重要的模式。對於自由派認為在所謂「低度開發國家」可以造福當地的觀念，恩克魯瑪以列寧主義的論點予以反駁：

新殖民主義的結果是外國的資本用在剝削世界上那些低度開發區。新殖民主義的投資其實是增加貧國和富國之間的差距，而不是減少差距。  
（Nkrumah 1965: x）

的確，恩克魯瑪對貧國富國差距漸大的預言已經開始實現了——雖然這些差距不是一致產生。從他寫書的時候開始，國際分工就已經開始發展，因此廉價的勞工和原料成了許多非西方國家主要的資源。國際勞工的運用需要政治的穩定，需要有經過訓練、有識字能力的勞工，還要有一個有功能的基礎結構，這就是為何西方製造商多半選擇那些由政府緊密控制的國家，例如中國或馬來西亞，當做生產衣服、電器用品和玩具的地點，而不選擇非洲國家，因為它們缺乏這些條件。這些國家的體制、經濟和政治仍然在殖民主義中操作，因此西方國家反而較偏好那些具有現代性形式的亞洲國家，在這些地方採用科技而未建立自由體制。

恩克魯瑪指出貿易協定、外援（尤其是軍援），以及由美國掌控的國際組織的操作（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變成了資本的來源，取代過去在獨立早期的時候，那些往往是野心勃勃、甚至沒有必要的工業規劃，以及文化帝國主義的形式，例如基督教的福音傳道，和平服務隊（Peace Corps），或者對媒體的控制，這一切事實上都是控制管道的建立和維持。恩克魯瑪這個分析和拉丁美洲的依賴理論息息相關，而且，依賴理論為恩克魯瑪的主張添加許多進一步的因素：科技的操控；通常由美國基金會資助，不受監督的非政府組織日漸增加；人口控制的壓力；重覓生產地以逃避西方的環境控制；以第三世界為出口目標，不是傾銷西方多餘的消費產品，而是銷售一些被認為不健康或比不是自然的選擇的危險物品——例如香菸或奶

粉（在水源不安全的地方，吃奶粉的嬰兒比喝母乳者因腹瀉致死的機率高25倍）——以及西方和其他地方所消耗的全球資源呈現整體不均衡的現象。但是，恩克魯瑪在批評新殖民主義的所有主張中，並沒有挑戰「發展」本身的觀念。其實阿敏後來針對以前法屬西非的新殖民主做補充分析時，也沒有強調這一點。但是他提出了一個挑釁的問題：恩克魯瑪所描述的新殖民主義的宰制對其他的結構因素——例如西非的經濟在獨立時變成巴爾幹半島化（balkanization）而四分五裂——到底是其原因還是結果？（Amin 1973: 273-274）

「新殖民主義」一詞還是很有用，因為它強調以廣義的馬克思主義的角度觀察後殖民系統中的經濟面。新殖民主義讓作家和行動派，如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發展文化和政治的分析，在經濟理論的架構中強調一些相關而持續的文化影響，例如殖民帝國的語言仍持續被使用，這類類的文化宰制的延續通常都是因為拓居者的後裔持續在場（presence），如英語或法語被當成實際上的國語，或者在殖民時期所建立的西方教育、立法或政治機制繼續存在（Ngugi 1981, 1993）。提安哥依據法農的主張，為恩克魯瑪的分析加上新殖民菁英的因素，也就是在西方受教育的統治階級，他們比較認同的是西方，而不是他們所統治的國家裡的人民；統治階層在享受富裕的生活之餘，以助長西方國家和跨國公司的剝削做為回報。雖然提安哥非常強調抗拒這個系統的各種文化形式，但是他也證明了依賴理論的一些問題所在。他強調新殖民主義的持續宰制，這樣的強調連帶的缺點就是暗指這些國家無能、被動，低估它們在獨立之後所做的努力，也忽略它們的獨立運動所代表的意義。如此一來，只是延續了它們無助軟弱的刻板印象，在同情的背後強化了西方霸權的論點，把第三世界看成同質性的，永遠的犧牲品。「新殖民主義」一詞的運用有時候變成有點儀式性（通常連帶著對「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有些形式上的抱怨），掩飾了對當代真正的物質狀況，其多元的特性和涵蓋的範圍，及造就物質狀況的政治和經濟情況等，一無所知，也缺乏興趣。而且，這個詞可以不必在經濟或軍事的新殖民主義，以及文化的新殖民主義之間做區分，通常前者被認為是當代權力結構的產物，而後者則牽涉到歷史的傳承。新殖民主義做為一個概念，它似乎比較適合用來描述某些以前的殖民地的狀況，尤其是非洲殖民地，如提安哥自己的國家肯亞。肯亞在總統肯亞塔（Kenyatta）<sup>譯註2</sup>的引導下，在獨立之後仍然非常西化，新殖民主義一詞反而比較不適合用來描述帝國主義經濟力量的操作。新殖民主義很適當地描述了持續的殖民行為，例如美國在1983年侵略格瑞那達（Grenada），或是西方自以為有權力依照他們的意願轟炸背離的國家，例如阿富汗（Afghanistan）、伊拉克、利比亞（Lybia）、塞爾維亞（Serbia）、或蘇丹。獨

<sup>譯註2</sup> Jomo Kenyatta (1889-1978)：肯亞總統（1964-1978），肯亞非洲民族聯盟終身主席。

立之後的最初幾年，爲了回應政治發展，開始改變抗爭模式，並肯定文化，但新殖民主義沒有觸及這些，也沒有將此概念化。新殖民主義一詞的概念和它所描繪的景況一樣，逐漸「去權」(disempowering)。對於近期以經濟剝削的操作爲主的權力理論，能動性的消失同樣是一個問題。

## 二、發展與依賴理論

依照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布列頓森林協議」<sup>譯註3</sup>決定，世界經濟體系大略依循凱恩斯原則(Keynesian principles)重新建構，此後，西方世界目睹了各種經濟理論前仆後繼，而這些理論往往輸出到其他國家進行操作，但是前蘇聯勢力範圍的國家不在此列。這些理論中的一個基本原理就是「發展」的概念，指世界其他的地方必需併入現代性的範疇，也就是納入資本主義所帶來的進步的西方經濟系統中，因爲在這個體系中，資本主義帶來進步的經濟成長。因此，殖民地一直被典型地視爲提供資源發展西方經濟，而不是爲自己發展工業。從這個角度來看，它們被視爲固定的、傳統的，置身在西方經濟的歷史過程之外。發展理論同樣有這個觀點，但是嘗試著以衝破傳統機制和社會態度種種限制的現代化去改變它們。這個過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某些殖民帝國開始，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進行的更快速(Havinden and Meredith 1993)。各家各派的學術專家提供有關「低度開發」社會的各種訊息，更優秀的專家則積極促使這些地方的經濟和文化朝著現代性蛻變(Escobar 1995)。大致上，後殖民國家在開始的時候都接受這樣的處方，認爲自己需要現代化才能發展經濟，增加財富：唯一的問題是，如何達成這個目標。在經濟上，它們可以選擇加入西方或者蘇俄的體系，但是事實上，這兩個選擇都認定「發展」是大家都期待的，只是所根據的模式不相同。戰後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認爲經濟發展是一連串直線型的發展階段，由一個權力集中的政府推動一個大規模的工業或基礎結構的計畫，才能讓一個國家「脫離」傳統農業經濟，轉變成一個工業國(Weiner 1966; Rostow 1960)。毛澤東在1958年的「大躍進」就是依照本土社會主義路線將這個概念付諸實現。發展的最終目的就是把第三世界現代化，其實就是「西化」(在現在就是「全球化」)。「發展」非工業化的國家需要藉助於貸款，需要向一些專門爲經濟成長而設計的銀行或西方國家借貸。但是對許多國家而言，尤其是南撒哈拉沙漠的非洲國家，當預期的成長落空時，就會發生通貨膨脹，然後接著貨幣貶值。這樣的策略只會引導它們走到負債的危機，欠債的國家最後要付出的利

<sup>譯註3</sup> Bretton Woods Agreement：1944年二次大戰結束之前，英美等44國在美國New Hampshire的小鎮布列頓森林(Bretton Woods)舉行國際貨幣基金會議，決議在1945年建立國際貨幣基金，建立新的世界貿易體系。

息遠遠超過它們當初所借來的(George 1988, 1992)。

恩克魯瑪一方面利用發展體系所助長的專制獨裁的權力結構，但他同時也觀察到，這樣的結構使新近獨立的國家仍然屈從於經濟勢力更強大的前殖民主人。非洲國家在獨立之後傾向社會主義，或者和親近蘇聯或中國形成認屬關係(affiliation)，部分原因是它們漸漸注意到一種不同的新殖民主義體系已經行之有年，就是1823年的「門羅主義」公布之後美國在中南美採行的干涉形式。這一點由美國商業機構有效經營的「香蕉共和國」<sup>譯註4</sup>素有惡名，可見一斑(美國和歐盟在1990年代的貿易戰，焦點放在美國政府控訴歐盟偏厚窮困的加勒比海農人，有損美國香蕉跨國企業，這事件絕非偶然<sup>譯註5</sup>) (World Development Movement 1999)。因爲這個原因，對發展模式最具體的批評就在1950年代末期由美洲發軔，以美國馬克思主義者巴倫(Paul Baran)的《成長的政治經濟》(*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1957)開始，他認爲發展的真正問題不在「低度開發」社會的傳統基礎結構，而是國際公司把任何盈餘收爲利潤，根本不願再投資在當地經濟的成長。

因此，三大洲的低度開發並非一個孤立的現象，只有傳統非工業社會才會發生的特殊例子，而是被拿來和西方的發展一起操作，形成共生的過程。到了1960年代末期，拉丁美洲和其他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將巴倫發展理論的批判進一步闡述，變成「依賴」理論，其中最出名的是法蘭克(Frank 1969)、卡多索和法雷圖(Cardoso & Faletto 1979)、費塔多(Furtado 1964)和阿敏(1974, 1977, 1988)。他們認爲發展理論沒有體認到，西方工業的成長是利用殖民時期殖民地的「低度開發」的過程而達成的。因此，西方破壞殖民地當地的工業，爲了自己的利益而讓非西方國家的經濟停滯。這個經濟原則的政治版就在美國所制訂的惡名昭彰的法律中可以看到。該法由普拉特(Platt)參議員提案，隨後由美國國會通過，言明1898年古巴獨立後的憲法必有一增列條款，允許美國有權力干涉古巴政治事務，並且將島上的海軍基地租給美國——古巴因此註定永遠的依賴地位，一直到1959年(到現在美國仍占據古巴某部分做爲海軍基地)(Castro 1972: 27-28; Frank 1969)。這一類強迫、占便宜的情況不會發生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新獨立的國家，那些所謂的發展中國家並沒有在世界經濟體系中擺脫從屬的地位：雖然它們在形式上獨立，在經

<sup>譯註4</sup> 「Banana Republic」原本爲貶抑之詞，指國家政局不穩的小國，通常由外國操控政府。其經濟只靠出口香蕉等水果和外國投資的熱帶國家。美國通常被指爲把中南美洲國家當成「香蕉共和國」。

<sup>譯註5</sup> 歐洲香蕉進口政策允許從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生產商，進口兩百萬香蕉到歐洲。其中有857,700根香蕉的進口證指名分配給迦勒比海。而且拉丁美洲的香蕉每噸課稅85歐元，但迦勒比海免稅。美國因此控訴歐洲偏厚其先前的殖民地。後來美國反擊，針對歐洲進口的奢侈品，依其價格課以100%的關稅。



濟上還是依賴。而且，因為它們的低度開發正好被拿來當西方發展的補足品（complementary product），西方國家基於自己的利益，透過不平等的交換，或者透過貿易的剝削讓低度開發國家維持現狀（這些國家針對此舉的一個回應就是開始實施「進口替代」<sup>譯註6</sup>政策）（Emmanuel 1972; Kay 1989）。這些觀念——貧窮不是因為停滯落後而產生的問題，而是因為資本家牟利的結果——很快就被其他領域拿來應用，例如在1972年羅德尼的經典名著《歐洲如何使非洲低度開發》（Rodney 1989），作者引用拉丁美洲發展與低度開發的理論來解釋非洲的情況，認為那是在殖民時期故意低度發展的結果。類似的論點也出現在討論19世紀印度和埃及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原因。羅德尼的論點後來經過另一位非洲主義者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發展成世界體系理論的一般形式，以世界市場需要的角度重新觀察，以前的殖民勢力紛紛以新殖民主義的形式剝削各國。這樣的國際主義的角度最先在布哈林（Bukharin 1972）<sup>譯註7</sup>、西爾費丁（Hilferding 1981）、列寧（1965）和盧森堡（1951）等人的帝國主義理論中出現（Luxemburg and Bukharin 1972）。在20世紀的大多時候卻被壓制，主要是因為史達林強調「一國社會主義」論，再加上他和托洛斯基的宿仇。無論如何，到了20世紀中期，全球市場已經蔚然成形，再也不是帝國主義敵對競爭的目標，已經變成由美國和跨國企業所宰制的經濟型態了（Wallerstein 1961, 1974-89, 1975, 1979, 1984）。

與此相互爭輝的有兩個理論，一認為全球成長乃是沿著一條共同的經濟之路，但不公平發展的西方理論，另一則是源自拉美馬克思主義的依賴理論，認為一個地方的經濟成長藉著其他地方的貧困來操作。古典馬克思主義中的帝國主義馬克思理論認為資本主義的操作殘酷無情，但是它以剝削而建構的生產終究發揮全世界生產力的共同力量（這一點和發展理論並無不相容之處），但是這樣的立論被依賴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所取代，這兩派理論主張中心的發展是透過貿易的剝削，以邊緣的低度開發做為代價。在1980年的「勃朗特報告」<sup>譯註8</sup>中，自由派資本主義的國家接受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新形式，強調北方世界和南方世界分配的不公平（Brandt et al. 1980）。從此之後，這個分法就變成一個謹慎委婉的說法，取代先前所用「有的一半」（haves）和「沒有的一半」（have-nots），以及世界上的「主導的」和「被宰

<sup>譯註6</sup> import substitution：進口替代。主張發展中國家應該以當地生產的物品取代進口產品，以發展本國工業。1950年代和1960年代，拉美國家政府以「進口替代」政策取代先進國家的進口產品。

<sup>譯註7</sup> Nicolai Ivanovich Bukharin (1888-1938)：俄國革命和政治理論家；1917年十月革命的領導者之一。

<sup>譯註8</sup> 聯合國的「國際發展獨立委員會」（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在1980年，由西德前總理勃朗特（Willy Brandt）發表的報告，報告中將世界分為南北，建議將南方國家納入全球經濟體系，要求各國採取措施，解決北方國家富裕而南方國家貧窮的問題。

制」人民。

依賴理論也為1955年在印尼的「萬隆會議」發起的第三世界的「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s）提供經濟地位的脈絡。無論這個「不結盟運動」的政治目標多麼讓人欽佩，問題是這群獨立國家「第三條路」的目標，在經濟層面上並沒有獨立的系統可以配合（的確，1967年對「七七集團」<sup>譯註9</sup>的經濟權力的要求與此正好相反），反而想透過「進口替代」政策切斷（de-link）經濟上對世界市場的依賴關係，例如印度、坦尚尼亞、牙買加，以及拉丁美洲其他地方的作法。同時，有的依賴理論隱然成爲一種批判，針砭「不結盟運動」所抱持的期待，認為第三世界經濟和社會發展有自己的一條路（Alavi et al. 1982; Alavi and Shanin 1982）。大多數非洲和亞洲國家在獨立時，雖然採取中間立場，在經濟上抵制外貨，但是實際上它們在政治經濟體系有兩種選擇：或者選擇西方需求的經濟（西方所極力強調自由市場、民營化、廢除外匯管制等一直到1980年代才實現），或者選擇中蘇形式的中央極權馬克思主義經濟。雖然這些國家在政治上採取不結盟，實際上許多新獨立國家遵行廣義的國家社會主義的策略。到了1960年代，走向激進社會主義，然後越來越傾向共產主義，在實際上已經是大勢所趨，無法抵擋了。1974年的石油危機同時擊垮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比較強的國家重新站起來，其他的就此一蹶不振。

52

### 三、批判發展理論

1965年以來，後殖民世界的許多不同地區有許許多多的嘗試，接二連三地將恩克魯瑪新殖民主義的早期分析重新定義和發展。後發展理論和後殖民批評分析有部分是這個過程的產品，但是後殖民主義不但建立經濟和政治宰制的分析系統，而且發展出像拉丁美洲模式這種抗拒宰制的方式。恩克魯瑪的主張所堅持的基本理念是，在經濟帝國主義的全球系統中，必需要有一個特殊的類別——新殖民主義——用以分析先前被殖民國家的經濟情況。現在，這種應該另覓一個不同理論的主張仍舊存在，只是變成區域性的，而且是以特定的殖民史的角度來分析。東南亞國家許多「經濟奇蹟」乃是這個事實累積的結果：日本是唯一的致力於殖民地工業化的帝國勢力。台灣和韓國在日本統治之下經濟的發展充滿動力，可說是巴倫的依賴理論一個很重要的反例（Myers and Peattie 1984: 347-452）。同樣地，時至今日，愛爾蘭和獅子山共和國（Sierra Leone）之間的差異大到無法簡單地以新殖民主義來討

<sup>譯註9</sup> Group 77：指南半球77個發展中國家，主要分布在拉美和非洲，現已經包括133個發展中國家和最低度開發國家。他們以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UNCTAD）發聲，推動「新國際經濟秩序」，要求西方國家增加經援，展延外債、開放市場等。

論，因為愛爾蘭現在的個人平均所得比其他許多西歐國家高很多，而獅子山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東南亞許多國家變成很富有，若以國民生產毛額或生活水準來看，有些國家甚至已擠身第一世界的地位（如新加坡），但是很多非洲國家卻更加窮困，比起獨立的那個時候，每一個人的收入更低了。

53 現在，仍然有自由派經濟學者運用發展的觀念，但是對早期一些立論的批判所形成的力量，現在發展出一個比較整體的形式，在原本狹隘的經濟層面之外，納入文化、社會和政治的因素。它體認到發展所包含的不只是經濟的改變，而且還有社會變遷中一些質的改變過程，例如性別是社會變遷的議題中主要的一環。這樣的整體觀點也不過是把受到宰制的層面擴及社會生活的所有層面，而不只是經濟面。無論如何，這種轉而注意各地的形式和差異也是對羅斯托（Rostow）等人以種族中心的發展理論所做的批判，因為他們總是把西方的模式當成唯一可能的標準（Hadjor 1993: 276-278; Leys 1996）。把發展分為幾個階段，認為非西方國家也會經歷歐洲歷史的相同階段，這種發展階段的觀念，和早期人種中心論的人類學觀念都是基於同樣的假設；人種中心論認為不同種族和文化在成就並不均等，但都是朝向同樣心智發展的路線前進。就像世界上不同民族被視為人類歷史的活博物館，同樣的，世界上的不同國家就是經濟史的活博物館。它們唯一前進的路就是模仿西方（Tucker 1999）。

它們的模仿也必須要跟隨西方本身觀念的改變，因為對於如何進一步發展經濟，西方本身的看法在改變。在資本主義的經濟理論中改變最驚人的例子就是貨幣主義（monetarism），這個概念其實是在1960年代在芝加哥和南美發展出來的想法，然後在1970年代，智利在皮諾契特（Pinochet）總統領導下付諸實行，在1980年代，由美國雷根（Reagan）總統和英國的柴契爾（Thatcher）首相提議而強行加諸全球非西方的經濟。隨著「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來臨，或者更狹義地說，隨著貨幣主義的來臨，「布列頓森林協議」中某些條規被放棄，加上蘇維埃體系的崩解等，「低度開發」國家從1970年代累積超過10倍的負債被利用成一個手段，強迫這些國家進入「結構性調整」的規劃中。基本上，這些規劃包括政府支出的緊縮、自由市場體系的建立、政府角色的削弱、民營化，鼓勵私人對國家和社會的商業投資，取消外匯管制，以多國企業國內投資方案取代國際對政府記化的援助，以及由西方慈善團體或基金會贊助，非政府機構所經營的小規模社會計畫。這樣的經濟過程通常（也就是選擇性地）會帶來民主化的壓力和人權議題。像「世界銀行」之類的機構精心設計一些越來越精密的數量模式，將「發展」分類，它們以如何達成目標的經濟處方做標準，此次改變的徵兆時刻是在1981年。在這一年，隸屬於「世界銀行」的「國際金融集團」（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有新的概念，將「開發中」國家重新分類為「新興」（emerging）市場。事實上，這還

是依照發展的結構，但是為了要鼓勵直接的外資，把經濟看成一個市場，而不是以政府為中心主導的事情。這樣的新興市場所根據的系統同樣地適用於已經工業化、半工業化、以及尚未工業化的國家：其中重要的因素就是相對財富。

54 縱然文化和歷史傳統各有不同，工業化社會如蘇俄或南非，和比較傳統的社會，如在西非的馬利共和國，大不相同，但是以經濟觀點來看，新興市場根據該國的平均收入低於或高於世界平均收入（「世界銀行」在1995年的數字是8,626美金）來區分。如此的區分將「開發中」和「已開發」國家之間的差異定義為物質的差距，也促成「最低度開發國家」（the 'least developed nations'）這個第三類的出現。從最極端的例子來看，最高度開發和最低度開發國家的差異就是每人生產力（per capita productivity）50：1，個人收入的差異也大致如此。就經濟觀點而言，新興國家和興盛（emerged）國家的差別在於興盛國家的市場屬科技的創新者，而新興市場是利用已經有的科技（換言之，一種精密的國際分工形式）。不同於後現代主義揚棄「大敘述」（grand narratives）的主張，以此模式為架構的經濟學家認為有一個過程讓不同歷史傳統的市場融合，一起走向一條普遍可行的經濟之路（「全球化」），這個觀點顯示，羅斯托的立論——所有國家可以跟隨著一條共同的路，走向發展和現代性——仍然是一般的通則。我們必須承認，在很多方面，每人所得（income-per-head）的計算有效地掩蓋各國文化、歷史和地理差異的情感因素，凸顯出最主要的差別：經濟的差距和物質的匱乏。但是，在這種普遍的計算方式，每人平均所得，或者每人國內生產毛額（GDP），這些數字可能掩蓋掉富有也有偌大差距的事實：強調第三世界國家的貧窮好像表示這只是南北之間的差別，這樣的劃分忽略了第三世界也有富有的情形，而第一世界也有貧窮。例如在孟買某些地方的房地產價格擠身世界上最高者，而英國北部某地區的房子轉手易主只要1英鎊。第三世界國家內部的所得，富有的菁英和一般老百姓之間差距非常大，這主要是財富根本分配不均，或者是因為有的政府不願意花錢在社會規劃方面（印度有能力負擔一個野心勃勃的太空計畫，但是政府只願意將國內生產毛額的0.7%花在整個健康照護上）。任何南北經濟關係的調整都起不了什麼作用，除非加上社會上財富重新分配，以及在生產和消費方面擴大發展。

經濟的多面性，以及非西方的不同經濟有不同速度的發長，都是批判依賴理論和低度開發理論的基礎（Blomström and Hettne 1984; Laclau 1971; Seers 1981; Törnquist 1999）。雖然依賴理論將低度開發的矛頭從內部轉變成外部的因素，但問題是，依賴理論並沒有真正挑戰發展理論的基礎，也就是已發展經濟和低度開發經濟二者之間變化與停滯的分野。依賴理論只就核心與邊緣的關係，呈現出一幅千篇一律、停滯不變的描述性圖像，呈現出實際上沒有多少改變的希望。這樣的景象讓我們認清已經達成什麼樣的目標，但無法解釋為何「邊緣」國家之間就有差別——

有的發展的比其他地方快速多了。依賴理論不認為依賴的國家要負相當的責任，把低度開發的罪過怪到其他地方，所以仍然無法針對一些能動性和自我轉變的反例提出解釋。右派和左派均對此有所批評：對低度開發和依賴理論最激進的批判就是英國馬克思主義者華倫（Bill Warren）所主張的（透過馬克思而非列寧的論點）：

和一般盛行的民眾對自由主義的看法相反的是，第三世界在戰後並非停滯不前——不論是相對的或絕對的。相反的，這些國家在物質的福利和生產力的發展都有重大的進步。……資本主義在第三世界強力、由「草根」開始的發展所帶來的真正景象由下列充分的證據得到證明：商業急速起飛，以及由此導致的社會區分……還有工資勞力相對擴增，取代以往家庭或自己僱用的形式〔包括封建形式的土地長期占有（tenurial）關係〕。（Warren 1980: 252-3）

雖然他的主張有點矯枉過正〔1996年阿赫默德（Ahmad）曾回應這些說法〕，但華倫正視一個事實：不是所有第三世界國家在1945年之後，經濟方面都停滯不前——各國依循不同的方向前行。各地發展一直是非常十分不平均，而且華倫承認，社會主義國家並未擠身最繁榮者之列。而拉克勞（Laclau 1971）在一篇深具影響力的文章中反駁依賴理論將剝削的來源從生產導向貿易。

隨著1980年代社會主義經濟明顯失敗，捨棄民族主義改而傾向資本主義經濟理論中的全球觀點（導致一些社會主義的解方——如銀行和重要工業的國家化——更形棘手），再加上以往同質性（經濟方面）明顯的第三世界現在以每人所得的差距來區分，各國差異之大，不亞於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分。基於上述的因素，即使是依賴理論的實踐者也認為依賴理論已經走到「死胡同」（Munck and O'Hearn 1999; Rajnema and Bawtree 1997）。依賴理論的沒落引出新的形式批判發展理論，也就是上面所概述的各種形式，例如在埃斯巴克（Escobar）和塔克（Tucker）的著作顯示，西方經濟進步的「大敘述」中的樂觀性假設，有其論述和機制的基礎。依賴理論只不過是同樣走錯路的悲觀版。在所謂的「後發展理論」中，評論者如阿爾瓦雷斯（Alvarez），埃斯巴克和布羅門（Brohman）面對持續的貧窮和資源分配不公等現實問題，另外加上新社會運動的刺激，這些人強調所謂的「群眾發展」（popular development）路線，也就是從下而上，而非從上而下的發展。這就牽涉到地方的（但通常和國家相聯繫）、以人民為中心的、以人類需要為導向的運動，尤其包括女性運動、生態運動，並且強調永續（sustainability）、自我依賴、文化多元主義和權利（Alvarez, Dagnino and Escobar 1998; Nussbaum and Glover 1995; Visvanathan et al. 1997; Wallerstein et al. 1990; Waterman 1998）。相關的論點中，塔克、曼佐（Manzo）和穆克（Munck）等批評家認為，依賴理論早期的失敗有部分

應歸咎於太過注意經濟和政治形式的宰制，沒有充分注意到塔克所稱的「文化面向的宰制」。他認為「這是一個關鍵性的疏漏，因為文化的分析是任何瞭解權力的核心，以及抗爭或逆轉依賴的策略所必需注意的重點」（Munck and O'Hearn 1999: 12）。他主張在這方面要更進一步就必需學習後殖民理論中行動派重視批判以及文化的位置，其中多元性的邏輯原則為「發展」概念所依恃的啓蒙運動（Enlightenment）的理性主義，提供理性的其他形式（Arndt 1987）。

「發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已是最後一個能自我意識到本身為一門學科的領域〔但就這方面而言，它還是領先區域研究（Area Studies）〕。「發展研究」的問題在於它毫不懷疑地沈浸在歐洲中心論的假設中，認為西方形式的進步和現代性是普世共通的。為了達到弗雷勒（Paulo Freire）——追隨著恩克魯瑪的腳步——所謂的「覺悟啓蒙」（conscientization）<sup>譯註10</sup>，發展研究注意到後殖民對這種歐洲中心論知識的批判，同時也注意到後殖民的實踐把知識論和本體論結合其他被排除的、被視為下屬的（subaltern）的非西方知識（Freire 1972: 15）。漸漸地，「後殖民」代表一個積極融合的場域，是政治和文化兩種論述的交會，一個以社會科學為基礎，另一則以人文為根基（Apffel-Marglin and Marglin 1996; Darby 1997; Hoogvelt 1997; Sunder Rajan 1997）。因此，人類學家古柏塔（Akhil Gupta）在他的著作《後殖民發展》（Postcolonial Development 1997）中將不同的學科結合，以針對「印度北部的鄉村的後殖民狀況」建立一個分析的架構。在這本書的結論中談論到農民的抗爭時，古柏塔扣連各種論述，包括當地地方的知識、發展理論、全球資本主義和生物科技等論述，他認為低度開發已經變成後殖民世界的一個認同形式了：

發展主義、農業資本主義以及科技的變化，徹底改變的不只是農村生活的結構和物質的狀況，非常重要的人們的知識體系及對自己的認同都改變了。這種不同因素的混合就是我所指的觀念——具有後殖民情境（postcoloniality）的狀況。（Gupat 1998: ix）

就是這種物質和歷史狀況的混合，加上雜揉的（hybrid）論述、以及文化對人民的認同和認知的影響分析，構成後殖民做為一種知識形式的獨特面貌。

<sup>譯註10</sup> Paulo Freire (1921-1997)：巴西教育家。認為教育應該把重點放喚醒人們內在意識，啓發他們認識自己的能力。著有《受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1970）（台北，巨流，2003）。

## 5.

## 後殖民主義

「後殖民」一詞引發冗長的討論，但其中有些論點頗具巧思（Appiah 1992; Ashcroft, Griffiths and Tiffin 1998; Loomba 1998; McClintock 1994; Shohat 1992; Slemon 1994）；這些辯論的許多問題可以解決，如果我們把後殖民定義為發生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之後，也就是指帝國主義最原始的意義——以直接統治方式宰制——之後，但還是在帝國主義後來的意義，也就是全球經濟霸權的系統之中。後殖民是一個辯證性的觀念，不但代表去殖民化的歷史事實，以及堅決爭取主權的成果，同時也代表國家和人民從此進入新的帝國主義的脈絡——一種新的經濟宰制，有時還有政治的宰制。新的主權經驗典型地帶動後殖民的文化發展，大大地改變殖民地的社會特質和意識形態，同時把獨立運動的目標調整到和國家自主非常不同的要求。後殖民也特指轉變後的歷史情況，以及在先前殖民勢力下因應變化的政治情勢的文化形成。相較之下，「後殖民情境」一詞注重後殖民國家必須在其中操作的全球系統所決定的經濟、物質和文化的狀況——這個全球系統嚴重偏向國際資本利益和七大工業國<sup>譯註1</sup>的利益。無論如何，「後殖民情境」仍標示了後殖民世界在這樣的狀況下仍舊發出對抗的壓力和能動性，證明若是沒有結構性的力量加上本土、個人的經驗，複雜地混合成特定的情形，就不會有「後殖民的狀況」。

更激進地說，**後殖民主義**——其實我比較偏好「**三大洲主義**」這個名詞——點明了理論和政治的位置，具體表現出在壓迫的情況下有一種介入的主動性觀念。後殖民結合了兩個因素，一是後殖民時期的認知性文化創新，一是針對「後殖民情境」種種狀況的政治批評。就這層意義來看，後殖民主義或後殖民批判的「後」，代表一個歷史的時刻，三大洲開始有新的理論形式，以及批評分析和實踐的策略。「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等詞對壓迫的政權和實踐只採取一種批判的關係，但後殖民主義不是如此，它為跨國性社會正義的各種政治理想而爭論、奉獻。後殖民不但攻擊現狀中經濟帝國主義的獨霸，以及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歷史，同時也標榜行動主義，採取正面的政治位置和政治認同的新形式，就像馬克思主義或女性主義一樣。關於後者，後殖民主義政治與理論和所謂的「第三世界女性主義」的目標與實踐，大部分是不謀而合（Park and Sunder Rajan 2000）；至於和

<sup>譯註1</sup> G7：美、加、英、日、德、法、義七國，自從1975年起，每年定期舉辦高峰會議，商議全球經濟問題。

馬克思主義不同的是，後殖民主義納入某些非西方形式的馬克思主義，這些形式都是為了分析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系統、歷史，及其造成的後果和持續的影響而產生的。後殖民主義以這些為基礎，對當代權力結構提出批判，採用的方法是分析後殖民時期主觀狀況和物質情況而發展出來的介入主義（interventionist），並且扣連主動性改變的實踐。因此，後殖民主義採用三大洲理論的觀點，這些理論分析「後殖民情境」的物質和認知狀況，並且對抗帝國主義系統在經濟、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化明為暗，但持續存在的宰制。全球性的社會不公需要後殖民批判——從受害者的角度，不是加害者的角度出發。致力於社會改變的三大洲行動政治可以在任何領域中出現——學術、文化、生態、教育、工業、各地城市與偏遠鄉區的「中心—邊緣」結構、市場、媒體、所有各種不同的醫療形式，主流政治、雨林、以及社會層面。它的力量來自各種型態的連結和共同的政治認同，然後開始有認知、社會和機制的界線，各領域因此建立，然後連結起來。後殖民受到普遍的注意，因為它對於外在的歷史情勢和後殖民的主體所體驗的狀況同樣重視。

## 一、國家

在後殖民文化批判發展成為政治和學術實踐中的一環之前，「後—殖民」（通常有加分號）一詞在社會科學中，有特定的馬克思主義意涵。這個用法延續到現在，在當代區域研究、經濟學、政治學和國際關係等領域的語言中，甚而在某些政治人物的論述裡，例如在聯合國，仍舊可看到這樣的用法。在比較早期，「後—殖民國家」廣泛地被使用，指的是後—獨立（post-independence）的馬克思主義國家（Hadjor 1993: 250-252）；到了最近，「後—殖民國家」指一些將馬克思主義的各種形式運用到自由市場經濟的國家，如阿爾巴尼亞和越南等國。因此最早的時候，「後殖民」一詞被視為等同於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助長了後來一直認為兩者幾乎是等同的主張。但是，我們必需瞭解，反殖民或後殖民行動主義的發展是透過改變傳統的政治架構，包括西方馬克思主義。

從1950年代和1960年代「後—殖民」開始使用後，世界的狀況並不穩定；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分成兩個明確的時期。1991年蘇維埃聯邦的解體是其關鍵點，正如1917年的俄國大革命是反殖民抗爭發展的一個支點。從資本主義的觀點來看，後殖民時期包括許多新獨立的國家採行馬克思主義中的反殖民和反資本思想，但隨後都紛紛放棄。第一個時期是冷戰時期，當時各國在競爭的雙方選邊站，而一些比較具有動力的（也比較樂觀的）國家或者選擇加入由納瑟、尼赫魯（Nehru）、蘇卡諾（Sukarno）和帝托（Tito）在「萬隆會議」所發起的「不結盟運動」。第二個時期就是蘇維埃帝國主義和三個世界結構（the three worlds structure）<sup>譯註2</sup>結

束，世界上幾乎每一個國家開始擁抱資本主義以需要為導向的自由市場，連那些原本抗拒的國家都轉變了，包括俄國和先前蘇維埃聯邦的國家，以及中國、印度、越南、阿爾巴尼亞。隨著蘇聯陣營的解體，以及中國轉向控制型的資本經濟形式，現在實際上也沒有什麼其他選擇。事實上，現在只有單一一個世界經濟體系，幾乎所有國家都被迫要針對它做某些結構性的調整。如果說共產主義崩盤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帝國主義可沒有消失。殖民主義結束後進入後殖民新的宰制形式：這個目標就是冷戰時期爭取全球主控權的鬥爭核心。後殖民主義不是為新世界體系背書，而是對其狀況做出批判的回應。今天，為自主、為真正獨立和自決所做的後殖民鬥爭必需和一個複雜的對手相互競爭，而這個對手透過大範圍的全球機制和實踐大展權力。

並非所有的殖民主義均已結束——除了第一章所提到的一些仍處於殖民狀態的個別例子之外，後殖民主義者最執著的關切點就是，許多正式去殖民國家中的「第四世界」<sup>譯註3</sup>的政治仍處於被殖民的狀況（或者，像日本原住民愛努族或西班牙的吉普賽人，他們身處的國家在現代史上沒有被殖民，但卻在自己的國家被殖民）。而且還有一個問題：在獨立的時候，權力往往轉移到當地中產階級的菁英，而這些菁英分子通常是殖民主義時期接受西方各種思想和說法的人，例如，接受西方本身的國族（nation-state）觀念。如此一來，權力就落到那些具有這種這樣國族許多認同的人，而不是那些具有國際主義或對本土認同和忠於本土的人。在獨立的時候所建構，並強制實施的國族形式把國家和民族當成同質性，這樣的國家形式很快地受到種族民族主義的挑戰，例如喀什米爾人（Kashmiris）、錫克人（Sikhs）、印度的賤民階級（Dalits），以及奈及利亞境內許多不同的弱勢族群，還有一些早期被視為壓迫者或少數特權的種族，例如在斯里蘭卡的泰米爾人，在土耳其、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庫德人（Anthony Smith 1986, 1992; Connor 1994; Olorunsola 1972）。在這些地方，國家的地理界線，以及殖民主義所遺留下來的立法和政治的結構，不斷受到當地種族和第四世界的挑戰。而在其他地方，取代過去殖民主義的社會組成仍舊反映了與它們特定殖民歷史的斷裂：先前的殖民勢力。而在那些有原住民的拓居社會，如北、中、南美洲，南非、台灣、澳洲，從歷史來看，這些拓居者通常引發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界線問題，而且他們以拓居者為基本的民族和文化認同一直受到挑戰——例如在紐西蘭的毛利人主張他們的種族政權（ethnocracy）。

儘管內部的殖民主義仍舊持續，反對「後殖民」這個詞的一個理由是，它太過於強調殖民主義影響被殖民社會的意義（Ahmad 1992）。非洲的狀況的確就是如

<sup>譯註2</sup> 1945至1989年，世界分三個世界：資本主義的第一世界，共產主義的第二世界，去殖民的第三世界。

<sup>譯註3</sup> 「第四世界」：指非洲、亞洲地區裡國民所得極低、資源嚴重缺乏的國家。

此，因為非洲的殖民的時期大多非常短暫。即使是像印度這樣殖民時期非常長久的國家，從1757年〔普拉西之役（battle of Plassey）〕一直到1947年，但殖民對它的的影響是相對地有限，而且主要是中產階級受到影響，包括正面和負面的影響。對一些殖民時期比較短暫的國家，如果說殖民時期足以構成它們歷史的特有風貌，也未免太荒謬。此外，即使在那些因為殖民占領而受到嚴重影響的國家，殖民的歷史和當代社會所重視的事物比較起來就微不足道了。無論如何，後殖民這個歷史的標記在實際上有沒有這些延伸的意涵，這一點仍不甚清楚。「後殖民」的歷史定義讓相對應的詞「後—獨立」也出現在民族主義的脈絡中，用以描繪在現代去殖民時期，本土文化和社會的發展。但是像這樣強調獨立而不強調殖民也有它自己的問題，因為這樣的強調也會被指責暗中抹殺了前獨立時期的原住民文化；還有，有些地方的獨立時間有時是不確定的，沒有一個明顯、戲劇性的權力移交時刻，有些殖民地是以自治領或保護國的形式而享有內部的自治，然後為了爭取合法的地位，逐漸由法律邊緣上推進，達到獨立（愛爾蘭是在1924年還是1948年「獨立」？埃及的獨立是1922、1936、1954年還是1956年？）

「後殖民」所標示的不是殖民，而是戰勝殖民。「後」代表了許多值得大書特書的勝利，這些勝利不應該在歷史的失憶症中消逝。後殖民時代這個名稱代表對抗殖民帝國的歷史成就的一種敬意；弔詭的是，它同時也說明了之後的生活狀況中，許多基本的權力結構還沒有任何實質的改變。後殖民主義的起源是對抗殖民侵略和帝國控制的歷史抗爭，而它的成功才可能徹底挑戰殖民宰制所賴以奠基的政治和觀念結構的系統。因此，就歷史的觀點來看，後殖民理論有很多不同的主軸：是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產物，也是19世紀和20世紀民族解放的運動產物，更是這些運動成功之後，在政治和文化方面所帶來的結果，又是1950年代、1960年代、1970年代三大洲的經濟和文化批判，甚至是移民的歷史效應，無論這個移民是在現在還是過去，是強迫還是自願。後殖民結合歷史以及當代文化的理論性敘述。歷史中行動的面向仍是後殖民書寫最關心的，包含記憶和再記憶的歷史行為，以保存獨立運動的完整面向以及反殖民主義行動中匿名的參與者。後殖民理論是由雜揉的形式和各種不同的邏輯發展出對抗的模式，抗拒反殖民主義所指向的各種不同的帝國政治和文化系統，這種理論的政治和認知的基礎來自獨立運動豐富的政治和知識史。後殖民拒絕把自由的鬥爭史簡化成一種頑強的「第三世界民族主義」。沒有社會主義調和的民族主義的解放帶來的不是壓迫的結束，而是壓迫的新形式。就這層意義來看，列寧認為共產革命運動在殖民解放之後會脫離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同樣地，後殖民主義基於資產階級的階級區分和性別動力（gender dynamics）而反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後殖民主義重塑政治領域，將民族主義從協助團結人民抵抗殖民壓迫，變成到了獨立時的反民主能動性（anti-democratic agency）以階級（通常是男

性）宰制性質不同的國家。就像由「三大洲主義」一詞更能顯示出來的，後殖民主義一直是以一個國際主義的形式來操作。

## 二、位置

他們希望把革命的工團主義<sup>譯註4</sup>淹沒在教授們的口水中。（Sorel 1999: 43）

有些人指責「後殖民」是一種地區性民族主義（provincial nationalism），也有人抱怨說後殖民根本是以帝國都會的觀點看世界；如果反殖民主義沒有那麼徹底地以都會為中心，這樣的指責就比較令人信服。正如多位評論家指出，如果參照下列的事實，這種指責就會更加有說服力：就機制的角度來看（但不是用政治實踐的角度），後殖民批判最明顯的力量來自當代帝國勢力龐大的美國大學，或者是19世紀時英國的大學（Appiah 1992; Dirlik 1997; Mukherjee 1990; Robbins 1999）。即使在這個領域，權力／知識的主軸還是不會輕易放棄西方經濟宰制延伸到後殖民理論所扣連的場域。反諷的是，這又是歐洲和美國掌握權力發號施令，說著另一個故事，現在是西方將自己定義為後殖民，認為後殖民主義是西方歷史和認同的一個重新的思考和構成。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唯一的原因是西方本身並非同質性的。在歐洲和美國，發展後殖民理論中的激進政治的人，是那些少數族群，尤其是在有色人種。在這個的領域，尤其是在各機構中，大部分被來自三大洲的知識分子所占據。許多最具影響力的理論家都是長期待在西方學術界，如阿默赫德、阿敏、阿皮耶（Appiah），巴巴（Bhabha）、查克拉巴帝（Chakrabarty）、德力克（Dirlik）、古哈（Guha）、霍爾（Hall）、馬孜茹（Mazrui）、穆丁比（Mudimbe）、薩依德和史碧娃克（Spivak）。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樣的後殖民互動說明為何後殖民理論被民族主義者（特別是印度的）視為是某種形式的「知識分子的背叛」（*trashion des clerrs*）<sup>譯註5</sup>，認為這些人的焦點居然延伸到自己的國家以外，也可說明那些以國際觀點強力扣連後殖民意涵，並且為少數族群（無論在西方的或是在其他地方）而辯的人本身往往受到最惡毒的攻擊，而攻擊他們的人不只是西方的右派，還有那些置身西方以外的人。批評後殖民理論的民族主義批評家因此和西方的右派同一陣線，這些右派拒絕修正傳統西方價值或已認定的歷史敘述，對於現代全球經濟是構成新帝國時代的部分因素，這樣的觀點也完全不能接受。無論如何，位置本身就是一個截

<sup>譯註4</sup> syndicalism：工團主義，起源於法國的一種戰鬥性的工會運動，主張工人以直接行動破除資本主義體系，改革社會。

<sup>譯註5</sup> 法國作家Julien Benda在1927年所出版的書的書名。



然清楚的概念；個別的學術位置是否屬於西方的，本身就很難定義，因為你不需要真正在西方工作才會接受徹底西方的觀點，或者有些人來自其他地方，但實際上多數時間都在西方工作。現在，當讀者讀一本書的時候，除了在封面護套上知道作者屬於那個機構之類的訊息之外，沒有人真正知道這個作者「在」哪裡，其實這一點都不重要。這個差別並不是地理位置的問題，而是個人在知識、文化和政治上，從什麼位置發言，發言的對象是誰，他們又如何定義自己的解釋空間。

西方後殖民批判的起源是學術機構，這一點和戰後移民歷史有關：英國的帝國船艦「乘風號」(SS *Windrush*) 在1948年抵達倫敦；美國的甘乃迪(Bobby Kennedy) 在1965年改變美國移民法案，將移民配額制度從原本以歐洲為主，改成以全球的基礎平均分配；在澳洲，「白澳」移民政策到了1972年取消。有一些移入的人口是中產階級的專業人士，但是至少在英國，來自中產階級比阿赫默德(1992)或德力克(1997)所說的類型少多了：許多人來自世界上最貧窮地區，他們面臨貧困的窘境，另外有些人移民是因為受到各種形式的宗教、族群或政治迫害。這些移民到西方的人，或是他們的子女，後來進入西方教育體制，但仍然強烈感覺到自己的出身之地被視為文化和政治的邊緣和周圍。他們的反應不是接受現況，也不是完全同化到現在所處的文化。相反地，他們用行動主義的精神和民族解放運動的自我賦權(self-empowerment)來武裝自己，開始針對西方歷史和西方知識所隱含的一些思想，提出難以解答的問題，並且以他們本身對三大洲的本體認知，扣連各種抗爭形式，抵抗移民日常生活需要面對的種族主義和去權(disempowerment)。

63 這麼一來，以後殖民主義在西方學術界的迴響而將它視為西方產物的看法，就有了比較複雜的角度。本書的論點就是，認為後殖民是西方的產物，這樣的分析太過簡單草率。做為學術界一個學科的研究領域，「後殖民研究」的確是出自世界各地的以英語為主的大學，後來具體化發展成爲一個學術領域，也的確是主要發生在西方機構，雖然也有在其他地方發展。但是，在許多方面，這個發展並不只是那些出身和文化認屬是在其他地方的「後殖民主體」所努力的結果，還有許多知識分子和文化上的行動派在過去一百多年來鼓吹的思想和實踐，漸漸發展出一些具有批判性、分析性而且在政治上十分堅定的方式來對抗西方。就歷史來看，就是這些身處殖民地，或是來自殖民地或新近去殖民的國家的行動派和知識分子，有效地扣連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的反對力量，這些批判的力量也和西方所發展的批評相連結。回顧起來，最令人驚訝的是，由反抗殖民主義所激發的知識和政治的純粹能量、分量和英雄式的投入，以及那股一直延續到後殖民時期的生產力(productivity)。後殖民研究讓這股力量有學術研究的焦點，凸顯出它的意義。這是第一次，在一個和薩依德的《東方主義》中所描述者相反的行動中，西方學術機構

所掌握的權力被用來對抗西方。這是第一次，在西方學術界，後殖民的主體變成了知識的主體而非客體。這也是第一次，三大洲的知識、文化和政治實踐在機制上，和任何其他國家一樣，爭取到多少算是平等的地位。

### 三、知識

任何一個當代的知識或政治運動建立之後，往往就有許多關於此運動名稱的辯論產生。這是因為命名牽涉到政治權力結構的重要形式，就如同女性主義、酷兒理論和黑人研究都經歷了和名稱的各種涵意搏鬥的歷程。任何以「主義」結尾的名稱的一大缺點就是，「主義」被認為隱含一套共同的思想，是單一而具有同質性的意識形態。這樣的歸納必然是事後一種廣義的概括總結。事實上，每一種主義的實踐往往是非常多樣化，而且性質大不同——想想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共產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這些名稱把各種不同位置的政治立場變成理論。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兩者在概念和實踐上性質完全不同。把「主義」當做是一個同質性的整體來攻擊它是毫無意義的，雖然這是一個很便利的方式，可以一筆帶過。以為後殖民主義是一個統一的理論，有一個一致的觀點和立場，這樣的想法也是錯誤的。舉例來說，當代黑人女性和男性在文化、歷史、知識和政治的需求，顯然迥異於那些在奈及利亞為抵抗跨國石油公司的剝削和生態破壞而奮鬥的行動派(Mirza 1997; Sivanandan 1982; Young 1999)。後殖民理論涵蓋多元化的行動，各有不同的優先順序和立場；以為後殖民理論有一個統一的理論架構將會是一大反諷，因為後殖民理論的特色之一就是拒絕統合一體的形式。

而且，就嚴格的定義來看，後殖民理論其實根本不是一個理論；也就是說，它不是那種「根據許多原則，歸納出可以應用在無數實證性描述的抽象模式」(Foucault 1972: 114)。後殖民理論發展出一套概念的資源，就像女性主義沒有一個必需恪守的單一方法，反而是許多共享的政治和心理感知，並且依據某個共同範圍的理論，運用各種理論性的見解而訂定特定的社會和文化目標。後殖民主義和女性主義的關係從方法學和政治層面，延伸到它和當代書寫與歷史緊密的關聯，及其主動介入政治實踐的動力。在某些地方，後殖民理論還是女性主義的一部分，同樣地肯定一種以廣納不同學門，相互爭辯的理論政治，以便能夠發展出自己的見解。和女性主義一樣，這就表示不同的理論家會根據特定的先後順序衡量他們的論點，如此就產生不同重點和不同可能性的寬廣立場。就像某些女性主義可能含有激進的反理論立場，重視的是個人意識和經驗的價值。因為後殖民主義就像女性主義，其特出之處就是它對個人和主體性的價值和重視，這就是為什麼後殖民在體制上和女性主義一樣，最開始時都是被放在文學系，在知識的主觀形式被嚴肅看待的學術機構

內有了孤獨的一角。例如，在後殖民主義之前就有許多殖民主義的歷史，但是這類的歷史很少考慮到那些承受殖民主義影響的人如何經驗這個過程，如何分析它。

65 做為一個知識政治的形式，後殖民理論以對話的方式發展，融合了西方和三大洲的思想，尤其是反殖民的解放政治。就歷史過程來看，許多理論來源，例如有關解放權力的論述或者馬克思主義，都是由西方開始的，但這些根源在殖民的背景下不斷發生變化，依據 19 世紀以來三大洲的觀點而重新調整。在 20 世紀下半葉的改變是，這個新知識開始回滲到西方，用獨立運動的革命和起義為西方社會和西方機制刻上標記。這個刻記 (inscription) 在 1968 年 5 月的事件中第一次實現。在歷史上，1968 年 5 月是在歐洲和美國行動主義者為了展現三大洲獨立運動的成功，把他們的挑戰延伸到攻擊西方帝國列強政治中心 (Fink, Gassert and Junker 1998; Mercer 1994: 287-308)。這個過程把早期反抗鬥爭所建立的知識和經驗的激烈形式，帶到政治和學術機構中：這是第一次，政治知識分子能夠一起擷取反殖民理論的資源，以及獨立運動時期由民族主義和反殖民解放的各種不同形式而發展出來的文化認同。後殖民批判標示了邊緣的政治和文化經驗進入比較普遍的理論位置，可以對抗西方政治、知識和學術的霸權，及其訂定的客觀知識 (Smith 1998)。文化是經驗的再現 (representation)，而文化批判挑戰其決定要素，因此文化往往是反殖民和後殖民理論最核心的關切點，後殖民理論強調文化議題其實也是因為反殖民主義有某些未竟事宜所造成的直接影響。反殖民運動的成功並沒有完全重新建立去殖民國家相等價值的文化。為達到這一點，鬥爭必需直搗那些帝國列強的核心地帶，因為它們在經濟、文化和軍事上仍舊保有宰制的地位。唯有這樣才能擊潰某些西方的意識形態，用非西方所發展的價值和知識對抗它們。這就是為什麼後殖民批判需要同時在西方以及西方以外的地方運作，這一點在政治上十分重要。把後殖民批判斥為西方而認為它不值一顧，這就是大錯特錯——也就是說，把非歐洲和反歐洲的思想對歐洲思潮所產生的影響，錯以為是歐洲本身的思想。

對後殖民理論的敵視同時也印證了法農所分析的，殖民自卑心態 (colonial inferiority) 的症狀——認定所有宗主國列為有意義的事不可能在西方以外產生。而事實恰好相反：後殖民是西方開始沒落的標記。同樣地，有些人認為後殖民理論是異質性理論，加上對經驗知識視為真理的反肯定 (counter-affirmation)，這兩者是一種奇怪的結合，這樣的扣連很容易被他們看成後殖民的困境，或者看成是西方學術和「第三世界」生存狀況之間的斷裂，好像第三世界的人只能感受，無法思考 (Breckenridge and van der Veer 1993)。後殖民的操作和這種論斷恰恰相反：非西方的知識和文化傳統構成一種足以發揮極大作用的知識體系，對抗西方政治和文化霸權。因為後殖民理論不只是一要將遺留在去殖民國家的殖民思想去除，也要把留在西方的殖民主義意識形態消弭。政治上的去殖民一旦開始，跟著就必需是文化的去殖

民：將西方去殖民，將它解構。正如肯亞的小說大家提安哥所說的，現在的問題是「心理的去殖民」和「動搖中心」(Ngugi 1981, 1993)。這就必然牽涉把歐洲知識主權和宰制去中心化 (decentring)，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也就是挑戰西方種族中心論的侷限，以及以白種西方男性的觀點為標準和真理的想法。西方知識的移位 (dislocation) 和換置 (displacement) 涵蓋學術知識的移位和換置，也包括重新評估它和殖民主義以及種族主義的關聯，並挑戰西方歷史主義把歷史當成納含世界上所有其他歷史的有次序的敘述，同時質疑文學、歷史、哲學和社會學所設的典範標準，因為它們把出自非宗主國中心的作品摒除在外，甚至包括發展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之間辯論性的對話。後殖民批評中有一部分是從三大洲的文化觀點出發，批評歐洲文明和文化。對一些想要脫離殖民宰制史的那些文化而言，後殖民理論包含運用、強化、發展它們自己的歷史資源以及政治和知識傳統。三大洲的知識和文化形式必需被重新評估、強調。後殖民理論也致力於回復歷史，就像西方本身總是會產生對自己的自我批判 (尤其是在馬克思主義中)，西方本身的反殖民主義和殖民主義一樣悠久，但許多各種不同的知識著作，以及不同形式的抗爭史，相對地少為人知。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被殖民的社會中的反殖民主義，這一段充滿動力的歷史在許多方面都被忽略：某些最重要的作品很難找到；而像拉明·桑戈爾 (Lamine Senghor) 甚至法農這些主要人物的作品尚未被收集齊全。本書是這個重估的開始，我的目標是將後殖民批評扣連整個歷史族譜。

66 後殖民批判結合政治和理論的實踐，其範圍回溯過去的殖民史，並且延伸到現在後殖民的日常現實面；這樣的實踐所尋求的是質疑過去的傳承，同時也挑戰政治繼承者所訂立的優先事項及其理由。因此，後殖民主義的操作是透過時間的面向 (或者說歷史的面向)，以及空間的面向 (地理的空間和文化觀念重整的他者的第三空間)，也就是以長期糾結在高壓的權力關係下所建立的知識形式來重整世界次序 (Bhabha)。後殖民主義為各種新的活動定名，藉此，從屬國家的新歷史，新認同，新地理，新的世界概念——跨國家的，而不是西方的——漸漸形成、展演，並且透過這一切重新調整現在的權力和資源不均衡，尋求更公平正義的社會。後殖民主義的定義由這種特別的歷史實踐結合而成，延伸到一種為改變現狀而產生的轉化政治。它的主要議題包括過去的殖民、帝國和反殖民，現在的後殖民、國際分工 (以童工開始)、各民族和文化的權力，以及在西方和三大洲社會的外移的移民，內移的移民，非自願移民、遷徙、游牧、拓居和離散。後殖民批判同時也關切在帝國主義的操作以及後來民族抗爭的形成中，文化所扮演的角色 (包括學術的、文學的和通俗的)；過去和現在的解放鬥爭；新民族主義中宗教與文化的地位；國家暴力；當代的認同政治；種族與族群、階級、性別、性特質；反種族主義和自由多元文化主義、去權和新殖民主義經濟；對原住民的第四世界文化的壓抑，以及其他原住民

少數族群和游牧民族被壓迫卻隱而未宣的歷史。經驗中的共同性將這一切結合起來，關切世界上不同民族在物質方面的差距所顯現出強烈的不公，並且認為必需要有一個跨國層次的激進社會改革。

#### 四、語言

67 過去30年，後殖民的發展由一系列議題或辯論發展，然後漸漸扣連到政治介入，這個發展過程有時被視為怪異，究其原因，有部分至少因為這個理論還在形成的過程，而且它是由各種不同的來源融合發展而來的，加上某些最著名的作者的作品使用的語言晦澀而精鍊。這不只是文體風格的問題：後殖民雖然大致上植根在文化研究，但許多觀念的字彙來自各個不同學科和理論，包括人類學、女性主義、歷史、人文地理、馬克思主義、哲學、後結構主義、心理分析和社會學，另外也受各種不同派別的西方異議分子和三大洲激進思想家所激發。同時，後殖民把這些元素轉接到自己的目標上，由此發展出新的理論觀念和功用，結果是原本它所借用的思想來源的那些學科，現在反而轉向它，在後殖民理論中找尋啟發和知識的活力。

無論是學生或是其他學門的學院人士一接觸到後殖民理論，對這些融合的字彙而形成的林林總總幾乎都不知如何著手。也就是說，那些第一次接觸後殖民理論的人可能因為一些術語、觀念、和非常隱晦的用字倍感困惑，不知所措。弔詭的是，後殖民主義訴諸平民化的批評角色，但是它的理論用字隱晦難懂，似乎和過去四十多年來橫掃全球學術體系的任何一個理論沒有什麼不同。為何後殖民批評的語言如此費解？而且，如果後殖民批評是要展現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為何後殖民理論要與高蹈的歐洲理論糾纏不清？在一個意圖與歐洲中心主義對抗的文化批判中，採用這樣一個令人退避三舍的論述，後殖民理論要如何辯解？

馬克思主義是第一個答案，因為它為反殖民理論提供主要的政治和理論的字彙。後殖民理論所採用的歐洲理論集中在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存在主義，因為它在反殖民鬥爭中被引用、發展、調整，有一段漫長而深刻的歷史，因而在理論、哲學和政治觀念的字彙上，同樣造成廣大而且深刻的影響。但是這不是後殖民理論語言困難的最大原因，它的問題主要受到後結構主義這種「高蹈理論」的影響。有許多年的時間，後結構主義似乎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敵手；但是比較接近事實的說法應該是：馬克思主義有主導知識的霸權地位，以致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所發展的大多數「理論」都是和它有著共生的關係。首先，這類的理論形式並非如一般所認定的，純粹直接是西方的產物。事實上，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這種「歐洲的高蹈理論」的來源是廣義的非西方：結構主義是由布拉格學派發展出來的一個反西方的策略，直接指向對抗帝國歐洲思想中階層化的文化觀念和種族觀念。而許多我們通常

稱為後結構主義的思想家致力於發展各種不同的理論位置，他們之中有的來自阿爾及利亞和北非馬格里布。雖然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都在歐洲引發討論、逐漸發展而來，但是這兩者的確都是外來的，而且在策略上都是反對西方的。後殖民思想結合了這類理論的激進傳承，進一步融入三大洲作家的思想和觀點，以及其他從去殖民的國家移民到西方的觀點。在經歷這一段理論與歷史的長軌道中，後殖民批判累積廣泛的論點和位置，相互激盪，層層疊疊地在刮除再重寫（palimpsest）中交互爭輝。許多它所引用的觀念，從離散到底層階級，都是取自其他來源，但是後殖民理論的特點就是把這些轉譯、變化，俾能在政治上產生功能。

因此，就歷史觀察，後殖民理論是由西方和過去三大洲的反殖民主義發展而來。以任何角度來看，它絕對不是一個從西方，甚至從宗主國產生的現象；而是西方和亞、非、拉美三洲在歷史、政治、文化和觀念方面，有強烈的歷史性互動而產生的混合物。反抗西方包含了來自西方內部和外部的對抗，也就是超越西方所滲透的界線。後殖民主義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非西方的，而是兩者互動的辯證性產物，並且從殖民主義之前和之後長期的權力鬥爭所引發的反叛找到新的對照力量，並扣連起來。許多偉大的反殖民主義者在西方機構接受教育，也在此接觸到反帝國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這些人將吸收的思想配合自己特殊的需要而發展——例如阿茲基韋、卡布拉爾、法農、胡志明、肯亞塔、恩克魯瑪、尼雷爾（Nyerere）以及桑戈爾。後殖民理論家對過去的第三世界和反殖民思想的興趣基本上是有選擇性的，但是他們這一切都受惠於反殖民思想對西方帝國主義及其基礎——意識形態系統——的批判。就是因為這些批判，才可能發展出獨特的後殖民批判思想：史碧娃克重讀馬克思就屬於這類政治知識傳統（Spivak）。莫爾吉爾伯特（Bart Moore-Gilbert）最近證明了後殖民理論的文化概念乃是由加勒比海作家發展而來，如湯瑪斯（J. J. Thomas）和伯列維特（Kamau Brathwaite）（克里奧化 creolization），奈波爾（Naipaul）（學舌 mimicry）和哈瑞斯（Wilson Harris）（跨文化想像空間）（Moore-Gilbert 1997: 169-84）。這類理論為西方和非西方思想加上一層異質的觀點，並且將之結合，形成揉合西方與非西方的理論位置，如甘地；或者以被殖民者的經驗重新詮釋和轉化的西方理論，如法農的作品。甘地和法農兩人移位並且重置（relocating）反殖民論述，主要是運用了這個事實：歐洲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從來就不是同質性，而是充滿矛盾和雙義性（ambivalences）。他們兩人以西方的自我批判開始；甘地不拘泥於一格，擷取新約聖經、卡本特（Carpenter）、羅斯金（Ruskin）、史賓格勒（Spengler）、梭羅（Thoreau）、托爾斯泰（Tolstoy）；而根據學者南迪（Ashis Nandy）的說法，法農將西方思想中兩股偉大的「內在批判」（internal critiques）——心理分析和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融合在客體性和主體性的面向（Nandy 1983）。這個策略在後殖民的文化批評中延

續下來，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巴巴（1994）以及史碧娃克（1993, 1999）。

因此，後殖民文化批判所發展的這類理論源自早期反殖民思想建立的時期，這些反殖民思想本身就是雜揉的組合。後殖民一詞的出現乃是為了描述一整套的批評概念，以及對立的政治認同和目標，這些都是反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鬥爭中所蘊積的政治和文化史持續的迴響。因此，後殖民主義的理論與實踐有一段包含各種不同系譜的漫長歷史，這些就是構成本書的主要題材。由於這些原因，後殖民理論的語言具有一種怪異的片段性（fragmentary）和雜揉性，這樣的語言不但反映經驗分析中的核心客體不斷改變的形式：具有衝突性的文化互動，而且也將此繼續重複。無論這是透過殖民宰制和原住民文化的變形，或是透過入境的移民而使宗主國的文化變成雜揉的文化，後殖民理論所關切的一直都是各民族和各種文化混合之後的正面和負面影響。後殖民本身用來分析這些現象的語言同樣也是混合的：一種理論的克里奧語。雖然具有異質性和流動的觀念，但是後殖民批判在政治的整體規劃上仍然是一致而迫切的。首先，探究歐洲歷史以及歐洲的文化和知識在殖民的實踐上有什麼程度的影響和後果，助長殖民到什麼程度。第二、充分認清國際間不斷奪取和剝削的手段和原因，並分析其中認知上和心理上的效應。第三、將這些認知轉變成文化和政治生產的新形式，以便在宗主國傳統的協定之外操作，使那些仍舊處於被去權的人民和社會能夠成功地對抗被貶抑和物質的不公，進而改變這種現象。

# 第一篇

## 歐洲的反殖民主義

### *European Anti-colonialism*

## 6.

## 從拉斯卡薩斯到邊沁

過去一百多年來，英國的統治者以此一想像取信人民：英國是大西洋以西的一個偉大帝國。但是到目前為止，這個帝國只存在想像中。到現在為止，那不是帝國，而是帝國的計畫；並非金礦，而是金礦的計畫。為了這個大計畫我們已經付出無數的代價，而且還在付出；如果我們仍像現在一樣追求這個大計畫，未來勢必將付出莫大的代價，而且結果很可能是一無所獲。事實顯示，殖民貿易的壟斷對整體的民眾造成的影響是損失，而不是獲利。……如果這個大計畫不能完成，我們就應該放棄。

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

歐洲反殖民理論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發展成各種反帝國主義的形式，接下來的這兩章中，我將檢視後殖民理論的歷史、政治和理論的脈絡中與歐洲反殖民理論相關的部分。我的論點是，後殖民理論雖然在某些方面獨樹一格，但是它的操作和歐洲反殖民傳統有一種共生共棲的關係存在。這個歐洲傳統可以廣義地分為三個不同的立場，我姑且稱之為：人道的（humanitarian）、自由的和馬克思主義的三種角度。馬克思本身的思想奠基於前面兩者，而後殖民理論則仰賴三者。馬克思對殖民主義的立場是一種辯證性的綜合，擷取許多反殖民主義的人道精神和自由傳統加以融合，也包括其中的矛盾之處。歐洲的傳統中有人道的和經濟的反殖民主義，也有一種自由派理想主義，熱切地主張帝國主義就是殖民者身負開化的使命，以強迫的方式為世界帶來現代化，終將為人類帶來福祉（Semmel 1993）。同樣地，馬克思也是贊同殖民和反對殖民兼而有之，讓後殖民主義中的馬克思批評更為複雜，因為後殖民理論有部分根據20世紀各種反殖民馬克思主義所發展出來的政治和文化理論的龐大體系。後殖民理論隱然以馬克思主義批評和理論的所有觀念做為前提，最適合放在馬克思的理論大體系中。兩者最大的差異就在後殖民對現代性抱持懷疑的態度，這一點反映在它對發展理論的批評中。

在此，我想從檢視馬克思之前的反殖民主義的基礎開始，然後探討他毅然調整方向的來龍去脈。在馬克思之前，反殖民主義有兩個主要傳統，一個是以道德為主，另一個則是經濟的主張。馬克思當時所做的就是結合兩者，然後運用自由派理想主義者／帝國主義者特有的鼓吹殖民主義的態度，重新架構反殖民理論。在馬克

思之前，最能夠言之鑿鑿、大肆批評殖民主義的就是自由派的政治經濟學家和資本家，這一點很教人驚訝；而且以一般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想法而言，實在是一個新穎的角度。和有些人所推想的恰好相反的是，在18世紀和19世紀的歐洲，其實就有一股強烈的反殖民主義的傳統，但是在今日後殖民書寫中，因為某些帝國主義意識形態傲慢的「再現」(representations)，當時這個激進的傳統根本就被忽視。有關19世紀的帝國主義的敘述，似乎都認定19世紀就是單一文化的，帝國主義完全是霸權的，整個歐洲完全缺乏自我評判的能力，而且認為現在的後殖民批評家是第一個揭露帝國主義這些明顯的缺失。究其原因，有一部分是因為最主導性的焦點都在殖民論述，以及過於注重「論述」的概念——當然就是薩依德在《東方主義》(1978)所表述的觀念——因而無法真正容納對立的思想，在這樣的狀況下，就會產生出某種程度的意識形態的一致性，變成歷史紀錄的歪曲。許多帝國主義角度的敘述中可以看到，帝國的霸權在殖民地如何面對被殖民者的抗爭，但是事實上在歐洲，帝國主義的概念也一直受到挑戰。波特(Bernard Porter)在他著名的作品(1968, 1975, 1983)中已經證明，當時英國國內因為帝國主義而有許多政治上的論爭；他也舉例說明，英國帝國主義的自由派思想主張以非種族歧視的基礎來操作，這個主張和殖民地本身的白人觀念相互衝突(Porter 1975: 185)。如果說，後殖民書寫中有一個不曾間斷的錯誤再現(misrepresentation)，那就是把歐洲這個主體，也就是歐洲本身，毫無疑問地視為一個單一一致的整體，以為整個歐洲一心一意以帝國主義為念。後殖民的批評和歷史書寫雖然強調差異，但是它不但把殖民主義等同於帝國主義，還把兩者硬湊成一個一致的、不會有問題產生的整體，以為它們有一致的驅動力 and 目標。帝國主義本身是異質性的，沒有一個單一一致的引導思想。在英國的政治文化中從來就沒有一個完完全全的霸權。英國文化最主要的特點就是其中的衝突性，而且越來越是如此。以為殖民者一律贊成殖民主義，而被殖民者都反對它，這樣的想法太過簡化了——許多被殖民的上層階級和買辦之類的資產階級在殖民主義之下過的很好。即使到了19世紀末，英國的帝國主義還是一直受到內部反帝國主義的批判，在公領域中，殖民的必要性和經濟的利益不斷地受到質疑。自由派政治家，政治理論家，和「曼徹斯特學派」<sup>譯註1</sup>相關的經濟學者，從亞當·史密斯到柯布敦、布萊特、葛拉斯登、霍布森、莫利(Morley)和高德溫·史密斯，相繼質疑殖民的必要性。

就實踐和理論的層面來看，反殖民主義可以回溯到殖民主義的起點。在許多方面，殖民一開始就種下滅亡的種籽。眾所周知，主動性的反殖民主義，加上反叛、叛變，交織成一段漫長而充滿動力的歷史——一段不屈不撓、不平凡的抗爭史：奴

<sup>譯註1</sup> Manchester School：19世紀英國政經學派，主張國家盡量不要干預經濟事務，以Richard Cobden和John Bright為首。

隸叛變的數量、抵抗的各種形式、以及反殖民鬥爭的程度，這一切就和它們的賦權的歷程一樣，令人動容(Blackburn 1988; Thomas et al. 1994: 44-45)。就歷史來看，殖民主義越是用明確的軍事利益來操作，就越會激發意識形態和文化的策略，以輔助軍事和公民抗爭。在獨立運動之前，抗爭的思想和實際形式是相互連結的，因此在策略上可以單獨運用，也可以同時採用。抗爭的思想和形式之間互動的關係，成為獨立運動行動派許多知識著作中的主題——這個複雜的狀況需要在後殖民時期大加調整。反殖民思想肇始於殖民的宗主國內部反殖民的情感所引發的各種不同的形式。從現代性(就其歷史的意義)開始之後，西方文化中一直有自我批評的因子，大致上說來，這種自我批判最偉大的例子就是馬克思主義，但也包含了歐洲固有的反殖民主義。

## 一、人道立場的反對

正如修姆(Peter Hulme 1986)所說的，以人道立場的道德基礎反對殖民主義，其歷史多少和歐洲殖民主義本身一樣悠久。歐洲反對殖民主義早在16世紀就開始了。歐洲反對殖民主義的先驅是天主教的主教拉斯卡薩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在他的著作《印地安人毀滅報告》(*A Short Account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es*, 1542)寫於哥倫布首度踏上新大陸的50年之後，他在書中首度對西班牙占領美洲，以道德和法律基礎提出質疑。拉斯卡薩斯最著名的就是他以人道立場的反對；但是他所提出的其他一些問題也一直是殖民主義無法擺脫的問題。首先，拉斯卡薩斯本身有第一手的經驗，目睹征服者可怕的行徑，他把焦點放在種族大屠殺的執行，此大屠殺是以西班牙國王為名下的命令，而透過國王下令的正是最初授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教會遠征隊遠赴美洲的教皇。當時美洲實際上被西班牙統治，所以拉斯卡薩斯就建議讓印地安人成為西班牙國王的臣民，然後印地安人就可以享有和西班牙本土的人民一樣的權力和保護的形式。拉斯卡薩斯進一步指出，當初教皇授權遠征只是要改變當地人民的宗教信仰，而不是征服。因此拉斯卡薩斯為殖民主義的兩派論點奠定了基礎，可稱之為改革主義和激進主義。以改革來說，拉斯卡薩斯主張同化，就是後來法國所採用的殖民統治模式，將殖民地視為本國的一部分，並且(理論上)因為享有同樣的行政和法律架構而受益。至於激進主義，拉斯卡薩斯質疑歐洲統治的整個法律基礎，也因此認為反殖民的抗爭有其正當性。拉斯卡薩斯的著作一直到18世紀仍然是反抗殖民統治最有影響力的論證。正如培戈登(Pagden)所觀察，在16世紀時，西班牙「在面對一個越來越有敵意的世界，仍全面維護自己在美洲的主權(imperium)和所有權(dominium)的主張」；這樣的立場一直到19世紀初期博利瓦(Simón Bolívar)<sup>譯註2</sup>成功地挑戰它的權威性

(Pagden 1990: 13-14)。拉斯卡薩斯的報告中陳述善良的印地安人被腐敗的征服者大屠殺，這樣的描述對16世紀「高貴野蠻人」(noble savage)這一主題的發展有非常重要的貢獻，常常被拿來和墮落不道德的歐洲人做對比，就像卡蒙斯(Camoëns)的《盧賽亞茲》(*The Lusíads*) (1572) 譯註<sup>3</sup>中所描述的。同時，拉斯卡薩斯主張印地安人應該享有和西班牙臣民的同樣權利，這個論點被吸收、發展成這是全人類應普遍享有的權利的觀念。拉斯卡薩斯肯定印地安人具有完整人性，並強力譴責征服者統治的「社會罪惡」，使古鐵耶雷士(Gustavo Gutiérrez) 譯註<sup>4</sup>將他視為20世紀拉丁美洲解放神學的先驅。

在1566年荷蘭開始反叛西班牙統治的抗爭時期，拉斯卡薩斯的著作被翻譯成荷蘭文，之後迅速地被應用到歐洲的反殖民主義中。到了18世紀，他的主張已經發展成一個成熟的政治論述，其中平等和人權的理論變成歐洲——尤其是法國——反殖民的基礎。人道思想的哲學家將「高貴野蠻人」的觀念發揚光大，變成歐洲社會天生具備的觀念，這也是盧梭(Rousseau)在政治著作中最常出現的主題，且廣泛地被運用在反對奴隸買賣運動中，同時也很明顯地呈現在英國浪漫詩人騷西(Southey)和華茲華斯(Wordsworth)的文學作品中。很多情況下，對「高貴野蠻人」的關注的是歐洲社會的影響，不是真正關懷其他非歐洲民族。無論如何，這個神話使反擊絕對主義和君主暴政得以持續；這些哲學家譴責任何對其他民族行使絕對的權力，包括殖民者的濫權。伏爾泰(Voltaire)、孟德斯鳩(Montesquieu)等人都引用拉斯卡薩斯的作品，譴責殖民征服行動中的暴力。但更重要的是，在這個時候，批判殖民政權的濫權都是以人權為名。因此，相信人類有基本的平等權利，變成一個比「高貴野蠻人」的觀念更有力的主張，以此為基礎，批判殖民政權的差別作為，尤其是批判「文明」的虛偽，把那些在當時尚未被歐洲文明污染的人貶為奴隸。伏爾泰、孟德斯鳩和內克(Necker)一致譴責奴隸制度和強迫性勞力；在法國大革命前夕，布里索(Brissot)還建立了「黑人之友協會」(*Société des amis des Noirs* 譯註<sup>5</sup>)。

在英國，18世紀最響亮的反殖民主義也是源自反奴隸運動；由於當時福音派的狂熱與激進的異議分子煽風點火，英國反奴隸運動比法國積極許多——當然，還有個更充足的理由：英國在奴隸買賣中比法國陷的更深。在英國，奴役變成反殖民聲

譯註<sup>2</sup> Simón Bolívar (1783-1830)：南美最有名的將軍之一，拉丁美洲大英雄，領導南美人民脫離西班牙獨立。

譯註<sup>3</sup> Luis de Camoëns 乃葡萄牙作家，所著 *The Lusíads* 是一長篇史詩，第一本敘述南非經驗的歐洲文學。

譯註<sup>4</sup> Gustavo Gutiérrez (1928- )：秘魯人，其著作《解放神學》(*A Theology of Liberation*)，深受矚目，被譽為解放神學領導人之一。解放神學的興起乃是因為南美生活貧困，因而強調解放窮人與受壓迫者，古鐵耶雷士(Gustavo Gutiérrez)親身投入苦難人權，這種共同行動的實踐成為基督徒信仰的生活方式。

譯註<sup>5</sup> Jacques Pierre Brissot 主張廢除奴隸買賣，在1788年成立「黑人之友協會」。

浪越來越強的主要原因。反對的意見在17世紀時開始清楚有力地發聲表述，後來因為和美洲殖民者的紛爭而漸漸發展，在1787年成立「廢除協會」(Abolition Society)時第一次達到顛峰。反奴隸運動的主張基於兩個基礎，這兩個基礎和反殖民主義的發展實質上是相同的：第一個就是人道立場的反對，這就是為什麼西印度美以教派(Methodist)傳教士積極參與針對農場主人的抗爭(宗教和傳教工作原本被簡化成宣揚文化帝國主義，因為此事件而有了不同的複雜面向)，第二個就是基於經濟因素而反對。英國的反奴隸運動顯示，基於道德的人道立場而反殖民所針對的不是殖民主義本身，甚至不是殖民壓迫對原本住民所造成的影響(雖然從17世紀以來文學的抒發中明顯可見這一主題)，而是奴隸制度的實行。因此，人道批評的真正目標是奴隸制度，而不是殖民主義，且這也變成了被重複應用的一個類比，被應用到後來有關女性地位、工廠工人和童工等自由派的論點。反奴隸運動得到女權行動派大力支持，女性行動主義者和性別議題變成歐洲反殖民運動重要的一部分，這代表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和後來自由派的殖民改革(Colonial Reform)運動比較起來，因為在該運動中的性別議題占重要的地位，但它本質上不是反殖民(Ferguson 1992; Midgley 1992, 1998; Semmel 1960; Ware 1992)。無論如何，反奴隸運動並非一直站在反對殖民的立場。反奴隸運動的「人道原則」可能被拿來當成殖民的藉口，辯稱殖民就可以讓英國停止奴隸買賣——在討論有關西非「奴隸海岸」譯註<sup>6</sup>時，這個論點常常被魏斯壯(Wadstrom 1794)，以及之後的其他人拿來發揮(馬克思為殖民辯護也是後來根據類似論點的改良)。正如波特所觀察，反帝國主義者和殖民改革者很少是相同的(Porter 1968: 19)。對於殖民地原住民的被虐待給予人道關懷，其實隱含一種干涉，而不是鬆手：在1837年成立「原住民保護協會」(Aboriginals Protection Society)之後，拓居移民對待原住民的方式成了反對殖民的理由，尤其是在澳洲(Baumgart 1982; Napier 1835)；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做為進一步「保護」的殖民政策的理論基礎，這也是「原住民保護協會」發起人霍奇金(Thomas Hodgkin)的主張。他有許多鼓吹殖民的著作，有一部分就是以人道立場為基礎(Hodgkin 1833, 1834; Porter 1968: 18-25)。自由派將殖民之必要轉變成一種基於對當地人民的道德職責所在；因此，比方說，1874年英國兼併斐濟(Fiji)，有一部分的動機是想要保護斐濟人民，讓他們不要遭受那些早先在此立業的英國拓居者的惡行對待；而莫瑞爾揭發剛果醜聞之後，1903年之後的剛果改革運動也同樣基於對當地人民的人道關懷(McIntyre 1977: 145; Porter 1968: 239-329)。20世紀初，有些社會主義者，包括德國和荷蘭社會主義者，以及英國的「費邊社」(Fabians)都主張，需要有一個殖民主義的社會型態，才能保護當地住民不受到他們自己以及資

譯註<sup>6</sup> Slave coast：歐洲貿易商將西非幾內亞灣的貝南海灣(Bight of Benin)沿岸稱為「奴隸海岸」，因為它是16到19世紀中期西非奴隸的主要來源地。

本主義的影響，這樣的立場使得「第二國際」(Second International)在1905年的代表大會走向支持殖民的立場(Braunthal 1966: 304-312; Lee 1988; Porter 1968: 109-123)。這種人道主義的論點在今天仍常常出現，成為干涉主義者入侵索馬利亞(Somalia)或塞爾維亞的科索夫(Kosovo)的理論基礎。

由於美國獨立戰爭引發的爭論，英國在18世紀時以道德和政治立場反對殖民主義的聲浪，焦點不是放在殖民主義本身，而是沒有讓殖民地的拓居者享有政治權。英法七年戰爭結束時，英國在1763年獲得魁北克，有關這一塊領土的管轄，在1774年的「魁北克法案」辯論中也強調拓居移民的政治權。雖然英國正式取得魁北克，還是有許多人一直力主將它歸還給法國，主要是因為他們體認到，在北美洲如果沒有法國的虎視眈眈，英國的拓居殖民者就會伺機尋求獨立(Knorr 1944: 115)。英國統治魁北克的問題是，除了愛爾蘭之外，它是英國統轄的征服領土中居住了(在魁北克則有一部分)信奉天主教的歐洲人。為殖民地人民的權利而辯護的人之中，最偉大而且最堅持的就是柏克(Edmund Burke)；他與其他人非常不同，因為這個主題就是他政治介入的主要基礎。雖然他現在最廣為人知的是《法國革命之省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793)，但是他當初最先是為魁北克和美國殖民地人民辯護，反抗英國王室的濫權——無論是檯面上或暗中進行的濫權，後來他又花了許多年攻擊「東印度公司」的行為有違道德準則，甚至將賀士丁的彈劾案送交英國國會(Burke 1981, 1991; Whelan 1996)。就他的作為來看，他非但為熱帶地區以剝削為目的殖民地奠定了治理的行為準則，同時也將權利的觀念灌輸給那些移民到拓居殖民的英國人。在1775年對下議院的演講中，柏克極力主張和美國談和，就是因為這個立場，使他被視為和激進派的福克斯(Charles Fox)同路，主張具有英國血統的人都應該享有同等的自由，不論是在英國本土還是在海外。他認為否定美國人享有和英國人同樣的自由就會破壞帝國的結盟(bonds)，後來他以同樣雄偉崇高的語言在《法國革命之反省》中期許建立這樣的一個帝國機制：

不要以為你辦公室的信件，你的指示，你暫停的條款，這些東西加起來就是造就整個神奇整體的偉大成分。這些東西不會構成你的政府。這些都是死的媒介，被動的工具，但是真正賦予這些東西生命與效能的，是英國共同體的精神。就是英國憲章<sup>譯註7</sup>的精神注入這片大土地，滲透、餵養、結合、茁壯，並且活化了帝國的每一個部分，甚至披及最弱小的成員。(Bennett 1953: 42)

<sup>譯註7</sup> British Constitution：指維繫英國政體的憲章，但英國不像美國，有一部明文規定的憲法。

將英國憲章延伸到拓居殖民地，這個想法在次年由亞當·史密斯提出來，但他所用的語言沒有像柏克這樣以有機的精神性來表達。

以現代人的角度來看，柏克以英國憲章為帝國標準模式的熱切之情，和他明顯的反殖民主義格格不入。他主張讓殖民地享受自由，但卻是在宗主國責任範圍之內自由；他鼓吹託管的形式，而不是真正的獨立。至於北美的殖民地，他文辭並茂的滔滔之言沒能讓政府做任何實質的讓步，但是這其中有一部分的原因就如柯恩(Koehn)所觀察的，是政策制定者本身「無法解決他們對帝國的集體曖昧不定的態度」(Koehn 1994: 146)。這個狀況所造成的結果之一就是次年美國殖民地的「反叛」，這也是第一個成功的反殖民抗爭。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大多數的反殖民革命雖然是反殖民，但事實上都是拓居者的反叛，例如在美洲殖民地或南美洲的例子(Simón Bolívar 1825)，甚至在愛爾蘭(Wolfe Tone, 1789)，都是比照美國的模式。這些抗爭成功之後，殖民者依例建立一個新政權，這種內部的殖民形式所建立的政權往往需要經歷第二次的解放戰爭或公民權利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s)(在美洲某些國家這一點尚未達成)。一直到19世紀末，反殖民族主義都是出自拓居的殖民地，後來典型的例子就是南非荷蘭血統的波爾人，以及澳洲的民族主義者(Jebb 1905; Eddy, Schruder and MacDonagh 1988)。反殖民族主義的政治策略很容易由這個事實看出：伴隨反殖民族主義而來的，就是以立法(或者非法的強制行動)抵擋印度和中國移民移入(正如在澳洲、加拿大、紐西蘭和南非的例子)(Dilke 1890: 528-536)。雖然拓居者的反殖民主義比較有自由派的特質，但是這種民族主義仍舊刺激現在某些後殖民文化的觀念——例如「帝國反撲」<sup>譯註8</sup>的觀念。帝國或許會反撲，但它顯然還是帝國。

美洲殖民地的反叛對後來英國管轄殖民地的態度造成很深刻的影響：英國的第二個帝國對第一個帝國的損失耿耿於懷。1776年之前，陀果(Turgot)就宣稱美國的例子代表歐洲對殖民地統治的結束。還有一個更進一步的論點影響了英國對北美13個殖民州的態度，該論點強調無限擴張有其弱點——母國政府比較偏向人口集中，以方便盡保護殖民地之責，免受外力侵入。這也是英國禁止美國殖民地向西邊拓展的理由之一；另一個理由要是把13個殖民州西邊的領土變成一個大的保護地，留給美國原住民。1776年之後這個規定立即被廢除，拓居者迅速地占領了原本英國政府留給美國原住民的土地。美國的「自由」就是自由地取代、滅絕美國原住民，尤其是依拉關斯族(Iraquois)，因為他們很不幸地做了錯誤的選擇，戰爭的時候為英國打戰。對原住民族的人道關懷使柏克對美國的態度連結到印度的情況。正如蘇蕾莉(Sara Suleri)所觀察，柏克必須「被記上一筆功勞，因為有些人開始

<sup>譯註8</sup> Bill Ashcroft 的著作《帝國反撲》(*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主張印度的文化和社會可能有些有西方未曾見識之處，他是其中之一。」(Suleri 1992: 46)

80 在彈劾賀士丁時，柏克的重點放在東印度公司管理的腐敗，在他獨特、感人的演講開頭，他以長篇幅敘述東印度公司的官員如何虐待當地的印度人。他強調道德和政治的正直，也為後來的殖民地治理者立下準則。柏克是一個改革者，而不是一個自由派的擁護者。他對殖民主義的批判不是指向帝國本身的合法性，而是帝國對權力的濫用，以及不能容忍其他文化中的標準、社會實踐和機制 (Mehta 1999)。他期許英國憲法可以為帝國統治立下一個模式，主要是因為英國能夠在英國國會的整個體架構中，為不同的殖民地提供不同的政治及法律、教育的制度。愛爾蘭的情況沒有在這個模式之列——柏克激烈地批判「刑事法」(Penal Laws) 譯註<sup>9</sup>，以及對天主教徒的歧視，將愛爾蘭變成一個實際上被隔離的地區。柏克期許的是蘇格蘭的例子：在1745年蘇格蘭高地文化被毀滅，並且經過「大清洗」(Clearances) 譯註<sup>10</sup>之後，蘇格蘭成功地併入英國政府管轄，同時又保有自己獨特的法律和教育系統。柏克鼓吹的是殖民統治在任何情況下，不應該干預各地的法律、教育和文化機構，由此，柏克為自由派的最低干預或不干預的原則定下基礎，這也是構成英國帝國制度思想的基礎。雖然就如吉朋司 (Luke Gibbons, 即將出版) 所說的，柏克對風俗、歷史和傳統等角色的主張可以放在現代多元文化的脈絡中來解讀，但他這個觀念並非源自任何文化權利的理論觀念。同時，柏克體認到自己在帝國中心所採取的保守政治立場，以及結合風俗和文化傳統對抗從上而下強制的意識形態，這些理念對那些在邊緣的殖民地被宰制的人民可能會發生不同的作用——變成一個激進的反殖民主張。

之後，對於19世紀英國殖民主義的實踐，許多的焦點同樣都是以改革為導向，而不是對殖民地本身的仇視，例如麥考萊、彌爾、布萊特或費賽特 (Fawcett) 等人 (Maccoby 1938, 1953)。但是柏克的反對立場並非純然的利他主義：他認為容忍海外殖民地採行壓迫政權終究會削弱並侵害國內英國制度的實踐，最後會威脅到英國內部的自由。針對加拿大1774年的狀況，他曾說：「當那個國家不能夠被當成自由的國家來治理的時候，我質疑怎麼可能在這個國家實行自由。不可能有一個自由的國家會讓另一個國家生活在奴隸制度中。他們為此付出的代價將會是他們自己的奴役」(Bennett 1953: 38)。這種自己終將付出代價的歷史報復的論點後來被柯布敦引用，而後霍布森也運用到帝國主義的論述中 (1938: 150-151)。同時，正如

譯註<sup>9</sup> 1695年，英國新教統治者頒布一連串的「刑事法」，剝奪愛爾蘭天主教徒的土地、地位、民權。天主教徒失去法律上任何保障。

譯註<sup>10</sup> 在1745至1746年的Jacobite Rebellion之後，蘇格蘭經歷了「高地大清洗」(Highland Clearances)，蘇格蘭高地的佃農被強迫驅離。

馬克思所指出的，柏克對印度事務的干預也是1784年「比特印度法案」(Pitt's India Bill) 譯註<sup>11</sup>之後，英國不同政黨派系長期鬥爭的部分原因，各派爭奪「東印度公司」的政治控制權，尤其是貴族和製造商利益之間的競爭尤烈。其實柏克的目的的是削弱「東印度公司」利用受帝國保護 (patronage) 的功能，讓它開放成自由貿易。柏克和史密斯一樣，認為任何一個帝國和殖民地的關係都應該建立在自由貿易的互利基礎上。

81 在18世紀之前，人道立場的反殖民另有一個輔助的論點，一個比較沒有那麼家長式 (paternalistic) 的政治主張，純粹基於信仰人類的自由，認為反殖民是自然的法則。這種觀點的反殖民主義在法國大革命時候得以進一步宣揚，因為法國大革命強調自由、平等和博愛，這個原則理論上應該推展到世界上所有種族。就是這樣人人天生平等的觀念邏輯引導革命的「法國國民會議」(French National Assembly) 解放了所屬的殖民地——為期很短的時間。就像美國獨立的時候一樣，所有人生而平等的原則通常被認為只限於白人。法國的政治激進派和英國的激進派一樣，至此開始注重黑人的權利和奴隸解放的問題。就是在這樣的一個脈絡下，羅伯士比耶 (Robespierre) 才有這個著名的說法：「讓殖民地消失吧，如果它們要你付出的代價是你的榮譽、你的光芒、你的自由」(Merle 1969: 192)。但這不代表革命的法國議會馬上將政治權利擴大到殖民地的人民。直到1792年，解放的黑人才有公民和政治權，到1794年在丹東 (Danton) 領導下才廢除殖民地的奴隸制度——一個起不了作用的措施，而且來的太晚。1791年在法屬聖多明哥 (San Dominique, 即海地)，由杜桑·盧維度爾 (Toussaint L'Ouverture) 所領導的奴隸叛變是第一個在新美洲大陸成功的叛變行動，這也表示到那個時候才有了因農場經濟和拓居經濟而發生反殖民叛變的前例 (Blackburn 1988; James 1980)。無論如何，革命分子思考的通常不是去殖民，而是人權的推展，以便將殖民地同化成宗主國法國的公民，並依循法國的行政結構；只有少數人，如布里索或康多賽特 (Condorcet)，預見到帝國終究要切斷與殖民的連結。因為革命人士所熱中的就是推廣他們構想的人權，因此特別注重政治和文化同化的過程，成為後來幾代自由派和法國殖民主義普遍採行的模式。這種將法國文明推展到世界的想法，剛好配合了日益茁壯的浪漫派所強調的民族主義和民族文化，導致赫德 (Herder) 一類的作家將殖民地比喻為無機的累贅，終將挫傷國家的力量和純潔性。但是，這樣的觀念並沒有引發去殖民，反而更進一步企圖將殖民地兼併到法國本土的文化；同化的夢想亟欲將所有殖民地變成法國的一部分 (即使到現在，法國仍然主張他們在太平洋的核子試驗屬國內事務)，

譯註<sup>11</sup> 1773年英國以「管理法案」(Regulation Act) 控制印度的公司。在1784年英國議會更進一步通過「比特印度法案」，由議會任命一個「控制委員會」(Board of Control) 管轄東印度公司。

或者以一個更普遍的觀點來說，是開化的使命驅使殖民者將其認定的歐洲文化和宗教的優點，灌輸到世界上的其他地方。

在英法兩國，每個人都享有人權，這個普世人權的觀念加上漸漸出現的各民族和原住民都應有自決權的新概念，為革命的熱情奠定基礎，清楚預告殖民的解放運動，並且為之奠定基本原則；非但如此，許多當代後殖民理論批判過去壓迫的殖民意識形態和政權，並且肯定現在非歐洲民族享有政治和文化自決和自我再現的權利，這些關切點也都是源自這兩個觀念。後殖民關切人權的破壞，這一點可說是呼應了拉斯卡薩斯以來以人道和政治立場反對殖民主義的悠久傳統。這個傳統比較注重政治和文化改革，而不是經濟傳統中的反殖民議題。有人認為，這樣的立場有一個與生俱來的矛盾：因為人權觀念的發展源自啟蒙時期的歐洲理論，如此一來，人道政治傳統代表一種對源自歐洲價值觀的共同肯定。無論如何，非歐洲的反殖民主義者迅速地吸收全球、普世的人權觀，以此觀念為基礎，對抗殖民主義的政治和經濟實踐，以及後來在後殖民時期的濫權。現在的問題是，在今日生產人權論述的全球資本經濟體系中，人權論述具有什麼功用？

82

## 二、經濟立場的反對

馬克思很正確地指出，從一開始，殖民的主要動機就是經濟。但是，經濟學家後來漸漸開始爭論殖民行動的必要性：實際占領、管轄，並負保衛之責，這些是否必要；經濟學家反而開始主張自由貿易。雖然這完全是另一個觀點，但是它並沒有和以道德政治角度反對殖民的看法有衝突之處，而且有許多作者兼俱兩個觀點。革命時期英國的實用主義派特別反對殖民主義，不只是基於道德因素，他們更質疑殖民地的經濟利益。他們反殖民的論點比任何出現在英吉利海峽彼岸的法國大革命的主張更為激進。他們主要的論點是經濟，挑戰殖民地可獲利的推論，並攻擊重商主義系統下的保護主義，他們所持的反對論點同樣適用於一個世紀之後的帝國主義體系。以經濟反對最重要的理論根據是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1776），該書寫於美國獨立戰爭期間，書中很明顯地可以看出史密斯屬於以殖民者需求為出發點的英國自由派知識分子（Sainsbury 1987）。毫無疑問地，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他在《國富論》中有一章大篇幅將焦點放在殖民地，尤其集中在英屬北美洲。但是他以歐洲擴張的歷史做為開頭——建立新殖民地的動機，探討它進入全盛時期的原因，以及它為歐洲，尤其是英國所帶來的利益。史密斯認為殖民的興起不是因為歐洲政府的「智慧與政策」，而是因為這些政府的「混亂與不公」。但是政府還是由殖民地獲得利益，因為殖民地所帶來的貿易和市場的擴張增加歐洲工業的生產。就這一點，史密斯做了一個基本的區分，這個區分成為他理論的基礎：「我們必需很小心地區分

殖民地貿易的效益，以及壟斷此貿易的效益。前者永遠必然是有益的，而後者總是必定有害的」（Smith 1910, II: 104）。因此，史密斯並非反對殖民的行為，他反對的是母國企圖維持對殖民地的經濟和政治控制。史密斯是自由貿易者，他認為歐洲國家對其殖民地的壟斷關係反而使產量不再增加那麼多，而且沒有它應有的那麼豐富，因為其他國家和殖民地本身的工業會受到排擠。他認為壟斷的關係使投資在其他貿易分項的資本轉移到壟斷的項目，以致非壟斷的貿易項目萎縮；貿易表面上的增加不是真正的成長，而是因為一些項目被忽略，資本被轉移到他處的結果。本土的工業受到侷限、扭曲，而且脆弱地需要依賴他人。雖然殖民貿易利潤較多，但就是因為這樣，工業變得沒有什麼競爭力，還讓其他的可以在其他地方廉價出售——對於19世紀末之後英國的經濟，這是一個很精準的預測。簡言之，保護的重商政策扼殺了工業全面發展的潛力。

83

史密斯以同樣的論點批評奴隸經濟，他反對奴隸經濟不只是基於人道立場，同時也是基於經濟的無效率。農場的奴隸經濟是殖民地經濟體系的一部分，據此，殖民地受到舊有的「航海法」和護衛責任系統的保護。傳統上，大家一直認定奴隸制度在經濟上對帝國有益，就許多角度來看都是如此（17世紀時，甚至有人認為奴隸貿易的一個附加利益是，非洲人從熱帶被賣到溫和氣候區，他們就需要穿英國的羊毛）。到18世紀的時候，在西印度的奴隸農莊（slave estates）<sup>譯註12</sup>所榨取的財富的確非常驚人——著名的東方風格的歌德式小說（gothic novel）《凡特克》（Vathek, 1786）的作者貝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每一年從他的奴隸農莊所得的收入高達165,000英鎊。史密斯並沒有否認這一點，但是他把論點轉為：奴隸經濟絕非這個系統的必要部分，它之所以繼續存在只是因為糖和煙草的利潤實在太大了，所以他說，只要有糖和煙草農場「就可以支撐養奴隸（slave-cultivation）的費用」（Smith 1910, I: 345）。對於一般的殖民地，史密斯提出的主張把焦點放在當時和美洲殖民地衝突的主要根源，而且這一點也是激進派的反殖民者在往後的200年仍重複強調的：雖然和殖民地的壟斷關係可以製造財富，但是這樣的利益名過其實，因為需要付出保護殖民地的代價太大。如果無論在和平時期還是戰爭時期，軍隊和海軍的費用——史密斯觀察到近期的七年戰爭就像18世紀的大多數的戰事，「通通是殖民地的紛爭」（ibid.: 112）——都被認為是帝國必需獨力負擔，以保護它和殖民地貿易壟斷關係的利益，這樣看來，這些壟斷的經濟利益其實是虛幻的。當歐洲的每一個國家沈浸在與殖民地的貿易利益中，其實它們浸在其中的是保護殖民地的代價。史密斯做了結論：「因此，在現行的管理系統之下，英國一無所得，除了為了自治領而必需承擔的損失之外」（ibid.: 112）。亞當·史密斯的這個論點使他與其他激進派經濟學家如塔克屬同一陣線，因為塔克堅持殖民地無利可圖，因此極<sup>譯註12</sup>買入農奴，壓榨他們的勞力為私人擁有的農地賣命工作，稱為「奴隸農莊」。

力主張要和殖民地切斷關係 (Knorr 1944: 117-125; Semmell 1993: 59-62)。史密斯也跟隨這個結論，提出一個激進的解決之道：「英國應該主動放棄對其殖民地的所有權利」(Smith 1910, II: 112)。無論他認為這是多麼必要，史密斯自己也承認英國不太可能採行他的忠言。因此他提出另一個方法：以他對帝國所必需付出的代價的分析，亞當·史密斯主張殖民地必需為保衛他們自己以及殖民地的管轄負擔費用。但是，他也由當時的狀況看出來這也是很難實行。他注意到美國要求「沒有代表就不納稅」(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譯註<sup>13</sup>，因此建議英國與其殖民地成立一個「憲政聯盟」(constitutional union)，由一個聯邦議會來統理。這種去殖民的另類之路是聯邦形式的自由派帝國主義，這個想法發展到20世紀，成為一個重要的主張。

根據史密斯的看法：「發現美洲，以及一條經過好望角到達東印度的通路，這兩件事是人類有歷史紀錄以來最重要的兩件大事」(ibid.: 121)。他認為這兩件大事對以後革命性的全球經濟系統的影響非常巨大，而且無法估計。雖然就經濟觀點而言這是有利的，但是他認為：「對東印度和西印度……當地人民而言，所有原本可以因這兩件大事而得到的商業利益，反而因為這兩件事所帶來的可怕的厄運而被淹沒、消失無蹤」。他期待這些國家的本地人有朝一日能夠變得強壯，「而且世界上所有地方的人民都有均等的勇氣和力量，只有這樣才能藉著對彼此的畏懼來遏阻獨立國家的不公不義，讓它們能夠尊重彼此的權利」。史密斯認為這種「均等的力量」只有藉著由國際商業的帶來「知識的相互溝通」(ibid.: 122)。商業為非歐洲地區的人民帶來厄運，但也只有商業能夠恢復他們的完整(integrity)、平等和權力：就這一點，史密斯幾乎是馬克思殖民主張的先聲。但是亞當·史密斯熱切期望透過世界貿易發展資本和工業，是基於一種效率至上的自由市場經濟，這完全是非馬克思模式。殖民地是這個概念的扭曲和障礙，妨礙了資本的擴張和國際商業的發展。他強力主張排除殖民地和宗主國自由貿易的所有障礙，所以特別大力攻擊「東印度公司」的壟斷貿易權(順便一提，「東印度公司」事實上負擔了保衛自己的費用，而且以很大的代價負擔倫敦的「東印度辦事處」)。但是史密斯所考量的殖民地絕大多數都是拓居殖民地，他沒有針對印度以私人公司形式的治理殖民地的特殊地位做任何評論。史密斯為19世紀大部分反殖民的態度建立了實質的基礎，尤其是曼徹斯特學派和自由孤立主義者(isolationists)，如葛拉斯登(William Gladstone)。就商業來看，壟斷的系統毫無效率，代價昂貴，是整個殖民系統在腐敗的保護體系下的一個縮影。自由派在1846年成功地和殖民地建立自由貿易，殖民地本身在1859

譯註<sup>13</sup> 18世紀美國獨立戰爭時期，英國議會通過新關稅和納稅法，遭到殖民地強烈抗議。美國抗議他們被強迫徵稅，但在議會中卻沒有美國代表，因而提出「沒有代表就不納稅」的口號。

年就開始制訂關稅對抗英國貨品，壟斷系統到了19世紀末期，在帝國的羽翼之下以保護主義的形式重現江湖(Bell and Moreell 1928: 322)。毫無疑問地，史密斯會反對列寧的主張，認為帝國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而是一個退化的反轉，回到過時的、沒有效率的重商主義的原則(Porter 1968: 7)。因此，在長期以道德和人道立場反對殖民主義及其實踐上，史密斯又加上一個犀利的經濟觀點批判殖民系統，對殖民系統之所以存在的基礎大加撻伐。

史密斯是蘇格蘭人，在愛丁堡寫作，因此就難免會出現一個問題：史密斯反殖民的立場如何連結到蘇格蘭對英國的立場。史密斯出版《國富論》的時間是在「四五起義」('45 rebellion)之後的31年。史密斯本身比較傾向世界主義(cosmopolitan)而不是民族主義，因此沒有將蘇格蘭，甚至愛爾蘭放在他討論殖民地的篇章中。他只有在某個討論帝國聯邦的想法時隨口提到，如果美國殖民地如他所完全預料到的，在經濟上最後超越英國，那麼帝國的席位往西移動就是順理成章了。同樣地，因為蘇格蘭在議會中派有代表，英國和蘇格蘭之間的貿易沒有關稅，所以兩者之間的關係在經濟方面找不到反對的立足點，除了一個：亞當·史密斯對殖民主義的經濟嚴加批判，主要是不滿英國本身的既得利益(通常是貴族的利益)根本就是以保護為名，重施重商主義的系統根本毫無效益可言，把積極進取的資本家排除在外。這類的資本家就是後來以北美和南美的投資而建立大型企業機構的愛丁堡金融家。詹姆士·彌爾(James Mill)和霍布森後來也認為，殖民地的維繫只是為了少數特權的利益(正如彌爾所說：「是一個為上層階級而設置的，體制之外的龐大援助」)，而且大致而言，給國家帶來的只有麻煩。就這一點來看，亞當·史密斯所根據的基礎其實和被他批評為守舊而狹隘的英國大學派觀點非常類似：兩者的最終的判斷標準就是實用性(Young 1996: 205-214)。正如柯利(Colley)所說的，在史密斯寫作的當時，許多蘇格蘭人並沒有對抗英國，反而忙著想辦法進入軍隊和政府謀得一職，大有分享帝國利益的決心。他們的不滿倒不是蘇格蘭是帝國的一部分，而是他們所沾的利益不夠多(Colley 1992: 117-132)。大英帝國事實上也越來越依賴蘇格蘭和愛爾蘭的積極參與(Jeffery 1996)：在19世紀蘇格蘭的首府格拉斯哥(Glasgow)成為大英帝國第二大城市，不是沒有原因的。同樣的，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史密斯也有幾分休謨(David Hume)對「居住在泰晤士河岸的野人」的仇視，但是他沒有像休謨看到1768年的殖民地反叛起義的景象時，那麼幸災樂禍地說：「噢！我多麼想要看到美國和東印度最後起來全面叛亂，國民所得減少一半，銀行破產使民眾信譽掃地，第三個倫敦變成廢墟，而流氓般的烏合之眾被鎮壓」(Hume 1932: 2, 184)。

史密斯之後，不到20年發生法國大革命，邊沁(Jeremy Bentham)為反殖民主義增添了第三個以政治理由反對殖民占領，使反殖民論點有完整的架構，從此成了

86 帝國中心反殖民所運用的理論。邊沁在1793年出版一本特別而且激進的手冊〈解放你的殖民地！致法國國民大會〉（‘Emancipate your Colonies! Addressed to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of France,’ Bentham 1843），邊沁跟隨亞當·史密斯的觀點，堅持殖民地的利益充其量也是虛幻的，因為保護他們的費用龐大，它們所引發的國際衝突代價太大，如果沒有殖民壟斷，貿易將可獲得更多利潤。無論如何，他首度將經濟論點和權力、正義等論述結合起來，認為依照道理法國應該讓殖民地享受它們為自己爭取到的自由和平等的權力：

你們選擇你們的政府：為何別人不能選擇他們自己的政府？你們真的要統理世界，這就是你們所謂的**自由**嗎？那麼，人的權利會變成什麼樣？難道你們是唯一有權利的人嗎？天啊！我的同胞們，你們有兩套標準嗎？  
（Bentham 1843, IV: 408）

邊沁的手冊將「美國獨立宣言」變成殖民解放的信條：既然法國人自己已經接受普世人權的論述，他們再也無法一直扮演殖民宰制的代理人（agent）。潘恩（Paine）的《人的權利》（*Rights of Man*, 1791-1792）不只同樣地適用於女性，也適用於被殖民的社會。往後，平等、自由和人權、國家自決權等觀念，成為反殖民奮鬥的辯護和基礎。雖然法國人偏好理性，但是他們對邊沁冷靜不偏倚的邏輯並不太熱中。以上的引述中，邊沁最後提的「兩套標準」同時也預言了後來在19世紀帝國主義者越來越偏好採取這種兩套標準的防禦性策略，也就是以種族主義為基礎的論點：世界上的確有兩套時（或者更多）的人類標準，只有歐洲人才配得上被稱為完整的人類，才完全夠格享受自由和自治。邊沁比史密斯更進一步，明白表示應該將去殖民的概念延伸到印度。但是，即使是邊沁本身對人權的論述是否能夠成功轉移到印度，也抱著遲疑的態度。他問道，自由之樹種在印度能夠生長嗎：「人權宣言能夠轉譯成梵文嗎？婆羅門祭司、刹帝利武士及貴族、吠舍平民、普陀羅奴隸、清潔工<sup>譯註14</sup>能夠站在同樣的基礎嗎？」邊沁在1831年遇到偉大的印度改革者洛伊（Rammohan Roy），他的問題有了機會得到肯定的答案。即使從歐洲人的觀點來看，道德的立場是很清楚的——「放棄你的殖民地——因為你們沒有權利統治別人，因為他們不願被你們統治，因為你們統治違背了他們的利益」（Bentham 1843, IV: 417）——歐洲的人權論述可以推展到什麼程度，是否可以轉移到任何社會，邊沁在1793年的遲疑延續到彌爾，他對於印度是否適合自由，也主張採用著名的「兩套標準」。1859年印度「兵變」之後的兩年，彌爾針對英國在印度，以及法國在阿爾及利亞有如下的看法：

譯註14 Bramin、Chetree、Bice、Sooder、Hallachore：前四者為印度種姓制度，將社會分為四階層：祭司、武士及貴族、平民、奴隸。Hallachore是波斯用語，指清潔工。

87 文明國家因為彼此獨立且具有國家地位而擔負的神聖職責，不是承諾那些殖民地——它們成為國家或獨立只會帶來禍害，或者充其量也不見得會帶來真正好處。……無論怎樣對待野蠻人民都被視為是違反國家法律，這只顯現那些做如是觀的人從未思考這個議題。我們的行為當然是破壞了道德的偉大原則；但是野蠻人沒有權利組國家，可是他們可以被賦予一個權利：可以在最早適合他們的時機變成一個國家。（Mill 1984: 118）

雖然有這些巧妙的言論，普世人權的論述是一個不會消逝的資源。到了20世紀，這個概念越來越強力地運用在反殖民運動上。1948年的「人權共同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Rights）中，普世人權變成正式條文，到現在仍然是世界上少數族群抗爭的基礎（Shivji 1989; Wallerstein 1995）。

## 7.

## 19世紀自由主義

## 一、法國19世紀反殖民主義：阿爾及利亞和開化使命

在18世紀時，以人道立場反對殖民主義者發現他們結合了自由派以經濟價值觀而反對的立場：基於人道和經濟兩個理由，殖民主義及隨之而來的行為實踐是錯誤的，應該被譴責。在英國，這兩個立場幸運地——但卻是意外的——結合攜手走過19世紀的多數時刻，一直到1870年代末期，後來也為馬克思帶來潛在的問題。另一方面，在法國，這兩者很快就分離，主要是因為在拿破崙戰爭末期情況已經大為不同。到了1815年，法國實際上已經失去大部分的殖民地，也幾乎不再是一個殖民列強了（在某方面很類似1776年之後的英國）；新的殖民地，尤其是阿爾及利亞和北非，得以讓法國恢復國家自尊和消逝的軍事榮耀。在1830年，不得人心的法國國王查理十世為了要保住王位而侵略阿爾及利亞；他最後失去了王位，但是法國人「有限度的占據」就此展開，雖然阿爾及利亞直到1847年才正式併入法國的殖民地。這段時期提供了充裕的時間辯論下列的問題：侵略是否有其正當性，帝國運用的手段，尤其是法國畢吉歐將軍的討伐軍所用的手段，以及行政組織的設置。商業利益一直是法國實行侵略的主要驅力，但是這點不可明言，因此就必需創造些其他的原因。浪漫的理想主義者如拉馬丁（Lamartine）和雨果（Hugo）支持侵略，他們被國家的榮耀和異國風情所吸引；而反對王室的人為昔日自由、民主、平等的革命原則而奮鬥，但他們同樣熱切地為阿爾及利亞的殖民而辯護。這股熱情到1850年代發展成拿破崙三世的帝國主義，他在西非和中南半島開始進一步的帝國擴張。對理想主義者和主張共和的人而言，侵略其他的地方只能從身負「開化使命」中找到為自己辯護的理由，加上民族主義的觀念，認為法國進步的文化在知識、科技和繁榮都毫無疑問地居於優越地位，可以為「落後」的人口帶來好處。在菲利普（Louis Philippe）的「七月王朝」（July monarchy 1830-1848）<sup>譯註1</sup>，原本標榜將法國政治原則推廣到法國屬地的革命熱誠，轉變成開創19世紀偉大帝國的意識形態。由於法國人熱切期盼「從革命的危險回歸到埃及的奢華」（Marx 1973a: 149）——借用馬克思頗能讓人共鳴的形容，這個意識形態在拿破崙三世的時候付

<sup>譯註1</sup> 1830年七月革命之後，法國建立了一個以金融家Louis Philippe為首的大資產階級統治的「七月王朝」。

諸實踐。後來，法國的「開化使命」被所有歐洲列強拿來運用。這種「開化使命」的觀念到了英國傳道人士，很典型地變成職責所在，到最後演變成了白種人所擔負的受苦受難的殉教精神。這樣一個惡名昭彰，以開化使命為名的大計畫常常被嗤之以鼻，根本沒有仔細檢視這個開化使命到底到包含些什麼，或是為何有這樣的需要。自信自己的價值觀就是普世的價值，弔詭地要強加諸其他人身上，只因自己的價值觀尚未普世，這樣的信念其實是英國啟蒙時期所傳承下來的。所有的人類都應有平等的革命性理念，經過扭曲成為身負開化的使命，變成文化帝國主義的壓迫形式，這樣的帝國主義的實踐比較不像傳統殖民主義那麼接近帝國主義的本質（Ageron 1973; Leroy-Beaulieu 1874）。

但是首先，為什麼「開化使命」——這個歐洲人決心要披及全世界的文化革命——被創造出來？在法國，這是由浪漫派民族主義者和自由的共和派理想主義者所構思出來的另一個選擇——也就是一個文化的主張——以對抗自由派經濟學家和激進派的議員，如巴斯夏（Bastiat）和雷鮑德（Reybaud），他們反對以軍力征服北非。反諷的是，「開化使命」是根據啟蒙時期激進的平等主義觀點而創造出來，只為了必需提出一個新的、不同的理由為殖民主義辯護，藉以對抗自由派基於經濟和財政的原因反對殖民主義。這也就表示，法國在18世紀時，開化使命和自由貿易這兩派自由主義的原則是各自獨立的，而且相互抗衡。即使是馬克思本人的革命大計也可以算在此之列：不假思索認定自己的文化優越，不可避免地要負起取代所有文化的使命。與此相對抗的就是那些因為贊成自由貿易而反殖民的人，尤其是資本家。因此，去殖民可以被看成是經濟自由主義的勝利——這也同樣需要對新殖民主義的觀念做一個重新調整。在某些方面，19世紀的帝國主義可說是資本主義的偏離，甚至可以被看成是資產階級抗拒帝國主義的形式。在19世紀末期，英國從貿易和投資所獲得的利潤隨著帝國的擴張而減少。去殖民絕對不代表反資本主義，但釋放世界市場——一個今天仍在進行的過程——代表亞當·史密斯的主張得到歷史性的最後勝利。

## 二、19世紀英國的反殖民主義

19世紀時，英國的情況幾乎和法國相反。英國兩大自由派的傳統經過很長的時間才分道揚鑣。18世紀末的時候，歷經兩次殖民戰爭和失去美國殖民地之後，以教會和自由派的立場反殖民主義聲浪的確日漸高漲，但是小畢特（Pitt the Younger）<sup>譯註2</sup>在拿破崙戰爭期間，不放過任何增加英國的殖民屬地的機會（Bayly

<sup>譯註2</sup> William Pitt, the Younger (1759-1806)：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時的英國首相。在24歲時（1783）擔任首相，為英國史上擔任首相最年輕者。

1989)。但是，從1815年「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一直到1870年的普法戰爭（Franco-Prussian War），大英帝國的擴張是量的增加（Porter 1991）。從1815年之後，輿論越來越反對依照法國模式以兼併和占據外國領土來擴張殖民地——事實上，當時的確對殖民非常反感。在第三章我已經敘述過，在英國，「帝國主義」一詞在19世紀中期最先被當成濫權的意思，英國人高度懷疑法國帝國主義野心勃勃。大眾對狄斯瑞里<sup>譯註3</sup>在英國極力發展帝國主義的反應〔在1850年代，政治立場最先是保持緘默，但是在他的小說《康寧斯比》（*Coningsby*, 1844）和《坦可里德》（*Tancred*, 1847）中已見端倪〕，可由大家對下列一事的普遍反感顯示出來：在1876年他提議以法案賦予維多利亞女王「女皇」（Empress）的頭銜。女王本身也熱中如此「女王」兼「女皇」的稱號，但是後來卻遭到越來越多共和黨的反對。狄斯瑞里就把新頭銜加以限定，成為「印度女皇」。印度殖民地是狄斯瑞里本人的帝國野心——亞利安人（Aryan）大結合——的寄託所在（狄斯瑞里主張猶太人也是亞利安人）。

但是，英國對帝國主義的抗拒沒有堅持下去。英國在19世紀從反殖民的情緒轉變成帝國主義〔這樣的轉變很類似普利查德（Prichard）從自由派的反種族主義，搖身一變，成為贊成19世紀末英國文化主導的種族主義〕（Young 1995a），後來，列寧對這種奇怪的大逆轉也做了批判：

在英國自由競爭最興盛的時期，也就是1840到1860年，英國主要的資產階級政治家都反對殖民政策，他們認為解放殖民地，讓殖民地完全脫離英國是不可避免，而且是眾所期待的。……在1852年，比較偏帝國主義的政治家狄斯瑞里曾說過：「殖民地是掛在我們頸上的重擔」。但是，到了19世紀末，英國的英雄是羅德士和張伯倫，他們公開鼓吹帝國主義，而且以最犬儒或冷嘲的態度運用帝國主義政策！（Lenin 1968: 225）

列寧的觀察非常正確，早期許多政治家原則上（如果不是在實踐上）反對殖民主義。但是對帝國不信任的這一段往往被遺忘了。有一個很少見的非強迫性地從殖民地撤退的例子：當時以砲艦外交聞名，現在經常被稱為帝國主義者的帕麥斯頓（Palmerston），1863年時主動將愛奧尼亞群島（Ionian Islands）交還給希臘。正如上面所提過的，即使是狄斯瑞里最初的時候也是受到當時的反殖民風氣所影響，雖然在所有的政治家中，只有他在後來最熱中發展新的帝國模式：正如松頓所說的，

<sup>譯註3</sup> 狄斯瑞里 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英國作家、首相、保守黨領袖。主張殖民擴張政策，發動侵略阿富汗和南非，是葛拉斯登的死對頭。1876年建議以法案通過維多利亞女王為「印度女皇」（Empress of India），而維多利亞女王則回報以「1st Earl of Beaconsfield」的頭銜。

到1870年初，狄斯瑞里主張：「為英國國內太平的政治氛圍注入帝國意識形態的時機到了」(Thornton 1985: 19)。葛拉斯登是一個積極的反殖民主義和反帝國主義者，但是他也漸漸被迫接受英國在埃及、南非和阿富汗所採行的政策，他認為這是對國家的責任和職責。1884年自由派的《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對於英國勉強而為的帝國主義有如下的說法：「不是英國人習慣將眼睛往外搜尋，對征服和併吞一類的事業虎視眈眈。我們所做的征服行動都是被迫為之，不得不然」(Porter 1975: 111)。

列寧所批判的這樣情感的逆轉到底有什麼緣由？除了領導者本身政治的意識形態之外，評論家通常指向帝國之間日益加深的敵對狀態，以及其他各種不同因素，以解釋為何立場突然轉變。回顧起來，顯然有一些事件，包括1857年印度的「兵變」，1865年「莫蘭特灣叛亂」事件，以及1870年「普法戰爭」，這一連串事件激化英國人對帝國主義的熱情。也就是說到了1880年，最鏗鏘有力的自由派反殖民主義的聲音大致上已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對國際間帝國權力結構的焦慮感。但是，仍舊有一種奇怪的，在某些方面說來是比較有趣的運動，導致反殖民情感大逆轉。從史密斯以後，如馬克古樂克(McCulloch 1837)等人不斷鼓吹將重商的殖民結構自由化，走向自由貿易的體系。英國和美國，以及南美近期解放的國家日漸增加的貿易，似乎證明了曼徹斯特學派的論點，自由貿易的利益高於操控、壟斷殖民地市場(Schuyler 1945)。1846年「穀物法」(Corn Laws)譯註4的廢除代表了市場自由派的大勝利，同時也意味著殖民傾向的系統已近尾聲，而且保留殖民地的許多理論基礎也無以為繼了。到了1850年代，去殖民的觀念開始被熱烈地討論：1851年四月份的《愛丁堡評論》(Edinburg Review)有一篇文章：〈我們還要保留殖民地嗎？〉('Shall We Retain Our Colonies?')(羅素(Russell)的殖民秘書葛雷爵士(Lord Grey)以長篇回應之)(Adderley 1861, 1869; Grey 1853)。曼徹斯特學派的經濟學家柯布敦和布萊特，以及牛津大學歷史教授高得溫·史密斯，這些被稱為「小英格蘭人」(little Englanders)，主張廢除帝國，因為帝國這是一個沒有效用而且昂貴的負擔，根本無法以經濟觀點來為其辯護。1840年代到1860年代為了紐西蘭人對抗毛利人，以及在美國內戰時保護加拿大，這一類的殖民戰爭讓英國付出的經濟代價，使他們對殖民地不再狂熱。相較之下，新的主張出現，認為結束所有殖民保護貿易關稅，可以擴增英國的商業。1870年，柯布敦主張：「商業的自由就是我們進入世界市場的管道。我們放棄殖民地的商業壟斷，以可悲的特權換得和全世界貿易的特權」(Merle 1969: 36)。柯布敦鼓吹帝國的商業擴張政策，但也同時是個反殖民主義者。正如薇思瓦納珊(Viswanathan)對貝森(Annie Beasant)激進的反殖民主義所做的

譯註4 英國對外國商品採高關稅，以保護本國市場。「穀物法」將外國糧食排斥在國門之外，1846年自由市場派掌權，廢除「穀物法」，開放英國糧食市場。

評論：「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情感在實質上無法區分」(Viswanathan 1998: 207)。這個講法看起來似乎很弔詭，但是反殖民主義並非和後來所謂的經濟帝國主義不相容，也就是帝國主義的第二個意義——以經濟為著眼點，而不是直接的殖民宰制。的確，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為例，反殖民主義可以被積極地利用來鼓動經濟帝國主義。即使是在激烈的時期，英國還是追求帝國主義的貿易政策，正如馬克思指出，由英國在遠東的政策，尤其從1839至1842年的鴉片戰爭中看出，它發動戰事強迫中國開放給歐洲商業；正如美國在10年之後的1853年對日本一樣譯註5。換言之，殖民政策和促進並保護英國商業的政策之間有所區分(Semmel 1970)。或者用今天的術語來說，一種帝國主義被另一種取代了。

但是，無論柯布敦一派的激進分子有多麼偏向帝國主義，他們仍然反對殖民地。他們的論點從1830年代開始，漸漸地被韋克菲德的自由派思想所取代，韋克菲德一派後來在帝國時期居主導地位，在許多方面，也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產生影響(Semmel 1993: 31)。韋克菲德認為英國的剩餘資本代表它的獲利率逐漸減低；因此，資本必需投資到國外，產量擴增才可獲利，利潤減少所引起的社會不安也可因而避免。這就需要帝國的存在，並鼓吹殖民。當時領導的自由派，尤其是彌爾，接納韋克菲德的想法。因此自由派主張讓殖民地商業和政治自主，這個立場和鼓吹殖民未必不能相容。由韋克菲德和布勒(Buller)所領導的殖民改革派提倡依據系統性的原則和自治的基礎，把殖民當成「自由貿易的輔助」，以解決他所觀察到的剩餘資本和人口的問題，藉著「將人口和資本移植到我們殖民地一些遼闊而荒廢的地區，在那些地方開創市場……，持續以各種方式雇用國內日增的人口」，如此就可為英國商品開出一個新市場(Wakefield 1914: 471-472)。自由派的反殖民主義就這樣同時變成自由派殖民主義。

除了自由貿易主義的原則外，1830年代在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譯註6所發生的武裝起義也促成了自由派的解決方案具體實現在1839年的「德翰報告」(Durham Report)譯註7中，建議(兼首倡)將權力從英國轉交給殖民地，並建立其內部的「責任的」自治(Lucas 1912; Wrong 1926)。美洲殖民者支持拓居殖民地的自主，認為這是無法避免的，這是一例。在1865年，相對於19年之後的帝國侵占，「國會特別委員會」(Parliamentary Select Committee)建議，英國應該退出西非，除了

譯註5 1853年，美國海軍由Perry率領四艘「黑船」軍艦，無視警備艇命令，直入東京灣，要求日本開放貿易，史稱「黑船事件」。

譯註6 Upper Canada：上加拿大，1791至1840年英國在加拿大的舊省，現為安大略省南部。Lower Canada：下加拿大，魁北克(Quebec)的舊稱。

譯註7 1837年，上下加拿大發生武裝暴動，德翰爵士被派遣到加拿大調查此事件，1839年德翰爵士提交一份報告給英國國會，除了主張英法之間的衝突是因為種族，不是原則問題外，他還提出兩項建議，一是合併上下加拿大為單一國會，二是建立殖民地責任政府。

香港船  
領事館

獅子山之外。這一股自由的風潮甚至傳到愛爾蘭：1867年11月，馬克思寫道：「我一直認為愛爾蘭脫離英國是不可能的。現在，我認為那將是無可避免的，雖然脫離之後可能隨之而來的是『聯邦』（Marx 1974: 158）。馬克思有這樣樂觀的新想法主要是因為加拿大剛剛得到自治領的地位（也就是「內部自主」）。在帝國憲法上的發展上，英國為其他白人拓居殖民地的類似行動建立了可能性，甚至也擴及熱帶殖民地，如印度及英屬西非的某些部分（要求立憲的獨立運動因而活躍起來，甚至是在某些國家還沒有被併成殖民地之前）。有某些人明顯警覺到這股風潮，開始提出大英帝國如此作法實際上可能正在解構自己的觀點。在1870年，卡爾納馮伯爵（Earl of Carnarvon）在上議院挑戰政府的對外政策，他評論道：「海外相傳有一個政策開始要將大英帝國去手斷腳。……如果真有這樣的政策，看在上帝的份上，讓我們知道吧」（McIntyre 1977: 19）。寇伯納（Koebner）和史密特（Schmidt）對這段時期這樣評論：「無論他們把這樣的發展看成進步的象徵，或是抱持悲觀的態度，那時候多數有思想的人幾乎不懷疑大英帝國即將消失」（Koebner and Schmidt 1964: 83）。在這段時期，英國的領導階層事先的確設想到是否至少有這樣的可能性：放棄殖民地的形式上統治。從一個政治的觀點來看，對於那些漂泊離散、思想自由的英國人，最起碼也應該被賦予他們在自己國內所享受的自由。很多人認為，賦予這些殖民地自由事實上將有助於保護、擴大文化和商業的連結。

在1850年代和1860年代，許多人支持在去殖民後組成聯邦的想法（Kendle 1997）。例如在1859年時，史密斯·貝爾（Sydney Smith Bell）提及亞當·史密斯鼓吹英國應該放棄殖民地的主張，評論道：「有完善的理由和原則支持將這個主張推展到所有殖民地，尤其像英國這樣受歡迎的政府，像這樣享受自由的英國人民所設置的殖民地，讓這些殖民地遲早達到像母國一樣的獨立狀態」（Smith Bell 1859: 393）。把這個觀念合理推展下去就是：大英帝國的成員實質上將會發展成由獨立國家組成的聯邦體系，仍舊屬於整體帝國的系統，因此，就像貝爾所說的：「大英帝國將會……在全世界的四分之三的地方重新製造出來」（ibid.: 469）

正如皮爾（Peel）在當時所體認到的，加拿大的例子為去殖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憲法上的先例，這樣的例子後來一直被其他英國殖民地援用（Koebner and Schmidt 1964: 61）。白人拓居殖民地的殖民族主義，以及一般殖民地的反殖民族主義，兩者同樣重要的因素就是歐洲本身的民族主義的發展，以及1848年革命的反帝國民族主義，尤其是1859至1860年義大利的解放。同時，反殖民主張在此時占上風所帶來的效應，尤其是廢除帝國在形式上的經濟與政治的連結——在那時候帝國和各地形成相連結的結構，使各地在此結構下經濟相互依賴、商業互蒙其利，以維繫帝國的連結——以及隨後的挑戰到底需不需要帝國，這些所產生的效應就是發展出新的、比較不是物質取向的帝國概念，即使是帝國殖民地一個個變成政

治和經濟自主，也要結合起來：這就是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從這個角度觀察，帝國主義的最佳形容就是一個延伸的民族主義的形式（這就可以解釋為何一個國家在取得獨立國家的地位後，很容易就變成帝國主義）。弔詭的是，重新調整的帝國主義新概念所必需具備基礎就在1846年，由反帝國主義者葛拉斯登道出了。他當時重新定義英國及其殖民地的新關係時，以文化的共屬（communality），以及實質認屬關係的觀點來看，基於「過去共同的傳統，以及對未來的希望——由於相似的根源、法律和作風——以內在的特性將人和各社群的人結合在一起」（Bell and Morrell 1928: 345）。這些觀念在19世紀後來的兩個非常重要的文本中有完整發展（已經在第三章討論過）：1868年的《大英國》和1883年悉禮的《英國的擴張》，有助於新帝國的觀念形成，將帝國視為是具有國家自主權的白種英國人的兄弟聯邦。

如前所述，在「大英國」的規劃中，容納了一些非常不同的帝國概念。一方面認為大英國由以英語為語言的白種人組成的聯邦，當地民族仍然維持從屬的地位，但是如狄爾克巧妙地形容，「在家長式的專制下享有平等」。就狄爾克和羅德士而言，他們的觀念類似一個全球英語系統的男性結盟，包括美國以及（對羅德士而言）和德國。另一方面則有些人將「大英國」提升為一個比較平等的帝國概念，基於共同的文化而組成一個由自由國家形成的帝國，各國之間沒有種族或其他分野（這個觀念在不同的時候曾被拿來大肆宣揚，其中包括維多利亞女王、塞司伯利（Sailsbury）、克若摩（Cromer）、寇松（Curzon）、張伯倫和米爾納（Milner）等人）。但是，即使是第二個模式也有所限制，認定某些特定的民族不適合自治（self-rule）（Mill 1984: 118-20）。有些人，例如盧卡斯，誇張到明白斷言「德翰報告」的原則不適用於「整個大英帝國，或是有色人種，或是非英國的白種人」（Lucas 1912, I: 315）。其他像佛勞德等人說的更白：「澳洲人、加拿大人、紐西蘭人都不會對在西非推廣自治表示熱心，當他們知道這代表要滅絕和他們同屬白種人、拓居在那裡的弟兄們」（Froude 1909: 325）。即使在自由派眼中，反殖民主義焦點主要一直放在白人的拓居殖民地，因此是一種具有選擇性的反殖民。雖然讓所有的帝國成員享有自主性的自治慢慢被視為一個理論上的目標，但是一般所構思的未來是大英帝國的所有屬民的社會和政治文化都變成英國化。無論如何，帝國聯邦的模式確根據已經制定的憲法系統，讓第一個要求自治權（home-rule）的印度及其他地方得以發展。

大多數殖民地人民的反殖民運動在開始的時候所要求的是自治，而不是獨立，這一點可由某些團體的名稱看出，如激進派女性主義者貝森所組的「印度自治權聯盟」（Indian Home Rule League）。在帝國敵對的狀態中，19世紀末的併吞或設置保護領都是因為越來越害怕別人先馳得點，例如紐西蘭人和澳洲人極力呼籲英國併吞巴布亞紐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波里尼西亞群島、密克羅尼西亞



(Micronesia) 和美拉尼西亞 (Melanesia)，否則德國人、法國人或美國人就會採取行動 (Hudon 1971; McIntyre 1977: 147)。在這樣的情況下，殖民地的民族主義不一定要尋求脫離帝國完全獨立，這只會讓它們更容易讓其他帝國併吞。例如大英帝國的殖民地所要的就是自治權，而法國的殖民地所希望的是根據憲法的同化，藉此獲得憲法賦予的政治權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 (有些例子甚至在之後)，愛爾蘭、印度、西非和南非民族主義運動的立即目標是依據加拿大模式，變成大英帝國的聯邦之一，成為享有自治權的自治領。英國的帝國理論家就預測，整個大英帝國將會依據這種模式，由一個在倫敦或帝國的其他任何地方的聯邦議會來操作。主張自治權的行動派同時也可能對帝國抱持熱中支持的態度——就像甘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或者像 19 世紀愛爾蘭的巴特 (Isac Butt)。在 1898 年的波爾戰爭<sup>譯註 8</sup>之前，在自治領的人偏向支持帝國主義，多過於在英國本地的偏帝國主義者。波爾戰爭成為第一個因帝國主義的實踐而引發的國際對立，主要是因為英國所出兵牽制的殖民者是白人，而且政治上已經是獨立。帝國主義的兩個政策——民主和專制——之間的矛盾因此痛苦地顯現出來 (Porter 1968: 123-37)；最典型地將此矛盾具體呈現公眾眼前的就是麥克布萊德 (John MacBride) 上校組成著名的「愛爾蘭軍團」為荷蘭的後裔波爾人而戰。站在另一方的則包括甘地 (Mahatma Gandhi)，和「非洲民族會議」(ANC)<sup>譯註 9</sup> 後來的領導人之一，普拉切 (Sol T. Plaatje)。在《麥富京日記》(Mafeking Diary) 接近尾聲的時候，也就是波爾人要投降時刻，普拉切在日記上寫道：「戰爭所帶來的將是更深的痛苦——無論結局是什麼」(Plaatje 1990: 122)。就意識形態的層面來看，英國的帝國主義思想自此不會回到昔日的盛況。「這是結束的開始」，愛爾蘭的社會學家康納利在 1899 年的時候很準確地觀察到了。

### 三、印度

19 世紀英國的殖民政策把重點放在愛爾蘭、印度和加拿大。英國政府一方面鼓勵白人的拓居殖民地，如加拿大 (或者說，屬於現在的加拿大的個別地區)、南非、澳洲和紐西蘭，發展自治政府，並在經濟和軍事方面依賴自己；但是對於有關印度和非洲的解放主張卻又不表支持。彌爾對此所抱持的態度是懷疑，而即使是高德溫·史密斯針對殖民主義加以撻伐時，也排除對印度殖民的責難 (Smith 1863:

<sup>譯註 8</sup> 1899 到 1902 年盎格魯薩克森的英國人和拓居於南非，屬荷蘭血統的波爾人之間，為爭奪新發現的金礦而發動的戰爭，一開始英軍敗，後來貝登堡上校率兵占領麥富京，牽制波爾軍，最後英軍勝利。

<sup>譯註 9</sup>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南非共和國黑人解放組織，1912 年成立，1990 年合法化。

292)。大多數英國反殖民者大多時候是跟隨著柏克的想法，把印度的目標限定在改革。正如馬克思精確地指出，即使是布萊特<sup>譯註 10</sup>對印度的提案也只是典型的改革法案。布萊特和費賽特一樣，是自由派在 1866 年成立的施壓團體——「東印度協會」(East India Association)——中的行動派；該協會在英國和印度均設有分會。只有一小部分的激進分子，如柯布敦或者「憲章運動派」(Chartist)<sup>譯註 11</sup> 領導人瓊斯 (Ernest Jones) 對印度「兵變」的反應和馬克思一樣，嚴詞批判英國在印度的統治 (Jones 1857; Marx 19731; Sturgis 1969)。1857 年柯布敦很驚訝地發現，「有些最近從印度回國的女士們」，他寫道：「她們經常用來描述我們在印度的屬民同胞的稱呼是帶有歧視的「黑鬼子」(nigger)。柯布敦對印度「兵變」的反應就是宣稱：

印度人必需由那些住在該地的人來治理。印度人民寧可被治理的很糟糕——根據我們自己的想法來認定的——，寧可被一些有相同膚色，有親朋關係的人來統治，也不願意屈辱地服從比較善於統治的入侵者，這些人都只是被對立的一方派來治理一段時間。……一個民族不可能永遠被利用，被明顯、有意地貶低。我們對印度統治的整個規劃是根據一個假設，認定印度人甘心成為屈辱他們自己的工具。(Morley 1893: 671-673)

柯布敦的主張起不了什麼作用，雖然改革派倒是成功地引進限定形式下的地方政府代表。1865 年柯布敦死後，社會主義者海德曼 (H. M. Hyndman) 繼續批判英國在印度的統治 (Hyndman 1907)。印度以行動對抗英國統治一直以不同的形式持續到 1857 年，但是在 1880 年代，時值英國帝國主義的全盛時期，印度民族主義的焦點就變成以聯邦主義解決政治問題的新可能性，願意以透過憲法的方式取得自治權。這在英國得到很大的支持：1889 年，也就是「印度國大黨」(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之後的四年，一群同情印度的人，加上魏德本 (Sir William Wedderburn) 等曾經參與設立「國大黨」的人士，聯合組成「印度國大黨」中的「英國委員會」(British Committee)。該委員會在 1920 年解散，也就是「阿姆利則<sup>譯註 12</sup>大屠殺」之後；此時，對於印度的民族主義運動，甘地決定跟隨「新芬黨」<sup>譯註 13</sup> 的前例，

<sup>譯註 10</sup> John Bright (1811-1889)：英國政治家。激進派領導人之一。在 1867 年提出改革法案 (Reform Act)。

<sup>譯註 11</sup> Chartism：1838 至 1848 年的「憲章運動」，主張政治、社會的改革，包括改革教育、工人階級的生活、男性參政權、投票權等。這是英國工人階級爭取改革議會的運動，以倫敦激進派洛維特 (William Lovett) 1838 年 5 月起草的《人民憲章》(People's Charter) 得名。這也是英國第一次全國性的工人階級運動。

<sup>譯註 12</sup> Amritsar：位於印度北部城市，現今旁遮普省的首府。1919 年英殖民政府頒布「羅拉特法案」(Rowlatt Acts)，延長行使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鎮壓顛覆活動的緊急權力。4 月 13 日大批群眾聚集在阿姆利則抗議這個法案，英軍則對群眾開槍，結果死 379 人，傷 1200 人。隔年，甘地即發動全國性的「真理力量」(satyagraha)。

不假外力，獨自奮鬥。1900年之後，「國大黨」多半偏重好戰的策略，「英國委員會」能維持這麼久，也實在令人驚訝。該委員會解散後，英國主張印度獨立的呼籲由「反帝國主義聯盟」(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的共產黨員取而代之，尤其是一位出色的「印度勞工黨」(Indian Labour)左翼的國會議員，沙拉瓦拉(Shapurji Saklatvala)譯註<sup>14</sup>。雖然英國提供了一些——通常是有區分性的——憲法上的改革和代表制，但是印度的獨立只能透過印度的政治行動主義和抗爭。印度反殖民策略的某些特殊形式，例如非暴力抗爭，有部分原因是憲法上已訂定殖民地的自治權而受到限制，不能發揮。

#### 四、愛爾蘭

就英國政府而言，19世紀下半葉去殖民的議題中最重要者當然就是愛爾蘭。1840年代和1860年代天主教徒所發起的「青年愛爾蘭運動」(Young Ireland Movement)和「費里安運動」(Fenian Movement)譯註<sup>15</sup>，還有飢荒和飢荒所帶來的後果，加上巴特的「自治政府協會」(Home Government Association)[後來變成1873年的「自治權運動」(Home Rule movement)]、土地之爭、1870年代晚期的農業危機、1880年代「常勝軍」(Invincibles)組織和它的同夥所策動的恐怖主義譯註<sup>16</sup>，再加上1880年代帕奈爾(Parnell)成功地運用策略將民族主義「自治黨」(Home Rule party)引入英國議會譯註<sup>17</sup>，這一切足以顯示，愛爾蘭的政治從來就不會離開英國政治的核心(帕奈爾的議會策略甚至成為現代英國政黨的組成奠下基礎)。解決加拿大，甚至印度，可以採用聯邦的方式，但是愛爾蘭的自治權一直被英國的上層階級視為是對英國完整性的一個威脅——即使是高得溫·史密斯也反對，而盧卡斯認為，如果德翰爵士的報告寫的是愛爾蘭而不是加拿大的話，他將「不會建議讓愛爾蘭實施自治，他會辯稱，愛爾蘭已經有自治的政府了」(Lucas 1912, I: 324; Kendle 1989)。弔詭的是，愛爾蘭的自治被視為某種會動搖大英帝國統一的因素，威脅大英國的中心地位，勢必引發大英帝國的英國人到底是誰的問題(超過一個世

譯註<sup>13</sup> Sinn Fein：新芬黨以愛爾蘭完全獨立和文化復興為目標，於1905年成立。

譯註<sup>14</sup> Shapurji Saklatvala (1874-1936)：第三個成為英國國會議員的印度人，同時也是第二個成為議員的共產黨員。1907年加入H. M. Hyndman的「社會民主聯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兩年後離開，加入「獨立勞工黨」(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譯註<sup>15</sup> 1857年在美國成立的愛爾蘭革命共和組織，致力於愛爾蘭獨立。

譯註<sup>16</sup> 1801年，Lord Cavendish在都柏林被一個稱為「常勝軍」的組織暗殺，掀起愛爾蘭要求成立共和國的政治運動。

譯註<sup>17</sup> Charles Stewart Parnell (1846-1891)：1870年，巴特創立新運動，要求為愛爾來頒布自治法案。1877年帕奈爾順利成為「自治黨」代表人物。到1880年代，帕奈爾以「愛爾蘭議會黨」爭取將愛爾蘭的自治帶入英國政治中心。

紀之後，在英國政府將權利下放的「地方分權」(devolution)時期來臨之後，這類問題充分浮上檯面)。這些爭論其實對愛爾蘭本身毫無意義，他們只是單純地希望結束英國的宰制，尤其是英國地主的宰制。這些爭論對大布列顛的一般人民也沒有什麼意義。由於愛爾蘭人民的移入，英國和愛爾蘭的激進運動一直緊密結合；到19世紀末期，透過在孟加拉的愛爾蘭主戰派的活躍分子尼維德塔(Nivedita)修女的努力，愛爾蘭人、印度人和波爾人的民族主義者之間也彼此有聯繫(Jayawaaardena 1986: 94)。正如佛斯特(Foster)所觀察，廢除1800年和愛爾蘭的「合併法案」(Act of Union)譯註<sup>18</sup>是1840年代憲章派所計畫的目標(Foster 1988: 365)。這在英國國內一直持續，是激進民粹派的悠久傳統：從1641年愛爾蘭叛亂被克倫威爾(Cromwell)鎮壓之後，這種對抗的勢力在17世紀中期就列入平權派(Levellers)所追求的事項(Aylmer 1975; Braisford 1961)。

1866年，葛拉斯登成為首相，英國有了第一位公開反殖民的領導者，他堅定地認為自己的特殊使命就是解決愛爾蘭問題。他廢除「愛爾蘭聖公會」(Church of Ireland) (1869)，通過兩個「愛爾蘭土地法案」(Irish Land Acts) (1870, 1881)，但是「自治權法案」(Home Rule Bill)兩度遭到挫敗[他一直被上議院非經選舉的「保守黨」(Tory)打敗]，在此過程中，他的黨還因此分裂(Lubenow 1988)。1893年「自治權法案」第二度挫敗之後，葛理飛(Arthur Griffith)建立「新芬黨」。1911年「自由黨」(Liberals)終於戰勝保守黨操控上議院的否決權，第二年就開始引入愛爾蘭和蘇格蘭的「地方自治法案」，到了1914年得到王室的同意。然而，新教徒的「北愛爾蘭統一黨」(Ulster Unionists)譯註<sup>19</sup>的暴力反應震驚了政府，後來又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宣戰，「自治權法案」就被廢棄了。和印度的情況一樣，自由派為愛爾蘭爭取有限度的自治行動最後一無所獲；只有愛爾蘭人自己以行動抗爭才能爭取獨立。1916年的「復活節起義」時，皮爾斯(Pearce)在都柏林的郵局階梯上宣布成立「愛爾蘭共和國」臨時政府，隨後多名領導人被處決，這些事件強化了整個愛爾蘭必需完全獨立的訴求。在隨後幾年相互使用暴力的行動中，英國行政癱瘓，很像英國在1947年之前對印度的後果一樣：兩個殖民地到最後都變成無法管治。1920年的「愛爾蘭政府法案」(Government of Ireland Act)中，愛爾蘭分成北愛爾蘭(Ulster)和南愛爾蘭(South Ireland)，一些人準備接受分裂的愛爾蘭自治領地位，另外一些人拒絕背叛1916年起義時的理想，因此兩派人掀起內戰。1922年，愛爾蘭沒能得到完全的獨立，但變成了愛爾蘭「自由邦」，也就是大

譯註<sup>18</sup> 英國王室在1782年准許愛爾蘭成立議會機構，但在1801年英國頒布「國家統一法」，將愛爾蘭政府所有事務完全置於英國掌控之下。

譯註<sup>19</sup> 由三個新教徒(Protestant)後裔的政治團體所組成的聯合黨，反對北愛爾蘭獨立，主張留在英國的聯合王國內。

英帝國中一個自治領。1948年，「自由邦」變成「共和國」，但是暴力衝突仍舊持續：愛爾蘭的分裂是英國新教派殖民主義三百年來持續的議題。因此，英國聯邦主義無法持續一貫地實行，有些地方如加拿大的幾個省、澳洲和紐西蘭，英國給予獨立，但是像印度這些地方就必需經過爭論的過程，然後訴諸不合作的暴力手段來達到目的。愛爾蘭在憲法上一直是英國的一部分，因此就必需透過憲法的方式尋求獨立。但是到最後，愛爾蘭人還是得為獨立而戰。就英國而言（一些重要但有限的例子）顯示，帝國政府未曾以一致的方式處理獨立運動——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反殖民運動也從來不曾有統一一致的步調。

1905年「自由黨」從「統一黨」手中接掌政府，也就是1886年「愛爾蘭自治權法案」的紛爭，葛拉斯登的黨分裂而導致政治成為荒野之後的20年，「自由黨」放棄他們早年激烈的反殖民政策，轉而變成偏向以帝國之下的一個黨自居，但是就如哈文登（Havinden）和梅里德斯（Meredith）所觀察的，甚至在那時候還是有「相當多的政治分裂和不穩定」：「所有主流的政黨都是堅定派的帝國主義者，但是這些帝國主義者找不到任何一個政黨確定會永遠堅定不移地支持他們」（Havinden and Meredith 1993: 21; Porter 1975: 202）。「自由黨」放棄反殖民之前，反對殖民主義早就被如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社會主義聯盟」（Socialist League）以及1893年之後哈迪（Keir Hardie）的新「勞工黨」（Labour Party）（雖然有一部分是受到家長式的「費邊社」所影響，但是在麥丹諾（Ramsay MacDonald）領導下的第一個勞工黨政府幾乎沒有把這些原則付諸實踐）等社會主義者接手（Halévy 1951: Howe 1993）。與英國帝國主義對立的原則仍舊持續，但是對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本質直接的政治分析減少了。隨著「自由黨」的變節，舊有的反帝國主義論點被擊敗。帝國主義的批評需要一個激進的新基礎。

## 五、霍布森的《帝國主義研究》

新基礎的發展為「新激進派」（New Radicals）奠定了社會哲學的基石。這個「新激進派」由霍布森所領導，他是一個大學推廣部的講師，其思想以史密斯和柯布敦的自由傳統為基礎〔後來凱因斯（J. M. Keynes）變成他的門徒〕。霍布森是第一個以涵蓋面廣泛的道德標準批判帝國主義，其基礎就是反對帝國主義以文明做為準則，自認西方文化普遍優於其他文化；霍布森主張文明應該是「多重形式」（Porter 1968: 181）。但是霍布森主要的焦點是經濟，在1902年他將自己始從1890年代發展而來的思想結集出版：《帝國主義研究》（*Imperialism: A Study*）（Hobson 1938）。這是第一個以理論性的分析研究帝國主義經濟、政治和體制的實踐，他認為帝國的所做所為基本上是非理性的。就波爾戰爭仇恨爭端來說，霍布森以無與倫

比的批判，就經濟和道德的角度指責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被「勞工黨」任意利用在他們反戰的活動中（Porter 1968: 123-137）。霍布森的焦點放在19世紀末由權力競爭而敵對的「新帝國主義」時期。他將1870年以後帝國擴張的大筆花費，以及從那時候開始在掠取的領土上所從事的、相對少量的貿易額，兩者做了一個詳細的分析比較。霍布森一筆將帝國主義者「貿易隨著國旗而至」的論點推翻。他同時也強力主張，開化的使命只不過是一個藉口：「我們的擴張幾乎只想要獲得一些熱帶和亞熱帶國家的領土，對於居住在該地的人民根本沒有真正要讓他們自治的意圖」（Hobson 1938: 37）。但是，霍布森證明帝國主義龐大的經濟負擔時，並不只是在鼓吹另一個更有效的選擇——自由貿易，他還重新引用史密斯的觀察——整體看來無利可得的事情，對特權的菁英可能是利潤可觀。霍布森認為就戰爭、軍備、軍事和裝配器材來考量，以絕對的角度看，這些都是不經濟而且不理性，但是戰爭的代價讓一小撮工業主義者從中牟利，為他們提供了很大的利益：這就是他所謂的「帝國主義的主要根源」：「從整個國家的觀點看是不理性的，但是從國內某些階級的角度來看，是非常合理的」（*ibid.*: 47）。而且，除了一小撮人從軍事花費中取得重大利益，單純的一般性資本的投資越來越大：帝國主義的操作變成是以大眾來擔保私人在國外的財務投資。因此，霍布森的結論：

帝國主義的經濟根源就是追求強大而有組織的工業和經濟利益，以大眾的代價和力量，為過剩的商品和過剩的資本求取、發展私人的市場。戰爭、軍事主義和「勇猛有勁的外交政策」只是這個目的的必要手段。（*ibid.*: 106）

同時，帝國主義在國內所造成的影響就是降低和限制民主的程度，而且，正如霍布森所指出的，社會的改革也遭到阻撓。

霍布森的重點不是貿易，而是資本投資的意義，同時也討論合併銀行和信託公司的財務資本的意義，這些觀點後來被運用到20世紀初期一系列相當有分量的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加以發展，尤其是希佛（Hilferding）的《金融資本》（*Finance Capital*, 1910）（Hilferding 1981）和布哈林（Burkharin）的《帝國主義和世界經濟》（*Imperialism and World Economy*, 1918）（Burkharin 1972）。霍布森的書也被列寧廣泛地引用在他1917年著名的針砭帝國主義的小書冊中。霍布森之後，因為國際社會主義者的著作，到20世紀才漸漸發展出有的理論性批判，針砭整個殖民系統。霍布森證明殖民主義的經濟面效果不彰，指出少數他所謂的「帝國主義的經濟寄生蟲」〔正如評論家所指出的，由此可看出霍布森是反猶分子（anti-Semite）〕資本家的利潤所帶來的是什麼好處，而且還針對開化的使命、種族、文化優越感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等說法，以及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提出道德批判，揭露帝國體系的基礎只

不過是一個犬儒式的「工於算計、貪婪的馬基維利主義 (Machiavellianism) 型態，所謂的『真正的政治』，只不過「重新塑造了整個外交的藝術，毫無憐憫、毫不顧忌地把國家的擴張當成外交政策的一股有意識的發動力」(Hobson 1938: 61, 13; Semmell 1993: 110-121)。

100 霍布森對帝國主義的批判很快地加上馬克思主義分析，發展成世界革命的國家政策。但是，就在三年之內，一個新的因素進入全球的舞台：1905年的日俄戰爭。雖然在此之前，日本已經是一個新的帝國列強，發展迅速，但是它打敗了俄軍，這是第一個非西方的外力成功地擊敗歐洲的帝國主義，亞洲的民族主義的領導都瞭解到其中所隱含的意義。正如阿布代·馬立克 (Abdel-Malek) 所指出的，一個侵略的東方國家戰勝一個被視為歐洲的國家，因而「全世界的民族運動走向一種明顯可見的激進路線。1905年成為所有民族運動思想發展中一個關鍵性的日期，沒有任何例外」(Abdel-Malek 1981: 82; Jayawardena 1986; Spector 1962)。俄國在1905年被日本打敗後，隨後發生了國內的革命，這在國際上的意義幾乎是同等重大。如季諾維也夫 (Zinoviev) 在1923年所說：「1905年的革命沒有成功，但是它卻喚醒了亞洲的民族，而新的自由風甚至吹向了歐洲」(Riddell 1986a: 43)。1905年的俄國革命凸顯了民族主義的問題，很快地各地的叛變揭竿而起，包括伊朗 (1906)、土耳其 (1908) 和中國 (1912)。根據列寧的觀察：「俄國的1905年革命運動之後，民主革命散播到整個亞洲——到土耳其、波斯、中國；英屬印度的騷動日增。更重大的發展就是革命的民主運動散播到荷屬東印度、爪哇和其他荷屬的殖民地」(Lenin 1962: 59)。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它所造成的後果就是，民族主義運動風起雲湧遍及全球。

從1880年代以後，殖民地本身以知識和政治對抗殖民主義日漸增強，被殖民者從此站到反殖民情感的前鋒，其效果比歐洲反殖民的行動派所能做的多得太多。有一部分是因為這就是殖民統治的影響所帶來的：資本主義在殖民地的貿易和工業的關係造成的斷裂 (disruption)，促成資產階級的誕生，他們所運用的知識來自殖民統治所引入的新教育體制、識字能力的推廣和報紙的增加，其目的是對抗封建，也同樣對抗帝國的統治者。第一個策略就是採行自由派或「第二國際」的社會改革主義的方式，開始憲法改革運動，期能依照加拿大和愛爾蘭模式得到自治的地位。正如上面我們所談過的，印度和愛爾蘭運動開始時是民族主義的組織，其運作大致上是要求或抗拒，聯邦形式的解決之道，也就是依照大英帝國中白人拓居殖民地自治領的模式，享有自治的形式但仍屬於聯邦。這也是「南非國民大會」(South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和「英屬西非國民大會」(National Congress of British West Africa) 最早成立的政治背景脈絡 (在有些地方一直持續到1920年代和1930年代；可參閱 De Graft-Johnson)。在帝國之內實行自治仍舊是許多殖民地期待的目

標。但是，到了1917年，反殖民主義很快地走到一個新的方向。在1890年，狄爾克可以自信地寫道：「在殖民地中，幾乎沒有，或者說完全沒有歐洲那種革命的社會主義」(Dilke 1890: 526)。不久之後，反殖民主義行動派開始運用第三種，也是最強力的反抗路線對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讓它在歐洲出現，並且創造一股重大的刺激，超越了歐洲的界線：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隨著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 (Bolshevik Revolution) 和1919年列寧成立「共產國際」(Comintern)，加上1929年的「反帝國主義聯盟」，共產主義一躍而成爲20世紀反帝國主義的基本政治。

## 8.

## 馬克思論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

## 一、馬克思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

馬克思本人是1840年代自由派反殖民氛圍下的產物。縱觀他本身的歷史脈絡，他並沒有針對「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本身做分析——其實是他的著作引發後來的論述將他的作品當成是針對各種的壓迫所做的批判性分析。馬克思使用「殖民」和「殖民地」時，把它們當成是拓居殖民地的意思（「我們要面對的是真正的殖民地，也就是自由移民，遷入處女地的殖民」）；他唯一持續地對殖民做分析是針對韋克菲德的《殖民藝術的一個觀點》（*A View of the Art of Colonization*, 1849）中，在澳洲和紐西蘭所實踐的一個理論，但正如馬克思自己所說，他之所以對此最感興趣，是因為韋克菲德「所發現的不是什麼關於殖民地的新發現，而是存在於殖民地中的現象，也就是宗主國的資本主義關係的真相」（Marx 1976-1981, I: 931-932）。韋克菲德當時提議殖民的帝國政府應該保留在殖民地的土地，然後以高於市場價值的價錢賣掉，不但可因此創造多餘的薪資勞力，還可進一步支付移出人口的運送費用。如馬克思所觀察，「土地財產在殖民地被人為操作得比較昂貴，為的是要把工人轉變成薪資勞工，讓資本有資本的作用，好讓新殖民地變成具有生產力；其目的是在殖民地上發展財富，而不是像美洲一樣，只是把它當成暫時解決薪資勞工之處」（Marx 1973b: 278）。因此，韋克菲德的殖民規劃證明了馬克思理論最主要的洞見——資本的創造基礎就是薪資勞工。但是，正如馬克思所體認到的，如果說這個人為的操作揭露資本主義關係的基礎，它卻並沒有因此有任何揭發殖民真相的洞見。反而是殖民主義本身揭露了資本主義的真面目：

資產階級文明中深刻的虛偽和固有的野蠻被掀開來，攤在我們眼前，在國內他們用比較體面的方式，現在他們在殖民地就赤裸現身。（Marx 1973a: 324）

因此，馬克思討論殖民擴張時，只針對它在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中所占的角色，或者在大英帝國的某些特定狀況，馬克思大部分把重點放在愛爾蘭、印度和中國，對當時這幾個地方所發生的事件有充分的評論。他也寫了一些有關緬甸、埃及、突尼

西亞和波斯的評論 (Marx and Engels 1968)。他的著作中有一種豐富的張力，呈現理論和歷史的特殊性，成為後來的分析，尤其是後殖民分析的主要模式。同時，馬克思有關殖民主義的著作，尤其是談到印度，素有爭議性很高的惡名。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和大家所期待的相反，後殖民理論和批評很少直接引用馬克思本人——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更何況，馬克思並不像列寧、毛澤東或法農等人以不同的方式特別為殖民革命提供解放的方針。

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寫《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時，主張在全球經濟發展資本主義的過程中，最廣義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扮演一個重要而直接的角色，因此他們號召全世界的工人——不只是歐洲的工人——起來反抗。他們在陳述資產階級的新商業體系發展時，特別強調殖民的擴張是重要的因素：

發現美洲大陸以及繞行好望角為興起的資產階級打開新的基地。東印度和中國的市場、對美洲的殖民、殖民地的貿易，以及交換方式和商品的普遍增加，這一切為商業、航海和工業帶來一種前所未有的刺激，也因此為搖搖欲墜的封建社會帶來快速的發展。現代工業建立了世界市場，美洲大陸的發現為世界市場鋪路。這個世界市場為商業、航海、和陸地溝通帶來無限的發展。(Marx and Engels 1952: 42-3)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全球性的擴張同時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因和果。歐洲所致力的全球性擴張是新經濟體系的動力中必要的一環，甚至可說是它的引擎：殖民擴張透過市場的增加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關鍵，而這也成了反對舊封建結構的一股革命性的力量。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殖民貿易的操作被當成帝國國內資本主義的一般狀況，也就是同樣需要市場、原料和投資，但事實是殖民的擴張才使得資產階級累積足夠的資本，全球性地改革整個經濟和社會體系——這個觀察後來被發展成世界體系理論 (Wallerstein 1974-1989)。最引人注目的是這一點被描述成一個重大劇變的運動，一個遍及世界的斷裂性的動亂，舊有的封建關係因此煙飛灰滅，傳統靜止的社會也因而進入轉變的過程：

資產階級無法存在，如果沒有持續不斷改革生產工具，進而改革生產的關係，然後以此改革社會的整個關係。……持續地改革生產，不間斷地干擾所有的社會狀況，永遠的不確定和變動就是資產階級時代和以前的時代不同的地方。所有固定的、凝結的關係，以及一連串古老悠久的偏見和意見，通通被一掃而光。所有新形成的一切在它們變成僵化保守之前就已經過時了。……不斷需要為產品擴張市場的需求，追逐著資產階級，遍及全球。這樣的需求必需在到處棲息，到處安頓，到處建立聯繫。(Marx and

Engels 1952: 45-6)

在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把資本主義描繪成不放過每一個來臨的機會，殖民主義因此成為資本主義發展歷程中每個特定時刻所必需的。殖民主義的操作被當成資本主義在帝國國內一樣的狀況來操作。重要的是，這會導致國內原有的社會和經濟體系的重大的斷裂；在殖民地則不但會造成破壞而且會形成阻礙，就像在愛爾蘭的低度開發的狀況。值得注意的是，當馬克思和恩格斯彷彿像時代錯亂般地以後現代主義角度描述革命性擴張時，他們強調資本主義的革命所要的並不是像愛爾蘭這樣的殖民主義，不是要軍事占領和行政管轄，它所要的是拓居安頓和全球經濟的發展。馬克思並沒有解釋為何資本主義需要直接的軍事征服和占領，但是我們大致可從他的分析歸納，主要是由於必需藉助於軍事來平服馬克思稱之為「亞洲生產模式」的對抗（馬克思觀察到，強制的力量「就是一種經濟力量」；Marx 1976-81, I: 916）。亞洲生產模式通常被認為是一個非常有問題的概念；最好的方式就是將它看成是一個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入侵，以固有的方式與之對抗的模式。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資本主義橫掃這個模式，透過科技所提供的商業利益強迫它改變：

透過生產工具的迅速改良，以及極其便利的溝通方式，資產階級將所有的國家，甚至最野蠻的國家，全部拉到文明。商品的價格低廉就是拜重重的大砲摧毀所有中國城牆所賜，資產階級藉此機會強迫那些懷著根深蒂固仇恨的野蠻人向外國人投降。它逼迫所有的國家在絕種的痛苦下，採行資產階級的生產形式，它強迫所有國家引進他們所謂的文明，要他們也變成資產階級。總之，資產階級創造一個依照自己形象的世界。資產階級讓鄉村依賴城鎮，同樣地，它也讓野蠻和半野蠻國家依賴文明的國家，讓農民國家依賴資產階級國家，讓東方依賴西方。(Marx and Engels 1952: 47-48)

因此，殖民主義和工業經濟的其他過程並沒有特別的不同。（資產階級是一股革命的力量，無情地摧毀舊有的封建和社會的連結關係，「除了赤裸裸的本身利益，除了僵硬的『現金付款』之外」，什麼關係都不曾留下——雖然它至少讓當地人民不必在「村子裡過白痴生活」。資產階級將宗教、騎士精神、情感至上等觀念淹沒「在自私算計的冰冷深水中」，取而代之的只有自由貿易「赤裸裸、厚顏無恥的、直接的、殘忍的剝削」。資產階級迫使所有其他國家變得和它本身一樣，但又同時還要依賴它，以低廉的價錢而不是大砲（雖然「絕種的痛苦」暗指可能有另外的方式）摧毀殖民地既有的本土工業。在此，馬克思和恩格斯隱然提出一種經濟帝國主義的激進理論，認為資本主義的全球經濟動力非但創造發展，並且強迫發展，同時又產生依賴。另一方面，更有爭議的是文明和野蠻國家之間的文化區分涇渭分明。恩格

斯對這段期間典型文化沙文主義的思考模式，直接明白地表達他的看法，他認為這顯然是未經思考就認定西方文明的優越。他這時候有時會激動地寫到法國征服阿爾及利亞，以及美國因 1845 至 1847 年和墨西哥的戰役取得加州等事件。但是，馬克思絕非沒有文化優越感，他引用黑格爾的歷史的和非歷史的（unhistoric）國家之分，將其解釋為具備和沒有具備革命潛力的國家之分。他對世界上蒙受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破壞的國家，表現出人道主義的關懷，但幾乎不曾表達對其文化的同情心。

就是基於這個原因，馬克思談論殖民主義的一些著作——最著名的就是談論印度和中國——即使有些爭議，也可說是具有生產性了。就前面概述的反殖民主義的傳統來看，馬克思絕對沒生產任何新的反殖民論點；在許多方面，他是追隨功利主義的批評（Turner 1974）。在《德國意識形態》（*German Ideology*）、《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Grundrisse*）和《資本論》（*Capital*）以及其他著作中，馬克思一貫以道德的基礎批判殖民主義：除了敘述征服、掠奪的歷史，以及殖民地的原住民族如何被趕盡殺絕（馬克思以典型的反諷形容這一切是「田園風格的程序」），他還以侯威特（Howitt）的《殖民和基督教》（*Colonization and Christianity*）中所記錄的種種暴行做為輔助（Marx 1976-1981, I: 915-916）。同時，他經常從「東印度公司」的歷史中擷取例子，不斷強調殖民主義基本的經濟動機是製造不合理且不公平的利益。因此，在這一方面他反對自由派經濟學家認為殖民主義在經濟上無利可圖的觀點。但是馬克思自己似乎有時候蠻接近他們的主張，例如馬克思在談論「東印度公司」的一篇文章中的結尾，引用狄金森（John Dickinson）的觀察說「照這個情況看，英國會因為失去在印度的帝國地位而毀了，所以不得不將它維繫下去，而我們的財政不斷擴張延伸，終至毀滅」（Marx 1973a: 315-316）。在此，狄金森有一個很重要的區分，也就是帝國對國家的利益越來越重要，但是就經濟的觀點來看，它的利益卻是越來越小：一言以蔽之，就是帝國主義。在他談論印度的文章中，馬克思清楚了當地說明在英國，對印度抱著不同的目標就有不同的圖利方式，並且直指「東印度公司」的整個歷史完全靠它對英國國內政治的緊張保持曖昧不表態。1857 年「兵變」之後「東印度公司」廢除，印度變成直接由英國王室管轄，這一點更加證明馬克思的分析，表示國家利益先於經濟利益。

105 馬克思在當時面對上述殖民主義的各種觀點：贊成殖民主義的人普遍認為殖民主義著眼於經濟方面有利可圖，但是他們加上了「開化使命」之類的道德責任，藉此反駁自由派反殖民主義者指控殖民主義無利可圖的主張。馬克思的問題是，他想指明殖民主義的意義對資本家而言是利之所趨，但是在他反殖民的立場上，卻弔詭地和一些極端的資本主義者如史密斯、柯布敦站在同一線。因此，他要如何擺脫這樣的困境？他的解決方法只能放棄問題重重的那一個基礎，也就是選擇另一個帝國主義者的說詞，主張殖民是帝國基於職責所在，肩負著開化的使命。如此一來，他

的分析自然和他們這些人有所不同；而且的確是大不相同，因為馬克思所提出的解決方式是站在完全不同的立場。就前面大略提及的兩個傳統，馬克思將道德的人道主義批判結合他自己對殖民主義的經濟批判。在調和兩者時就顯示出馬克思和激進的自由派有所區分，因為馬克思肯定殖民主義所帶來的進步的影響，他更將自己歸屬於理想派的傳統，認為殖民主義是引介現代性的必要手段（事實上，史密斯已經預告這樣的立場，他主張只有商業才能夠弭平商業在歐洲以外的地方所造成的破壞）。這一脈的主張所帶來的問題在「第二國際」的延伸討論上引起激辯，但還是沒有得到解決。相較之下，「第三國際」比較不覺得認同現代性有什麼問題，甚至大部分的解放運動的領導人都不覺困擾：例如卡布拉爾以這些主張做根據，肯定帝國主義有其歷史的必要和歷史的使命（Cabral 1969: 80）。到現在，我們對照之下就會發現，在許多方面馬克思的立場就顯得比較棘手。

在史密斯之後八十多年，馬克思認為世界經濟從封建轉變成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必需經歷的過程中，殖民和全球貿易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Marx 1976-1981, I: 915; III: 450）。在 1858 年一封給恩格斯的信件中，馬克思主張：

資產階級社會的特定任務就是建立一個世界性的市場，至少約略有其輪廓，而且根據這樣的世界市場從事生產。既然世界是圓的，這個任務似乎必需藉由加州和澳洲的殖民，以及打開中國和日本才能完成。我們遭遇到的難題是：在歐洲大陸，革命迫在眉睫，而且將是社會主義的革命。想到在一個比歐洲大得多的領土上，資產階級社會的運動仍然持續升高，社會主義是否注定會在這個小小的角落裡粉碎？（Marx 1977: 341）

在這段話中，殖民被描述成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時也暗示完成全球的市場化之後，資本主義就會邁入一個新的，實質的帝國主義的階段。但是，馬克思在此指出，將資本主義經濟轉移到歐洲以外，實際上會使歐洲避開社會主義的革命，因為就全球的觀點看，資產階級革命仍舊在發生的過程中。馬克思認為世界經濟的全球化，以及伴隨而來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階段，都是資產階級藉以避免國內社會主義革命的手段。因此，它的功用非常重要。印度的馬克思主義者羅伊（M. N. Roy）<sup>譯註 1</sup>就是以這樣的脈絡來看，才會說歐洲的革命事實上從殖民地開始的。在這個方面，馬克思最偉大的主張就是 1853 年關於中國的看法。當時，積弱不振的大清朝廷事實上被歐洲列強的利益所操控。馬克思認為 1851 年「太平天國」叛亂就是英國鴉片貿易在中國社會「溶解能動性」（*dissolving agencies*）所帶來的直接結果；當時茶葉價格提高，製造商品在中國市場萎縮，對英國國內產生連鎖效應；馬克思寫道：「我們大可以這麼說，中國的革命將為現今工業體系負

<sup>譯註 1</sup> M. N. Roy (1887-1954)：印度 20 世紀最著名的哲學家，激進派的人道主義革命者。

荷過度的寶礦點起一把火，長期的危機因而爆發，一旦擴及海外，緊接著將會在歐洲大陸發生政治革命」(Marx 1973a: 331)。歐洲人在中國建立「秩序」，而中國將回報西方世界的是失序混亂。這種恰恰好的平衡關係後來並沒有發生——到後來20世紀中期的殖民解放運動才發生，但是這個事實讓馬克思更加注意殖民革命的影響，也更加堅持必需分析當時特定狀況的真正政治可能性，但他仍舊認為殖民地在宗主國的經濟體系扮演一個重要角色。雖然馬克思強力批評「東印度公司」的反應，但是從一個政治的觀點來觀察，對於1857年印度士兵的反叛一事，他的態度和其他人比起來不算熱心。儘管他以「東方的愛爾蘭」形容印度，但是他認為印度獨立的物質和政治先決條件都還未完全成熟，遑論社會主義了(Marx 1973a: 301)。就此意義來看，馬克思對探究抗爭的各種跡象不感興趣，他注意的是在什麼地方具有可行的政治條件讓抗爭利用。同樣地，他鄙視資產階級如博利瓦等人的民族主義反殖民革命(Marx and Engels 1982: 18, 584-585)。從這一點就更清楚馬克思和某些後殖民著作的不同，後殖民論述傾向把反殖民抗爭正當化，而不去考慮它特定的政治目的或影響。就歷史的觀點來看，這可說是肯定反殖民主義普遍存在，但是如果以政治目的觀察，就必需區分不同種類的反抗和不同程度的成效。

馬克思對殖民抗爭的態度也顯示他對於共產主義的解放規劃中有關民族主義的情感缺乏熱誠。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提出以共產主義對抗民族主義，並強調他們的解放計畫以國際主義的政治為基礎。但是在1848到1860年之間，他們兩人對於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可能的結合越來越樂觀，更加願意將他們的論點，例如在《共產黨宣言》所發展出來的對階級關係的概念，應用在階級區分上面。這樣的區分概念後來被列寧充分發揮在「被壓迫和壓迫國家」的區分(Lenin 1968: 596)。「任何壓迫他國的國家都是在為自己打造鎖鍊」，馬克思在1870年說道(Marx and Engels 1971: 163)。他們有這樣的改變是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0年代越來越同情愛爾蘭的民族主義(他們談論愛爾蘭的著作超過400頁)。在1869年，馬克思在「第一國際」的大會(General Council)上宣稱「他認為解決愛爾蘭問題的答案就是解決就是英國的答案，而解決英國的答案就是解決歐洲的答案」。第二年，馬克思寫道：「能夠真正迎頭痛擊英國官方的唯一法寶就是愛爾蘭」，他還說「解放英國工人階級的先決條件就是，改變現在強迫性的合併形式(例如對愛爾蘭的限制)，如果可能的話變成平等、自由的同盟，如果必要的話，要變成完全獨立的。」因此，「愛爾蘭的民族解放」變成英國解放的重要先決條件，而且需要實際的支持(Marx and Engels 1971: 161-163, 294; Munck 1986: 15-20)。正如馬克思自己對恩格斯承認他自己的信念有很大的修正：

倒不是要用像「國際的」和「人道的」正義等說詞為愛爾蘭辯護，……這

是為英國工人階級的直接和絕對利益，所以才要擺脫現在和愛爾蘭這種關係。這就是我最完整的信念，這些原因中有一部分我是無法講給英國的工人們聽。長久以來，我相信提高英國工人階級，就有可能推翻愛爾蘭政權。……現在，經過更深入的研究之後，我的信念有了180度的轉變。英國的工人階級在擺脫愛爾蘭之前，永遠不會達成什麼目標。愛爾蘭問題必需應用謀略。這就是為什麼愛爾蘭問題對普遍的社會運動非常重要。(Marx and Engels 1971: 284)

因此，有關殖民地在政治上的重要性，馬克思的看法的確有很重大的轉變。被殖民者不再等待帝國列強的工人階級的解放；相反的，被殖民者現在扮演一個重要而主動的角色，要在各殖民地啟動歐洲和世界革命。殖民地必需先有民族主義，才能觸發國際革命，而殖民地就變成革命潛力的一大關鍵。一年之後，恩格斯進一步闡釋這個觀點：

就愛爾蘭的例子來看，真正的國際主義必需要以明確的國家組織做為基礎；愛爾蘭，以及其他被壓迫的國家民族可以加入我們(第一國際)，但是要那些征服他國的國家一樣平等，而且以「抗議中」表達被征服的不滿。因此，愛爾蘭的分裂不只是正當的，甚至有必要在條文的前言中言明，身為愛爾人，首要迫切的職責就是建立他們自己的獨立國家。(Marx and Engels 1971: 303)

這樣一個以民族主義為基礎的國際主義觀，隨後在1899年布隆(Brunn)的「第二國際」大會上得到認可，但是在恩格斯著名的1882年致考茨基(Kautsky)譯註<sup>2</sup>的信函中並沒有特別提到這些。他在信中遊走在兩個觀念中：一是革命的無產階級必需接管殖民地，引導它們走向獨立，另一個就是殖民地本身可爆發自發性的革命，他補充道，如果是後者的話，「的確對我們是最好的，我們自己國內就有會有足夠的力量」(Marx and Engels 1934: 399)。

馬克思對殖民主義本身也並非完全仇視，這一點和恩格斯沒有什麼不同。馬克思認為殖民主義的目標或者是打破非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例如印度的紡織工業)，將之轉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或者就要像在愛爾蘭一樣，要避免這樣的轉變過程，以保護英國工廠的勞工供應——這就是早期低度開發國家的例子(Marx 1976-1981, I: 854-870; Marx and Engels 1968: 273-290)。因此，英國在愛爾蘭的統治所造成的影響是倒退的，雖然愛爾蘭因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發展而具有革命的潛力；但是馬克思認為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最終的影響的正面的，雖然它在1850年

譯註<sup>2</sup> Karl Johann Kautsky (1854-1938)：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領袖之一。



代還不具革命的潛能（馬克思也把這個觀點應用在1848年的捷克）（Fox 1974; Marx and Engels 1971; Marx 1973a: 323）。認為英國對印度的影響是正面的，這樣的觀點符合他的主張，認為以物質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下工業化本身就是進步的：問題只是在於從中得利的到底是誰？而資本主義生產模式所必需經歷的重新組成時所帶來的摧毀和斷裂，到底又造福了誰？因此，馬克思極力批判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時，他也稱許英國在印度的成就，尤其是英國開始加強印度在政治上的統一，組織並訓練印度軍隊，引介自由的媒體，以及鐵路和汽船（Marx 1973a: 320-321）。馬克思辯稱，殖民主義是一體的兩面，有好有壞：「英國必需完成在印度的雙重使命：一是摧毀，一是再生——毀掉舊式的亞洲社會，然後在亞洲奠定西方的物質基礎」（Marx 1973a: 320）。馬克思為殖民主義的分析提供一個有動力的架構，把它看做具有破壞性，同時又兼具轉變性；他顯然無法接受殖民主義必定就是惡行的看法。一方面，馬克思談到印度人因為英國的占領承受深刻的痛苦，這些痛苦比較不是因為侵略和征服所造成的，反而是因為工業競爭和自由貿易的引入，導致「整個印度社會架構」的崩解帶來巨大的痛苦（Marx 1973a: 302）。無論目睹這樣的景象會多麼令人厭惡，馬克思還是認為能夠因此脫離東方專制獨裁的階級制度下被動的生存方式，能夠擺脫「沒有尊嚴、停滯不前、像植物一般的生活」，終究對印度人有好處的。就是在這樣的背景脈絡下，他寫下1853年著名的這一段話：

的確，英國引發印度的社會革命是因為英國只是被最卑劣的利益目的所驅使，所採用的強取豪奪更是愚昧。但這不是問題所在。問題是，如果亞洲的社會狀況沒有一場基本的革命，人類可能完成使命嗎？如果不能，那麼，無論英國可能犯下什麼罪行，它是一個無意識的歷史工具，不知不覺中帶來那樣的革命。（Marx 1973a: 306-307）

馬克思認為，以道德和人道主義的論點反對殖民主義，終究抵不過它的所帶來的利益——走向社會主義的世界歷史性運動。正如黑格爾宣稱非洲沒有歷史，馬克思也輕率地丟下一個奇特的評語：「印度社會完全沒有歷史」（Marx 1973a: 320），並且認為英國的使命正是加速將印度從一個沒有變化的社會推進歷史。馬克思一邊譴責殖民主義卻又一邊為它辯護，致使印度的馬克思主義傳承面臨困境；長久一段時間，印度馬克思主義者試著恪守馬克思的立場，但在此過程中開始有了曖昧多義（ambivalence）的傳統，這也就變成後殖民理論的核心。馬克思的立場直接引發殖民現代性的問題，以及什麼程度的現代性可被認為是有益的，什麼程度是有破壞性的（Barlow 1997）。馬克思強迫當代的讀者面對這個問題：殖民主義批評到底有多少成分是因為嚮往前工業時期整個生活形態。他力促讀者釐清他們是因為緬懷原本的鄉村生活，就像盧梭<sup>譯註3</sup>或哈賈德一樣，還是因為他們贊成現代性的形式會為

他們帶來利益、多產，而不是帶來壓迫。那些沒有管道接觸現代性的人，如果有機會的話，一般都會想要現代性。那些因為意識形態的原因而反對現代性的人，通常是一些已經具有現代性的人。許多的反對都是和資本主義的重組所帶來的痛苦有關：馬克思絕對沒有忘記它所帶來的恐怖，但是馬克思本人將它視為享受社會主義的好處之前必需經歷的階段。

根據馬克思的看法，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以猛烈的方式引入，摧毀「東方專制獨裁」舊有的「野蠻」體系，這種專制獨裁只是強化了殘暴的手段，貶低人類，迫使人們屈服於外在的情況。因此，資本主義將人類提升到「得以掌控外在情況」。或者用相反的方式來說，殖民的階段和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引入，終究必然會被社會主義所超越，馬克思認為這個主張是一種對過去的挽救，對壓迫的那一段歷史的一種彌補的方式。因此，對於馬克思而言，殖民主義具有強烈的辯證性：同時是無情的經濟剝削體系，又是一個走向烏托邦的未來的一個重大的正面的行動。但是在做這樣的主張時，馬克思對於在殖民的狀況下，什麼政治行動才是正確的形式，並沒有留下清楚的作法。例如，如果殖民主義是要冒險把國家推回前資本主義時期的舊式經濟和社會體系，那麼是否應該反抗、推翻它？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所主導的反抗應該被看成是敵或是友？有關民族主義，馬克思本人在不同的時候採取不同的立場。也就是這些議題讓布哈林、考茨基、列寧、盧森堡、羅伊和托洛斯基等人在「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中，引發激烈的爭論。

## 二、馬克思理論與帝國主義

有些時候，某些後殖民理論似乎將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當成一個不辯自明的實體——如果不是把它們看成自然現象，就是當成殖民意識形態下被誤導的產物；這些理論反而沒有把這樣的意識形態看成是先有了產生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經濟系統，才有這個意識形態。相較之下，任何帝國主義的馬克思理論必定會將它解釋為「全球規模中資本主義演進的一個連貫理論」中的一個部分（Brewer 1980: 23）。馬克思的著作中並沒有針對帝國主義本身的言論，主要是因為他在1883年逝世，也就是帝國主義正要開始進入發展的高峰期。在馬克思理論中許多不同的帝國主義的理論，其實都是從他的著作引伸發展而來的。大體上說來，這些理論共同的論點都是：帝國主義是財金資本主義和商品流通的產物，因為獲利率降低，連帶需要併吞更多市場，如此一來就牽涉到不平等的權利關係，以及主導不同生產模式的各國之間的互動。現代新殖民主義的理論在這方面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帝國主義的各種

<sup>譯註3</sup> 盧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法國哲學家、作家。啓蒙時期的偉大思想家之一。著有《愛彌兒》(Emile, 1762)。

不同的馬克思主義分析所依據的是馬克思的言論中各種不同論點發展而來：其中包括將帝國主義視為資本主義的一個特別的階段，或者是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以及這些國家和非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特別的一種關係的形成，或者將帝國主義當成是一般性的描述，形容某一群體和另外一個群體根據經濟宰制和剝削而建構的一個較為靜態的經濟體系。正如華倫所指出，列寧最先開始將重點做了一大轉變，這就是為什麼列寧對帝國主義的觀點後來以左派為主（Warren 1980: 48）。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對殖民地的影響最後會是進步的，但是對列寧而言，就當前政治的角度來看，帝國主義純粹是負面的，是資本主義剝削的機制。就這種立即的意義來看，帝國主義做為一個概念，它的好處就是消除馬克思對殖民主義立場的雙面性。

帝國主義的馬克思理論有很多，但是大致來說，這些理論可分為古典派理論以及依賴或世界體系理論。會開始有這樣的區分是因為考茨基和列寧兩人的差異；兩人之間主要的爭議在於帝國主義的政治和經濟之間的關聯。列寧追隨西爾費丁和伯罕寧，一直將帝國主義看成是資本主義的某一個特別的歷史階段，身為宗主國的帝國和被殖民國家或半被殖民國家之間的關係。帝國主義的形成是由壟斷性的資本主義，主要是因為國內利潤降低，所以被迫往外做地理上的擴張，不斷尋找新的市場、資源和勞工，也因此在各帝國列強內部統治階層的利益之間，形成強烈的敵對和衝突，這個過程是達到最後的社會主義形式的必要先決條件。列寧對帝國主義的觀點雖然所強調者不同，但是本質上和馬克思對殖民主義的論點並沒有分歧，也就是某一種生產方式以激烈手段強行加諸另外的方式，但是最終還是會帶來社會主義的好處。在這個模式中，全世界的經濟是一種具有動力的進化，朝著資本主義發展，未來將一直持續增強。馬克思和列寧期待透過所謂的低度開發國家達成完全的資本主義發展，但是這個目標經過相互交戰的蕭條年代，無法立即達成，導致考茨基的理論影響力日漸增強。相較之下，考茨基主張帝國主義不應該被視為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敵對，而是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和所謂的未開發國家之間的關係形式，這樣的關係不一定需要以政治形式控制領土。就這一點，考茨基能夠容許工業資本主義者在實踐上一直反對重商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保護主義（Kautsky 1975; Munck 1986: 34-35）。他認為在面對未開發地區時，資本主義的各種利益相互勾結，因而主張帝國主義是西方剝削非西方的一種相對靜態的系統，或者說是不平等的交換、依賴或低度開發，這樣的論點為戰後的帝國主義理論家建立了一些基礎，例如巴倫、法蘭克（Frank）、華勒斯坦、伊曼紐爾（Emmanuel）和阿敏等人的理論。

因此馬克思理論中的帝國主義大約有兩派，但是這兩派在實質上並非相互矛盾。首先，列寧主義派的理論認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一個特殊階段，其中最顯著的就是各地國之間強烈的敵對，尤其是在地理上沒有擴張的空間後：「這是第一次，世界已經完全被瓜分完了，因此，未來只有重新劃分的可能。也就是說領土只

可能從一個『主人』交到另一個手中，不可能有一塊無主人的領土會落到某個『主人』手上」（Lenin 1968: 223-234）。那些就技術而言沒有被殖民的國家則被賦予不同形式的「依賴」，有些是「半殖民」，有些是「經濟和外交方面的依賴」（ibid.: 230）。在這樣的模式下，全世界的經濟以漸進的模式，在動態的競爭下朝著資本主義發展，而且在未來將會持續增強。

馬克思理論中的帝國主義第二個路線大約是追隨考茨基和法蘭克，認為帝國主義是宰制和剝削的關係，區分為開發經濟和低度開發經濟的世界體系。低度開發經濟意指尚未進入發展，實質上是靜態的，甚至可說是已經走向末路的經濟。這種把帝國主義看成是中心和邊緣之間一種不對等的辯證關係，廣為後殖民批評家接受，他們引用「帝國主義」時不是採納列寧的歷史觀，而是把它放在較為日常運用的「宰制和被剝削的國際關係」上。根據布魯爾（Brewer）的說法：「先進國家和低度開發國家……乃是一個不對等的世界體系中互補的兩半，是過去好幾個世紀發展而來的產物」（Brewer 1980: 10）。但是對後殖民理論而言，這樣的兩半並不是靜態的互補，而是激烈的辯證關係——以阿多諾（Adorno）的話來說：「兩半都帶有著資本主義的污點，都包含改變的元素。……是一個自由的整體被撕成各半，無論其中一者做到什麼程度，都無法擴增為整體自由」（Bloch et al. 1977: 123; Young 1996a: 21-22）。帝國主義撕裂的兩半變成描繪中心與邊緣這兩個歷史性權力關係的整個基礎，其中所牽涉到的不是單向宰制的權力關係，而是鬥爭的敵對狀態。

如果我們考量一下馬克思主義本身的歷史角色，同樣也會出現類似的結構關係——如果中心改變邊緣，邊緣也會使中心轉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主要在政治干預的層面上，但是在理論的層次上，以馬克思主義分析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以及分析反殖民鬥爭的歷史角色，兩者之間必需劃分清楚。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看，反殖民主義和反帝國主義一直都是反抗全球資本主義系統中的一部分。但是從反殖民的角度來看，馬克思主義是對抗殖民主義的特殊鬥爭中的一環，而且可以和其他資源結合，並與這些資源相互調節，尤其是和民族主義。雖然這兩者的結合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解放鬥爭尤其顯著，但是從一開始，馬克思主義對殖民主義的立場的主要核心就是鎖定在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

第三篇

從第一國際到第四國際

*The Internationals*

## 9.

## 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 從第一國際到俄國革命

### 一、「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

馬克思本人是1864年參與成立「國際工人協會」(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的核心人物，該組織成立後立即在其臨時條款中肯定正義的原則適用於「所有人類，無論膚色、信念或國籍」(Marx 1974: 83)。「第一國際」開啓當時對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抗政治(counter-politics)運動：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就是早期社會主義者的國際觀點，才會第一次出現以國際角度批判帝國主義和普遍的殖民系統，把兩者看成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一部分。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把所有的殖民關係都併入他們對資本主義的批評，但是一直到「第一國際」在1872年崩解，它所專注的焦點大部分都放在歐洲內的歐洲殖民主義——尤其是愛爾蘭，以及蘇俄占領波蘭。1889年「第二國際」成立之後，焦點變成俄國和奧地利兩個帝國和歐洲國家的關係，這個焦點成爲左右、界定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對民族問題的觀點。因此，考茨基、盧森堡和包爾(Bauer)把焦點放在多國的帝國議題。1896年，「第二國際」首度支持民族自決的權利，對於承受專制獨裁統治的國家的工人表示同情，並且譴責資本主義的殖民擴張(Riddell 1986a: 4)。三年之後，在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的壓力之下，「布隆會議」(Brunn Congress)支持以民族主義觀點的國際主義立場，處理奧匈帝國的社會主義政黨所提出的政治和文化要求。包爾同時也宣稱喚醒他所謂的無歷史國家具有革命性的意義。對此，「印度國大黨」的創黨主席那羅齊(Dadabhai Naoroji)表達熱烈支持(1907年，印度革命分子卡瑪(Bhikaijee Cama)在史圖加特(Stuttgart)的演講中打開印度國旗，這也是一種表達支持的態度)。在這段期間，典型的想法就是印度自治權代表仍持續在英國的主權下運作(Goode 1978: 102-135; Löew 1979; Riddell 1986a: 5)。

在歐洲的工人階級和其他地方的被殖民者之間有一種共同的被壓迫經驗，加上在殖民地漸漸增強的憤怒意識，尤其是中國被列強瓜分，1898年西美戰爭〔導致美國名作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也積極參與成立的「反帝國主義聯盟」，(Twain 1992)]、波爾戰爭、1904至1907年德國在德屬西南非大肆屠殺赫雷羅人

(Hereros)，以及凱斯曼爵士和莫瑞爾揭發剛果的實況 (Morel 1903, 1904a, 1904b, 1906)，再加上1905年的日俄戰爭，以及1905年在俄國、1906年在伊朗、1908年在土耳其、1910年在墨西哥等地所發生的革命，還有義大利在1911年侵略的黎波里 (Tripoli)，這一連串事件使大會越來越注意從1900年以來的殖民問題和民族主義的問題。大會中辯論的主題主要是，有鑑於社會主義的原則和殖民主義完全不能相容，社會主義對殖民主義是否應該全面譴責，或者反對應該有其限度，因為殖民主義的確開啓了自然資源的利用，為普遍的人類帶來益處，同時也將前工業經濟和文化引導到社會主義之前的必需經歷的現代性的階段。在1904年在布魯塞爾的大會上，英國社會主義者海德曼甚至表達他對於英國統治印度的悲嘆，因為英國毀掉印度的財富和文化，他認為「對西歐而言，社會主義本身並沒有那麼重要，反而是避免這種大規模的殘殺比較重要」(Carrère d'Encausse and Schram 1969: 127)。但是在1907年在「史圖加特會議」中，因為1905年俄國革命之後所接連發生的罷工和起義的影響，主要的辯論就集中在殖民主義。但是當時許多立場根本談不上是進步的。當時美國社會主義者激烈譴責美國對亞洲移民的待遇，從這一點也反映出對殖民地的種族歧視。在歐洲社會主義之中，考茨基激烈反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他認為德國和荷蘭社會主義者，包括伯恩斯坦 (Eduard Bernstein)、大衛 (Eduard David) 和凡寇爾 (Hendrick Van Kol) 等人所提出的「社會主義的殖民政策」，根本是措辭的矛盾 (Kautsky 1975)。大衛曾辯稱：「歐洲需要殖民地，現有的還不夠多」，所以提議增列一條：「有鑑於社會主義的目標是將全世界的生產力提高到為全人類服務，將所有膚色，所有語言的人口提昇到最高階段的文明，大會應該將殖民思想視為社會主義運動提升全世界文明的目標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iddell 1986a: 7)。雖然這個提議被否決了，最後被採用的方案支持考茨基所提的譴責資本主義的殖民政策，以及所謂的開化使命，但是同時也納入了一個聲明——可視為盧押勳爵「雙重委任統治」的先聲，也就是確定社會主義對所有民族國家的必要性，同時也認定需要有和平的政策為全人類的利益而發展世界的自然資源。這個主張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勞工黨」政治家具文 (Ernest Bevin) 曾再度引用。曾參加1907年會議的列寧對社會主義屈服於種族政策不以為然；他說這就是「讓資產階級將真正的奴隸制度引入殖民地，讓當地人民蒙受不可言喻的的羞辱和暴力，用散播酒精和梅毒『開化』他們」(Carrère d'Encausse and Schram 1969: 134)。這樣一個妥協的國際主義立場並沒有持續到戰爭爆發，許多成員在衝突時立刻表態支持他們自己的一邊，「第二國際」顏面盡失。只有少數幾個人——如列寧、盧森堡、康納利——一直維持他們國際的社會主義立場，始終堅持這一場戰爭就是帝國列強敵對下的產物，而且可能引發革命內戰——1915年之後「新門瓦 (Zimmerwald) 會議」時的左翼就是認同這個立場 (Braunthal 1966; Haupt 1972; Munck 1986: 33-

39; Riddell 1986a: 276-383)。

## 二、「我不是俄羅斯人，我是立陶宛人，真正的德國人」<sup>譯註1</sup>： 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

一直到1917年布爾什維克政府出現之前，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帝國主義高張的時候，沒有一個主要的世界列強伸出援手實際支持反殖民主義鬥爭。舊歐洲國家，包括英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比利時，甚至德國和義大利這些新成立的國家全部都盡力要增強自己的帝國勢力，或者至少要維繫他們的帝國統治。19世紀新興的非歐洲列強——美國和日本——也追隨著意有所圖的帝國政策，通常直接在太平洋和東亞彼此競爭（如果說第一世界大戰主要是歐洲帝國列強之間的戰爭，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東方就是太平洋的帝國列強之間的戰爭）。因為帝國系統的同質性，歐洲以外個別的自主小國不被視為有能力發展的實體。帝國的併吞通常美其名為一種保護的手段，或者是為了防止其他帝國列強的覬覦，或者是防範貿易商或拓居者的強取豪奪。只有愛爾蘭是例外，因為它位居歐洲，且在大布列顛之側，因此位置特殊。除此之外，帝國和殖民地都鮮少認真思考讓殖民地變成沒有外力支撐的獨立國家。大家都很清楚，比方說，如果英國退出黃金海岸，讓它獨立，那麼黃金海岸很可能會被其他求海外領土若渴的殖民帝國以某種形式侵占。全世界沒有一個大家同意的全球政治系統，可以讓人們保護他們自己的獨立。即使在1919年的「凡爾賽條約」談到許多民族自決的原則，但是這只能適用於歐洲，而不適用於半殖民地，例如伊朗代表獨立的要求被置之不理（反而變成英國的保護領），也不適用於某些殖民地，例如在歐洲，所有主要殖民列強的領土上都發生過政變和叛亂。戰爭的結果帶給主要幾個殖民列強勝利的果實，英國、法國和美國因戰利之便大肆擴張海外帝國，尤其是以前在中東的土耳其鄂圖曼帝國的領土，而同時又主導因為多國聯合的奧匈帝國和俄羅斯帝國的瓦解而出現的歐洲新國家的形成 (Stalin 1936: 271-272)。雖然先前的奧匈帝國部分獲得獨立，但是應該讓德屬殖民地獨立的想法甚至都不曾討論到 (Andrew and Kanya-Forstne 1981: 182)。相反的，戰勝國和它們新組成的聯合組織——原本是為了確保「凡爾賽條約」所立下的條款而設立的「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重新分配德國的屬地。這樣的結果被列寧描述成「小偷們的廚房」。「第三國際」的第一次大會精確地將之形容成有計畫地對抗「國際革命工人共和國的思想」(Adler 1980: 55)。

譯註1 'Bin gar keine Russin, Stamm' aus Litauen, echt deutsch': 引自生於美國的英國詩人艾略特 (T. S. Eliot) (1888-1965) 的名詩作〈荒原〉(The Wasteland) 中的一句。艾略特同時也是劇作家和文學評論家，獲得1948年諾貝爾獎。

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政治不安，最直接的影響不是因此鼓舞了歐洲之外的殖民地起來反抗，反而是刺激一些仍然在多國結合的帝國控制之下的歐洲國家紛紛起而反抗。1916年都柏林的起義讓各地殖民地因民族主義運動而引發的不穩定，變成了英國的一大問題，而奧匈帝國，這個因為和德國同盟而成爲蘇俄和英國的主要敵人，也爲了國內的少數民族公開爲獨立而戰而苦惱。從1848年「種族之戰」(war of the races)開始之後，各族群的民族主義運動就更肯定要訴諸分裂的力量，以對抗日趨沒落的歐洲帝國勢力 (Young 1995a: 120)。因此，對任何一個歐洲強國而言，鼓勵對手的境內的族群民族主義都是一張危險的牌。但是比較不受這個威脅的德國，在1915年東邊戰線的幾次成功的攻擊之後，認爲俄國政府可能因此解體，毫不猶豫地鼓勵少數民族反抗。因此德國人支持烏克蘭和波羅的海各國的抗爭，而且參與計畫，聯合俄羅斯帝國境內的民族運動，期望俄羅斯真正解體分裂。德國人也認爲鼓勵民族運動就是牽制社會主義明顯威脅的一個方式。戰爭伊始，德國政府的戰爭目標就是終結沙皇對於非俄羅斯人的統治；1916年，德國宣布它所征服的領土不會回歸俄羅斯的統治。德國甚至設立一個「外來民族聯盟」(League of Non-Native Peoples)，統籌一個由「民族同盟」(Union of Nationalities)組成的被殖民者的會議，在1916年6月在瑞士洛桑 (Lausanne) 舉行 (在稍早則有1910年的一個世界會議；Carrère d'Encausse 1992: 50-56; Lenin 1968: 248)。在瑞士舉行是很合理的，因爲瑞士是所有流亡的政治行動派的第一選擇，包括當時也在瑞士的列寧。因爲德國本身也是帝國列強之一，加上它的結盟國奧匈帝國所面臨的民族主義問題，德國在統籌時，盡其所能將參與者的焦點鎖定在攻擊俄國的殖民主義。然而，這次會議清楚顯示各個少數民族運動的團體表面上是單獨奮鬥，事實上大家都有共同的政治立場。卡爾德安卡絲 (Hélén Carrère d'Encausse) 如此描述：

在洛桑，被壓迫者的團結第一次呈現在世界的舞台上，預告了蘇丹加里也夫 (Sultan Galiev) 在亞塞拜然「巴庫 (Baku) 會議」中的第三世界馬克思主義，以及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不只是歷史性地團結不同國家的人民，同時也是一個世界性的分裂，將「無產階級人民」——被壓迫者——和壓迫的人區分開來，這樣的一個概念就在1916年，在一個平和的瑞士小城中生根。大約40年之後，印尼「萬隆會議」就是這次會議的一個迴響，回應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日內瓦雷夢 (Leman) 湖畔首度提出的幾個主題。(Carrère d'Encausse 1992: 58)

因此，艾略特 (T.S. Eliot) 在1922年在一首詩中哀嘆西方文化的衰敗時，寫下「我坐在雷夢湖畔哭泣」也就不足爲奇了。

也許大保守派艾略特不需要如此挫折感傷。因爲「洛桑會議」呼籲被壓迫者團

結起來，雖然這對沙皇而言情勢十分複雜，但是團結的概念還是被小心地引導到資產階級的民族運動，而不是革命的國際主義。到最後，還是德國人把革命的共產元素注入俄國。1917年春天沙皇被廢，德國最高統帥安排列寧從瑞士利用密封的火車回到莫斯科，名噪一時。8月，德國和已經宣布獨立的烏克蘭簽署一份個別的和平協定，搶先了俄國臨時政府。但是最先在被壓迫者和壓迫者之間劃下清楚界線的布爾什維克，很快地表現出他們做好準備如何解決問題：把民族自決的要求和對資本主義的抗爭結合起來，注入對抗帝國主義的共同鬥爭中。

1848年之後，共產主義無產階級的革命性團結的理想，和政治上比較成功的民族運動一直處於競爭的狀態，後者則以馬志尼 (Mazzini) 爲最偉大、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歐洲的反殖民主義，無論是在義大利、奧地利—匈牙利，愛爾蘭和其他地方，仰仗的是民族主義，而非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就某個意義而言，至今日仍然是問題——一直是，到底要和民族運動結盟呢，還是要各行其道。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詳盡說明他們對兩者關係所持的立場。一如列寧所體認到的，兩者必定具有辯證性的關係：

工人無祖國。我們無法拿走他們所沒有的東西。無產階級必需先取得政治上的優勢，必需起來做民族國家的領導階級，必需就是此民族國家的組成，而就目前而言，工人本身就是一個國家，但不是資產階級的那種意義。由於資產階級的發展、商業自由化、世界市場發展，也由於生產模式，以及因此而造成的生活狀況的一致化，各民族國家的差異和人民之間的敵對日漸消逝。無產階級至上將會讓這些差異和敵對加速消失。……好比終止一個人被另一個人的剝削，一個民族被另一個民族的剝削也同樣地被終止。(Marx and Engels 1952: 71-72)

因此，團結的共產主義終止分裂的民族主義：共產主義者的任務就是指出，並強調「爭取不同國家的無產階級民族鬥爭中所有無產階級的共同利益，不受所有國別的影響」(Marx and Engels 1952: 61)。國際主義將會終結民族和殖民的利用剝削。就政治策略和實踐而言，馬克思主義的困難就是，對於一向被視爲屬於資產階級的個別民族主義鬥爭，兩者之間的結合到底要多深？正如上面所述，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1860年代的愛爾蘭民族運動越來越同情。從1890年代中期之後，民族自決和社會主義到底孰先孰後的問題激起熱烈討論，其中包括了奧匈和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如考茨基、包爾和巴枯寧 (Bakunn)，波蘭社會學家如盧森堡，以及「烏克蘭斯拉夫聯盟」(Ukrainian Slavic Federalists) 和「喬治亞社會民主黨」(Georgia Social Democrats) 等人士。大略而言，俄國和波蘭的社會共和派傾向工人階級的利益需跨越國家民族之分思想，這就是盧森堡的立場；而少數民族的社會主義派偏好包

爾的聯邦主義理論，以保證完整的文化自主和少數民族的權利為要。這兩種立場導致嚴重的分裂，位居中央的黨派認為民族的差異日漸消逝，而身處邊緣者認為社會主義才是少數族群得以恢復自主的方法。而俄國和奧匈則視聯邦主義是一個良方，可以調和古典馬克思主義以階級鬥爭為先，以及少數民族的民族主義。這些辯證持續在更大的反殖民鬥爭的場域中發酵。

### 三、俄國大革命：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

俄國大革命所帶來的後果之一就是，第一次有一個主要的大國反對帝國主義，而這一點戲劇性地改變了全球政治的動力。俄國大革命用自己的方式表達反帝國主義的抗爭。從16世紀中葉以來，俄羅斯帝國默默地以移民的殖民方式擴張版圖，往西併吞了波蘭、芬蘭和波羅的海三國，往東到西伯利亞，南到黑海的克里米亞（Crimea）、喬治亞、高加索山脈和土耳其斯坦（Turkestan）。到了1897年，超過55%的沙皇的屬民是「他者」（*inorodtsy*），或者稱為「外來民族」；其中有許多是穆斯林、佛教徒，或者信奉各地融合的宗教。俄羅斯帝國和後來的蘇聯人民組成一個高度異質性，各種語言和族群的綜合，對任何一個政府而言，無論是革命政府或是帝國政府，差異所產生的複雜性都很難應付。各語言、文化和民族之間沒有簡單的——甚至複雜的——協調溝通。1926年，新的蘇維埃政府為了修正沙皇「俄羅斯化」（Russification）所實施的殘忍政策，因此正式承認150個語言。「俄羅斯化」的整個規劃凸顯專制集權的帝國統治，根本沒有將多元的種族同化到一個主導的文化中；如果說它有同化什麼的話，那就是各民族一致都因為抵抗帝國而增強對少數民族的認同。每當中央的控制鬆綁時——例如1916年在戰爭的壓力之下，或者1987年戈巴契夫（Gorbachev）執政後再度引用列寧的「重新建構」（*perestroika*）和「開放」（*glasnost*）的概念——各族群的民族主義重展離心力：重新建構變成了帝國的解構。

俄國革命前幾年，曾經對少數民族和語言有過激烈的辯論。1913年列寧命史達林寫《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以解決這個問題，這本書很可能是在列寧的指導下所撰寫（Stalin 1936）。該書仍然是分析民族主義、文化和語言之間的關係最傑出的一本——事實上，此書見解十分精闢，以至於托洛斯基認為實際執筆人是列寧（Trotsky 1941: 156-157）。雖然他對於民族的組成所下的著名的——其實是衍生出來的——定義充滿了形式主義，但史達林顯現出他自己對中亞的情況和高加索山區，以及對各族群不同的語言和文化因素——尤其是宗教——之間複雜的內在關係等，有非常深刻的觀察，並且在很多地方他駁斥歐洲那種單一直接的民族認同模式（Stalin 1936: 48-49）。就列寧而言，他比黨內的

多數人更實際更有策略。一方面，他拒絕所有聯邦主義的想法；他反對任何文化自主的觀念，而且駁斥把民族文化視為資產階級的觀念。另一方面，他反對伯罕寧等人的觀點，他為民族自決的權利而辯護，並且積極鼓吹各民族組獨立的國家。他拒絕將民族主義當成只是一個對無產階級不具意義的資產階級現象，他主張無產階級應該和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對抗殖民壓迫。他認為化解這樣表面上立場相互矛盾的方法就是，相信民族主義是一個將會被超越的階段，而各民族獨立成國家也只是一個過渡性的現象，國際性的工人階級還是會大團結。如果各國可以自由選擇要脫離或是要統一，工人階級會以更大的無產階級團結統一的訴求來對抗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區分。這就要靠一個中央化的政黨來教育工人，讓他們對跨國性的無產階級大團結有一種渴望。如此一來就有兩種自決的可能形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形式，以及既是民族主義又是國際主義的工人階級形式。正如上面所言，針對這兩種形式列寧事實上是追隨著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的辯證法則。雷南（Renan）的問題是「什麼是民族？」，但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卻問「誰是民族？」民族不是一個單一的實體；民族往往是由兩種民族文化所組成，而它所依據的基礎就是階級的區分。

對民族主義採取這樣的辯證性觀點就是列寧的中心立場。廣義地說，他是違反黨的路線，但是唯有如此他才能支持這樣的立場，期待在第二個階段時這樣的矛盾可以化解，因為到時候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就會被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所取代了。但是史達林的觀點就有一點不一樣：他傾向將各民族的少數文化融入無產階級文化，將種族和階級均等融合，成爲一個緊密的整體，一個外表看來兼具兩者的整體。因為他不是把結合看成是過渡階段，所以就提倡一種聯邦主義的形式，在一個比較大的結構中容許民族自主，在聯邦形式的政府中有各別的代表，而這大致上也是1924年憲法所採用的形式。針對民族主義、語言和自決，黨的正式立場在1917年春天以前是兼併列寧和史達林的立場，聲明「所有俄羅斯民族有權選擇脫離，成立獨立國家，而且將被承認」。但是，這個的立場聲明接著說，這個權利和下面這個問題不應該混淆：「是否在某一特定的時間讓某個民族獨立比較適宜」。這就要交由無產階級的政黨從整個社會主義鬥爭的立場來解決。列寧在一個有名的比喻中曾將民族獨立比為離婚：以立法准許離婚是很重要的，但是有這樣的權利並不一定就是每一個民族都要選擇運用這個權利。這個聲明中沒有提到史達林所偏好的聯邦主義，但是提倡「廣大的地區自主」，同時主張廢除強制的國家語言。但是，它排斥以「民族文化自主」操控教育和其他方面，以便創造一種聯合工人和資產階級的「民族文化」。這個聲明主張應該有共同的跨民族的政治、貿易工會、合作和文化的組織。最後，這個聲明也要求應該立法「廢除所有民族所享之特權，並取消其侵犯少數民族之權利」（Stalin 1936: 269-270）。這一點就隱含列寧對俄羅斯沙文主

義和種族中心主義的懷疑漸深漸劇，他一直認為這樣的心態有發展成宰制獨霸之虞，也因此會將少數民族壓縮成一種近似殖民的地位，和沙皇時代沒什麼不同（Lenin 1964: 164-165）。1918年的11月，蘇維埃政府對俄國各民族的權利有一個正式宣言，由史達林和列寧簽署，明白肯定「讓居住在俄國領土之內的少數民族和部落族群，無阻礙地發展」（Riddell 1993: 248）。

列寧所持立場的雖然邏輯一致，但還是有些拐彎抹角：在革命之後，尤其是內戰和白俄羅斯侵略的時期，雖然布爾什維克幾乎立刻在1917年成立「民族事務人民委員會」（Commissariat of Nationalities），但是許多少數民族真的就選擇脫離。1918年3月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Brest-Litovsk）協定」讓俄國失去幾個先前的殖民地，包括波蘭、烏克蘭、波羅的海三小國、芬蘭；接著而來的又有各地的民族抗爭，包括白俄羅斯（Belorussia）、喬治亞、亞美尼亞（Armenia）、亞塞拜然（Azerbaijan）、土耳其斯坦和高加索山區和西伯利亞的其他地區（Carrère d'Encausse 1992: 79-98; Suny 1998: 96-120）。布爾什維克政府以「民族事務人民委員會」史達林做為代表，以現實的考量做回應，基於少數民族存在的事實而允許它們脫離，或者是基於策略性的考量，或者是因為別無選擇，但是倘若該地區對蘇維埃具有重大的經濟意義，政府就拒絕讓這個地區脫離獨立。布爾什維克政府趁著外來軍隊撤出的機會，從1921年之後建立自己的勢力，以協約或者必要時以軍事手段在它控制的地區重申掌控權。雖然布爾什維克對各國政府的干預（如烏克蘭和幾個中亞共和國）被視為違背當初民族自決的原則，但是這些行動也必需放在內戰的脈絡中來看，因為幾個脫離的國家和主張抗革命（counter-revolutionary）的白俄羅斯和「協約國」（Entente）站在同一陣線，意圖推翻布爾什維克政權（Pipes 1997）。將這些國家再合併也就是實踐列寧所主張的，以合法的程序結構讓尋求民族自決的國家在形式上成為民族國家，然後放棄它，以便組成工人的國際聯盟：既然各民族已經脫離，有些甚至已經被承認獨立，這些國家的共產黨申請將國家加入非國家定義（non-nationally defined）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列寧必需讓步，同意採行他一直強力反對的聯邦的結構。1922年「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誕生：史達林原本規劃以俄國宰制變成制度的「自主化」（autonomization），成功地被列寧轉變成其他自主國家加入的「俄羅斯蘇維埃聯盟社會主義共和國」（RSFSR）<sup>譯註2</sup>，形成一個各國享有平等地位的蘇維埃共和國的聯盟（Lenin 1964: 164-170）。這個共和國聯邦從來沒有被當成是一個傳統聯邦式的民族國家；它反而被看成是一個非國家性質的社會主義國家聯邦，當時被認為這個聯邦將會變成全球工人階級的聯盟：列寧寫道：「聯邦是一個過渡的形式，引導不同民族的工人們走向完全的統一」（Riddell

<sup>譯註2</sup> Russian Soviet Federated Socialist Republic.

1993: 268)。就如「共產國際」所形容的：「蘇維埃共和國的國際聯盟」是一個長期的目標，但是就眼前而言，聯邦是一個屏障，可以用來對抗周遭一直想要推翻共產黨的資本主義國家（Adler 1980: 414）。這在實質上也代表民族解放變成共產黨在殖民地所致力目標中必要的一環，因為聯邦的結構需要先有民族國家的存在，才能變成聯邦的一分子。但是，在實際上，在史達林崛起之後，沒有一個自主的國家自願加入聯邦；即使是東歐各國在1945年之後，仍和蘇聯保持涇渭分明。

聯邦的結構是由個別民族國家依據其政黨要求自由加入而形成，它一直維持到蘇聯解體。地區的自主是被容許的，但是這種離心力有一股日漸加緊的向心力加以制衡，也就是透過中央集權操控地方黨派來反制。雖然中央採取一些步驟讓各地共產黨更能代表當地人民，但是這個結構在實質上代表了俄國仍舊扮演支配的角色，這也是列寧希望小心提防的。列寧主張黨「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即刻將純粹、嚴格的共產思想傳播到鄉間」（Lenin 1968: 688），但在史達林的時代，這也代表地區的經濟和文化自主都受制於集體化和現代化的中央集權。穆斯林的國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1917年蘇維埃政府廢除了兼顧可蘭經律法（Koranic law）的雙重法律系統；到1930年，學校禁止可蘭經教學。然後伴隨而來的是以平等權利的法令攻擊伊斯蘭的父權結構，尤其是有關婚姻和離婚。這些措施導致發生多起婦女被迫公開掀面罩的情景（Carrère d'Encausse 1992: 162-168）。在中亞族群各異的穆斯林地區，蘇維埃政府在史達林的倡議之下，解決少數民族問題所採行的方式是：創造各種「非自然」國家（artificial nations），其目的就是要防止各民族在宗教或種族的基礎上統一結合。雖然各民族國家被容許有自己的語言，但事實上許多國家都是使用多種語言；語言和族群的被看做是一個分離宗教，甚至民族社群的方式。在1921年紅軍侵略喬治亞之後，罷黜孟什維克（Menshevik）政府，建立一個即使是喬治亞當地的布爾什維克黨也反對的、包括喬治亞、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的「外高加索聯盟」，再加上1924年實質併吞外蒙古，布爾什維克宣稱的原則——民族自決的權利——顯然在中亞有其侷限。如果史達林最應該對這樣的發展負責的話，托洛斯基和列寧兩人在政策層面也有責任。為了自己的名譽，列寧最後準備了一篇十分嚴厲的批判，指責史達林對於有關民族問題採用越來越沙文主義的政策（〈民族或「自主化」的問題〉‘The Question of Nationalities or “Automization”’）。但是列寧注定避開了這次正面攻擊史達林，因為當時被他託付此項任務的托洛斯基背叛了他。托洛斯基在面對「第一個三頭政治」（first troika）<sup>譯註3</sup>反對他自己時，很快地就和史達林妥協了（Deutscher 1970; Lenin 1964: 164-170; Lewin 1969; Munck 1986: 82-85）。

因此，蘇維埃政府採行的是一種相互矛盾的立場，將列寧的主張在實踐上做扭

<sup>譯註3</sup> 指史達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Kamenev）三人主導。



曲，一方面要落實並表示支持民族自決，但是另一方面，在對國家有利可圖時壓制民族自決。對於先承認其權利，而後允許其獨立的國家，如芬蘭，它所採行的另一種方式就是承認其獨立的政府，但同時又支持當地共產黨著手推翻它。在憲法上，1922年之後蘇聯由個別的共和國組成，但這些國家同時臣屬於一個統一的立法、教育和文化制度，由中央極權的機制掌控，意圖消滅各民族的文化差異。黨的中央操控必須抗衡的是許多少數族群和少數民族的國家所展現的強大離心力。1990年代，莫斯科的掌控鬆綁，民族自決的要求立刻重新浮現，顯示民族自決有其堅強持久的力量。

因此，對舊俄帝國，蘇維埃政府所持的立場又是反殖民主義和殖民主義兼而有之。對於其他帝國，它的立場雖然不是全然的直接了當，但是比較沒有那麼矛盾。這主要是列寧本人改變上面所提，在1914年時很少被殖民國家可以真正尋求完全獨立的狀況。反帝國主義是列寧政治哲學的核心，這一點在他著名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Imperialism-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1917）表達得很清楚，但是它也激發了他所有的作品注重國際關係，尤其是有關民族與殖民問題。1916年，列寧駁斥盧森堡相信只有「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能夠領導五大洲被剝削被奴役國家的軍隊」，列寧寫道：「忽略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是一個錯誤，他還說：

在帝國主義的時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戰爭不只是意料中的可能，而是不可避免的。世界上大約10億的人口，或者說，超過一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中國、土耳其、波斯）。在這些地方，有的是民族解放運動已經非常蓬勃，有些正在發展，漸漸成熟。每一場戰爭都是以不同的方式來延續政治。殖民地所延續的民族解放政策將不可避免地帶領他們進行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戰爭。（Carrère d'Encausse and Schram 1969: 145）

列寧在此主張的是民族和國際的辯證關係：掀起民族戰爭是爲了對抗帝國主義的國際體系。1920年7月，列寧在對「共產國際」的第二次大會上的演講中，他和印度馬克思主義大師羅伊站在一條陣線，痛陳帝國主義所帶來的影響就是將世界劃分成「受壓迫國家和壓迫國家」。而受壓迫國家包含了世界70%的人口（Lenin 1968: 596）。列寧視帝國主義爲資本主義動力的核心，因此將殖民革命放在新共產政府優先順序中重要位置，將它視爲蘇維埃政府對抗資本主義的核心要素，也因此決定性地改變了全世界反殖民抗爭的動力。反殖民鬥爭第一次可以扣連在一個比較大的架構中，更重要的是，可以仰賴一個主要的強國，在組織、物質和軍事方面得到支持。因此，列寧對俄國以外的民族自決權的主張，總是會連結到他批判帝國主

義是資本主義的壓迫形式；同時，從他認爲資本本身就是「國際的，而且是壟斷性的」，可以看出他的國際主義觀點（Lenin 1968: 154）。因此，後獨立（post-independence）國家發現它們獨立之後仍受制於新殖民主義，此時就會體會到民族主義不足以對抗這個更大的系統。列寧在1916年有關民族自決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西方的歐洲和美國等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這些『大國』中的每一個國家都壓迫其他的民族，無論是在其殖民地亦或是在其本國境內」（Lenin 1968: 163）。因此，在帝國的國內被剝削的無產階級，以及被該國剝削的殖民地人民之間，有一種基本的結盟。共產主義者反對所有形式的壓迫，因此他們反對殖民宰制；殖民地對民族自決的要求變成無產階級對抗資本世界不可或缺的一環。而且，在俄國與白俄羅斯內戰期間，以及「同盟國」（英國、法國、芬蘭、捷克、波蘭、美國和日本）延伸戰場侵略西伯利亞時，列寧和他的同事——特別是史達林和季諾維也夫——漸漸體認到亞洲被殖民的國家是蘇聯未來戰略的盟友。他寫道：「現在看來，東方民族的解放非常可能實現」。正如他所說的，他體認到俄國將會「成爲歐洲和亞洲之間，東方和西方之間的一個邊界」，因此他要在俄國對抗資本主義的革命和東方被占據國家的民族解放之間，建立基本的政治連結（Lenin 1968: 504, 502）。

1918年11月，史達林在《共團青年真理報》（*Pravda*）上發表一篇〈十月革命與民族問題〉，以「十月革命的國際意義」做爲結論，這個宣言永遠改變了全世界被殖民國家的政治去權（disempowerment）。史達林寫道：

- （一）十月革命擴大了民族問題的視野，將它從對抗民族壓迫的特殊問題，轉變成解放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一般問題。
- （二）十月革命打開了寬廣的可能性，爲達成解放的目標開出一條合適的道路，也因此對西方和東方被壓迫民族的解放目標有極大的幫助，引導它們共同以這種勝利的鬥爭管道對抗帝國主義。
- （三）十月革命已經因此在社會主義的西方和被奴役的東方之間建立一道橋樑，創造對抗世界帝國主義的一個新革命陣線，從西方的無產階級延伸，經過俄國革命，延伸到東方的被壓迫民族（Stalin 1936: 76）。

## 10.

## 第三國際到東方民族的巴庫會議

## 一、「第三國際」的形成

對國際主義的堅定信念促使列寧著手整理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中有關民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的議題，以及其中對自決權利的肯定。就在俄國革命之後，他有了時間和精力籌組「第三國際」，也就是「共產國際」，或者眾所周知的 Comintern——一個爲了世界革命而成立的組織。其實在「第二國際」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產生派系分裂之後，列寧在1914年9月就曾首度召開會議。中西歐和中亞爆發革命之後，許多共產黨派紛紛成立，鼓舞了處於困境的布爾什維克黨，在1918年秋天嘗試將這些萌芽的革命力量組織成一個新的國際力量。12月，大型的國際會議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Petrograd）舉行。彼得格勒的會議由社會主義小說家高爾基（Maxim Gorky）擔任主席，與會者包括來自印度，伊朗和中亞，還有來自英國和美國但因支持蘇維埃革命政府而被捕的士兵（Riddell 1986b: 436-437; New York State Legislature, 1920: 1; I: 421-458）。

「共產國際第一次世界大會」，以團結「世界上無產階級之革命黨派，藉此促進並加速全世界共產革命的勝利」爲號召，於四個月後，也就是1919年3月召開（Trotsky 1945, I: 19）。由於「同盟國」的阻撓，39個受邀的共產黨派和革命社會主義團體的許多代表無法出席——只有九個來自歐洲的共產黨派代表順利與會。在這些歐洲黨派中，有資格參加的愛爾蘭團體是康納利的「愛爾蘭社會共和黨」（Irish Social Republican Party）以及「愛爾蘭運輸及一般工人聯盟」（Irish Transport and General Workers' Union）；而歐洲以外正式被邀請的，只有美國、澳洲和日本的團體。但是其他42個代表中有一些是來自殖民地，但已經身在蘇俄的行動派分子。不像「第二國際」，或者「洛桑會議」，只有那些以革命爲目的，而以不是改革爲宗旨的社會主義團體才有資格參加。那是一種過度的干預，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因此分裂爲二，雖然後來有許多以團結爲號召的「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s），還是無法挽回分裂的局面（McDermott and Agnew 1996: 12-13）。這在歐洲所帶來的後果就是許多共產黨派被邊緣化。但是在統治者更加不肯妥協的殖民地，這樣的分裂鼓舞改革派運動從尋求自治或者在宗主國中心爭取更大的代表性，轉變爲民族解放

的革命軍隊。

「第一次大會」主要的焦點還是放在歐洲的事件，尤其是德國的革命情勢，儘管1919年春天「斯巴達克起義」(Sparticist uprising) 譯註<sup>1</sup>失敗，布爾什維克黨卻認為這是他們政治生命延續的關鍵。但是由托洛斯基起草的宣言以「全世界無產階級」為對象，喚起大家注意到「凡爾賽和談」的矛盾：一方面歐洲享有自決權，另一方面殖民地仍舊受到壓迫，這兩者引發的戰事才是世界大戰的主要原因。宣言也強調其中更深一層的矛盾——殖民地的人被徵調為殖民的主人而戰：「印度人、非洲人、阿拉伯人和馬達加斯加人在歐洲領土上打仗——為了誰呢？為了繼續被英國和法國奴役的權利而戰」。宣言中指向愛爾蘭、馬達加斯加、中南半島和其他地方的起義，以及英屬印度的罷工，但其中所稱「殖民地的解放只有在和宗主國的工人階級的解放結合在一起的時候，才有可能發生」，卻也確定了以歐洲的政治為主要考量，殖民革命為附屬的中心原則：帝國主義國家必需先由英國和法國的都市無產階級先加以推翻，以便為「安南 (Annam)、阿爾及爾和孟加拉、以及波斯和亞美尼亞的工人和農人」爭取獨立。到那個時候「社會主義的歐洲將會以其科技、組織、和意識形態的影響力，協助被解放的殖民地，幫助他們轉變到一個有規劃、組織的社會主義經濟」。這個宣言評論道：「即使是現在，在比較開發的殖民地的鬥爭雖然是在民族解放的旗幟底下進行，但是它們很快就會有某種清楚的社會主義特色」(Adler 1980: 31-32)。「**只有在民族解放的旗幟之下**」才能讓一些民族解放的鬥爭不被視為等同於殖民解放，並希望能夠有越來越清楚的階級特色：如何調和民族主義的目標和共產主義目標之間的問題，將變成共產國際大會的辯論核心。

「第三國際」的焦點的確就是討論這個議題。一方面，「共產國際」的歷史就是一片單純的直線進行的歷史，七次會議依序在間隔不等的時日舉行，按照這七次的順序就是它的歷史。但是另一方面，同樣的歷史卻是以不同形式操作，有如向心力和離心力之間永遠的拉扯所產生的張力。來自殖民地的代表一直抗拒接受一個普世共通的標準政治策略，他們要求在政治上承認他們的文化身分，並體認他們在思想傳承上有些基本的差異，甚至極力要求組織另外一個「殖民國際」(Colonial International)。為了達到這樣的目標，他們經常挑戰共產主義的中心；史達林企圖壓制他們，結果反而造成他們脫離共產國際和各地的共產黨，鼓勵選擇其他模式為基礎的立場，如托洛斯基主義 (Trotskyism)，伊斯蘭教，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或者透過在政治上歸屬德國、日本而採取法西斯主義立場。但是，三大洲民族解放革命的第二階段行動中，最具關鍵的時刻就是1949年中國第一次成功的「第三世界」革命。

譯註<sup>1</sup>「斯巴達克斯同盟」在1918年由Rosa Luxemburg和Karl Liebknecht領導，在柏林發動政變。希望德國建立一個蘇維埃式的政黨。1919年1月被鎮壓，領導人被殺。

## 二、第二次大會，1920年7月到8月

「第一次大會」時，歐洲的革命情勢看來相當好：除了德國情勢詭譎，共產黨在法國、德國和義大利迅速成立，其他各地許多不同的社會主義黨派也宣布它們對布爾什維克的支持。不久之後，蘇維埃共和（為其甚短）在匈牙利、巴伐利亞 (Bavaria)、斯洛伐克 (Slovakia) 以及伊朗的吉朗 (Gilan) 成立。到了1920年夏天的第二次大會，領導者如布爾什維克的列寧，季諾維也夫，拉迪克 (Radek) 和托洛斯基體認到，像匈牙利庫恩 (Bela Kún) 的共產政府垮台 (1919年8月被羅馬尼亞軍隊征服) 之類的挫敗之後，歐洲立即革命越來越不可能了。相對於此，紅軍氣勢如虹，成功地抵抗「同盟國」的侵略，甚至打敗波蘭軍隊，將他們逼退回華沙——史達林在1945年從納粹手中解放波蘭時，不會忘記這場侵略譯註<sup>2</sup>。在這樣的情況下，列寧受到薩丹·卡里也夫的鼓勵，把東方國家視為更具有無產階級的革命意義。薩丹·卡里也夫是黨內最高階，也是最有影響力的穆斯林官員，同時在中亞廣受群眾愛戴。在〈社會革命和東方〉(‘Social Revolution and the East’ 1919) 一文中，他主張蘇維埃政府對待東方的政策需要「嚴重的修正」。他精闢地指出，到那時候為止，所謂的「世界革命」其實就是西方的革命，東方完全被忽略，或者只獲得柏拉圖式的支持。他認為：「如果沒有東方的參與，社會主義革命將永遠不會成功」。因為帝國列強在經濟方面倚賴它們在東方的殖民地，因此，他的主張就是：如果列強沒有了東方的殖民地，它們就等於毀了 (Kedourie 1971: 564, 569)。於是，「共產國際」對東方國家和民族越來越重視，視它們為可能的同盟。事實上，許多人後來評論，如果那時沒有穆斯林紅軍軍團，蘇俄不可能打敗白俄羅斯及「協約國」。布爾什維克政府被帝國列強團團包圍住，在這樣的情勢之下，列寧將其對所有國家的無產階級必需團結起來的呼籲，延伸到「所有殖民地和被壓迫民族的所有民族解放運動」，把對抗資本主義的鬥爭擴大到「以蘇維埃的力量戰勝世界帝國主義」(Riddell 1991, I: 285)。如果布爾什維克革命對歐洲工人而言，不但代表勝利，並且將意味持續以戰爭對抗歐洲統治階級，那麼，對東方的工人和農民而言，它所代表的是對抗統治階級的專制和世界帝國主義的雙重壓迫。「在這一次 (第二次) 的大會上」，列寧宣布：

我們目睹雙方慢慢形成一個結盟，一邊是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革命無產階級，一邊是那些沒有無產階級，或者幾乎沒有無產階級的國家，也就是東方國家中被壓迫、被殖民的大眾。要鞏固這個結合必需靠我們自己。當每

譯註<sup>2</sup> 1939年德國納粹和蘇聯紅軍占領波蘭，一直到1945年1月27日，紅軍解放奧斯維新集中營。2月，英美在雅爾達密約中同意將波蘭歸屬蘇聯勢力範圍。

一個國家中被剝削被壓迫的工人掀起革命攻勢，結合數以千百萬計，沒有被紀錄在歷史中的人民——長久只被視為歷史客體的人民——所發動的革命攻勢，如此一來，世界帝國主義就會垮台。(Riddell 1991, I: 123-124)

正如季諾維也夫後來所描述的，「第一次大會」大致上是「一個宣傳的集會」，目標是反抗帝國主義 (Riddell 1993: 49)。而「第二次大會」在許多方面才算是真正創立「第三國際」的會議，主題放在比較激進的計畫：要把一直被當成歷史客體的那些人轉變成革命的主體。隨著攻無不克的國際紅軍進攻華沙，「第二次大會」在一個高漲的氛圍中舉行。會議的兩百名代表來自37個國家，大部分是歐洲國家，但也有來自美國和澳洲，甚至還有三十多名代表分別來自中國、荷屬東印度、印度、伊朗、愛爾蘭、韓國、墨西哥和土耳其。受到列寧的鼓舞，代表們將焦點放在殖民問題，尤其是愛爾蘭和荷屬東印度當時的情勢，這兩處都有非常積極的共產黨在運作。這是第一次來自全世界的反殖民行動派集合在一起，討論一個共同的策略以對抗帝國勢力。在「第二次大會」以及後來的大會上的辯論中，開始出現社會主義的民族運動各種不同立場，包括現在的和未來的都在此時隱然成形，並且第一次將各地因特殊背景狀況而產生的不同要求，放在一個普遍的架構中，共同致力於激進的社會主義政治。這是第一次，發展出一個政治性的論壇，把各地政治關係放在全球的狀況中做辯證性的討論。由此看來，不只是「共產國際」和殖民地關係的詳細始末有待書寫，在「共產國際」不同機制中，來自殖民地的反殖民知識分子政治家們有關殖民議題的見解，有許多充實而廣泛的出版資料也有待研究書寫。有關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反殖民批判的立論，將會因為這樣的研究而有戲劇性的轉變；而且這樣的研究可以證明，特定的殖民情況放在比較大的政治和理論架構的脈絡時，可以如何分析。這樣的分析證明和現在有時受到批判的後殖民研究有很大的關聯；由於歷史和文化的差異，後殖民研究正因為放在這樣大的脈絡中分析而被指責，儼然它是個資訊不靈通、缺乏正當性的創新。其實，這反而顯現後殖民主義有其激進的政治系譜。

在「第二次大會」上，透過列寧和印度的羅伊之間一段著名的辯論，一些直接而基本的理論和政治問題因此更清楚。羅伊有孟加拉革命民族運動的背景，曾經與德國共謀企圖將武器運入印度，後來加入在加州和紐約的印度移民的革命團體。1917年，羅伊在舊金山以「印度謀反案」<sup>譯註3</sup>罪名遭逮捕之後逃離美國，移居墨西哥。羅伊的美籍妻子依芙琳 (Evelyn) 是一名行動派，與紐約「自治權聯盟」(Home Rule League) 的領導人雷依 (Lala Lajpat Rai) 共事多年。依芙琳陪著羅伊

<sup>譯註3</sup> Hindu Conspiracy Case：美國決定與英國同一陣線參戰後，遂與德國為敵，1917年逮捕共謀的印度人和德國人，並在加州受審。當時美國稱羅伊與德國共謀，報紙標題稱他「是一名危險的印度革命分子，德國間諜」。

由墨西哥前往莫斯科，名義上是代表「墨西哥共產黨」(Mexican Communist Party)。事實上墨西哥的激進派自己已經有一個「共產黨」，羅伊為了讓自己符合代表參加「共產國際」的資格，因此他就組了另一個共產黨，此舉也奇妙地預示印度的共產黨將分裂為二 (Overstreet and Windmiller 1959: 25)。羅伊開啓了列寧自己所稱的「一場熱烈的辯論」，針對的問題是：面對殖民地的民族運動，共產主義的立場到底是什麼。他們兩個意見相左的第一個原因是戰術的不同：列寧認為對於殖民地資產階級的民主運動，所有可能的共產主義者都應該給予支持，一起合作，共同對抗帝國主義。這個立場是他在1913年一篇名為〈退步的歐洲和進步的亞洲〉(Backward Europe and Advanced Asia) 的文章中已經詳細說明，他認為和歐洲的情況比較起來，所有亞洲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應該扮演一個更進步的角色：

在亞洲的每一個地方，一股強大的民主運動在成長、蔓延、增強。在亞洲，資產階級仍然和抗拒反動的人民站在一起。數以千百萬計的人民意識到生命、光明和自由的重要。(Lenin 1962: 62)

另一方面，羅伊以其孟加拉革命民族主義的背景，極力反對這種必需和他很鄙夷地稱為辯論團體的「印度國大黨」合作的意見。對一個兩年前才轉向社會主義的人而言，他算是非常有膽識地挑戰列寧主張和資產階級解放運動結合的意願，強調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目標和工農大眾相互衝突，因為前者追求本身的階級利益，而後者要求的是「從各種剝削中解放出來」(Riddell 1991, I: 221)。他認為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是相對地懦弱，因此一開始就應該有一個革命的政黨來引導大眾，才能夠避開民族主義，走向社會革命，並推翻外來的資本主義。他和列寧意見相左的第二個原因是策略的不同，主要是有關亞洲在發展世界革命時的重要性。羅伊修正馬克思對愛爾蘭的立場，認為帝國列強對殖民結構有經濟上的依賴，因此「歐洲革命運動的成敗，完全要看東方革命的過程而定。東方國家的革命若是不能成功，西方的共產運動將一無所成」。而列寧認為西方的成敗「完全」依賴東方的革命，這樣的想法太言過其實了，所以要求羅伊將這個呼籲從他的文章中刪除 (Riddell 1991, II: 848)。再者，雖然印度有無數的農民和無產階級可能成為革命分子，但是列寧切重要地點出印度的共產分子尚且未能成功地建立一個共產黨，這就表示羅伊的策略在實際層面上仍舊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和政治的現實無法連貫 (Carrère d'Encausse and Schram 1969: 152)。最後，列寧和羅伊各退一步，將文章中列寧原本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改成「革命的解放運動」，強調兩者之間和「共產國際」的結合方式將視每一個國家共產主義和解放運動的相對發展而定。

列寧的〈論民族與殖民問題〉和羅伊的〈補述〉('Supplementary Theses')，兩篇合起來十分有說服力，直接表達共產主義對殖民主義結構的觀點和政策。到現

在，這兩篇論文依然是對殖民主義最強而有力的分析，精闢地分析殖民主義所用的各種剝削形式，並指出必需透過全球結盟的鬥爭方式才能將之驅除。正如列寧自己所觀察到的，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觀念就是，「壓迫和被壓迫民族之間的區分」，這是針對過度強調階級對立所做的一個重大的修正（Lenin 1968: 596）。文章最開頭先批判平等的觀念——尤其是民族平等觀念，根本是定位在資產階級的民主，和共產主義所嚮往的物質平等是相對立的。同樣地，兩篇論文堅定主張共產黨不應該以形式的原則考量民族問題，其政策基礎應該「精確地衡量特定的歷史情況，尤其最重要的是經濟方面的情況」。第二，被壓迫階級的利益，以及所謂的「人民」——其實就是統治階級——的利益，兩者之間應該清楚地區分開來。第三，

應該同樣地劃分清楚被壓迫民族和壓迫的民族，前者是無法享受平等權利的、依賴的民族，而後者是剝削他人、享受平等權利的民族。清楚區分這兩者才能對抗資產階級民主的謊言，他們掩藏自己假藉殖民和經濟奴役他人的事實，他們以最富有、最先進的資本國家的狹隘多數，奴役世界上絕大多數的人口。（Riddell 1991, I: 284）

殖民主義將民族不平等化成建制化的系統。在1914至1918年的戰爭中，雙方政府都宣稱自己是為了自由、民族解放和自決而戰；但是「凡爾賽合約」顯示的是它們的目標其實是奪取彼此的殖民地做為戰利品。即使有一些地方正式承認各民族和「少數民族的權利」之間一律平等，戰爭所顯現的就是資本主義國家事實上仍舊不斷破壞這個情況。而對於那些不得享受這種平等待遇者，這兩篇論文明白表示，

「所有共產黨對於不能享受平等的依賴民族（例如愛爾蘭、美國的黑人等）以及殖民地所發動的革命運動，必需給予直接的協助」（Riddell 1991, I: 286）。

這是第一次，有國家宣布其國際政策時，將美國黑人的情況和殖民解放的鬥爭連成同一陣線，公開給予支持。美國黑人的情況將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主要焦點。資本主義國家對內的壓迫，以及它們對外以專制操控被殖民的民族，兩種壓迫之間有許多相符之處，因此兩篇論文主張對抗資本主義的鬥爭和對抗帝國主義的鬥爭不可分割（indissociability），所以結論是：

從這些原則就可以知道，「共產國際」對民族和殖民問題的整個政策基礎，必需以團結所有民族和國家的無產階級和勞苦大眾共同為革命奮鬥，才能推翻地主和資產階級。唯有這樣的統一才能保證可以戰勝資本主義，如果沒有戰勝資本主義，不可能消除民族的壓迫和不平等。（Riddell 1991, I: 285）

從一個全球的觀點來看，壓迫基本上是以階級為基礎，所以對抗壓迫必需以國際主義做為其整體的目標。界定反殖民運動的差異最關鍵的就是：反殖民鬥爭是否應該像資產階級的解放運動一樣，只是以消滅帝國勢力為目標，或者反殖民鬥爭應該被視為一個更廣大鬥爭中的一部分，更大的目標是推翻深植在資本主義，造成民族和個人的不平等與壓迫的根本源由。列寧和羅伊認為對抗帝國主義的戰爭毫無疑問的就是後者。他們認為資產階級的解放運動所「製造出來的國家結構在政治上是獨立的國家，但是在經濟、財政和軍事上完全依賴帝國勢力」（Riddell 1991, I: 289）。換言之，資產階級解放運動只不過是依賴和新殖民主義的序曲。

但是，由於在現階段的殖民地中，資產階級解放運動發展的最為完整，於是產生了列寧和羅伊意見最為相左的問題了：共產黨對非共產黨的解放運動應該採取什麼態度。兩篇論文最後同意採取的立場是，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共產黨應該扮演先鋒的角色，以國際主義對抗民族主義，至於在非資本主義或「比較落後」的國家，「所有共產黨必需以行動支持這些國家的革命解放運動。……『共產國際』應該達成暫時的協議，甚至應該和殖民地以及落後國家的革命運動結盟。但是不能和革命運動合併」（Riddell 1991, I: 288）。羅伊本身認為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運動和革命大眾的運動有絕對的區分，因此對此態度保留，但是有鑑於在1920年的時候，歐洲以外的大多數共產黨充其量尚處於萌芽階段，只好接受這個是實際上唯一可能的策略（Riddell 1991, II: 851-855）。而列寧的立場強調被殖民國家的農民革命，認為其革命的可能性超過無產階級的革命，同時他也認為資產階級的菁英分子在獨立之後有可能扮演壓迫的角色。在許多方面，他這樣的立場預告了戰後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多元路線，以毛澤東在中國的解放為始，對民族解放和社會經濟解放的關係進行激進的重新評估，並且強調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應視各情況之特殊性而加以應用，尤其是有關農民的地位，以及土地的問題（Riddell 1991, I: 214）。相較之下，羅伊拒絕修正馬克思主義對殖民情況，或者說三大洲情況的原則，雖然列寧說，羅伊的觀點主要還是受到他所觀察的印度的情況左右，他的主要焦點仍舊是印度。羅伊對民族主義的憎恨幾乎和他對「外國的宰制」一樣地反感，他強烈反對任何和資產階級組成「聯合陣線」的想法。他宣稱印度已經在工業上充分發展，可以進行歐洲模式的無產階級革命，所以不斷強調「群眾」的革命角色，反而不重視農民革命（Riddell 1991, I: 223; Roy 1922）。羅伊最大的貢獻是他預期到支持地方民族運動的危險，因為各地民族運動的目標只是推翻帝國勢力，這個問題是他本人在中國親身體驗到的。同時他不願意承認各地情況互有差異，他認為如果地方的共產黨不嚴格遵從「共產國際」的路線，只證明它缺乏紀律而已——羅伊將毛澤東形容為「沒有紀律的投機分子」——結果是「中國共產黨」在1927年完全不受「共產國際」的左右（Haithcox 1971）。

### 三、1920年9月「巴庫會議」

雖然列寧沒有像羅伊那樣，認定殖民革命優先於歐洲革命，但是「第二次大會」代表一個決定性的策略行動：布爾什維克積極地和對抗帝國主義的全球性鬥爭站在一條陣線上。最直接的步驟就是在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Tashkent）成立一個「共產國際中亞分部」（Central Asiatic Bureau）。羅伊離開莫斯科前往塔什干的時候，帶著兩火車的武器和金塊，為的是希望能團結流放在該地的印度人成立一個印度解放軍隊，由巴葛（Mohammed Abdur Rabb Barg）和哈莫德（Muzaffar Ahmad）兩人領導，這兩人當初離開印度為的是要參加在塔什干的泛伊斯蘭教「基拉法運動」，後來先在阿富汗首都喀布爾成立一個「印度革命協會」（Indian Revolutionary Association）（Minault 1982）。雖然他們進行了一些包括駕駛訓練，但是羅伊出身上層士紳，屬波羅門階級，穆斯林的遷士們（*muhajirun*）<sup>譯註4</sup>無法接受他成為他們的領導人，而羅伊自己也始終無法創立一個有影響力的革命軍隊。1920年5月20日，列寧寄了一則訊息給「印度革命協會」，在廣播中以英文放送：

我很高興聽到進步的印度人對於自決的原則，以及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有了迅速的回應，要幫助自己從外國和本地資本主義者的剝削中解放。印度人要為自由掀起一場英雄的戰爭。……我們歡迎和穆斯林與非穆斯林緊密結盟。……自由亞洲萬歲！（Lenin 1962: 248）。

135

列寧歡迎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結合，後來證明是太過於樂觀了。

隨著「中亞分部」的成立，「第二次大會」也發出召開特別會議的要求，計畫發展一個共產聯盟，結合中亞的工人和農民共同對抗帝國主義。「東方民族第一次大會」在1920年9月，在當時和現在都是高加索山脈（the Caucasus）石油工業中心的穆斯林的城市——巴庫舉行。「巴庫會議」是反殖民主義歷史中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事件。雖然「同盟國」以及鄰近的亞美尼亞共和國和喬治亞共和國都極盡所能阻撓，還是有超過兩千人抵達巴庫，顯示他們對1920年6月29日莫斯科透過廣播而傳送的要求與會做了最好的回應。這是最早之一——如果不是第一個——利用收音機的科技將共同的反帝國主義訊息，跨越地理上涵蓋許多國家的廣大區域，傳送給以解放為目標的奮鬥者。這個廣播的呼籲以這一段話做結：

希望藉此大會向你們的敵人宣告，無論他們在歐洲和美洲，還是在你們自己的國家，告訴他們奴役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你們起而反抗，你們將會勝利。希望藉此大會向世界的工人們宣告，你們所護衛的是自己的權利，你

<sup>譯註4</sup> 指遷移到麥地那的麥加信徒，被賜予「遷士」*muhajirun*的榮耀稱號。

們要和現在正在對抗所有不公義和剝削的強大革命軍隊結合起來。希望藉此大會為世界上被奴役的千百萬人民帶來力量和信心。希望它灌輸人民自己的力量要有信心。希望它早日帶來最後的勝利和解放。（Riddell 1993: 40）

不像「共產國際」大會，或者早期「東方民族共產組織俄羅斯人大會」（All-Russia Congress of Communist Organizations of the Peoples of the East），這次的會議沒有要求參加者必需是遵行革命社會主義政治，雖然有百分之六十其實是共產黨員。參加的代表大多數來自中亞的穆斯林國家，包括許多來自土耳其和伊朗，以及新蘇維埃的中亞共和國，包括北高加索、亞塞拜然、基瓦（Khiva）。另外還有來自印度、阿富汗、中國、韓國和阿拉伯的代表，以及來自帝國列強的激進派反帝國主義代表，包括英國、法國、德國、荷蘭、美國和日本。不同國家的人民共同承受殖民統治，或者外國勢力不斷的干預，來自這些疆域的行動派，在巴庫齊聚在反帝國主義的共同旗幟下。

這次會議的計畫是要團結被殖民國家的工農和歐洲的無產階級，「為的是反抗共同的敵人」（Riddell 1993: 40）。正如這次會議對各代表所做的呼籲：

近東的工農們！如果你們組織起來，成立屬於自己的工農政府，如果你們自己武裝起來，團結俄國的工農，你們將壓制英國、法國和美國的資本主義，將擺脫這些壓迫者，得到最後的自由。（Riddell 1993: 39）

136

「同盟國」近期在中亞的軍事干預，此時已招致普遍的反感（巴庫本身才剛從土耳其，然後是英國的占領中解放，在被占領時第一個「巴庫蘇維埃」的領導人被立刻處死），再加上「凡爾賽合約」之後英法在中東的帝國控制大肆擴展，因而此次會議很容易就將共同的敵人設定為英國和法國的帝國主義，然後延伸到英國、法國和美國的資本主義。這次大會的主席季諾維也夫回應會議的參加代表時，呼籲要有「一場特別是對抗英國帝國主義的聖戰」。這一點得到非常熱烈的迴響，有些代表甚至延伸到討伐巴勒斯坦的錫安建國主義（Zionist）<sup>譯註5</sup>行動派的聖戰（*Jihad*）（Riddell 1993: 78）。最後的宣言中，洋洋灑灑12頁幾乎完全把焦點放在抵抗英國的帝國主義，以下面的訴求做結：

我們要進行一場聖戰，為了對抗歐洲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最後的堡壘，為了對抗海盜的巢穴，以及由海陸進攻的搶匪，為了對抗長久以來所有東方民族的壓迫者，為了對抗帝國主義的英國！（Riddell 1993: 232）

<sup>譯註5</sup> 錫安建國主義就是猶太民族主義者在巴勒斯坦重建猶太國家的主張。

這樣的激情是時代的產物：蘇維埃在許多先前的俄屬亞洲共和國，如北高加索，亞塞拜然和基瓦，以及吉朗（伊朗）連連戰勝，加上中東的土耳其、伊朗、埃及、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伊拉克）等地反對英法占領的反殖民抗爭不斷，而阿富汗曾迫使英國接受由阿曼努拉（Amanullah Khan）所宣布的獨立，還有紅軍在西邊和南邊的前線節節勝利，逼使團團包圍進逼的「同盟國」撤退，更有印度和中國的群眾反抗運動，這一切代表「巴庫會議」籠罩在勝利的氛圍中。參加的代表完全支持「第二次大會」對解放運動的宣告，表達對蘇聯反抗帝國勢力侵略的認同，聲明「與蘇俄為敵的戰爭就是與東方為敵的戰爭」（Riddell 1993: 143）。馬力亞特吉（Mariátegui）在1923年一次演講中談到他從秘魯的觀察：「東方的國際在這一次會議中奠定了基礎——不是社會主義的國際路線，而是一個獨特的革命和起義的國際路線」（Mariátegui 1996: 38）。

這次會議的主要目標就是：在意識形態上首度凝聚激進路線，然後在政治上結盟，將在帝國壓迫下的工人，還有在蘇俄控制之下的共產黨工農，以及世界上被壓迫的殖民地的工農們聯合起來。在這樣的精神下，季諾維也夫將〈共產黨宣言〉的訴求修正為「所有土地上的工人們，以及世界上所有被壓迫的人民，團結起來！」許多鏗鏘有力而激情的演講都是為了要激發這種團結的情緒，因此演講中經常強調喚醒政治意識，並譴責英國的帝國主義，反而沒有強調有什麼實際的步驟進行革命性的反帝國主義鬥爭。無論如何，在會議中所提出的議題很有實質意義。一個共同的政治情勢——區分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因此建立起來；在蘇俄承諾提供政治和物質協助的聯合計畫宣言中，確定歐洲和美國的革命工人階級，以及被殖民國家的反殖民行動派必須團結起來。「共產國際」要當全球團結的一個支軸，而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的共產黨員的任務就是，在和非共產主義的解放運動合作時，要贏得工人和農民的心，使他們相信共產主義。同時，與會代表一再重申，被殖民社會的立即敵人是當地的上層階級、地主等，他們是殖民勢力的功能操作者，為了自己的利益和特權而剝削人民和農民。因此在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這種普遍性的區分之中，也會有一種國際主義的政治性結合，在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操作。與會的代表因而常常質疑各種形式的民族主義掩蓋內部的階級衝突。大家都體認到，被殖民國家的階級衝突通常不在工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而是在地主、收稅者和負債的農民之間。此次會議積極討論土地問題，並且肯定發展農民革命的必要性，而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因此會議形成一個政治哲學的基本信條，後來毛澤東，隨後還有三大洲的解放運動，紛紛將之付諸實踐。

會議中一致認為東方的革命將有助於推翻西方的資本主義，因為資本主義的基礎就是在東方進行剝削（印度代表巴葛是塔什干「印度革命協會」的主席，曾經是1919年「喀布爾會議」的蘇維埃代表之一，他甚至得寸進尺地宣稱：「印度，只

有印度才是世界上所有嚴重衝突的真正原因。歷史不止一次顯示，印度的自由代表了世界的自由，以及所有戰爭的結束」。不同的代表對會議中「東方」的成員有非常不同的定義，有的認為包括了所有被西方帝國主義所壓迫的民族（布爾什維克他們自己使用此定義），有的認為是泛指亞洲和非洲，而最常被界定的東方就是指亞洲和北非所有國家的結合，雖然這兩者有差異性，但是它們「因為文化中的共同點——伊斯蘭教」而通稱為東方（Riddell 1993: 121, 159）。與會代表們一致同意，東方代表「穆斯林的東方」，其地理涵蓋範圍從穆斯林的非洲延伸到中國的一部分。此次大會確立了伊斯蘭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結盟，也就是薩丹·卡里也夫所持的立場（他參加了「第二次大會」，但沒有參加「巴庫會議」）。早在1917年12月，「人民委員會」會議發出一個由列寧具名的呼籲：「致所有在蘇俄和東方勞動的穆斯林」，要求他們支持被沙皇壓迫而起來革命的穆斯林，其中宣稱：

因此，宣告你們的信仰、風俗、你們的民族和文化的機制是自由而不受侵犯的。自由而不受阻礙地建設你們自己的民族生活。這是你們的權利。  
（Riddell 1993: 251）

138

列寧總是一再強調必須要尊重伊斯蘭文化和信仰；雖然他的〈論民族和殖民問題〉譴責阿富汗尼（Jamal ed-Din al-Afghani）的思想引發泛伊斯蘭運動，但是列寧把這些思想界定為利用反西方帝國主義的解放鬥爭，其實是為土耳其等的帝國主義政權辯護。

同時，史達林也採取步驟將各地區單獨發展、尚在萌芽階段的穆斯林共產組織做一些協調整合。1918年，在史達林的「民族事務人民委員會」的支持下，蘇丹卡里也夫主導建立了一個「蘇聯共產黨穆斯林組織中央局」（Central Bureau of the Muslim Organizations of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通稱為Musburo，主要是在蘇俄共產黨的指導下協調穆斯林的組織活動。同時，蘇丹卡里也夫自己成立一個獨立的「穆斯林共產—社會主義黨」（Muslim Communist-Socialist Party）。同年11月，在莫斯科的一次會議中，史達林強迫蘇丹卡里也夫將該黨變成共產黨的一個穆斯林分支（Bennigsen 1958: 405-406; Carrère d'Encausse 1992: 141）。儘管如此，蘇丹卡里也夫還是繼續透過Musburo鼓吹共產主義應有特定的穆斯林民族主義的形式，將共產主義拓展到對地方性的穆斯林的關懷，這也就是後來在亞洲、非洲和其他地方的三大洲馬克思主義的特色。蘇丹卡里也夫的立場反映了一個事實：在革命之前，在蘇俄的穆斯林政治領袖們都一致認為，伊斯蘭的俄國代表一個團體，也就是自古以來的伊斯蘭烏瑪共同體（umma），雖然在地理上和語言上是分裂的，但它有共同的突厥（Turkic）歷史、文化和宗教傳統。在1917年5月和6月的「泛俄羅斯穆斯林大會」上，只有兩派的意見區分，一派尋求一個統一的政府和政治結構

的穆斯林國家，另一派則主張要建立一個聯邦形式的穆斯林國家。布爾什維克黨參加了這次會議，原本接受一個穆斯林國家的想法，尤其是建立單獨的穆斯林軍隊、政府、甚至黨派，實質上將穆斯林地區視為一個穆斯林國家 (state)。雖然如此，1919年列寧拒絕同意薩丹·卡里也夫的提議成立一個統一的「韃但—巴什基爾共和國」(Tartar-Bashkiria republic)，並下令成立兩個自治國家。但是，在1924年，建立一個統一的伊斯蘭蘇維埃的夢想被史達林粉碎，因為他根據自己在1913年所定的標準，將蘇俄的中亞地區劃分為六個各自獨立的國家。烏瑪共同體就因為各國獨立的文化和政治傳統而分裂了，更重要的是將某一個地方的語言特許為國家語言(和文學)，取代了以往在中亞地區有各種語言，而以阿拉伯話、波斯話和察合台話(Chagatay)為通用語的狀況。這個決定引起各地激烈的反彈；但終究還是冷酷無情地強制實施。蘇丹卡里也夫對建立一個穆斯林國家，以及對建立圖然共和國(Republic of Turan)的夢想等問題，與蘇俄領導的衝突越來越大，於是在1923年被捕入獄，罪名是因為他「民族思想的偏離」，並且被指控和穆斯林保守派游擊反抗運動——「巴斯馬其(Basmachi)叛亂」有關聯——這個逮捕的行動是史達林發動的，但是經過列寧和托洛斯基兩人的同意(Bennigsen and Lemerrcier-Quellejay 1981: 269-275; 1986; Bennigsen and Quellejay 1961; Bennigsen and Wimbush 1979; Carrère d'Encausse and Schram 1969: 183-184; Monteil 1982; Stalin 1936: 173-174; Sultan-Galiev 1984)。蘇丹卡里也夫後來被釋放，其後仍舊致力串連蘇聯所有穆斯林地區，期能設立一個地下的秘密組織網路(Bennigsen and Broxup 1983: 85)。但是，在1928年一場針對穆斯林共和國的大規模整肅，矛頭對準穆斯林領導和知識分子，蘇丹卡里也夫再次被逮捕，和許多其他泛伊斯蘭／突厥領袖們一樣，終於在1937年被處決。雖然針對另一種路線施加壓力主要是指向泛伊斯蘭主義，但這種策略也用在對付泛亞洲運動。參加「第二次大會」的韓國代表朴鎮淳(Pak Chin-sun)，以〈革命的東方，與共產國際的接續任務〉(The Revolutionary East and the Next Task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肯定結合民族主義元素的政策，在1922年他被解除了「共產國際」的職位。

相比之下，列寧迫切要求原則上的彈性，也就是將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引介到各地時，需因應特定文化的特殊性，這一點成了「巴庫會議」的基本理念，後來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解放運動中，和馬克思民族主義一起再度出現。在「第二次大會」時，列寧的彈性表現在策略層面的區隔，把對資本主義的共產政策，以及對主要是土地殖民或半殖民國家的共產政策分開來。「共產國際」的成員採用列寧的立場做為「共產國際」的一般政策，然後在1919年庫恩在匈牙利的蘇維埃共和國失敗之後開始發展，並在《「左翼」共產主義——未成熟期的失序》('Left-Wing' Communism — An Infantile Disorder, 1920)詳加闡述。列寧的立場就是把布爾什維

克的模式變成普世共通的模式，黨——不是工人的蘇維埃——才是革命先鋒的關鍵。但是，對於那些所謂的「落後」國家，還沒有都市的無產階級的存在，列寧反而認為組織農民的蘇維埃具有絕對的重要性，可以在和黨維持比較鬆散的關係下運作(Lenin 1968: 514-515, 598)。這個概念其實早在「第一次大會」時，在托洛斯基起草的〈對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宣言〉中隱然可預見，此宣言肯定蘇維埃人民、工人和農會，都是革命干預的能動者(agents)(Adler 1980: 33; McDermott and Agnew 1966: 13-16; Riddell 1993: 162)。在「巴庫會議」上，代表們熱烈地談論農民的蘇維埃所具有的革命力量，相較之下，反而對黨的地位興趣缺缺。而且，儘管在正式的強調中譴責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在實際作為上，大多數的成員都像薩丹·卡里也夫，採取某種的民族主義，將被壓迫和被剝削的民族納入更大的國際團結的脈絡中。



## 11.

## 婦女國際，第三國際和第四國際

## 一、各次國際和共產婦女運動

社會主義運動和婦女運動之間一直有種相似性，但毋寧說兩者意識形態方面更為一致。尤其在1905年之後，社會主義的婦女運動一直對抗資產階級的婦女運動，強調社會主義的必要性，認為社會路線才是順利解決婦女鬥爭的關鍵。1913年，布爾什維克黨員在俄國組織第一次的「國際婦女節」(International Women's Day)；次年他們開辦一個婦女報紙，由工廠的女工出資，並且負責發行。阿曼德(Inessa Armand)、柯崙泰(Aleksandra Kollontai)和蔡特金(Clara Zetkin)，和布爾什維克領導們負責籌畫反戰的「社會主義婦女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ocialist Women)，在1915年在柏林舉行，並積極構思撰寫「勞動婦女」宣言，並開始發送(Riddell 1986a: 267-279)。但是，此次會議的成員拒絕了布爾什維克提議譴責「第二國際」，以及它所呼籲的進行革命鬥爭以對抗戰爭。

1917年3月8日，推翻沙皇的起義以「國際婦女節」的示威做為開端。有了順利的開端之後，布爾什維克將婦女的平等列入革命政府的優先事項中。「共產國際第一次大會」通過決議，「需要喚醒最廣大的無產階級婦女的階級意識」。執行委員會適時設立了一個「國際婦女秘書處」，做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由蔡特金擔任秘書長。該秘書處後來召開「第一次國際勞動婦女大會」，與「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同時舉行。來自20個國家大約有24名代表參與，最有名的除了蔡特金之外，還有柯崙泰和潘赫絲特(Sylvia Pankhurst)。被該會採用的〈致全世界工人婦女〉中，認定共產主義的目標和婦女的利益基本上相同，尤其是有關主張婦女本身的政治選舉權。當時許多歐洲國家和美國婦女雖有參政權，但是仍然不足以保障她們所有的利益：「他們丟給我們一塊難以下嚥的小麵包，一根小骨頭，就像他們給予女性的投票權。即使到現在，世界上仍舊有超過一半的婦女還沒有享受到平等的政治權利。在資本主義之下，婦女永遠不可能有平等的權利」(Riddell 1991, II: 973)。宣言中主張，只有共產主義才能剷除婦女「在政治、經濟和精神上的奴役」，能夠組織公共的托育，能夠讓大家免於貧窮和戰爭。宣言最後以一個特別、但是有一點模糊的對「東方民族」的呼籲做結束，呼籲東方的婦女起來為終結奴役而奮鬥，但這個訴求並沒有用性別用語來定義。在此時刻，秘書處對這一點顯然十

分謹慎，提出的是終結東方男性的剝削以及西方帝國主義的剝削。無論如何，該次大會採用的〈論共產主義婦女運動〉(These for the Communist Women's Movement)不但令人印象深刻，而且明確多了，包含一個特別的小節，專為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婦女而寫的。在此，女性的自由和平等被列為優先，先於為了共產主義而和男性合作：

- (1) 打破束縛女性的各種偏見、道德和實際作為，以及宗教和法律上的規則，這一切導致婦女在家庭、工作和性方面淪為男性的奴隸。為達此目標，需要教育的不只是婦女，還有男性也需要教育。
- (2) 在教育、家庭和公共生活上，婦女要奮鬥以爭取完全的法律平等。  
(Riddell 1991, II: 992)

反諷的是，這項平等的要求在當年後來舉行的「巴庫會議」上被置之不理，因為當時議程和主席團由男性主導。為了對穆斯林的規矩表示尊重，當時男性和女性分開就座，女性被安置在陽台，真正被邊緣化了。但是在第五場會議時，季諾維也夫為了回應來自55名女性成員所施的壓力，他提議「為了強調大會的宗旨，並加速解放東方婦女」，參加成員應該選出三名女性進入主席團〔來自達吉斯坦的巴魯琪(Baluch)，來自土耳其的哈努曼(Najiye Hanum)，以及來自亞塞拜然的紗巴諾娃(Shabanova)]。哈努曼起身答謝大家的熱烈支持時，她的言論得到熱烈的掌聲，聽眾鼓掌良久。她當時的講詞是大會少數幾個沒有被翻譯的演說，也因此沒有被記錄在議程記錄中，這毫無疑問有其緣由。但是她在最後一次會議上的演講由紗巴諾娃翻譯，記錄就保留下來了。哈努曼主張婦女運動的完整性必需要將東方婦女的運動當成「全世界革命運動中，一個關鍵而必要的結果」，同時，也是它成功的重要元素。她認為東方婦女絕對不會像「膚淺」的資產階級女性主義者，只是為了爭取不要戴面罩之類的權利而奮鬥，她認為這一個議題應該放在最後的順序。哈努曼認為女性對抗的是穆斯林國家婦女所受的不公平待遇，她們所尋求的是絕對的平等，這是一個無階級之分的社會最基本的要求。哈努曼認為東方的婦女毫無疑問地忍受雙重壓迫，一方面被資產階級和上層階級壓迫，同時也被「她們的男人的專制」所壓迫。因此如果必要的話，婦女要對兩者宣戰，就如她所言，不惜掀起「一場血淋淋的生死奮戰，以武力贏取我們的勝利」。哈努曼提出的要求包括完全平等的權利，有教育、工作與婚姻管道，廢除一夫多妻制，建立婦女委員會以爭取婦女權利並保護女性。哈努曼宣稱她相信婦女絕對有權利提出這些要求，並且肯定共產主義，因為只有共產主義者完全瞭解這些要求：「共產主義者體認到我們婦女有相同的權利，於是對我們伸出手，我們女性要證明給他們看，我們是他們最忠實的同志」(Riddell 1993: 204-207)。哈努曼和緊接著發言的土耳其斯坦的碧必娜

(Bibinur) 在這些言論中都很明確地表示，婦女應該擁有這些權利，這是不辯自明的，是屬於她們自主的領域。而婦女和共產主義的結盟是因為只有共產主義體認到女性的壓迫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壓迫形式之一，並肯定女性的解放是共產黨尋求普世平等中重要的一部分。婦女的解放，以及性別關係的重新銘刻(reinscription)，是共產主義諸多目標的一個基礎。去除階級觀念和消除男尊女卑的階級概念，以及消除壓迫國家和被壓迫國家之間的你尊我卑的階級之分，這之間絕對有其密不可分的連帶關聯。哈努曼的講詞除了鏗鏘有力之外，還有一個重大的貢獻：她這場演講在1920年，也就是凱末爾(Mustafa Kemal)成立土耳其共和國的三年之前，她激進的女性主義帶給當代土耳其的女性主義非常不同的面貌；以往她們的觀點侷限在伊斯蘭、土耳其民族主義者所設定的範圍中。之後，凱末爾「由上而下」強制將這樣的民族主義觀點當做他偉大的現代化擘畫中的一部分。

「巴庫會議」的成員同時也體認到，種族壓迫基本上是帝國意識形態的表徵。美國的代表李德(John Reed)，也就是《撼動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的作者，提醒他們種族壓迫在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另一種形式的階級壓迫，尤其是在美國的非裔美國人(Riddell 1993: 273-275, 133-134)。共產主義是第一個，也是唯一的政治理念，意識到這些不同形式的宰制和剝削之間有其內在的關聯，而且必須消除所有的壓迫才是成功實現各種解放最根本的基礎。光是消除其中一種壓迫的形式，不會對其他的壓迫性宰制的持續造成影響。因此，在政治上對抗壓迫必須涵蓋所有以各種形式呈現的階層化權力與剝削的同時論爭。在強調這種相互關係時，參加「巴庫會議」的女性代表的重點，和後來在「第三次大會」的綱要所描述的立場有一點微妙但重大的不同。「第二次共產婦女國際大會」指出，「對全世界勞動婦女而言，她們要從幾個世紀以來的奴役、沒有權利、不平等中解放出來，只有透過共產主義的成功才有可能」。這當然就是意謂著婦女第一優先要做的必需是「堅定地從事革命的階級鬥爭」。因此，就像反帝國主義，共產婦女運動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把她們的政治要求列為次要，在面對「婦女大眾根深蒂固的被動性和政治的落後時」，必需教育她們，讓她們知道她們的階級有更崇高的共同目標。「共產國際」一再肯定爭取婦女平等的訴求，一直強調婦女在政治上所代表的意義，但是反對在黨中成立單獨的婦女協會，也反對婦女組織的自主性和一切意涵。它的目標就界定在「以共產主義的思想，教育廣大的勞動婦女，把她們帶進蘇維埃的鬥爭力量中，一起建立蘇維埃工人的共和國」。對那些被描述成「經濟落後的國家(東方)」，首要工作就是由共產黨和勞動婦女部門負起責任，確定每一個人都體認到婦女具有平等的權利，而且婦女平等的原則必需帶入家庭和公共生活的領域。除了這一點，它認為透過教育婦女對「一般文化水準的提升」，以及透過「自我活動(self-activity)的解放」，就可以「消除她們對自己能力的疑慮，將她們引進建

設或鬥爭領域的實際工作中」。婦女的解放要和提昇階級意識結合起來，以階級的基礎實現婦女的解放。「各部門必需告訴婦女，女性主義者無法解決女性解放的問題」(Adler 1980: 212-225)。因此，婦女的解放和被殖民者的解放在結構上並沒有相連結，兩者是因為國際無產階級團結在一起的目標才有了連結。雖然共產黨以一種保護心態認定婦女大眾在意識形態上被奴役，如果沒有黨的領導就無法進行她們的解放，但是事實上，共產黨對致力於婦女平等的心力一貫而徹底。毫無疑問的，無論在當時來看，或者從那時候以後，這都是其他政治黨派無法望其項背的。

## 二、1921年6月到7月，「國際共產第三次大會」

「巴庫會議」的決議之一就是建立一個持續運作的「宣傳行動部」(Council for Propaganda and Action)。這個組織很快地就開始訓練行動分子，並且以各種亞洲語言出版宣傳手冊，趁機利用「巴庫會議」在東方所造成的震撼。1921年，蘇聯和阿富汗簽署一份協定，呼籲「解放東方民族」。但是，同一年，蘇聯也和波蘭、英國政府簽下商業協議。英國政府看到「巴庫會議」的一些報告心生警惕，因此在協議加了一個條款：俄國政府停止所有可能威脅到大英帝國的宣傳，尤其在亞洲的宣傳。從此蘇聯開啓了惡名昭彰的雙重政策，一方面由「外交人民委員會」和外國的列強進行外交協商，另一方面「共產國際」同時致力於推翻這些政府(Hudson 1971: 81)。就在簽署商業協議的同一個月，「共產國際」藉著在德國挑起武裝起義，開始不顧一切地擴大在歐洲的革命，但是很快地被「國家防衛軍」(Reichswehr) 打敗；諷刺的是，打敗他們的防衛軍是由紅軍秘密訓練出來的；這場戰役中，無論是工人的性命或者是德國共產黨都付出了非常大的代價。蘇聯這樣的雙重政策凸顯了東方民族運動的問題，這些問題也就是羅伊早就預料到的。在土耳其，凱末爾在1920年建立了一個革命的國民政府，俄國政府基於歐洲工人和亞非民族之間的反帝國主義而支持他。1921年1月，凱末爾鎮壓曾經是他盟友的農民游擊隊——「綠軍」；另外，他還將土耳其共產黨17名領導人處死；此外，許多曾經參加過「巴庫會議」的土耳其人被逮捕處決(Samim 1981)。雖然「第三次大會」針對處決發表反對聲明，但是拉狄克呼籲土耳其共產黨繼續支持國民政府，凸顯俄國政府矛盾的立場(Adler 1980: 318-320; Carrère d'Encausse and Schram 1969: 193-194)。身為秘書長的拉狄克和主席季諾維也夫合作，利用主席的地位，將他們兩人都隸屬的「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政策強加在「共產國際」上；透過這兩人個人合作，聯手將兩個理論上是各自獨立的政治實體實際結合在一起。「第三次大會」的政策因而開始主導「共產國際」關注事項的優先順位，一直到它在1943年解散(「同盟國」還能夠說服史達林將之廢除的時候)，這個主導的政策

144

就是以現實政治(*real-politik*)的要求為蘇聯辯護，而且為了尋求蘇聯的利益，俄國國際政策從世界革命轉變成需要包容西方列強。

土耳其的事件代表「第三次大會」所碰到的情況迥異於「巴庫會議」。前一年秋天在德國和義大利的革命運動失敗，「第三次大會」面對的是鞏固的資本主義瀰漫著自保和妥協的氛圍。「共產國際」以前以國際性的攻勢為優先，現已變成盡所有力量維護布爾什維克勢力，並且將共產黨的組織中央集權化(Adler 1980: xxviii, 234-260; Carr 1966, III: 383-397)。雖然托洛斯基本來在他起草的論文中肯定「在今日，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人民革命運動同樣是世界勞動人民革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像無論在舊世界還是在新世界中的資本國家，無產階級的起義不可或缺」，但是在實際上，有損大英帝國利益的任何決議都沒有通過，托洛斯基和季諾維也夫兩人都貶抑東方在革命中的意義(Adler 1980: 194; d'Encausse and Schram 1969: 41-42)。這和「巴庫會議」一面倒地強調東方革命的重要性成了強烈的對比。「第三次大會」中殖民問題被安排到會議的最後一天，而且限制代表發言時間不得超過五分鐘。羅伊和其他人反對以這樣突如其來而且專斷的方式「肅清」東方問題，但是大會和完全由西方國家代表所組成的執行委員會卻置之不理(Collotti Pischel and Tobertazzi 1968: 62; Carrère d'Encausse and Schram 1969: 187)。

## 三、1922年11月到12月，「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

對照之下，在「第四次大會」之前，蘇聯和英國之間的關係已經惡化，也就是說再也沒有什麼理由限制「共產國際」反對英國帝國主義的一些活動了。除此原因，中國情勢的發展使得大會將焦點轉向殖民問題，這個轉變在1922年初所召開的「遠東勞動人民大會」(Congress of the Toilers of the Far East 1920)可以看出。面對在歐洲崛起的法西斯運動，「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在「政治局」(Politburo)的倡議之後，擬採用列寧和托洛斯基偏愛的新「聯合陣線」的策略。雖然歐洲政各地共產黨強烈抵制，質疑「共產國際」突然改變原本的政策，將改革派從革命社會主義運動中分離，但這個政策改變主導了整個「第四次大會」。事實上，從「第二次大會」以來，政策就已經走向和激進的資產階級黨派妥協，這也是羅伊所一直駁斥的手法。因此，「第四次大會」將東方的政策有效地拓展到西方。無論如何，有一個關鍵性的差異仍舊存在：「聯合陣線」的政策只是策略性的，好讓在西方的共產黨穩居更大的左派運動領導地位，但是在實質上共產黨在殖民地並不存在，因此殖民地不適合立刻轉向社會主義，這漸漸成為主導的觀念；民族解放運動因此只被看成是社會主義的第一階段，在後來階段的獨立和完全工業化之後，才走向社會主義。這也就是說第一優先的應該是協助任何一種民族運動，如土耳其，因為民族運

145

動的反殖民主義對西方帝國勢力有比較大的政治影響。相較之下，來自殖民地國家的「共產國際」代表有的主張社會主義對以農民為主的土地經濟是可能的，不需要經過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整個過程，例如蘇聯本身；有的代表則像羅伊一樣比較樂觀地宣稱，像印度一類的殖民地國家已經工業化，已經有實質上的無產階級可成為立即革命的潛力。但是拉狄克質疑羅伊的觀點，他提醒大家注意到羅伊在印度發展共產主義沒有成功，同時也特別強調「執行委員會」的態度：「如果我們同志抱怨我們對他們的工作興趣缺缺，我必需回答說，一個黨所被激發的興趣完全看它的行動而定」（Carrère d'Encausse and Schram 1969: 194）。

正如拉狄克這個惱火的回應所顯示的，「第四次大會」最著名的是它扣連不同的立場，一邊是來自被殖民國家的代表所採取的立場，一邊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所發展出來的策略性路線。在史達林正式強制普遍實行此政策之前，「共產國際」就已經有由上而下實踐的共產主義形式，和由「下」而取得訊息是一個對比。在「第四次大會」中，歐洲對穆斯林的觀點，以及諸如荷屬東印度共產黨領袖陳馬六甲（Tan Malaka）所持的穆斯林社會主義觀點之間，明顯有一種緊張關係。列寧在「第二次大會」時和羅伊的討論中曾經鼓吹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合作，但是在羅伊的壓力之下，同意加以限定，將諸如泛伊斯蘭主義的反動民族運動排除在外。相較之下，陳馬六甲在「第四次大會」主張必須將革命的社會主義調整，因應東方國家特殊的文化狀況，尤其是伊斯蘭國家，因為伊斯蘭教對一般東方人民有基根本的意義。既然以泛伊斯蘭主義為中心的民族鬥爭是反帝國主義，他認為這樣的民族運動在實際上是進步的。陳馬六甲因為「伊斯蘭聯盟」（Islamic League）在爪哇引起廣大共鳴的特殊經驗有感而發。他自己的共產黨和「伊斯蘭聯盟」共同合作，一直到1921年才分裂，有部分的原因是「第二次大會」對泛伊斯蘭教的譴責。他強力批評大會誤解東方泛伊斯蘭教的本質，認為它不應該被貶為反動運動：

泛伊斯蘭主義到底是什麼意思？以前它有一個歷史的意涵，也就是伊斯蘭教要以手中之劍要征服全世界。……現在泛伊斯蘭主義的意涵事實上已經非常不同了。它也是民族解放運動的鬥爭，因為伊斯蘭對穆斯林而言代表了一切，不只是宗教，也是他們的國家，他們的經濟，他們的養分和一切。因此，泛伊斯蘭主義現在代表的是所有穆斯林民族之間的同胞情誼，而解放鬥爭不只是阿拉伯人的解放鬥爭，也是印度和爪哇人民，以及所有被壓迫的穆斯林民族的解放鬥爭。現在，這樣的同胞情誼代表一種解放鬥爭，不只是對抗荷蘭資本主義，而且也對抗英國、法國和義大利的資本主義，以及全世界的資本主義。這就是今日泛伊斯蘭主義對殖民地被壓迫民族中的印度群島所代表的意義。就是在這樣的脈絡下，他們秘密地傳播，

把它當成是對抗世界各種帝國勢力的鬥爭。現在，我們所有的人都有一個新任務。就像我們都希望能夠做民族戰爭的後盾，我們也要期許自己當解放戰爭的後盾，支持2億5,000萬極端主動、極端善戰的穆斯林對抗帝國列強。（Carrère d'Encausse and Schram 1969: 189-190）

「共產國際」不為所動：大會之後五個月，穆斯林民族主義者蘇丹卡里耶夫被逮捕。1926年陳馬六甲在爪哇和蘇門達臘（Sumatra）組反叛團體，一直到1927年被荷蘭強力鎮壓。當時陳馬六甲自己被「共產國際」譴責並開除，之後，他經常被形容成托洛斯基派（Trotskyist），仍繼續積極從事獨立鬥爭，籌組了「無產階級黨」（Murba），他為此所付出的代價就是在1949年被新的印尼共和政府處死（Kahin 1952; McVey 1965; Törnquist 1984）。

雖然列寧主張以感性體會穆斯林的信仰，而且蘇丹卡里耶夫短暫性地受到史達林的激勵，想要在策略上為布爾什維克和分離的穆斯林國家搭起橋樑，但是「共產國際」本身從來沒有展現任何真正想要和伊斯蘭民族主義者結盟的興趣。但「共產國際」同時仍舊致力於吸引穆斯林國家，小心翼翼不要以種族主義的態度對待被殖民者。比方說，有一封來自阿爾及利亞的塞底貝爾艾伯斯（Dibi-bel-Abbes）的信就引起許多批判性的討論。該信抗議「共產國際」對法屬北非穆斯林的指控（他們被形容為法國資本主義的「殖民奴隸」），說他們被禁錮在退步的「穆斯林的封建主義」中，尤其是被自己一些支持民族主義的宗教領袖和地主所剝削（Carrère d'Encausse and Schram 1969: 197）。雖然被大會直言無諱地譴責，但是「阿爾及利亞共產黨」認為穆斯林抗拒進步的思想，反而認為需要依賴「法國共產黨」成功地在北非建立共產黨，所以提議訂定政策不讓殖民地獨立，他們主張以這個政策做為「阿爾及利亞共產黨」的實際政策，一直到阿爾及利亞革命（Adler 1980: 354）。例如在1937年，「阿爾及利亞共產黨」認為被壓迫民族的利益繫於他們和法國聯合，所以支持以改革殖民地為名，惡名昭彰的「布魯姆—維奧萊（Blum-Violette）法案」<sup>譯註1</sup>（Munck 1986: 95）。帝國內的共產黨以及殖民地革命之間的利益衝突，因為「共產國際」本身依賴英法兩國的共產黨在兩國殖民地組織反殖民革命而更加惡化。但是「法國共產黨」在突尼斯（Tunis）設立分支，並支持1924至1925年在北非民族主義者的「里夫叛變」（Rif Revolt），以及1925至1926年在敘利亞對抗法國帝國主義的起義（Rodinson 1979: 88）。羅伊無法成功地在印度建立一個有效的共產黨之後，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之下，大英帝國派遣代表團在1927年和1928年到加爾各答。但是，幾乎沒有什麼成效（Spartt 1955）。

譯註1 法國總理Leon Blum和阿爾及利亞前總督Maurice Violette提議，讓2.5萬名阿爾及利亞人在不放棄穆斯林身分的情況下，歸化為法國公民。該提案主要著眼於法國的同化政策，宣稱其目的是教育阿爾及利亞人，後被議會否決。

有關新的一套草案〈論東方問題〉(‘Theses on the Eastern Question’)在大會上引起辯論，羅伊、陳馬六甲等人對共產運動和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有不同的看法。相較之下，陳馬六甲強力支持兩者結合，而出身婆羅門階級的羅伊對於結合布爾什維克主義與穆斯林的目標十分不屑：他將「巴庫會議」斥為「任意浪費時間、精力和物質資源」(Roy 1954: 98)。他堅持自己在「第二次大會」中的立場，也就是在民族解放和革命運動之間，必需截然劃分清楚。他在這次大會強調所謂的「殖民和半殖民國家」的社會發展的有其多樣性，藉以說服「共產國際」。羅伊將東方國家分成三類：一類是資本主義已經相對發展的國家(印度、中國)；另外一類是開始發展資本主義，但仍處相對低程度的國家，因此仍由封建主義主導，在此情況下，資產階級有「客觀的革命性」，確實可成為「革命的先鋒」(土耳其)；還有一類是「主要還是處在原始情況中的國家，仍然由封建的父權制度管轄的社會」。羅伊堅持，革命的策略必需根據主導該社會的不同結構而有所調整。他對第三類的封建社會沒有什麼著墨，但是對於第一類資本主義已經相對發展的國家，他認為民族主義的資產階級已經和帝國勢力結合一起對付無產階級和農民：「因為這個原因，千百萬人民渴望民族解放，他們必需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把自己從帝國主義中解放出來才可能進步。因此，這些地方的民族革命運動不可能在資產階級的帶領之下成功」(Gruber 1974: 302, 299, 305; Carrère d’Encausse and Schram 1969: 190-191)。在實際作法方面，羅伊依照「共產國際」的「聯合陣線」政策，但是都沒有成功〔同一個月在迦耶(Gaya)舉行的「印度國大黨」會議時，羽翼未豐的「印度共產黨」慘遭修理〕。羅伊持續以同樣的主張嘗試要改變「共產國際」的政策，但是到了「第五次大會」時，他被擁護「共產國際」官方路線的曼努伊斯基(Manuilsky)譴責，他的位置也被正式解除(Carrère d’Encausse and Schram 1969: 44; Gruber 1974: 316-319; Overstreet and Windmiller 1959: 44)。羅伊的主張——「殖民地有一種雙重的鬥爭，反抗的對象一則指向外來的帝國主義，一則指向直接或間接支持外來帝國主義者的本地上層階級」——最後在1928年的「第六次大會」中終於被接納，當時「聯合陣線」的策略轉向「階級對抗階級」，而甘地被斥為「英國帝國主義的主要代理人」(Gruber 1974: 303; Munck 1986: 94)。反諷的是，「共產國際」在那時候已經對羅伊失去耐性，認為他還沒有能組織一個他所鼓吹的無產階級的民眾黨——已經到了1934年了，距離他當年第一次挑戰列寧的政策，針對是否可能在殖民地組無產階級民眾黨而激辯時，已經過了14年，而印度共產黨也不過有150名成員。其實羅伊是迫不得已，他大部分的工作只能在海外指揮，也因此他的活動被英國情報局有效地牽制(Overstreet and Windmiller 1959: 62, 357)。1927年，羅伊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分被派到中國，主要目的是對「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表示支持。這份差事其實有部分是故意不想讓羅伊干涉印度的共產活動，藉機

幫助「英國共產黨」掌控「印度共產黨」。這個策略收到反效果，因為羅伊將史達林的秘密——計畫重組「國民黨」，並且展開農民革命——洩漏給汪精衛，而汪又把消息轉告蔣介石。他們立刻加強鎮壓農民運動，並且開除武漢政府中的共產黨員；所有中國的主要勢力因此聯合起來對抗共產黨(McDermott and Agnew 1996: 175-177; North and Eudin 1977; Roy 1938)。羅伊被召回莫斯科，並且在1929年被「共產國際」開除。

但是，在1922年，這還不是「共產國際」的態度。當時許多的注意力都必需集中在「聯合陣線」的新政策所代表的策略意涵，所以大會不得不發展一套新的〈論東方問題〉。這些論文清楚地定義「共產國際」的新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在辯論時各方所提立場使論文的語氣頗具彈性。雖然他們以一般的角度形容「印度、美索不達米亞、埃及、摩洛哥、中國和韓國等地的民族革命運動，像旋風一樣地成長」，但是這是第一次承認不同殖民地的革命運動有其「極大的多樣性」，而且提到各個殖民地某個特殊的鬥爭時刻運用不同手段的可能性，兩篇文章所用的語言反映出羅伊和陳馬六甲兩人不同的立場，同時也可看出美國、加拿大和澳洲基於「種族仇視」所設立的移民限制法和殖民問題之間的關係(Adler 1980: 417-418)。文中有一整個小節討論如何將殖民地土地改革問題以及飢荒當成校準器，以調整社會生產。論文中同時也注意到在封建或半封建社會，資產階級的民族解放運動為了自己的利益，如何對土地重新分配的關鍵問題採取躲避或妥協的態度，因而譴責「印度所採用的消極抵抗策略(「不合作」)——對甘地的譴責完全反映了羅伊本人的立場(Adler 1980: 412)。就像許多孟加拉人一樣，羅伊仇視甘地；他對甘地於1920年停止不合作運動深感憤怒。雖然大會論文在結束時，肯定發展所有反殖民解放運動的聯合陣線需要有一個權宜的政策，論文中還是提出警告：由各地的統治階級代表協商出來的形式上的獨立，可能只是讓殖民地原地踏步，停留在原來的地位，變成「一個半殖民的緩衝國，世界帝國主義的傀儡」(Adler 1980: 416)。

149

#### 四、1924年7月，「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

在一般政策的大原則下，對特殊狀況採取彈性和權宜的方式，像這樣的策略再也沒有出現在「共產國際」的記錄文件中。「第四次大會」是列寧最後一次參加的會議。直到他過世，他還是堅信俄國革命的成功與否和東方革命息息相關。雖然在東方「千百萬被剝削的勞動人民已被欺壓到人類痛苦的極點」，但是在軍事上仍然被西方壓制，因此列寧主張：

終究來說，鬥爭的後果將會依據這個事實而定：蘇俄、印度、中國等占了

全世界人口的絕大部分。在過去這幾年，這個絕大多數的人口已經以超快的速度捲入解放的鬥爭中，因此就這方面而言，世界鬥爭的最後結果將會是什麼，已經是毫無疑問的。由此看來，社會主義全面的勝利是絕對可以充分保證的。（Lenin 1968: 702）

但是在1924年7月的「第五次大會」之前，列寧就過世了。前一年10月德國最後的革命之舉被擊敗。史達林原本除了設立「東方解放同盟」（League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East）之外，並沒有參與「共產國際」的事務；但是就在這個時候，身為「民族事務人民委員」的他，第一次插手「共產國際」的事務，將策略做重大的改變：他計畫將亞洲的民族主義帝國運動團結起來，放在一個共同的反帝國主義聯邦的架構中。列寧和托洛斯基一直以世界革命的角度來思考，將蘇聯的革命視為革命運動的觸媒，可將革命運動跨越邊界，散播到各地。在1915年，列寧曾寫道，社會主義在一個資本國家取得初勝之後，接著「該國勝利的無產階級就會起來對抗其他的世界——資本主義的世界，吸引其他國家的被壓迫階級為此目標而奮鬥」（Lenin 1968: 155）。相較之下，史達林以比較辯證性的觀點來思考資本家的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認為兩股勢力持續鬥爭——預告了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因此，對史達林而言，世界革命的未來端看蘇聯的命運而定，而列寧卻認為蘇聯的命運有賴於世界革命。史達林這個相反的觀念就是他提出「一國社會主義」這個惡名昭彰的政策的基本信念，也就是將「共產國際」的目標變成是協助蘇聯鞏固權力，而不是加強世界革命。雖然他對殖民事務的注意在表面上是加強了，但是暗中卻將焦點改變了，以致於胡志明在他第一次與會時就察覺到必需提醒各代表——以一種比羅伊更加強力的措辭——注意殖民問題的存在（Carrère d'Encausse and Schram 1969: 199-200; Gruber 1974: 308-310）。

史達林積極插手「共產國際」的事務，並且掌控了海外的共產黨領導人，其效應最直接反映在對中國的政策。中國從1919年開始就派代表參加「共產國際」，但是就像日本代表片山潛（Sen Katayama）等人一樣，他們並沒有像陳馬六甲和羅伊和「執行委員會」產生摩擦。「共產國際」最初把在遠東努力的焦點放在日本，因為日本是工業化的國家，可以為革命提供最好的情勢；但是不久日本政府將共產黨列為非法，加以最嚴厲的警察監視和干預，就像印度的情形一樣，使得「共產國際」無法運作（McDermott and Agnew 1966: 159）。但是被世界所有列強瓜分占據，像是一個「半殖民地」的中國，在1911年革命和孫中山在1912年宣布成立中華民國之後，整個情勢一觸即發。中國從1911到1949年的歷史十分複雜，在此無法詳述一些事件曲折的細節（請參閱Brandt, Schwartz and Fairbank 1967; Carrère d'Encausse and Schram 1969; Dirlik 1989; Fairbank 1983; Luk 1990）。中國革命的主

要因素就是黨派之爭：由孫中山所領導的資產階級的「國民黨」，以及一個小型但是具有舉足輕重分量的「中國共產黨」之間的爭鬥。「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陳獨秀本身就具有許多三大洲馬克思主義的特點；他執著於社會主義中一致而民主的形式，對於將馬克思思想融入中國的特殊情勢，陳獨秀有其獨立而彈性的作法，將馬克思主義變成本土形式的政治實踐。雖然他批判「共產國際」，但是他接受1922年「共產國際」由拉狄克倡議的指導原則，進行「聯合陣線」的政策，開始和當時勢力強大的國民黨聯合。「共產國際」基於經濟和社會情勢，很清楚地表示他們相信「國民黨」是中國革命運動的主力。一方面因為「中國共產黨」對此可能性感到不安，一方面因為「中國共產黨」決定以一個獨立個別的政黨繼續存在，有自己明確的社會主義的目標，因此蘇聯也直接和孫中山進行協議，並且派遣了一萬名的「顧問」到中國。「國民黨」認為「中國共產黨」應該服從他們的指揮，但是「中國共產黨」的目標是從內部運作，希望能夠自己掌控黨的機制，這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一直延續。

蘇聯對「國民黨」的影響就是「國民黨」越來越仰賴布爾什維克的軍事訓練，並且將之奉為模式。布爾什維克的政策理論的影響雖然很顯著，但實際並不長久。1925年史達林掌握大權，並掌控「共產國際」政策，孫中山逝世，「國民黨」寧漢分裂，一派由蔣介石領導，另一派則由汪精衛領導（政府設在武漢）。雖然蔣介石有很明顯的行動，如下令逮捕、拘禁所有政治軍事顧問，並且在1926年開除所有黨內居高位的共產黨員，但是「共產國際」還是持續支持蔣介石，罔顧「中國共產黨」對此越來越保留的態度。這大半是史達林面對托洛斯基的反對時所做的堅持（Trotsky 1932）。在1927年4月，蔣介石取得上海——中國主要的國際都市，也是「中國共產黨」勢力最堅強的地方。蔣介石對自己的軍事實力越來越有信心，因此放棄「聯俄容共」的「聯合陣線」政策，在城裡屠殺了數千名共產黨員。但是「共產國際」在史達林的堅持下，仍不願意改變政策，因此在5月時派遣羅伊到中國，督促「中國共產黨」繼續和武漢政府聯合陣線。這個舉動又一次讓「中國共產黨」陷入矛盾，因為「共產黨」對農民承諾的是土地改革和土地國家化，而武漢政府大致上代表的是土地階級，甚至已經特地設立組織專門鎮壓農民的反抗。「中國共產黨」拒絕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查報告》中所提出的土地分配的規劃，毛澤東本人因此被解除「中國共產黨農民部」部長的職位（Mao 1965, I: 23-59）。

正如前文所述，事實上是羅伊——也許是有意地——將史達林改組「國民黨」的計畫洩漏給汪精衛，因此加速了「聯合陣線」策略的瓦解。汪精衛獲得消息後的反應是開除武漢政府中的共產黨員，加強鎮壓農民運動，然後聯合蔣介石，以及反對「中國共產黨」的一些實力強大的軍閥。史達林不顧托洛斯基和季諾維也夫的激烈反對，他不能也不願承認自己政策的錯誤，仍然堅持國共合作。1927年8月，共

產黨部隊暴動，反抗武漢政府；11月，史達林終於不再堅持「聯合陣線」政策，令「中國共產黨」取得它僅剩的都市據點——廣州的控制權。「國民黨」在三天之內以殘忍的手段鎮壓了這次的暴動。

## 五、1928年「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和1935年「共產國際七次大會」

152 對所有人而言，這起暴動顯然就是一樁政治大災難，而「共產國際」在1928年夏天「第六次大會」對此所做的反應是先譴責「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然後才將其「聯合陣線」的策略改變成極左的「階級對階級」的立場。在許多方面，這個「階級對階級」策略是同樣糟糕的政策，因為它對於中國的「國民黨」起不了任何作用，反而鼓勵了德國、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的共產黨去攻擊其他的左派政黨，如此不但促成了法西斯主義的崛起，並且在「共產國際」1935年的「第七次大會」再次改變策略採取新的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時，製造了一種不信任的氛圍。

對殖民地而言，「人民陣線」的策略就是支持近期被詆毀的民族解放運動。1939年史達林和希特勒的協議，以及希特勒1941年侵略俄國，導致「共產國際」突然的政策大逆轉，使得各地共產黨立場各有不同：例如，在印度的「國大黨」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以「殖民者滾離印度」(Quit India)運動的策略對英國施加壓力，而「印度共產黨」卻支持英國戰爭(同樣地，拉丁美洲的共產黨支持美國)。依據史達林「一國社會主義」的原則，「共產國際」的政策淪為蘇聯促進外交利益的工具，而不是為了世界革命。來自莫斯科的指令經常不合各地的情況，但卻毫不留情強制實行。由下列事實可看出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屈服於史達林的原則：1937年以後史達林的清算對象包括了許多對「共產國際」政策最積極參與的人，例如季諾維也夫、拉狄克、庫恩和蘇丹卡里耶夫等人；仍居住在蘇聯的「第二次大會」代表，有三分之二在1930年代末期被處決或者死在監獄(Riddell 1991, I: 9)。史達林不只把焦點放在來自蘇聯的人，數千名來自德國、瑞士、南斯拉夫、波蘭、義大利、匈牙利、保加利亞、奧地利、希臘、土耳其和波羅的海三國的共產黨代表消失了；同樣的事也發生在數千名來自被殖民國家，到蘇聯就讀或者被放逐的人，(包括他們自己和家人)——印度人、伊朗人、韓國人、中國人，以及其他各地的人。這在國外的共產黨員中製造了一種「恐慌的氣氛」。一名當時匈牙利行動派在1938年寫道：「許多外國人在每一天傍晚的時後收拾家當，總以為自己要被逮捕了。還有許多人呈現出半瘋的狀態，因為持續的驚恐而無法工作」(McDermott and Agnew 1996: 149)。當初參加「第二次大會」和「巴庫會議」時高漲的革命情緒，

在面對1937至1938年來自殖民地的共產黨行動派連連在蘇聯被謀殺，已經變成驚慌失措的狀態。在史達林清算時，三大洲的共產黨員被迫害，加上史達林突然的政策大轉變，使得拉丁美洲和亞洲的共產黨被邊緣化，對殖民地共產運動的幻滅也逐漸蔓延，尤其是在對共產運動最積極的亞洲(Ali 1984)。在1920年參加「第二次大會」，代表中除了來自蘇聯以外，到了1933年已經有三分之二離開「共產國際」(Riddell 1991, I: 9)。「巴庫會議」當年的盛況在好幾年之後才可復得。但是在後來的會議中——1945年在曼徹斯特，1955年在印尼的萬隆，1966年在古巴哈瓦那一——仍舊維持討論政治性提議。

雖然大家普遍認為「共產國際」在1928年就已經不再注重殖民世界，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在「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的討論議程中，曾針對依賴國(阿根廷、巴西)、半殖民國和殖民國加以討論，最後的結論是肯定殖民國的「核心工作就是為民族獨立而奮鬥」(Comintern 1929a: 41)。這個新的主張認為殖民地「代表了世界的鄉村地區，相對的是工業國家所代表的是世界的城市」，這樣的定位表示殖民地的獨立現在被視為走向社會主義之路的初步階段，而不是一個達成立即目標的手段(Comintern 1929a: 41; Comintern 1929b)。因此，「第六次大會」修正1920年對殖民問題的主張，提出一套具有實質意義的新的《論殖民地的革命運動》(*Thesis on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the Colonies*) (Comintern 1929c)，詳細描述了「共產國際」的政策，並且分析各國的情勢，甚至為未來的行動提供了一些行動方針。此後，「共產國際」比較重視個別國家和殖民地實際行動的詳細形式，而不是以一般性的反帝國主義理論激發世界革命的熱情。如此一來，「共產國際」大量增加一些深入群眾的活動，尤其是在相對比較受到忽視的地區，如非洲。

「共產國際」的失敗不應該只是歸咎史達林。中國遵從「聯合政策」所帶來的嚴重後果，早就在史達林介入「共產國際」政策之前，從土耳其和伊朗的例子就可以看出來了。即使是早年「聯合陣線」的政策所引發的有關殖民地民族運動的問題，也早就被羅伊單獨挑出來和列寧辯論：「共產國際」所支持的是資產階級，甚至一些封建的反帝國主義領袖本身通常是仇視共產主義的〔例如，中國的蔣介石，阿富汗的阿馬紐拉(Amanullah)國王、或是摩洛哥的阿布杜勒·克里姆(Abd-el-Krim)〕，有時候，像土耳其的凱末爾會和他們這些資產階級形成策略聯盟，對抗當地的共產黨，表面上故做鎮定地忍受成員被屠殺。在伊朗之類的國家，「共產國際」的工作也受到阻礙，因為高加索地區的反殖民主義在傳統上就是反蘇俄的；1921年蘇俄放棄在伊朗吉朗的共和國，做為和伊朗策略結盟的代價。而巴基斯坦的猶太民族主義者錫安派被認為是英國的同盟，所以「共產國際」支持阿拉伯人，無視於猶太勞工運動比較贊同「共產國際」政治，也不顧有一個小的猶太共產黨的存在。無論如何，「共產國際」對穆斯林民族主義的仇視使它在巴勒斯坦、敘利

亞、埃及、摩洛哥和中東等地的阿拉伯民族運動中，扮演的只是相對有限的角色。

這一切似乎支持一般政治歷史學家的觀點——認為從殖民地的角度來看，「第三國際」發展出重要的理論立場，但是在實際的層面卻是不成功的。它最明顯的成功就是中國的例子，但是而其成功之因是中國不顧「第三國際」的指導原則。雖然以上有許多例子支持這個論點，但是歷史家還是只把「共產國際」斥為致力於普遍的意識形態攻擊東方，這個觀點一直持續到冷戰時期。我們不能像博坎納（Borkenau）在1938年，輕易將「共產國際」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作法歸納為完全失敗，也不能像克勞定（Claudin）一樣，認為「共產國際將走向絕路，因為它沒有成功地在帝國主義宰制的大多數國家中，建立堅實而具影響力的據點」——這個評斷到現在為止從沒有人認真地駁斥過（Borkenau 1938: 289; Claudin 1975: 194）。首先，儘管史達林作法不同，「共產國際」代表第一股強大的反殖民的組織，劇烈地改變了殖民地反帝國政策的動力。它引導第一次國際性的討論，並且詳細闡明反帝國主義的一般作法，這些原則可供後來的依據，並且依各地的要求加以調整。但是，就像史達林本人所觀察到的，理論性的討論是不夠的：「理論若是不能和革命的實踐連結起來的話，理論變成漫無目的，就像實際的作為如果沒有革命理論照亮它、引導它，將宛如在黑暗中摸索找不到自己的路」（Stalin 1939: 28）。「共產國際」的對於理論的討論，整個脈絡比較容易追溯，不容易看出來的反而是它在全世界國際性的共產黨工作所實際介入的情況，這方面的發展情形博坎納在1938年時顯然完全沒有觀察到（例如，他描述「共產國際」在南非和印度的影響是「完全沒有」——事實上當時共產黨在這兩個國家正籌建堅實強大的基地）（Borkenau 1938: 287-288）。而且蘇聯協助世界各地建立共產黨，並在1920年於莫斯科設置「東方共產主義勞動者大學」（Communist University of the Toilers of the East, KUTVU），為反殖民行動提供教育與訓練，同時也出版如《新東方》（*Novyy Vostok*）之類的期刊，以及「共產國際」的《新聞通訊》（*Inprekorr*），期能促進基層結構在組織和政治上的發展，為政治活動提供基本的物質與意識形態的協助。行動派在黨的紀律運作方面得到訓練，並且瞭解組織讀書會、婦女和青年組織，社會和文化機構等的重要性。從達成目標的反殖民革命角度來看，「共產國際」及其世界各地隸屬的黨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似乎沒有太大的成果。但是在1928年「第六次大會」中，重新注意到殖民議題，並訂立一連串的新方法，由於這些新的原則，許多行動派才能奠定未來成功的基礎：簡單地說，如果沒有各地已經建立起來的政治基層結構做為基礎，戰後反殖民運動不可能那麼迅速就可以成功（Comintern 1929b 1929c），在非洲和印度尤其如此。因此我們必需要考量到反殖民抗爭的實際機制，透過這樣機制才能將反抗的思想傳達到組織的層次，並且得以付諸實行。即使是游擊戰也必需要和軍事行動同時建立一套社會和政治的機制，就像

在中國或古巴的例子。共產黨行動派強調必需建立一個有群眾支持的黨派，因此在政治基層的發展方面花費許多時間和精力。這樣的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見到成果。各地共產黨行動派積極參與當地活動，其成效通常在「共產國際」不能有效實際控制的時候比較成功（最顯著的例子就是中國）。這樣的成就常常被忽視，就像博坎納很輕蔑地說，這是三大洲的人民傾向發展「他們的共產主義」（Borkenau 1938: 287）。但是他們自己的共產主義正是左派行動分子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耕耘的成果。因此，主張這些理論和組織方面的成就是屬於民族解放運動的一部分是很恰當的說法。

## 六、托洛斯基和「第四國際」

史達林的順從主義最猖獗的時候，許多殖民地的國際主義革命行動派轉而向托洛斯基輸誠。這樣的舉動不像大家所想的那麼明顯：從被殖民者的角度來看，托洛斯基雖然一開始就參與「第三國際」，但是他在裡面的地位很微小。他的興趣很堅定地放在主要的焦點——歐洲革命（就官方而言，他負責「共產國際」和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拉丁美洲之間的關係，但是在「共產國際」的討論中，這些國家都不是重點，雖然從1919年以後，共產黨在拉丁美洲十分活躍）；在他發表的言論中很少提到殖民議題（參見Trotsky 1945: 125, 139, 136-137）。托洛斯基認為殖民地是革命場域中最微不足道的：殖民地的任何革命都是歐洲革命的副產品。托洛斯基並沒有參與「共產國際」對於東方問題的討論；後來因為和史達林爭論中國政策而變成介入甚深的時候，他對於中國基本上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看法也幾乎沒有好好地闡述過（Trotsky 1932）。身為忠貞的國際主義者，他認為民族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杜撰，因此一直對解放運動中的民族因素抱持冷漠的態度（Carrère d'Encausse and Schram 1969: 41; Munck 1986: 61, 84-85; Trotsky 1934: 899-913）。

托洛斯基的「第四國際」在1936年舉行，也是他被放逐後七年；來自英國的兩名代表之一是詹姆士（C. L. R. James）。在史達林放棄國際主義而主張「一國社會主義」之後，「第四國際」致力於國際革命的目標，但是它缺乏一個主要列強的經濟和軍事後勤的支持。托洛斯基對民族自決問題態度冷漠，使他對史達林做出第一次致命的妥協，以避免面對列寧所提議的殘酷蘇聯再次占據喬治亞共和國；而做為一個國際主義運動，「第四國際」持續托洛斯基這種冷漠（Deustcher 1970: 91-96）。但是托洛斯基在殖民地許多方面的立場是接近列寧。就像列寧一樣，托洛斯基支持沒有土地的農民，認為它們就是革命的潛力，這一點不同於「共產國際」所堅持兩種策略，一是無產階級革命，認為無產階級的先鋒將會領導被剝削的農民，另一則是和資產階級解放運動合作。在「第四國際」的第一次大會中，托洛斯基的



主張多少有點爭議，他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因為本質而落後」，但它們也是「被帝國主義宰制的世界中的一部分」。因此，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剛好說明他所主張的綜合與不均衡發展的觀點：「最原始的經濟形式和資本主義技術與文化最新的發展結合在一起」，這個描述到現在仍然很精確描繪了許多三大洲的文化特性（Alexander 1991: 279）。在政治層面上，這就表示民主和社會主義的鬥爭必需同時進行，而且從一個階級轉變到另一個階級必需藉著持續不間斷革命的手段才能夠實現。從這個角度可以明顯看出托洛斯基主義、毛澤東的文革和中國以及其他地方的都市革命之間的複雜關係（Benton 1996; Fields 1988; Zhang 1991）。

托洛斯基的政治理念影響超過一些運用他名字的政治團體。托派（Trotskyist）的運動史是惡名昭彰而且不甚可靠。除了南撒哈拉沙漠殖民地以外，托派團體幾乎遍及世界每一個國家，但是在大多數地區都因為這些團體極端的派系傾向，因而在三大洲都是在被政治邊緣化的情況之下運作。最大的例外就是拉丁美洲〔尤其是1930年代的智利和墨西哥、1950年代的玻利維亞（Bolivia）、1960年代的阿根廷〕，以及錫蘭（斯里蘭卡），從1935年起，「蘭卡平等社會黨」（Lanka Sama Samaja Party）在國家政策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Alexander 1973; Coggiola 1986; Gall 1991; Jayawardena 1988; Lerski 1968）。在越南的情況非常特殊，一個頗有實力的托派團體和共產黨合作，一直到1945年它的成員被胡志明整肅（Van 1995）。在阿爾及利亞多名托派分子在獨立時被任命為第一任總統班貝拉（Ben Bella）政權的思想顧問（Jackson 1977: 139）。在南非和印度的托派團體仍舊是邊緣的組織，但卻生氣勃勃，這將會在第17章和22章詳細討論。這些地方一如其他地方，任何脫離「共產國際」隸屬的團體或個人通通被歸類為托派，就像印尼的陳馬六甲一樣（Kahin 1952; McVey 1957, 1965）。因此一般而言，我們可以說，在三大洲的許多革命社會主義黨派和解放運動強烈認同托派的立場，也就是選擇另一種形式的共產主義，捨史達林和蘇聯的共產主義形式。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公開標榜托派主義的重要人物，如詹姆士，更是堅持這樣的形式。

157 民族解放運動接收了托洛斯基派（和列寧派）一直強調的核心論點——馬克思理論需要因各地的迫切性而調整——並開始發展。同時，托洛斯基的紅軍所立下的範例——紀律嚴明的軍隊組織的形成和訓練，他對「從下而上的革命」的堅持，主張人民必須要透過蘇聯的構成積極參與政治，以及強調被殖民國家的基本任務就是獨立和土地革命，這一切顯示在政治思想和革命實踐的層面上，許多解放運動所展現出來的是托洛斯基派的傾向。但是托派的這些理念只被稱為屬性相同的思想傾向（ideological affiliative tendencies），主要是因為托洛斯基有關世界國際主義（cosmopolitan internationalism）的主張和解放運動所認同的民族主義有很大的不同。弔詭的是，解放運動的政治反而在許多方面比較接近史達林的語言（Abdel-

Malek 1981, II: 87)。這也是後來毛澤東所發展出來的政治立場——因農民地位的主張不同而與「共產國際」分裂，但他認同將解放運動當做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鬥爭，這個立場在1949年毛澤東在中國的大勝利之後，成為代表三大洲的「第三條路」，因為這是三大洲中第一個社會主義民族解放運動勝利的例子。在1956年之後，以及中國和蘇聯分裂之後，許多三大洲的解放運動在意識形態上認同中國，想要復興1848年、1905年和1917年的革命精神。儘管蘇聯因為冷戰政策而持續干涉，但是中國對三大洲提供了最實質的協助，尤其是在東南亞和南撒哈拉的非洲（Donaldson 1981; Feuchtwanger and Nailor 1981; Harris and Worden 1986; Mazrui 1993; Neuhauser 1968; Saivetz 1989）。但是，三大洲新獨立的社會主義國家1955年在萬隆組織「不結盟運動」，宣布脫離蘇聯或中國的控制而獨立時，也是小心翼翼（Allison 1988）。「不結盟運動」的策略是利用冷戰的敵對狀態，同時從東方和西方、從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獲利。

第四篇

自由鬥爭的理論實踐

*Theoretical Practices of  
the Freedom Struggles*

## 12. 民族解放運動： 導言

對革命英雄主義的記憶將會留存。

阿赫默德（1992: 28）

對殖民與被殖民雙方而言，反殖民主義在實踐與理論的層面上都應回溯到殖民主義的源頭。許多受殖民主義之苦的人——包括加勒比海的加勒比人，到印度的蒙兀兒（Mughal）統治者，到紐西蘭的毛利族——從歐洲入侵就開始抵抗。而殖民者方面無論是歐洲人、日本人、猶太人或俄國人，在他們要在某地建立殖民地時，很少不碰到已經居住在該地的人民持續的抗爭。殖民史其實就是堅毅不屈地抵抗征服者的歷史，對外來者的宰制和主權的喪失起而反抗。北美、南美、非洲、南亞、東南亞的土地上，抗爭的血跡斑斑。對抗歐洲統治的抗爭從加勒比海的奴隸和逃亡黑奴的反叛開始（從1519到1844年有將近100次的起義事件；在古巴有段時間是每一年都有叛亂的事件），然後是「美國革命」，而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也有殖民和奴隸的反叛事件，之後就是19世紀許許多多的起義反叛（尤其在愛爾蘭、印度和非洲），到了20世紀變成到處都有叛亂抗爭。這其中有些抗爭行動眾所周知，從1791至1804年由海地的杜桑·盧維度爾所領導的第一次黑人解放戰爭，到「卡非爾戰爭」（‘Kaffir’ War）（1799-1878），到博利瓦（1817-1829）領導的南美解放運動，到特納（Nat Turner）的「奴隸叛亂」（1813）到印度的「兵變」（1857），到毛利人之戰（1860-1872），到牙買加「莫特蘭灣起義」（1865），到美國的「傷膝河事件」（Wounded Knee, 1890），到愛爾蘭1916年「復活節起義」，到紅軍的「長征」（Long March 1934-1935），到肯亞的「茅茅起義」（Mau Mau uprisings 1952-1959），到「匈牙利起義」（1956），到「越戰」（1960-1974）。這類的叛變在數量和程度上都是非同小可。單就南撒哈拉的非洲對殖民主義的反抗來說，其中就有許多著名的戰爭和叛亂發生在1799到1906年的南非（在那塔爾由邦巴沙（Bambatha）發動的最後一場武裝叛變是在1906年），阿散蒂族（Asante）在1821至1834年、1873至1874年、1895至1896年以及1900年都有叛變發生，而1837年有納德比族（Ndebele）對抗波爾人，巴索托蘭（Bautoland）在

161

162

1851至1852年、1858至1868年、1879至1881年有叛亂，而奧馬爾(El Hajj Umar)領導西非對法國的抗爭則在1854至1864年，安哥拉在1860、1902、1907、1913年，祖魯族對英國的抗爭在1870至1906年，對抗葡萄牙的巴呂埃(Barue)抗爭在1870至1917年，馬夸族(Makuta)在1878年起義，阿布希里(Abushiri)在1880至1890年的叛變，曼丁哥族(Mandinka)在1882至1886年和1891至1898年發生第一次和第二次「曼丁哥戰事」，1884年有麥心吉珥(Massingire)叛變，1886至1920年有索瑪利亞和伊索比亞，1888至1898年有杜爾(Samori Ture)的反抗，1888至1891年在東非則有反抗德國的入侵的抗爭，1889至1895年、1908至1916年有波勒族(Baule)抗爭，1891至1898年有「兮兮戰爭」(Hehe War)，英國與納比德族(Anglo-Ndebele War)的戰爭在1893年，莫三比克在1895至1899年，納比德族對抗紹那族(Tonga)的戰爭在1896至1903年，1897年有「錫納唐加起義」(Cambuamba Sena-Tonga)，1898年的獅子山，1898至1904年的馬達加斯加，1900年的南迪(Nandi)暴動，1901年的「曼康各起義」(Makanga Rising)，和1904至1907年的「赫雷羅—納曼起義」(Hereo-Nama)(隨後被滅絕)，1904年的喀麥隆(Cameroons)，1904年的紹納族起義，1905至1907年的「馬及馬及起義」(Maji Maji Uprising)，1905年的法屬剛果，1905、1908、1914年的肯亞等(Ajaji 1989; Boahen 1985; Bute and Harmer 1997; Crowder 1971; Iliffe 1995; Robinson, Gallagher and Denny 1981)。

在二次大戰期間，除了有些進一步的抗爭事件，如丁卡族(Dinka)和努埃爾人(Nuer)在蘇丹的起義，在法屬和西屬的「里夫叛變」，法屬毛里塔尼亞(Mauritania)和義屬利比亞，或者印度的「恐怖」行動等等，此時的抗爭越來越以農業和工業的政治形式來操作，例如1929年在奈及利亞的集體罷工(由市場的婦女抗議人頭稅發展而來)，在加納的可可農民的抗爭，法屬西非的漢莫力特族(Hamallist)的對抗，在肯亞所發生的攻擊稅收人員事件，塞內加爾發生的罷工，1920年末期在法屬赤道非洲(Equatorial Africa)抗議勞工政權在鐵路建設計畫中的操作，1935至1938年期間西印度的大規模的動盪。同時，這些抗爭透過新聞和印刷等知識文化的管道，越來越清晰有力：借用波爾漢(Boahen)的話來說，有「報紙、書本、手冊、陳情書、移動抗議(protest migration)<sup>譯註1</sup>、罷工、杯葛、投票箱、佈道檯、清真寺」(Boahen 1985: 575)。1930年代世界性的經濟大恐慌使反殖民的不滿情緒更加高張，但是到了1930年代末期，整個殖民的情勢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改變。從被殖民者的角度來看，無論戰爭的後果是什麼，最重要的因素是日本，一個非白種人的亞洲勢力擊敗各帝國在東南亞的優勢。在大戰期間殖民者的權威和操控面臨動盪和腐蝕，這也意味著許多殖民地，如印度、緬甸、加納、

<sup>譯註1</sup> 非暴力抗議的一種形式，通常是長途步行到某一地，進行抗議活動。

突尼西亞和利比亞，隨後可以要求並達到獨立。在有些原本要求立憲去殖民但得不到回應的殖民地，或者有些已經發展自治形式，但帝國仍亟欲重申其政治控制權的殖民地，這些地方就會發生武裝解放戰爭，如在越南的「人民解放陣線」(PLAF, 'Vietcong')，1952至1960年在肯亞的「茅茅起義」，1955至1962年喀麥隆(Cameroons)的「喀麥隆人民聯盟」(UPC)和「喀麥隆游擊隊」(CNO)，1964到1991年南非的「非洲民族會議」(ANC)和「泛非洲代表大會」(PAC)，1961至1976年安哥拉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FNLA)，「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MPLA)，「安盟」(UNITA)，1963年在幾內亞比索(Guinea-Bissau)由卡布拉爾所領導的「幾內亞比索與維德非洲獨立黨」(PAIGC)，1963至1991年的「厄利垂亞(Eritrea)解放陣線」(ELF)，1964至1976年的「莫三比克解放陣線」(FRELIMO)，1966至1980年在辛巴威(Zimbabwe)的「辛巴威非洲人民聯盟」(ZAPU)和「辛巴威非洲民族聯盟」(ZANU)，1964至1990年在納米比亞(Namibia)的「西南非人民組織」(SWAPO)(Boahen 1985; Ajaji 1989; Bute and Harmer 1997; Mazrui 1993)。

一般說來，在歷史書上有記載的反殖民抗爭都是一些讓殖民帝國深感棘手的抗爭。事實上，還有許許多多不可計數的抗爭；有的被帝國成功地鎮壓，在帝國勢力採取更積極更壓迫的形式加以監控之後，悄悄地銷聲匿跡；有的發展出更加本土化的不同形式抗爭。現在，這些歷史的記錄有待一一還原。殖民者為了維繫占據、統治的地位，出動的軍事侵略以及長征的軍隊數目多到無法細數。有一個意象可以充分理解這些起義抗爭多到什麼程度：在《第三世界地圖》(Third World Atlas)中有一張世界地圖，上面標記著從1519年到現在，反殖民和奴隸叛變等事件的日期和地點，地圖上這些點擠到爆滿(Thomas et al. 1994: 44-45)。這些點的歷史訴說著永不屈服的抗爭的故事。

各地的抗爭形式迥異，湯瑪斯等人(1994: 44)將這些形式分為五類，可歸納如下：

1. **抗拒被征服**：此類戰爭是針對歐洲侵略的反抗，主要是大範圍的軍事回應，從職業軍隊的正式軍隊攻打，到原住民以低劣的武器做零星的抵抗都有。
2. **對抗歐洲統治**：包括各種反殖民的抗爭，從奴隸的反抗到激烈的起義和叛變，到非暴力抗議、罷工和「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等群眾運動。
3. **宗教復興運動**：反殖民的不滿透過宗教運動更清楚有力，因為宗教肯定原住民傳統文化，期許一個去殖民的烏托邦式的未來。
4. **以民族立憲行動達到去殖民**：加拿大、紐西蘭和澳洲白人拓居殖民社群典型

的行動。

##### 5. 民族解放鬥爭：武裝游擊隊的抗爭，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反殖民主義涵蓋了上述五種類別的抗爭史。第二類應該細分為兩小類，一是原住民或其他主要民族的反抗，一是早期歐洲殖民者反對歐洲統治的抗爭，如北美和南美。早期的歐洲拓居殖民者的抗爭符合最含糊的第四類，正如費洛（Ferro）所觀察的：「我們可把這一類的獨立鬥爭看成是白人的殖民地擴張的最進步階段」（Ferro 1997: 211）。第三類——宗教復興運動——是最沒有被好好研究過，而且在後殖民理論的領域中，也是繼寇馬若斯（Comaroffs）和其他最近的非洲歷史學家之後，才剛開始注意這一類。這包括了伊斯蘭和印度的民族主義，東非和南亞的救世主（Mahdi）運動，還有東非、中非和南非，以及爪哇、緬甸、印度和紐西蘭的先知主義（prophetism）和彌賽亞運動（messianic movements）（Adas 1979; Anderson 1958; Boahen 1985; Comaroff and Comaroff 1991 1997; Kedourie 1971: 106-127; Rosberg and Nottingham 1996: 324-331; Sundkler 1961）。以先知預言做為反殖民抗爭的形式，此一領域有許多方面尚待研究，尤其是有關它如何運用原住民的意識形態，以及如何扣連現代性的種種形式。做為一種民族主義的形式，宗教復興雖然常常受到當地原住民文化傳統的啟發，但是它也建立自己的一套壓迫的手法。當它和社會主義或女性主義的某些目標相結合時，如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某些形式，肯定就可以和後殖民批評的政治連結起來。

164

反殖民鬥爭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回應各種異質的情況。在一些由白人建立已久的拓居殖民地，如加拿大或澳洲，反殖民鬥爭就是逐漸發展直接參與政府的形式——當然只針對白人拓居者而言。而在一些白種人屬少數的拓居殖民地，如阿爾及利亞、肯亞或羅德西亞，對大多數的人而言，情況就比較複雜，多半必需由「民族解放陣線」、「西南非人民組織」、「辛巴威非洲民族聯盟」之類的組織以武力擊敗。在其他非白人的剝削殖民地，似乎有一個通則：由改革運動所帶來的經濟和教育的發展越好，如印度的情況，通常就越可能有資產階級的政治抗爭，以有效的運動要求獨立。這方面的例子有印度／巴基斯坦，錫蘭（斯里蘭卡），以及加納，這些地方都有完善的教育制度和經濟，以及有效的聯合貿易結構，還有一個以種姓制度和階級制度等嚴厲的階層概念所架構的社會體系。在這些國家中，本土菁英階層準備好要接手掌管大權。在非白人、非拓居者的殖民地，也就是所謂的在「低度開發國家」之列的殖民地，依賴的如果是有爭議的殖民勢力，通常就沒有那麼簡單直接，當地的抗爭就會比較激進。除了白人的拓居殖民地，殖民列強如法國和葡萄牙，執著於「同化」的意識形態，強力對抗反殖民運動。因此殖民者的頑固造成反殖民者以民族解放軍隊訴諸戰爭，如「越共人民解放陣線」或「莫三比克解放陣線」。

有時候後殖民分析給人的印象是權力的動能（dynamics of power）只是文本性的，而且是很微小的，被殖民者很少在實質上被賦權。但是歷史告訴我們的卻不是如此。許多20世紀初期的抵抗和叛亂有實際的行動，但這些只被列在編年史的紀錄，除此之外，抗爭政治到目前為止幾乎被隱沒。一直到了19世紀，反殖民主義才開始被放在特定的政治、文化和理論位置。在這些討論闡釋中，文化所占的核心地位形成反殖民主義史的特色：在抗爭模式的發展中，被運用來配合武力的文化行動主義（cultural activism）往往被視為具有抗衡的力量，對抗一些充滿意識形態的假設、合理化的說詞，甚至抗衡殖民者對從屬人民所灌輸的自卑感。就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這些政治抗爭的形式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那些以原住民文化為基礎的政治抗爭，一是認同殖民或西方現代性形式的抗爭。到了20世紀，這些兩類緊密地連結，多半變成以兩者混合的形式。但在意識形態上兩者還是相互對立的端點。

無論反殖民主義在什麼地方出現，它代表一個共同的擊劃，也就是將權力結構逆轉。但是要透過什麼方式達成或形成顛覆、逆轉，完全視民地的特定歷史情況，而且可能有許多不同的形式。因此，傅瑞迪（Füredi）主張，反殖民主義：

165

很難單單就反帝國主義的角度說清楚。……絕對沒有任何單純的帝國／被殖民者的關係，帝國的統治往往需要透過某些程度的機制居中斡旋，包括當地人的合作。（Füredi 1994: 22）

因為這種當地的斡旋協調，反殖民的情緒通常透過社群的暴力或族群的暴力來表達。有爭議的是，這些合作者包括殖民者的占領軍隊。殖民軍隊的士兵通常由殖民地當地士兵組成，有時候這些士兵和他們所控制人民屬於不同的民族或種族。他們所效忠的是殖民帝國〔例如庫馬洛（Thema Khumalo）報導，在辛巴威的自由鬥爭中，「因為國家是由白人所操控，黑人士兵必需依照白人的指示，而且為了討好白人，黑人士兵實際上忍受無法言說的鞭打和折磨」；Staunton 1990: 77〕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要維繫軍隊的絕對效忠。如果和塞佛卡（Savarkar 1947）辯論「印度兵變」是不是一場解放戰爭，這個辯論完全是合理的；但是稱之為「兵變」並沒有什麼不對，因為這是由當地的印度軍隊（「印度兵」sepoys）引發的反叛，對抗的是他們的英國軍官。當然反抗的不只是這個，但是以一個普通的名詞，如「反叛」或「叛亂」將兵變的事實一筆帶過，其實是淡化這個事件的激烈程度。正如馬克思所強調的，就某個意義而言，「兵變」比任何起義更為嚴肅，因為兵變有軍隊做為基礎，而且一定是屬於殖民者的軍隊，正因如此，這些軍隊都受過訓練，而且武器精良。

兩億印度人被英國指揮的20萬當地士兵控制，而這支軍隊由一支只有四萬

名的英國軍隊負責監督。乍看之下，印度人對英國是否忠誠，顯然要仰賴當地印度兵的效忠才能維繫。英國統治者在建立當地的印度兵隊時，同時也造就了印度人所擁有的第一個反抗中心。（Marx and Engels 1959: 39-40）

兵變是顛覆英國殖民勢力最有可能的形式。

後殖民批評家以各種方式告訴我們，反殖民抗爭的呈現方式有許多種，其脈絡各有不同，而實踐的方式也各異。在另一方面，把反殖民主義放一個理論性的政治位置來觀察，其形式相對有限。以政治、思想和軍事對抗殖民主義的主要類型歸納如下：

1. 以歐洲道德和人道精神而反對（啓蒙運動、反奴隸運動；人權理論）。
2. 以歐洲自由經濟思想而反對（史密斯、柯布敦、布萊特、巴斯夏）。
3. 帝國列強之間存在的歐洲／非歐洲的敵對（如英國—法國—德國—蘇俄，以及美國—日本—蘇俄）。
- 166 4. 肯定拓居殖民地有自決的政治權利（如美國、加拿大、玻利維亞、德蘭士瓦省／橘自由邦）。
5. 殖民民族主義（包括資產階級的、文化的、宗教的）（如印度、巴基斯坦、愛爾蘭、蘇格蘭、波蘭、土耳其、埃及、肯亞、中國）。
6. 反殖民國際主義（如泛非洲主義、泛阿拉伯主義、泛伊斯蘭主義、基拉法運動、黑人精神（*négritude*）運動、非洲社會主義）。
7. 工業罷工、土地改革和公有主義（communalism）所引發的動盪，移動抗議，農民叛亂等：這些或成為對抗殖民勢力的替代形式，或轉變成反殖民的活動，通常會和共產主義以及／或者（and/or）民族主義相互結合。
8. 馬克思國際主義和武裝民族解放運動（如中國、越南、古巴、安哥拉、莫三比克）。

就歷史角度觀察，後殖民理論是上述一切的產物；但是，它也是有所選擇的。就廣義而言，後殖民理論歸屬第一類，不是第二類和第三類。有一派後殖民理論把自己歸為第四類。那些仍然以第五類的傳承為職志的人，把後殖民理論列為「西方的」，敬而遠之。第六類在現今很少有支持者，縱使國際主義是許多解放思想的核心，而且它和第八類沒有什麼相抵觸。第八類在馬克思國際主義的大架構中，發展民族解放的政治。但是在當今後殖民思想中，有一股對國際主義重燃起的興趣正漸漸浮現（Brennan 1997; Robbins 1999; Sinha, Guy and Wollacott 1999）。因此，針對殖民主義的抗爭有許多不同的意識形態和形式，就像第七類所顯示的，而在某些方面，後殖民理論必須承載所有這一切的歷史軌跡。各種解放運動衝突的傳統根源，

仍舊引發後殖民理論各種張力——尤其是資產階級（以及離散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一個以社會正義和公平為目標，強調更介入的政治之間的衝突，因為後者以各種不同的三大洲社會主義革命思想為基礎，同時也受到抗爭的種種記憶所啓發。

#### 在抗爭第四區的政治局

我已行過廣西省的13個區，  
 嚐盡18座不同監獄的樂趣，  
 我不斷問，我到底犯了什麼罪？  
 我的罪就是獻身於民。（Ho Chi Minh 1962: 85）

## 13.

## 馬克思主義與民族解放運動

阿爾及利亞的阿布德·埃卡德（Abd el-Kader）<sup>譯註1</sup>在1832至1847年發動反對法國的叛變失敗後，恩格斯將之斥為「野蠻狀況的社會」所做的「無望」的抗爭。騰納（Bryan Turner）引述這個評語說，「對民族解放運動而言，古典馬克思主義不是一個可以指望的革命理論」（Turner 1978: 5）。騰納的《馬克思和東方主義的末路》（*Marx and the End of Orientalism*）和薩依德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在同一年出版，騰納的書有意將歐洲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去殖民化」，到現在這仍然是後殖民理論的主要目標。對某些人而言，後殖民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的關係仍是後殖民理論政治主要的謎題。一些包括我自己在內的評論家，從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的脈絡觀察法國戰後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分析它如何橫生出後殖民理論的觀點。有些人，如阿赫默德，則認為它只不過是民族主義派馬列思想的迷途羔羊（Young 1990; Ahmad 1992）。這兩種論點不盡然是完全對立的，因為它們都看清了一個事實：後殖民理論還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方針，但同時以偏離正統自居，也就是以史達林主義或者後來共產黨的各種形式，將馬克思主義朝不同方向發展。

這樣一個從中心偏離的過程一直在馬克思主義的範圍之內操作，所以它的異質性也就不足為奇。就如佛加克斯（David Forgacs）所觀察的：

無論馬克思主義思想有多麼嚴密，它具有雜揉的特色。馬克思主義的形成是經過仔細的審視和琢磨，不只針對真實的世界，而且也對自己的文本斟酌再三，甚至對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也抱持同樣的態度。馬克思本人的思想就是透過和思想家如黑格爾、李嘉圖（Richardo）、普魯東（Proudhon）等人的批判性對話而逐漸發展。（Forgacs 1982: 134）

正如列寧把馬克思主義描述成一個集「德國哲學、英國政治經濟和法國社會主義」於一身的產物，同樣地，反殖民馬克思主義也是東方與西方雜揉的產物。這樣的混合雜揉一直是馬克思主義的特色，成為20世紀哲學和政治的實踐，一直不斷和其他學門，在各地、以及各種文化和政治脈絡產生建設性的互動。在殖民地和三大洲，馬克思主義根據不同的社會和文化脈絡發展，通常變成西方所不認識的馬克

<sup>譯註1</sup> 阿爾及利亞反對法國的民族解放鬥爭領袖。法國對阿爾及利亞的殖民於1830年開始，原先法國只占有沿海局部地帶，1847年擊敗Abd el-Kader軍隊之後始占領全境。

思主義的形式。

20世紀早期拉丁美洲的馬克思主義者，尤其是馬力亞特吉，是第一個提出馬克思主義中的歐洲中心主義。這並非代表他們反對馬克思主義本身，而是在馬克思理論中的一個異議，暗示馬克思主義必需修正、重新調整方向。反殖民和後殖民思想所致力就是要依據其目的，將馬克思主義重塑、轉譯和轉變，但是其間的過程都是在馬克思主義的範圍之內操作，將馬克思主義視為具有批判性，是一個具有有動力的傳統。後殖民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者和馬克思本人的思想產物。在歐洲的馬克思主義者，或者在其他地方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通常對馬克思主義的非歐洲形式的重要性輕描淡寫，甚至不太承認。馬克思主義也有中心和邊緣之分，它本身也有宰制、反抗和顛覆種種形式。如果後殖民理論是去殖民的文化產物，那麼它也是馬克思主義在反殖民場域中的歷史產物。對許多第一代的後殖民理論家而言，馬克思理論是他們的起點，是他們當時的研究基礎，當代知識文化的主導，因此被認為是所有進一步研究的一個基礎線。而且，這些第一代的理論家所知道的共產革命政治都屬於三大洲：中國、越南、古巴。

有些人也許反對將馬克思主義放在非歐洲的反殖民論述的核心地位。他們認為，即使馬克思主義本身也對歐洲文化有自我批判的論述，但是它終究還是歐洲（甚至德國）的。但是，在列寧之後，反殖民馬克思主義多半是第三世界所創：三大洲政治所致力就是將馬克思主義轉變成不同工具（instrument），藉以對抗鞏固的歐美帝國勢力。1917年之後，三大洲絕大多數的民族解放運動，其思想與實踐可說都是以馬克思主義為中心。那時候，在非洲和亞洲已經有反殖民運動，而且美國帝國主義在當時已伸向中美和南美，所以這兩個地方也有反殖民運動。除了中東之外，在許多殖民地，現有的民族運動或反殖民運動，以及共產主義新的激進政治和社會規劃，兩者之間開始有思想方面的相互結合和調整（Laqueur 1956; Rodinson 1979; Turner 1978）。同時，1917年這個日期直接說明為何愛爾蘭的獨立運動，也可以間接地說明印度的獨立運動，為何不在此之列：這些獨立運動在19世紀形成，比較傾向當時威望甚隆的加里波底（Garibaldi）和馬志尼的義大利民族主義。在印度，共產主義者和極左派大多拒絕和「印度國大黨」結合，才讓尼赫魯的社會主義派世俗主義（secularism），真納（Jinnah）的改革派伊斯蘭教，以及塞佛卡的宗教公有主義（religious communalism）運用民族主義的情緒。至於其他地方，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恩克魯瑪和法農之後，大部分的非洲民族主義都和各種的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結合，而亞洲大部分的共產黨，如中國和越南的共產黨，開始時都將民族主義併入他們的擘劃中。

169 從歷史的脈絡來看，除了某些例外，馬克思主義為20世紀的反殖民抗爭提供了理論的啟發和最有效的政治實踐。馬克思主義的優勢在於它的政治論述可成爲一

種工具，透過它，反殖民鬥爭可以從這個殖民場域轉譯到另一個場域。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非常不同，因為後者被定義為自我中心，只會和自己成員對話，而馬克思主義提供一個可以轉譯的政治和政治語言，透過這樣的管道，身處不相同情況中的行動派可以相互聯繫；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個共通的媒介，各種特殊性可以在反殖民主義這一個共同的論壇中討論。這個來源是列寧原則的布爾什維克共通模式，經過辯證而有所修正，以因應各殖民地情勢的不同。在反殖民的鬥爭中，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結合一直被認為已變成偏向民族主義的形式，而不是馬克思主義；一般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偏離，成爲民族主義的一種形式。我們也可以用相反的觀點來看，也就是將民族主義看成輔助的元素，有了它才產生創造性的政治和理論實踐，藉此，馬克思主義所具有的可以轉譯的特性一直處在轉譯的過程當中，而這樣的過程不一定是完全清晰可辨的。三大洲的馬克思主義和列寧是一個辯證性的對照，它強調的是所謂的革命實踐的不可轉譯性，並且注意地方形式的必要性，還要將普世的共通性轉化成地方的語言。這就有違布爾什維克所主張的共通性以及其革命模式可以轉譯為普世通行的形式，和也和史達林「從上而發的革命」大不相同，甚至也違反了美洲人的想法——就像卡斯楚（Fidel Castro）在1962年「哈瓦那第二宣言」中所說的，革命只不過是世界市場上的另一種商品：

古巴是革命的出口商。在不眠的商人和掠奪者的心中有一個想法：革命可以被購買、販賣、租用、借貸、出口和進口，就像一件商品一樣。  
（Castro 1971: 144）

因此，三大洲的馬克思主義可說預告奧蒂斯（Fernando Ortiz）寓意深長的說法：它是馬克思主義文化互化（transculturation）的體現，奠定了後殖民理論的基礎。

## 一、阿布代·馬力克論馬克思主義和解放運動

從1917年以後，有許多實際的原因足以解釋為何蘇聯陣營被視為反殖民奮鬥中最有力的資源。就歷史來看，在反殖民主義的鬥爭中，先由蘇聯，後來由中國和古巴提供物質和軍事的協助，這意味著理論與實際一直交疊，互為表裏，即使二者從來就不是相等的。20世紀經過了「第三國際」走入戰後時期（除了1935至1945年），各共產國家以不同的馬克思思想，對大多數的殖民解放運動直接提供物質協助和思想啟發，甚至指導他們反殖民奮鬥的政治哲學。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蘇聯弔詭地成爲倖存的最後一個帝國列強爲止。蘇聯的解體也正好是最後一個主要的殖民地政權勢力退出南非的時候，這並非巧合。20世紀的特點就是大力對抗資本主義以及西方的勢力，無論是1917年在蘇俄的布爾什維克革命，以及因此而帶動的東



歐和中國的革命，或者是亞洲、東南亞、非洲、加勒比海等的反殖民解放運動都是如此，在整個對抗過程中，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人成功地在帝國主義時代末期擺脫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某些時候，例如在越戰期間「骨牌理論」(domino theory)時期，許多人覺得似乎是馬克思主義的抗爭勝出。正如阿赫默德所言，越戰代表反殖民抗爭的一個高峰：

革命的反殖民主義；在最落後的經濟中，最進步的社會主義政治實踐；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之間直接的延長戰；完全不均等的武力——這一切都濃縮在越戰中。(Ahmad 1992: 28)

在1963年，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寫道：「切·格瓦拉(Che Guevara)曾經對美國如此預言：『你們即將失去全世界，』而他的預言就要成真」(de Beauvoir 1968: 520)。但是，反殖民的勝利後來變成了社會主義的失敗。許多社會主義的抗爭後來潰散，而三大洲的社會主義在反殖民戰爭混亂的殘局中陷入困境，但這些事實不能抹殺這一段非凡的歷史成就，這些也未必就代表抗爭就此結束了。事實上在此同時，社會主義的反抗也轉變了資本主義的本質。無論是否以另一種經濟體系實現，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想仍然是內在抗爭的一個形式，對抗資本主義的剝削榨取的模式。

有關馬克思主義和民族解放運動之間的關係，討論最為精闢者就是1970年阿布代·馬力克的一篇文章。阿布代·馬力克的主張在拉丁美洲、非洲和東南亞反殖民和反帝國行動主義最高潮的時期發展成形，因此就理論的討論和分析的層面來看，他的貢獻無出其右。他表現出三大洲討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時的核心概念，主張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動態的運動，而不是一個具有固定體系的原則。他認為馬克思和列寧都不曾認為他們的作品應該被當成「經過嚴密的規劃，在每一個關頭都可以直接被應用」(Abdel-Malek 1981, II: 106)。這一點關係到阿布代·馬力克文章中所提的核心問題，也就是他幽默地稱之為「原住民中的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或者說是三大洲這種「低度開發世界」中的馬克思主義；這也就是指馬克思主義和民族解放運動之間的關係，以及民族解放運動在三大洲付諸實踐的時候和馬克思主義的互動所產生的影響。阿布代·馬力克提醒大家，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和歐洲的馬克思主義相去甚遠。而且，他認為這兩者之間「在目前來說，甚至沒有對話的可能性，更不用說什麼融合」。如果說這樣的狀況在1970年的時候沒有發生，這樣的對話和建設性的融合反而後來發生在歐洲馬克思主義主流之外的領域，也就是現在後殖民理論的領域。後殖民主義調合並持續發展解放運動中的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各地區的文化特殊性如何在經濟學家——包括中東(阿敏)，拉丁美洲(法蘭克)，和非洲(華勒斯坦)——所發展出來的世界體系理論的架構中以辯證關係操作(Frank

1969; Wallerstein 1974-1989, 1975, 1979, 1984; Amin 1974, 1977, 1998)。

從三大洲的觀點來看，1970年馬克思主義在歐洲的發展處於危機狀態：阿布代·馬力克說：「幾乎沒有什麼理論的更新」，同時更具體指出「理論性的東西所做的，幾乎和革命沒有什麼關係」(Abdel-Malek 1981, II: 79)。另一方面，從歐洲的觀點來看，三大洲的馬克思主義像「一個激進的民族主義形式，迥異於西方思想家、行動派和積極分子所發展，然後被建制化的馬克思主義——至少一直到『共產國際』陷入危機時」。因此，阿布代·馬力克開啓了各種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廣義地說是，這個辯證關係的兩端，一邊是蘇俄和歐洲的共產黨馬克思主義，一邊是歐洲以外所發展，從來不會被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無論是在「共產黨」內或之外的人)所接受的馬克思主義。他將此歸因於傳統上歐洲黨派的支配優勢往往凌駕國際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這本身的根源就是來自歐洲長期以來文化和政治的領導地位。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喜歡將非西方發生的事情邊緣化，縱使事實顯示，非西方才是馬克思主義成功地發展它實際革命的動力、並且取得政治權力的地方。

阿布代·馬力克把三大洲馬克思主義的出現輕鬆地形容為明顯的「激進民族主義」形式，這樣的說法頗為鮮明。在西方，左派知識分子一直苦於不知如何界定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關係，但是對於三大洲的知識分子而言，這一點從來不是問題，他們將一直將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視為相互關聯的思想(殖民列強也是如此，被殖民者的不同意見總是輕易地被貼上「共產主義」的標籤)(Munck 1986; Nimni 1991; Soekarno 1969)。從反殖民的觀點來看，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如羅汀生所說：「民族解放是社會主義理想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是社會解放重要的一環」(Rodinson 1979: 119)。這並不代表民族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理想的一部分。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政治哲學，它所許諾的是一個更公正公平的社會。民族主義沒有這樣的規劃。民族解放對解放的要求和民族主義本身大不相同。但是這兩者習慣上被同化了，這正是評論家如派瑞(Parry 1987)和拉瑟若斯(Lazarus 1999)關注的問題的核心。如他們倆所言，後殖民批評家在批評民族主義時，有時候的確也貶抑某些民族主義的抗爭論述(Parry 1987: 35; Lazarus 1999: 120)。如果真是如此，那是因為各種反殖民民族主義不盡相同，列寧和羅伊當年的爭論第一次凸顯這個議題之後，這一點就很清楚，而且這對婦女特別有意義。正如阿赫默德簡潔的評語：「有些是進步的，但有些不是」(Ahmad 1992: 102)。民族主義理論家從來沒有好好地分析過西方所謂的「第三世界民族主義」，因為第三世界民族主義不是根據一般的模式或意識形態在運作。布儒理(Breuilly)說：「反殖民主義是民族主義各種主要的形式之一」(1993: 156)。也許這樣說更合適：反殖民主義通常會運用某種民族主義的形式，達到民族解放的目的。但是對法農而言，這樣的民族主義運用了稍微不同的策略性方式，扣連居主導地位的反殖民主義，它

不一定有民族主義做為最終目標時所產生的壓迫形式和實踐。後殖民批評最關心的核心就是這一點重要的區分。

雖然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沒有用很多話來說明，但是他在《想像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 1983) 一書中的創見，不是像史達林 1913 年的那篇文章 (Stalin 1963) 用一堆變數來定義民族主義，安德森反而比較傾向運用索緒爾 (Saussure) 的觀點，將民族主義看成是一種語言。以索緒爾的措辭來說，民族主義做為一種語言，其意義的產生是源自兩相對照的區分，因此它是一種形式，不是實質。〔這就是為什麼後獨立 (post-independence) 朝著所謂的「建國」的努力大致上都是失敗的，或者充其量是在高壓的狀況下操作，這都是因為誤將民族主義當成是實質，而不是一個形式〕。傅瑞迪 (Füredi) 以一個比較實際的方式說明這一點：

民族主義很少可以被當成一個獨立的變數；它是一個形式，透過這樣的形式呈現出許多不同的反應、目標和利益。它的力量不是發自內在的，而是依賴不同的社會團體情感的強度。這就是為什麼有自覺的民族主義政治家們從來行之不遠，不成氣候，除非他們覺得自己能夠善用大眾渴求的更好生活的目標。那些把問題獨立看待的人，將它看成一種自覺的民族主義的檢驗，他們忽略潛藏的社會動力，因為這個動力到最後可能透過某種可觀的集體認同形式而凝聚結合。(Füredi 1994: 21)

傅瑞迪以英屬圭亞那、肯亞和馬來亞的例子來證明，把民族主義當成自覺的意識形態，這種屬於菁英的形式通常只有在為時已晚的時候，才會和一些與農民或工人比較直接相關的，如土地權利之類的特殊議題所導致的社會動盪結合。在被殖民的情況下，菁英分子的鬥爭所反對的是拓居殖民者或殖民當局，這個事實就足以將他們帶入民族主義的議題中。但是，對一般農民和工人（無論男性或女性）而言，民族主義通常是帶領他們走向某個比較特定目標的方式，例如土地，公平工資和去除賦稅的種種壓榨形式。傅瑞迪的分析更適合應用在印度。自從獨立之後，「印度國大黨」的知識分子對民族主義的擊劃，以及民眾的罷工和農民問題之間的鴻溝，深深困擾著印度的歷史學者；印度的群眾和民族主義的目標如果有什麼關聯，也只有透過一些如甘地這類人物，半信半疑地被拉到民族主義的目標來。強調民族主義是形式，是一種語言（將它連結到拉崗 (Lacan) 潛意識的語言論述，將是這方面一個有趣的研究方向），而不是某種本身需要被拿來分析的獨立的、先前就存在的實物，這樣的觀點就可以切入無休無止不相干的思考和焦慮，撥雲見日。

173 歷史上的例子顯示，「民族主義」以及它呈現的各種形式之間的關聯無論實際上有多麼薄弱，在政治上不是那麼重要，它所代表的的確是語言的功用。例如，在

英屬圭亞那的殖民當局對糖產工人掀起激烈的動盪，這些騷亂具有民族運動的政治效應。對殖民當局而言，罷工和動盪不只是罷工和動盪：這些是民族主義反殖民的語言。同樣地，在肯亞，當殖民拓居者的統治當局對所謂的「非法居住者」(squatters) 被迫遷出白色高地 (White Highlands) 所發動的抗爭時，他們就冠以民族運動之名，以「茅茅」稱之。一旦被如此定義，此後任何的抗爭行動就變成一種民族主義的反殖民表述。因此，在某個意義上，「茅茅」就是民族運動。英國所派遣的軍隊宣稱打敗「茅茅」，但是事實上它所打敗的是殖民當局自己編造的名詞——後來快速的去殖民可充分證明這一點。真正的問題是掌控和宰制的問題，而這些例子告訴我們，在殖民的狀況下，權力的競爭以民族主義的語言輕易從地方轉變成全國的層次。無論民族主義現在在歐洲「是」什麼，或者以前是什麼，它在三大洲一直是一個語言，是殖民者的操控和被殖民者自決之間的權力鬥爭，在「民族主義」這個語言中操作，形成一種概念，透過概念的運作，許多特定的議題和不满結合在一起，變成政治化。只要有權力的鬥爭，你就可以隨意加入任何喜歡的因素（正如民族主義有各種組成元素一樣）。但是，儘管法農有他的看法，那樣的權力鬥爭卻很少是簡單的二元對立。殖民列強可以說比較連貫一致，至少在開始時，但是，反殖民者的抗爭則是片斷而且情況各異，來自不同的地方和階層，因此彼此產生競爭，甚至對立。因此，重要的關鍵是要把鬥爭推到某個程度，以便共同努力對抗更大的差異，暫時捐棄較小差異，這也是毛澤東後來所主張的。因此，獨立之前革命運動的結合，後來轉移到在任何社會的政治生活中都會出現的權力鬥爭。例如，轉移到婦女解放，或者社會主義。

就像民族主義可以被當做一個便利的吸虹管，呈現出各式各樣的不平與不滿，不滿的情緒透過吸虹管被聚集壓縮成一個超越原本意義的隱喻意義，伊斯蘭教和馬克思主義也是一樣。正如以上所述，許多革命雖然有時被歸類為共產主義，其實在意識形態上並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後來也不曾發展成社會主義的形式。阿爾及利亞是個好例子（儘管法農有不同的看法）。伊斯蘭民族主義也同樣是個好例子，它的功用事實上和其他民族主義相同——伊斯蘭教充分體現在社會和文化上，這一點讓它發揮更大的作用。而其他的例子，如越南，共產主義的反帝國立場讓有組織的共產黨得到群眾的支持，因此革命成為共產革命。而在古巴，革命深得民心，因此民眾在革命之後傾向支持共產主義。因此，就歷史的觀點來看，解放運動百花紛  
174 放，沒有形成任何一種「傳統」。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關係將會永遠是由多種因素而決定的，不但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是主導的意識形態，而且因為馬克思的反殖民主義變成了知識運動與政治運動的操作，由此產生一個特出而紮實可觀的理論知識體系，到現在可以一直被拿來運用（除了甘地以外）。有些自由的鬥爭，如起義和革命，可以說就只是歷史，但有一些農民的起義現在變成

是後殖民歷史中最迫切的研究課題之一。而其他的例子，重寫歷史本身就是反殖民運動中重要的一環，強調的是反殖民運動對論述的生產有其重要性，這些分析仍舊持續影響今日的政治和文化情勢。

## 二、第一階段：直到1928年

阿布代·馬力克主張馬克思主義和民族解放的結合可分為三個連續的階段：第一階段一直到1928年的「第六次共產國際大會」。第二階段期間沒有任何成功的社會革命（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阿布代·馬力克認為這個階段「很少、甚至是沒有可用之素材」，而「共產國際」搖擺不定的立場只造成「被屠殺者的煉獄」（Abdel-Malek 1981, II: 87）。他認為這實際上阻斷馬克思主義和民族解放運動的所有發展，使民族解放運動變成零星片斷，只能停留在和殖民國對話的情況。1945年之後勝利的第三階段見證一個獨特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三大洲出現，尤其是在1949年中國革命之後。

阿布代·馬力克的第一階段歷史，也就是一直直到1928年「共產國際」的民族解放階段，這段在前面已有詳述。在此，我將把重要的因素集中在革命鬥爭如何延伸到東方，並且著重「共產國際」大會中針對共產主義和民族解放運動的策略關係所做的討論。在第10章我們已經談過馬克思主義因為碰到三大洲的不同問題而更加豐富，經過因地制宜而被轉譯成地方性的語言，這樣不同的馬克思主義在「巴庫會議」第一次詳盡討論，爾後在陳馬六甲、羅伊、蘇丹卡里耶夫等人開創性的著作中加以發展。正如阿布代·馬力克指出，這三位代表了共產主義和非歐洲民族運動的關係發展中，衍生不同立場的可能性：陳馬六甲代表的是民族主義最堅定的立場，主張共產主義和反殖民運動是一體的，因為二者有相同的目標，但不一定要有相同的社會政治。相較之下，羅伊則採相反的立場，認為要揚棄所有民族主義的形式，嚴格遵行馬克思主義理論，將它應用在殖民地的情況；他的立場特別著重殖民地在世界帝國主義的體系中邊緣化的經濟地位。阿布代·馬力克認為蘇丹卡里耶夫「為後來馬克思主義在三大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Abdel-Malek 1981, II: 84），因為他依據各地文化的不同而開始調整馬克思主義。

本尼格森（Alexandre Bennigsen）寫道：薩丹·卡里耶夫最具創見的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誕生是針對西方工業主義的一個回應，他以此為起點，修正、調整，讓馬克思理論可以順應亞洲的需要，更重要的是，適合農業社會的需求」（Bennigsen 1958: 401）。正如我在第十章所述，薩丹·卡里耶夫批評布爾什維克在早期漠視東方政治的潛力。他認同阿富汗尼的革命泛伊斯蘭主義，同時也強調後來變成三大洲基本的政治認同：把世界分成壓迫者和被壓迫者。薩丹·卡里耶夫主張

被殖民者都是無產階級，因為他們被外來的勢力宰制，正因如此，他們的解放運動是社會主義的，而且是進步的。蘇丹卡里耶夫的門生，穆札法爾（Hanafi Muzaffar）這樣說：

伊斯蘭的教徒（被殖民者）是無產階級，因為他們是唯一真正被壓迫的人民。他們比英國或法國境內的無產階級更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在伊斯蘭教的土地上所發生的民族運動具有真正社會革命的特色。（Laqueur 1958: 401）

薩丹·卡里耶夫則更進一步地提出新的「殖民國際」（Colonial International），由被殖民的民族組成聯盟一起反抗工業國家，他認為工業國家事實上就是帝國專制的資本主義工具。但是他對國際主義的熱衷終究不如他對伊斯蘭教的同情那麼深。雖然沒有那麼直接的關聯，但是薩丹·卡里耶夫泛伊斯蘭教的社會主義形式比較不能算是奠定1952年埃及革命意識形態的先驅，反而比較像1965年伊朗最初的伊斯蘭馬克思主義的「聖戰者組織」（Mujahedin）的先驅。但是它最重要的意義是把被殖民國家描述成無產階級的國家。正如阿布代·馬力克所主張，許多年後，把被剝削國家視為無產階級的人民變成三大洲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最強力的體現就是毛澤東和格瓦拉對抗帝國主義的全球性運動。但是格瓦拉不是以某一個特定的國家或人民的名義發言，他像法農一樣站在國際的角度，為所有大地不幸之人<sup>譯註2</sup>發出不平之鳴。

## 三、第二階段：1928到1945年

雖然阿布代·馬力克注意到在這個階段中，葛蘭西和陶里亞帝（Togliatti）著作中有一個新的、異質性的多元馬克思主義在逐漸發展成形，將會對反殖民和後殖民理論產成特殊的意義，但是他也和一般人一樣，認定1928到1945年之間，共產主義的反殖民在理論和實際方面都沒有什麼發展。他強調這段時間在理論面十分薄弱，這個說法需要限定在某一方面，因為事實上三大洲所發展出來的獨特的馬克思主義，在實際和理論的層面都有實質的進展。共產主義的反殖民行動絕對沒有在1928年之後消失。事實上，隔了四年所舉辦的1928年「共產國際」大會比先前更強調殖民解放運動，也許是因為史達林完全掌控「共產國際」的機制。此次大會斥責歐洲共產黨對殖民地群眾運動「無動於衷」，並且指示對殖民帝國和殖民地的這

<sup>譯註2</sup> 此處作者運用法農著作*Les damnés de la terre*（1961）之英文譯名*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大地不幸之人》）為喻。本書中譯提及法農此書時，採法文書名之中譯《受詛咒的大地》。

類運動都需大力支持 (Comintern 1929c)。「第六次大會」也有一連串有關策略、實踐和組織的提議。這些也許不如共產大會前幾次的辯論那麼清楚明顯，但由各地方政治層面來看，在許多方面卻是更為有用，因為這些提議所關注的是黨的實際建立，以及相關的民族組織、貿易聯盟、婦女和青年團體，這些提供社會主義獨立運動所必需的資源和群眾的支持。事實上，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些社會主義的獨立運動全面浮現。就舉一個我將在下面兩章說明的重要例子，一些流傳很廣的觀點（如 Wallerstein 1961: 146）認為布爾什維克和「共產國際」忽視了戰前的非洲黑人，這和事實大相逕庭：蘇聯在 1920 年代末期開始積極介入，甚至為許多戰後反殖民運動的方向，以及後來非洲國家的獨立奠定基礎，引導它們走向共產陣營。

由「共產國際」開始領導這些行動其實早已有跡可尋：前一年的 2 月，1927 年在布魯塞爾舉行「反殖民會議」，這是由德國共產主義者穆森伯格 (Willi Münzenberg) 所領導的一個共產組織——「國際勞工防衛部」(International Labour Defence) 所籌畫。參與這次盛會人囊括來自五大洲 43 個國家的 180 多位代表，包括來自「殖民聯盟」(Union Inter-coloniale, 先前黑人殖民地聯盟之一支) 的安地列斯籍的巴黎律師布朗寇 (Max Bloncourt)，「印度國大黨」的恰托巴底亞耶 (Virandranath Chattopadhyaya)，劍橋出身的「英國共產黨」印度籍理論家帕米爾·杜特 (R. Palme Dutt) 的弟弟克里曼·杜特 (Clements Dutt)，「南非國大黨」的主席古米德 (J. T. Gumede)，當時阿爾及利亞激進派反殖民運動「北非之星」(Etoile Nord-Africaine) 的創立者兼領導者哈吉 (Messali Hadj)，來自印尼的哈達 (Mohammed Hatta)，1922 年「殖民聯盟」的創立者胡志明，以及真納、肯亞塔、「黑佬防衛同盟」(Ligue pour la Défense de la Race Nègre, 簡稱 LDRN) 秘書長加藍·庫雅特 (Garan Kouyaté)，共產黨「非洲民族會議」領袖顧馬 (J.A. Guma)，還有被稱做代表了加維 (Garvey) 的「美國黑人聯合促進會」(UNIA) 或「美國黑人黨」(American Negro Congress) 的莫爾 (R. B. Moore)，激進派馬克思主義者尼赫魯，和泛非洲民族主義者拉明·桑戈爾 (Lamine Senghor)，「黑佬防衛同盟」主席，來自埃及的尤錫夫 (Ibrahim Yousseff)，另外還有來自西方的支持者如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其他還有遠從敘利亞、韓國、古巴、委內瑞拉、阿根廷、墨西哥、海地和秘魯的代表。

177 因為這一次成功的開始，「反帝國主義暨民族獨立聯盟」(the 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 and f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後來通稱為「反帝國主義聯盟」) 以尼赫魯為榮譽主席，在柏林成立 (德國被評估為最適合的歐洲據點，因為它已經不是殖民列強了)，總部設於倫敦和巴黎，分部則遍及印度、墨西哥、北非和中國。著名的反帝國主義者、英國社會主義派的國會議員 (獨立勞工黨)，同時也是「印度國大黨英國委員會」的前任聯合秘書長布洛葛威 (Fenner Brockway)，被選為主席。

這個「反帝國主義聯盟」的功能之一就是接掌反帝國主義的某些事務，這些工作原先由「共產國際」，以及現在已經解散的「東方解放同盟」所負責。「共產國際」出版《國際新聞通訊》(*Inprecorr*)，「殖民聯盟」出版偏共產主義的刊物《巴黎》(*Le Paris*)，「反帝國主義聯盟」出版《反帝國評論》(*The Anti-imperialist Review*) 以及《資訊錄》(*Information Bulletin*) 和《被壓迫和被禁錮人民期刊》(*Journal de Peuples Opprimés, Châines*)，還有許多以殖民為主題的激進宣傳冊和海報。第二次大會在 1929 年於法蘭克福舉行 (Geiss 1974; Hooker 1967: 11; Jones 1996; Langley 1973: 304-312; 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 1931, 1935; Padmore 1956; Wilson 1974)。在很多方面來看，把基地設在蘇聯以外的地方是比較實際的安排，可讓身處帝國中心或者殖民地行動分子比較自由地接觸，也可以對帝國的殖民政府所進行的殖民事務以團體的力量公開施壓。「反帝國主義聯盟」直接和殖民地的反殖民行動派結合，並且也和歐洲的共產黨聯合。這個聯盟促使「共產國際」不再依據那些在帝國中心運作的共產黨所規劃的反殖民行動，決定接管它們的組織。同時，許多的訓練機構在莫斯科成立。「莫斯科科學研究院」開設了一個特別的「非洲研究」的課程，以訓練蘇俄和非洲學生研究民族問題和殖民問題。另外，「東方勞動者大學」，以及「共產紅教授研究院」(Academy of Red Professors) 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協助，以結合、訓練在非洲、亞洲和其他地方反殖民的行動分子。「列寧大學」大部分的學生是來自西方，但也同時有許多美國黑人，還包括了一些信奉加維主義 (Garveyism) 的學生 (Padmore 1956: 318; Wilson 1980: 79)。也有中國學生就讀「孫中山大學」，包括了 (很奇怪地)「中國國民黨」領袖蔣介石的兒子，後來正是這個兒子主導「國民黨」政權解嚴，走上自由開明之路。

莫斯科校園有來自國際各地的學生，這種現象不算特別。同樣的現象也是以一種非正式的形式出現在倫敦、巴黎和里斯本，以及紐約的哈林區和美國其他的大學。投身歐洲和美國的反殖民主義者大多流放在這些帝國首都，他們或者為了進大學受教育，或者因為政治活動被迫流亡，生活在帝國都會中心開放的政權下 (例如，在殖民地，貿易聯盟和共產黨都是被禁止的，但是在歐洲是合法的組織)，或者是因為他們在大戰時加入軍隊，因而被剝奪了回國的權利。在殖民帝國境內比在殖民地享有較大自由表達政治理念，而且比較容易接觸到「煽動性」的文學，因此他們的流放經驗和近期後殖民的離散社群有同樣的效應：這些經驗鼓勵他們定義自己的政治和文化身分認同，也為他們的政治發展出理論和哲學基礎。正如阿布代·馬力克所說：「那段期間的革命分子生活在一個……與帝國都會對話的架構中；而且就是因為與帝國中的左派接觸，才開啓了雙方的討論」(Abdel-Malek 1981, II: 89)。參加布魯塞爾的反殖民會議大部分是有這樣離散背景的行動派。就像後殖民主義一樣，反殖民主義有部分就是由於這些離散人士推動，主要都是由他們扣連的

運動。跨越疆界的知識分子兼政治家將他們在西方的經驗，加上本土的思想，兩者兼併融合到他們的思維中，產生反殖民運動。不用說，他們對西方思想的興趣集中在反殖民鬥爭；他們展現了非凡的能力，將任何可以納入反殖民思想的論點善加利用。

有些殖民地的屬民，如法農和甘地，在帝國首都就學，然後到其他殖民地工作，因而漸漸發展出基本的反殖民立場。另外有些像阿爾及利亞的班貝拉，在參與解放鬥爭之前曾在殖民軍隊中受軍事訓練（班貝拉曾在中南半島的法國軍隊中擔任中士）。這些情況還產生一個特別的效應，也就是反殖民主義在策略方面是由那些流亡在殖民地之外的人所發展出來，這些策略不只幾乎完全是由男性所主導，而且是從男性觀點出發。女性在民族運動中也是積極活躍，但是女性很少離開殖民地，或者被迫離開家園。但是正如反殖民分子恩克魯瑪所回憶，當這些男性流亡在海外的時候，通常得到同情他們的左翼歐洲婦女的協助。這些人在流亡時是社會主義者，他們回到家園後積極鞏固女性主義和民族運動之間原本已經建立的關係。至於其他回歸殖民地的政治領袖，如甘地或肯亞塔，情況就比較複雜。正如他們所言，其他的就是歷史：在民族解放開始勝利之後，後殖民主義有一部分是受到需要延續婦女解放鬥爭的驅策和界定。

#### 四、第三階段：1945年之後

1917年是一個標記：帝國列強的政治現狀粉碎了，而且已無可挽回。布爾什維克革命並沒有為被殖民的人們帶來立即的改變；姑且不論帝俄的狀況，除了愛爾蘭獨立之外，沒有殖民地在1917到1945年獨立。但是事實的狀況沒有那麼悲觀：除了蘇聯之外，其他勢力，如德國和日本，為殖民地的反殖民組織提供物質和道德上的支持。德國人對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趣可回溯到1880年代；正如列寧所說的，這些記錄都在《世界經濟檔案》（*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中有案可考。（Lenin 1968: 248）。德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積極協助愛爾蘭和印度民族主義者。一次大戰之後，南非白人民族主義者（*Afrikaner nationalists*）越來越同情納粹德國，因為納粹德國當時把自己塑造成抵抗英國的霸權——英國在戰後居主導地位，整個歐洲宛如環伺在側。納粹追隨德國帝國傳統，積極鼓勵英屬殖民地的反殖民抗，並且在巴格達、耶路撒冷和英屬中東的其他城市培養基層組織，甚至和愛爾蘭的「愛爾蘭共和軍」（IRA）建立關係（Koebner and Schmidt 1964: 290; Dillion 1994; W. D. Smith 1986）。但是除了有一些針對印度民族主義者鮑斯（Subhas Chandra Bose）生平的討論之外，納粹的反帝國主義在今天不會受到重視，這也是意料中的事。即使在歐洲，反帝國主義的立場絕對不等於左翼的立場：有時候某個

政權所採的各種政治傾向事實上沒有什麼不同，就像英國的例子，或者像蘇聯，史達林最後所進行的是舊沙皇的帝國主義之實。就政治的意識形態而言，解放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和納粹反帝國主義不同，雖然在意識形態上納粹的反帝國主義是反對盎格魯撒克遜霸權，但它處心積慮，策略性地建構自己帝國主義的藍圖。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民族運動也不例外。

日本也不例外。如前所述，日本在1905年打敗俄羅斯帝國之後，以反殖民勝利之姿趁勝追擊。在1927年所謂的「田中備忘錄」（*Tanaka Memorandum*）之後，日本開始在東南亞建立一個以經濟和政治宰制的勢力範圍，稱為「繁榮體」（*sphere of prosperity*），以侵略滿州開始。當他們橫掃歐洲在東南亞的殖民地時，日本代表的是足以和英國、美國、荷蘭在遠東的帝國主義競爭的力量，日本視自己的征服為解放，將這些殖民地納入日本太平洋經濟區域的運作。在二次大戰期間，某些國家把日本人當做解放者般歡迎它，例如緬甸的民族主義者，以及印尼的蘇卡諾（Kahin 1952; McVey 1965; Meyers and Peattie 1984; Törnquist 1984: 48）。在美國，許多非裔美人行動派，包括杜博斯（W. E. B. Du Bois），基於種族主義將日本和日本的民族主義視為足以領導各民族，他們共同的目標就是反對白種人的帝國主義（Lipsitz 1997: 329）。傅瑞迪說：「許多非洲人、亞洲人和加勒比海的人都樂見一個有色人種的國家對歐洲還以顏色」（Füredi 1994: 27）。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同盟國」讓原本義大利占領的突尼西亞和利比亞獨立（但先確定新的政權是「溫和派」），但是在其他地方，顯然還是以商業或者帝國做為考量，被日本占領的殖民地歸還給原先的帝國。但是，英國、荷蘭和法國等帝國在東方被日本擊敗的事實，不但激勵了殖民地對爭取自治的期望，歐洲列強從此再也無法重建他們先前的帝國霸權了。在二次大戰期間以及戰後隨之而來的普遍紛亂不安，不亞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動盪，從暴動到「印度解放軍」襲擊印度，還有其他各地的紛亂：阿爾及利亞、英屬圭亞那、巴哈馬群島、布干達（Buganda）、緬甸、印度、肯亞、馬來亞、奈及利亞，所羅門群島以及薩伊（Zaire）（Füredi 1994: 36-52）。戰爭末期，各地的要求已經升高到不能接受任何像1919年一樣，重申殖民地有控制權之類的權利就可了事。英國已經承諾讓印度獨立，而在許多英屬殖民地，甘地的「真理力量」（*satyagraha*）<sup>譯註3</sup>似乎是可行之路，即使英國政府不斷在印度、巴基斯坦、緬甸、錫蘭、加納等地設限。其他殖民列強，尤其是法國、荷蘭和葡萄牙，非常不願意允諾任何殖民地獨立。日本戰敗之後，「法國共產黨」創立者之一的胡志明宣布越南獨立；但是，由於英美的協助，法國很快地重新

<sup>譯註3</sup> *satyagraha*：由印度文的兩個字「*satya*」（真理）和「*agraha*」（堅持）結合而成，代表「堅持真理的力量」（*Holding Fast to the Truth*）。甘地的信念是，真理才能產生力量，因而採取「不合作」或「非暴力抵抗」做為策略。

占領越南。但是法國人從未完全壓制共產黨：先前對抗日本的胡志明軍隊繼續反抗新的殖民勢力。這種持續對抗的力量顯然也發生在馬來亞，「馬來亞抗日人民軍」(MPAJA)曾經對抗日本的侵略，在1948年之後毫無困難地由「馬來亞共產黨」將它轉變成「馬來亞反英人民軍」[(MPABA)，後來被稱為「馬來亞軍隊」(MRLA)]，繼續抵抗英國企圖重新全面掌控有自主權的地區。和「茅茅運動」的情況一樣，英國在1954年宣稱勝利，然後在三年之後撤離。當時仍舊是不合法的「馬來亞共產黨」繼續對抗獨立的馬來亞政府(O'Balance 1966)。在不同的殖民地和不同的獨立政權之下，像這樣複雜的歷史還有菲律賓和其他地方的游擊戰(Rafael 1995)。

阿布代·馬力克的第三階段原本可以以1941年的「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r)做為開始。在此憲章中，小羅斯福(F. D. Roosevelt)和邱吉爾宣布他們尊重「所有民族選擇有權利選擇他們生活所在地的政府形式；而且，他們希望將權利歸還給那些被武力剝奪主權和自治政府權的民族」。當被問及這是否指的是英國殖民地時，羅斯福和邱吉爾後來對於大英帝國的殖民地以及納粹掌控的歐洲殖民國家是否也包含在內，兩人意見不同。但是，無論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邱吉爾已經為帝國敲下喪鐘(Brinkley and Facey-Crowther 1994; Committee on Africa, the War, and the Peace Aims 1942; Parliamentary Peace Aims Groups 1941)。從1945年「聯合國」在舊金山會議成立之後，反帝國主義和去殖民變成國際議題的主要焦點(Ferrair Bravo 1981)。後來，雖然有「大西洋憲章」的宣布，但是美國態度曖昧不清，一方面支持獨立運動，但是當獨立運動向左傾的時候，美國就試圖採取鎮壓手段。美國最後在1946年才同意其菲律賓殖民地建立新的殖民共和國。實際上，是美國打敗了英國和法國在蘇伊士(Suez)的勢力。最重要的是，蘇聯和當時的中共支持世界各地日益壯大的民族解放運動，尤其是非洲和亞洲。這兩個地方的解放運動採用不同的形式，因為非洲的反殖民主義大部分是直指白人拓居者和舊的殖民勢力；而在亞洲，中共的出現以及1950至1953年的韓戰意味著解放鬥爭變成冷戰中另一種權力鬥爭的一部分(到最後，非洲的解放運動也被拉到這個權力鬥爭中)。這也導致美國在亞洲和非洲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一方面，美國樂見非洲國家獨立，另一方面則對它自己在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帝國領地有截然不同的態度。美國之所以成為1960年代反帝國主義者最主要的焦點，就是因為它為了自己的利益——最著名的就是越戰的例子，不惜延續它協助(或建立)腐敗專制政府的立場——它在南美對抗所有的群眾運動，只為了自己的商業利益。美國這種作法剛好就激發兩大洲的反帝國主義：亞洲和南美洲。在亞洲，反帝國活動由中國和越南領導，在南美則以古巴為首。

第二次世界大戰並未結束歐洲以外的戰事。阿布代·馬力克強調，對三大洲而言

戰事在各地持續……。這就是為什麼1945年之後，在三大洲人民心中，『世界和平』的概念是如此的遙不可及，甚至是陌生怪異的。和平，和誰談和平呢？……暴力從世界的這一端散播到另一端，帝國的霸權在這樣暴力瀰漫的氛圍中，變得越來越強硬。(Abdel-Malek 1981, II: 91)

但是這個暴力也象徵一個事實：潮流要轉向了——不只是因為印度在1947年獨立，更是因為1949年中國的革命在許多方面意義重大。1947到1957年之間，殖民地情勢有了決定性的轉變。「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的勝利對殖民國家的影響，就如布爾什維克革命對歐洲的影響一般。這是第一次，一個原先是半殖民的非白人國家，經過軍事手段，成立了獨立的共產政府：民族解放在社會革命結合在一起。經過許多年對抗「國民黨」和日本，毛澤東的成功為中南半島(尤其是越南)的反殖民鬥爭注入了新的活力和資源。隨著史達林主義在歐洲日趨嚴苛，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在歐洲以外地區經歷轉變。由於「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發展不同形式的三大洲共產主義，轉變反而助長了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共產國際」政策的逆轉和它對中國的禍害，隨著一個人取得權勢而結束：毛澤東。毛澤東雖沒有真正被逐出共產黨，但也早先曾經失勢。隨著1934至1935年的「長征」，「中國共產黨」遷移到延安，並且強化其自主權。在毛澤東在1937年成為黨主席之前，「共產國際」已無力干預、抗衡他了。毛澤東形式的中國共產黨植根於農民的革命潛力，不依靠都市的無產階級，這樣的方向對三大洲的左派民族主義有非常深刻的影響。這是第一次，馬克思主義因應三大洲的社會現實重新建構後，發揮了力量。從此之後，共產主義不再只有一個「官方模式」——一個即使在不相干的脈絡中也要運用的模式。

## 14.

## 中國、埃及、萬隆會議

## 一、毛澤東與中國革命

因為「共產國際」的問題，三大洲的反殖民運動各有不同，即使這些鬥爭在各地持續不斷，就國際的角度來看，政治上的影響並不大。但是這樣的情況隨著毛澤東在1949年打敗蔣介石的軍隊之後就戲劇性地改變了。這是第一次，在西方以外的地方發生社會主義的革命（蘇俄是位於東西邊界之間的歐洲化國家）當然，中國從來不是歐美正式的殖民地，也沒有完全被入侵的日本所殖民（日本軍隊雖然有許多次勝利，但從未完全占據整個中國）。無論如何，中國的半殖民的地位顯示，毛澤東的勝利對殖民國家和半殖民地的政治活動，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半殖民地，具有實際的激勵作用。毛澤東的革命所反對的是帝國主義而不是殖民主義，因為他先對抗的是入侵中國的日本帝國的軍隊，然後才對抗地主階級的勢力，以及英美所支持的資產階級「國民黨」。這個事實一直是毛澤東思想和辭令的主調，並得到一些人的認同，還有些人將之移轉到三大洲其他類似狀況中的革命，包括金日成（Il-song Kim）、胡志明和切·格瓦拉等人所領導的革命。而且，中國革命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特別強調像中國和拉丁美洲這種「半殖民」的狀況，如果爭取政治的主權也連帶表示爭取社會和個人的解放，那麼民族主義就代表了反動和解放的力量，並且需要更進一步的革命。毛澤東將民族解放和社會經濟的解放兩者的關係徹底重新檢視評估，強調需要調整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以回應各地特殊的狀況，尤其是有關農民的角色和土地問題。毛澤東獻身於領導農民對抗地主，隨後修正共產黨政治，因此轉變了三大洲農民社會的革命潛力。這就是為什麼對許多人而言，毛澤東代表一個從自己角度出發的三大洲革命的範例和可能性。毛澤東之後，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解放運動越來越認同農民，而不是都市的無產階級，並且將革命定位在農民革命。共產黨一直以都市無產階級做為革命力量唯一的先鋒，在三大洲以農村為主的社會中，這個策略就是它長久以來無法在政治上成功的一大障礙。

我曾在第11章簡略敘述「共產國際」的政策在中國一敗塗地，我提到毛澤東因為《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而被解除「中國共產黨農民部」部長的職務，因為他在報告中主張農民才是最主要的革命力量。在1927年共產黨員被剷除及隨後的「長征」之後，毛澤東取得黨內領導地位。他所依賴的多半是游擊策略，後來和

182

183

「國民黨」聯合抗日的合作基礎也不甚穩固。國共雙方互不信任，美國打敗日本之後，國共雙方開戰。毛澤東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時候才18歲，他的成年生涯幾乎在戰亂中度過：對日本的戰爭，對「國民黨」的戰爭（後來「國民黨」沒有完全被打敗，撤退到台灣），和美國の間接戰爭（因為美國支持「國民黨」），和台灣「國民黨」的對立，以及和韓國的戰爭（毛澤東的兒子死於1950年的韓戰），還有其他和南越傀儡政權的戰爭——毛澤東死前一年，美國在越南大敗。由此經歷可想而知，毛澤東的《毛澤東選集》五卷中所關注的焦點大半都是這些戰爭。他一生的戰爭經驗——在中國的戰爭，以及隨後與中國邊界國家的戰爭——對他的思想有很重大的影響；他的思想一直在對立的兩股力量之間的戰鬥中運作：內部和外來，或者內部和內部之間永遠的戰線。

在莫斯科的史達林和托洛斯基都無法掌握中國社會城鄉巨大的差別，在都市的是一小群無產階級，而鄉村仍舊由勢力強大的地主階級所控制，可憐的農民任由其宰割——這樣的區別根深蒂固，因此即使經歷了50年的共產主義，中國社會中城市與鄉村截然清楚的二元化區分仍舊持續到今日（雖然毛澤東宣稱將在共產社會中消滅這個差距；Mao 1965, I: 345）。在毛澤東的時代，即使是這樣的區分也將中國社會結構的複雜性和異質性過分簡化了，因為中國社會中還包括了擁有大企業的資產階級、一大群官僚、知識分子、職業軍人、強盜惡棍、還有一貧如洗的鄉下窮人，這些人都受制於宗族制度（clan system），以及地方和政府各種形式的政治勢力。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體認到，在中國，鄉村的農民才是革命力量的基礎，而不是都市的無產階級。毛澤東沒有遵循「共產國際」強迫三大洲社會奉行古典馬克思主義的策略，他想另闢蹊徑的意圖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已經顯現端倪（Mao 1965, I: 23-59）。「共產國際」也體認到農民的重要性，並將農民列為重要的動員力量：列寧本人在1920年曾主張「農民的蘇維埃（soviets）<sup>譯註1</sup>，被剝削者的蘇維埃，就是可以運用的武器，這不只適用於資本主義的社會中，也適用於前資本主義的國家……包括落後國家和殖民國家」（Lenin 1968: 598）。無論如何，農民從未被「共產國際」當做革命潛在的先鋒，「共產國際」認為自己不可能領導一個鄉村農民和精密的工業化都市社會的混合經濟，也不可能因此在戰爭中獲勝，農民不可能領導戰爭，甚至贏得戰爭，因為這種混合的現象就是1917年俄國所面臨的狀況。因為這樣的原因，「共產國際」的重點一直放在黨的角色以及都市無產階級。但是由於日本的侵略，以及由「共產國際」協助訓練其軍隊的「國民黨」軍閥勢力強大，中國的狀況其實大不相同。毛澤東被拒絕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曾說明，普遍的自發性農民組織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在鄉村對抗各地主的專制。「國民黨」把這些最可憐的農民發起的組織斥為「痞子運動」。毛澤東為這個評語下

<sup>譯註1</sup> soviet原本的意思是指共產國家的「代表會議」或是「革命委員會」。

了這樣的註腳：

總而言之，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紳士們打在泥溝裡，在社會上沒有了立足地位，沒有了發言權的人，現在居然伸起頭來了。不但伸起頭，而且掌權了。他們在鄉農民協會（農民協會的最下級）稱王，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裡弄成了很兇的東西了（Mao 1965, I: 29-30）

毛澤東說，這些「痞子」，這些赤貧的底層階級的人民擁有讓中國改變的真正的革命力量，而且農民也是早先推翻封建勢力的革命先鋒。因此，他們最能夠回應「共產黨」的領導，因為「共產黨」相信他們的運動以及他們的成就（毛澤東列出14件大事）。「共產國際」政策失效之後，毛澤東在對抗日本和「國民黨」時，將「共產黨」與廣大的農民結合。毛澤東從來沒有放棄他對農民的力量和價值的基本信念：是毛澤東不再將農民視為問題，也不像布爾什維克認為農民必需被政治化，以便走向一個進步的政治。毛澤東將農民視為一股強大而激進的政治改變的力量。這種改變立刻在所有被殖民地，以及依賴的非工業化國家得到回響，因為在這些地方，以工業無產階級為基礎的革命模式根本就不適合。

## 二、毛澤東的矛盾

毛澤東也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調整到一個以民眾為基礎的中國導向。這一點由他在1937年和1957年的兩篇談論「矛盾」的文章中最為明顯（Mao 1965, I: 311; V: 384）。根據阿圖塞（Althusser）的看法，這兩篇文章最完整地呈現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特色（Althusser 1977: 182）。毛澤東認為辯證法就像是敵對的兩股內在力量相互拉扯對立，由此產生變化：「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透過內因而起作用」。他用俄國革命的例子來解釋：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不只是開創了俄國歷史的新紀元，而且開創了世界歷史的新紀元，影響到世界各國內部的變化，同樣地而且還特別深刻地影響到中國內部的變化，但是這種變化是通過了各國內部和中國內部自己的規律性而起的。（Mao 1965, I: 314）

毛澤東重視從內在的力量而產生的變化，因此特別強調歷史上主觀和客觀的力量，這是對古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個重大的修正，開啓了後來由法農和切·格瓦拉所發展的屬於三大洲社會主義的，非個人化的人文主義新思想，也成了阿圖塞〈矛盾和多元決定論〉（‘Contradiction and Overdetermination’）一文的基礎（Althusser 1977: 87-128）。同時毛澤東也是第一個強力主張社會中上層建築的力量



足以改變基礎：

生產關係、理論、上層建築這些方面，在一定條件之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著如同列寧所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的時候，革命理論的創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著政治文化等等上層建築阻礙著經濟基礎的發展的時候，對於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為主要的決定的東西了。（Mao 1965, I: 336）

因此，毛澤東的主張像一體的兩面。他不只是著重變化中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他也指出文化和政治因素可能阻礙變化，因此就需要一個文化革命來導正。毛澤東以激進的方式重新調整理論的方向，主要是因為他相信群眾的能動性和力量，而且相信農民有文化和政治的智能。毛澤東和史達林相反的是，他相信群眾的自發性，強調他們有能力將弱點變成力量，並且主張農民所擁有的知識是知識分子所無從理解的（Mao 1965, IV: 243）。他的基本信念就是在政治的過程中需要有人民的參與，而他所提的「群眾路線」的理論正是這個基本信念的延伸（Mao 1965, B: 50）。同時，群眾路線就是接近大眾、動員他們，把黨的思想轉化成群眾的行動，而黨要能夠回應人民對它的奉獻。這種強調人民主動參與特別有吸引力，因為俄國已經淪落到官僚和黨內菁英的思考模式中，和日常生活的困苦越離越遠了。毛澤東最具革命的特點之一就是相信一般大眾的文化，這一點仍受到反動派的排斥。

186 毛澤東之所以這樣地肯定一般大眾，尤其是農民的角色，是因為他體認到共產主義的成功並未讓1911年以後中國內部嚴重的分裂立即結束。他認為有必要聯合潛在次要的敵人打擊共同的主要敵人，因此主張用一個稍微不同的觀點在社會中運作辯證法，不是只有簡單的階級區分。對毛澤東而言，這不只是找出中國社會內部的矛盾問題，更要在任何關鍵時刻，在眾多問題中將主要的矛盾分離出來。毛澤東認為社會中的矛盾是不平均的，因此主要矛盾本身所展現的不只是主要的，還有非主要的方面。在政治和軍事層面，這就變成在複雜的環境中決定戰略和策略的問題。毛澤東對中國情勢的分析迥異於西方簡單直接的階級之爭的觀念，因此從理論的觀點來看，他的主張比較接近後殖民社會中異質性的多樣化。在1930年代，毛澤東認為帝國主義是中國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則包括封建主義和農民的群眾力量之間的對立。到了1950年代，他認為主要矛盾存在中國人民本身。他在1957年的重要演講〈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毛澤東承認「階級鬥爭還沒有結束」，並且認為中國社會內部仍舊有各種不同的對立。他認為應該區分公然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不同的群體，如勞工階級、農民、工業家、商人、知識分子和少數民族，對於前者應該予以壓制，對於後者應該採取差別政治。他反對黨採取箝制批評的路線，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強韌有力，如果能在自由辯論的環境中「透過

鬥爭」，就可以有進一步的發展。因此毛澤東提倡容忍異質性，由此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才得以浮現，讓大家認清。基於這個原因，他也主張「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從他的口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以及「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可看出他想要以「適合中國特殊國情」重新調整列寧式的民主中央集權主義（Mao 1965, V: 408-11; Mao 1989: 131-89）。但是在中國，這些想法後來在違反法紀的時候比較受推崇，反而不是在奉行條規時的口號。在實際上很難要全國性和地方性的積極行動派清楚劃分反革命分子和非敵對的異議分子，尤其是面對集體化抗爭之類的政策時。

### 三、文化大革命

「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Mao 1970: 120）。毛澤東對農民的智慧的信心，延續到他後來繼續對抗中國反革命資產階級的文化和官僚體系。他堅持反動的力量在經濟基礎變化中仍舊存在，必需透過進一步的上層建築的革命反制。在1966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權力鬥爭時期，毛澤東和林彪共同發展這樣的思想。「文化大革命」實現毛澤東對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激進修正，因為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基礎的改變將轉變文化的上層建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項工作做的更多、更快、更好、更省」（Mao 1970: 125-6）。儘管社會主義的改變連帶使經濟基礎改變，但是毛澤東所一直關心的還是社會實踐和意識形態如何持續的問題。他對於社會結構中反革命力量的連續一直抱持實際的態度。雖然文化革命也是中國內部領導之間權力鬥爭的產物，但是它也代表第二次革命的必要性，也就是需要改變社會的結構——這個觀念很吸引西方和其他地方的激進派，同時也引導一些如阿圖塞之類的學者重新定義意識形態（也導致他後來將意識形態定義為永恆而引發著名的爭議），並考量社會結構中的機制和其他因素如何操作，變成抗拒改變的力量（Althusser 1971）。毛澤東的理論在1960年代激進派左翼知識分子之間產生很大的影響力，尤其是阿圖塞和巴黎著名期刊的《原樣》（*Tel Quel*）小組成員〔如巴特（Barthes）、克莉絲蒂娃（Kristeva）、索萊爾（Sollers）、德希達（Derrida）〕，這些人劃時代的著作一直被視為是從結構主義轉變成後結構主義的代表（Culler 1975）。伊立特（Gregory Elliott）證明毛澤東的理論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對阿圖塞作品的深刻影響，但是法國後結構主義中有多少是毛澤東所重整的歐洲政治和文化理論，以及法國後結構主義和深受毛澤東思想影響的印度後殖民主義之間的複雜關係，這些都仍有待研究（Althusser 1966; Elliott 1987）。從在澤東自己的作品改變的痕跡也可看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他的寫作從《毛澤東選集》優雅、古典的風格變成十分激進。在

「文化大革命」期間，他的作品不再詳述政策，而是一連串非連貫的、命令式的指導原則，將理論化成一些大眾日常生活的基礎，在思想和日常生活實踐之間建立緊密的關聯性。同時，他舊有的論述作品被重新編輯成一本本以主題結成的選集，也就是著名的小紅書——《毛澤東語錄》。毛澤東的思想因而被拆散開來，變成簡練的觀感和片段。這就是群眾路線政策的一個例子，讓他的思想立刻廣為流傳，而且具有說教的作用。數百萬冊的毛語錄印製發行，「文化大革命」的示威者手中拿著一本本毛主席的小紅書，紅色的封面在空中揮舞的畫面讓人印象深刻。毛澤東的思想變成意識形態戰爭中具體的武器，毛澤東的思想被推上崇高的偶像地位，變成政治意志和社會現實的一個具體符徵（signifier）。

188 「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在於上述的百花齊放和消除反革命分子兩個原則之間的困難。一方面，「中國共產黨」第11屆人民大會中央委員會的16條主張「必須嚴格分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內部矛盾搞成敵我矛盾。……人民群眾中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現象。幾種不同意見的爭論，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Mao 1970: 121）。另一方面，16條又鼓勵將「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個大致上是反面的擊劃，基於下面的假設：

資產階級雖然已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格、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格、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ibid.: 117-8）

毛澤東主張這個鬥爭需要「經歷很長很長的時期」；「文化大革命」在「不間斷的革命」過程中只是第一個階段。這個觀點鼓勵將社會的區分具體化，無產階級的文化在當時顯然只被定位在革命和反革命階級的敵對狀態中，藉以掃蕩那些阻礙經濟基礎改變的上層建築因素。

1956年之後，中蘇分裂以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在意識形態方面向中國靠攏。中國重新振奮了革命的精神，而且願意對解放運動，以及位在第一線，受到高度壓迫的三大洲國家，尤其是莫三比克、南非、西南非、尚比亞和辛巴威等國，提供顯然對它無利可得的實質協助，而且它傾向農民和土地革命，並且傾向由下而上的鬥爭，這些都是以人民為方針，它還強調以游擊戰和武力鬥爭對抗帝國主義，這一切都是大轉變，影響並鼓舞三大洲所有解放運動，尤其是拉丁美洲（Mazrui 1993: 804-6）。毛澤東的農民革命為三大洲的馬克思主義重新調整方針，為法農、卡布拉爾和格瓦拉的等人立下基礎。納瑟和尼赫魯所實施的、資產階級菁英偏好的溫和社會主義路線的民族主義已經被超越了。

## 四、埃及

如果從掙脫殖民帝國而獨立的目標來看，早期一些最具意義的革命運動其實不算真正的民族解放運動。最早中國對日抗戰就有民族主義的意義，但是中國真正的革命是針對「國民黨」。同樣地，埃及革命的政治意義不是來自反殖民革命，因為理論上，埃及在1922年就獨立了。但是長久以來，埃及就一直是反殖民抗爭的象徵。1805年以來，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ī）治理下的埃及就是一個被殖民國家的範例（在當時是受奧圖曼帝國統治），有訓練有素的軍隊，也有堅強的工業和農業經濟基礎，享有高度政治獨立。就政治觀點來看，埃及在兩個選擇之間擺盪，一是仍舊在帝國之下享有自主權，一是完全獨立，本身變成一個帝國勢力。就現實而言，在穆罕默德·阿里以及他的孫子伊斯麥爾（Isamil）的治理之下，埃及的經濟進步，在港口設備、道路、鐵路和電訊方面的基礎建設都很現代化，國家教育系統高度發展，而且有蓬勃的新聞以及具有國際性的文學和文化環境，甚至具有強大的軍事機器。為了因應歐洲列強與日漸增的干預（從1840年的「倫敦條約」開始，一直到1882年英國侵略埃及），埃及本身發展出一個堅強的文化民族主義，不斷抵抗英國的宰制，即使它的軍隊無法抵擋英國格林槍的威力。雖然被英國占領，後來還有克若摩的去工業化將埃及變成蘭開夏（Lancashire）棉花工業的經濟衛星。埃及在經濟、軍事和文化方面成功的自我賦權（self-empowerment）的經驗，提供了一個實際的現代化的模式，供所有國家借鏡，無論像印度、愛爾蘭、北非馬格里布（Maghreb），譯註<sup>2</sup>的被殖民地，或者像日本或土耳其有被殖民之虞的國家（Ajayi 1989: 355; Mitchell 1988）。埃及民族主義知識分子杜思·穆罕默德·阿里（Duse Muhammad Ali），同時也是泛非洲主義刊物《非洲時代和東方評論》（*African Times and Orient Review*）（1912-1918）的倫敦編輯，還是激進民族主義的《在法羅王的土地上》（*In the Land of the Pharaohs*, 1911）的作者，是他啟發了加維，為他的思想提供了主要的根源。

## 五、納瑟

英國在1914年正式宣布埃及為其保護領地，但是由「埃及國民黨」（al-Wafd al-Misri）譯註<sup>3</sup>領袖所領導的民族抗爭，到了1919年的革命達到高峰：此次革命成

譯註<sup>2</sup> 阿拉伯馬格里布聯盟（Union of the Arab Maghreb）：指非洲北部鄰地中海國家，包括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斯和利比亞。

譯註<sup>3</sup> al-Wafd al-Misri是阿拉伯文，指國民代表，又譯「華夫脫黨」，是一個推動埃及國家獨立和廢除君主制度的政黨。1916年是埃及人民的常設代表團，1929年正式成為政黨。1936年埃及完全獨立後，該黨與國王長期衝突。

功地動員了埃及社會各階層反對英國統治，包括婦女也加入公開示威。1922年3月，英國承認埃及在2月正式宣布的獨立。但是，在國王福阿德一世（Fu'ad）的統治之下，埃及實際上還是在英國的管轄，主要因為他和「國民黨」長期激烈的紛爭（Boahen 1985: 585; Vatikiotis 1991）。因此納瑟在1952年為對抗順服的王室而發動的革命其來已久。這場革命就其發展而言，可說是相對地緩慢：因為納瑟直接受到甘地非暴力的理念所影響，所以不願意處死法魯克（Farouk）國王，因為他相信「流血的革命將會以流血收場」（Mazrui 1993: 116）。在1954年，納瑟取得充分的政治控制權，開始和英軍協商撤退之事。但是他最具關鍵性的介入，為埃及爭取到真正的獨立是在1956年。當時美國和英國不信任納瑟的「埃及國民黨」政權，因此決定取消對阿斯旺水壩<sup>譯註4</sup>的資助；而納瑟則立刻還以顏色，宣布埃及收回蘇伊士運河主權。英法和以色列聯軍成功地入侵埃及，但後來受到美蘇兩國的壓力而撤軍。對英國而言，這至少標示了現代時期殖民主國第一次明顯的失敗（法國一直想要給予納瑟致命一擊，因為法國認為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的主要支持者就是納瑟，但是法國人自我安慰說，至少他們最初的時候曾取得殖民的軍事勝利）（Clayton 1994: 124-5）。

190

蘇伊士運河危機讓納瑟在一夕之間成了三大洲的國際英雄，也成了參與「不結盟運動」國家的當然領導人之一，同時也是中東對抗西方宰制的核心人物，尤其是在伊拉克與西方在1955年的「巴格達協定」（Baghdad Pact）之後。就像卡斯楚和其他革命領導者一樣，掌權越久，納瑟就變得傾向越社會主義。他的社會主義採取國家化的形式，要確保經濟的獨立，而且有一套重新分配土地和財富的政策，並且加強健康照護，以及教育制度去英國化，這一切措施比印度尼赫魯的政策更進一步。納瑟的《革命哲學》（*Philosophy of Revolution*, 1954）寫於1948年巴勒斯坦戰爭期間，書中幾乎沒有提到基本的社會主義取徑，除了宣稱「世界上每一個國家經歷兩次戰爭」之外。他認為第一次的戰爭是民族解放的政治革命。「第二次革命是社會革命，社會上的階級相互鬥爭，直到全國人民得到公正公平，而且情況穩定」（El-Nasser 1954: 23）。根據他將埃及的影響力擴散出去的同心圓觀念，納瑟結合了泛阿拉伯主義、泛伊斯蘭主義和泛非洲主義。就像恩克魯瑪對泛非洲主義一樣，納瑟聯合敘利亞在1958年建立了「阿拉伯聯合共和國」（United Arab Republic），很快地將阿拉伯國家聯合的想法付諸實現。

納瑟的觀念主要是現世主義的思想，要提昇現代化；在他掌握勢力之後不久就禁止激進的「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在他1970年去世之前，他的社會主義和非洲其他地方的發展比較起來，算是十分狹隘的。利比亞在1969年以納瑟模式發動政變之後，建立神權國家的爾卡紮菲（al-Qadhafi）一直挑戰納瑟

<sup>譯註4</sup> Aswan Dam：埃及南部一座世界最大的岩石壩，20世紀最偉大的工程。

的現世主義。納瑟努力要解決迦薩地帶（Gaza strip）的巴勒斯坦難民問題，但是在1967年的戰爭被以色列痛擊而埃及慘敗後，不得不放棄（Mazrui and Tidy 1984; Vaatikiotis 1978）。就像尼赫魯一樣，雖然在政治和歷史上的影響力無庸置疑，但是納瑟並沒有在意識形態和理論方面為社會主義發展出進一步的形式，一個足以被稱為是埃及馬克思主義或三大洲馬克思主義的形式。雖然阿布代·馬力克（1981）本人是埃及人，但是他認為，就一個比較宏觀的理論史的發展軌道來看，納瑟所代表的意義並不大。羅汀生認為從革命以後，埃及在政治發展一般都以實際考量，根據實際情勢做回應：這也就是為何納瑟和蘇聯緊密的政治結盟的原因，這樣才能讓他將阿拉伯自然神論的社會主義（deist socialism）和專制獨裁結合，但這個作法反而沒有能夠讓他發展出一個獨立的、屬於三大洲的社會主義（Rodinson 1979: 186）。

從這個角度來看，泛阿拉伯民族運動原先的伊斯蘭社會主義形式——「復興主義」（Ba'athism）在1961年對抗「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時，反而是一個更原創、更

191

## 六、1955年萬隆會議

在蘇伊士運河危機之前，從解放鬥爭的角度來看，納瑟生涯中最具象徵意義的重要事件就是1955年的「萬隆會議」。這次會議有29個非洲和亞洲國家參加；領袖包括尼赫魯、恩克魯瑪、蘇卡諾、納瑟，以及帝托——就地理而言，帝托應該不在此列，但就政治地理的觀點就算是恰當了。「萬隆會議」代表非常重要的象徵力量，因為這實際上是第一次後殖民國際會議，由從前的被殖民地變成新進獨立國家所主辦。正如阿布代·馬力克所言，這是「被殖民國家團結的第一張藍圖」（Abdel-Malek 1981, II: 108）。南斯拉夫（Yugoslavia）總統帝托參與「萬隆會議」等於是他的一个宣示，表示南斯拉夫脫離蘇聯獨立的決心。就像帝托一樣，許多出席「萬隆會議」的領袖都是傾向於社會主義，但是決心要依據自己的需要建立一個新的政治秩序。此次會議結論時有一共同宣言，呼籲非洲和亞洲各國在經濟、文化和外交各方面更緊密地聯繫，肯定人權和自決的原則，並且以各種方式呼籲終結殖

民統治。在那個階段，「萬隆會議」的主要功能是協調聯繫成一個施壓的團體，以實現這些目標；這次會議邀請了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的代表而達到立即的政治效應（Appadorai 1955;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1955; Kahin 1956; Padmore 1956: 422-51; Romulo 1956）。雖然這些參與的國家宣稱無意形成一個地區性的集團，但是「萬隆會議」在實質上是一個獨特的政治團體，它們的主張成爲亞洲和非洲是第一個公開宣示要致力於發展一個獨立的、屬於三大洲的政治意識。此次會議形成一個有潛力的新權力集團，對於全球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等的優先順序，有一個屬於「第三世界」的新觀點，因此1955年的「萬隆會議」可以說是代表後殖民主義的一個基礎。在許多方面，「萬隆會議」乃是一個開端的標記——將「後殖民」放在意識形態和政治的位置上，超越它原先只是歷史描述性的意義。的確，「萬隆」和「後殖民」在功用上有時候幾乎是同義詞——甚至兩者都限定在亞洲和非洲，排除拉丁美洲的狀況。

「萬隆會議」也爲後來1961年正式開始的「不結盟國家運動」奠定了基礎。面對全球局勢在冷戰時期，第一世界的西方和第二世界的蘇聯集團之間日趨兩極化的情況，「不結盟運動」代表企圖要建立新的權力集團，也就是「第三世界」。「不結盟運動」將焦點從去殖民化轉移到各國之間的不平等，想合力重新調整西方和其他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不結盟運動」提出建立「新國際經濟秩序」，該提議後來被聯合國採納，併入1974年聯合國「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宣言與行動綱領」中。「不結盟運動」也爲「七七國集團」立下基礎——該集團在1964年「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中首度組成，成爲聯合國討論發展議題的委員會（Jansen 1966; Jiandu and Mandaza 1986; Müller and Sauvart 1993; Singham and Hune 1986; Willetts 1978）。在均衡世界經濟的實際作用方面，「不結盟運動」做爲一個政治機制與「七七國集團」都不算成功，但是「不結盟運動」所立下的原則在意義上沒有減弱，仍是必須努力以赴方得達成的目標。「不結盟運動」的問題在於冷戰的權力結構，以致於「不結盟」在實際上幾乎行不通，因爲這個運動想要聯合成一股團結的力量，卻不斷受到國際紛爭的影響而減弱。它從未成爲一位熱心的英國評論家所宣稱將形成的「虹幕」（color curtain）（Wright 1956）。「不結盟運動」以經濟問題爲優先考量，因爲基本的後殖民經驗讓這些國家體認到，政治獨立並不代表經濟獨立。它們體認到，受經濟帝國主義所宰制的世界中，依賴的形式仍舊持續存在，這個認知到後來1966年的「哈瓦那會議」變成激進的觀念。就在「哈瓦那會議」中，南半球的三大洲——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第一次聚在一起，組成一個更大的三大洲聯盟。和「萬隆會議」比起來，「哈瓦那三大洲會議」代表反帝國鬥爭正式邁向全球化。

## 15.

## 拉丁美洲（一）： 馬力亞特吉、文化互化與文化依賴

我們是500年來鬥爭下的產物。

「墨西哥查巴帝司塔民族解放軍（EZLN）宣言」

所謂的「拉丁」美洲——但除了「拉丁美洲」之外，還有什麼其他的稱謂嗎？——在反殖民主義的歷史中，以及反殖民主義和後殖民理論的關係上，占據了一個特殊的位置。拉丁美洲早期就從歐洲統治中解放，這表示拉丁美洲絕大部分到現在幾乎經歷兩個世紀的後殖民。也就是說，它的後殖民時代在其他許多地方被殖民之前就已經開始，甚至在歐洲列強，如德國和義大利本身成爲國家之前就開始了。拉丁美洲抵抗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國主義，以及19世紀初反殖民運動、19世紀末和20世紀的反帝國運動，這一連串的抗爭史很複雜，涵蓋時間相當長，可回溯到500多年。另一方面，就獨立運動的觀點來看，具有重要意義的時段其實相當短暫，只從1808到1825年，但是面臨加勒比海的宏都拉斯、英屬和荷屬圭亞那等拉美殖民地在戰後才爭取到獨立（Kinsbruner 1994; Lynch 1986; Lynch and Humphreys 1994; Prago 1970; Williamson 1992）。法屬圭亞那仍舊屬於法國。另外，和美國脫離英國獨立之後的情形一樣，到了20世紀，巴西在經濟和文化勢力方面比它先前的殖民國——葡萄牙還要強大。以巴西的例子而言，這種自由卻是經由它轉變成依賴英國和美國而得。

「巴達帝司塔民族解放軍宣言」所說的五百年的鬥爭，其實是迦略諾（Eduardo Galeano）在《拉丁美洲的開放心脈》（*The Open Veins of Latin American*, 1973）一書中非常有力的論點：拉丁美洲一直被外國的利益和本國的代表聯手掠奪，持續500年未曾間斷。該書的重要性在於它從「長時段」（longue durée）的觀點來看拉丁美洲的歷史——該書的副標題是《一個大陸五百年來的掠奪》（*Five Centuries of the Pillage of a Continent*）——500年的歷史中，拉丁美洲所經歷的不同形式的剝削變成一個共同的經驗。正如卡彭鐵爾（Alejo Carpentier）在《消失的足音》（*The Lost Steps*, 1953）中著名的說法，在拉丁美洲，被殖民與去殖民之間的區分相對不是那麼截然清楚，後殖民是發生在殖民現代性的時差中，因此不像世界其他地方依

194 循典型的時間脈絡而發展，拉丁美洲似乎處於政治時間和文化時間同時存在的狀況。但是，封建制度和現代性同時並列，加上「第三世界」典型的問題——有時巨大的國民生產毛額掩蓋財富分配過度不均的問題，這些和其他各洲的情況並沒有什麼不同。正如法農所觀察的，殖民的現代性在結構中一直包括「時差」的因素，其中的動態能量（dynamic energy）即是史華慈（Roberto Schwarz）所謂「錯置的思想」（misplaced ideas）而造成的轉變效應所推動。在拉丁美洲，「時間弔詭」的扭曲特別顯著（Stern 1999: 135）。

從1823年的美國的「門羅主義」之後，拉丁美洲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甚至比東南亞，更順服於美國帝國主義形式的新殖民主義：無論在軍事上、政治上和經濟上均是如此。美國宰制的結果就是一種政治和經濟的無力感，連帶也造成文化認同的缺乏，這個現象所衍生的影響和各種的另類選擇在拉丁美洲依賴理論中已有充分探討。拉丁美洲對帝國主義的回應鮮少訴諸直接了當的民族主義，因為外來的政治利益所採用的操作方式就是和內部殖民主義聯合。在1961年，被趕出古巴的革命組織以武裝行動從豬羅灣（Bay of Pigs）入侵古巴，企圖奪回政權，但因為美國「中央情報局」暗中干預反革命活動而慘敗，此後美國透過「中央情報局」運用這種聯手的策略更是昭然若揭：1964年幫助巴西推翻總統古拉特（Goulart），以及1973年的智利總統阿連德（Allende），然後強行實施右翼的獨裁。1811到1825年拉丁美洲從歐洲的統治中解放，這絕不代表一般民眾可恢復自由，或是可以有任何形式的自決。就像美國一樣，還有一些拓居移民的歐洲白人（criollos）所進行的資產階級革命。在某些國家，如阿根廷，美國模式的歐洲移民政策，加上屠殺原住民族，反而建立了一個以歐洲型態為主的社會。在其他地方，大多數的原本的住民認為「獨立」所帶給他們的改變很少；而奴隸的狀況幾乎和從前沒有什麼不同（巴西的奴隸制度一直到1888年才廢除）（Wade 1997: 31）。從此以後，農民和當地原住民族的情況只有隨著都市化和社會區分而每下愈況；土地缺乏的農業問題，以及赤貧的困苦日益嚴重。這些狀況所帶來的後果就是，拉丁美洲過去兩百年來的歷史就是不曾間斷的農民革命，甚至到今天還是如此。「古巴革命」將南美各種不同層面的政治情況聚合在一起，透過農民的協助得以成功。取得政權之後，新政府重新分配土地（在古巴或秘魯仍有些方面有待完成），勇敢面對經濟依賴所造成的情況，並尋求改變。同時，也因為「古巴革命」的國際視野，1966年重要的「哈瓦那會議」中，南美和東南亞的反帝國主義第一次扣連到全球的反殖民鬥爭。

### 一、拉丁美洲的馬克思主義

195 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本身對拉丁美洲顯然是冷漠的；相對地，拉丁美洲在19

世紀時對無政府主義的偏好也超過對馬克思主義。但是在俄國大革命之後，共產黨在各國迅速成立：1919年在莫斯科，1920年在阿根廷，1921年在巴西，智利和烏拉圭，1925年在厄瓜多爾和古巴（由梅拉（Julio Antonio Mella）和馬第（José Martí）親近的伙伴巴里諾（Carlos Baliño）創立），1930年在秘魯（由馬力亞特吉創立）。從「共產國際」世界革命的角度來看，拉丁美洲從來不曾被認為具有什麼重要意義，即使它本身就是一個革命的場域。拉丁美洲的事務由在莫斯科的「拉丁美洲秘書處」來討論，也就是托洛斯基的職責所在；而葛蘭西也是秘書處的委員之一。在拉丁美洲，「共產黨」以及「共產國際」干預的整段歷史過程十分複雜，而且許多著作都已經討論過，但是遺憾的是，一些主要的研究都是在「共產國際」檔案開放之前（Aguilar 1968; Alexander 1957; Caballero 1986; Dillon 1962; Poppino 1964）。拉丁美洲的共產黨和其他地方的共產黨一樣，經歷內部的分裂、派系傾軋、機會主義式的政策轉變，以及後來的告發、驅逐和清肅異己。事實上，如果要說他們和其他共產黨有什麼不同，那就是他們更為極端，因為他們努力遵從「共產國際」反覆多變的政策，經歷革命派和改革派的分裂、「聯合陣線」和民族主義資產階級的對立、階級與階級的對抗，以及「人民陣線」的策略。在此，我們不討論各地正式的共產黨如何竭盡所能地配合莫斯科變化莫測的路線，我們要討論的是馬克思主義形式的發展如何反映拉丁美洲不同的社會和文化的特殊情況。相對於一些將史達林主義傳到拉丁美洲的人，將馬克思主義傳到拉丁美洲的開創者包括智利的拉卡貝倫（Recabarren），古巴的梅拉，阿根廷的龐賽（Aníbal Ponce），秘魯的馬力亞特吉；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馬力亞特吉。

和其他地方的情形一樣，「共產國際」的支持對拉丁美洲的共產黨大致上是福禍參半。只有當殖民地、半殖民地或依賴國家的共產黨能夠像毛澤東在中國一樣，不遵從「共產國際」的政策，從「共產國際」政策中將自己解放，才能夠成功。在南美洲，馬力亞特吉仍然是最令人矚目的人物，他體認到史達林模式的侷限，並致力於對抗這種模式所訂定的限制。在1929年「第一屆拉丁美洲共產黨大會」的演講中，馬力亞特吉針對當時頗受非議的「聯合陣線」策略提出非常深入的分析。根據「聯合陣線」策略，「中國共產黨」被要求要和蔣介石的「國民黨」合作，但其結果卻不堪設想。一年之前大約是同樣的時間，1928年的「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中政策逆轉，馬力亞特吉和秘魯「阿普拉黨」（Aprista）決裂，並反對成立「拉丁美洲國民黨」。馬力亞特吉的立場所代表的意義和印度馬克思主義者羅伊不同，羅伊宣稱印度在1920年之前就充分工業化，足以依據典型的布爾什維克模式發展無產階級革命，因此不需要與民族主義者聯合。而馬力亞特吉強調的是拉丁美洲的特殊情況，尤其是封建制度依然存在，再加上原住民族被剝削的問題。三大洲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發展出解放的馬克思主義，其核心策略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需要結合

不同文化的特殊狀況。列寧、托洛斯基和史達林等人有時候也會抱持這個立場，但這不等於他們在政治實踐上會採行。這個具有創造思想的彈性馬克思主義形式最先從毛澤東在中國的策略開始，在馬力亞特吉和梅拉早期的立場也明顯可見，也是切·格瓦拉的基本信念，這些人主要都是以農民的角色為主，在革命運動時或者以農民獨立運作，或者和都市的無產階級聯合。

## 二、1910年的墨西哥

毛澤東的農民革命雖然是最成功的，但絕對不是第一個。在許多方面，查巴塔（Zapata）在1910年在墨西哥的叛亂才是三大洲起義的真正先驅；他領導的起義對抗剝削的列強——無論是殖民還是新殖民帝國的列強，並且為1990年代「查巴帝司塔」（the Zapatistas）反抗墨西哥政府的後殖民鬥爭提供了延續性（Díaz Polanco 1997; Huizer 1973; Pineda Gómez 1997; Wolf 1971; Womack 1972）。這次起義源自當地的農民起而對抗掠奪他們土地的大地主。「查巴帝司塔」為恢復土地權而奮鬥，而它的目標和組織剛好在當時都市無政府的動盪不安中，顯現出農民的潛力——同時也顯現出這股力量的侷限性，因為農民不願意在自己領域之外的地方採取軍事動作。但是他們土地改革的激進目標傳到了維拉（Pancho Villa）——北方軍事叛亂的領袖。「查巴帝司塔」和維拉的人馬一起呼籲「清算地主制度，將土地歸還印地安社群，將革命的敵人和外國人的土地收歸國有，[並且] 規劃土地改革」（Wolf 1971: 39）。雖然這兩派人馬被擊敗，但是他們的訴求無異為勝利者做了政治規劃。1915年立憲派的阿瓦多（Salvador Alvarado）將軍入主猶加敦（Yucatan），廢除該地的抵債勞役（debt peonage）；1934年卡德納斯（Lazaro Cárdenas）將軍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土地改革和勞動組織，廢除農場主人的政治權利，將他們的土地以村莊公有地分配給農民，並且將石油地和鐵路變成國有，卡德納斯結合土地重新分配和國家化，為許多後來的三大洲社會主義政權提供了一個模式（Galeano 1973: 139）。墨西哥農民叛亂就像此後許多南美的農民起義一樣，都具有法農所說的自發性的優點和缺點。不像蘇俄、中國或越南的革命，墨西哥的農民叛亂並非由一個組織嚴謹的革命黨所領導，能夠用清楚的方式處理各種不滿；格瓦拉和卡斯楚想要修正的就是這個缺點。根據他們的核心策略，一個反叛的小游擊隊就可以引導山區的農民慢慢加入，漸漸地，活動的成功會刺激其他原本心存不滿的群眾，到最後連都市的無產階級也會加入他們（Debray 1967; Guevara 1972, I: 136-46）。結合先鋒的知識分子和農民的力量是南美激進主義和革命運動的主要特色，到今天還是依然如此。兩者之間關係的建立就是靠馬力亞特吉。

## 三、馬力亞特吉

馬力亞特吉是他那個時代中，最為細微、最具有創新能力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和文化理論家之一。他的馬克思主義源自紮實的古典馬克思思想，但是在他1919年造訪歐洲時見識到義大利激進派的發展，這段時間也是共產主義最有賦權能力，最具創新力的時候，這是他後來不再拘泥於正統馬克思主義的部分原因。在義大利，他見到葛蘭西和陶里亞帝（Palmiro Togliatti），而且對同一年在都林（Turin）創辦《新秩序》（*L'Ordine Nuovo*）的一批人所信奉的自由意志說（voluntarism）很感興趣。索雷爾（Sorel）對道德和暴力的想法，以及克羅齊（Croce）的新黑格爾唯心論（neo-Hegelian idealism）影響《新秩序》這一批人，以及後來的馬力亞特吉（Femia 1981: 81-101）。儘管如此，列寧本人在1920年兩度宣稱《新秩序》的立場「完全符合第三國際所有的基本原則」（Gramsci 1989: 139）。馬力亞特吉同時也對激進自由派葛貝提（Piero Gobetti）（他本人同樣受這幾個知識分子所影響）的著作非常有興趣，因為馬力亞特吉想要瞭解，秘魯做為一個缺乏經濟發展的產物，葛貝提如何看待它的文化落後（Chavarría 1979: 68）。馬力亞特吉終其一生都維持國際主義者的觀點，寫了許多犀利的文章討論甘地、愛爾蘭，以及中國的革命。但是他著作的焦點放在故鄉秘魯的經濟情況對文化的影響，而且他的觀點都是從一般的拉丁美洲的角度出發。馬力亞特吉是第一系統性指出文化依賴問題的人；他所提的解決之道深受《新秩序》的思想所影響（透過葛貝提而吸收），尤其是他們所強調的道德重整與文化復興的必要，而且呼籲必需發展一種強烈的革命意識做為階級鬥爭的基礎。對馬力亞特吉而言，這種「英雄式」（heroic）社會主義形式才能讓他們走出文化和經濟的依賴。

馬力亞特吉所抱持的立場後來有了清楚的主張，在他1927年最著名的作品《秘魯實況七論》（*Seven Interpretive Essays on Peruvian Reality*）中有扼要的陳述（Mariátegui, 1971）。他認為要瞭解秘魯這個國家的形成——從征服時期，經歷為獨立而革命的時期，一直到現今——最佳的方式就是瞭解秘魯的經濟進化。「現在的秘魯經濟和現在的秘魯社會維持著征服時期的原罪，這個罪的引發和形成就是因為排除印地安人，以及抗拒印地安人」（*ibid.*: 59）。他認為秘魯社會之所以特殊，是由於資產階級和操控銀行與工業的外國資本主義的利益相互結合所造成的，他們與地主勾結，操控了剝削當地農民的封建土地制度。因此，即使是改革派的政府也無法有效地針對這樣的情況做重大的改良。當地白人和占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民之間的關係就是一種內部的殖民主義。這樣的殖民關係被視為先進的（也就是優越的）相對於落後的（也就是低下的）種族，先進種族的種種作為美其名是為了落後種族的

利益著想，想要幫助他們改善生活。馬力亞特吉完全反對這種說法。馬力亞特吉認為社會主義才能夠真正瞭解真實的情況。正如一般所相信的，印地安人的問題不是種族、文化或道德的問題，而是基本的社會經濟問題：「印地安人問題的根源在於我們土地永久占有的經濟制度」（*ibid.*: 22）。他說：「社會主義教我們用新的觀點看待原住民的問題，我們不再將它看成是抽象的族群或道德問題」（*Mariátegui* 1996: 82）。封建大地主就是將它當做族群和道德問題，根據殖民論述所主張的基本種族區分，宣稱印安人是原始的、脆弱的，因此需要由白人來「拯救」。事實上，馬力亞特吉極力主張印地安人的「問題」只是經濟和政治的剝削所造成的結果。「種族」問題是封建制度和勞役制度的產物。馬力亞特吉分析秘魯的基本問題，認為癥結就是印地安人的問題以及土地問題，如此避免了種族區分的觀點，或者其反面的自由主義觀點——將原住民加以浪漫化。

馬力亞特吉是第一個人體認到1920年「巴庫會議」對東方人民的革命運動代表更廣大意涵的人。他在1925年出版的文章〈東方與西方〉（‘East and West’）寫道：「革命的潮流不只影響了西方。東方也受到衝擊，震盪不安。現代史上最現代最超越的現實就是東方的政治和社會的轉變」（*Mariátegui* 1996: 39）。馬力亞特吉是少數幾位共產黨員強調殖民地人民起義所代表的政治意義，以及對社會主義的歷史需求，而且他將秘魯社會的革命元素放在原住民的農民上，認為他們的革命類似對抗實質的殖民主義：「原住民運動和世界革命運動之間緊密的關聯性非常明顯易見，毋庸贅述」（*ibid.*: 81）。社會主義讓他體認到印地安人的重要性。馬力亞特吉沒有把重點放在都市的工人階級，他在印地安人的漫長歷史中看到反對封建地主階級的起義，這是一種革命的傳統，在實質上具有社會主義的特色，因為它不只是要求終結剝削，更要求回復到印加時代公有（communal）、合作的生活模式。和非洲的社會學家一樣，馬力亞特吉認為前殖民時期文化就是共產主義之前的共產文化。這個觀念讓他一再強調社會主義以國際為基礎，不是以歐洲為基礎。更重要的是，他強調應發展具有本土固有特質的馬克思主義，一種能夠回應拉丁美洲社會需求的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終究是拉丁美洲的傳統。印加文明是歷史上最進步的、原始的共產組織。我們當然不希望在美洲的社會主義只是一個複製和模仿。我們需要一個英雄式的大創新。我們必需賦予印美（Indo-American）社會主義新的生命，反映我們自己的現實，用我們自己的語言。（*ibid.*: 89）

拉美社會主義是獨特的，因為它融合共同的殖民文化以及激進而具有道德性的原住民傳統——一種點燃自發性革命意識的傳統。馬力亞特吉認為這個具有革命意識的傳統不是當地人民的另類選擇，而是吸收社會主義思想的一種延續的文化動

力：「原住民的希望絕對就是革命」，而且就是這股革命的衝動為拉丁美洲的馬克思主義奠定基礎（*ibid.*: 81）。將印地安文化重新歸位為文化抗爭的一個形式是1920年代「印地安原住民主義」（*indigenismo*）運動的共同特色，尤其在墨西哥、玻利維亞和秘魯。其他人所主張的多半把印地安文明浪漫化，把印地安人公有的生活形態看成是托爾斯泰或甘地所描繪的，在面對現代工業化和都市文化的情況下，回歸到鄉村文化。但是馬力亞特吉獨排眾議，強調印地安文化的現代性，以及印地安文化所具有的社會革命的潛力，這種革命潛力是回應被征服的事實以及隨之帶來的後果。

布雷南（Timothy Brennan）在研究葛蘭西和馬力亞特吉兩人之間的政治和知識的關聯性的時候發現，馬力亞特吉將葛蘭西國內殖民主義的觀念轉譯到秘魯，因此「階級區分這類的語言披了種族和族群的外衣，這其中每一個類別都是人口再分類的次族群（sub-population），各有自己的歷史和傳統，並且各有不均等的潛力，為尚未實現的民族文化提供基礎」（*Brennan* 1989: 47）。馬力亞特吉認為社會主義和新的文化傳統將會根據他所謂的「新的印地安」而建立起來。在他所創的期刊 *Amuta* 中，馬力亞特吉主張：

秘魯以印地安的基礎重新建構。新一代正恢復我們真正的過去，我們真正的歷史。……革命的「印地安原住民主義」積極而具體地結合現今的印地安文化。這樣的「印地安原住民主義」並不是耽溺於幻想烏托邦式的復興。它將過去視為一個基礎，不是一個未來的規劃。它對歷史和歷史事件的看法是實際而現代的，既不會漠視也不會輕忽四個世紀以來任何歷史事實——無論是改變世界現實還是秘魯實際狀況的歷史事實。（*Mariátegui* 1996: 71）

馬力亞特吉著作中絕大部分所念茲在茲的就是，希望在最廣義的政治和文化層面上，建構一個新的秘魯傳統。馬力亞特吉認為西班牙殖民主義毀滅了原住民的文化，而且「將西裔拉美人的族群、政治和道德等的外在特色都標準化。西班牙人殖民的手段就是把所有殖民地的命運一致化」（*ibid.*: 113）。但是在政治上，西班牙語系的美洲被四分五裂地巴爾幹半島化（Balkanized），其結果就是每一個國家在經濟上的功能變成歐洲和北美的殖民地，而「拉丁美洲的知識生產缺乏自己的特色，沒有原創的面貌」。馬力亞特吉所提倡的文化復興就是要在秘魯破除歐洲人和印地安人之間的經濟和政治區分。要消除這種區分必需要經過社會主義所架構的革命，也就是要打敗歐洲剝削階級、地主和都市資產階級的勢力。

1930年馬力亞特吉去世之後，他的思想就相對地沈寂下來，一直到1960年代他的作品重新出版。他作品中明顯地融合毛澤東思想，尤其是有關農民在革命中

扮演主要角色的觀念，廣為左派人士接受，而且對秘魯的革命組織「光輝之路」(Sendero Luminoso)和切·格瓦拉都有很深刻的影響；切·格瓦拉是透過他的第一任妻子喜兒達(Hilda)學習毛澤東和馬力亞特吉(Becker 1993; Gadea 1973:20; Vanden 1986)。「印地安原住民主義」仍然是拉丁美洲數以百計的原住民族，如卡里布族(Caribs)、阿拉瓦克族(Aarawk)、圖必瓜尼族(Tupi-Guarani)等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核心，他們說的語言有數百種之多，他們散居之地跨越國家的疆界。馬力亞特吉在某些地方很像印度的甘地，能夠將以往為地方議題起而抗爭的農民運動引導到激進政治的大架構中。這樣的結合讓馬力亞特吉在對抗文化依賴時跨出重要的一步，做為對拉丁美洲許多不同的底層階級所承諾的政治架構中的一部分，這一步預見了里貝羅(Darcy Ribeiro)對他所謂的「社會的剩餘」(sobrantes)所宣稱的承諾——這些社會上的剩餘正是弗雷勒所致力的、被壓迫者教育學的對象(Freire 1972; Ribeiro 1977, 1978a, 1978b)。

#### 四、文化依賴

對於一個金權政治、帝國主義的北美，我們對抗它唯一一個有效的利器就是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拉丁美洲。(Mariátegui 1996: 89)

到了20世紀初期，「依賴」一詞在馬克思主義的論述中，已經特別指拉丁美洲國家——例如，在1928年「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中，討論有關殖民和民族問題時，提到的國家包括所謂的「半殖民國家(如中國、印度)，和依賴國家(阿根廷、巴西)」(Comintern 1929a: 40-1)。在〈反帝國主義的觀點〉('Anti-Imperialist Viewpoint')中，馬力亞特吉一開始就問道：「拉丁美洲共和國的情況和半殖民國家的情況到底類似到什麼程度？」(Mariátegui 1996: 130)。他否認兩者之間的類似，因為拉丁美洲沒有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資產階級，也就不可能像亞洲一樣和農民結盟。基於這樣的觀點，馬力亞特吉拒絕接受「共產國際」以共同反帝國主義的目標而要求共產黨和民族主義團體結合。他認為秘魯的資產階級很滿意名義上的獨立，因為他們在國家的經濟附屬地位中牟利。他認為先認定這個的差異才能夠「避免盲目追隨歐洲中心主義，才能夠將我們革命的行動調整，依據精準的評估而配合我們實際狀況。……在我們的情況中，民族主義的因素……既非反帝國主義鬥爭的關鍵，也不是它的基礎」(ibid.: 131)。馬力亞特吉認為，「共產國際」為三大洲的殖民、半殖民和依賴國家所開的處方——結合反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對南美洲並非合適的政策，因為南美洲基本上面對的是階級的敵對和封建主義的鬥爭。正如他所說的，我們不是「因為反帝國主義才是左派(或社會主義者)，……我們是

反帝國主義者是因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因為我們是革命者，我們用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ibid.: 132-135)。

馬力亞特吉對他所謂的高估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所做的批評，以及他反對「為『第二次的獨立』而奮鬥」的觀念，主要都是因為他堅持南美的現實問題就是封建制度以及被外來勢力的剝削。但是「共產國際」基本路線所強調的西方以外的反帝國主義，一直延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然後發展成可能是拉丁美洲最廣為人知的社會和政治理論——依賴理論。拉丁美洲的「依賴理論」是1945年美國總統杜魯門(Truman)所熱烈倡議的「發展理論」和實踐的對抗論述(counter-discourse)。

我們在第四章就已經討論過拉丁美洲的依賴理論。在第四章提到它主要是因為它是後殖民各種狀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依此看來，依賴理論不應該被當做地區性特殊狀況，應該被視為後殖民基本理論觀念中的一部分。事實上，在許多方面尚未被承認的一個顯著的事實就是：拉丁美洲的依賴理論是一個理論的創新，已成為主流馬克思主義的一部分，正統和所謂的古典馬克思傳統的擁護者也接受這種修正的三大洲馬克思主義。把依賴理論延伸到世界體系理論還是那些生活在非西方的人特別感興趣的，但這一點更是鮮少被接納。依據前面所言，依賴理論的干預絕大部分還是侷限在經濟的領域，對於文化的附屬，遠比不上經濟的依賴那麼受到關注，縱使文化和三大洲社會的關聯是那麼緊密。

雖然從某個觀點來看，低度開發可能是一個很精確的經濟描述，但是經濟低度開發並不代表就是文化低度開發。在中南美洲國家，各種文化高度發展，並且從一個更強力的行動主義立場去處理依賴的餘緒(Adelman 1999)。對拉美發展理論的批判最著名的是不斷產生各種方式對抗依賴現象：在政治上，最有代表意義的是1959年古巴的革命，抵抗的對象是受制於美國利益的腐敗政府。伴隨著南美歷史悠久的革命活動而來的還有範圍更為廣泛的文化著作，這些文化書寫挑戰依賴的觀念，並且把焦點放在透過各種觀念，如文化互化、雜揉，甚至在生氣蓬勃的現代主義時期所發展的食人想像(anthropophagy)，將這些扣連各種文化自主的形式。所有這些觀念有一個共同的出發點：文化的接觸和混合，但是是一種特殊的接觸混合。奧蒂斯認為文化互化乃是人民的產物；他拒絕使用「文化育化」(acclutration)一詞，因為它隱含了將原住民族同化到主流文化的意思，他說：「古巴真正的歷史就是相互磨合的文化互化的歷史，是透過地理上的遷徙所帶來的文化互相轉譯而帶來的影響」(Ortiz 1995: 98)。文化互化並不是文化的接觸而已，也不是最終可能形成的文化融合，而是從一個文化到另一個文化，不同的異質文化相互撞擊、發酵、調合、然後像慢火燉煮一樣(Pérez Firmat 1989: 22-7)。這個混雜揉合的過程同時也讓主導的一方所傳遞的文化質素得以重新創造、重新銘刻(reinscription)，如此



一來，像現代性的各種形式才能夠被重新塑造，重新調整改變。根據奧帝斯所造的「文化互化」這個出色的新詞，在調合的過程中所引起的翻攪騷動就是古巴文化和政治情況的寫照。拉瑪（Angel Rama）在《拉丁美洲的文化互化敘事》（*Transculturación narrativa en América Latina*, 1982）中反對文化相互轉移的概念，因為互轉所強調的是轉移者——無論是內在的還是外在的——的主導地位，拉瑪所採用的是奧帝斯文化互化的觀念，藉此證明原住民的文本對其他種類的拉美敘事的影響。萊哈德（Martin Leinhard）曾經說明安地斯通俗文化如何在實踐上在文化雙語中流傳，在文化雙語的體制下，「殖民帝國的語言、論述和象徵，剛好可以掩飾、並保存被禁止的本土內容」（Leinhard 1991; Rowe 1995: 72）。另一方面，巴西和西班牙裔的加勒比海作家筆下的社會，迥異於雷達瑪（Roberto Fernández Retamar）和坎克里尼（García Canclini）等的安地斯（Andes）社會，因為前者強調雜揉是拉美文化最核心的特色，有利於「進入現代性，而後離開它的策略」，並且在過程中有利於文化賦權（Canclini 1995:1）。這種透過文化流動形式和現代性形成斷裂（disjunctive）關係，和南亞文化理論者如恰特吉（Chatterjee）和南迪所採取的辯證立場是一個對比。另一方面，對雷達瑪而言，位處世界地理文化邊緣的拉丁美洲，其雜揉的特質還含有一種被邊緣化的他者性（otherness），隱藏其革命的潛力（Retamar 1989）。

203 這樣的一個體系將殖民和後殖民認同的分析連結到新殖民的情況，以及各種對抗形式的發展。雖然這樣的主張在拉美文化和政治發展軌跡上十分獨特而創新，但是我們不能將它和其他地方的後殖民理論所發展的類似觀念輕易分開，而且有些理論上的文化互化正在進行著。例如，史華慈認為隨著拉美經濟依賴而來的，就是意識形態的從屬和文化的模仿：「我們巴西人和其他拉丁美洲人不斷經歷的，就是我們文化中的偽造、非道地，以及模仿等特質」。但是他的作品有意扭轉這些的次屬（secondariness）所帶來的異化的感覺——這種想要生產歐洲道地文化而不能的失敗感，將它變成其他一種獨特的（如果永遠必需是非道地的，也要有其獨特性），專屬於巴西的東西。以負面角度將巴西文化狀況視為病態只是世界主義的上層階級菁英分子的看法。史華慈認為模仿其實也包含「文化移植」的轉化，同時也將「錯置的思想」加以創發生產。他主張不必把巴西文化的形成看成只是軟弱的模仿，而是將它視為像熱帶主義（tropicalism）一樣的離中心（off-centre）的主動性轉變（Schwarz 1992: 1, 15, 140-142）。這個過程同樣地適用於觀念和思想的範疇，體認到運用恰特吉所說的「衍生論述」（derivative discourse）在尚未達到目標時，連帶必須同樣地堅持它的改變：

當思想代表了它們所指的過程中的抽象面的話，思想就得其所哉。我們的

文化依賴有一個致命的後果——我們一直用其他地方所設計的觀念系統，奠基於其他社會過程的概念來解釋我們的現實。從這一點來看，絕對自由意志論的意識形態本身通常是不得其所的思想，唯有依據當地的矛盾重新建構思想，它們才不會不得其所。（Schwarz 1992: 39）

依據當地矛盾重新建構不適其所的思想一直是拉美馬克思主義的核心。這樣的改變也可以說是後殖民主義的一個特點。思想與實踐在不得其所（就是「異國的」）的情況下修正、混合，經過文化互化的形式而改變，在非此非彼的當中混合雜揉，創造出新的認同和來源，並且要察覺並扣連原有的文化，將英國文化的影響「熱帶化」（tropicalizing）。這樣的願景多年以來就是許多作家念茲在茲的主要課題，如史華慈、奧帝斯、雷達瑪和拉瑪，以及坎普斯（Haroldo da Campos）、聖提亞哥（Silviano Santiago）等人（Beverley, Oviedo and Aronna 1995; da Campos 1986; Santiago 1978; Vieira 1999）。

## 16.

## 拉丁美洲（二）： 古巴：格瓦拉、卡斯楚和三大洲

當區分的心態將人性切成敵對的兩半，我知道我將和人民站在一起。我知道這一點，因為我看到這銘刻在那個晚上：我是教條的折衷派解析者，是武斷信念的精神分析家，但是我卻像著了魔一般呼哮，要攻向障礙物和戰壕。

切·格瓦拉（1995: 152）

就政治的層面來看，依賴理論到現在已經有很長的歷史了，即使通盤的背景脈絡未變。一直糾纏它的問題其實就是後殖民理論的核心問題：批判西方發展理論將非西方視為低度開發和依賴，這個批判得到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以經濟自主做為回應，晚近則越來越邁向文化自主的觀念。現在，依賴理論的批判時常常忘記它不只是以被動的方式對抗西方的發展模式而已，其實它在實質上可說是補足（complemented）「獨立理論」（Independency Theory）或「互賴理論」（Interdependency Theory），這也是拉丁美洲對社會主義革命史的偉大的貢獻，以古巴和它直言要求國際上的被壓迫者團結起來做為代表，這是1920年代早期布爾什維克主導的國際主義時期以後，不曾被提起的呼籲。卡斯楚和格瓦拉的政治理論依據發展和低度發展的模式，他們強調依據特殊的文化脈絡和當地情況調整馬克思主義，著重對話和迎合群眾的方式，為掙脫依賴的困境與無能提供了另外的路徑。這些方向為群眾發展理論（popular development theory）提供地方層次所遵循的信條預先鋪了路，雖然這些主張的都是非常激烈的形式（Guevara 1971, III: 61-86）。事實上，格瓦拉更進一步地主張，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最先由當地原本的狀況發展而來：「這個革命，如果剛好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聽好，我說馬克思主義——那是因為它用自己的方式發現了馬克思所指出的路途。……這就是為什麼今天我告訴你們這些拉丁美洲勤奮的年輕人，如果我們的革命就是所謂的馬克思主義，那是因為我們在此地發現了它」（Guevara 1969: 247-8）。格瓦拉的立場就是——政治獨立只是真正自主的第一個階段。在〈政治主權和經濟獨立〉（‘Political Sovereignty and Economic Independence’）一文中，格瓦拉認為古巴

205 獲得政治獨立之後，隨即開始爭取經濟獨立……如果一個國家沒有自己的經濟，如果它被外來的資本滲透，那麼這個國家就不可能擺脫它所依賴國家的督導。……政治的主權已經在1959年的1月1日取得，這個樑柱只有在我們達到完全的經濟獨立時，才會完全鞏固。（Guevara 1987: 85-89）

格瓦拉提出警告，奮鬥的第二階段可能比第一階段更加困難，他的著作和演講大多圍繞著後獨立（post-independence）社會的問題和目標。他對依賴的批判，以及不斷強調世界對帝國主義的屈服，都影響到後來阿敏和華勒斯坦發展世界體系理論的架構。如果說帝國主義是一個世界體系，格瓦拉斷然拒絕三大洲要屈服於它，並且主張社會主義的方式才能讓三大洲在經濟和文化方面脫離帝國主義的掌控。格瓦拉的焦點放在後殖民的社會所面臨的問題，因此特別強調如果沒有其他相關的自主形式，即使獨立也有其侷限。他從未懷疑過古巴或西裔美洲文化的自主性；但是他瞭解，如果要進行有效的激進變革，經濟和制度的改變是非常重要的。「依賴」是他的仇敵，但是他不像後來後的殖民思想家只關心「衍生論述」的問題，因為他的觀點是國際的，而不是放在國家或民族，而且他不把焦點放在西方和三大洲之間實質上或是表面上的文化區分，也不會因此而感到困擾。他所在意的是要盡一切可能的有效方式終結一種不同的內在／外在之分，也就是中心和邊緣的分野，因為就是這種中心和邊緣之分製造出貧窮、不公和帝國主義的相關效應（Chatterjee 1986）。就像法農或甘地一樣，格瓦拉擷取任何進步的政治思想。這三個人的貢獻是國際性的，因為他們三位都勇於將「人」列為第一原則。

## 一、切·格瓦拉同志

### 歌贈卡斯楚

你說太陽會升起來  
讓我們走吧  
沿著不在地圖上的路途……

……我們的  
眉間掃過暗中翻騰的星星  
我們會得到勝利，或者會鞠躬盡瘁  
當你的聲音將四面的風等分成  
土地改革、公義、麵包、自由  
我們將以同樣的腔調

### 與你站在一起

（Guevara 1968b）

206 就像法農和甘地一樣，格瓦拉也是一個浪漫者，後來成了三大洲偉大的政治偶像之一。格瓦拉在1928年6月14日生於阿根廷的羅沙利歐（Rosario）。格瓦拉的祖父為愛爾蘭人，姓氏為林區（Lynch），在19世紀時從愛爾蘭西部的馬友（Mayo）移民到阿根廷。格瓦拉獨特的領袖魅力從他每一張照片，以及他演講強而有力的辭令中散發出來。除此之外，他最大的特點就是強調人性的特質，對道德價值的堅定信念，這一切都是源自於他相信人類的平等和公義、他的同情心，以及他對一般眾民的親和力。有一回他在智利著名的銅礦產地丘基卡馬塔（Chuquicamata）碰到一對挨餓受凍的夫妻，他們是共產黨員，正在找工作：

就著蠟燭光，男人喝著巴拉圭茶，吃著一片麵包加起司，他乾皺的面容有一種神秘而悲愴的況味。他用簡潔而感情豐富的語言告訴我們這一切：如何在監獄裡過了三個月，還有他不得溫飽的太太，一直忠心耿耿地跟著他，小孩留給一個好心的鄰居照顧，他像朝聖般的一站又一站地找工作卻一無所獲，他的同志一個一個無聲無息地消失不見……

這對夫妻凍到四肢麻木，在沙漠的夜晚捲縮在一起，他們是世界上所有無產階級的縮影。他們連一條可以蓋的破毛毯都沒有，我們就給了他們一條，我和阿爾伯托（Alberto）就盡可能地合裹另外一條睡。那晚是我最冷的夜晚之一。（Guevara 1995: 59-60）

我們很難找到格瓦拉的獨照，除了一些場合，例如他獨自站在講台上，對著聯合國演講之類的場合。即使是像那樣的場合，他也讓自己看起來就是代表世界上所有受壓迫的人民在說話。在「古巴革命」的照片裡，格瓦拉和卡斯楚兩人被拍照時都不是在說話或演講，一張一張都是和人民在一起的照片，和他們談話，參與他們，握著他們的手，對他們微笑。如果格瓦拉坐在一群人中間，一定會有人用手臂圈著他的肩膀，流露出隨意的親密。格瓦拉不但是游擊隊、醫生、知識分子，他更是大眾人物，時時將人民的價值和利益放在第一。他們的價值就是他的價值。他以一個人因為貧窮和不正常的飲食影響其成長為例，解釋「低度開發」的經濟觀念（Guevara 1972, III: 66），這就是他典型的作法。在革命戰爭期間，他在每一個游擊隊所經過的小鄉村或小部落設立一個醫療諮詢站。他寫道，這是一個單調的工作，因為他沒什麼醫藥可以提供，而所有的人的狀況都是一樣的：女人因為生活中艱苦操勞而早衰，兒童的肚子腫脹，因為寄生蟲、佝僂病和營養不良。

住在塞拉山脈 (Sierra) 的人民像野花一樣地生長，無人看顧照料，他們辛苦工作得不到報償，很快地就枯萎凋謝。就在那些醫療諮詢站，我們活生生地感受到人民的生活需要一個決定性的改變。土地改革的想法變得清楚明確，和人民融為一體的想法不再是一個理論而已，它變成了我們生存中根本的一部分。(Guevara 1996: 156)

207 古巴現在有一些世界上最先進的醫院和最好的醫療，這就證明格瓦拉在塞拉山脈設立診療處的影響。革命之後，格瓦拉的每一個週末不是放鬆休息，而是在糖廠或工廠勞動。革命不久之後，古巴拉斯維拉斯大學 (University of Las Villas) 聘他為教育學院的榮譽教授。他對這項殊榮的回報就是，以激進的思想引導傑出的大學教授：「要成為黑人、黑白混血兒、工人、農夫；放下身段走入人群，回應民眾，也就是說，回應所有古巴人的所有需求」(Retamar 1989: 45)。雖然他對族群認同的差異一直很敏銳，但是他主要關心的還是如何對抗大家共同面臨的各種形式的壓迫，他沒有把焦點放在闡述這些族群的差異。他和這方面的先驅馬第和馬力亞特吉相同的是，格瓦拉認為這方面的首要任務就是對抗種族歧視，因為這是拉丁美洲各種形式的剝削系統中最基本的根源 (Graham 1990; Wade 1997)。正如法蘭克後來所說的，拉丁美洲的「印地安人的問題不在沒有將印地安文化或經濟併入到社會中。他們的問題和其他絕大多數人民的問題一樣，就在剝削的宗主國與附屬國的型態已經融入整個資本體系的結構和發展中，造成普遍低度開發的狀況」(Frank 1969: 142)。正如馬力亞特吉指出的，這種以剝削融入的方式被種族低劣的論調輕輕帶過。因此，只有拒絕這種以種族差異為基礎的觀念，才能夠讓真正剝削的基礎顯現出來。但是在另外一方面，這種反種族主義讓格瓦拉低估原住民族的族群認同足以使他們抗拒以共同的壓迫經驗做基礎的認同——這就是為何格瓦拉最後無法使玻利維亞和瓜拉尼族的印地安人 (Guaraní Indians) 結合的原因，他也因此而犧牲了性命。格瓦拉在日記中絲絲入扣地記載著他真實的心聲：「這群農民對我們沒有什麼幫助，反而可能是告密者」。日記的最後寫道：

10月7日

游擊[戰爭]之後已經是第11個月了。今天沒有什麼複雜的事，甚至可以說是非常田園的一天。到了12:30，一名老婦人趕著羊群進入我們紮營的峽谷，我們必需將她拘捕起來。她沒有給我們任何有關士兵的可靠消息，問她的每一個問題她都回答不知道，說她已經很久沒有經過這邊了。她只說了一些山路的消息。……下午5:30分，印地 (Inti)、阿尼契托 (Aniceto) 和巴裡托 (Pablito) 到老婦人家裡，她家中有一個殘廢和一個

發育不全的女兒。他們給她50披索，要她不可洩漏任何事；其實我們對她會不會遵守承諾不大有指望。(Guevara 1968a: 156)

正如弗雷勒所觀察的，即使格瓦拉以直率不修飾的風格敘述他和農民的接觸，還是「流露出這個不凡的人對於愛和溝通有多麼深刻的能耐」(Freire 1972: 138)。反諷的是，在格瓦拉死後，有一個頗受歡迎的支派「拉西格哈的聖者」(Saint Ernesto of La Higuera<sup>譯註1</sup>) 很快竄起，這一批人在格瓦拉生前對他一直十分冷漠 (Guevara 1998: ix)。格瓦拉是一個受過訓練的醫生，本身有患有嚴重的氣喘，但是他積極投入工人和農人的生活，和他們溝通，認同他們。在〈為工人階級締造一個黨〉('In Building a Party of the Working Class') 一文中，他描述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是什麼樣子，而這恰恰是他自己最好的寫照，同時也顯現出他將自己的思想實踐到什麼程度：

同志們，永遠記住這個，把它銘刻在你們記憶中，把它當成對抗所有偏差最有利的武器：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必需要是最好的、最完全的、最完整的人類——但最重要的是成為一個有人性的人。他必需是一個和群眾生活在一起，和人民一起感動的黨員；他也是一個引導者，以具體的方針規劃群眾有些尚未成形的願望；同時也是一個將所有的一切奉獻人民，永不倦怠的工人——一個犧牲自我的工人，為了革命不惜放棄休息的時間、個人的寧靜、家庭、甚至自己的生命。但是，他永遠不會對接觸人群的溫暖感到陌生。(Guevara 1987: 195)

格瓦拉對於接觸人群的溫暖從來不會感到陌生；相反的，他接近群眾，喜歡有他們陪伴。〈古巴的社會主義與人〉('Socialism and Man in Cuba', 1965) 這篇文章到現在仍然是20世紀偉大的政治和文化文本之一。他在文章中大膽陳述：「讓我這樣說吧：真正的革命是被一種偉大的愛的感覺所引導」(Guevara 1987: 258-9)。很少有革命者敢講這種話，也很少有人會主張革命必須要將對人民的愛化為理想，藉此避開教條主義，堅持「這樣的人性之愛轉變成真正的行動，變成足以為模範的行為，然後形成一股動力」(ibid.: 259)。愛也變成對革命的愛、也連帶成為同胞之愛、社會情感的愉悅，以及一種同性和異性之間的愛。(Guevara 1972, III: 322)。格瓦拉引用卡斯楚在1962年4月11日的演講：

誰說馬克思主義摒棄人類的情感和同伴情誼，漠視對同志的愛，對同志的尊重，對同志的體諒？誰說馬克思主義就是沒有靈魂，沒有感情？其實，正是愛人類才催生了馬克思主義。就是因為對人類的愛，對人性的愛，希

<sup>譯註1</sup> La Higuera：位於玻利維亞，是格瓦拉犧牲之處。

望能夠減除無產階級的苦，希望能夠替無產階級打倒貧窮、不公、痛苦和所有的剝削，就是因為這些原因，馬克思的心理產生了一些想法，馬克思主義就在適合的時候出現。它產生的時機恰恰是社會革命真正的可能性出現的時候——不只是真正的可能性，而且是歷史的必然性。馬克思正是這一切的詮釋者。但是如果不是像他，像恩格斯，像列寧一樣，具有著豐富的人類的情感，他怎麼會成為這樣的一個詮釋者呢？（Guevara 1987: 194）

格瓦拉認為：「革命必需透過人」，透過一種持續的奮鬥，建立一個以人類價值為基礎的社會。格瓦拉主張，建立共產主義需要的不只是經濟基礎層面上的改變，也不只是文化的轉變，更需要改變人類。

## 二、新人類

209 雖然格瓦拉是最先呼籲需要有「新人類」的人之一，而且他盡全力要讓革命的古巴達到性別的平等，但是格瓦拉從他的太太葛蒂雅（Hilda Gadea）所學到的性別政治主要是不平等所導致的不公義，而不是質疑性別認同的各種形式（Gadea 1973）。無論如何，不管表面上格瓦拉的性格有多麼男性氣概：鬍子、雪茄、征戰的疲累，但是他不害怕凸顯自己的脆弱，反而大談政治之中感情的必要性，他甚至以人類的愛之類理想來定義社會主義，希望能依據人類的價值建構社會。他經常談到身為一個（男性的）革命行動分子所面臨的困境，因為他和家庭、尤其是兒女的關係必然因此而較為疏遠，但是他也強調這是個人必需面對的情況：

如果一個男人認為將一切奉獻給革命的意思就是不應該牽掛著一些憂慮，如小孩子缺了什麼東西，或者小孩的鞋子破了，或者家裡缺了什麼必需品，如果以此推理，他的心未來必然會受到腐敗的細菌所污染。（Guevara 1987: 259）

腐敗之菌將會使你變成鐵石心腸，對於一般人的個人需要和渴望無動於衷。同時，格瓦拉也認為自己的小孩不應該比其他的小孩擁有更多。他在游擊隊行動時曾寫了一封封感人至深的信給他的孩子，信中交織的就是這股溫柔和情感，對兒女日常生活細節的關懷，同時又時時強調更大議題的重要性，以及為他人更大的福祉而犧牲的必要性。「要很有革命情操，」他在一封給女兒喜兒達（Hilda）的信中，親切地寫道：「你必需瞭解我仍然在很遙遠的地方，而且會離開很長的一段時間，盡我所能對抗敵人。不是因為這是什麼偉大的事情；我只是在做某些事」（Guevara

1997: 351; 1972, III: 322）。

德柏瑞（Debray）有一句名言：「古巴革命」實際上就是在革命中推動了一種革命（Debray 1967）。「古巴革命」所代表的是從根本上脫離莫斯科所操控的、漸趨崩盤的階層化共產黨，成功締造一個由當地人民的革命能動性所建立的社會主義新形式，由一小群先鋒最先領導農民，而非都市無產階級，打敗了橫亙在他們面前的巨大傳統力量。「古巴革命」顯示不同形式革命的可能性。對於蘇維埃意識形態及其機會主義式的搖擺政策，格瓦拉以激烈的方式脫離，他所象徵的是跳脫教條式的共產主義，走向一個完全以人類價值為基礎的社會。對格瓦拉而言，社會主義可以簡單地定義為消除人類被其他人的剝削現象（Guevara 1971, III: 268）。就這個觀點來看，他贊同的是非洲社會主義的立場；就像他經常所引述的馬第，但是格瓦拉的觀點更有國際主義觀。然而格瓦拉也注重本土的價值，尤其把西裔文化的價值當成英語宰制系統中一種社會肯定的形式。就像卡布拉爾，格瓦拉之所以能夠體會到人民的需要，主要是因為他在田野裡和他們長時間的相處，但是對於他所同情的原住民而言，格瓦拉勢必還是陌生的。他參與「古巴革命」是因為在他第三次的拉丁美洲各國之旅結束時，目睹並第一手經驗整個拉丁美洲人民在生活中所面臨的艱困現實，以及各種形式的剝削（Guevara 1995）。在《古巴的社會主義與人》（1965）中，他扼要地描述他對古巴的新革命社會主義的願景，也就是回歸到蘇聯已經喪失的人類價值。這篇文章特別嘗試要「定義個人，也就是在建構社會主義這齣怪異而動人的戲碼時的演員，將他的生存定義為雙重的，一方面是一個獨特的個人，同時也是社會的一分子」（Guevara 1987: 249）。他注意到個人生存的這兩個面向不但在資本主義商品化的關係中已經蕩然無存，在史達林模式的社會主義機制中亦同樣被抹煞，但這兩個面向都是格瓦拉思想和實踐的核心。格瓦拉所熱衷研讀的沙特和佛洛伊德都是以個人為出發點，然後慢慢延伸到個人參與社會的必要性。但是格瓦拉總是將這兩個面向同時放在一起，堅持兩者有辯證的重要性（Gadea 1973: 36-7）。格瓦拉可能是唯一信奉馬克思主義但花費許多精力強調社會主義需從個人做起的領袖，他認為孤立的個人若是沒有積極參與社會創造，這個人就是不完整、未完成的人。同時他也主張，共產主義的社會只能透過「新人類」所具有的能動性才能建構起來。這樣的新人類將成爲一種有意識的發動力（conscious motor），完全理解「掌握時機表達自己，並且讓自己在社會的有機體中被其他人感受到」（Guevara 1987: 253）。如此一來，藝術的角色就可以轉化成文化領域中各種異質形式的革命性表達（ibid.: 257）。因為在資本主義國家中，藝術原本被當做是一些特別疏離的個人逃避現實的管道，讓人遁入美學的領域；藝術只是被動地認同這些疏離者，甚至在1950年代東方陣營的社會主義國家已經把藝術貶成一種只是在反映現實主義的美學。哈瓦那大學哲學教授，同時也是大詩人和散文家的雷達瑪最著名的就是他

致力於發展藝術性表達的可能性，嘗試獨特的新形式。他以莎士比亞筆下的卡力班（Caliban）<sup>譯註2</sup>的觀點，建立一種獨特的「麥蒂索混血」（*mestizo*）<sup>譯註3</sup>拉丁美洲文化，也就是馬第讓入記憶深刻的說法：「我們的美洲」（Martí 1977: 84-94; Retamar 1989: 17）。我們的美洲：能夠這麼說就表示已經肯定了1895年以來古巴第二次獨立戰爭在歷史上的重要性。1959年的「古巴革命」是一個尋求獨立、自主的革命，這是先前的革命所未能達到的目標。格瓦拉的貢獻就是再讓大家可以義正辭嚴地說「我們的美洲」。

「在這段建立社會主義的時期，我們看到了新的人類誕生了」（Guevara 1987: 252）。雖然這可能透過道德和物質的誘因而達成，但是格瓦拉認為要鞏固一個重建的新人類「需要發展一種意識，一種具有新價值觀標準的意識。做為一個整體的社會，必需被轉變成一個巨型的學校」（Guevara 1987: 251）。1959年1月1日，卡斯楚和格瓦拉進入哈瓦那的時候，50%的古巴孩童沒有上學校；而現在，古巴是拉丁美洲文盲比率最低的地方。教育，以及透過自我教育而得到的一種更廣義的賦權觀念，變成革命的古巴最核心的價值，也開啓了一種解放的潛力。這股潛力後來在巴西發展成弗雷勒的「受壓迫者教育」。教育這股強大激進的力量為低下基層的人們打破了階級的藩籬，以及其他各種形式的社會壓迫，這股力量一直是古巴社會主義的中心原則。

### 三、三大洲

最重要的是，格瓦拉像法農一樣，把視野放在全球的不公義。格瓦拉幫助實現「古巴革命」之後，1964年他帶領一列國際主義的軍隊到剛果，協助當時頗受人民愛戴的「盧蒙巴組織」（Lumumbist）<sup>譯註4</sup>，三年之後，他到玻利維亞開始領導當地的武裝鬥爭（Gálvez 1999; Guevara 1968a）。這些都是格瓦拉將長期以來所抱持的立場化為行動：結合全球力量對抗殘餘歐洲殖民主義，以及日漸壯大的美國帝國主義。他將對抗的力量匯集成一股激進的、以三大洲為基礎、由三大洲所領導的三大洲政治。

<sup>譯註2</sup> 卡力班是莎士比亞《暴風雨》（*The Tempest*）中的角色，是魔法師普洛斯佩羅（Prospero）的奴隸，他學會殖民者的語言後，用它來詛咒普洛斯佩羅。雷達瑪（Roberto Fernandez Retamar）是古巴詩人、散文家和哲學教授，致力於拆解歐洲中心論。他以不同的角度閱讀《暴風雨》，以卡力班的觀點為主體，認為他正是邊緣文化的化身，象徵勇於反抗和對立的精神。

<sup>譯註3</sup> *mestizo* 指歐洲人（尤其是西班牙裔）和印地安人的混血。

<sup>譯註4</sup> 盧蒙巴（Patrice Lumumba）是剛果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人，剛果成立共和國之後的總理。1961年為政敵所殺害。

不要忘記，在面對攻擊者的侵略及人民的痛苦時，我們的情感不能只限於拉丁美洲的架構，甚至侷限在拉丁美洲及社會主義國家的架構中。我們必須實踐真正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對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每一個侵略、每一個侮辱、每一個違反人類尊嚴和人類福祉的行為，我們都要感同身受。（Guevara 1987: 195）

在一場對「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演講中，格瓦拉批評已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區分，指責他們對市場的宰制以「依賴國家的飢餓和剝削」為基礎（Guevara 1987: 302）。他主張唯一能夠平衡這個現象的方法就是消滅已發展國家對依賴國家的剝削，「以及所有這些剝削所帶來的後果」（*ibid.*: 303）。他在1964年11月11日對聯合國的演講——〈殖民主義的氣數已盡〉（‘Colonialism is Doomed’）中，格瓦拉對古巴以及三大洲許多社會持續受到的壓迫，做了最公開、最懇切、最深遠的分析。他以「古巴革命」所傳達的基本訊息做為演講的開頭，強調「古巴革命」對全世界五大洲所有被壓迫社會所代表的意義——「由『古巴革命』的行動以及日常的例子顯示，在現在人性所趨的狀況下，人民可以自我解放，讓自己得到自由」（*ibid.*: 322）。這種尊嚴得來不易，而得到之後，又不斷受到美國的制裁和軍事干預等威脅，在此情況下，古巴還是爭取到它的自主。在經歷數十年的各種層面的宰制和依賴之後，「古巴革命」喚起古巴和整個拉丁美洲起而反抗，並堅定追求民族自決——不斷地以「祖國或亡國！」（*Patria o Muerte!*）的口號激發——，這股精神的意義不能被低估。但是格瓦拉並不會因為古巴的情形而滿足。卡斯楚的三大洲革命精神以民族主義的國際主義觀為基調，但是格瓦拉是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者。格瓦拉宣稱，古巴肯定各國之間和平共存，但這「不包括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共存。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和被殖民的人民團結起來，包括所謂的荷屬幾內亞、安哥拉、莫三比克，這些地方的人民為了爭取自由而被大肆屠殺」（*ibid.*: 323）。格瓦拉義無反顧地從這個被帝國主義壓迫的地方轉戰到另一個地方——從高棉到寮國，越南、塞普魯斯、波多黎各、韓國、英屬圭亞那、瓜得洛普島（Guadeloupe）和馬提尼克島、南非、剛果、羅德西亞、西南非（那米比亞）（Namibia）、巴蘇陀蘭（Basutoland）、貝專納（Bechuanaland）、史瓦濟蘭（Swaziland）、索馬利亞、巴勒斯坦，甚至到「所有和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對抗的人民所在之地」（*ibid.*: 326）。最後，格瓦拉轉而注意美國如何在拉丁美洲操作，他批評美國在各國壓制性的干預手段，如委內瑞拉、尼加拉瓜、墨西哥、海地、多明尼加共和國、瓜地馬拉和哥倫比亞——以及古巴。對格瓦拉而言，美國就是帝國主義剝削的主要代理人，而其基本的剝削場域就是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越南的戰爭代表的就是美國宰制全球的企圖。1967年格瓦拉在〈創造兩個、三個、許許多

多的越南) ('Create Two, Three, Many Vietnams') 中，對三大洲傳達了一個著名的訊息，其中越南代表關鍵的象徵地位：

我們——全世界被剝削的人民——必需要扮演什麼角色？三大洲的人民眼睜睜地看著越南，從中學習教訓。……他們在每一次的對抗的中全力攻擊，絕不休止——這就是所有人民的策略。但是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人們仍然忍受著可悲的和平，在這些地方，我們的任務是什麼？就是要不惜任何代價解放自己。(Guevara 1997: 317)

正如阿布代·馬力克所指出的，這一段話中有一個關鍵的基本概念。無論《共產黨宣言》或者是「共產國際」的決議，主要的對象是全世界的工人，但是格瓦拉對主體位置做了一個基本的改變：「我們——全世界被剝削的人民」，「我們——被剝奪的人民」(Guevara 1997: 326)，我們——後殖民的主體。在格瓦拉的〈告三大洲〉中，後殖民主體的認知已然誕生。即使是法農，他也從未以全世界下屬或底層階級的一般大眾的位置發聲，為這些人發言，說給這些人聽，但格瓦拉非常有效地拓展蘇丹卡里耶夫所主張的東方穆斯林是無產階級的立場。「這裡面一個重要的宣示就是：『我們——全世界被剝削的人民』——不是『三大洲的共產黨員』。我們就是——而且被全球如此視之——被西方低度開發的無產階級」(Abdel-Malek 1981, II: 94)。這個世界不是分成三個世界，而是兩個：「一個是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互鬥的世界，而另一個世界是被壓迫者遲早會得到勝利的世界」(Retamar 1989: 213 55)。格瓦拉最後的政治宣言——1967年的〈告三大洲〉——就是第一次以一個被帝國主義剝奪的主體詳細說明反霸權的國際主義立場，鏗鏘有力，很具說服力地呼籲三大洲的人民開啓抗爭的新陣線，從國際主義的觀點運用游擊戰的全球策略。

與此相關的是，1966年1月在哈瓦那舉行的「非、亞、拉美人民團結三大洲會議」(Tricontinental Conference of Solidarity of the Peoples of Africa, Asia and Latin America)，在許多方面這次會議代表以國際主義的抗爭正式開始，而後殖民理論正是這個領域的產物。今日大家比較熟悉的1955年「萬隆會議」是獨立的非洲和亞洲國家第一次主要會議，它主要意義是結合晚近去殖民的國家，並且針對冷戰的兩大勢力採取不結盟的策略性決定(Appadorai 1955)。而1966年的三大洲會議則有些不同的意義：首先，它聚集了所有非西方世界的代表，也就是三大洲的代表；第二，它決議與激進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陣營站在一起，但是強調不受蘇聯或中國的任何指導。期刊《三大洲》(Tricontinental)就是此次會議的「非、亞、拉美人民團結組織」(OSPAAAL)的成果，這本期刊後來肩負重任，以重要的政治、文化和知識團結三大洲人民。這是第一次有一個以著作彙集各種思想的園地，為後來的後殖民主義提供理論和政治的基礎。在《三大洲》中，我們第一次發現三大洲的社

會、理論和文化政治的思想因此結合起來：格瓦拉、卡布拉爾、法農、胡志明和許多其他人，第一次被放在一起，形成一個政治作品的緊密體系。後殖民主義是隨著《三大洲》而誕生的。在第一期的《三大洲通訊》(Tricontinental Bulletin)——專門報導三大洲當代政治事件的補述性刊物，阿連德觀察道：這次會議的成果具有「最偉大的歷史意義，代表我們對抗帝國主義和新舊殖民主義的共同奮鬥更加鞏固」。「幾內亞比索暨維德角非洲獨立黨」(PAIGC) 譯註<sup>5</sup>的秘書長卡布拉爾說，「在自由和社會主義的古巴開創的一個團結、奮鬥的三大洲組織，這是最深遠——如果不是最偉大的——組織，為民族解放而鬥爭的人民戰勝帝國主義加諸於他們的痛苦，尤其是美國帝國主義」。他還說：「現在我們的任務就是將決議付諸執行，強化鬥爭，以加速帝國主義與新舊殖民主義的瓦解。」；「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領袖阿塞維多(Luis de Azevedo)評論道：「三大洲會議是人類歷史上人民解放運動的第一次大團結，共同對抗剝削者」。其他國家或組織的領袖或代表也做過同樣的評語，包括薩伊(Zaire)、「非洲民族會議」、「辛巴威非洲人民聯盟」，委內瑞拉、哥倫比亞、瓜地馬拉、秘魯、多明尼加共和國、烏拉圭、智利、越南、寮國、中國、高棉、蘇聯、幾內亞、安哥拉、剛果、南非、辛巴威、幾內亞共和國(Tricontinental Bulletin 1, 1966: 6-7)。

在他的〈告三大洲〉中，格瓦拉強調犧牲自我和國際鬥爭的重要性：

讓我們發展一個真正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有國際無產階級的軍隊；我們在它的旗幟底下奮戰，為的是拯救人性的神聖目標。犧牲在越南的旗幟底下，還有委內瑞拉的、瓜地馬拉的、寮國的、幾內亞的、哥倫比亞的、玻利維亞的、巴西的——舉幾個現在正進行武裝鬥爭的國家——都是同樣地光榮，同樣是大家所期望的，無論對美國人、亞洲人、非洲人，甚至歐洲人，都是一樣的。

在任何一個國家，那些尚未誕生在國家旗幟底下的人，每一滴血都是一個經驗，一定會被傳遞下去，傳給活下去的人。(Guevara 1998: 172)

格瓦拉在次年被「美國中央情報局」所訓練的玻利維亞軍隊逮捕並遭槍決。當時他只有39歲。他死後，格瓦拉變成左派的偶像，激進而富同情心，象徵一種無私的精神，對低下、被剝削的人民無私的奉獻，而且毫無國界之分；他的形象廣為人知，甚至和耶穌相提並論。但是到了近期卻有些人合力意圖拆解他的神話，將他定位為政治的失敗者，並且貶斥他以游擊戰為主的聚焦理論(foco theory 譯註<sup>6</sup>)，

譯註<sup>5</sup> 指 Partido Africano Independencia da Guinee Cabo Verde (African Party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Guinea-Bissau and Cape Verde)。

譯註<sup>6</sup> foco theory：聚焦理論乃卡斯楚和格瓦拉所發展出來的概念，他們認為反政府的暴動

這是格瓦拉所主張的，在特殊歷史時刻的某種情況下，策略性介入的理論之一。就比較大的角度來看，刻意貶低格瓦拉也是美國持續破壞「古巴革命」的一環，同時，他們還想要以經濟綁住其他各國，以此否定巴西對世界所許諾的自由。其實格瓦拉本人應該算是第一個承認他一生中有多次的失敗的人。他從來沒有把自己當成不平凡的人。在他有關「古巴革命」的著作中，他時時思考著掌權之後的錯誤，同時顯示他急於從這些錯誤中學習，做為未來的殷鑑。他自己認為在剛果的行動是失敗的，雖然以比較寬廣的角度來看，他的行動代表古巴人的支持，支持剛果、幾內亞比索、安哥拉、那米比亞、辛巴威和南非對抗殖民和傭兵所組的軍隊，這也是南非最後打敗殖民統治的重要因素（Gálvez 1999: 293）。如果說格瓦拉最後到玻利維亞也是一個失敗之舉的話，那也是因為他亟欲拯救該國的貧窮，希望它脫離壓迫、剝削和掠奪。這樣的行動沒能成功，除了壓迫者之外，對任何人都沒有什麼好處。格瓦拉體認到這樣的行動會遭遇困難，他還是以哲學的角度思考——「當人類的命運處於存亡之秋，一個人或一個國家的危險或犧牲又算得了什麼呢？」——他終究還是很有自信：

在最後的階段，有一兩次行動暫時被打敗是沒有什麼關係，因為要繼續鬥爭的決心很明確，而且與日俱增，大家明確意識到需要革命來改變，而且確定這是可能的。（ibid.: 158）

215 儘管最後的失敗，格瓦拉自己的名字和形象一直深植人們心中；儘管最後的失敗，他所奮戰的原則仍舊是非常有力的象徵。任何一次表面上的失敗都無法抹殺他在「古巴革命」的成功，以及「古巴革命」對拉丁美洲，對三大洲，對非裔美人的奮勇抗爭，對被壓迫的人民以及被剝奪的人民所代表的意義（Davis et al. 1971）。數十年來面對美國報復性的壓迫，一次又一次讓格瓦拉更加堅定立場，「古巴革命」非凡的成就就是一個永遠的指標，告訴世界可以做到什麼。古巴克服困境生存下來，強韌地代表著格瓦拉所奮鬥的原則。格瓦拉本身代表一種有原則的同情心，一種解放的對話形式，一個與剝削宰制的系統對抗的革命性論爭，這不但在拉丁美洲是前所未有的先驅，對世界其他各地的組織而言亦屬先鋒，例如北美洲激進的團體如「黑豹」（Black Panthers），以及各地持續的農民革命或游擊運動，包括在瓜地馬拉、委內瑞拉、哥倫比亞、秘魯、玻利維亞、巴西、墨西哥；也是社會解放各種其他形式的先驅，如弗雷勒，甚至是激進解放神學的先驅，因為這一派的神學沒有把贖罪的重點放在個人的罪過，而是社會的罪愆——貧窮、不公和壓迫——，以及對窮人的差別性的偏見（Gallet 1972; Gott 1973; Gutiérrez 1988; Huizer 1973; 不需要等待客觀情勢的配合。他們主張以少數的武裝叛變，如游擊隊，造成焦點，然後形成反對的對抗力量。

Marighella 1971; Singelmann 1980; Stavenhagen 1970)。上述這些沒有一個純是重複格瓦拉的思想或策略，絲毫不加修正，不加拓展；例如「光輝道路」的歷史可以證明農民鬥爭在某些狀況下，和族群認同的形式反而比較有關，這反而不是格瓦拉當初設想到的（Stern 1998; Gorriti Ellenbogen 1999; Guevara 1998: xiii）。雖然受到他影響的組織，如「圖帕馬羅斯城市游擊隊」（Tupamaras）及「蒙托內羅斯」（Montoneros）很快殞落，但是他仍然持續不斷地激勵拉丁美洲的革命，如哥倫比亞的「民族解放軍」（ELN），以及薩爾瓦多的「馬蒂民族解放陣線」（FMLN）（McLintock 1998）。由副總司令馬珂士（Subcomandante Marcos）——後現代的格瓦拉——在墨西哥恰帕斯（Chiapas）所領導的「查巴帝司塔叛亂」證明他們所奮戰的原則和格瓦拉的沒有什麼差別，由是觀之，格瓦拉仍舊是最傑出的象徵和角色模範（Campa Mendoza 1999; Duhalde 1994; Maorcs 1995; Moguel 1998; Ronfeldt 1998）。

卡斯楚曾說：「殖民地沒有說話。殖民地默默無聞，直到它有機會表達自己」（Castro 1972: 28）。格瓦拉常常援引的是代表「古巴革命」的基本文本，以及可說是後來成為後殖民主義的革命傳承——〈哈瓦那第二次宣言〉。這個宣言具名的是「古巴哈瓦那，美洲自由領土的古巴人民」，是古巴人民給全世界的一個具有反叛意義的宣言。格瓦拉認為〈哈瓦那第二次宣言〉是「拉丁美洲無產階級、農民和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指導方針」（Guevara 1987: 195）。我們很難相信格瓦拉不是這個宣言的起稿者之一。這個宣言最獨特的地方就是它同時為「古巴革命」呈現了歷史、經濟、文化和道德的論點，回應後殖民的帝國主義在拉丁美洲的所做所為，包括是針對保證讓古巴在1898年脫離西班牙之後獨立，卻又強迫它依賴要美國的「普拉特修正案」<sup>譯註7</sup>，以及1959年革命之後美國的經濟封鎖，1961年「豬灣灣入侵事件」，還有1962年美國主導將古巴從「美洲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中除名等（Pérez 1986）。就是這個宣言奠定了「相互依賴」的理論政治基礎；也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將比較近期對發展批判歸為充其量只是政治的無意識（political unconscious）。同時，這個宣言也談到權力關係的轉變，也就是世界上被剝奪的人開始爭取權力，並且寫下他們自己的歷史：

未來的歷史將會由印地安人的飢餓大眾、由被剝削的工人來記載；將會由進步的群眾，由散布在拉丁美洲這個不幸之地、誠實而聰明的知識分子來書寫，歷史將會記載著群眾的鬥爭和想法：我們的人民，被帝國主義虐待、鄙視的人民，將寫下史詩，傳遞下去，我們這群一直不被承認，但現

譯註7 Platt Amendment：由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 O. H. Platt (1827-1905) 在1901年提出美國陸軍撥款案附加條款，規定美古兩國保持主從關係，旨在把古巴變成美國的保護國。



在正逐漸甦醒的人民。

這群勞苦的人們被毫無人道地剝削，這些窮苦的人被鞭子和監督者所控制，他們從未被重視過，或者說幾乎不大被重視。打從他們一開始走向獨立之路，他們的命運都一樣：印地安人、高楚人<sup>譯註8</sup>、麥蒂索人、尚寶人<sup>譯註9</sup>、葛德倫人<sup>譯註10</sup>、沒有地產或收入的白人，所有這些人組成「民族」的各階層，但從來不曾享受到任何的利益……他們不斷地死於飢餓，死於原本可以醫治的疾病或疏忽，因為對他們而言，生存的基本要件從來不曾足夠——普通的麵包、一張病床、治病的藥、幫助他們的手——他們的命運一直是相同的。

但是現在……這群無名的群眾，這個有色人種的美洲，鬱悶、沈默的美洲，整片大陸以同樣的悲涼和幻滅在吟唱，現在，人們決定開始走進自己的歷史，開始用自己的血寫歷史，開始為創造自己的歷史承受苦難，為它犧牲……

是的，現在的歷史將會把可憐的拉丁美洲列入，這一片被剝削被唾棄的拉丁美洲已經決心開始為他們自己所有的時段寫下歷史。（Castro 1972: 165-6；英文譯文經本書作者修改）

<sup>譯註8</sup> gauchos：西班牙和美洲原住民混血的後代，通常特別只在阿根廷草原區的放牧者。

<sup>譯註9</sup> zampos：黑人與印地安人混血兒。

<sup>譯註10</sup> quadroon：黑白混血兒和白色人所生的孩子，黑人血統占四分之一。

## 17.

# 非洲（一）： 英語系非洲社會主義

世界上可能沒有任何人像非洲的人民，在過去受這麼多的苦，同時被剝削得這麼厲害。

尼赫魯，1938（Nehru 1941: 275）

### 一、前共產主義時期的非洲反殖民主義

非洲對殖民主義的批判，以知識、政治、哲學和文化的形式回應歐洲強制實施的殖民統治，早在共產主義的思想和政治實踐影響撒哈拉以南之前就開始了。完全公正看待非洲的反殖民主義就必需要瞭解非洲政治和軍事的抗爭史，在這方面，詹姆士的《黑人反抗史》（*History of Negro Revolt*, 1938）提供了簡明扼要的概述，而若柏格（Rotberg）和馬孜茹（Mazrui）（1970）的書有比較長篇幅的敘述，記載從18世紀末期以來非洲反殖民和民族主義思想的歷史（關於非洲民族主義，可在藍格禮（Langley）在1979年，以及布拉干薩（Bragança）和華勒斯坦在1982年出版的書中找到相關資料）。光是在西非，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有為數不少的知識分子行動派扮演了泛非洲運動的先驅，他們展現一股對歐洲殖民系統漸漸增強的反抗，並以各種方式鼓吹非洲文化中的各種價值。這股強力的知識和政治文化的代表人物包括《西非國家與人民：為非洲種族辯護》（*West African Countries and Peoples: A Vindication of the African Race*, 1868）的作者侯頓（James Africanus Horton），第一位獅子山的黑人州長弗格遜（William Fergusson），身兼商人、經濟學家和《西非報導》（*West African Reporter*）的創辦人葛蘭特（William Grant）、政治家喬治·強生（George W. Johnson）、哲學家布萊頓（Edward W. Blyden）和克拉梅爾（Alexander Crummell），這兩人都是移民（從美屬維京群島和美國移來），還有歷史學家薩穆爾·強生（Samuel Johnson）和雷多夫（C.C. Reindorf）、黃金海岸律師薩爾巴（John Mensah Sarbah），以批判英國和法國殖民主義著名的新聞從業人員潘·傑克遜（John Payne Jackson）和胡查（Louis Huchard），民族主義者赫伯·麥坎雷（Herbert Macaulay）和迪亞涅（Blaise Diagne），以及律師卡斯利·海佛（Joseph

Casely Hayford)。這些人之中，主張泛西非文化民族主義的布萊頓和他的弟子，《解放衣索比亞》（*Ethiopia Unbound*, 1911）一書的作者兼「西非會議」的創辦者卡斯利·海佛，這兩人最具直接的政治影響力，而文化民族主義也最受注意（Geiss 1974; July 1968; Langley 1973: 37-40）。立歐坡·桑戈爾（Léopold Senghor）和後來的穆丁比也將克拉梅爾視為「黑人精神」（*négritude*）運動<sup>譯註1</sup>和泛非洲主義的先驅，而吉洛伊（Gilroy）認為他是「黑人錫安建國主義」（Black Zionism）觀念的創始者（Gilroy 1993; Mduimbe 1988）。1920年代、1930年代和1940年代許多行動派，如兩位來自塞內加爾的兩個桑戈爾（也就是拉明·桑戈爾和立歐坡·桑戈爾），來自黃金海岸的恩克魯瑪，來自幾內亞的杜爾（Sékou Touré），都因為非洲在政治和知識方面長久而實質的抗爭傳統而有所啟發。從布萊頓和克拉梅爾可看出，非洲人、非裔美人，以及非裔加勒比海和拉美激進派知識分子的接觸很頻繁。就政治歷史的角度來觀察，「黑色大西洋」是一片整體的區域，每一個個別的成員都不可能單獨隔離，單打獨鬥：北美洲和南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和非洲的歷史牢牢地繫在一起，反之亦然（Gilroy 1993）。

大體而言，三大洲反殖民主義和後殖民主義一樣，是漂泊離散下的產物，是本土與世界的混合，是一種革命性的結合；它不只是因為漂泊離散，更是因為在殖民地和宗主國不同程度的壓制，結合而成的產物。兩次大戰之間以及早期的政治運動之間的區別，主要就在非洲反殖民主義的國際主義面向。從未曾在非洲舉行過的「泛非洲代表大會」對於拉美、加勒比海和非洲的行動派之間的國際性接觸有所助益。第一次的會議是由「非洲協會」（African Association）創辦人，來自千里達的席維斯·威廉士（Henry Sylvester-Williams）的提議而組織起來；「泛非洲協會」（Pan-African Association）就是這次會議的成果。在這次會議中的〈致全世界各民族〉（‘Address to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中的主張——已經確定是由參加成員之一的杜博斯所撰寫：「20世紀的問題就是膚色所導致的界線問題」，自始至終都在提醒世人同樣注意非洲的狀況，無論是非洲本土或是非洲人離散在各國的狀況（Du Bois 1989: 10; Langley 1979: 738）。這個觀點在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另外兩次非洲會議中更為明顯：1911年在倫敦舉辦的「全球各種族會議」（Universal Races Congress），以及華聖敦（Booker T. Washington）在阿拉巴馬的塔斯基吉（Tuskegee）舉辦的泛非洲的「黑人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Negro），這個會議在1912年舉行，參加的有卡斯利·海佛，以及來自英屬東非、賴比瑞亞、奈及利亞、盧安達（Rwanda），荷屬東非和南非的代表（Boahen 1985: 768; Langley 1973: 31-2）。非洲的民族主義可能比任何其他反殖民運動更具有國際主義的特

<sup>譯註1</sup>「黑人精神運動」主張發揚非洲人獨特的特質和文化，認為所有黑人的後裔都具有共同的，與生俱來的特性，應該將此共同的特性和精神發揮到各方面。

質；它最特出的也就是它的國際主義，這是由各地的非洲人共同發展出來的，包括在美國、加勒比海和歐洲的非洲人。那些居住在非洲地區以外的人，無論是漂泊的或是放逐的，往往都會和非洲本土一些成立於20世紀的黑人政治組織維持聯繫：1912年的「非洲民族會議」，1920年突尼西亞的「大司托」（Dustur）與「新大司托」（Neo-Dustur），1920年由黃金海岸的卡斯利·海佛和奈及利亞的薩維濟醫生（Dr Akiwande Savage）所創的「英屬西非國民大會」，1920年代肯亞的「基庫尤中央協會」（Kikuyu Central Association），1930年代塞內加爾的「社會主義聯邦」（Socialist Federation），以及「摩洛哥行動委員會」（Comité d’Action Marocaine）等（Wallerstein 1961: 55）。三大洲反殖民主義一直有具體的政治和理論：一種在觀念形成的層次上發展出來的政治和理論性的批判，但同時又透過實質的策略和實踐將之付諸實行。

因此，非洲解放的機制和產生採用洲際（intercontinental）運動的形式，但從未能脫離美國和加勒比海的重大干預而獨立運作（後來古巴對安哥拉的干預絕對不是一種激進的偏離，而是基於同樣的精神）。今日，要劃分後殖民的漂泊離散和原本住民的非洲政治，從歷史觀點來看無甚意義。自從「黑色大西洋」開始之後，分開在兩大陸的非洲人從未讓大西洋將他們分割。在20世紀，離散各地的非洲行動派知識分子在海外組織政治團體、出版報紙、寫書、寫文章，後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自己的家鄉不遺餘力地涉足政治活動。以英語為主和以法語為主的行動派之間有非常緊密的聯繫：例如，在倫敦恩克魯瑪兩度到巴黎見「法國國民議會」（French National Assembly）的非洲成員——包括阿皮蒂（Sourous Apithy）和立歐坡·桑戈爾——而且花了很長的時間和他們共同籌畫一個「西非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Union of West African Socialist Republics）。阿皮蒂和桑戈爾後來在1948年的「西非會議」中，代表法屬西非到倫敦參加（Nkrumah 1957: 47-49）。後來，在1968年，恩克魯瑪觀察道：「美國黑人的力量，以及非裔人民在加勒比海、南美和其他各地的奮鬥，共同形成非洲政治和軍事革命鬥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Nkrumah 1968: i）。當恩克魯瑪回到加納，他身邊的人就是一個「黑色大西洋」結盟的典型，包括了來自美國和加勒比海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家，但是他同黨中許多人對他這一點頗不以為然。

## 二、非裔美國和非裔加勒比海激進派的影響

第一次世界大戰大大地強化非洲的民族運動，因為一次世界大戰時非洲軍隊被徵召到東非或歐洲打仗，因此他們有了一個新的國際角度來看他們自己的情況，並且目睹殖民主人的不堪一擊。這批兵士歸鄉後，對長期以來與殖民勢力合作的當地

傳統首長的權威感到不耐，因而開始採取罷工行動，並要求如果不能獨立也要有代表權。威爾森（Wilson）總統的14點及其對自決的肯定態度，對政治主張的各種新形式有很大的鼓勵（Boahen 1985: 305-6）。同時，另一位來自加勒比海的人物也在非洲解放政治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加維。在1920年代，西非人和加維的「全球黑人進步協會」（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在協商為賴比瑞亞的非裔美人建立第一個黑人家園時，就有直接接觸。雖然這幾次的接觸最後不歡而散，但是加維的「黑人猶太錫安建國主義」的觀念——加維自己在紐約被選為第一任的「非洲臨時總統」——在非洲和在美國幾乎都是眾所週知。到目前為止。加維的「全球黑人進步協會」是當代一般非洲最知名的非美政治運動（Langley 1973: 306）。「加維的聲音在非洲中回響不絕」，詹姆士如此說道，他敘述著肯亞塔告訴他：

在1921年肯亞的民族運動者沒有閱讀能力，他們聚集在一個讀報人周圍，他讀的是加維的報紙《黑人世界》（*The Negro World*），他們仔細傾聽，一篇文章朗讀過兩三次。結束後眾人四散，向不同方向疾奔而去，穿過森林，小心翼翼地將他們所記住的一切背誦給其他求知若渴的非洲人，他們渴望一些可以提昇非洲人卑微的意識的觀念（James 1992: 300）。

加維從閱讀華聖敦（《超越奴役》（*Up from Slavery*）），以及他在英國遇見埃及民族主義知識分子杜思·穆罕默德·阿里（《在法羅王的土地》一書的作者），因而體認到必需發揚黑人民族主義和黑人的驕傲感的觀念。加維的黑人民族主義和黑人的驕傲，加上「全球黑人進步協會」所堅信的黑人權利宣言——黑人不應該劃地自限，認為自己要服從種族歧視的法律，這些一直都是非美政治文化的核心，尤其是黑人權力運動中一些黑人民族主義的主戰分離派，如梅爾肯·艾克斯（Malcolm X）、以利亞·穆罕默德（Elijah Muhammed）、凱米歇爾（Stokely Carmichael）、紐頓（Huey P. Newton）、西爾（Bobby Seale）、戴維絲（Angela Davis）和比較近期的法拉肯（Louis Farrakhan）（Franklin 1992; Van Deburg 1997; Wolfenstein 1981）。整個20世紀的美國黑人解放運動不斷地啟發殖民非洲的解放運動，例如1970年代在南非有畢克（Steve Biko）的「黑人意識運動」（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Biko 1978; Davenport 1991: 379; Fredrickson 1996; Sixth Pan-African Congress 1976: 222）。正如我們可以預想得到的，非美的政治在方向方面不像加勒比海和非洲那麼傾向馬克思主義：加維完全贊同資本主義，也同樣地反對共產主義的非種族主義（non-racialism）。他的極端民族主義，以及強調黑人種族的自覺和明顯排斥混種的非裔美人，最為左派的美國共產黨反對，但是美國共產黨也很佩服加維不凡的能力，可以得到多數群眾的支持。加維甚至還驕傲地宣稱「我們是第一批

法西斯主義者」，他對左派的黑人行動派一直抱持者仇視的態度，攻擊敵對的領袖，如布立格茲（Cyril Briggs）（加維說他不是真正的黑人），而對於從1905年的「尼加拉瓜運動」（Niagara movement）之後，積極為黑人權利而奔走的杜博斯，加維則針對其個人大肆謾罵（James 1998; Kelley 1994; Padmore 1956: 97; Von Eschen 1997; Weisbord 1973）。

杜博斯漸漸地將本土的目標拓展到為非洲人爭取權利的國際性規劃，其基礎就是自決的觀念，以及種族、社會和政治的平等，還有民主的社會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杜博斯恢復了「泛非洲代表大會」：第一次在巴黎，與1919年的「凡爾賽和談」同一時間舉行，這次主要是由非洲的代表（包括「非洲民族會議」的普拉切），聯合西非和美國的代表扮演施壓團體的角色，一起為沒有代表參加的被殖民地發聲。杜博斯提議「統治非洲需經由非洲人的同意」，希望此次會議能夠為非洲的自決做一個開端。同時也希望可以讓以前的德國殖民地和葡萄牙、比利時的殖民地，由即將成立的「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授與權限，由非洲人治理（Du Bois 1965: 8-12; Kedourie 1971: 373-376）。此次會議接受了授權的想法，但是卻將德國殖民地授權給英國、法國和南非。在「凡爾賽和談」會議中，威爾森總統所宣稱的自決的原則只適用於歐洲國家。但是杜博斯鏗而不舍，他見到泛非洲運動從1919年第一次的戰後會議逐漸發展，繼續在1921、1923和1927年舉行三次會議。杜博斯主持了1945年在曼徹斯特舉行的著名的第五次的「泛非洲代表大會」，會中由恩克魯瑪、潘得墨、肯亞塔和其他許多非洲和加勒比海的領袖共同規劃，為後來成功的非洲去殖民建立一個政治進程表（Geiss 1974; Hooker 1975: 31; Padmore 1963）。雖然杜博斯反對任何一種形式的種族主義，但是他還是強調提昇非洲意識，以及非洲文化認同所具有的賦權力量（empowering power）。他的雙重意識的觀念——「永遠要透過他者的眼光來看自己」，是第一個以紮實的非美觀點批判白人主導的文化對非裔美人的異化影響（alienating effects）。同時這個觀念也等於為法農鋪路，他在《黑皮膚，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中以心理的角度更精闢地分析殖民文化如何運用各種機制，讓被殖民者產生卑微的心理（Du Bois 1989: 3; Fanon 1986）。

杜博斯和法農兩人都是從黑格爾的意識的角度出發，分析宰制和去權（disempowerment）對心理的影響，然後漸漸移向激進的社會和政治需求，要求賦權和自決。他們透過社會領域中的文化，扣連心理和政治的分析和重構（reconstruction）：文化、心理和政治就是建立黑人力量（black power）的三個節點（nodal points）。非美傳統中的民族主義和文化的自我賦權，透過非洲人的離散所形成的文化重新合成（recoalescence）策略，要求平等權利和自決的驅策力逐漸影響到殖民世界的非洲人：美國黑人和非洲黑人的壓抑和解放一直有著共生的關

係。如果說非裔美人在美國對抗種族歧視和壓迫透過行動和言辭的鬥爭，啓發了所有被殖民者，這種說法一點也不誇張。從1909年的「有色人種促進會」<sup>譯註2</sup>的設立，到加維的「全球黑人進步協會」，到1960年代的「黑人權力運動」，非裔美人的反抗動力啓發了世界上被壓迫的人民，尤其是非洲。他們的鬥爭和非洲人的鬥爭是一體的。以英語爲主要語言的加勒比海政治行動派，如潘得墨等人，注意到這一點，因此往往就選擇到美國就學，而非英國。非洲境內以英語爲主的政治行動派，如阿茲基章、恩克魯瑪、班達（Kamuzu Banda）等，也是因爲同樣的理由到美國——他們受到在美國受教育的黃金海岸教育家阿格雷（J.E.K. Aggrey）的鼓勵。阿格雷回到非洲，一般將他看做是非裔美人「反侵非洲」——要將白人殖民者趕出非洲（Boahen 1985: 763-74）。這個非洲天啓錄式的幻想——由進攻的非裔美人把非洲從殖民的宰制中解救出來——後來成爲斯凱勒（George S. Schuyler）著名的小說《黑人帝國》（*Black Empire*, 1937-8）的主題。

222

除了杜博斯以外，在美國的左派行動分子對非洲的影響較小，部分原因是他們在美國本身就沒有太大的影響力，另一部分的原因是他們對「黑人錫安建國主義」或「泛非洲主義」比較沒有興趣，因此對美國和非洲之間的關聯也不感興趣。共產黨員把非裔美人看成是一個美國革命的潛在先鋒：自從1920年李德在「共產國際大會」上以非裔美人的立場發言之後，列寧就鼓勵「共產國際」將非裔美人視爲「美國共產黨」活動中一個策略性的重要元素。「共產國際」後來非常注意非裔美人，把他們當成是美國最大的一股革命潛力，鼓勵激進左派的立場，將種族議題併入階級鬥爭的大架構中。在1928年3月的「國際紅色勞動工會」（Profintern）第四次大會也有類似的決議，隨後1928年的「共產國際大會」因爲「美國共產黨」沒有成功運用而非裔美人感到挫折，因此發出一個指導原則：更積極參與「黑人解放運動」。其實「美國共產黨」以一連串的策略嘗試要動員非裔美人：他們企圖滲透加維的運動沒有成功，改採同樣是判斷錯誤的策略（也可適用於南非）——建立一個「黑人地帶」（Black Belt State），也就是在美國境內建立一個自主的非裔美人州，這個想法一方面是和加維的「回到非洲」的想法互別苗頭，一方面還可以實現列寧所定義的，將少數族群和種族看成被壓迫者，讓他們擁有民族的自主權。有一些爲期甚短的前線組織遵行這個策略，如「美國黑人勞工協會」（American Negro Labor Congress），由休斯（Langston Hughes）領導的「黑人權利鬥爭聯盟」（League of Struggle for Negro Rights），以及以人民陣線爲主的「黑人大會」（National Negro Congress）。加維垮台之後，共產組織和許多敵對的組織競爭，如布立格茲的「非洲血誓弟兄」（African Blood Brotherhood），或者「前進華盛頓運動」（March on Washington Movement）（James 1998: 155-73; Padmore 1956: 303-17）。非

<sup>譯註2</sup> NAACP: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裔美人常常懷疑共產黨對他們的興趣，只是把他們當成一個工具，並非真正關心非裔美人的問題和需要。布立格茲的「非洲血誓弟兄」嘗試把加維所強調的黑人認同與黑人意識和共產主義的原則結合，這個策略在許多方面和非洲的社會主義不謀而合。

美國的共產黨改變立場並沒有消除黑人對這個主要是白人的組織的不信任，許多美國黑人，包括最有名的例子羅貝森（Paul Robeson），仍然比較傾向蘇聯，因爲蘇聯種族的態度表現的非常包容，而且以平等待之。著名的千里達板球選手康士坦丁（Learie Constantine）在他的書《膚色的障礙》（*Colour Bar*）中，用兩張照片呈現尖銳的對比，一張是「在美國喬治亞州的黑人被處以私刑，用油燈灼燒，命在旦夕」，而另一張是一個年輕的女性和男性，看的出來是少數民族，坐在一起唸書，照片下面的字寫著：「少數民族平等受教；蘇聯塔吉克州立大學（State University of Tajik）動物系學生」（Constantine 1954: facing 46, 70）。杜博斯也有這樣的評語：「在記錄上，蘇聯對種族容忍方面的確非比尋常」。杜博斯在他很晚的時期，被「美國有色人種促進會」解除特別研究會主任的職位後，他加入了羅貝森的「非洲事務委員會」（Council of African Affairs），最後變成共產黨員。事實上，就是「非洲事務委員會」（成員包括羅貝森、葉根（Max Yergan）、韓頓（Alphacus Hunton）和杜博斯），以及「美國有色人種促進會」（由懷特（Walter White）領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第一次將非洲的解放和國際主義反殖民論述變成非美政治的核心。懷特宣稱，第二次世界大戰各種經驗與視角給非裔美人一種與世界上被壓迫的被殖民者休戚與共的感覺，他們覺得「美國黑人的鬥爭就是世界各地反帝國和反剝削的主要核心，無論是在印度、中國和緬甸、或是在非洲、菲律賓、馬來西亞、西非和南美」（Von Eschen 1997: 8）。這方面的成就應該歸功於潘得墨，他從1930年代末期就開始定期爲《芝加哥衛報》（*Chicago Defender*）、《匹茲堡信差報》（*Pittsburgh Courier*）以及《危機》（*Crisis*）寫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潘得墨是「黑人聯合通訊社」（Associated Negro Press）駐非洲特派員，他的報導廣爲非美報紙聯合採用。凡·艾斯肯（Penny M. Von Eschen）曾就潘得墨這方面的能力評道：「他對非美思想有深刻的影響」：

223

潘得墨特別透過他的新聞事業爲國際運動塑造了一種通俗的語言，刺激了1940年代的美國黑人論述。……對非美、西印度、西非和英國的報紙而言，他是一個多產的新聞記者兼散文家，同時對於美國、英國、加勒比海，以及……西非的反殖民行動派之間的溝通幫助甚大（Von Eschen 1997: 13）。

<sup>譯註3</sup> Ellis Island：紐約港的一個小島，島上曾設立移民檢查站。

到了1940年代晚期，麥卡錫主義（McCarthyite）的整肅（整肅目標包括羅貝森和1952年被驅逐出美國，監禁在艾利斯島<sup>譯註3</sup>的詹姆士）在實質上已經終結了「美國共產黨」的政治勢力，而如羅貝森和杜博斯等人將共產黨和非美行動派的政策作連結，他們的影響力也消失了。到了1950年代中期，冷戰的氣氛，加上非洲解放運動的政治激進化，以及越來越注重美國國內公民權（Civil Rights）運動，這一切使非洲解放的議題不再是主流非美政治的中心焦點。後來在1960年代，這一切又再度改變了：著名的「切—盧蒙巴組織」（Che-Lumumba Club）——一個集合奮戰的純種黑人的共產黨派——在洛杉磯成立，還有自覺歸屬於三大洲革命鬥爭的黑人社會主義的復興運動——由凱米歇爾、瓊斯（Leroi Jones）和「黑豹」領袖紐頓所領導（Davis et al. 1971; Gerassi 1971, 2: 675-742, 761-763）。凱米歇爾曾說過：卡斯楚是「加勒比海最黑的純黑人」（James 1998: 246）。

224 面對當時眾所週知的「膚色障礙」的經驗，共產主義所堅持的種族平等奠定了它吸引加勒比海知識分子和政治行動派的基礎，尤其是詹姆士，以及他的同伴，千里達的涅斯（Malcolm Nurse），潘得墨比較為人所知的名字是喬治·潘得墨（George Padmore）。涅斯在1928年以潘得墨為名就讀於霍華德大學（Howard University），主要是為了有助於他在美國日漸積極的共產活動（Hooker 1967: 6-9）。就像很多來自加勒比海和美國的同伴一樣，潘得墨被共產主義吸引的基本原因是，共產主義在理論和實踐都反種族主義，而其理想就是建造一個沒有種族歧視、全球平等現代社會；共產黨也是唯一在政治上致力於民族自決，以及解放美國和各殖民地的非洲的國際組織。但是潘得墨在「美國黑人勞工協會」的工作讓他更清楚瞭解想在美國工人中建立種族之間的政治統一是多麼困難；白種人勞工傾向於維持種族主義的態度，而黑種人勞工懷疑由白人主導的共產黨。

就像許多非洲知識分子、反殖民運動的領袖和行動派一樣，潘得墨漂泊各地，在他有生之年，他在千里達、美國、莫斯科、巴黎、倫敦和加納遊走。他強力的組織能力，加上能言善道，讓他和詹姆士之間的友誼產生一種互補而共生的關係。詹姆士的政治抱負有時是和潘得墨相近，但是他個人早期比較傾向寫小說和重寫歷史。他不像迪奧普（Diop）那樣想要找回失落的非洲文化，他要保留的是黑人抗爭這一段從屬的歷史，然後將非洲放在當代史的中心。1932年，詹姆士在英國準備撰寫康士坦丁的傳記時，潘得墨來訪，想要說服詹姆士成為共產黨的行動派。詹姆士本身是托洛斯基的信徒，所以拒絕了。當時詹姆士的政治思想正趨向成熟：他的文章〈西印度的自治〉（‘The Case for West Indian Self-Government’）中的慎重小心，與1938年的《黑色的雅各賓黨人》（*The Black Jacobins*）一書中的革命性，兩者之間有很大的對比。就某個意義來看，這本書可稱為托洛斯基本人有關俄國革命的著作之後，最偉大的一本有關托洛斯基思想的歷史著作。《黑色的耶可賓黨人》

的成就在於它創造了新的歷史——黑人的革命鬥爭被放在中心，而不是邊緣。正如朱恩（E. San Juan）所說，詹姆士肯定「群眾所具有的豐富的、自發的、創造性的力量，以及工人大眾所具有的政治能力，在危機時期所動員的一股匯集起來的力量」。（San Juan 1998: 230）。雖然詹姆士在《黑色的雅各賓黨人》中頌揚被殖民者的反叛精神，但是他在這段時期的其他著作中仍明顯可見托洛斯基的影響，因為這些作品中，詹姆士對殖民問題表現出相對漠然的態度。值得注意的是在他1937年的《世界革命》（*World Revolution*）一書中關注歐洲的事件，而提到有關殖民的問題不超過一兩個詞——只有對於中國的情況才值得持續討論（James 1937: 229-267）。詹姆士本人自己把思想的改變歸因於潘得墨：「我以歐洲的角度開始托洛斯基路線的運動。後來我接觸到潘得墨，他說他是馬克思主義者，那麼殖民問題呢？非洲問題呢？……他教導我，我將他的教導付諸實行」（James 1987: 5）。詹姆士對於非美情勢的立場從來就不算是正統的。他反對「共產國際」路線，因為「共產國際」認為對於非裔美人的鬥爭所應該採取的正確立場是支持黑人民族主義的目標，225 在美國境內成立一個獨立的黑人州。更重要的是，在托洛斯基拒絕被說服，不願接受這樣的作法不是對非裔美人最有建設性之後，詹姆士認為托洛斯基——這個與他共同討論過非裔美人的情況的人——在這方面的想法思路不清（Trotsky 1978）。對詹姆士而言，此時列寧逐漸成為核心，他引述列寧的觀念，為歷史，為非裔美人的自主和社會權力的鬥爭而辯護，他認為這些鬥爭不但有助於無產階級的發展，並且也是「社會主義鬥爭的一部分」（James 1992: 182-183, 372）。但是回顧起來，非裔美人的戰鬥精神在美國社會革命的過程並沒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就在社會主義再也不是非裔美人的選擇時候，戰後非洲反殖民的馬克思主義正在發展，結合了加勒比海和歐洲的激進政治。詹姆士到最後變成了泛非洲主義者，因為他漸漸看到非洲的社會主義成為社會主義新形式的先鋒，他認為這個新形式可以兌現1924年列寧死後就被遺忘的諾言（James 1969; 1977）。

恩克魯瑪和立歐波·桑戈爾之類的重要人物往往強調他們從非裔美人、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等政治著作的啟發，同時，他們將此連結到對非洲文化的肯定；由近期非洲、歐洲和美國的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可證明非洲文化的豐富和複雜性（Mudimbe 1988: 88-90）。如果說非洲解放一直是三大洲的一個課題，有部分是因為在殖民地受到的壓抑意謂著政治激進派和知識分子通常必需放逐到歐洲和美國（許多非洲知識分子在今天也是處於放逐狀態，也是基於同樣的原因）。因此，倫敦和巴黎這樣的帝國首都弔詭地成為非洲反殖民運動活躍的中心，也是這些人相互接觸的地區，為來自不同國家的積極分子提供了自由和機會，讓他們可以見面接觸，藉以協調彼此之間的活動，即使他們被情報系統嚴密地監控（Robinson 1983: 369-75）。來自加勒比海的人所扮演的角色尤其重要，特別是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

當時加維思想的影響力以及「泛非洲代表大會」都已經日落西山了。在詹姆士紀錄潘得墨生平的手記中，詹姆士寫道：「絕大部分是西印度人將非洲的問題變成英國政治中一個活生生的問題，而這類情況一直持續到恩克魯瑪在1940年代初到了倫敦」（James 1992: 293）。羅貝森也說：「我在倫敦發現了非洲」（Von Eschen 1997: 16）。在魯賓遜（Cedric Robinson）的古典研究中，他也認為來自非洲的加勒比海行動派對後來發展獨特的非洲或黑人馬克思傳統有特別的影響力：魯賓遜所列的名單包括杜桑·盧維度爾、塞捷爾、法農、潘得墨和詹姆士（Robinson 1983）。後殖民理論特別將此當成是最重要的啟發，而且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才會使得霍爾（Stuart Hall）——此一傳統的當代代表人物——被賦予特殊的權威地位。溫士頓·詹木斯（Winston James 1998）也強調非美激進行動主義深受這些來自加勒比海的移民所影響——這些人之中最著名的例子有布立格茲、高倫（Jesús Colón）、加維、哈里遜（Hubert Harrison）、馬凱（Claude McKay）。就像許多他同時代的人，馬凱也和其他地方的進步派團體有接觸；他的小說《班卓琴：一個沒有情節的故事》（*Banjo: A Story Without a Plot*, 1929）對1920年代非洲的反殖民行動派在巴黎的真實生活狀況，有非常深刻的描寫（McKay 1929; Miller 1998: 21-3）。

### 三、非洲的共產黨活動

如果說共產黨和（或者說「對於」）非裔美人的政策不能算是成功的話，相對地，它在非洲的成功其實是超過大家所認定的。大家往往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共產國際」鮮少在非洲活動。事實上，「反殖民會議」和1928年的「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當時努力想恢復反殖民陣線的策略時，就強調應該特別注意非洲。因此，正如威爾森舉證歷歷地分析俄國干涉非洲時所凸顯，當時的確有許多小型但是具有意義的活動（Wilson 1974）。這絕非是許多人以為的，在1925年和1939年之間共產主義在非洲是「毫無成果」（Bottomore et al. 1991: 353）。注意這段歷史也可以證明三個相關的重點：第一，在許多殖民地，「共產黨」在地方民眾的層次上所進行的組織性活動相當成功。第二，「共產黨」的活動拓展反殖民運動和國際性的連結。第三，它顯示了獨立運動典型地採用「共產黨」的馬克思反殖民主義，然後有創意地根據自己已經建立的政治優先事項加以改變。非洲反殖民運動中的這些共產黨因素也可以用其他方式證明，從其他在亞洲或中南美洲的反殖民和帝國相關的行動亦可顯現。

1930年「國際紅色勞動工會」——共產國際的貿易工會組織——創立「黑人勞工國際貿易聯合委員會」（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mmittee of Negro Workers, ITUC-NW），將潘得墨和美國共產黨的黑人行動派福特（James W. Ford）從美國請

來管理「黑人宣傳組織部」。他們被授與黨部資深官員的位置，在克里姆林宮（Kremlin）設立辦公室，出版傳奇性的期刊《黑人勞工》（*The Negro Worker*）。1930年7月，在福特和「反帝國主義聯盟」總會的指導之下，潘得墨著手組織在漢堡（Hamburg）的第一次黑人勞工國際會議，這是一次小型的會議，參加代表來自美國、加勒比海、拉丁美洲、南非和西非。大家討論的不只是貿易聯盟的議題，同時更廣泛地談論世界各地黑人的社會和政治情況。正如潘得墨在次年提到他們當時所談的議題，「比方說，非洲被帝國主義的強盜掠奪土地；透過「通行證法」（Pass laws）以及非洲其他反勞工法令和種族歧視的法令來奴役勞動者；美國的私刑、抵債勞役和隔離制度；以及導致數百萬黑人勞工流落街頭的失業現象，讓他們飢寒交迫，瀕臨死亡」（Padmore 1931: 5; Ford 1938; Hooker 1967: 141-17）。雖然「國際紅色勞動工會」在潘得墨設立「黑人宣傳組織部」的時候，大致上考量的是美國和南非，但是潘得墨很快地就和其他各地的非洲民族主義者結合，包括了肯亞的肯亞塔，蘇丹的加藍·庫雅特，奈及利亞的麥坎雷，甘比亞的史墨爾（E. F. Small），以及獅子山的華勒士·詹生（I. T. A. Wallace-Johnson）。這些人有時候以倫敦和巴黎為據點，和他們自己國家的政治組織積極聯繫和接觸，並且運用「共產國際」的組織技巧發展實質的政治勢力基礎，尤其是在貿易工會和青年運動中培養政治基礎。透過在英國殖民地被禁止的《黑人勞工》的非法發行（加維的《黑人勞工》在幾乎所有的非洲殖民地都是被禁止的），以及相關的行動派組織的志同道合者，如「殖民海員協會」（Colonial Seamen's Association），以及「國際海員及港口勞工協會」（The International of Seamen and Harbour Workers, ISHW），潘得墨和同伴才能傳遞反殖民的宣傳，並且讓休戚與共的情感將非洲的抗爭連成全球性。這項工作有賴英國的共產黨及其在殖民地結盟組織的輔助，尤其是和「反帝國主義聯盟」之類的國際共產組織合作的「英屬西非黑人福利協會」（Negro Welfare Association of British West Africa）、「國際勞工保障」（International Labour Defence）、潘得墨的「黑人勞工國際貿易聯合委員會」，以及和非洲港口城市經營俱樂部和貿易工會的「國際海員及勞工協會」。

這些組織支持非洲行動派在各殖民地的主要工作，如《甘比亞瞭望》（*Gambia Outlook*）的編輯史墨爾是「英屬西非國民大會」的創始人，同時也組織「布瑟司特貿易工會」（Bathurst Trade Union），這是非洲第一批（非法）的貿易工會之一，成功領導1929年的民眾罷工。華勒士·詹生在這方面也是一個特別重要的人物：他在1931至1932年就讀於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大學，之後在奈及利亞組了一個非常成功的非法貿易工會（「奈及利亞非洲勞工工會」），同時也參與建立激進的婦女組織。他在1933年被英國殖民當局強迫離開奈及利亞，因此他就轉往黃金海岸（加納），在當地建立了後來迅速成爲一個重要的民族組織——「西非青年聯盟」（West

African Youth League, WAYL)。在所有青年，族群和類似的組織中，「西非青年聯盟」在各方面所提出的要求是當時最為激進的。華勒士·詹生合作的對象包括他的共產黨同志，「亞香緹自由社」(Ashanti Freedom Society)的創始人阿烏納雷那(Bankole Awooner-Renner)，還有泛非洲民族主義者，如阿茲基韋。阿茲基韋從奈及利亞到美國就讀於霍華德大學，在大學時碰到潘得墨，也和《新黑人》(*The New Negro*, 1925)的作者羅克(Alain Locke)一起研讀。後來阿茲基韋在1934年轉往倫敦，出版了《世界大事中的賴比瑞亞》(*Liberia in World Affairs*)。同一年，他又前往黃金海岸，變成極具影響力的報紙《非洲晨報》(*African Morning Post*)的編輯。他向潘得墨拉稿；後來在1937年時，他自己和潘得墨一起在倫敦建立了「非洲事務局」(African Service Bureau)，當作是反殖民組織的一個中心(由「反帝國主義聯盟」協助)。阿茲基韋在1937年回到奈及利亞，加入「奈及利亞青年運動」的執行工作，並且編輯《西非領航》(*West African Pilot*)。身為「奈及利亞國民會議」的主席，他強力鼓吹需要聯邦憲法促成奈及利亞獨立；1963年，他成了奈及利亞的總統(Azikiwe 1968, 1970)。而華勒士·詹生在黃金海岸以煽動罪名被捕，在1938年回到獅子山組織「西非青年聯盟」的分部，並開始辦報紙《前哨》(*The Sentinel*) (Boahen 1985: 764, 629)。受到1945年「泛非洲代表大會」的刺激，他和恩克魯瑪一起在倫敦成立了「西非民族會議秘書處」(West African National Secretariat)，其主要目的就是將新的泛非洲民族主義在西非付諸實現。到1946年，他們出版了一份激進的月報《新非洲人》(*The New African*)。正如威爾森所說，透過這些行動派，非洲民族主義的團體才得以發展黨派組織、貿易工會、婦女和青年組織，同時也創立報紙和其他各種政治機制的形式，為許多1945年以後的獨立運動建立了基層的組織(Wilson 1980)。雖然以政治、法律或社會改革的角度來看，非洲青年運動並沒有什麼成果，甚至一些保守的立憲政治黨派，如麥坎雷的「奈及利亞國家民主黨」(Nigeria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看似成果乏善可陳，但是它們的確建立了一種政治文化，為1945年之後的民族主義運動提供了豐富而有效的資源。就革命的成功與否，蘇聯顯然是沒有達成目標，但是它提供非洲行動派一些黨派組織技巧，而且因為蘇聯的物質和道德的協助，所以培養出一種民族主義的情感。這些效應沒有在大戰之間的時候顯現出來，而是顯現在1945年之後，迅速而有效地扣連民族主義對自決的要求。

如果沒有前面這20多年花費長時間建立這些基層組織的工作，恩克魯瑪就不可能在1948年和1950年能夠動員貿易工會和相關的組織，發動工人罷工，並建立一個新的激進政黨。恩克魯瑪的成功也是因為他自己體認到政治組織的重要性，他的這個見解是受到列寧著作的啟發。在美國時，恩克魯瑪遇到當時美國托洛斯基主義者之中最傑出的詹姆士，恩克魯瑪回憶：「就是透過他，我才學到地下組織運動

如何運作」。他同時也和非美組織的領袖們接觸，主要是基於政治原因，而因為思想：「我的目的是學習組織的技巧。我知道，當我有一天回到黃金海岸的時候，我會碰到同樣的問題。我知道，無論殖民問題的解決方法是什麼，成功與否就在它所採行的組織」。恩克魯瑪在這段時期所寫的，充滿強烈的列寧主義反殖民的小書冊《邁向殖民的自由》(*Towards Colonial Freedom*, 1942-1945)，他在最後一節「必要之事」中問道，殖民地要如何達到自由與獨立，他回答：「最重要的是，殖民地群眾的組織」(Nkrumah 1973: 39)。在倫敦的兩年中，恩克魯瑪活躍在政治組織中，他積極參與建立的組織包括1945年的「泛非洲代表大會」、「西非學生聯會」(West African Students Union)、「西非國家秘書處」，還有一個名為「圓圈」(The Circle)的革命先鋒團體。另一方面，他建立了「有色人種工人協會」(Coloured Workers' Association)，這是一個為貧窮的非洲海員和英國的工人謀福利的組織。回到加納之後，恩克魯瑪依據他在英美已經完全嫺熟的共產國際組織技巧行事(Bretton 1967: 10; Thoompson 1969: 89-95)。身為新的「黃金海岸統一大會黨」(United Gold Coast Convention)的秘書長，他很快地對同事們強調創辦一份報紙的重要性，把它當成黨的機關報。他買下一台古柏牌(Cropper)印刷機，1948年9月開始出版《阿克拉晚報》(*Accra Evening News*)。他寫道：「從一開始，《阿克拉晚報》就成了運動的先鋒，同時也扮演宣傳者、煽動者、動員者和政治教育者等角色。每一天，報紙的一頁頁都在提醒人們，為自由而鬥爭，為打倒腐敗的殖民系統和可怕的帝國主義而鬥爭」。第二年，在黃金海岸的其他城市，《電訊早報》(*Morning Telegraph*)和《每日郵報》(*Daily Mail*)開始出刊。同時，恩克魯瑪也創辦一個青年讀書會，後來發展成全國性的「青年組織委員會」(Committee on Youth Organization)，透過這個委員會，他終於得以控制比較保守的「黃金海岸統一大會黨」，然後把它變成一個屬於民眾的政黨——「大會人民黨」(Convention People's Party)。恩克魯瑪在1957年獨立成功之後回顧這一段時，他很敏銳地評論道：「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設立政治組織來反對殖民主義的人，很快地成功了」(Nkrumah 1957: 76, 39)。但是，成功也帶來一些問題：恩克魯瑪的政治組織有效而且周密，因此在獨立之後，組織所反對的殖民勢力撤退，國家反而變成一個越來越獨裁的個人政治機器。

另一方面，恩克魯瑪在政治上的成功也是因為他和本土團體結盟，這些團體反對的不只是殖民勢力，同時那些反對被殖民者操控，成為殖民者工具的傳統菁英分子。在地方政治環境的架構中，由共產黨行動派鼓吹的激進主義成為非洲其他地方的典型。青年組織雖然在現代人聽起來稀鬆平常，但是其實這是從馬志尼在1831年創立，而後在世界各地廣被模仿的「青年義大利」(Young Italy)運動，從那時候，青年組織成了民族主義運動的基礎(Borsa and Brocchieri 1984; Gandhi 1997: 5,

27-28; Mack Smith 1994; Srivastava 1982)。在南薩哈拉沙漠地區，這些青年團體包括「黃金海岸青年會議運動與青年聯盟」(Gold Coast Youth Conference Movement and Youth League)、「奈及利亞青年運動」(Nigeria Youth Movement)，獅子山的「西非青年聯盟」(West African Youth League)、「基庫尤青年協會」(Young Kikuyu)、以及「青年加彭」(Jeune Gabonais)。尤其在西非，靠一份鏗鏘有力的報紙和印刷文化所帶來的民族主義的情感畢竟有限，還有賴海外一些比較激進的反殖民報紙和期刊偷偷帶進殖民地，才能強化這股民族主義的情感(Boahen 1985: 575; Füredi 1994: 32-3)。這樣的文化是一群識字、受教育的人——通常是菁英的專業階級——的產物。這個階層同時也是「共產國際」行動的主要目標，想要藉此改變這樣的認定：透過憲法改變的方式就是朝向一個更激進的革命態度。在其他地方，各種形式的地方性抗爭躲避所有「共產國際」的滲透，教殖民當局更覺棘手。這些地方性的抗爭包括農民運動，尤其是根據本土的宗教、基督教、或者伊斯蘭教而發展的解放的「彌賽亞運動」，例如：在南非和東非的「衣索比亞主義」<sup>譯註4</sup>、或是西非、馬格里布和蘇丹的「馬赫迪主義」<sup>譯註5</sup>或泛伊斯蘭主義。在中非洲相信千禧年說的獨立教會宣揚殖民主義的崩解近在眉睫，因為非裔美人的解放力量可以真正解放非洲，如或不然，因為世界末日來臨，殖民主義也將終結〔如：基塔瓦拉(Kitawala)運動、基班古(Kimganguist)運動、卡其(Khakists)運動〕。另外還有一些獨立的教會，包括烏干達的「非洲正教教會」(African Orthodox Church)、尼亞薩蘭的「最後的上帝與耶穌教會」(Last Church of God and his Christ)。在東非，這種宗教反對運動部分造成基斯瓦希里語(Kiswahili)所謂的*siasa*——動亂、行動主義、抵抗——這些往往都是地方層次的群眾運動。菁英派的商業和青年組織具有不同的特色，它們清楚地表達不滿，如「吉力馬札羅本地種植者(咖啡)協會」[Kilimanjaro Native Planter (Coffee) Association]、「青年班干達協會」(Young Banganda Association)、「坦干伊喀非洲協會」(Tanganyika African Association)、杜庫(Harry Thuku)的「東非協會」(East African Association)，或者「基庫尤中央協會」(Kikuyu Central Association)——肯亞塔在1927年成為該協會的領袖。和其他殖民地一樣，反殖民主義有兩個非常不同的立場；一方面是世俗主義的，傾向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立場，而另一方面是傳統主義的宗教愛國主義立場，或者當地組織對某些特殊議題發動大規模抗爭(Boahen 1985)。這兩種反殖民主義的形式或者同時存在，例如阿爾及利亞或埃及，或者在無法控制的情況下困難地結合運作，例如1950年代的「茅茅起義」——這是一個自發性的本土抗爭，殖民當局認定肯

<sup>譯註4</sup> Ethiopianism：非洲到了1890年代出現本土教會運動，黑人希望將信仰非洲化，本地化，因此出現衣索比亞教會，並找到聖經中所提的古實就是衣索比亞。

<sup>譯註5</sup> 馬赫迪主義(Mahdism)相信回教救世主馬赫迪(Mahdi)的誕生及降臨。

亞塔必需負責，我們在本書第25章將會以另一個鬥爭形式的觀點來詳細討論它。這兩種形式之間的緊張關係為某些後殖民國家帶來後續的困擾。

#### 四、南非

南非的情況迥異於非洲其他地方：特別是它的採礦工業代表南非已經部分工業化了，另外還有相當大群的資產階級。事實上，南非許多本土的抗爭形式和非洲其他地方雷同：地方性的農民革命、重要的非洲基督教獨立教會、各種不同形式的立憲派政治組織，再加上「非洲民族會議」——全非洲以各種不同的「本土協會」的形式仿效它，還有部分是因為勞動移民。無論如何，相對而言，戰鬥路線的工人階級運動在南非比較前進，1918到1920年之間，在特蘭斯瓦爾(Transvaal)和約翰尼斯堡發生大規模的罷工和杯葛。因為這個原因，「共產國際」一直把南非當成是非洲最具革命希望的政治領域。1921年，「南非共產黨」(SACP)由許多白人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團體組成，特別是邦亭(S.P. Bunting)領導的「國際社會主義聯盟」(International Socialist League, ISL)成立後，「南非共產黨」歸屬於「共產國際」。這是非洲第一個共產黨，而後來它的發展受到兩個因素掌控。第一，就像在美國一樣，「南非共產黨」主要是白人的組織，它體認到必需和黑人團體「非洲民族會議」合作，因為它是1912年就建立的南非第一個黑人民族主義政治組織；1917年，「國際主義社會聯盟」幫助「非洲工商勞工聯盟」(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Workers' Union of Africa, ICU)成立，後來這個聯盟由來自尼亞薩蘭的卡代里(Clements Kadalie)領導，變成非洲黑人與有色人種最大的工業勞工運動。「南非共產黨」後來的合作對象包括「非洲工商勞工聯盟」、「非洲民族會議」，以及在不同組織中同時擔任不同職位的許多傑出的人物，如查皮安(George Champion)、凱爾(E.H.Khaile)以及顧馬。雖然古米德本身不是共產黨員，但是他被選為「非洲民族會議」的總主席之後就積極加強與共產黨的聯合，因為「在所有南非的政黨中，只有共產黨毫無保留地鼓吹南非的非歐洲人和其他種族的自由和平等」(Meli 1988: 77-78)。雖然「非洲民族會議」和共產黨因此而合作，但這也成了「非洲民族會議」和「非洲工商勞工聯盟」之間摩擦的根源。1926年，「非洲工商勞工聯盟」整肅領導階層的共產黨。從1928年之後，「南非共產黨」經常肅反，因為它必需根據「共產國際」政策的改變和多變的政治結盟策略而調整定位。就地方的角度而言，最慘的政策改變就是要建立一個個別的本土共和國的提議，這簡直就是要求「美國共產黨」支持在美國設置一個特別的「黑人地帶」州的翻版。這個事件使「南非共產黨」被列到南非極右派的陣營，即使那是在1939年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之前。就像在美國的問題一樣，這段時期「南非共產黨」被「共產國



際」嚴密控制，一直無法有自己的政策來回應地方或是國家的情況。同時，不像阿爾及利亞之類的其他拓居殖民地的共產黨，它們一直根據歐洲殖民者的種族偏見來運作，「南非共產黨」自詡是唯一由沒有種族偏見的白人所主導的政黨，積極鼓勵非洲人參與，並且盡全力致力於為絕大多數人民爭取社會和政治上的公正。但隨著「種族隔離政策」(apartheid) 成為正式的政府政策，加上南非的情勢日益惡化，「南非共產黨」和「非洲民族會議」之間有一段長時間的結盟。因此，當一個共產黨員真的就成為南非白人唯一可以證明自己真正反對種族隔離的方法 (Boahen 1985; Davenport 1991; Fredrickson 1996; Roux 1948; Wilson 1974, 1980)。而「非洲民族會議」的領導階層踏著非洲政治行動派的老路，走向監獄或是放逐到倫敦。

除了「南非共產黨」之外，一群大部分由心懷不滿的共產黨革命知識分子發展托洛斯基主義的派別。以依地語 (Yiddish-speaking) 為語言成立的組織——「農工社」<sup>譯註6</sup>——是偏蘇聯的團體，而許多托洛斯基主義團體成員都是逃離納粹的猶太移民。這一段引人的歷史在賀森 (Hirson) 的書中有扼要的記載 (1993)：主要是從1930年代以後，南非左派反對團體典型的現象就是組織之間互鬥，其中較著名的包括「南非共產聯盟」(Communist League of South Africa) (比較廣為人知的名稱是「列寧社」Lenin Club)、「南非工人黨」(Workers Party of South Africa, WPSA) (比較聞名的名稱是「斯巴達克斯社」Spartacus Club)、「南非第四國際組織」(Four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outh Africa)、「工人國際聯盟」(Workers International League)，加上它們各式各樣的政治行動主義 (從1934年在約翰尼斯堡的「非洲洗衣工人罷工」(African Laundry Worker's Strike) 作為開始)，以及它們的出版品 (最著名的是激進的理論期刊，由B先生——「南非工人黨」領袖，波蘭人波拉可 (Yudel Burlak) ——所編輯的《一觸即發》(The Spark, 1935-9)，以及《工人的聲音，社會主義的行動和火焰》[Workers Voice, Socialist Action and Umlilo Mollo (The Flame)]。從非洲社會主義的角度來看，最重要的發展就是由「南非工人黨」的成員在1935年成立了「全非洲人大會」(All African Convention)，做為反對何索 (Hertzog) 將軍提議「原住民法案」的運動中心，因為何索提出兩個法案，用以剝奪南非黑人的土地和投票權。「全非洲人大會」由塔巴塔 (Isaac Bongani Tabata) 以及古蘭 (Goolam)、古爾 (Jaineb Gool)、凱斯 (Ben Kies) 等人領導，後來和「有色人種南非工人黨」(Coloured WPSA) 組織的「反有色事務部」(Anti-Coloured Affairs Department, 或稱CAD) 合併成「非歐洲人統一運動」(Non-European Unity Movement, NEUM)。後來該組織從1943年一直維持到1970年代。在所有有關托洛斯基主義的團體中，這個「統一運動」最具有意義，主要是因

<sup>譯註6</sup> Gezerd：就是 Gezelshaft far Erdarbet，意為「農工社」(Society for Agricultural Labour)。

為它是唯一能夠同時得到非洲人和有色人種支持的團體。即使它的名字是統一，但是這個組織越來越反對「南非共產黨」和「非洲民族會議」之間的結盟，因為它從來就無法和「南非共產黨」所能提供的物質以及政治支援相抗衡 (Tabata 1974)。後來其他的左派政治反對團體，如畢克的「黑人意識運動」，全部被種族隔離的南非政府極有效地壓制。到最後，是「南非共產黨」和「非洲民族會議」成功了，特別是「非洲民族會議」以經濟和文化制裁的方式，得到全球的國際協助。叫人驚訝的是，雖然曼德拉 (Mandela) 拒絕放棄武裝鬥爭，他的政治策略還是比較接近幾乎是一個世紀之前的甘地。在這方面，扮演非常重要的南非婦女運動對曼德拉有所助益，這一點我們將在25章再做討論。

## 五、潘得墨和詹姆士

激進戰鬥路線的共產黨反殖民組織大半的工作在1933年之後漸趨緩慢，這樣的情形不只發生在南非。有鑑於德國法西斯主義崛起，「共產國際」的目標轉變成「人民陣線」的策略，其中之一就是停止針對英法兩國的反帝國宣傳。詹姆士曾詳述潘得墨如何被通知要在《黑人勞工》中宣傳非洲人的主義敵人是法西斯主義者——即使在那時候，德國在非洲並沒有任何殖民地，並要求他們開始宣傳英法兩國是民主之友 (James 1992: 291-300)。雖然「人民陣線」在歐洲而言屬正面的行動，而且對於英法兩國殖民地的反殖民行動派，如華勒士·詹生，支持行動仍舊默默地持續著，但是莫斯科比較大眾化的「黑人勞工國際貿易聯盟委員會」被解散，對《黑人勞工》的支持也撤銷了。潘得墨公開譴責這個行動，後被撤除黨籍 (Hooker 1967: 31-2)。他離開莫斯科後，先到巴黎，然後到倫敦；在倫敦，他遭受「英國共產黨」的人格謀殺 (character assassination)。潘得墨後來說，這種人格謀殺「一直是共產黨所運用的最致命的武器之一」(Padmore 1956: 313)。他和共產黨決裂凸顯非洲和加勒比海共產黨的一個特色，也是三大洲共產黨的各種形式都具有的一個特色，那就是在遵循信條方面缺乏彈性，這正是西方共產黨非常顯著的一個特點。共產主義思想應自由開放地配合各地和各國不同的考量，其應用方式不是抽象、不可改變的。更重要的是，主導反殖民思想中以自我依賴為主的民族主義吸收共產思想時，應加以調整變化。潘得墨在某一次的聲明中說：「時機到了！黑人該停止依賴別人為你們打仗了」，這段話隱含他已經不再對「共產黨」在非洲世界抱持什麼希望 (Wilson 1980: 87)。潘得墨雖然和「共產黨」決裂，他還是和以前的左派同志並肩工作，仍然仰慕蘇聯的政治典範。例如，在1946年，他和卜乃哲 (Dorothy Prizer) 出版《俄國如何改變殖民帝國：對帝國勢力的一個挑戰》(How Russia Transformed Her Colonial Empire: A Challenge to the Imperialist Powers)，書中兩人

大膽向英國的兩個政黨進言，要它們效法列寧挑戰沙皇的帝國，放棄殖民地 (Padmore and Pizer 1946)。潘得墨對列寧的景仰未曾消失，但是他對史達林的幻滅使他和共產黨漸行漸遠，但是他不像詹姆士慢慢轉向托洛斯基主義，反而擁抱泛非洲主義的社會主義理想，堅定地走向一個不是源自兩大世界強國的政治哲學。在許多方面，潘得墨從共產主義走向泛非洲的社會主義，這也象徵左派反殖民主義從 1920 年代到 1960 年代的改變。

當蘇聯提供石油幫助義大利的墨索里尼 (Mussolini) 侵略阿比西尼亞 (Abyssinia) 的事情被揭發後，潘得墨對蘇聯所作所為的批評更顯公允。因為這個原因，大家對「反帝國主義聯盟」的支持驟降。從 1935 年以來的衣索比亞危機期間，當時在倫敦的潘得墨和其他行動派成立「阿比西尼亞國際非洲之友」(International African Friends of Abyssinia, IAFA)。該組織除了潘得墨之外，執行委員會包括加維的第一任妻子艾美 (Amy Ahswood Garvey) (財務)、「東非協會」秘書長和「肯亞基庫尤中央協會」(在 1939 年被禁) (秘書) 的肯亞塔，由千里達的詹姆士擔任主席。

「阿比西尼亞國際非洲之友」和加勒比海的其他支持團體建立國際連結；在美國，他們則和哈林區的「衣索比亞防衛臨時委員會」(Provisional 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Ethiopia, PCDE) 接觸 (Kelley 1994: 129-132)。正如歷史學家所分析的，侵略阿比西尼亞使漂泊離散的黑人第一次共同有全面性的反應；新的反殖民族主義團體的形成，如「衣索比亞世界聯盟」(Ethiopian World Federation) 代表抗爭中心網路的成長，把「中心對邊緣」的關係改變成一個帝國勢力逐漸陷入其中的蜘蛛網絡 (Mazrui and Tidy 1984: 9; Von Eschen 1997: 11)。隨著現代通訊系統的方便，以及莫斯科、開羅和其他地方的異議電台的出現，某一殖民地起義的消息，得以驚人的速度傳播到世界各地其他反殖民行動派的耳中，而這也促成最早以一致的形式回應反殖民事件。正如傅瑞迪所說：

因為對義大利侵略衣索比亞事件，離散各地的黑人有共同的回應，從這一點立即可看出他們對帝國主義宰制的憤恨有多麼深刻，對自由有多麼渴望。衣索比亞把殖民地脫離西方控制而獨立變成一個象徵：離散的黑人對侵略的共同反應顯示一種深刻的感情，是一種大家不曾察覺到的情感。在整個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這次的侵略變成一個轟動的事件 (cause célèbre)。這些離散的黑人所做的共同回應之所以獨特，在於它是普遍的共鳴。這可能是第一次，第三世界共同回應西方干預的例子。(Füredi 1994: 23)

墨索里尼的行動，特別是英國的回應，變成倫敦、紐約和非洲的迫切議題。正

如傅瑞迪所說的，加勒比海因為這個事件，政治意識開始滋長，而且對當地農耕系統開始不滿，並且由此扣連整個帝國系統的操作。此點可由下列事實得到證明：在英屬圭亞那和千里達，侵略阿比西尼亞事件在東印度所造成的影響，和對非洲加勒比海社群的影響同樣激烈。賽拉西 (Haile Selassie) 就像聖經中大衛 (David) 般對抗如巨人般的葛利亞 (Goliath)。衣索比亞本身是一個帝國勢力的事實從來就不是一個議題；就像日本一樣，無論衣索比亞做什麼或曾經做過什麼，它不可能有錯。事實上，就像日本一樣，衣索比亞變成帝國可說是為了不讓自己被歐洲帝國勢力侵占。後殖民時代政治的複雜性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在衣索比亞獨立之後，其他地區的自由鬥爭紛起，例如在厄利垂亞，在提格雷 (Tigray) (Peberdy 1985; Fessehazion 1999)。

阿比西尼亞被侵略的事件鼓舞泛非洲的抗爭走向更廣大的架構，這一點可由這個事實證明：1937 年「阿比西尼亞國際非洲之友」的委員會成員籌組「國際非洲事務局」(International African Service Bureau, IASB)，做為非洲解放鬥爭的中心，該事務局的主要負責人員有華勒士·詹生 (秘書長)、詹姆士 (編務執行長)、肯亞塔 (副秘書長)，來自英屬圭亞那後來成為在英國的「泛非洲聯盟」的秘書長馬康南 (T.R. Makonnen) (財務)、潘得墨本人擔任主席 (Padmore 1956: 145-146)。「國際非洲事務局」是一個左翼組織，目標是發展獨立的非洲身分認同；該組織與杜博斯的「泛非洲代表大會」結盟，最後結合成「泛非洲聯盟」(Pan-African Federation)，或者說是「泛非洲代表大會」運動的英國分部。「泛非洲聯盟」由十多個在英國和愛爾蘭各地的非洲組織所組成，這些地方包括卡地夫 (Cardiff)、都柏林、愛丁堡、格拉斯哥 (Glasgow)、倫敦和曼徹斯特；加入這個聯盟的組織數量不少，證明這段時間非洲政治的行動主義在英國廣泛散布。該聯盟也出版刊物《國際非洲觀點》(International African Opinion)，以及許多談論特定殖民問題的單獨宣傳冊。聯盟的某些領袖在這段時期也出版一些重要的作品，最有名的就是詹姆士的《黑色耶可賓黨人》(1938) 和《黑人反抗史》(History of Negro Revolt, 1938)，肯亞塔的《面向肯亞山》(Facing Mount Kenya, 1938)，潘得墨的《英國如何統治非洲》(How Britain Rules Africa, 1936)，和《非洲與世界和平》(Africa and World Peace, 1937)。正如這些書裡激進的政治藍圖所顯示的，「泛非洲聯盟」和「泛非洲代表大會」事實上訴求相同：非洲民族和其他「從屬的種族」要爭取自決權和獨立，非洲人民要有平等的公民權，並且廢除所有形式的種族歧視。這些要求必須加以訂定，以便讓非洲人，以及世界各地的非裔都能夠加以運用。

1956 年潘得墨說：「杜博斯的『泛非洲代表大會』和『國際非洲事務局』的聯合，絕對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幾年對非洲所造成最大影響」，此言不虛 (Padmore 1956: 148)。這多半應歸功於潘得墨本人，他是「泛非洲代表大會」背後的驅力，

同時也是推動非洲去殖民化和非洲社會主義的建造者之一。潘得墨將杜博斯比較學術的中產階級運動轉變成一個解放非洲的實踐組織。恩克魯瑪、潘得墨和詹姆士將泛非洲主義改變成一個完全是社會主義的理想，激勵杜博斯在晚年走向左派。正如前面所說，潘得墨本身越來越走向社會主義的泛非洲主義，他把這樣的方針定義為一種自主的非洲政治哲學，而不是取自東方或西方，這樣的非洲政治哲學反對西方的經濟宰制和白人的殖民。在本質上，詹姆士一直是一個加勒比海傳統的革命分子，而潘得墨的立場傾向結合社會主義思想，強調非洲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在政治上依循甘地模式的行動主義。潘得墨和詹姆士兩人是國際主義行動派的一對搭檔，他們倆在許多方面就像立歐玻·桑戈爾和法農：對每一件事情，兩人知識和政治立場相同，但是卻各自發展，一個是改革主義者，一個奔向革命之翼。桑戈爾和法農兩人分別主張以立憲與革命爭取獨立進行鬥爭，兩種路線的政治差異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對象（西非和阿爾及利亞）各有特殊的背景脈絡。潘得墨和詹姆士都是來自千里達，但是兩人也有區域性的差異。潘得墨從莫斯科到倫敦定居之後，他的興趣轉向非洲和泛非洲社會主義，但是詹姆士將焦點轉向非洲的過程是緩慢漸進的，後來他回到加勒比海。隨著恩克魯瑪垮台之後，非洲社會主義的問題越來越多，詹姆士認為1959年「古巴革命」是加勒比海革命傳統的高峰，而這段歷史是他一生中一直努力要留存並且執筆記載的。

## 18.

## 非洲（二）： 恩克魯瑪和泛非洲主義

在非洲，泛非洲主義的概念早在1860年代由索賈（Tiyó Soga）首次表述，後來隨著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哈林文藝復興」（Harlem Renaissance），以及「黑人精神運動」，漸漸發展成文化和政治思想。到了1940年代，泛非洲主義已經廣義地涵蓋工業化社會主義經濟政策，以及獨立的非洲各國在農業生產方面各種形式的合作（Esedebe 1994; Soga 1983）。在這一章中，我們的焦點不在討論二次世界大戰前，泛非洲主義如何逐漸成為殖民改革的政治舞台；我們的重點放在泛非洲主義中的自決和社會主義的概念，也就是恩克魯瑪——在1945年後要求去殖民化的領導者——所引導的主要思想。 236

在英語世界中，杜博斯和潘得墨兩人所定義的泛非洲主義觀點類似。但令人驚訝的是，這兩個人都不是在非洲出生的，「非洲一體的觀念將這片黑暗大陸上所有本土非洲人的想法和理想結和起來」，杜博斯還觀察到：「……這個觀念自然是源自西印度和美國」（Kedourie 1971: 372）。在思想上，這兩個人各自依循不同的方向，但卻在中間相遇。杜博斯最先是保守的古典學教授，由於關心種族歧視的議題逐漸走向人文的社會主義和泛非洲主義，認為這樣才能為問題提供一個更寬廣的解決方式；1945年之後，他越來越偏向俄國模式的共產主義。相較之下，潘得墨的泛非洲主義的發展脈絡是因為他對共產主義的幻滅，他逐漸相信非洲社會主義必需是非洲和社會主義並重。在1930年的第一次「國際黑人勞工大會」中，潘得墨一直提醒大家提防泛非洲主義，並且譴責卡里代及其在南非的同夥，指加維是「不誠實的煽動者」，甘地是印度資產階級利益的代理者，杜博斯是「美國黑人的小資產階級改革者……只求自己職位而被領導階級收買的煽動者，矇混一般黑人民眾，為的是把他們的注意從革命鬥爭中轉移開來」（Padmore 1931: 124-126）。但是，到了1934年他和史達林決裂之後，潘得墨寫信給杜博斯，邀請他參加即將由巴黎的法裔非洲人在巴黎舉辦，由他的朋友加藍·庫雅特所主導的「黑人世界大同」（Negro World Unity）會議。潘得墨寫道：「你願不願意幫我們為非洲、美國、西印度以及其他地方的黑人建立一個大同世界的基礎？」（Hooker 1967: 40）潘得墨從莫斯科到巴黎和加藍·庫雅特等人接觸以後，迅速地轉向1930年代盛行的「黑人精神運 237

動」中泛非洲主義的概念，因此他在1935年定居倫敦時，已經堅定地認為必需以非洲的獨立做為達到進一步目標——非洲世界大同——的手段。就實際的操作以及概念來看，這個運動中的國際主義很明顯。潘得墨以國際主義和共產主義並行並重，主要是根據兩個觀點：一是泛非洲主義思想中的跨國特色，這就像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是在它最早成為政治哲學的國家以外的地區，另一則是著眼於其政治組織 (Padmore 1956: 319)；很清楚地，「共產國際」提供了一個基礎結構，促成國際主義早期的發展，之後又提供了一個可供參考的模式。反殖民知識分子行動派——拉明·桑戈爾、加藍·庫雅特、潘得墨——和共產黨決裂，其缺點就是將這些人隔離共產黨組織的政治機器之外。他們只好照自己的觀點重起爐灶。

阿皮耶總結現在對於泛非洲主義的觀點，認為泛非洲主義的規劃忘記「非洲」是歐洲的發明，而且非洲各地文化的差異並不亞於非洲和其他大陸之間的差異。泛非洲主義訴諸「黑人精神」這代表它偏向本質主義，令人非議 (Appiah 1992)。在泛非洲主義所擘畫的理想中，跨洲際的偉大和光輝喪失了。做為一個反對歐洲白人壓迫（無論是反殖民或在美國國內）的共同策略，非洲和美洲的泛非洲主義要藉著結合國際之間的團結和共同的政治規劃，要求代表權、土地權、教育、經濟重建，以及終結種族主義和制度化的種族歧視，進而為非洲人和非洲裔美人帶來特別的力量。而且，泛非洲主義的發展是獨立規劃，不是受惠於世界上的列強或其思想。

正如湯卜生 (V. B. Thompson) 所指出的，在20世紀前半葉，無論大西洋兩岸的非洲後裔的政治導向多麼不同，所有這些不同組織和人物的行動顯然都朝向同一個觀念：(1) 加維的「非洲人的非洲」群眾運動；(2) 杜博斯比較溫和的中產階級「泛非洲代表大會」運動；(3) 共產黨主導的「西非學生聯盟」和潘得墨在倫敦的「國際非洲事務局」的知識和政治活動；(4) 「英屬西非國民大會」及其相關組織的活動，以及南非「非洲民族會議」的活動；(5) 身在巴黎和法語系非洲的行動派，其中最著名的是立歐玻·桑戈爾 (Thompson 1969: 54)。到了1945年，「泛非洲代表大會」的擘劃和獨特的政治結合充分反映出上述這些潮流的混合。

### 一、1945年曼徹斯特「泛非洲代表大會」

238 1945年的曼徹斯特「泛非洲代表大會」有賴非洲和加勒比海的知識分子做準備工作，尤其是兩位組織委員會的聯合秘書：恩克魯瑪和潘得墨。這兩位非常有組織能力，而他們所安排活動熱烈，使這個開創性的會議有了具體的成果。當時潘得墨本人已經出版兩本書，可算是第一波的反殖民批判，批評英國在非洲的統治 (Padmore 1936, 1937)。在大會的要求下，潘得墨又寫了一本書，針對英屬非洲的殖民狀況做進一步的分析〔《非洲：英國的第三帝國》(Africa: Britain's Third

Empire, 1949)〕，這本書特別著重戰後「勞工黨」政府的政策，也就是潘得墨所形容的新「經濟帝國主義」〔殖民帝國的官方說法是「殖民發展和福祉」(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Welfare)〕。

1900年的第一次「泛非洲代表大會」為非洲人和非裔人民要求平等的權利；1919年在凡爾賽的「泛非洲代表大會」也要求教育權，以及國家公平對待和政治參與。1945年的「泛非洲代表大會」則非常不同，因為它舉行的時間剛好碰上1945年共產黨主導的「世界貿易聯盟會議」(World Trade Union Conference)，因此參與的非洲代表比以往多得多，而且整個會議也不再由美國的知識分子和改革者所主導。來自西非和非洲的代表都是參與貿易聯合運動的學生工人，因此他們都是左派的政治活躍分子，積極參與自由的鬥爭。1945年的「泛非洲代表大會」在政治意涵上，比之前的幾次濃厚許多。在這次會議上，第一次明白地以非洲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角度，清楚陳述非洲獨立與自決的要求，並且詳加闡述。正如恩克魯瑪所說的：

就是「第五次泛非洲代表大會」為非洲民族主義提供了一個出口，帶來非洲政治意識的覺醒。事實上，這次的會議是一個屬於非洲人的非洲群眾運動。(Nkrumah 1957: 44)

就在1945年的「泛非洲代表大會」中，泛非洲主義不但正式被認同為泛非洲主義的理想，同時也是非洲社會主義的政治。這時候，美國的泛非洲主義已經完全的非洲化了。

正如泛非洲主義的主導意識形態從種族主義修正為非洲社會主義，泛非洲運動的政治策略也重新訂定。到那時候為止有兩種策略，一是「非洲民族會議」和「西非會議」所鼓動的以憲法改革對帝國施壓的路線；一是1920年代和1930年代激進行動派所鼓吹的革命列寧主義原則。而1945年的「泛非洲代表大會」宣布他們要採取的是非暴力的正面行動，以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做為基礎。這個由甘地引介，最先在南非，後來在印度由「印度國大黨」實踐的「真理力量」，在「第五次泛非洲代表大會」中被討論，並且同意將它列為唯一可行的有效方式，可以讓外來的統治者尊重沒有武器的從屬人民的意願。在1945年，當時甘地對抗英國的這個策略頗具威名，而且顯然被認為是有效的，所以大家將它視為是印度未來達成獨立的主要手段，足以讓印度成為大英帝國第一個回歸自治的非拓居殖民地。恩克魯瑪這樣說道：

會議一致同意非洲社會主義的原則要以非暴力的正面行動策略做為基礎。會議也同意「人權宣言」中所闡述的原則，勸告非洲和非裔人民，無論他

們在什麼地方，他們可以組織政黨、貿易聯盟、合作社和農民合作；這些組織將支持他們爭取政治自由和經濟進步。（Nkrumah 1957: 43-44）

此次會議的〈告殖民地工人、農人和知識分子宣言〉有這樣指示：「你們的武器——罷工和杯葛——是所向無敵的」。它肯定使用非暴力的方式是泛非洲主義和非洲社會的組織所抱持的中心原則，同時也認定非暴力代表是它所代表的人類價值的核心。但是甘地的政治影響力大致上侷限在它的戰術和政治策略：泛非洲主義的思想是由黑人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和共產主義反殖民行動發展而來的一種社會主義。

## 二、非洲社會主義

非洲社會主義的建構創造了政治的聯繫，就像桑戈爾、加藍·庫雅特、恩克魯瑪和潘得墨等人一樣，這種聯繫在共產主義的政治活動和干預的邊緣或界線上操作。這樣的彈性又因為「中國共產黨」所採行的、三大洲中第一個另類形式的共產主義——第一個具體在政治層面上抗現代性（counter-modernity）的例子——而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潘得墨把非洲社會主義視為「第三條路」，認為這樣的路可比擬1955年「萬隆會議」所創的「不結盟運動」。

在我們為民族自由、人類尊嚴和社會救贖的鬥爭中，泛非洲主義提供一個在共產主義和部落主義之外的另外一種思想選擇。它拒絕白人的種族主義，同時也拒絕黑人的沙文主義。泛非洲主義代表的是種族共存，這是基於絕對平等和對人類特性的尊重。（Padmore 1956: 379）

240 非洲社會主義原本可為俄國共產主義提供另一種不同的思想選擇，它的發展乃源自對俄國模式的共產主義所抱持的，既熱衷又抗拒的心情，這點在潘得墨和杜博斯的作品中非常清楚。桑戈爾的人文社會主義也可找到同樣的辯證法則，但他更加強調非洲文化豐富的精神層面。非洲社會主義和泛非洲主義的目標相同，它肯定（當時不流行的）新人文主義，加上後來在政治規劃上的失敗，造成非洲社會主義在現今相對不受注意。在辛巴威、安哥拉和莫三比克所應用的共產主義形式，比較嚴格遵循蘇俄或中國的模式，較少依照非洲特殊性加以調整，反而像回顧般突顯出非洲社會主義的見解及其抗現代性作法的正當性。做為一個政治和經濟的規劃，非洲社會主義有一部分是依據尼赫魯的社會主義模式，以及1945至1952年由英國「勞工黨」政府所制訂的福利國家的模式。所有在20世紀中所發展的各種社會主義的形式之中，這些例子因為能夠在民主的架構中持續進行激進的、迎合群眾的規劃而更顯突出。英國建構福利國家之所以能夠有所成就，因為它依然以回應一般民眾

的需求和期望為目標。

泛非洲社會主義從來沒有被嚴謹地定義為一個原則，然後輔以許多不同的重點。泛非洲主義是對反殖民主義和自決的共同承諾，並拒絕以暴力做為獨立的手段，另外，有鑑於歐洲模式的階級鬥爭無法在非洲運作，因而以社會的互助合作為宗旨，致力於經濟中央集權化和國家化的一般政策，並極力強調非洲文化傳統的保存和發揚，甚至進一步發展非洲文化的統一。它的承諾是黑人民族主義而非個別的民族主義，這樣的使命顯示在泛非洲團結的願景中，它的終極目標是建立一個「非洲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Africa）。實際上，在英語系統和法語系統的領土中，拿這個做為憧憬的目標比較容易，然而這兩個語系的各國要建立一個聯合的非洲時就顯得困難重重，主要是因為舊的殖民勢力政治基層結構仍留有勢力，以便和新獨立或半獨立的國家和歐洲維持關係。另外，在英國和法國的殖民統治之下，如法屬西非之類的大片領土已經成為一個整體殖民地，但是隨著去殖民化的原因而四分五裂，變成各自獨立的國家的集合。從殖民的角度看泛非洲主義的策略，比從現代的非洲地圖來看還比較可能實現。恩克魯瑪認為，雖然民族主義是解放鬥爭中的必要步驟，但是這「絕不能被視為解決我們人民在政治和經濟方面被剝削的最後手段」（Nkrumah 1968: 25）。在非洲，民族主義有其侷限，因為它大部分是在地理政治的架構中運作，以歷史任意獨斷（arbitrary）的劃分為基礎，將非洲分成不同的殖民地。去殖民之後的獨立國家，在形式上不是非洲，在經濟上多半也行不通。它們在獨立之後為生存而努力，但新殖民主義的剝削卻透過非洲本地公司 and 多國公司，以及國際商品市場，用泛非洲的規模來控制它們。恩克魯瑪認為，拉丁美洲的政治宰制和經濟剝削永遠提醒非洲人民，民族主義有其侷限。在後殖民的時代，當代非洲文化和政治理論家質疑、挑戰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基礎和功用時，泛非洲主義在去殖民化之前展現的一些另外的選擇，更顯其真知灼見超過大家所認知的。問題是這個沒有受到肯定的泛非洲主義在政治哲學和目標的背後，到底有什麼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理論基礎呢？只有在現在，我們才能將它看成是一個抗現代性的形式，其必要性比當初那些倡議者所能想像的還要迫切的多。

泛非洲主義的理想有時候在實踐時運作的很成功。例如，當法國第五共和總統戴高樂（de Gaulle）在1958年給法屬非洲殖民地最後通牒，要它們選擇仍舊維持是法國體系的一部分，或者選擇獨立而願意面對法國立即全面撤退。幾內亞人民很勇敢地投票選擇獨立，法國的回應就是幾乎在一夕之間撤退，讓幾內亞處於混亂狀態。這時恩克魯瑪立刻伸出援手幫助幾內亞，並且和杜爾組成了「加納—幾內亞聯盟」（杜爾後來變成比恩克魯瑪更加獨裁，但是當恩克魯瑪後來被罷黜的時候，杜爾也有所回報）。就像後來的「加納—幾內亞—馬利聯盟」，或者桑戈爾的「馬利聯邦」（塞內加爾和馬利），或者尼雷爾「東非與中非泛非洲運動」一樣，「加納—幾

內亞聯盟」並沒有維持多久。一旦獨立的目標達成，整個非洲大陸政治聯合的目標——第一代非洲領袖如恩克魯瑪、肯亞塔、尼雷爾、卡翁達和姆博雅（Mboya），以及更早的、漂泊在美國的非洲民族主義者等人所念茲在茲的願景——已經失去了理論依據。取而代之的是較為開放的政治和經濟集團，以及更直接立即的目標，例如解放非洲南部仍被殖民、或被白人拓居者統治的國家。無論是工業化或是天然資源造成的差異，每天的政治、文化、地區和經濟的現實，蓋過離散的非洲人所努力的種族的夢想，因為這些夢想遠離了非洲生活每天所面對的實際面，完全把非裔美人生活中晦暗的真實面抽象化了。個別的國家也因為文化和政治傾向分成不同的集團——例如，激進的「卡薩布蘭加集團」（Casablanca group），較保守的「門羅維亞集團」（Monrovia group），以及先前屬法國領土的「布拉紫維爾集團」（Brazzaville group）。無論如何，泛非洲主義的觀念仍然是一個永遠的可能性，在1963年所成立的「非洲團結組織」（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OAU）的支援下，仍然為所有超越國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非洲制度提供基礎（Amate 1986; El-Ayouty 1994; Naldi 1999）。

非洲社會主義是20世紀非洲政治理論的偉大成就。它是屬於非洲的，但同時也是全球反殖民運動的一部分。潘得墨在1959年生命結束之前在加納寫〈泛非洲社會主義指引〉（‘Guide to Pan-African Socialism’）時，他仍然相信民族解放的鬥爭是「全世界被剝削和被掠奪人民反對現況的鬥爭中的一環」。他附和列寧，主張殖民地的民眾是「被壓迫者中的被壓迫者」（Friedland and Rosberg 1964: 224）。潘得墨一直援引先前列寧在革命後偏向亞洲和非洲的策略性方針，他描述「這樣的策略是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激進偏離」，據此而主張此社會主義必需非洲化：

我們非洲人需要用我們自己批判性的角度檢視馬克思主義，看看其中有什麼可以成功地應用到我們非洲所面臨的普遍狀況，特別是在加納的情況。

（Friedland and Rosberg 1964: 225-7）

242

在此可見潘得墨同意毛澤東的主張，認為許多馬克思主義者的一大錯誤就是將馬克思主義變成一個信條，沒有將它當成一個理解知識的工具，一個未來社會發展的指引。潘得墨所強調的是要如何「發展我們自己的社會主義形式，適合我們自己的情況和歷史背景……。發展社會主義的各種新的技術，應用在我們非洲的環境和歷史背景」。因此，潘得墨對非洲社會主義的定義是：將社會主義調整到非洲的特殊狀況。他從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角度定義非洲社會主義的目的與目標。在政治上，它的目的就是「基本的人權、社會公義和法治」做為基礎的民主。在經濟上，目標是透過共同擁有生產和分配的所有權，提昇人民的福祉，但同時設置混合區以及私有區（地方的和外來的）。在社會方面的目標就是「依據每個公民的能力

取他之才」並且「根據每個公民的需要，予他所需」。潘得墨期望的是開創福利國家，在經濟的基礎上做改變，同時也「在風俗、習慣、人民的制度上有根本的改變，甚至在人民的思考模式方面也要徹底的改變。……這就牽涉到全面的重整，不只是社會基礎的重整，在思想、心態和人民社會習慣方面，都必需重整。」他認為社會主義不只是經濟系統，更重要的是經濟的力量和經濟的問題。就實際的層面而言，潘得墨認為「真正的模式必需建立在非洲的基礎上」：經濟重建的起點必需是土地（Friedland and Rosberg 1964: 229-234）。許多非洲社會主義者的共同規劃就是提昇農業，不但藉此改善農民的情況，同時也可藉著生產過剩來發展工業，由此將貿易經濟轉變成工業經濟。就像許多後獨立國家一樣，為了到達到真正的獨立，社會主義的路就是達到經濟自足的目標，以「經濟獨立」來映照名義上的政治獨立，才能達到真正的獨立。這就是從加納到古巴的後殖民政府在依賴經濟時期一直努力的目標。

### 三、恩克魯瑪

有一個人非洲人，將非洲被殖民的鑄模永遠地粉碎了，他就是恩克魯瑪。

（Sixth Pan African Congress 1976: 220）

潘得墨最著名的稱號是「非洲解放之父」，而他自己形容恩克魯瑪是「泛非洲社會主義的標竿人物」（Sixth Pan African Congress 1976: 222）。潘得墨寫〈泛非洲社會主義指引〉一文的時間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是最樂觀的時候，也就是他的密友恩克魯瑪剛剛成為新獨立的加納總統時。潘得墨的非洲社會主義的基礎都是他和恩克魯瑪一起在倫敦的時候討論發展而來的，他們對非洲社會主義目標的表述也非常類似。他們兩人先前都是共產黨員，因此兩人共同發展政治理念。恩克魯瑪當總統之後，任命潘得墨為非洲事務的私人顧問（Hooker 1967: 132-3）。在潘得墨過世以及失去他的泛非洲大使之後，泛非洲主義的抱負和科學馬列主義思想開始明顯地超過非洲社會主義，成為恩克魯瑪自己心目中立即的優先目標。隨著他的統治越來越獨裁，加納內外對他越來越不信任。1966年他被罷黜之後，非洲就失去了泛非洲主義的建造大師，同時也喪失了獨立時期最具魅力的領袖。

243

恩克魯瑪和潘得墨兩人偏愛超越國界的泛非洲主義，這一點毫無疑問和他們早期共產黨背景的國際主義有關係，而且也和他們注意到新殖民主義的危險有關聯。在1958年4月和12月，加納獨立之後不久，恩克魯瑪在阿克拉（Accra）召開兩次重要的泛非洲代表大會：「獨立非洲國家會議」（Conference of Independent African States）以及「全非人民會議」（All-Africa Peoples Conference）。前者大多由潘得墨

負責籌組，恩克魯瑪在會中為泛非洲主義的願景歸納了四個階段，要共同致力於終結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民族獨立，民族結合，締造跨國的團結和社會，以及經濟和社會的重建」（Nkrumah 1961a: 125-30; Hooker 1967: 135）。兩次會議成功地在非洲各國之間建立政治的橋樑，最後還共同決議支持法農在阿爾及利亞組的「民族解放陣線」，並且譴責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強調「非洲的解放鬥爭是非洲人本身的任務」（Sixth Pan African Congress 1976: 87）。這次會議的高峰就是在1963年成立「非洲團結組織」（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泛非洲主義一直被批評，被排斥，因為它所根據的是一個難以理解的種族化的非洲特性的概念，而不是基於任何政治或實際的需要。但是對恩克魯瑪和潘得墨而言，非洲終究要在政治和經濟上聯合，才能成爲一個整體的、自足的社會主義文化，不再受到西方資本主義持續的經濟宰制。這些大格局的政治抱負變成了恩克魯瑪的禍害。他的一個錯誤就是把政治聯合放在經濟聯合之前（即1961年創立的「卡薩布蘭加集團」所採取的立場，由「非洲國家聯邦」（1960）、加納、幾內亞和馬利，以及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和埃及創立）：如果那時候他能夠傾向比較實際，但社會主義立場沒有那麼鮮明的「門羅維亞集團」，能夠重視它們的提議建立一個「非洲共同市場」（African Common Market）的話，或許後來許多非洲國家的經濟衰退可能就有不同的結果——而且，就像歐洲的情形，政治的結合會伴隨著市場的統一而來。沒有經濟或政治的團結，許多非洲國家處在依賴的地位，它們主要的經濟關係是和歐洲，不是和它們身處同區的其他國家。

244 洪通基（Paulin J. Hountondji）從歷史的角度告訴我們，恩克魯瑪從早期的「非洲主義」時期轉變成後來較傳統的馬列主義。事實上，恩克魯瑪在他最早的美國時期就顯現出馬列主義的傾向：是在潘得墨的影響之下，恩克魯瑪才採取非洲主義的立場。在潘得墨逝世之後，他漸漸轉到一個普世的科學社會主義，正如沙魁巴瀚（Serequeberhan, 1994）所說的，這就是把非洲的特殊性歸列到歐洲現代性的形式中。恩克魯瑪在晚年放逐的寫作中，把特別屬於非洲的非洲社會主義的觀念斥爲「思想混淆不清的一例」，反而宣稱社會主義的原則才是全世界共通的，而且強調現代非洲需要階級鬥爭的原則（Hountondji 1996: 137; Nkrumah 1968: 28-29; 1973: 438-445）。但即使在那時候，他還是承認社會主義可以有不同的路徑，達到社會主義的唯一方式就是「規劃不同的政策以完成普遍的社會主義目標，每一種政策都依據某一特殊國家在特定歷史時期的特定狀況，發展出來的特殊形式」（Nkrumah 1973: 444）。恩克魯瑪對非洲社會主義最早的貢獻不是他根據基本的社會主義而歸納的、一直被拿來實際應用的社會主義信條，反而是他早年爲非洲社會主義的社會所提供的、新的哲學和思想基礎，這些基礎在去殖民後的困難時期讓社會得以鞏固。他強調，「在進行社會主義重建的時候，必需要讓人民對自己地位有新的認

識，他們需要被喚起的是以前讓他們投身政治解放之戰，爲他們帶來獨立的那一股精神」（Friedland and Rosberg 1964: 263; Nkrumah 1961b）。在他非洲主義時期的末期所寫的最有原創性的著作，《內在覺醒：去殖民的哲學和意識形態》（*Consciencism: Philosophy and Ideology for Decolonization*, 1964）中，恩克魯瑪以意識形態的功用，重新評估馬克思主義和西方哲學，並從中發展出一個適合非洲社會的哲學立場：「我們的哲學必需在非洲人民的環境和生活狀況中找到它的武器」。恩克魯瑪強調「要重新找回非洲社會中人文和平等的原則，我們需要社會主義」（Nkrumah 1970: 77-78）。他認爲非洲的社會主義不是革命的，因爲它只是用當代的詞彙重述潛藏的非洲公有主義的基本原則。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恢復非洲傳統社會的和諧，面對隨之而來的伊斯蘭和歐洲基督教的影響。在1964年的第一版，恩克魯瑪相信這個理想可以以和平的方式達成；到了最後一版（1970），他就像法農一樣，不相信非洲可能回到殖民前那種無缺點的公有文化。相反地，非洲需要的是一個新的哲學和意識形態的位置，適合後殖民狀態中彼此敵對的歷史現實：

非洲人因爲面對現代非洲社會的三個派別，內心的危機感將促成這種哲學的誕生。我想將這樣的哲學稱爲「哲學的內在覺醒」（philosophical consciencism），因爲它可以爲新的意識形態奠定基礎，它的目標將涵蓋非洲所經歷的伊斯蘭和歐洲基督教經驗，以及傳統非洲社會的經驗，經過孕育之後，我們運用這些經驗，讓社會和諧地成長與發展。（Nkrumah 1970: 70）

245 因此，內在覺醒代表了一種適合後殖民文化的文化意識形態，一種吸收各種不同、甚至互相抗衡的各類影響而形成的思想。它不是藉著排斥那些仔細檢選出來、被視爲非本土的元素，去走回頭路；相反地，它是要將這一切融成一個新的形式。雖然內在覺醒是以民族的觀點出發，但同時它也把民族放在國際、世界的環境中。對恩克魯瑪而言，最主要的衝突不是文化本身，而是經濟的衝突，因爲他認爲資本主義的西方原則和「非洲傳統社會中的社會主義的平等原則」相互衝突。內在覺醒代表一種以哲學角度塑造潘得墨所描述的，任何社會革命背後所必需具備的意識形態的革命。恩克魯瑪主張，這樣的意識形態革命「必需在非洲人民的環境和生活狀況中找到它的武器。就是在這些狀況中，才能締造我們的哲學」：

內在覺醒就是一張以知識重整各種力量的地圖，它可以幫助非洲社會將非洲境內的西方、伊斯蘭和歐洲基督教等元素消化，以一種適合非洲人性格的方式發展。這樣的非洲性格是由潛藏在傳統非洲社會中，諸多人文主義的原則互相結合而定義的。（Nkrumah 1970: 78-9）

這樣的「非洲性格」就是恩克魯瑪所說的「黑人性格中共同的精神」，強調非洲社會主義的人文基礎；這種性格現在處在一種衝突的情況，因為各種不同的力量相互對立，是「殖民主義所遺留的一個社會的大雜燴」。內在覺醒的目標不是為這些對立的力量找到和諧的解方，而是朝正面、進步的方向發展其中辯證性。恩克魯瑪因此建立一個理論，以處理去殖民之後，殖民者遺留的雜揉、多元文化等無可避免的現象；他的論點也預示許多後殖民理論所關切的重點。他指出社會和哲學的差異往往是為了因應日常生活中困難的張力而被設計出來的；另外，他以「非洲性格」的藍本和需要所規劃的社會主義前景，仍然是最有影響力、最具挑戰性的——無論這樣的遠景因為他的垮台受到多大的限制，甚至在他捨民主和非洲主義的原則之後，為加納製造多少問題。1970年代和1980年代馬克思主義政權崛起，恩克魯瑪的影響力相對失色，是否應該依據非洲人的特殊性而調整政策因而較少受到關注，但是恩克魯瑪在大家稱之為他的「潘得墨時期」所強調的非洲社會主義，依然是非洲政治哲學中具有啟發性的重要的文本之一：

如果獨立不是要和人民疏離的話，解放國家的社會主義應該接受許多原則。社會主義如果要忠於自己的目標，自然會努力結合社會進化之前，尚未被殖民主義破壞的平等和人文的傳統；它會努力在殖民主義的結果中找尋這些元素（就像在尋找新的生產方式和經濟組織），以便能夠調整，為人民謀得利益；它會努力限制、並阻止殖民主義中的資本主義習性所造成的異常和支配性利益四處流散；它抹去人們的「殖民心態」，喚回他們的信心；它堅定地保衛人民的獨立和安全。簡言之，社會主義體認辯證關係的重要，瞭解對立的關係可能產生創造性的力量；它認同鬥爭的創造性，理解到力量的運作必需順應任何的變化。它同時也涵蓋物質主義，並且將它轉譯為社會主義的平等。（Nkrumah 1970: 106）

如果說恩克魯瑪的《走向殖民自由》（*Towards Colonial Freedom*, 1947），潘得墨的《泛非洲主義或共產主義》（*Pan-Africanism or Communism?*, 1956），以及塞傑爾的《反殖民主義論述》（*Discourse on Anti-Colonialism*, 1950）三本書代表穆丁比所說的「戰後早期幾本偉大的解放著作」的話，恩克魯瑪的《內在覺醒》這本書必定在建立非洲文化和知識自主的著作中占據核心位置（Mudimbe 1988: 90）。

恩克魯瑪開始時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家，但最後卻成了一個糟糕的政客。他的錯誤就是認為獨立之後，他就可以把目標放在經濟自由，以及非洲解放和團結上面（「這個偉大的目標超越一切，它的崇高無可比擬」），卻犧牲了他努力奮鬥才得到的政治自由（Nkrumah 1961a: 221）。恩克魯瑪一直小心注意新殖民主義的威脅，卻拿它來當做壓制國內反對力量的手段，也因此罔顧了特別是非洲所需要的自由

（Serequeberhan 1994）。正如穆丁比所說的：「最好的說法就是，他只是沒有將理論化為實際。然而他的理論仍舊流傳下來，挑戰並啟發了非洲新一代的馬克思主義者，成為尋求革命性的改變和文化動力的典範」（Mudimbe 1988: 95-6）。恩克魯瑪所害怕的——新的非洲國家如果單打獨鬥，恐怕「早早就會崩解」，從許多方面來看，這個恐懼真的是先見之明（Nkrumah 1961a: 228）。在1972年，卡布拉爾強調恩克魯瑪對非洲有正面的貢獻，他認為恩克魯瑪的失敗不應該用純粹個人的成敗來分析。他的結論是：「只要帝國主義存在，非洲的獨立國家就必需是掌權者的解放運動——否則，它就不可能真正獨立」（Braganca and Wallerstein 1982, II: 109）。後來，卡布拉爾本人充分實現在非洲可行的社會主義。泛非洲主義留下的思想：寬容、和平、非暴力和平等，這些特別為非洲發展所定下的政治原則，在曼德拉近期所領導的南非重現。曼德拉本人扮演了一個橋樑的角色，銜接到早期人文的、寬容的一代所追求的：要讓世界看到「非洲人能夠在正義、寬容、解放、個人自由和社會進步各方面，扮演領導的角色」（Nkrumah 1961a: 82）。

#### 四、尼雷爾

坦尚尼亞的尼雷爾也信奉類似的原則，並將之付諸實踐。尼雷爾的社會主義在理論方面比較沒有那麼出色，但是他的理論在許多方面為後來的發展鋪路，而且就如穆丁比所說的，現在回顧起來，他的理論「可能是所有非洲社會主義中最實用的」，而他本人則是「比較可靠的政治思想家之一」（Mudime 1988: 94, 92）。就像潘得墨和恩克魯瑪一樣，尼雷爾首先強調社會主義不是另一種形式的經濟系統，而是一個不同的社會體系：他的願景是一個以相互支持的共同價值做為基礎的新國家，走向一個非洲民族的共同體，以相同的原則互相扶持。尼雷爾將社會主義定義為「烏佳馬」（*Ujamaa*）<sup>譯註1</sup>，或「公有主義」，並透過一個群體相互關照例子來闡述社會主義的可能性：「非洲社會主義的基礎和目標就是延伸（extended）家庭」。這就表示需要將非洲社會主義性別化，以開啓整個改變的可能性，並且為恩格斯強力反對的資產階級小家庭結構提供另外一種模式。因為尼雷爾的社會主義是把非洲放在第一位，所以無法能接受社會主義不能變通，把它當成信條般遵行，因為這樣的社會主義並沒有考量到非洲的現實：

社會主義——就像民主一樣——就是心靈態度。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它就是社會主義的心靈態度，不是嚴厲地恪守某個標準的政治模式。為了確

<sup>譯註1</sup> 「烏佳馬」的基本概念是所有社區的成員像延伸家庭般，共同合作。是一個強調合作、共享的集體經濟。



保人民關心彼此的福祉，我們需要有這樣的心靈態度。(Nyerere 1968: 1)

因此，尼雷爾也認為獨立的非洲社會主義國家的第一步就是教育、再教育，才能夠將因為殖民主義的掠奪而喪失的心靈態度態找回來：「在我們傳統的非洲社會，我們是社區的一員。我們照顧社區，而社區也照顧我們。我們不需要，也不想剝削我們的同胞」(ibid.: 6-7)。尼雷爾和同黨在1967年重要的「阿魯沙宣言」(Arusha Declaration)中定義他們的社會主義形式，強調依賴自己，而且偏向小規模的規劃。就經濟和社會的觀點來看，他認為當地農業和工業相關的小規模計畫，和一些以發展大規模的現代工業的大型計畫比較起來，小型計畫有用太多了：「我們必需考慮什麼是可利用的，或者什麼可以被變成可利用的，讓人民相對地花較少的代價，才能夠讓人民操作。我們沿著這樣的路線走向未來就可以避免巨大的社會斷裂和人類的苦痛」(ibid: 97-78)。尼雷爾這個詹姆士所形容的「對非洲的真實所做的深刻而有創造性的回應」，後來由尚比亞的卡翁達更進一步發展。卡翁達認為傳統的非洲社會就是「相互扶持的社會」，是一個接納、包容的社會 (James 1977: 219; Kaunda 1967: 5-6)。相較之下，恩克魯瑪則不斷鼓吹一個以國家化和重要的政府基層組織規劃為基礎的科學社會主義形式，後來在莫三比克、安哥拉和衣索匹亞的蘇聯派社會主義思想追隨恩克魯瑪的觀念，制訂中央集權式的計畫，漠視鄉村社群的需要，把焦點放在大規模的都市工業發展的基層規劃。就實際的角度來看，這個影響造成坦尚尼亞經濟機制和商業大規模的國家化，即使在「阿魯沙宣言」之後還是一樣：尼雷爾也沒能讓他最好的原則付諸實踐。直到近期，也就是「非非洲形式」(non-African style) 的社會主義——以及資本主義——已經不再被認為可能在非洲社會行得通的時候，大家才開始接受尼雷爾的主張，強調本土的、永續的方式，重新體認前殖民時期的社會中，政治和經濟關係的複雜性，以及經濟和社會改變時不同的動因 (agents) 所扮演的角色。當代「非洲發展與生態研究」(African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Studies) 的經濟學家、理論家和實踐者，針對最有效的社會策略做辯論時，尼雷爾的主張成了一個重要的基礎 (Maddox, Giblin and Kimambo 1996; Shivji 1989)。

## 五、從「正面行動」到暴力

在今日，非洲社會主義相對地較少受到注意，一部分是因為它和泛非洲主義的關聯，一部分則是因為其中的想法被認為已經被超越了。強烈認同非暴力的主張不再是非洲政治的主要概念了。在1945年「泛非洲代表大會」時，領袖們認同非暴力的策略，因為甘地的策略首度在南非運用成功。恩克魯瑪吸收甘地的「不殺生」(Ahimsa)，也就是非暴力主張，這是針對殖民地很難發動武裝起義而採取的策略，

因為被殖民者如果沒有第三者，如蘇聯的幫助，很可能就會被軍事鎮壓而擊潰。而會議當時堅持非暴力抵抗的策略，在後來有恩克魯瑪、尼雷爾和其他人應用成功。恩克魯瑪整合運用現有的不同貿易聯盟、婦女和青年組織的基層結構，以「正面行動」的策略讓加納成為20世紀第一個達到獨立目標的非洲國家。

恩克魯瑪的革命背景讓他察覺到自己在追隨甘地的路線時，也就是摒棄以其他方式達到獨立的目標。1949年在他的小冊書〈我所認為的正面行動〉(‘What I Mean by Positive Action’)中，他指出，達到自治的方式有兩種：武裝革命或是以甘地所主張的透過立憲和合法的非暴力手段，施以道德的壓力。

我們鼓吹的是後者。但是對被殖民者而言，自由絕不可能憑空而得；自由的獲得必需經過痛苦和激烈的鬥爭。由於殖民地的教育落後，大部分的人民是文盲，而他們唯一瞭解的就是——行動。

我認為「正面行動」就是採用一切合法、立憲的方式，反擊國內帝國主義的力量。我們的武器就是合法的政治煽動、報紙和教育活動。最後的手段就是根據甘地在印度所用的絕對非暴力的原則，訴諸合法的罷工、杯葛和不合作。(Nkrumah 1957: 92)

這個策略在以英語系統和法語系統為主的西非運用得很好。在那時候，沒有人考量到下列事實所隱含的意義：甘地的「真理力量」在南非的成功只限於達成或保住了印度人的某些政治權利，而不是爭取到這個拓居殖民地大部分的統治權。由南非的逐漸惡化的情況，以及肯亞「茅茅起義」的例子來看，泛非洲的非暴力路線越來越難以維繫。

恩克魯瑪相信，1958年「全非洲人民會議」能夠「激發、鼓勵非洲大陸其他地方的非洲人跟隨黃金海岸的腳步，走向非暴力革命的路線，而不是茅茅主義 (Mauism)」(ibid.: 185)。「民族解放陣線」的法農挑戰他這個觀念；法農認為暴力有其必要性，這個論點後來發展成他所著《受詛咒的大地》(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一書的第一章。為了強調他的主張，恩克魯瑪在1960年4月7日在阿克拉召開了一個會議，進一步討論「正面行動與非洲安全」，會中他堅定無比地宣告：「我們譴責暴力，覺得它很可悲。我們要致力於非暴力的正面行動」。但是事實上，這次的會議宛如宣告正面行動的策略實際上已經結束了。後來很快地發生法國在撒哈拉的核子測試事件，恩克魯瑪呼籲所有非洲採取正面行動來反對這個測試，他認為「其結果將會和甘地歷史性的『食鹽大遊行』<sup>譯註2</sup> (Salt March) 一樣地震撼，

譯註2 1930年英國制訂「食鹽法」，規定食鹽由政府專賣，甘地反對此一規定，帶領印度人長途跋涉200英里，到海邊抓起一把鹽，表示公開反對食鹽法。後來全國各地都有人公然違法私製，迫使英國政府進行談判。

一樣地成功。」(Nkrumah 1961a: 215)。但是恩克魯瑪沒有像甘地有明智的策略，提出明確的計畫，而且他的正面行動也不夠實際。它的侷限在1959年8月發生在葡屬幾內亞的「比幾歸提(Pidgiguiti)大屠殺」事件中就可以清楚看出；當時正在罷工的碼頭工人被迫回去工作時，有50名工人慘遭屠殺。1960年的南非的「夏普鎮(Sharpeville)大屠殺」<sup>譯註3</sup>更是悲慘。南非人反對法案通過而發起的非暴力的正面行動，但結果卻是69名以和平反抗的人被南非政府的法律和命令殘殺(Davenport 1991: 358)。1961年12月16日，由新成立的「非洲民族會議」武裝部「民族之矛」(Spear of the Nation)<sup>譯註4</sup>發動第一次有組織的對抗南非政府的破壞行動。對於以暴還暴的新政策，「民族之矛」有一個宣言：

「民族之矛」將會以新的方式繼續為自由和民主而奮鬥，我們必需用這些手段，才能補民族解放運動既有行動之不足。……人民的忍耐不是無盡無止的。任何一個國民族家都會面臨只剩下兩條路可走的時候：默默服從或奮起而戰。現在南非就面臨這個關頭……政府採用粗暴的政策，我們再也不可能只用非暴力抵抗政府的鎮壓和暴力。(Meli 1988: 214)

一年之後，曼德拉在他第一次審判中對法庭所做的陳述中，他還是強調相同的主張，他認為「我們的態度已經被一段不是我們創造的歷史所制約……。政府的暴力只會帶來一個結果，就是以暴力抗衡。我們一再提醒政府當局，在這個國家，不斷訴諸暴力只會讓人民還以暴力」(Bragança and Wallerstein 1982, II: 38)。這樣的決心在另一篇文章〈從甘地到曼德拉〉(‘From Gandhi to Mandela’)中更加明確。這篇文章出現在1969年紀念甘地為南非印度人爭取權益而在那塔爾(Natal)成立「那塔爾印度會議」75週年，由「非洲民族會議」出版的期刊*Sechaba*中。曼德拉引述甘地本人在1938年的說法，將它當做是支持「非洲民族會議」決定開始以暴力形式進行鬥爭；甘地說：「當必需在懦弱和暴力中做抉擇的時候，我會勸大家選擇暴力……。我選擇暴力的意願千百倍超過要選擇閹割我們整個民族。為了榮耀我寧願用武器，我不願眼睜睜地蒙受恥辱」(Bragança and Wallerstein 1982, II: 43)。從甘地到曼德拉，「真理力量」的理想到此為止。但是它還是會回來的，只是它的形式變成了曼德拉所用的「不妥協的寬容」(uncompromising generosity)。

<sup>譯註3</sup> 南非種族隔離政策中規定非洲人進入白人社區需攜帶身分證。1961年3月21日，數千人聚集在約翰尼斯堡郊區夏普鎮反對此一法令。白人警官向人群掃射，69人死亡，2,000多人被捕，在半年之內陸續有兩萬多人牽連被逮捕。

<sup>譯註4</sup> 1961年6月，曼德拉和「非洲民族會議」幹部及南非共產黨員組「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計畫對白人政府發動暴力攻擊，破壞公共設施，以嚇阻外國投資，使國家經濟衰退，迫使政府重新考慮其立場。1962年曼德拉被捕之後，「民族之矛」發動將近200次破壞行動。

除了南非，這時候許多其他的殖民地——阿爾及利亞、安哥拉、肯亞、尼爾薩蘭、羅德西亞／辛巴威，西南非，西屬撒哈拉——或者依舊是拓居殖民地，或者仍由葡萄牙和西班牙這種頑強的殖民勢力所掌控。1960年代在阿爾及利亞、葡屬安哥拉、幾內亞比索和南非開始採用武裝鬥爭，表示正面行動的策略確實結束了。在1961年，「葡萄牙殖民地民族主義組織會議」(CONCP)<sup>譯註5</sup>——為對抗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政權而聯合各地武裝鬥爭的一個聯合陣線——成立了，並且在1968年在蘇丹的喀土穆(Khartoum)會議中，這個組織結合其他走向武裝鬥爭的自由組織，包括在南非、辛巴威和那米比亞著名的「非洲民族會議」、「辛巴威非洲人民聯盟」和「西南非人民組織」。在非洲以外，1959年的「古巴革命」，以及日益升高的「越戰」，代表了當時的變化：如果打敗帝國勢力是可能的，為何不能打敗殖民勢力呢？

現在，和暴力比起來，非暴力策略鮮少受到討論，比方說在法農的作品中就有這個現象。但是法農之所以強調暴力有其非常不同的原因，由於北非對法國拓居殖民有一段漫長激烈的抵抗史，法農由此脈絡來看待暴力：採用暴力是因為情況迫切需要。如果把這些看成是絕對的意識形態或本體的差異，那就是大錯特錯了。法農和曼德拉一樣，都痛恨暴力。許多在英語系非洲中最反對暴力的人後來改變了立場，包括恩克魯瑪、尼雷爾和卡翁達。恩克魯瑪在他垮台之前就已經捨正面行動而取革命戰鬥，雖然他自己解釋主要是因為新殖民主義謀反，才會強化暴力手段(Hountondju 1996: 135)。儘管放棄了正面行動的原則，但是他仍舊忠於泛非洲主義的理想：他的《革命戰鬥手冊》(*Handbook of Revolutionary Warfare*, 1968)以整個非洲大陸為基礎，提出成立一個「全非人民革命黨」(All-Afric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以及「全非人民革命軍」，以武器對抗拓居殖民者和傀儡政權，以達到非洲的政治團結。在許多方面，更引人注意的是卡翁達總統捨棄正面的行動。他以非暴力行動帶領尚比亞走向自由，而且一直極力鼓吹甘地以道德力量取代武力的政治方針。但是，因為某些對手根本無視於世界其他人的譴責，同時也因為內部自由派反對力量的無能或缺乏，只憑道德力量根本行不通。1963至1964年南非的里沃尼亞(Rivonia)審訊，以及次年白人拓居者政權在羅德西亞的「單方面宣布獨立」(UDI)的宣言，讓即使是最熱切支持非暴力的人醒悟，對於權力十分鞏固的白人拓居者政權而言，甘地50多年前在南非發展的策略根本對他們毫髮無傷。在羅德西亞／辛巴威的「非洲民族會議」、「全國民眾黨」和「辛巴威人民聯盟」抱持傳統的非暴力立場，尋求妥協的憲法改革最後一事無成。在「民族之矛」成立之後，1964年開始在莫三比克和辛巴威的武裝鬥爭確定非洲解放的新時代來

<sup>譯註5</sup> Conferencia das Organizações Nacionalistas das Colonias Portuguesa (Conference of Portuguese Colonies Nationalist Organizations)：葡萄牙殖民地民族主義組織會議。

臨。安哥拉的「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宣布，在荷蘭政權的軍事備戰狀態中，游擊戰是鬥爭唯一可能的正當形式（Braganca and Wallerstein 1982, II: 74）。1966年4月18日，「辛巴威非洲民族聯盟」開始採取武裝鬥爭（*Chimurenga*）。卡翁達在談論羅德西亞的史密斯（Smith）政府所採取的行動時，有這樣的結論：

如果能夠撇開正義、合法和道德的問題，這個道理似乎就很清楚了：如果使用暴力保衛這樣的國家是對的，那麼用暴力摧毀它就不可能是錯誤的了。（Kaunda 1982: 75）

到了1974年「第六次泛非洲代表大會」在坦桑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Dar Es Salaam）舉行的時候——這是第一次在非洲的土地開會——有關非洲民族解放的討論主要都集中在各地的暴力鬥爭，包括安哥拉、幾內亞比索、以及佛得角群島（Cape Verde Islands）、莫三比克、那米比亞、索馬利亞、南非、西屬撒哈拉、辛巴威和巴勒斯坦。現在，非暴力抵抗已經不合時宜了，泛非洲主義更名為「革命泛非洲主義」（Revolutionary Pan-Africanism）。尼雷爾在開幕致詞中仍強調非洲社會主義其他兩個價值的重要性：終結經濟的不公以及否定非白人的種族主義：「非洲大陸以及全世界的未來有一個基本原則：人性是無法劃分的。如果一個人因為膚色或種族的關係而默默承受羞辱，他就不可能有自尊地活著，也不值得其他人的尊敬」（Sixth Pan African Congress 1976: 9, 90-1）。三年之後，即使尼雷爾本人也使用軍事力量推翻烏干達的亞明（Idi Amin）長達八年的暴政獨裁。但是在1979年賴比瑞亞首都蒙羅維亞的高峰會議，決議採用〈非洲人權憲章〉（“African Charter of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再度確認尼雷爾的基本原則。

但是，在1959年之後，阿爾及利亞、安哥拉、莫三比克、南非和辛巴威，信奉強硬派政治路線的自由鬥士開始主導那些奉行非洲社會主義和泛非洲主義的政權。雖然這不是必然的（斯里蘭卡就是一例），但是在非洲及其他地方，獨立之後的政權之所以失敗，和去殖民過程中的暴力影響脫離不了關係。第一線國家（front-line states）也因為南非和美國而持續不穩定。在這樣的脈絡下，當代非洲社會主義在南非重現實在令人驚訝，因為南非的解放最後由一股結合道德、經濟和軍事的力量所形成的壓力，在人民和國際的層面上發揮力量，有效地結合兩種可能的選擇。南非的解放顯示，暴力和非暴力的選擇不一定永遠是絕對的，而且運用的技巧必需因各種個別的情況而定。就某些方面來看，南非的情況可比擬印度的情況，也就是說不同的群體各自採取暴力或非暴力，這種辯證的關係可以對霸權產生有效的抗衡。曼德拉成功是因為他在面對一個不公不義的政權時，拒絕放棄暴力的手段，但是他相信非暴力是基本的原則。非洲社會主義一貫的理想在南非延續下來，代表了第一次，一個經濟強大的非洲國家已經就位，要為非洲社會定義一個新的政權和新的未來。

## 19.

## 非洲（三）： 拉明·桑戈爾、立歐玻·桑戈爾和 法語系非洲社會主義

「黑色大西洋」不只包括說英語的非洲，也涵蓋說法語、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的非洲各地。要為非洲建立一個新的政治和文化的身份認同，這個想法也是一群來自法語殖民地，以及後來的葡語系殖民地的反殖民知識政治家所努力的目標。從革命的共產主義走向泛非洲主義和非洲社會主義，這段歷程也發生在這些法語和葡語系的非洲知識分子。正如藍格禮（1973）所證明的，即使英語系的非洲人主導1945年的會議，泛非洲運動在法語地方中的活躍一如20世紀前半葉在英語地區的蓬勃：例如有「喀麥隆民眾協會」（*Union des Populations de Cameroun*），加上塞內加爾和馬利的桑戈爾，還有有一陣子烏弗埃·包瓦尼（Houphouët-Boigny）在象牙海岸成立的「民主聯盟」。但是反諷的是，對於法語地帶的非洲居民而言，泛非洲主義早就由法國人付諸實踐了，因為法蘭西帝國刻意規劃自治領，因此從中非一直到地中海自治領幅員遼闊。屬於法國的非洲殖民地只有法屬西非聯邦和法屬赤道非洲（Mazrui 1993: 60）。正如在英語系非洲一樣，有些地方採取接受宗主國統轄，但以憲法施壓的方式或正面行動，這樣的策略所面對的往往是當地拓居者的鞏固政權不肯妥協的立場。1954年「阿爾及利亞戰爭」的爆發顯示，在這種狀況下，行動派除了轉而使用暴力之外，別無選擇。英語系非洲在正面行動和暴力之間的辯證拉扯，也同樣發生在法語系非洲。就這方面，法語系非洲有兩個主要人物來自不同領域，代表兩個極端不同的可能性，他們就是立歐玻·桑戈爾和法農。正如恩克魯瑪或甘地，在討論其中任何一人的策略時，如果不考慮到另一個人的對照立場，勢必抹殺他們在整個介入過程中的歷史辯證。

法國以不同的形式殖民非洲，這表示從政治上、文化上，以及自決的選擇上，法語系非洲和英國的殖民非常不同。英國系統的概念大略以帝國走向獨立自治領的聯邦，在理論上，這是任何一個被殖民國家可能嚮往的狀況。而法國以同化為基礎的殖民系統代表著整個帝國屬法國的一部分。由於法國革命熱切要求平等，一些比較舊的殖民地，如馬提尼克島，以及塞內加爾四城（*communes*）〔聖路易、哥瑞

(Goree)、達卡 (Darkar)、盧費斯哥 (Rufisque)) 的居民在憲法上被視為法國公民，而且可以派一名代表參加「法國國民會議」。即使其他只是殖民地的人民，至少在理論上都一直認為自己是法國人。法國的政策十分成功，尤其是對那些來自加勒比海 (安地列斯) 和西非的人而言，以致於在反殖民運動中產生不同的動力。即使是官方的同化原則 (有不同程度)——將被殖民者同化在法國文明中——從 20 世紀初就一直備受攻擊，認為法國應該進一步走向英國的階層化的型態或荷蘭的「聯合」(association) 型態，但是同化的原則仍舊流傳，沒有動搖；而被殖民者更加強調學習法國文化和教育，甚至拒絕考慮以憲法讓殖民地在政治上脫離法國 (Betts 1961)。但完全的同化的人也只有少數，雖然這些少數的人的確是成功地完全同化——尤其是那些皇家代表，如迪亞涅者流，代表殖民地赴巴黎參加「法國國民會議」(在拓居殖民地，如阿爾及利亞，這些代表通常都是從拓居移民中選出)。反對法國以這些方式統治非洲的人開始堅決反對以「代表」自滿，甘於被同化的立場。但是，由於法國的同化並沒有正式立法，也沒有強制執行，被殖民者可能的選擇和英國的被殖民者有所不同：奇怪的是，法國行動派可以鼓吹完全合併，而另外一批人同樣地強力主張完全獨立。只有這個現象才能解釋，為何有些法國殖民地終究還是選擇成為法國大陸的一部分。

因此，在許多情況下，反殖民民族主義，以及政治和文化的自我定義仍舊弔詭地圍繞在一個比較廣義，但毫無疑問的認定——自己仍舊屬於法語文化的一部分。這種心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招募殖民地士兵的宣傳中更加明顯：宣傳中聲稱所有的殖民地人民都是法國人，為法國而戰；在大戰期間，法國以殖民地士兵出戰；最惡名昭彰的是在萊因地區 (Rhineland) 之戰以後，提出所謂的「以血還債」(*dette de sang*)，認為這是互相的義務，殖民兵為法國而犧牲是對法國的回報。很多來自英屬非洲、加勒比海和亞洲等殖民地的參戰的人也有同樣的觀念，但卻不像法國這樣的公開昭示。由於這些的差異，許多法屬殖民地公民和人民的政治和文化書寫中，有關政治、文化和自我定義的觀念都還是將自己定義為法國文化的一部分——如果不是法國的一部分的話。文化的混合，以及對現代性保持肯定的態度，一直是他們基本的心態。正如米勒 (Christopher Miller) 所說，20 世紀早期法語系非洲知識分子的文化理論為後殖民所強調的文化雜揉以及跨文化詩學鋪路，尤其是強調混種 (métissage) 和混血的克里奧化 (*créolité*)，指出在文化、知識、政治上與現在的連續性，此連續性通常被忽視 (Miller 1998: 3)。這樣的連續性在格利桑 (Edouard Glissant) 身上最明顯；他的一生很像雅各布森 (Roman Jakobson)，跨越了許多典型屬於不同世代的運動 (Glissant 1989, 1997)。像立歐玻·桑戈爾等人的政治強調法國文化之中發展不同形式，因而還一度反對獨立，這些主張現在通常被投以懷疑的眼光。相較之下，塞傑爾的立場就比較矛盾，他寫的《殖民主義論述》

(*Discourse on Colonialism*) 是控訴殖民主義最猛烈的著作之一，但他後來成功領導一個政黨，鼓吹馬提尼克島在政治上歸化法國大陸，排斥獨立。他這樣矛盾的立場反而比較沒有問題，顯然是因為其著作立場清晰，和他在事件中所做的政治決定儼然可以分開探討 (Césaire 1972)。因此，塞傑爾在後殖民殿堂中所占的地位和他的學生法農幾可比擬。這兩個人可以說是文化同化的知識分子代表人物，儘管在政治上並非如此。法農的政治激進主義在他到阿爾及利亞之後得到完整的發展，因為阿爾及利亞的政治背景迥異於加勒比海或西非。

一般而言，法語系的反殖民文化開始時以帝國內的獨立做為目標，但是在「俄國大革命」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漸漸傾向完全的文化和政治獨立 (這種轉變也體現在甘地的政治生涯中)，但法語系的殖民文化仍舊比較辯證性地分裂在兩種選擇中：胡志明和法農一派要求完全獨立，而塞傑爾和桑戈爾所追求的是以更公平互惠的方式重新建立宗主國和殖民地的關係；他們認為，一旦這個目標達到了，無論是否在憲法上獨立與否，殖民地仍舊屬於廣義的法國政治和經濟文化中的一部分。奇怪的是，後殖民理論 (粗略而言) 贊同法農而排斥立歐玻·桑戈爾，但是其實後殖民在許多方面反而比較接近桑戈爾探索文化差異中各種相互關聯的形式，而不是法農那樣黑白分明的二元論。而且，無論在政治上有多麼激進，在許多方面，胡志明 (乃至法農的) 比較有辯證性的二元模式，比較不是依據三大洲文化而發展的政治和文化政治的形式，反而比較傾向把歐洲馬克思主義當成共通模式應用在非歐洲的脈絡上。

## 一、兩次大戰之間的法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戰後，法國殖民地陸陸續續有叛亂和廣泛的抗爭事件 (Boahen 1985)，大部分的反殖民運動是在帝國中心的巴黎發聲，一部分是因為和殖民地比起來，巴黎享有更大的政治自由，一部分是因為來自不同國家的行動派在巴黎相遇，一起建立組織，還有一部分是因為比較容易取得「法國共產黨」的金錢和其他形式的幫助。這一批人大部分是戰後退役的行動派，有感於殖民地的環境受限制，相形之下受到都會自由的氣氛所吸引，再加上可以藉機接受教育、接觸文化，所以在 1918 年之後就留在巴黎 (Langley 1973; Lawler 1992; Recham 1996)。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大約有 20 萬非洲人到歐洲打仗，這多半是因為代表參加「法國國民會議」的塞內加爾代表迪亞涅努力招兵買馬，就像米勒所描述的，「活活體現同化的理念」，雖然迪亞涅的行為和甘地比起來，沒有那麼直接了當的宣示教人非議：1915 年，甘地也在印度招募士兵為英軍作戰，當時他的名言是：「我發現大英帝國有一些我所愛的理念」(Conklin 1997: 142-150; Echenberg 1991: 45-46; Miller

1998: 17; Overstreet and Windmiller 1959: 19)。在第一次大規模移入法國的北非人中，許多阿爾及利亞人被帶到法國當工人，取代那些上前線的工人。就是在法國這樣一個政治自由的情境中，哈吉才能夠集合了在巴黎的阿爾及利亞人，在1920年代創立「北非之星」。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一個意想不到的效應是，來自非洲、加勒比海和中南半島等不同殖民地的人結合在一起，產生一種跨越族群、文化和地理分界的新情誼，在全世界共通的反殖民意識形態都是來自共產黨的時刻，他們的結合促進了另一種共同的反殖民意識形態。就像在英國殖民地一樣，法國不遺餘力強制將法語訂為各殖民地的官方語言，沒想到反而讓來自各殖民地的行動派很容易溝通。這些人合作的第一個公開宣言就是胡志明成立的「殖民聯盟」，這是一個將所有法蘭西帝國所屬地區的行動派結合起來的共產組織，尤其是來自中南半島和安地列斯群島的人。他們出版報紙《放逐者》(Le Paria)，從1922年發行到1926年。「殖民聯盟」跟隨「共產國際」的官方路線，主張殖民地的解放將跟隨著歐洲革命的腳步，但是它的焦點放在譴責法國在中南半島、安地列斯和非洲的統治 (Dewitte 1985; Langley 1973: 293)。1928年之後，「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恢復反殖民主場，因此「法國共產黨」成立了一個「殖民委員會」(Colonial Commission)，每個月出版《殖民通訊》(Bulletin Colonial)，鼓勵各地共產黨或法屬殖民地組織的發展，但需要由巴黎的「法國共產黨」監督。就像在英國和英屬殖民地一樣，非洲人和來自其他殖民地的人抗拒這種歐洲白種人想要掌控的企圖，這些歐洲白種人的激進主義雖然也反種族、反殖民，但卻很少能夠擴及非洲人本身的需要和角度。加維主義 (Garveyism) 思想中已經有另外一種非共產主義的路線；他的主張以及其他在巴黎和法屬殖民地不受「法國共產黨」直接影響的反殖民行動主義將在下一節討論。無論如何，這其中的區別從未截然劃清。就像其他反殖民行動派的例子，官方和非官方的共產黨，以及反殖民民族主義之間的分野從來也不是絕對清楚，甚至常常因為各政府和情報局的交混而更難以劃分。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像加藍·庫雅特這些個人黨員，通常也同時是非共產黨機構的成員，反之亦然。而共產黨也對非共黨組織提供財經和其他協助。所謂「共產黨前線組織」的觀念通常大略地指具有相同基本意識形態而的協會組織。

## 二、反殖民行動派：胡努、桑戈爾、加藍·庫雅特

兩次世界大戰中間的時期，在巴黎有三個重要的非洲反殖民政治組織，不在「法國共產黨」的掌控之中，這三個組織的領導人物分別是：胡努〔來自達荷美 (Dahomey)〕、拉明·桑戈爾 (來自塞內加爾) 以及加藍·庫雅特 (來自法屬蘇丹，現在的馬利)。他們三人都採用非洲的觀點，而不是民族主義的觀點。接下來

的各節我要分別討論這三位離散的人物，他們所參與的組織，以及他們所發展的反殖民思想，因為他們建立了激進的知識政治傳統，這個的傳統到1960年代持續不墜，而且十分豐富，對非洲整個法語系的解放政治有深遠的影響，甚至還透過法農和其他人，直接傳輸到後殖民理論中。在戰前，非洲法語地帶的地方性政治活動的影響力不如英語地帶的殖民地。主要的發展包括塞內加爾的四城第一次選派非洲代表——迪亞涅，成為「法國國民會議」代表的一員。迪亞涅是改革者，杜博斯曾說服他擔任1919年在巴黎的「泛非洲代表大會」的召集人，但他從1919到1934年逝世之前都一直是「法國國民會議」的代表 (Du Bois 1965: 9)。胡努、桑戈爾和加藍·庫雅特三人認為他對自己本身所象徵的地位太容易退讓，接受法國政府漸進的政策。他的「共和社會主義黨」(Republican Socialist Party) 的優勢以及他在塞內加爾所具有的政治影響力，某種程度說明為何後來立歐坡·桑戈爾漸漸邁向中間溫和的立場。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各種青年和社會組織紛紛成立，政治議論呈現了多樣的角，但是這些組織仍舊不如英語的非洲那麼廣泛。在地方性的層級上，最有影響了的包括西非的「公民人權聯盟」(Ligue des Dorits de l'Hommoie et du Citoyen) 以及法屬赤道非洲馬資瓦 (André Matswa) 所領導的「法屬赤道非洲友好聯誼社」(Société Amicale des Originaires de l'Afrique Equatoriale Francaise)。這兩個組織發起罷工行動，但是真正付諸實現的時候都被殖民當局有效鎮壓。

## 三、胡努和「全球黑人防衛聯盟」(LDRN)

1924年寫下《宇宙蛻變與輪迴之內捲論》(Involution de metamorphoses et des metempsychoese de l'univers, 1921) 這本非凡著作的作者胡努，通常被認為是後來「黑人精神」理論的主要先驅之一，他在當時就已經是巴黎左派圈子中著名人物。有一回他被幾個白種的美國人從一家蒙馬特 (Montmartre) 咖啡店裡丟出來，只是因為這幾個美國人發現鄰桌坐的是黑人。這些美國觀光客就是典型的文化帝國心態，還以為自己仍舊活在美國「克勞法」(Jim Crow) 譯註<sup>1</sup>的世界中。這經驗可比甘地在抵達南非時，被丟出頭等火車的經驗。有此經驗後，胡努決心成立一個「全球黑人防衛聯盟」(Ligue Universelle de Défense de la Race Noir, LDRN)。正如它的名稱所顯示的，該組織的基礎就是加維所主張的泛非洲主義的原則，當時這些觀念在加勒比海地區、西非和巴黎的非洲離散分子中，十分有影響力。雖然泛非洲主義運動失敗，但加維的理念不墜，持續激發政治行動派擊劃各種可能性，從胡努到「黑人精神」運動，一直到1940年代晚期的《非洲現身》(Présence Africaine) 的文化規劃。胡努一直被認為和「共產黨」以及加維的「全球黑人進步協會」有關聯。

譯註<sup>1</sup> 美國南北戰爭後，南方所通過的歧視黑人的律法。

「全球黑人進步協會」稱他為該會在法國的代表，他也幫忙將「全球黑人進步協會」的報紙《黑人世界》，以及《放逐者》發送到他的國家達荷美（Boahen 1985: 646; Langley 1973: 293）。1924年他到紐約和加維會面，並在「全球黑人進步協會」聚會上的演說中強調，巴黎現在已經成為「黑色人種的心臟」。他能夠在共產主義和加維的主張折衝，這就表示原本無法相容的兩種政治立場——從巴黎的觀點或從達荷美的角度——可以結合，為新的反殖民解放文化的建構和產生奠定基礎。「全球黑人防衛聯盟」曾曇花一現出版過泛非洲主義的期刊《大陸》（*Les Continents*），鼓勵非洲各國和離散各地的非洲人要表現一股新的黑人的驕傲之外，並反對殖民地的狀況，主張被殖民者有權要求或者絕對的自主，或者完全的同化。《大陸》的另一位編輯是馬提尼克島的梅林（René Maran），他的小說《巴特瓦人》（*Batouala*, 1921）對歐洲殖民主義及歐洲在非洲的「文明開化任務」有嚴厲的批評，這本書像是為戰後身在巴黎的非洲人規劃反殖民的激進規程。1924年這個期刊在著名的提告行動——針對曾經是它所稱的合編者迪亞涅的毀謗——中敗訴。這次的審判讓保守的非洲代表和年輕的激進異議分子之間的差異更加兩極化，很有效地在法庭上公開清楚闡述激進的新政治立場。胡努本人對自主與同化兩種選擇，立場非常曖昧。他呼籲應將兩者等同視之：「殖民地絕對自主，但在一般問題上和母國維持帝國關係；或是整體而完全地同化，沒有邊界之分——也沒有種族之分」（Langley 1979: 235）。他的《宇宙蛻變與輪迴之內捲論》是一本奇怪而曖昧的書，似乎像喬依斯（James Joyce）一樣在探討蛻變和輪迴，以哲學的角度陳述同化的可能性，正如米勒所言：「內捲代表一種逃避，想要擺脫一種壓迫性的差異，一種源自虛構的區分所導致的狀況」（Miller 1998: 52）。內捲的現象也受到文化互化的過程所帶來的同時革命所影響。胡努本人對不肯讓步的法國殖民政權，在態度上也越來越強硬。後來他在哈林區見到一些加維的信徒，再加上激進派的夥伴韓康林（Louis Hunkanrin）從巴黎回到達荷美，在他們的激勵下，胡努參與了一次出師不力的達荷美解放行動；達荷美在1923年之後一直處於不穩定的狀態。一連串的暴動和罷工讓情勢更加紛亂，因此胡努的民族組織變成地下化，領導者也紛紛被捕。到1936年生命結束之前，胡努一直待在塞內加爾繼續積極參與反迪亞涅的政治活動，並宣揚他的共產主義反種族反殖民的內捲化理論（Boahen 1985: 646-7; Langley 1973: 298-300）。

#### 四、拉明·桑戈爾和「黑佬防衛委員會」（CDRN）

1926年，拉明·桑戈爾——立歐坡·桑戈爾的遠房堂哥，一位強硬派的反殖民共產黨員——和十幾位激進派的非洲年輕人，一起創立「黑佬防衛委員會」（La Comité de Défense de la Race Nègre, CDRN），承繼「全球黑人防衛聯盟」，並且將去

世的列寧選為榮譽主席。這也就代表「黑佬防衛委員會」比較傾向共產黨和貿易聯盟，站在共產國際的陣線。拉明·桑戈爾在1924年他從自己的祖國塞內加爾到了法國之後就參加「法國共產黨」。在大戰期間他為法軍作戰，因此塞內加爾拒絕讓他回國定居。這是基於技術性規定之類的理由，但事實上是因為他在「殖民聯盟」一直十分活躍（Dewitte 1985）。在1925年他從黨內黯然引退，因為共產黨不願意強調種族的政治議題——他認為黨的策略近似迪亞涅的立場，令人憂慮。在桑戈爾的領導之下，「黑佬防衛委員會」增加來自基層的群眾，並協助行動派，如胡努在塞內加爾的政治活動，而「黑佬防衛委員會」的貿易聯盟也紛紛在主要港口，如馬賽（Marseilles）和勒阿弗爾（Le Havre），建立組織分部，其主要目標就是讓黑人的水手、工人和退伍的軍人更加激進。有了佛瑞（Emile Faure），和激進的共產黨員兼「反帝國主義聯盟」成員加藍·庫雅特的共同協助，再加上「共產黨」的經濟資助，「黑佬防衛委員會」出版一份期刊，在法屬非洲廣泛發行。該期刊名為《黑佬之聲》（*La Voix des négres*），後改為《黑種人》（*La Race nègre*）。在《黑佬之聲》中，桑戈爾將「黑佬防衛委員會」的策略訂為「和真正為被壓迫人民的解放和世界革命而奮鬥的組織，永遠一起合作」（Langley 1973: 304）。這份期刊反映其母體組織（parent organization）的強硬態度；強力批判法國殖民政治，鼓吹殖民地完全獨立。桑戈爾和加藍·庫雅特堅守共產主義的立場，認為可以由階級戰爭對抗帝國主義來達成目標，而佛瑞則越來越鼓吹反殖民獨立運動，認為獨立運動才能回歸非洲固有的政治形式。這本期刊和《大陸》一起關心世界上所有反殖民運動的最大福祉，並且刊登各家各派的著作，如在中南半島的胡志明的著作，也報導各組織的活動，包括「北非之星」、倫敦的「西非學生聯會」，還有加維的運動和其他在美國的非美組織，如「美國有色人種促進協會」等（Langley 1973: 306）。

桑戈爾本人最廣為人知的就是他對法國殖民主義嚴加撻伐，以及他猛烈的民族主義。他在1927年參加「反帝國主義聯盟」開幕會議的演講，清楚顯示他所堅持的路線。該次演講內容刊登在《黑佬之聲》的第二期，由講詞中可看出他和胡努的政治立場不但多所雷同，而且使用的辭令技巧也類似，例如引用令人痛恨，非常殘暴的事件或殘忍的懲罰，讓讀者或聽眾對這法國殖民政府統治的兇殘有如歷歷在目。桑戈爾描述自己奉獻於世界革命，由此可見他的共產主義非常明顯。然而，他的優先順序還是以非洲為中心，他寫下「黑佬防衛委員會」的目標：

一個廣納非洲年輕人的組織決心要採取步驟，為他們的種族帶來解放。你們或許已經注意到，我們這個種族是世界上最受壓迫的種族。這是一個受到全世界所有帝國主義者壓迫的種族；我們的生死操縱在敵人的手裡。（Langley 1979: 256）

桑戈爾接著攻擊以「文明開化任務」為名在殖民地進行的種種暴行；他批評帝國的強迫勞動，還有帝國之間買賣殖民地宛如奴隸販賣的現代版，他還攻訐法國公民和法屬（殖民地）人民在戰後退伍所得天壤之別，並且抗議同化政策在實踐上的矛盾：當法國需要殖民地當地的居民作戰或貢獻勞力的時候，他們就被視為法國人，「但是」，桑戈爾指出：「當談到應該給我們應有的權利時，我們就不是法國人，而是黑人了」（ibid.: 260）。桑戈爾的演講讓與會代表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讓法國政府特別注意，因此他從布魯塞爾回到巴黎時便被遭逮捕。後來因他的健康狀況不佳而被釋放，他撐不過當年年底，死於肺結核。

「黑佬防衛委員會」的《黑佬之聲》在1927年發行兩期，其中的第一期有一篇〈致所有非洲人〉的宣言，呼籲非洲國家一定要站起來，再一次興盛壯大，用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黑佬防衛委員會」的獨特立場就是結合兩個訴求，一是以全面性的激進反殖民主義，要求讓所有被殖民國家獨立，這一點只有〈共產國際宣言〉可以比擬，另一個訴求毫無疑問地受到加維的啟發，呼籲必需要有一個以保衛全世界「黑種人」為基礎的政治。「黑佬防衛委員會」在經濟上受到「法國共產黨」資助的事實顯示，「法國共產黨」將「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的一般原則付諸實現；根據該次會議，各地共產黨應支持反殖民革命運動。共產主義的原則因應特殊的非洲政治而結合與改變，在桑戈爾和他的委員會手中達成，也預告了泛非洲主義將轉變成社會主義運動。

桑戈爾的激進主義延伸到文化，以及更主流的政治問題。米勒在一篇重要的文章中，特別提到桑戈爾將胡努的「全球黑人防衛聯盟」更名為「黑佬防衛委員會」，桑戈爾強調新名稱中的「黑佬」（négre）是非常有意義的。在《黑佬之聲》第一期的第一頁，有一篇名為〈黑佬這個字〉（‘Le Mot négre’），借用米勒的話來說，該文主張「透過語言恢復屬於黑色人種的特質——後來這個願景所擊劃的，都只被歸結於立歐玻·桑戈爾和塞傑爾所主張的『黑人精神』（Miller 1998: 33）。事實上，「黑佬防衛委員會」想要藉著恢復所謂的「我們時代的髒字」，藉此對抗「有色人種」（hommes de couleur）、「黑種人」（noirs）和「黑佬」之間的階級區分。法國人使用這三個字時，實際上分別指三個階級——「有色人種」指的是「有文明進化」的非洲人，「黑種人」指未受教育的非洲工人，而「黑佬」則指原始鄙俗的農民。因此，法國的種族論述同時具有一種以同化的程度做為基礎的文化階級區分。如此一來，法屬非洲人在自己之間也會有區分。桑戈爾以「黑佬」做為抗拒的政治表達，他認為像「黑佬／黑鬼子」（negro/nigger）這樣「最低下」的字眼應該變成泛非洲主義的專門用語，因此所有非洲人和非洲人的後裔才能一起認同：

「黑佬防衛委員會」的年輕人努力將這個字從你們一直在拉扯它的污泥中挑檢回

來，他們把這件事當成一個職責，要讓「黑佬／黑鬼子」成為一個象徵，成為我們種族的名字。

現在我們的土地，我們的權利，我們的自由，通通不再屬於我們，所以我們要緊緊抓住我們祖先留給我們僅有的遺產，以及我們皮膚顏色的光澤。這個名字是我們的：我們屬於它！……[我們]把它當成一個抗拒的吶喊：一面旗幟。我們要光輝榮耀地稱自己「黑佬」，而且是以大寫的N做為開頭。（引述自 Miller 1998: 35）

這些話出現在致力於保衛非洲人的期刊中的第一期，特別鏗鏘有力，而且很有原創性，鼓吹一種新的身分認同，以拒絕帝國宰制的負面語言做為開始。許多後來的弱勢運動從此採用這種模式，以自我命名或者詆毀（denigration——「詆毀」一詞流露出歐洲文化種族主義其來有自<sup>譯註2</sup>）標籤的再挪用（reappropriating），做為回復正面身分認同的基礎，變成政治反抗和賦權的一個重要行動。「黑佬防衛委員會」宣言中首度闡釋了後來發展「黑人精神」運動的策略，雖然在這個宣言中提到的復興（renewal）主要還是政治、語言和種族的面向，沒有觸及立歐玻·桑戈爾和塞傑爾所提倡的回歸傳統非洲文化。相反地，拉明·桑戈爾強力的政治策略為「黑人精神」提供一個非常不同的淵源脈絡，迥異於文學史上的說法。「黑人精神」在1930年代在巴黎並非只是以文化運動的形式發展出來：它的形成背景正是法語系非洲在高度政治化的環境，但是所有解放運動的策略陣仗中，卻尚未運用到文化革命的資源。因此，「黑人精神」的觀念為解放運動策略添加了文化的元素，讓非洲社會政治哲學的發展更加全面性，因此，源自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才會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和非洲文化的特定需要相結合。

桑戈爾同時也撰寫小說《侵害家園》（*La Violation d'un pays*, 1927），一部具有震撼力的寓言故事，控訴西方殖民勢力以侵略和暴力破壞非洲在前殖民時期的和諧寧靜，這也是法語系非洲第一部反對殖民主義，描述帝國宰制和剝削體系的小說（Senghor 1927; Miller 1998: 25-8）。故事中許多地方正是桑戈爾所關心的主題——徵召非洲人為法國打仗的罪行，以及後來退伍士兵所受到的無恥對待。但是故事的最後充滿了鬥志，因為殖民地爆發天啓預言式的世界革命，對抗帝國勢力。這部小說的生產過程有一點反諷——桑戈爾撰寫、出版這本書的時候是在1920年代，在巴黎自由的氛圍中（雖然他本人一直受到情報局的監視）。但是小說卻被禁止輸入非洲，寄過去的書也大部分在抵達時被當局攔截：

譯註2 denigrate由de和nigrare組成，de是「降低，貶損」，nigrare就是to blacken（弄黑）；其字源nigr-就是niger。

這段時期，在法國有積極而有組織的反抗殖民行動，但是另一方面，殖民地卻有效箝制異議，這兩方面的落差在闖關失敗的嘗試中，戲劇性地顯示出來。放逐法國才讓拉明·桑戈爾有機會表述他的反殖民主義，而共產黨也提供了必要的協助，但是非洲的殖民勢力卻毫不費力就把這些威脅除掉了。（Miller 1998: 28）

而充滿自由氛圍的倫敦和英屬殖民地之間也存在這種差異，甚至里斯本和葡屬殖民地之間也有。無論是被迫放逐或是自願放逐的行動分子，在宗主國的首都相遇，很快地變成接觸聯繫，一起在帝國的心臟地帶發展反殖民組織。他們和殖民地的聯繫雖然被警方緊密監督，但卻不一定會因為警察的監視就完全沒有效用。一些知識分子，如印度的羅伊仰賴郵政，因此很容易被監控，但是像桑戈爾和加藍·庫雅特在法國和西非發展政治組織，並和其他同路的政治組織和貿易聯盟建立了緊密的聯繫，他們所遭遇的困難就少多了。僅有為數甚少的《侵害家園》傳到塞內加爾的人民手中，但是以巴黎為基地的一些激進派報紙和雜誌真的在殖民地完全被壓制，卻自由地在殖民的場域私下流通。

## 五、加藍·庫雅特和「黑佬防衛同盟」（LDRN）

263

就像許多反殖民運動一樣，「黑佬防衛委員會」的成員有派系之分，對於政治議題的先後順序以及激進作法的程度差別的程度，各自有不同的策略。就拿「黑佬防衛委員會」的例子來說，從安地列斯的角度和從非洲的角度所主張的觀點和先後順序各有不同，兩者之間的緊張日趨嚴重。由於派系的紛爭，在1927年夏天，桑戈爾和加藍·庫雅特退出「黑佬防衛委員會」，另組「黑佬防衛同盟」（Ligue de Défense de la Race Nègre, LDRN）。而「黑佬防衛委員會」後來就大幅更名為「黑種人福祉保衛委員會」（Comité de Défense des Intérêts de la Race Noire），它所出版的雜誌《黑人種族》（*La Race nègre*）仍舊維持《黑佬之聲》的政治策略，第一期的語言政治更進一步，收入一篇文章是以一種被稱為「小黑人」（*petit nègre*）的語言所撰寫的文章（Dewitte 1985: 150-7; Miller 1998: 43-4）。

1929年桑戈爾英年早逝之後，「黑佬防衛同盟」由加藍·庫雅特繼續領導。加藍·庫雅特來自法屬殖民地蘇丹，他是巴黎大學的文學系學生。他也是共產黨員，而且是許多共產黨邊緣政治組織的內部，甚至是外部的行動派。在1930年代早期時，他和潘得墨過從甚密。加藍·庫雅特和潘得墨兩人顯然有許多共同點：以共產主義為原則並支持共產主義，但是兩人都抗拒黨的中央控制，另組一些以非洲政治認同為中心規則的組織。加藍·庫雅特似乎同時屬於許多不同組織，有些歸屬

共產黨，有些不是，因此，即使到現在，我們很難對他的政治活動有比較清楚的瞭解：沒有他的傳記，他的作品也沒有被收集。在他的領導之下「黑佬防衛同盟」和「共產黨」、共產國際、「國際紅色勞動工會」等組織，以及共產黨的貿易聯盟緊密聯繫。在一次類似拉明·桑戈爾所領導的大型活動中，加藍·庫雅特造訪一些法國港口，如波爾多（Bordeaux）和馬賽港等，開始在各港口建立分部、貿易聯盟和「黑佬防衛同盟」的討論小組，甚至遠達法屬非洲，也就是「黑佬防衛同盟」在1929年曾參與剛果起義的地方。透過加藍·庫雅特，「黑佬防衛同盟」和共產黨的「黑人勞工國際聯合會」（Comité Syndical International des Ouvriers Nègres），以及潘得墨的《黑人勞工》有了聯繫。「黑佬防衛同盟」同時也哈吉的「北非之星」，「中南半島聯會」（Association des Indochinois）以及如「水手國際社」（Club International des Marins）之類組織合作，透過它們，被禁的革命文獻就輾轉送到水手中，然後傳到各殖民地流傳。「黑佬防衛同盟」在籌組「殖民同盟」（Rassemblement Coloniale）上是主要的推手，這是一個重要的泛民族主義的政治組織，希望團結，北非、西非、馬達加斯加和中南半島等法國殖民地的民族主義運動（Padmore 1956: 335）。1930年，加藍·庫雅特和來自塞內加爾的佛瑞，海地的沙如（Leio Sajous）〔納道爾（Paulette Nardal）所辦的文學期刊《黑人評論》（*La Revue du monde noir*）的編輯〕，一起成立了「巴黎黑人學術全球委員會」（Comité Universel de l'Institut Nègre de Paris）——一個類似倫敦的「西非學生聯會」的組織。加藍·庫雅特的活力十足，以反殖民運動的理論和政治立場，立下實際的範例指引如何在實踐時以基層群眾活動建立有活力的組織，並得到群眾的支持。這些離散的行動派都是真正的「邊緣知識分子」，在核心和周邊、中心和邊緣之間遊走，在兩者之間建立了有力的連線。在帝國首都的中心，他們本身屬於邊緣，但是他們絕非只是映照的鏡子，也絕非立場曖昧含糊（JanMohamed 1992）。有了這些人就沒有距離感、斷裂感和脫離感，除了針對那些透過教育和思想同化他們的殖民意識形態保持批判的距離之外，他們為自己的政治獻身，他們的立場清晰，他們的目標清楚。

「黑佬防衛同盟」的政治規劃奠基於直接的要求殖民自決和獨立，這一點和共產黨的目標一致。它持續胡努開始的路線，一直攻擊「非洲的歐洲人」，代表人物就是保守派的非裔法國人迪亞涅和康代思（Gratien Candace）（來自瓜得洛普島），他們還攻擊法國的同化政策，因為同化在實際上只是讓法國殖民地的拓居者有了政治代表權而已（Langley 1973: 310-311）。加藍·庫雅特特別先主動透過貿易聯盟組織的運作和激發，不遺餘力地結合反殖民主義、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這一點充分反映在「黑佬防衛同盟」每個月出版的《黑人種族》。這個該月刊從1930年由「黑佬防衛同盟」中央局局長，塞內加爾的佛瑞擔任編輯。該期刊強烈反殖民立場偏向

264



國際主義，所以對非洲人在非洲和美洲的鬥爭一直維持泛非洲主義的觀點，注重強迫勞動這一類的議題。加藍·庫雅特離開之後，《黑人種族》比較沒有那麼注重全球革命。它繼續要求非洲殖民地的獨立，但也同時更加強認同非洲的民族、文化和種族政治（Dewitte 1985: 171-216）。

從1927至1930年擔任「黑佬防衛同盟」秘書長的加藍·庫雅特，在1931年的內部分裂之後，連同多位同仁一起離開「黑佬防衛同盟」，轉而投效另一個更加強硬派的「黑人勞工聯盟」（Union des Travailleurs Nègre, UTN）——一個公開認屬於「法國共產黨」的組織。透過「黑人聯合組織」（Syndicate Nègre），加藍·庫雅特開始出版另一份立場更加強硬的新期刊《黑佬的吶喊》（*La Cri des nègre*），毫不留情地揭露法國在殖民時所做所為的種種真相（Langley 1973: 319-21）。維持一貫要求獨立的「黑人勞工聯盟」宣布與「共產黨」結盟，因為「只有『共產黨』在其規劃中，明文寫下黑人的權利，以及黑人政治自由和民族獨立的願景」（ibid.: 320）。1934年，加藍·庫雅特和潘得墨被逐出「共產國際」，兩人的政治更明顯走向非洲主義，但是在仍舊以社會主義為方針。透過他們和貿易聯盟組織的相互聯繫，加藍·庫雅特和潘得墨接觸漸繁，就開始對他講述泛非洲政治的必要性。五年前，也就是1929年，加藍·庫雅特邀請杜博斯到巴黎（但是沒有接到杜博斯的回音，因為信被法國警察沒收）；1934年，在加藍·庫雅特的提議下，潘得墨親自寫信給杜博斯，邀請他參加即將舉辦的「黑人世界團結大會」（Negro World Unity Conference）（Hooker 1967: 37-40; Langley 1973: 320）。杜博斯親臨巴黎，並且和這兩位激進的行動派結盟，這是一個非常具有意義的歷史時刻：三位來自美國、加勒比海和非洲的非洲人，代表三種——美語、英語的和法語系非洲——傳統的結合，他們的結盟象徵泛非洲主義開始成爲一個將真正的運動根苗散播到所有離散非洲人的政治運動。但是，後來巴黎的情勢對反殖民行動分子越來越不利。《黑佬的吶喊》被禁；1937年，「北非之星」、「黑佬防衛同盟」、「殖民同盟」被布魯姆（Léon Blum）的新「人民陣線」政府鎮壓。

正如英語系統的行動派一樣，雖然有這些熱烈的行動，但是就直接的政治影響力來看，這些不同的反殖民組織成效有限。從1937年之後，反殖民民族主義行動派組織實際上從巴黎消失了。加藍·庫雅特在德軍占領時期被納粹處死。但是，胡努、桑戈爾和加藍·庫雅特，以及其他行動派爲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所出現的獨立運動奠定許多根基。他們在殖民地建立了鞏固的政治基層結構，以及其他各種形式的組織。同樣重要的是，他們也建立了一種主動的政治意識，挑戰並改變被法國殖民的文化意識形態。這樣的政治意識之所以延續下來，並且在1930年代晚期和1940年代發展，主要就是透過文化政治。上面提到的直接形式的政治活動後來被鎮壓了，但是它的活力轉變成另外一種更「合法」的表現形式。英語系的行動分子

多半是政治哲學家，但是法屬加勒比海和非洲的反殖民革命領袖，如塞傑爾和立歐波·桑戈爾，兩人都是詩人。

## 六、文化轉向：黑人精神

政治活動的熱烈也促成非洲1930年代出現最著名的政治和文化運動——「黑人精神」。「黑人精神」一詞最先是塞傑爾在他的《返國手記》（*Cahier d'un retour au pays natal*, 1939）中使用，但是這個觀念其實在1930年代的文化刊物早就出現了，例如沙如的《黑人評論》（*La Revue dumonde Noir*），以及超現實派的馬克思主義期刊《合法防衛》（*Légitime défense*）中，——1932年的一期由一群安地列斯學生寫的文章中，即可見其端倪。現在，「黑人精神」通常被攻擊的原因是它被認爲含有本質主義和種族主義，或者是因爲它缺乏政治的激進主義而指責它對於法國文化看起來是採接納的態度。但是這樣的評論只能在脫離現實，把它當成在脫離政治和社會狀況的情境中產生，才能成立。「黑人精神」的特殊貢獻絕對不在於它扣連反殖民政治，因爲它的脈絡和架構已經是政治激進主義中既有的一環。沙特有一段話被法農引用在他的《受詛咒的大地》中，他認爲黑人精神的觀念具有「辯證性」：

黑人……創造出一種反種族主義的種族主義。黑人絕對不是想要宰制世界；他要的就是要消滅種族特權，無論是顯現在什麼地方的特權；他決心和所有被壓迫的有色人種團結在一起。「黑人精神」這個主觀的、存在哲學的種族觀念，就像黑格爾描述中的「轉化」（“passes”），一下成爲客觀的、建設性的，正確的無產階級觀念。……最積極鼓吹「黑人精神」觀念的人同時也是強硬派馬克思主義者，這不是偶然的。（Sartre 1976b: 59）

266

所有提倡「黑人精神」的人都對「轉化」都很嫻熟：不是悄悄轉化到白人的社會，而是在種族具體而特殊的情況，以及普世共通的、抽象的階級概念之間遊走，找尋一個第三度空間，藉由種族主義和反種族主義相互對立的價值觀，產生一個沒有種族主義的新人文主義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人類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定義。法語系的行動派自由地在這兩個極端中遊走，有些人徘徊在最初的階段，有些人大膽地跨到另一個階段，將負面經驗逆轉、超越。就像許多參與這樣運動的人一樣，大家都不是固守一個立場，包括塞傑爾、達馬士（Léon Damas）、普里斯·馬爾斯（Jean Price-Mars）和立歐波·桑戈爾等人，他們以當時巴黎各種可運用的反殖民政治，探討非洲文化和政治問題。因此，「黑人精神」運動就是在非美民族主

義和反殖民共產主義相互流動和變化的混合背景中建構起來。「黑人精神」運動最早的政治理念侷限在透過憲法要求平等的公民和政治權利，從1940年代之後，它的理念漸漸被運用在獨立運動。「黑人精神」的發展成為已經是非常清晰明確的反殖民運動中的一部分，散發相當可觀政治力量，後來這股力量之所以減弱是因為除了非洲文化完全被法國同化以外，非洲政治和文化的身分認同在理論的闡述上根本不足。雖然胡努、桑戈爾和加藍·庫雅特都想從共通的共產反帝國主義，走向更非洲主義的立場，提倡以完全政治獨立做為最激烈的解決之道，但是他們都不曾完整地重新定義他們自己的身分認同——西非文化面對法國文化的身分認同。加維的理念中也沒有扣連非洲文化的特殊性，加勒比海和西非的行動派之間因此而產生區分。「黑人精神」的發展扣連非洲文化認同的新形式，可以同時延伸到加勒比海和西非。它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是因為有一些身在巴黎和法國殖民地的非洲人，在較寬廣的歷史知識和文化鬥爭的脈絡中，為抵抗法國「文明」中「開化任務」的意識形態和法國人理所當然的優越感，企圖要重新建立、肯定非洲文化而發展出來。「黑人精神」從來就不只是限於文學的運動（Jack 1996; Langley 1973: 316; Markovitz 1969; Miller 1998）。

「黑人精神」運動確實將自己清楚地定位於既有的政治立場的光譜中。根據1934年《黑人種族》中一篇文章的觀察，離散的非洲政治有三個集團：「永遠有三種聯盟：一種是本質激進，排他性強，另外兩種集團中，黑人的利益以及右派和左派白人階級的利益，毫無希望地混合在一起」。這個問題可以歸納為是否具有或缺乏（presence or absence）「混種」（*métissage*）的問題。正如米勒所觀察的，《黑人種族》在1934年重新問世的時候，一方面維持它激進的反殖民和親共的立場，但另一方面卻更加傾向種族主義，拒絕所有形式的「混種」，無論是實際的或是文化的混種（Miller 1998: 45）。它所接受的是第一類的聯盟「本質激進，排他性強」，因此對是否獨立的立場變成堅決主張獨立。站在這樣的立場，即使是人文主義和社會主義都被視為源自非洲傳統社會，而不是來自西方：

我們希望政治能夠獨立，然後才能藉此恢復我們古老的黑人文明。恢復我們祖先舊有的習俗、哲學和社會組織是極有必要的。……我們的種族是人類體系之冠，很快地，大家會感覺到對這個體系的需求。

我們黑人四海之內皆兄弟，站在一起對抗西方人凶猛的個人主義。  
（Langley 1973: 323）

《黑人種族》攻擊新的「黑人精神」運動中的知識菁英主義，指責它使用非本土形式，尤其是它在文化上的綜合，或者說，「黑人精神」的觀念在實際上根本不

夠本質主義（事實上，現在有些人對它的批評卻正好相反，認為「黑人精神」太本質主義了）。迪亞涅者流的保守派認為非洲人的利益可以結合在歐洲人的權利中，除了這個立場之外，1930年代以本質主義和文化混合在巴黎所發展出來的兩個立場，到現在依然存在：第一個立場是非洲文化分離主義；第二種立場是非洲和歐洲文化調和。第二個立場的重點在，到底是什麼樣的折衷調和是加勒比海式的「混種」——個別的元素相互融合而產生一個新的「克里奧化」的產物，或者用立歐玻·桑戈爾的隱喻來說，產生「有機體」——或者說是「越界」（*transgressive*）接枝的有機體——將法國文化的枝接種到非洲的樹上，同化而後轉變，將主導文化結構逆轉過來，變成奧帝斯的「文化互化」的概念。另外一種調合就比較激烈，可能包含一種無法解決的猛烈、和異化的文化混合。非洲和加勒比海法語系的思想脈絡所顯示的是不斷實驗胡努所謂的「內捲化」的形式（將同化視為轉譯、轉移（*transmigration*）或喬伊斯概念中的輪迴），以接枝、混合、銜接，創造出一個新文化——一個文化差異的辯證性斷裂的產物。根據米勒的觀察，這種文化政治的理論豐富多樣，在許多方面近似後殖民理論所關注的主要議題，雖然這些理論大部分並非歷史理論持續分析的主體：

儘管殖民世界有兩極的聲譽，但是相較於後殖民時期顯得格外複雜的狀況，它其實毫不遜色，同樣都有含混曖昧之處。遺忘殖民主義不是沒有後果的：讓人以為某種文化模式（例如「混種」）是比較新的觀念，甚至將之大書特書，大過原本的真相……。只有回頭挖掘歷史，我們才能看到先前已經有了這些模式，看到它們如何展現在殖民的脈絡中，如此才能更加瞭解對這些模式所蘊含的完整意義。（Miller 1998: 3）

至於第二個比較複雜的文化交流立場，有一個新的方式隨著1947年塞傑爾的《返國手記》的出版，以及在巴黎和達卡（Darkar）出版的評論《非洲現身》（*Présence Africanine*）開始浮現。《非洲現身》由迪奧普主編，一直到現在仍繼續出刊。該期刊最初的目標是「定義非洲的本源（originality），加速將之帶入現代世界中」，穆丁比加油添醋，成為認同以「文學上的強力主張，用自己的理性建立再現的新系統，以去除殖民主義所帶來的文化異化」（Mudimbe 1992: xxii, 5）。這個期刊也提昇了需要有非洲歷史的觀念，迪奧普的書《黑種人的民族與文化》（*Nations nègres et culture*, 1954）就是有意建立這樣一個重要的基礎。1954年之後，這本期刊更偏向民族主義，將文化賦權和更強力的殖民主義對抗做結合。它的出發點不是回歸到完全純正的非洲，而是把它當成自覺的文化混合。迪奧普描述在巴黎的非洲學生如何出版這個期刊，這些學生「組成團體，去研究那些形塑我們的各種情況和特性」：

我們既不是白種人，不是黃種人，也不是黑種人，我們已無法完全回到我們祖先的傳統，也不可能同化於歐洲——我們覺得自己構成了新種族，心智上混雜的新種族〔「心態上的混種」(mentalement métissée)〕，但是這個新種族卻未曾擁有認識本身根源的覺醒，也沒有將此一根源揭櫫於世。那我們就是失去根源的人了嗎？我們一直都沒有定義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在某個程度上，我們在兩個世界之間游離自棄，我們在雙方都找不到可認定的意義，對雙方而言，我們都是陌生人。(Diop 1947: 186)

用奇怪的隱喻來闡釋兩種文化混合的產物所代表的意義，以強烈種族意識的字眼——「心態上的混種」——暗示接受文化和知識的雜揉，這種心態一直是法語系非洲和加勒比海的著作主軸——從法農到塞傑爾，到格利桑，到桑戈爾都是一樣。在法國的同化的脈絡中，這些人本身都是法國教育系統的產物，因此和他們成長時所接受的本土文化逐漸疏離，所以他們需要從雙重的影響中創出第三個空間——屬於離散或文化移民的空間，用法語來對抗法國，這就是各家各派的行動分子所運用的模式。雖然有些激進的期刊登載一些以方言或其他形式發表的文章，但是一般說來，法語系統的行動派以法語發聲從未受到質疑。正如沙特在他為桑戈爾的《非洲與馬達加斯加法語新詩選集》(Anthologie de la nouvelle poésie nègre et malgache de langue française, 1948)寫的前言中指出，以法語發聲的確製造一些特殊的問題，但同時也提供了解決之方：

因為字來自思想，當黑人以法文宣稱拒絕法國文化時，他用這一隻手接下了另外一隻手所推掉的。他將敵人的思想機制烙印在自己身上，同時也將本身潤色。(Sartre 1976b: 23)

269 這個辯證的——我們幾乎可以說是解構的——立場就是被殖民的主體所尋求的「保存某種他所批判的真理價值，以此做為工具」，這仍然是法語系非洲和加勒比海思想的中心(Derrida 1978: 284)。

## 七、立歐玻·桑戈爾

加藍·庫雅特的《黑佬的吶喊》是法語系統的共產期刊中最激進的，其中有一位撰稿者立歐玻·桑戈爾，他的政治實在很難和這種政治行動主義聯想在一起(Miller 1998: 46-47)。雖然他的文化政治常被批評是菁英主義，他的「大非洲」<sup>譯註3</sup>觀念被斥為「只不過是歐洲中心思想之本體化，將之投射、呈現為非洲人之自己想

<sup>譯註3</sup> Africanité:主張將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Berber)納入非洲人。

法」，但是他和法農都體認到，完全回到前殖民傳統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且，隨著文化宰制而來的，或者說隨著對抗文化宰制而來的，必須有某種辯證性的融合(Serequeberhan 1994: 47)。而社會主義是這種協調融合的支軸。

雖然越來越強調文化和精神層面，法語的泛非洲主義在政治方面和英語系的泛非洲主義一樣，仍舊屹立不搖地投效社會主義的操作。幾內亞總統杜爾，同時也是「非洲民主聯盟」(Rassemblement Démocratique Africain)的創立人之一，對非洲社會主義的擁護最接近恩克魯瑪，他認為唯有如此才能走向泛非洲的團結(Touré 1959; 1976)。在眾多法語系非洲知識分子和政治領袖中，例如塞內加爾的主要反對者狄亞(Mamdaou Dia)，他的《非洲民族與世界一體》(Nations africaines et solidarité mondiale, 1960)曾被法農大幅引用在他的《受詛咒的大地》，後來他也有幾本談論伊斯蘭人文主義的重要著作，但是這些人的重要性還是比不上傑出的桑戈爾。他在1945年被選為代表參加「法國國民會議」，在1960年被選為總統之後，桑戈爾漸漸將「黑人精神」的觀念運用到非洲社會主義——一種被桑戈爾明白定義為對抗史達林模式的「開放的社會主義」(Senghor 1964a: 63; Vaillant 1990)。他認為非洲原本就是以社會主義為導向，因為它的文化大致上就是「公有的」文化，而不是以階級差異和剝削為基礎的文化：「我們在歐洲人來到之前，就已經是社會主義了」，他如此寫道(Senghor 1964a: 49)。因此，非洲社會主義乃是歐洲社會主義的先驅，但是非洲的社會主義形式被殖民主義消滅了。這個觀念成了泛非洲主義者，以及其他支持這個理念的人的共同立場，例如桑戈爾的朋友塞傑爾在《殖民主義論述》(Césaire 1972: 23)中有同樣的觀念；潘得墨也同樣主張非洲社會早就以「原始的共產主義」形式做基礎(Friedland and Rosberg 1964: 223)；尼雷爾也認為非洲傳統社會早就有社會主義和民主的根苗，如此孕育出來的文化價值為社會提供再生(regeneration)的基礎和來源(Nyerere 1968: 12)。

儘管桑戈爾強調非洲文化和精神的團結，並在1950年代呼籲以美國的模式創造「非洲合眾國」，但是在實際的作法上，他對於泛非洲主義化為政治運動就顯得比較謹慎。他強調「非洲和馬爾加什島聯盟」(Malgache，大部分是以前的法屬南撒哈拉沙漠非洲)是非洲獨立國家之間多國橫向團結，並和法國和歐洲維持「縱向」歸屬關係運作。他指出：畢竟，英語系非洲國家在獨立之後仍舊是大英帝國的成員(Senghor 1964a: 64, 88-90)。因此，在實際上，他的泛非洲主義把焦點放在締造一個先前法國在西非的殖民地所組成的國家。但是桑戈爾的泛非洲主義和潘得墨不同，潘得墨的目標是經濟的自足，而桑戈爾強調國際之間的國家獨立，他認為這一點絕不可忽視：「現代國家是去疆界化(de-territorialized)，在非洲大陸如此，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亦如此」(ibid.: 63)。因此，在去疆界化的情況下，真正的獨立是透過結盟和聯合，也就是在實際上透過和其他法語系的非洲文化聯盟。把桑戈爾的

作品和恩克魯瑪在《內在覺醒》兩相比較，其知識背景的不同就清楚地顯現出來：桑戈爾的作品處處流露他和當代法國哲學文化的交流，而恩克魯瑪則多半是在英美哲學的脈絡中運作。《內在覺醒》最後還有附錄，恩克魯瑪為殖民、解放、新殖民主義，以及體現哲學內在覺醒的社會主義，這一連串的過程發展出一個形式的邏輯數理等號〔例如，「某地的解放是因為處在狀況（Nkrumah 1970: 109）。

桑戈爾、法農和其他法語系的政治知識分子都是在法國知識脈絡中運作，這就是為何他們的作品在當代後殖民理論中尤其具有影響力，因為後殖民理論有一部分是依據馬克思主義和法國後解構主義思想的辯證發展而來的。有些人認為後解構主義只是當代的發明，和反殖民主義的歷史沒有關聯，這樣的主張完全只從英語系統的角度觀察。後殖民理論所依據的就是反殖民理論全盤的文化和知識脈絡：法語系非洲社會主義就是後殖民最接近的直接先驅之一。

在非洲知識分子當中，桑戈爾最積極全面參與1945年之後的運動，也就是由沙特所開創，強調馬克思的人文主義精神，著重他早期將焦點放在異化對後來決定論（determinism）的影響，就桑戈爾的觀點來看，這個決定論的運作「傷害個人和他的自由」（Senghor 1964a: 76; 1964b; 1983, II: 29-44; Sartre 1948）。沙特的存在主義馬克思思想的核心就是強調必需維持人類尊嚴和自由，這一個準則對法農有深遠的影響。雖然法農和桑戈爾在政治上有差異，但是他在《受詛咒的大地》的結尾也呼籲要回復到一個完整意涵的新人文主義的觀念，這是歐洲人實際上未曾達到過的境地（正如塞傑爾所說的：「在西方時常冒人文主義這個字的時候，他們其實離能實現真正人文主義還遠得很，真正的人文主義是被拿來做為普世之衡量準矩」）（Césaire 1972: 56）。就像法農一樣，桑戈爾也主張，如果有一個普世共通的人文主義，那麼這樣的人文主義尚有待建立。他兩人和後來的尼雷爾、卡翁達所提倡的新「開放」人文主義（「人還是我們考慮的第一要素：他構成我們的衡量標準」）絕對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也不是一個在所有時代所有地方都共通的準則，而是一個辯證性的觀念。在這樣的概念中，「唯有透過個人本身的歷史、地理和族群的背景，他才能掌握人類一些永恆的特質」（Senghor 1964a: 65, 78）。這個特殊性就是新的非洲人不但要接納，甚至要超越殖民主義的文化和政治事實的餘蔭，以及因為「去權」而經歷的羞辱。就和法農一樣，桑戈爾也深深被沙特的黑格爾馬克思主義所強調的存在即是異化的觀念所吸引，因為異化不只是歐洲工人階級永遠的狀況，更是受到殖民主義宰制的文化和人民所面臨的情形。法農在他的《黑皮膚，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中從心理影響層面分析這個情況。馬克思的異化觀念提供一種辯證性的概念，異化可成為新的事物，新的情勢，新的人文主義出現的基礎，然後藉此達到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去異化（disalienation）。

桑戈爾是一個天主教徒，同時也受到德日進（Teilhard de Chardin）的人文基督教所影響；而德日進也常隨意引用沙特的存在主義。這種存在主義現象學本身受到哲學和科學史的發展所影響，尤其是卡維壘（Cavaillés）和巴謝拉（Bachelard）的作品，它們在許多現在有關後結構主義和後殖民理論思想的引介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事實上，這些思想早在反殖民時期就早已成形且已問世。例如，在桑戈爾的《論非洲的社會主義》（*On African Socialism*）中，桑戈爾評論道：

經過最細微、最精進、最令人振奮的研究之後，不連續、不確定的因素將顯現在所有事情的底層。……用這樣的新觀點來看世界，真實本身——同樣的那個現實——對我們而言，似乎是多重的，至少有多樣而矛盾的面貌。（Senghor 1964a: 70）

修正客觀的現實論思想，拋開假設，這一點仍可見於馬克思的著作中，如此才可能把把觀察者從被觀察的事物中抽離。取而代之的是研究者在揭開事物時的思想，他／她一方面揭露，但同時也再度遮蓋；這種客觀、修正的觀念引導我們重新評估，重新評定各種經驗知識可能呈現的形式，而這正是非洲知識體系的一貫基礎。因此，非洲馬克思主義以一種「結合並超越」的經驗系統發展。桑戈爾主張非洲思想並沒有像當代列維·布留爾（Lévy-Bruhl）等人的人類學一樣，將「他者」（the Other）客體化，而是以同理心理解「他者」：「他馬上就受到感動，在『他者』的浪波中，以離心力從主體流向客體……拋開自己的個性，認同『他者』，將自己置之死地而在『他者』復生。……主體和客體在知識的行為上成為面對面的辯證（Senghor 1964a: 71-73; cf. Mudimbe 1992）。這不只是把歐洲人類學將「非洲特性」（Africanness）為「他者」的觀念內化（internalization），就像桑戈爾的「大非洲」有時就是被這樣形容是將「他者」內化的表現（Serequeberhan 1994: 49）。桑戈爾和法農一樣，也是非常重視沙特所闡述的存在和異己（alterity）（Fuss 1994: 22-24; Sartre 1958）。這種將「他者」銘刻在自己身上的能力是後來列維納斯（Levinas）和德希達哲學探索的根基，桑戈爾認為這種能力正是非洲人之所以理性的一個特殊工具（instrument）。他認為這個能力不是要和古典的歐洲理性對立，而是與之共生共存，即使是挑戰它的基礎——姑且不論時代的錯誤，用今天的角度來說，就是德希達式的基礎——「傳統上，非洲黑人的理性具有辯證性，超越認同、非矛盾（noncontradiction），以及『被排除的中間層』（the excluded middle）等原則」。桑戈爾拒絕歐洲抽象的理性，包括馬列主義的抽象理性，他偏愛用隱喻，將非洲社會主義的基礎定位在具體的層次上。理性的抽象化本身就是歐洲文化的歷史產物，因此不能照單全收：「在理論上，有人背叛了馬克思是因為他們連一個逗點都一成不變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而我們背叛馬克思是因為我們把他的

方式應用到西非的現實中，就像三夾板一樣」(Senghor 1964a: 75-78)。

桑戈爾認為以亞洲和非洲現實來重新定義馬克思主義才是真正對馬克思忠誠，這個思想的產生背景是因為他對共產黨的史達林主義感到幻滅；另外一個顯然也是對史達林主義感到幻滅的例子就是1956年塞傑爾脫離共產黨。就像沙特一樣，桑戈爾決心發展「對社會主義的建設性批判」，將追求的目標加上「對人類尊嚴的渴求和對自由的需要」。因此，桑戈爾追求的是他所說的「民主的社會主義 (democratic socialism)」，甚至要結合精神價值，也就是連結法國社會主義者的舊道德思潮的社會主義。就歷史和文化的觀點而言，我們屬於這股潮流」(Senghor 1964a: 45-46)。這種主張回歸法國工團主義 (syndicalist) 者的社會主義道德傳統，在索雷爾的作品中明顯可見，桑戈爾追隨沙特、列斐伏爾 (Lefebvre) 等人的腳步，根據特定需求發展馬克思主義。就他的角度來看，這個特定需求就包括非洲文化：「我們必需建立我們自己的發展計畫，以歐洲社會主義的貢獻為基礎，同時也要以最好的黑人非洲文明做根基」。法語系的非洲社會主義和英語系的非洲社會主義同樣堅持的就是，社會主義的接枝必需顧及非洲文化的歷史和文化現實：桑戈爾主張馬克思主義必需被重新思考，並且以毛澤東做為例子，強調「從非洲的現實角度出發」(ibid.: 48, 67)。在這樣堅持下，馬上產生的效應就是文化在政治論述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對桑戈爾而言，文化「顯然就是政治的基礎和最終目標。……文化就是社會的肌理」。法語系非洲知識分子，如桑戈爾和法農，強調文化是美學的、是哲學的、也是社會的。然而最重要的要強調文化獨立才是「其他的獨立：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必要先決條件」(ibid.: 49, 60)。因此，桑戈爾認為第一步就是回到「西非的資源」，實行一種當代巴西現代主義者所說的「食人習性」(anthropophagism) 譯註4的同化方式：

對我們而言，社會主義就是在接觸非洲現實時被拿來測試的方式。我們在選擇清楚之後，基本上就是如何同化我們的選擇的問題。同化就是將我們所陌生的食物轉變，將之化成我們的血和肉——總而言之，就是要非洲化 (Negrofy) 和柏柏爾化 (Berbersize) 譯註5。(ibid.: 83)

273 桑戈爾主張，非洲社會在「經濟上和文化上是混雜的，結合了非洲人和歐洲人的貢獻」(ibid.: 93)，因此，非洲社會主義就是結合歐洲社會主義思想和當代非洲

譯註4 anthropophagism一字由希臘文anthropos (人類) 和phagein (吃) 合併而來。巴西現代主義文學家Oswald De Andrade (1890-1954) 在1928年發表“Manifesto Antropofago” (食人主義宣言)。他主張吸收外來文化有助於創造自身的表達方式，正如印地安人食人肉的目的是將敵人的力量化為己有。

譯註5 柏柏爾族為非洲原住民，在撒哈拉沙漠過游牧生活，散居於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和埃及的部落裡，信奉伊斯蘭教。

社會的價值觀；為了解決非洲社會內部的矛盾，這樣的結合必需經歷探索和生產的過程。為達此一目的，必需藉助於馬克思，同時還要運用新的哲學和科學的發展，在研究的過程中更需要新的技術和知識的形式。

最重要的是，無論歐洲如何影響我們，我們的現實和歐洲並不相同。所謂對社會主義忠誠就是在面對這些不同的現實時，我們必需選擇新的方法，新的技術，新的手段——最現代，最完美的方式。(ibid.: 103)

沙特稱桑戈爾的散文和詩作是當時法語中「唯一偉大的革命詩作」，在他的作品中，桑戈爾在理論的邊境中間遊走，想要在非洲現實的特殊性與社會主義的普世共通性之間找到跨越的方式，把近期被殖民文化的客觀決定要素的分析，結合到迪奧普所稱母系社會的「社會集體主義」(social collectivism) 中公有共享的經驗的主觀表述 (Diop 1989: 177)。許多評論家認為桑戈爾對「大非洲」的定義方式已經足以教人全盤否定其思想。不過，他的主張就像非洲社會主義一樣，複雜而深遠；他追求將普世的共通性安放在本土的現實上，期能在所有非洲社會主義中產生動力，由此可見有一種建設性的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 一直在成形的過程中。

## 20.

非洲（四）：  
法農／卡布拉爾

## 一、法農

「殖民的問題不只是各種客觀歷史狀況之間的關係，還包括了人類對這些狀況所抱持的各種態度」，法農如是說道（Fanon 1986:84）。英語系的非洲行動派將焦點放在對客觀範疇的介入，也就是歷史的範疇、經濟史、社會性（sociality）和物質性等等；而法語系的行動派從胡努以後，特別將焦點調整，平衡其注意力於壓迫和剝削的歷史層面，關照人們的態度。簡言之，法語系行動派重視的是主觀的範疇，也就是亟欲扣連殖民主義的文化和心理效應，探究人們承受這些影響因素的經歷。正如杜博斯提出的：「成爲一個問題到底是什麼感覺？」（Du Bois 1989: 1）發現自己被轉變成殖民的主體是什麼感覺？看到自己的文化被貶抑、被侵犯，自己的語言被排除在所有權力形式的方言之外——所有權力形式只能用一個外來的語言行使、接觸——是什麼感覺？成爲殖民主體的感覺是什麼？現在，無論身是在三大洲，或是在西方主導文化中的少數移民中，做爲一個「後殖民主體」是什麼感覺？簡言之，殖民和去殖民的帶給人類什麼經驗？對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而言，殖民主義的心理效應是什麼？殖民主義對性別問題有什麼影響——不是只有性別角色的影響，殖民主義是否牽涉到某些經驗的性別化和跨性別化（transgendering）呢？還有，如果殖民主義對個人的心理層面產生影響，那麼，在政治、軍事或游擊鬥爭中所採用的這些有形的方式之外，是否有什麼以認識論和本體論爲基礎的對抗方式？這種把自己視爲主體，同時也是客體，將內在和外在結合，主觀和客觀並置的辯證性，就是杜博斯所形容的「雙重意識」。

在許多方面，客觀事物的主觀經驗構成文化的範疇，而且在文學中表達的最清楚有力，就像桑戈爾和塞傑爾的作品。主觀經驗也構成心理學的範疇，因爲心理學就是爲主觀的經驗提供客觀的表述。桑戈爾和塞傑爾選擇用詩做爲表達集體的主觀性，而法農選擇心理學的學科訓練去探索、扣連殖民主義對被殖民的主體所造成的影響，並且透過心理學的方法對抗這些殖民的影響，把被灌輸的自卑感轉變成自我賦權。後殖民書寫中，比較關注將個人經驗和文化身分認同放在比較客觀的歷史領

域中討論，這有一部分是受到在後殖民理論中關鍵人物法農本人的影響。正如評論家所指出的，後殖民分析往往將焦點放在客觀條件對主體性的影響，但是要點是：法農將強硬的反殖民行動主義扣連到加維傳統和「黑人精神」中最重要心理救贖和黑人賦權。獨特的後殖民認識論和本體論的發展，和政治行動主義並不衝突。相反的，就像一些爭取自由運動的政治知識分子和知識政治家所表現出來的，此一發展反而使政治行動主義得以成功。

法農於1925年生於馬提尼克島，在二次大戰期間離開法蘭西堡（Fort de France）加入自由法軍的戰鬥行列。1945年，他回到馬提尼克島研讀哲學，當時馬提尼克島正在選舉代表參加「法國國民會議」，在剛加入「共產黨」的塞傑爾的選舉活動影響之下，法農有了第一次激進的政治經驗。帶著結合了共產主義和「黑人精神」的強大力量，法農回到法國後開始接受醫學、精神醫學和哲學的正規教育。他在里昂（Leon）學習精神醫學的時候，編輯一份黑人期刊《達姆達姆鼓》（*Tam-Tam*）。在他取得醫師資格後，先在西非找到一個工作，但是工作並不順利。1953年，他前往阿爾及利亞的布里達安儒爾醫院，擔任精神科主任。1945年5月，正當法國慶祝他們從德國的手中接收阿爾及利亞時，在阿爾及利亞卡必利亞（Kabylia）的塞提夫（Setif）發生穆斯林叛變，後被法軍以殘酷手段鎮壓，阿爾及利亞的代價就是4.5萬人被屠殺。阿爾及利亞似乎在法國的掌控之中，但是在1954年，也就是法農抵達阿爾及利亞的次年，法軍在越南的奠邊府（Dien Ben Phu）大敗，「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正式開始解放戰爭。阿爾及利亞的戰爭讓法農有了第二次激進的政治經驗：法農開始參與阿爾及利亞的革命運動，在1956年他辭去布里達安儒爾的職位。身為「國家解放陣線」中央委員會的成員，法農很快被驅離阿爾及利亞，後來他轉往突尼西亞，並開始成為「解放陣線」機關報《聖戰者》（*El Moudjahid*）的編輯之一，他的許多著作都是在該報中發表。後來他到阿克拉擔任駐加納大使，然後到馬利，負責組織黑人的力量，協助馬格里布的反殖民戰鬥。1961年他發現自己得了白血病，先在蘇聯接受治療，但是蘇聯的醫生力勸他到美國治療，雖然法農本能上覺得這個建議未必比較好。他抵達美國之後被「美國中央情報局」拘留而未就醫，被審問了10天。1961年12月，法農死於華盛頓的一家醫院，隔年，阿爾及利亞獨立。

## 二、法農與法語系的非洲政治思想

在美國和歐洲的左派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從來就是以歐洲為中心，一直把殖民主義的議題邊緣化，因此他們多少忽略了法農。到了1980年代，法農的著作躍居後殖民理論文本中的主要地位。和許多前面所討論過的行動派知識分子比較起來，法

農在後殖民領域中地位顯著特別令人矚目。如前面所談，他的獨特在於將主觀和客觀領域結合，成為法語系非洲政治和文化哲學家「混種」的一大特色（Sartre 1976b: 11）。法農和其他幾個人的不同就是他所根據的是理論和心理學的基礎，而不是在詩的層面上，因此為殖民主義開拓了一個精神病理學的面向。就知識的角度來說，他是被同化的最徹底的法語系殖民行動派，同時也是最全面參與法國當代哲學和文學文化的人，幾乎超過所有當時的非洲或加勒比海的知識分子。做為一個國際主義的行動派——從馬提尼克島到巴黎，到阿爾及利亞，到突尼西亞，然後經常從突尼西亞到訪各地——他對本土文化的興趣是有限的：當他將一般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巧妙地轉向三大洲的時候，他不像幾乎所有英語系統和法語系的馬克思主義者嘗試將它接枝到非洲文化的特殊性，對於這方面法農本人的經驗其實是相對受到侷限。在知識方面他一直是巴黎為中心，而且從未抗拒過歐洲思想的本身，雖然他那麼盡力對抗歐洲宰制殖民世界。做為一個在歐洲受教育的被殖民菁英分子，法農運用西方思想的資源對抗西方。他所致力的就是轉譯西方思想的認知位置（epistemological location）。

法農在這方面和其他許多方面一樣，採取的方式迥異於多數其他法語系反殖民作家的方式。他在法語系非洲反殖民的主流思想軌道中運作，但是從來沒有成為其中的核心。他深受他的老師——馬提尼克島的塞傑爾——所影響。塞傑爾是「黑人精神」運動的創立者之一，他所寫的《殖民主義論述》隱然補足了法農的作品，尤其是其中針對西方和西方文化對種族主義和人文主義的雙重標準所做的道德和文化的批判。法農不像前面幾章談非洲所提到的人物，他不是泛非洲主義者：他一直對泛非洲主義抱持懷疑的態度，尤其對它所奉行的非暴力的正面行動（Fanon 1965: 127-128）。法農是一個革命家，他的激進立場完全來自他在阿爾及利亞的經驗，以及阿爾及利亞所處的狀況。他確實提過「非洲團結」，但是他所說的是革命的團結一致，是在「直接行動」的脈絡下，而不是在泛非洲主義的脈絡下團結：「今天，我們的口號必須是『非洲人，不管是非洲男人或女人，挺身而戰吧！終結法國殖民主義！』」（Fanon 1967: 131）。阿爾及利亞戰爭是整個反殖民行動主義歷史中最叫人不寒而慄，最激烈殘暴的一章，其中令人瞠目結舌的暴力是「民族解放陣線」行動最初的策略，而法軍當然不遑多讓，也祭出同樣激烈的暴力手段還以顏色（Clayton 1994: 114）。雙方手段兇殘的程度和方式實踐在人民身上——無論男人、女人、孩童——叫人不忍卒睹。在這樣的情況下，有許多時候「暴力」是一個太乾淨、太理智的字眼，過度圍繞著哲學概念的尊嚴，根本無法描述在阿爾及利亞所發生的景況——令人髮指、教人做嘔、虐待狂似的屠殺。

### 三、法農和阿爾及利亞

法農是一個精神科醫生、作家、知識分子，他走到激進政治領域的時候算是相對的比較晚了。一直到1956年夏天他才辭去布里達安儒爾醫院的職位，那時候阿爾及利亞戰爭已經開打多了。他在獨立鬥爭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恩克魯瑪或桑戈爾甚至和潘得墨等行動派很不同。他並沒有參與「民族解放陣線」的軍事活動，除了在1960年曾組織一條經過馬利的補給新路線之外（Fanon 1967: 177-190）。他被驅離阿爾及利亞之後，在「民族解放陣線」和戰爭中所扮演的僅僅是次要的角色；在許多歷史記載中，如果有提到他的話，也僅僅是點到為止。但是，「民族解放陣線」所實現的國際性政治活動超過法國人所能做的，而法農在這其中確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其意義絕不亞於軍事活動的肉搏戰。除此之外，他的主要角色就是為「民族解放陣線」在突尼西亞的報紙宣傳戰爭，將「民族解放陣線」以暴力激勵反殖民運動的意識形態變成它特有的標誌，倡導社會主義的世俗主義。就這方面而言，非穆斯林的法農就像烏茲狄克（Omar Oussedik）一樣歸屬於「民族解放陣線」的馬克思主義路線，為「民族解放陣線」的左派強硬立場發聲，以知識和歷史的基礎凸顯其策略的崇高尊嚴。他所強調的農民的革命角色（事實上他在這方面沒有什麼經驗）影響了1963年後獨立時期的「工人自治」（autogestion）政策——由哈比（Mohammed Harbi）所提出的鄉村工人自我管理的策略，主要目的是將農民組織成一個大的政治群體。儘管和其他政治組織，如哈吉以立憲民族主義為主的「民主自由勝利運動」（Mouvement pour la Triomphe des Libertés Démocratiques, MTDL），有些分歧，但是「民族解放陣線」還是得到阿爾及利亞多數民眾的支持。它屬於穆斯林的，但卻不以恪守伊斯蘭教教義為方針（它之所以得到埃及的支持是因為泛阿拉伯主義的關係），它走馬克思主義路線也只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反殖民的立場（無論在游擊策略、實質的軍事援助或意識形態方面，「民族解放陣線」從中國、南斯拉夫和越南得到啟發；而法國人是利用中南半島的退伍兵來對抗「民族解放陣線」）（Horne 1996: 404-407）。和多數非洲解放運動的情況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法農是極少數居領導地位的知識分子，如若不然，他的政治哲學就不可能發展到足以媲美像薩丹·卡里耶夫、爾卡紮菲、拉明·桑戈爾或立歐玻·桑戈爾等有地位者的政治哲學。這一點大致上可反映出阿爾及利亞的拓居殖民地位——法國人根本無心培育任何當地的菁英階層。

278 所有這些因素都反映在法農的作品中，他的著作在一種混合的政治背景下形成發展。「民族解放陣線」的主要思想立場是傾向穆斯林，反法國人，反拓居殖民者，它對社會主要的承諾就是農業改革和土地重新分配。這些因素加上在思想上以

致力於暴力做為解放的手段，為一個分裂的、異質性混雜的社會提供了團結的基礎——事實上，「民族解放陣線」進行是毫無組織系統、片片斷斷的運動，它完全沒有一個大黨的組織能力。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民族解放陣線」和法農的立場都是著眼於暴力的好處和必要性，但很少提到解放之後的自由社會是什麼樣子。到獨立的時候，「民族解放陣線」大致上已經不再是一個有影響力的政治組織了，班貝拉一心一意建立自己的勢力基礎，對於未來的政治方針毫無規劃。班貝拉身旁有一群左派知識分子，其中最傑出的就是哈比；班貝拉將他們當做思想的引導者，以彌補他自己對社會主義缺乏知識（Jackson 1977: 136-40）。但是，班貝拉掌權只到1965年。在此事件中，阿爾及利亞革命開始嚴厲的伊斯蘭教認同<sup>譯註1</sup>。對法農而言，他的寫作將更多的焦點放在民族主義、民族意識的陷阱、以及透過文化扣連豐富的民族主義所遭遇的困境，他的重點並不是社會主義所要追求的人類平等和公義的理念。只有沙特在法農《受詛咒的大地》的前言中肯定地說：「為了勝利，民族革命必須走社會主義之路」，除此之外，我們很難在書中看到法農本人有這麼直接明白的陳述（Fanon 1965: 10）。法農晚期作品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也只限於以馬克思主義的大架構分析第三世界被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剝削；例如，在這些分析論述中，法農譴責美國是一個新的帝國主義「怪獸」。他與馬克思主義直接交鋒的地方非常有限。《受詛咒的大地》在他死前一年——1961年出版，他在書中開頭就說明，歐洲社會的階級區分在殖民地變成了種族區分：

在殖民地，經濟次結構也是一種上層建築。它的因也就是它的果：你有錢，因為你是白人；你是白人，因為你有錢。這就是為什麼每次我們碰到殖民問題的時候，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應該稍微延伸調整。（Fanon 1965: 32）

在這段話中，法農把自己放在主流的三大洲馬克思主義中，他所認知的是古典馬克思主義在殖民的場域中必須有所調整。然而，在他這段話前半部的論點是殖民地的經濟關係並未假藉任何意識形態去掩飾，這樣看來，法農根本沒有將馬克思主義分析做任何延伸。在第八章的時候，我曾引述馬克思在《資本論》的批評：

資產階級文明中深刻的虛偽和固有的野蠻被掀開來，攤在我們眼前，在他們國內用比較體面的方式，現在他們在殖民地就赤裸現身。（Marx 1973a: 324）

<sup>譯註1</sup> 班貝拉：阿爾及利亞民主人民共和國首任總統（1963-1965），他所採取的是結合阿拉伯和伊斯蘭的社會主義路線。他在一場軍事政變下台之後，阿爾及利亞轉向純粹的伊斯蘭教。



法農所修正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呈現在第二句中，他用種族區分取代了階級認同，藉此，法農事實上就逆轉了馬克思原本的論點；而馬克思本人最初是將蒂耶里 (Amédée Thierry) 在《高盧史》(*L'Histoire des Gaulois*, 1828) 中的種族分析轉變成階級分析 (Young 1995a: 75-76)。法農認為殖民地的區分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種族之分，他們的地位、角色和功能依據種族身分而訂定。兩者之間的關係就是同語重覆的 (tautological) 邏輯，是一種以原初暴力 (originary violence) 為根基的剝削而形成：你有錢是因為你是白人，而你是白人因為你有錢。雖然這兩個群體之間的區分是經濟的區分，但是這個分野並非經濟差異的產物——反而是政治和種族差異所造成的，而這些差異是整個系統操作的根基。法農在上段引文接下來繼續修正馬克思主義的前資本主義社會分析，法農區分農奴和被殖民的屬民有所不同，並將封建制度中的騎士統治和拓居殖民者的統治加以對比，其根據是拓居移民仍是外來者。但是，法農似乎沒有注意到騎士統治通常是封建貴族的制度，或者說，封建主義往往構成一種內部的殖民主義形式。

法農的善惡二元世界觀變成種族化的基模 (schema)，有部分是因為他透過《黑皮膚，白面具》的種族分析，進入殖民的狀況。殖民主義就是黑白的問題。奇怪的是，這樣的觀點也反映出防衛的法國軍隊本身的領導者（「殖民者」或「外籍兵團」）的意識形態，這些人根據革命戰爭 (*querre révolutionnaire*) 理論的原則，將對抗殖民革命視為善惡之戰，而他們要對抗的就是邪惡的種種力量，要對抗這群被視為「某種邪惡的精髓」——如法農所言——的當地人民，因為在他們身上民族解放和共產主義已經合而為一，無法區分 (Clayton 1994: 128-31; Fanon 1965: 33; Kelly 1965)。法軍慘無人道，往往為了達成目標不擇手段，也就成了「民族解放陣線」的暴力鎖定的敵人了。

雖然法農在《一種垂死的殖民主義》(*A Dying Colonialism*)，原本的法文書名為《阿爾及利亞革命第五年》(*Year 5 of the Algerian Revolution*) 中，對阿爾及利亞的歐洲少數族群有稍微不同的看法，但是在《受詛咒的大地》中，他為了將就自己的辯證模式，反而選擇略過那些生活在阿爾及利亞的貧苦的白人，也就是那些混種或不同種族的白人，事實上這些人在阿爾及利亞占了相當大的比例。另外，他也略而不談被殖民者中有錢的資產階級，阿爾及利亞的確有這麼一些人，但是他們不至於像印度的資產階級那麼闊綽顯演 (Fanon 1980: 125-56)。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沒有這群當地的資產階級，那麼，〈民族意識的陷阱〉這一整章就會顯得多麼多餘，因為這篇文章維持法農一貫敏銳的分析，精闢地指出對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在獨立後有轉變成新殖民主義的菁英之虞。同樣地，法農在此重新建構階級動力時，對於馬克思主義做了最實質的修正，把階級之分變成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分。雖然這個將階級區分類比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分的觀點，從此被歸納到媲美

蘇丹卡里耶夫對資本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國家的區分，但是法農的模式依然還是最適合拿來分析拓居殖民地的狀況。就此模式來觀察，我們必須要注意，法農後來在書中放棄了他原本純粹種族主義的基模，改而視農民為真正的革命階級，和都市無產階級或殖民資產階級對立。這麼一來，他所走的路線的就是毛澤東的三大洲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就像格瓦拉一樣）。但是，和毛澤東不同的是，法農極少將焦點明白直接地放在社會主義上，除了對於新人文主義的肯定之外。新人文主義源自與法農不同路線的泛非洲主義成員 (Fanon 1965: 253-255)。在《受詛咒的大地》最後一句話中，當法農提到展開新頁，提到要有新觀念時，卻沒有指涉到普遍的社會主義，也沒提到當時大家正在闡述的非洲社會主義理想。什麼才是新的觀念仍然隱而未宣。

法農在這方面採取策略性的緘默，顯然是受到他的意識形態的影響，他反對當代非洲社會主義所採取的形式，尤其是立歐玻·桑戈爾的主張（遑論法國的正統共產主義形式，以及「阿爾及利亞共產黨」反對脫離法國獨立）。法農甚至反對恩克魯瑪的馬列社會主義路線，因為他不贊成「正面行動」的原則。阿爾及利亞這個非常不同的政治環境以採取不妥協的暴力來對抗殖民政權，法農選擇一條和恩克魯瑪、桑戈爾不同的路，加入激進的政治路線。他在一篇談論暴力的文章中清楚陳述這個立場，後來這篇文章成了《受詛咒的大地》的第一章。最初是在1958年阿克拉舉行的，由恩克魯瑪主導的歷史性「全非洲人民會議」中，法農以這篇文章做了一個充滿戲劇性和爭議性的干預。其實文章的對象不是針對恩克魯瑪本人，而是法語系非洲領袖們，如桑戈爾。因為桑戈爾暗中轉變成不支持獨立，要和法國協議的立場，但是當時法國對阿爾及利亞的情況感到害怕，且又缺乏再繼續一場殖民戰爭的資源。這種謹慎協商的獨立立場表示塞內加爾對阿爾及利亞的「民族解放陣線」的支持會減到最低。法農在大會上的干預預告了強硬派的新氛圍將在未來十年具體實現。《受詛咒的大地》標示了非洲政治的新時刻。在它出版之時，多數的非洲國家都已獨立。沒多久，阿爾及利亞和肯亞分別在1962年和1963年獨立，它們成為其他未獨立國家的策略模範：其他仍處殖民地的多半都是拓居殖民地，如羅德西亞、葡屬非洲殖民地和南非，它們只能採取暴力的方式。

#### 四、法農和暴力

《受詛咒的大地》中的第一章〈關於暴力〉(‘Concerning Violence’) 是全書最為重要的部分，整篇文章以似非而是的邏輯操作。一方面，這一章陳述了阿爾及利亞的「民族解放陣線」所考量的立場，也就是以阿爾及利亞革命特殊的歷史和政治社會情況而決定的立場。但是另一方面，法農以一種概論性的高層次來寫作，以致

於整本書讀起來像是一本概論性的反殖民主義經驗和過程的手冊。的確，這本書從出版之後一般都是以這個角度來解讀，這也就是為什麼它成為1960年代一些運動的領導者的實用手冊，如非裔美人的「黑人權力運動」的梅爾肯·艾克斯，以及同時期南非「黑人意識運動」的畢克，即使他們所面臨的是不同的背景脈絡（Malcolm X 1992; Mazrui 1993: 275, 715）。雖然法農談及自己是非洲人，也談到「非洲人的革命」，但是他沒有那麼關切社會主義的非洲化，反而比較注重將革命原則抽象化，好讓這些原則具有概括性，可加以應用。這也是他的其他幾本討論非洲和阿爾及利亞革命的書的特點，這幾本書比較明確具體，但還是常常有將觀念抽象化的傾向，無論是從心理學或社會學的角度，也無論他所使用的是實證的或是歷史的材料。正如他自己所說，他所想要做的就是「闡述所有被殖民者的奮鬥的共同本質」。就是因為這樣刻意將分析放在一個普世共通的層面上，才會讓《受詛咒的大地》成為霍爾所稱的「去殖民的聖經」。

法農只是「民族解放陣線」的一個聲音，但是正如沙特所說的，他這個普世化的形式很快地被視為第三世界的聲音（Fanon 1965: 9）。雖然法農很清楚地在談阿爾及利亞的狀況，但是整本書好像是在闡述整個歷史的各種過程。《受詛咒的大地》的開頭有一句具有大氣魄的話，但事實上是不夠精確的總括性說法：「去殖民永遠是一種暴力的現象」（ibid.: 13）。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指責法農為了暴力而暴力，把暴力光榮化。對此，沙魁巴翰提出了一個很正確的觀點替法農辯駁：去殖民暴力的源頭就是殖民的暴力，這個殖民的暴力是法農幾乎不認同的（Serequeberhan 1994: 76）。對法農而言，以暴力回應可以說是被殖民者的一種本體的賦權（ontological empowerment）形式，但就是這一點讓它變成了某種抽象的觀念。雖然法農承認去殖民是一個歷史過程，但是它還是可以以抽象的方式待之。他提到「所有去殖民最開始的時候像一種空白泥板（*tabula rasa*）<sup>譯註2</sup>」。去殖民沒有先前的歷史、文化或政治的認同：就像洛克的經驗主義所說的，心智就像是一張白板。從這一點出發，接著就可以同樣地寫出共同的殖民情況，因為殖民就是辯證性的鬥爭，原住民和拓居者之間，被殖民者和殖民者之間的辯證鬥爭：「殖民的世界一分為二」（Fanon 1965: 29-31）。這個二分法結果就是法農的論點被廣泛地應用到所有殖民的情況，通常都基於表面的推斷——這是法農本身引出的——所有的殖民狀況在本質上都是相同的。就權力和宰制的觀點來看，這些狀況當然都是相當雷同的，但是就特定的政治狀況來看就有了差異：就拿最明顯的例子來說，行動派在拓居殖民地和剝削殖民地對付殖民者的方式就有不同。法農的影響就是讓這兩者之間的差異有時候消失了。他獨特的、以普世共通性為基礎的分析形式對整個後殖民理

譯註2 *tabula rasa*：拉丁文，指「空白的泥板」。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洛克的名言：「心智宛如空白的泥板，經驗刻在上面留下痕跡形成智慧」。

論有深刻的影響。

同時，法農把阿爾及利亞的情況抽象化，變成一個殖民主義和去殖民的一個概括性的樣板，這也是受到為《受詛咒的大地》寫前言的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沙特的影響。法農的「殖民主義」顯然是取自阿爾及利亞的情況，但是他的知識和哲學脈絡還是明顯受到都會巴黎的影響。雖然他在書中的結論時要同伴們「離開這個歐洲」，但是法農本身在理論方面的表述仍舊以歐洲為導向，尤其是導向沙特（ibid.: 252）。沙特是少數歐洲哲學家 and 知識分子中，把殖民議題當成核心的人之一。他在這方面的影響，以及他對非洲議題的關注，使得穆丁比甚至將沙特形容為「非洲哲學家」（Mudimbe 1983: 83）。他親身熱情參與反殖民鬥爭活動，尤其是阿爾及利亞和越南的活動。雖然現在研究沙特的人不太注意他這方面的事蹟，但是事實是他從1948年以後廣泛地關懷「第三世界」的議題，從他首先參與種族主義和「黑人精神」議題，到中南半島和阿爾及利亞戰爭，到古巴革命、越戰、以阿衝突，一直到法國移民等事件。就如拉穆奇（Lamouchi, 1996）詳盡的證明，沙特對「第三世界」的奉獻表現在實踐、政治和哲學理論的層面上。沙特在當代所有歐洲知識分子界鶴立突出，獻身為奮鬥爭取自由人士的團結而發聲。

不但是沙特影響了法農：法農清楚直接表述暴力的必要性也影響到沙特，以致於沙特將他在《辯證理性之批判》（*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中的〈種族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實踐與過程〉（‘Racism and Colonialism as Praxis and Process’）一章中，把焦點放在以暴力的原則談論殖民衝突（Sartre 1976a: 716-734）。沙特認為殖民的暴力有其辯證關係，致使後來的歷史成為一連串斷裂的換置（*disjunctive displacements*），無論是殖民者或被殖民者都出現這樣本體性的含混面向（*ambivalence*）（ibid.: 724）。同時，法農本人非常清楚地在沙特的存在馬克思主義的架構中寫作，並且深受沙特對阿爾及利亞的分析所影響，尤其是沙特在1956年春天所發表的一篇文章，也就是法農辭去他在精神病院的職務之前不久的時候。文章名為〈殖民主義是一個系統〉（‘Le Colonialisme est un système’），沙特在文中反駁他所謂的「殖民者的障眼法」（*colonialist mystification*），因為有些人主張阿爾及利亞的問題是一個需要改革的個別情況，或者說那只是需要將好的拓居者和壞的拓居者分開的問題而已。相較之下，沙特以慧黠的口氣說，改革是阿爾及利亞獨立之後他們自己的事情。他指出問題出在殖民，這不是個別的事情，而是19世紀所實行的一個系統，而現在這個殖民的後果彈回到殖民國本身了。他認為阿爾及利亞是「殖民系統中最清楚明白的例子」（Sartre 1964: 27）。他簡潔有力地陳述阿爾及利亞被法國殖民的歷史，從一開始就以經濟學家費利的理論清楚地闡述帝國的經濟和動機。殖民地原本是剝削的形式，為了母國的利益而設計出來的，將拓居者放在一個矛盾的位置上，讓他們在面對忠於拓居殖民地和忠於祖國之間掙扎分裂，沙特認為

現在的殖民地已經變成沒有經濟利益，而且付出的代價比得到的利益更巨大。但是無論如何，它仍舊是整個系統的一環，個別的殖民地都只不過是一個其中的一個齒輪。沙特以典型的協調客觀情勢與主觀情勢的方式說，是整個系統——不是個別的殖民地——需要修正，但是整個系統所帶來的後果卻是回擊到個別的殖民地：

而且，當我們談到「殖民系統」，我們必須明白，這不是一個抽象機制的問題。此一系統確確實實地存在，而且發揮作用；殖民主義像煉獄般的惡性循環是一個真實的狀況。但是這個現實透過上百萬的拓居者以及他們的子孫們而具體化，因為他們是殖民主義所造就出來的，他們的思想、言談和行為都是根據殖民系統的原則。

拓居殖民者像原住民一樣，依據其功用與利益被構造出來的。（ibid.: 43）

拓居者和被殖民者是同一系統的兩面，因此兩者絕對是無可挽回地相互對立，就像法農所說的，連結在一個不可能的辯證關係中，兩者都無法超越。法農的《受詛咒的大地》以這個基礎為殖民系統提供了洞察、完整的分析。雖然殖民主義毫無疑問地是一個系統，但卻不是一個普世共通的系統。沙特和法農所分析的結構是法屬馬格里布的拓居殖民，法農的才氣在於他將拓居殖民的結構移置到「殖民主義」的本質中。

這麼一來，他就避開了扣連普世文化和地方文化的辯證性，這兩者的辯證是非洲社會主義做為一個政治理論最偉大的成就。根據米勒的觀察，卡布拉爾所選擇的是面對這個辯證性，「一方面，基於他自己的道德和政治信念，走向普世文化，另一方面，他想要在更大架構的概念下尊重地方和族群文化」，因此才會讓他「陷入在兩種迫切的抉擇之中」（Miller 1990: 47）。就這點而言，桑戈爾所認為的，非洲理性具有解構觀念的可能性開始出現，並證明了它在策略上的成效。

## 五、卡布拉爾：以文化抵抗和解放

從非洲社會主義的觀點——不是反殖民革命的概括原則——來看，主張訴諸暴力達到解放目的的人之中，最偉大的一個不是來自英語系文化，也不是來自法語系文化，而是來自葡萄牙語系文化的卡布拉爾。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1957年在巴黎，來自幾內亞比索的卡布拉爾和來自安哥拉的安德拉德（Mario de Andrade）與內圖（António Agostinho Neto）三個人成立了「葡屬殖民非洲反殖民運動」（Movimento Anti-Colonista of Africans from the Portuguese colonies）。這三個人從此在安哥拉緊密合作，建立「安哥拉解放人民運動」，開始了後來成為非洲最艱苦的

反殖民鬥爭。卡布拉爾運用他在組織方面的經驗建立幾內亞比索的獨立運動——「幾內亞比索與維德角非洲獨立黨」。反抗葡萄牙的非洲解放鬥爭的領袖們後來成立了一個聯合的組織——「葡屬殖民地民族主義組織會議」，主要是針對解放鬥爭做分析、協調和計畫。葡萄牙人和法國人一樣，對殖民地採行同化政策，宣稱殖民地就是本土大陸的一部分。但是這兩者的殖民地的情況有些實質的差異，葡萄牙殖民主義某些特定問題界定，以及到1960年殖民主義依然存在的原因，都是「葡屬殖民地民族組織會議」最先的主要關切的重點。葡萄牙和法國最顯著的一個差異就是法屬殖民地的同化策略相對比較寬大，而葡萄牙並非如此：葡萄牙將安哥拉的人口劃分「本地人口」和「同化人口」，比例是99%：1%（Bragança and Wallerstein 1982, I: 75）。這一點可以部分解釋，為何葡萄牙一直到19世紀末期在非洲的領域是一個非正式的帝國，葡萄牙人只侷限在海岸線地區；這些領土一直到1920年代才完全由葡萄牙控制。此外，葡萄牙有大量的反抗統治的活動，無論是地方的武裝反抗，或是農民或獨立的彌賽亞教會消極性的抵抗（如遷移出去），或者是在洛朗索馬克（Laurenço Marques）的罷工行動，或是在羅安達（Luanda）或里斯本受教育的菁英團體以文學或政治形式表述他們的反對立場（Isaacman and Isaacman 1976, 1983; Marcum 1969-1978; Penvenne 1995; Vail and White 1980）。一連串的民族主義團體——「海外聯盟」（Liga Ultramarina）、「殖民地聯盟」（Liga Colonial，與杜博斯的「泛非洲代表大會」保持接觸）、「安哥拉聯盟」（Liga Angola）、「保衛非洲權益聯會」（Junto de Defesa dos Direitos de Africa）、「加維主義非洲民族黨」（Garveyite Partido Nacional Africano）、「非洲聯會」（Gremio Africano）、「安哥拉同胞會」（Associação des Naturais de Anglola）越來越受壓制，後來紛紛被吸收成為支持法西斯的薩拉扎（Salazar）政權。但是真正的差別和問題就是葡萄牙本身雖然曾經是大帝國，但當時已經是貧窮落後的國家，而且大致上仍舊是一個封建制度的國家，由一個法西斯的獨裁者統治，這個獨裁政權彷彿是時代錯誤般，到了戰後還存活了很久<sup>譯註3</sup>。這也就表示葡萄牙像寄生蟲一樣依賴它的殖民地，可悲到無法承受失去殖民地，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也無能，根本無法重新調整自己的統治方式，採行新殖民主義的政權（Anderson 1962）。因此，為了意識形態和經濟的原因，葡萄牙緊緊守住自己的殖民地，尤其仰賴南非的援助，因為南非將安哥拉和莫三比克視為保護的緩衝國，抵擋自由的「黑人非洲」對北部的威脅。無論如何，隨著解放戰爭日炙，葡萄牙對抗它們所付出的代價越來越龐大，法西斯政權終於在1974年的軍事政變中被推翻。

身為「幾內亞比索與維德角非洲獨立黨」的秘書長卡布拉爾領導幾內亞比索的人民已武裝解放鬥爭對抗葡萄牙，當時葡萄牙受到西班牙、「北大西洋公約組

<sup>譯註3</sup> 薩拉扎從1933年實施獨裁政權，到1974年才被推翻。

織」、美國，以及南非的協助。彈丸之地的幾內亞比索人民面對的是葡萄牙殖民勢力及其同盟的占盡優勢，它的勝利足可比擬越南擊敗美國。早期的時候，卡布拉爾的重點主要放在土地權利、農業生產、確立以政治和文化權利對抗葡萄牙殖民主義的壓制力量，並且在民族解放的奮鬥過程中團結人民，以促進政治發展（Chilcote 1972: 350-81）。卡布拉爾在理論方面的主張是他政治行動主義的產物，這些行動所累積的經驗也讓他產生更大的文化自信。和安哥拉的內圖一樣，卡布拉爾主張軍事鬥爭應該是一種包含了社會和心理重建的廣義政治鬥爭中的一環（Agostinho Neto 1980; Andrade 1980, 1887）。他寫道：「慢慢克服殖民剝削所引起的心理情結」，解放的民族戰鬥「才能使殖民主義的產物——『邊緣』的人們——恢復他們非洲人的性格」（Chilcote 1972: 375）。卡布拉爾認為，對被殖民者而言，心理的重建和對自己文化的肯定，這兩者不是互不相干的不同活動，而是和民族解放這個大格局的鬥爭相輔相成的過程，互為因果。他的作品之所以突出是因為他將分析從開創抵抗活動的實際層面，延伸到對抗時所牽涉到的軍事策略，到組織反殖民黨派所扮演的先鋒主導角色，甚至分析以何種形式才能確立文化認同和尊嚴——這是卡布拉爾認為解放過程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因素。法農不認為本土文化具有革命的可能性，他問道：「簡單地說，解放的鬥爭是不是一個文化現象？」並且主張鬥爭會產生新的文化。卡布拉爾和蒙德蘭（Mondlane）一樣，認為這些議題最重要的就是政治和物質的問題：活生生的文化——整個殖民史中主要的抗爭工具——現在成為解放運動內在的一環。

## 六、理論武器

卡布拉爾在這方面的主要觀點呈現在他三篇演講中：〈理論武器〉（‘The Weapon of Theory’ 1966）、〈民族解放與文化〉（‘National Liberation and Culture’ 1970）、〈民族解放鬥爭中的認同與尊嚴〉（‘Identity and Digni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Struggle’ 1972）。〈理論武器〉是在1966年1月哈瓦那舉行的「亞、非、拉美人民三大洲會議」的致詞。卡布拉爾反對將布爾什維克模式變成普世共通的原則，面對帝國主義中大多數馬克思理論傾向歐洲中心論，他提出「哈瓦那第二宣言」，強調「民族解放和社會革命不是出口的商品」：他堅信它們特別是「本土和民族精心經營的成果……基本上是由每一個民族的歷史現實所訂定、形成的」（Cabral 1969: 74-5; 參見1973: 53）。正如馬克古樂克所觀察，在幾內亞比索，「像[法農]《受詛咒的大地》所提出的策略——依賴農民的領導以及都市自發性的突發事件——不可能會成功」（McCulloch 1983: 3）。卡布拉爾強調革命理論中實際經驗的多樣性和特殊性，這是基於他本身對幾內亞比索有詳盡的瞭解，因為他曾經

為「農林部」（Forestry Department）進行廣泛的農業調查工作，這個經驗也讓他深切體認到西方先進資本經濟所發展的模式根本不適用。做為一個解放運動的領導者，卡布拉爾的不凡之處在於他仔細研究殖民統治的政治經濟，每個地區不同族群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實際面，幾內亞比索不同階級之間的關係，並且深刻體認農民的需要，尤其是在土地工作的農婦。卡布拉爾體認到不同殖民地有不同的狀況，因此特別關注解放運動在意識形態和理論方面的缺乏（參照 Abdel-Malek 1981: 105），他認為概括性的一般理論的發展已經足夠協助強化未來的解放運動。卡布拉爾大多數的作品所關切的是對抗葡萄牙的游擊戰所寫下的詳盡歷史；他開創性的理論著作嘗試以他所謂的「攸關社會結構的民族解放基礎和目標」（Cabral 1969: 75），重新思考帝國主義系統，以及殖民主義的實踐。卡布拉爾認為這兩者必須以未來的情況做辯證性的思考。

根據卡布拉爾的看法，我們不但要從政治的角度考量解放運動，更要考慮到「帝國宰制對我們人民的社會結構和歷史過程所造成的影響」（ibid.: 81）。卡布拉爾追隨羅伊，拒絕以沒有階級的存在做為被殖民國的特色，他強調殖民社會中有內部的階級階層化，而且這些階級在面對殖民勢力的時候有不同的利益。羅伊承認需要和資產階級的解放運動合作，所以特別強調共產黨需要掌握先機，成為解放運動的先鋒，以便實施社會革命，而不是多半只能做到的有名無實的民族革命。但是，正如「共產國際」的成員對羅伊指出的，他自己也無法將思想成功地實踐，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這些思想仍停留在相當抽象的階段。相較之下，卡布拉爾在領導幾內亞比索的解放過程中發展他的思想，並且觀察到被「共產國際」一直當成理論性預測的新殖民主義在非洲其他國家如何實際操作。因此卡布拉爾將社會主義和民族解放的整個關係重新調整，跨出了激進的一步，為布吉納法索（Burkina Faso）的桑加拉（Thomas Sankara）提供了政治哲學的基礎（Sankara 1988）。雖然卡布拉爾不願意將農民視為主要的革命階級，但是他在解放的觀念上顯然受到毛澤東、卡斯楚和格瓦拉的影響。卡布拉爾不只是以正式政治獨立的觀點來定義民族解放，不是只有殖民統治的結束而已，民族解放還必須要脫離外國的宰制。政治獨立本身並不是解放的目標，因為那只是政治上的虛名：「民族解放鬥爭最重要的是反對新殖民主義的鬥爭」（Cabral 1969: 83）。卡布拉爾的〈理論武器〉激進地介入民族解放運動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關係，他並沒有嘗試著要將兩者融合，反而重新定義什麼是民族解放。一個獨立的國家只有兩條路可以走：回到帝國宰制（資本主義、新殖民主義），或者走向社會主義。真正的民族解放應該在內部和外部兩種面向中操作，也就是在內部有激烈的社會革命，在外則要擊敗殖民勢力。解放的革命目標包括形式的獨立和社會主義的革命，這就需要和內在與外在因素脫離。這樣強調社會和文化面的革命成了1960年代被重新定義的革命所具備的特色。

287 首先就是階級和階級聯盟的問題。「共產國際」一直強調解放運動中，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有其危險性，因為這些資產階級實際的目標是形式上的獨立，他們希望實際上「國家跟以往一樣，是一個半殖民的緩衝國，世界帝國主義的傀儡」。因此「共產國際」要求完全的革命，要和這些資產階級劃清界限。但「共產國際」一直不清楚要用什麼方式一方面和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合作，一方面又要對抗他們，而且事實上這個策略也從來不曾成功過（Adler 1980: 416）。「共產國際」察覺到，在獨立運動時做為領導先鋒的黨派以後將會得到掌控權，因此它的指導方針就是敦促各地共產黨取得先機，但它也同時體認到，在實踐的層面上，如土耳其的情況，在獨立後主要的革命工作仍舊得持續。卡布拉爾的方式是將獨立與解放分開，以解決這個長期的過程問題。這樣的區分後來成為後殖民理論政治前提的核心；在卡布拉爾之後，後殖民政治的確以獨立之後繼續追求解放為目標。卡布拉爾主張，即使擔任領導先鋒的黨派以革命軍隊達到獨立的訴求，通常並不代表就已經真正解放。因此，區分殖民鬥爭和新殖民鬥爭就是很重要的一點：

殖民處境（整個民族為一階級，對抗殖民國家資產階級壓迫的力量）顯然至少可引出民族主義的解決之道（民族革命）；民族獲得獨立之後，理論上就會採取一個最適合自己的經濟結構。而新殖民鬥爭（工人階級以及其同盟所對抗的不但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同時也要對抗本土的統治階級）就無法以民族主義做為解決之道；它需要將帝國主義深植在殖民領域中的資本結構加以瓦解，然後正確採用社會主義的解決之道。（Cabral 1969: 86）

因此，解放包含兩個階段，第一個是聯合鬥爭的階段，整個民族在此時同屬一個階級。到了第二階段的時候，工人階級瓦解帝國主義所構築的社會和文化結構，目的是創造平等，脫離壓迫，得到真正的解放。第一階段的解決之道是民族主義，第二階段是社會主義。因此第一階段的革命是外在的，而第二階段是內在的，是帝國宰制所帶來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的革命。卡布拉爾和其他解放運動行動派不同的地方在於他並沒有把焦點放在革命本身，反而注重要透過什麼手段才能將革命變成國家和社會重新建構過程中的一部分。就這方面而言，卡布拉爾的著作為1990年代出現的對非洲國家的分析預先鋪了路。

288 至於解放的第一個階段對抗外國宰制的鬥爭，卡布拉爾主張由小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領導，因為他們大部分（卑躬屈膝地）和帝國勢力來往，也大多意識到必須去除這樣的宰制。到了第二階段，小資產階級開始和工人階級一起扮演先鋒領導的角色，但是在這時候，小資產階級很容易為自己階級的利益來行事，而且為了保有這個爭取到的權力，他們就會將國家的發展朝新殖民主義的功能，因而背叛民族解放的目標。為了防止這樣的發展，卡布拉爾認為小資產階級只有一條路可走，也

就是「強化他們的革命意識」，他們必須拒絕變成更資產階級的誘惑，並且認同工人階級。關於這一點，卡布拉爾有一個最驚人的結論，激進地修正了列寧的主張——統治階級不會自願放棄權力：

這就表示，為了真正完全達成民族解放鬥爭的使命，革命的小資產階級這個階級必須自殺，然後才能以工人的角色重生，要完全認同他們所屬的人民最深切的期盼。（Cabral 1969: 89）

卡布拉爾勢不兩立的抉擇——「背叛革命，抑或整個階級自殺」——有許多背景脈絡：從1960年代早期之後，非洲大陸的獨立國家普遍以新殖民主義的概念的操作；古巴卡斯楚的「開門」政策允許那些認為革命不符自己階級利益的人選擇離開；卡斯楚和格瓦拉否定自己的階級位置，強調在革命之後「革命意識的發展」；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也強調持續的後革命（post-revolutionary）需要文化與社會復興。雖然卡布拉爾的提議充滿戲劇性的警語，但是他的確是少數殖民主義馬克思理論家中，嚴肅地考量如何解決後革命情況中的階級利益衝突。就階級的自殺來說，卡布拉爾本身可說早就自行了斷了，而且他體認到這樣的自殺行動需要一種他所謂的「文化再改造」（cultural reconversion）。他描述自己在里斯本當學生時候經歷在知識上的解放，認為那是心理上的「再非洲化」（re-Africanization），他認為「心理的——心態上的——再改造」是被殖民者融入解放運動不可或缺的元素（Cabral 1973: 47,45）。有了這樣的心態，小資產階級才能認同國家民族的文化 and 利益，而不是只考量自己階級，因為到那時候，解放鬥爭已經發展到「整合鬥爭中不同的社會群體及不同層次的文化」（ibid.: 53）。

## 七、文化的角色

正如卡布拉爾自己說的，他反對殖民主義的道德和政治立場不只基於「我們人民的具體狀況——悲慘、無知、忍受各種折磨、大部分的基本權利被否定」，而且是因為殖民者將非洲人民排除在歷史之外，把歷史當成是只有他們自己的歷史：

殖民者常常說是他們把我們帶入歷史中：今天，我們要告訴他們，事實並非如此。是他們讓我們脫離歷史——我們自己的歷史，為的是讓我們跟隨他們，在後面跟著，跟著他們歷史的進程。（Cabral 1969: 63）

「回歸我們的歷史」：正如卡布拉爾所描述的，這就是武裝反殖民鬥爭中為解放而戰鬥的目標。文化的持續才能促成解放運動；所謂文化的持續就是「一個民族的歷史成果，同時也是歷史的決定因素」，卡布拉爾認為文化的存續和對文化的再

肯定可以為解放鬥爭提供滋養的種子 (Cabral 1973: 41-43)。完全實現一個民族的文化就是他們回歸自己歷史的方法。從一開始，卡布拉爾就特別關注他所描述為「人民大眾面對外來宰制時，文化對抗有一種無以摧毀的特色」(ibid.: 59-60) 因此，即使在游擊戰的時候，1965年黨的指導方針就包含了這個訓示：「要求黨內每一個有責任感，受過教育的黨員，每一天都要為文化形成的改進而努力」(Cabral 1969: 71)。他一直強調教育的必要，特別是婦女的教育。他特別重視解放鬥爭中的文化歷史面向的含意，照此推論，這也意謂他終究得挑戰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從階級鬥爭才開始的主張，也因此要挑戰那種認為美洲、非洲和亞洲的人民在殖民主義之前活在歷史之外的觀點，或者認為他們尚未有歷史是因為殖民主義對他們影響程度仍然太微小的說法。卡布拉爾堅定地主張一個社會的文化生活和經濟生活之間，有一種「強烈的、依賴的、相互作用的關係」，所以他認為歷史的驅動力在於生產的型態，而不是階級鬥爭。如此一來，卡布拉爾在後續的馬克思主義架構中創造一種具有包含歷史的新模式〔可比擬阿圖塞在《閱讀資本論》(Reading Capital, 1970) 的模式)。卡布拉爾將獨立重新定義為「每一個民族有權利擁有自己的歷史」，而不是擁有「自決的權利」，因此解放的目標應該重新訂定，擴大為每一個民族擁有生產力的權利，也就是說解放意謂該國家民族的生產力完全脫離外來的干涉或宰制 (Cabral 1969: 65; 1973: 43)。

卡布拉爾對文化角色的強調之所以引人是因為他將社會的歷史和經濟生活定義為相互作用的關係。文化不是遙不可及的一種操作，不是像歐洲文化的故作姿態，成了中產階級的休閒活動，藉此維持自己的階級身分認同，或者把它當成經濟基礎的上層結構。這樣相互作用的功能顯示，既然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歷史產物，民族的解放就「必須是一種文化的行動」，而解放運動就是「進行鬥爭的人民以一種有組織的政治方式來表達他們的文化」(Cabral 1973: 43-4)。因此，解放鬥爭「不只是文化的產物，而且是文化的決定因素」(ibid: 55)。卡布拉爾認為解放不但要結束外來的宰制，同時也要建立一個新的社會構成，藉此人民將得到認同與尊嚴。只有在此同時才可能解放，因為人民已經有認同與尊嚴，把這些特質當成他們自己文化的產物。卡布拉爾還注意到，古典馬克思主義壓倒性地強調革命政治策略中的經濟面，而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在掌控的時候特別將焦點放在異國社會中的文化層面。卡布拉爾寫道：

帝國主義統治的實踐……需要（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是）對它所統治的社會和以及它所存在其中的歷史現實（包括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現實）多少有些正確的知識。這種知識需要以比較的角度——和宰制的主體與其歷史現實做比較——才能顯現。這樣的知識在帝國主義的統治實踐中非常必

要，因為帝國主義的統治必定帶來兩種身分認同的對立——而且多半是激烈的對立。這兩種身分認同的歷史元素各不相同，在功用上互相矛盾。(ibid.: 58)

卡布拉爾有一個論點預告了薩依德在《東方主義》的觀點，他指出帝國主義不但引發想要認識其他文化的慾望，而且為了掌握其他社會而累積了史無前例的大量資訊，「有關殖民宰制下的人民和群體，在歷史、民族學、人種誌、社會學和文化各方面」的資訊。要有這方面知識為的是宰制的成就和延續，這一點也可以證明，以軍事觀點而言已經「被鎮壓」或「平定」的國家，其文化抗爭的力量卻仍然持續。卡布拉爾轉向這股知識驅動力的源由，為這些被觀察的文化找出其中隱含的意義。如果為了研究被殖民者的文化，這一切工作、專業見解、大量的組織活動在西方持續進行，這就顯示出抗拒的力量、持續的威力以及某些無法被同化的地方。卡布拉爾因此修正他認為必須把「回歸」——「回歸源頭」或是文化復興——當做是文化賦權的一個策略的想法，他主張需要「回歸」是本地的菁英分子，因為他們已經沾上帝國文化中些許的文化和知識，或者是那些在文化上被剝奪的「殖民離散者」，因為他們的立場有基本的矛盾存在。卡布拉爾認為一些文化策略是一般性的解答，忽略了「人民大眾面對外來宰制時，文化對抗有一種無法摧毀的特色」(Cabral 1973: 59-60)。帝國主義宰制要瞭解原住民的文化，其實是為了要操弄被殖民者、壓制他們、毀滅他們，因此被殖民者「繼續以文化對抗，即使他們政治和軍事的對抗已經被擊潰」。即使菁英分子已經被同化，卡布拉爾認為一般大眾多半沒有受到殖民國的影響，因為殖民者對他們保持冷漠的態度，所以大眾反而保存了自己的文化，這有一部分是透過人民自己的能動性：

這個結果也是人民以文化抗爭所產生的效應，當他們在政治上被宰制，在經濟上被剝削時，發現他們自己的文化可以成為保留身分認同的一個堡壘。(ibid.: 61)

即使遭受到迫害、壓制、背叛、羞辱，文化還是繼續流傳，賦予人民回歸的力量，可以創造歷史。根據卡布拉爾的敘述，文化所保留的身分認同有一種辯證的形式，迥異於現代批評家所描述的展演式的身分認同。他認為身分認同來自文化架構中屬於個人或群體的地方，而這樣的文化架構通常以一種抗拒的形式操作，無論是被動或主動的。文化的行動往往必須是集體的行動，它的本身就標示了抗拒性的反擊，抗拒殖民宰制，抗拒屈服於帝國的規範和實踐。因此，民族的解放不需要創造身分認同，解放運動是被殖民者基於認同一股不曾失去的尊嚴和力量而生的產品。卡布拉爾認為文化和認同是一體的，支撐著政治和軍事抵抗的能動性。

卡布拉爾的主張展現出對於黑人非洲的文化自主性越來越有信心；他仍舊很擔心，非洲民族運動只有一個奠基於本土文化的理論做為輔助根本不足。他來不及看到自己貢獻在這方面的重大心力所收到的成果。他在1973年被一個葡萄牙攻擊兵團刺殺，也就是幾內亞比索和維德角獨立的前一年。

卡布拉爾至少不必和大家共同經歷對非洲國家在獨立後的逐漸的幻滅感，這是去殖民國家分崩離析的情況所造成的結果。獨立之後的非洲所面臨的經濟和政治的問題，需要從多方面做更多實質的探討，在此無法一一處理。但是我要強調的一點是，要瞭解非洲從反殖民運動開始之後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的發展——而且現在仍舊在進展——的過程，不可忽略了當代非洲主義者的分析。恩克魯瑪曾抱怨去殖民是依據一種先劃分後統治的政策，將非洲分成無法運作的小國家；今天，他這個觀點被拿來從一個不同，但是比較具有動力的角度重新檢視，將焦點放在國家和國家機器（state apparatus）的問題，這也是卡布拉爾特別關注的問題（在這方面阿圖塞後來學他這個觀點）。把泛非洲團結當成立即的政治目標，這個理想幻滅了，再加上某些非洲國家的運作越來越窒礙難行，把國家當成一個機制（state as an institution）的基礎現在需要重新考量。大衛森（Basil Davidson）在《黑人的負擔》（*Black Man's Burden*, 1992）中特別注意到撤離的殖民帝國強制加諸殖民地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形式，根本和其成員的各族人民或各種文化毫不相干，因而帶來悲慘的後遺症。恩克魯瑪以泛非洲團結統一做為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大衛森則把焦點放在如何將非洲國家中這種牽強附會的關係轉變成族群構成（ethnic configurations）。與這個主張相關的還有曼但尼（Mamdani, 1996），他認為殖民主義在非洲留下的影響已經變成一種去中心化的專制系統，透過族群和宗教形式強制以本土權威和習慣法（customary laws）來操作。要對抗這樣的國家形式就無法不面對這些情況，無法產生非洲社會主義認為要透過現代性才能具有的、不同的公民和主體的概念。對於「非洲性格」的熱切倡導——恩克魯瑪本身尤其熱中——證明了後殖民非洲也受制於各種矛盾政治系統的衝擊（Quayson 2000: 15-6, 88-90）。貝雅（Jean-François Bayart, 1993）分析非洲國家悲劇性的失敗，發現它們在建立政治的正當性時很難與其他形式的歸屬和忠誠相競爭，即使就像他所主張的，非洲的族群意識（ethnicity）和傳統一樣，是被創造出來的。他甚至有一個激進的主張，認為非洲無法回應發展經濟的處方乃是因為執意拒絕進入陌生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模式，此一冥頑意志比起徹底失敗更是問題所在。非洲主義者近期的發展——例如主張以自我評判的理論機制分析後殖民國家面臨的社會、政治和文化議題——一直處在一種不斷重新定義、改變和發展的過程中。非洲的後殖民主義只是這個過程中進一步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許多早期非洲社會主義的處方現在被重新發覺，放在不同情況的背景脈絡以及不同的後殖民現代性的見解中重新運作。

292

## 21.

## 暴力的承受者／主體： 阿爾及利亞、愛爾蘭

世界各地的革命者必須選擇承受暴力之苦或是使用暴力。如果他們不願意讓精神和智識屈從於武力，就必須下定決心把武力變成智識和精神的主體。

293

馬力亞特吉（Jose Carlo Mariategui）（1996: 49）

1922年，巴格達。經過清晨市場的活動之後，塵埃落定。一群一群小孩正從學校走回家。整座城市裡，坐下來吃東西的人們低聲唸著：Bismillah-ir-Rahmanir Raheem 譯註<sup>1</sup>。這種寧靜被天空中吵雜的引擎聲打破。一隊英國皇家空軍凌空而過。幾分鐘過後，重擊聲在遠方響起。這群飛機正四處隨意轟炸山坡上的村落。這是首次新的皇家空軍被部署來對付一群造反的被殖民者。這些被承諾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從土耳其人手中得到自由，但卻在1919年「凡爾賽會議」中交給英國統治的伊拉克部落人民，被綏靖平定。

1998年，巴格達。齋戒月譯註<sup>2</sup>前兩天的下午三點。小孩和父母都在他們的床上睡覺。疾駛市區的汽車聲被一陣陣尖銳的防空槍砲聲音打斷，還夾雜著防空飛彈的低吼聲。經過四波的巨響之後，美國海軍EA-6B戰鬥機開始轟炸伊拉克的防空設施。而在歐洲和北美，人們端坐在沙發上觀看巴格達被攻擊時那些怪誕慘綠色的電視畫面。英國政府宣布，皇家空軍正準備接下去的轟炸攻擊。巴格達醫院的醫生發出第一次的傷亡報告。伊拉克的軍事力量被削弱貶抑了。

殖民的暴力以「平定」的名義來進行；後殖民暴力則以「貶抑」為之，把後殖民的人民降回到底層階級的地位。「這條穿過暴力的無盡通道就是所謂的歷史」（Derrida 1978: 130）。

未來持續遙遙無期。

譯註<sup>1</sup> 穆斯林禱告詞：奉至善、慈悲的阿拉之名。

譯註<sup>2</sup> Ramadan: 伊斯蘭教曆法中的9月，當月每天必須厲行齋戒。

## 294 一、主體／從屬 (Subject, Subjection)

誰是暴力的承受者／主體？是承受暴力之苦的人，或是執行暴力的主體？暴力製造出雙重的主客體，將暴力的施行者變成承受者，同時變成主體和客體。對他或她的存有來說，主體和客體的暴力都是一個外來者：

在我更加接近時，我看到那個阿拉伯人已經回來了。這次只有他一個人，仰身躺著……他一看到我，把身子抬起來一點點，同時把手伸到口袋裡。我自然地緊握住在我外套口袋中雷蒙的左輪手槍……我向前踩出一步。這個阿拉伯人抽出他的刀子，舉著朝向我……

我身體裡的每一條神經都像一條鋼線彈簧，我的手緊緊握住左輪手槍。扳機放開……我又朝著那具一動不動的身體開了四槍，這些子彈在他身上並沒有留下明顯的痕跡。連續的每一發都是對我的墮落之門大聲、致命般的重擊。

卡謬的見解是，暴力也會疏離、撕裂暴力的主體。讓我們跟著卡謬的質問，看看他如何質疑法國以漫長血腥的行動「平定」阿爾及利亞。這個行動開啓了暴力的動力，到現在仍然緊緊縈繞著法國和阿爾及利亞——西蘇 (Hélène Cixous) 將此遺緒謔稱為 *Algériance*。法屬—猶太—馬格里布 (Franco-Judaeo-Maghrebian) 理論，也就是眾所周知的解構，道出了那個難以忘懷的著魔。

1840年，早期曾是強烈反殖民主義者的畢吉歐將軍 (General Bugeaud) 在法國初次侵略阿爾及利亞10年之後，被委派為法國去鎮壓阿爾及利亞。他對反抗的居民進行一種「襲擊政策」(policy of *razzia*)<sup>譯註3</sup>，以焦土、剷除的政策，燒掉他們的作物、將他們的房子夷為平地。對那些反抗法國侵略的人而言，那個是一種滅絕的政策。在一次有名的作戰裡，一群阿爾及利亞的戰士被圍困、封閉在一個山洞裡，然後受到煙燻窒息而死：

迎面而來的是來福槍的彈火。……我把所有的出口 (各個山洞的出口) 密封，造了一個非常大的墳墓。這泥土會永遠覆蓋著這些狂熱分子。沒有人進入到這個山洞；沒有人……，除了我自己知道，有500個土匪被埋在那裡，他們再也不能去割斷法國人的喉嚨。(Todorov 1993: 205)

在他對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期間法國殖民主義的分析裡，沙特指出在阿爾及利亞和法國這兩個對比鮮明的國家之間暴力關係的界定，如何在開始的時候「以畢吉歐的

<sup>譯註3</sup> *razzia*：北非摩爾人所進行的以擄人為奴或搶劫財物為目的的襲擊。

士兵訂定，然後再以[他們]駭人聽聞的屠殺來執行」：

暴力和毀滅是吾人所欲求對象內在的部分……對於殖民者之子，暴力是存在於情境本身之中，並且是生產此殖民之子的一股社會力量。殖民者的兒子和穆斯林的兒子都是界定這個系統本身的此一客觀暴力的產物。(Sartre 1976a: 717-18)

在畢吉歐行動之後的100年，在阿爾及爾 (Algiers) 那所名稱詭異的畢吉歐中學 (Lycée Bugeaud) 出現兩個最好的學生卡謬和雅克·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德希達稱他自己是「小黑人，非常阿拉伯的猶太人」，早期曾被學校退學，然後被取消法國公民身分，然後又於1942年在法國維琪政權統治下的阿爾及利亞 (Vichy Algeria) 被貶為法國屬民的身分。在那個時候之前，阿圖塞 (Louis Althusser) 的家庭已經移民回到他的祖父母在1871年被驅逐出境的法國。但是阿圖塞 (這個殘暴的拓居殖民者之子) 談到他的父親時，說道：「他隨即回到前線，留下我的母親被洗劫、強暴和完全崩潰」，但阿圖塞依舊是暴力之子，並且以殺殺他的妻子來結束他的生命：

在這個時刻我按摩著她的脖子前面……海倫 (Helene) 的臉龐冷靜、一動也不動；她的眼睛張得大大的直視著天花板。

突然，我感到一陣的恐懼。她的眼睛一直瞪著，然後我注意到她的舌尖在她的牙齒和嘴唇之間露出來，怪異而且靜默。(Althusser 1993: 15-16)

「這些暴力之子是他們父親的暴力行為 (*praxis*) 所產生下來的，他們的父親把他們帶回到他們希望逃離的歷史。」(Sartre 1976a: 719)

## 二、暴力，侵犯

沙特、梅米和法農都認為，殖民的暴力以辯證的方式在歷史和個人的層次和發生作用：暴力的施為者和被侵犯的承受者同樣地受制於它。折磨他人的人發現在折磨他自己的妻子和小孩。法農位在儒安維爾的醫院裡毫無區別地充塞滿來自殖民地對立雙方的心理受傷者。事實上，在雙方相互敵對的歷史辯證中，是暴力把雙方結合在一起。德西達評論說：「沒有人可以逃離那種暴力和恐懼。」暴力的痕跡是殖民機制的主要符號 (semiotic)，它的溝通方式。丟炸彈的人在炸彈殼上寫上信息。「這是來自於查德·拉肯柏的一份齋戒月禮物」，在1998年向伊拉克發射的一枚火箭上用塗鴉字寫著。恐怖分子也運用殖民者的語言反擊。



法農也把殖民主義的「暴力的層級等第」(violent hierarchy)的說法倒轉來看。把索雷爾在《暴力的反省》(*Reflections on Violence*)中的論點用到殖民地的場域，他認為，受羞辱的被殖民的屬民是因為做為暴力的承受者才首度成為一個主體；暴力成為受壓迫者的一種心理治療。暴力提供一種最初期的中介形式，藉由暴力主體從非存在(non-being)轉變為存在(being)，從一個客體轉變為一個主體。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說道，到了1959年革命之後訪問古巴的時候，「沙特才理解到法農所說的話的真實性：只有藉由暴力，受壓迫者才能獲取人的身分」(de Beauvoir 1968: 606)。對法農而言，暴力的行動也創造出一個具有存在統一體的民族來反抗他們的壓迫者。

296 在1956年的時候……「民族解放陣線」在一份出了名的傳單上寫道，殖民主義只有在刀子架在它的喉嚨上時才會鬆手，沒有一位阿爾及利亞人認為這種說法太暴力。這份傳單只是說出每一位阿爾及利亞人心裡所感受到的：殖民主義並不是一部思考機器，不是一個帶有推理能力的身體。它的本質就是暴力，而只有面臨到更大的暴力時它才會讓步。(Fanon 1965: 48)

反殖民抗爭會竭盡所能變成革命戰爭。

### 三、令人焦慮不安的狀況

如同沙特所稱，法農的介入代表了反殖民的「革命暴力的理論家」，這種介入標示著三大洲民族主義的歷史性轉變，走向一種暴力的本土文化主張，這樣的轉變很快地甚至轉化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激進政治，最早表現出這種轉向的就是1968年的五月事件(Lumumba 1972: 3)。法農的革命暴力也標示著甘地另一種反殖民抗爭形式的挫敗。暴力對抗非暴力——這就是反殖民的問題。儘管衣索比亞於1896年在阿多瓦(Adowa)戰勝義大利軍隊，以及在1899至1902年南非戰爭早期波爾人的勝利，但直到第二次大戰期間藉由侵略的日本軍隊擊敗殖民列強(對英國人而言，1942年新加坡拱手讓給日本就是帝國衰亡的象徵)，以及1949年中國革命的成功之前，以軍事手段來達到解放的可能性顯然是遙不可及。在這種情境之下，甘地那種高超的非暴力戰略就是用智慧戰勝背後有殘酷無情的軍事力量做後盾的自由派英國殖民主義的邏輯，先前英國的軍隊就曾以非常殘暴的方式來對付1857年的起義。

然而，事實上如同在愛爾蘭，立憲引起的動亂和農業改革結合了和暴力叛亂和鎮壓，以及杯葛和絕食抗議等消極的抵抗策略結，正如阿民(Shahid Amin 1995)

所指出的，在印度的情況真的是暴力與非暴力，紅蘿蔔和棍棒，兩手策略的混合：就英國人而言，戰術包括1935年印度法案的憲政改革，再配合令人焦慮不安的暴力鎮壓，例如1919年在阿姆利則的屠殺。就印度民族主義者而言，他們關注愛爾蘭的作法，特別是以帕奈爾做為學習對象，如同索雷爾所觀察到的，帕奈爾的權威「並不是只依賴他所能掌控的選票數量，而是他在對愛爾蘭農業問題做最起碼的宣布時，每一個英國人所感到的恐怖。由一個議會團體所操控的少數暴力行動，對帕奈爾的政策非常有幫助」(Sorel 1999: 67)。和1843年奧康納(Daniel O'Connell)在科龍塔夫(Clontarf)的作法不同，帕奈爾從不規避暴力的政治。對印度人而言，自由的抗爭也幾乎同時結合和平的運動，如1930年「食鹽大遊行」，以及1930年吉達港軍火庫襲擊事件中所使用的軍事革命戰術，當蘇吉雅·森(Surjya Sen)以印度共和軍的名義發布獨立聲明時，其精神猶如1916年愛爾蘭人的「復活節起義」。英國人也許有採行一種分化而後統治的政策，但他們也面對著各種不同戰略的混合體，如古吉拉特，塔什干和孟加拉等地各有不同戰略；如「印度國大黨」、Anushilan Samity和Jugantar的恐怖團體，以及半軍事武裝的印度教極端主義組織(Hindutva)「國民自願服務團」(RSS)；還有哈莫德(Muzafar Ahmad)、波士(Subhas Chandra Bose)、甘地、尼赫魯和辛格(Bhagat Singh)等人不同的策略。

1947年之後，許多非洲民族主義領袖公開宣稱他們是甘地戰術的門徒。迦納的恩克魯瑪和尚比亞的卡翁達所成功領導的非暴力獨立運動，都把甘地的成就事蹟做為範本。然而，過一段時間，這兩位也都被迫承認，拓居殖民地所需要的是和此完全相反的策略，這種策略以阿爾及利亞全面進行的暴力為開端(Kaunda 1982; Nkrumah 1968)。從為爭取在羅德西亞多數統治而對抗非法白人拓居者殖民政權的那段漫長而艱苦的抗爭，迫使一個身心俱疲的卡翁達放棄他一生的原則。這種策略對法國也一直是必要的，他們依據一種非常不同的殖民統治的理論與實踐來操作。為了努力壓制革命的異議分子，並且在經歷二次大戰的羞辱之後要重新樹立它的權威，法國在阿爾及利亞和印度支那展開暴力的壓制和即時處決。1945年5月，這個剛剛解放的法國政府為了對付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的起義，以飛機攻擊塞提夫(Setif)，殺死超過一萬名的阿爾及利亞人。如果甘地是在中南半島而不是在印度實行非暴力運動，胡志明認為，他「早就上天堂了」(Andrew and Kanya-Forstne 1981: 246)。卡翁達也持相同的意見：「甘地的命運將會非常不同，如果他起來反對的不是英國的統治者，而是面對著不和他們的反對者玩善良遊戲的獨裁者」(Kaunda 1982: 27)。然而，即使在印度，分治所帶來的流血，證明在它的反殖民目標中被移除的暴力，乃是那些處於宰制、貧困和種姓制度的不平等處境下的人，表現他們的行動最為垂手可得的方法。1954年法國在奠邊府戲劇性地敗給越南，在阿爾及利亞的宣戰，古巴革命，這些都標示以非暴力做為反殖民戰略業已結束。非

暴力戰略在南非的前哨站也隨著1960年的Sharpeville事件而結束。1961年打了勝戰的越南將軍武元甲(Vo Nguyen Giap)出版了《人民的戰爭，人民的軍隊》(People's War, People's Army)，這本書被美國CIA形容為「越共支持未發展國家的叛亂手冊」(Giap 1962)。1965年9月3日，林彪出版了《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份正式聲明立即因為提出一種「人民戰爭」的理論而聞名，主張革命的暴力和一種經由「圍困」城市而達到打游擊的「殲滅戰」(Gerassi 1971, 1: 70-90)。1968年恩克魯瑪出版了《革命戰爭手冊：非洲革命武裝階段的指引》(Nkrumah 1968)。「反帝國主義的反戰主義已經死亡」，以前的反戰主義者恩克魯瑪宣布：為了打敗在1960年代主宰著全球的新的帝國主義勢力，暴力的戰術是有必要的。「用盡各種必要的手段」，暴力已經成為普遍的、可接受的。「我瞭解訴諸暴力的需求」，1968年巴西的勒西斐(Recife)大主教Monsignor Helder Camara指出：「我尊敬那些選擇接受暴力的人」(Davidson 1969:21)。

298 法農認為，非暴力僅僅是調適良好的西化菁英的理論，決不是人民尋常的作法，對此一主張後來的鄂蘭則不表同意(Arendt 1970)。他鼓勵年輕的阿爾及利亞女革命分子，把炸彈放置在足球場裡以及法裔阿爾及利亞人時髦的餐廳裡。同時，他經常擔心成為暴力犯對受壓迫者心理所會造成的影響，他和沙特曾提出頗具說服力的證明，法國和德國迫害者也受到一模一樣的心理影響。《受詛咒的大地》在人性方面由多重因素所造成的巔峰，出現於法農在他的屋子私底下治療一位陷於憂鬱狀態的警察，這位警察是個歐洲人。他在等待法農的時候，在醫院的庭院裡走來走去，這時這位警察碰到一位被他加害的人，一位由於遭受酷刑的驚嚇而神智不清的阿爾及利亞愛國分子。接著法農遇到他：

幾分鐘之後我在回家的路上從他身邊走過。他正緊靠著一棵樹，看起來要昏厥的樣子，顫抖著並且全身是汗。事實上他已有了焦慮危機。(Fanon 1965:216)

法農把他帶回家，然後又返回醫院，尋找那位愛國分子，最後在廁所裡找到他，正準備要自殺。遭遇到暴力，犯此行的人和受害者，所造成的影響力開始在法農身上產生作用。波娃到羅馬機場去接他：

在他看到我們之前我們已見到他。他一會兒坐下，一會兒站起來，又坐下去，兌換他的錢，取回行李，所有的舉止都很唐突，臉部動作極為不安，多疑地來回轉動眼睛。在車子裡，他亢奮地談話：再48小時，法國軍隊就會侵略突尼西亞，然後就會血流成河。(de Beauvoir 1968: 606)

「我可能是過度精神錯亂」，他有一天自己說出來，始終含混兩難，患了沙特以及後

來丹佳蘭加(Tsitsi Dangarembga)所稱殖民主義的令人焦慮不安的狀況。沙特和波娃都記錄了這一段，法農雖然主張暴力是「一個極力爭取自由的世界所無法逃避的命運」，他同時也被暴力嚇壞(de Beauvoir 1968: 609; Lumumba 1972: 4)。然而，他從沒有把他對崇高的暴力的讚揚，扣連到暴力理當促成的具有政治崇高性質的社會主義。

暴力的施為者卻受制於暴力，沒有一個地方比多樣的和多種族的後殖民阿爾及利亞更加嚴重，在阿爾及利亞教派的暴力現在經常被稱做「地方性流行病」(endemic)。法農不斷指出，法國在阿爾及利亞有關人性方面的遺害，乃是對「心理—感情上的影響」讓「一整個世代的阿爾及利亞人沈浸在恣意的、沒有特定對象得兇殺裡」(Fanon 1965: 205)。波娃認為，法農確實事先預見到這些麻煩：預測民族解放陣線(FLN)的勝利會換來100萬人的生命，他接著指出，或許想想印度，「浩劫之後會是令人『震悚』的」(de Beauvoir 1968: 609)。他是否預測到民族解放陣線本身會變成腐敗的菁英階級，一個由軍隊掌握權力並且接受法國政府支持的寡頭政權，乃至預測到第二次革命戰爭攻擊的對象竟是民族解放陣線本身，他的民族解放陣線？(Ottaway and Ottaway 1970) 這個戰爭的暴力仍然在上演中。阿爾及利亞的政治，以及可以稱之為阿爾及利亞社會的「去法國化」(defrancification)的政治，自從法農主張一種使暴力成為可能的政治以來，以走了一段漫長的路。就像婦女遮臉的面紗，他的政治策略放在歷史中來看，也有「一種擺盪不定的價值」。

299

#### 四、愛爾蘭：同化和暴力

我應該用什麼顏色才會畫出讓我震驚的事物，也就是，無盡的不公不義？來自一個偉大文明的所有人民都被冤屈、污辱、否定其身分。(Lyotard 1993: 170)

1649年克倫威爾在德羅赫達(Drogheda)；1882年「常勝軍」(the Invincibles)在鳳凰公園(Phoenix Park)譯註4；1916年「復活節起義」；1972年「血腥星期日」；1998年「奧馬汽車爆炸事件」(Omagh)。暴力也常被描述為愛爾蘭的「地方流行病」。羅易德(Llyod)認為：「可能除了綠色，沒有一種性質比暴力更常而且不斷被認為是愛爾蘭的屬性」(Llyod 1993: 124)。為何從來沒有一種類似法農對殖民地阿爾及利亞裡暴力的基本角色所做的分析，也對愛爾蘭裡的暴力政治加以理論處理？愛爾蘭和阿爾及利亞之間的相似性，陸思迪克(Ian Lustick)在《紛擾不

譯註4 原書把年代誤植為1892年。1882年5月6日愛爾蘭事務大臣Frederick Cavendish和次官T. H. Burker在都柏林鳳凰公園遇刺的案件。

安的國家》(Unsettled States)一書中有非常詳盡的分析。雖然愛爾蘭和阿爾及利亞之間，在暴力的層次有一些引人注意的相似處，從另一個層次來看，這兩個殖民地第一眼應該是完全無法比較的，因為它們是由兩個殖民體制完全相反的殖民政權所占領，法國和英國。然而，這種不同主要是理論上的，因為這兩者在它們各自的體制內都是異於常態的，兩者構成看似被同化的殖民地，但它們從來沒有被完全同化，而且，在這兩個殖民地裡被剝奪土地和權利的底層階級，從來沒有放棄反抗。和愛爾蘭一樣，阿爾及利亞是由一個不同宗教的拓居殖民者為了安頓開拓，用武力從當地人民手中侵占而來，殖民國家則允許這些拓居者占有土地。這兩個國家都使用武力反抗，要把殖民的政權推向去殖民化，同時在這兩個國家裡拓居的殖民者本身，則訴諸準軍事的武力以阻擋去殖民化。其差別是，在阿爾及利亞，法國放棄拓居殖民者（白種的法國移居者），這些人裡面有許多人重新移民回法國，現在成為極右派的勒彭（Jean-Marie Le Pen）最熱誠的支持者。和英國不同，法國沒有可行的體制來支撐他們帝國的瓦解。而同化的體制意味著，唯一合乎憲法的反抗方式，就是以合乎它的條件來參與——在法國殖民地裡唯一合乎憲法的方式，也就是弔詭地屈服於更大程度的同化。例如在阿爾及利亞，依據1881年「本地人法規」(code de l'indigénat)，為了取得法國公民身分、公民權和地方的投票權，阿爾及利亞人必須放棄伊斯蘭教改信基督教。穆斯林中很少人這樣做，結果他們一直沒有公民權，例如沒有陪審團來審判，或是沒有合法參與政治的途徑，一直到1919年法國才有些許的讓步（Jackson 1977: 8-9）。如同陸思迪克所指出的，在阿爾及利亞沒有土地改革，移居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阻礙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布魯姆－維奧萊」（Blum-Violette）憲法改革，使得穆斯林人沒有投票權，以及1945年法國在Sétif<sup>譯註5</sup>對穆斯林抗議行動的暴力鎮壓，這一切意味著憲法改革主義的路線對阿爾及利亞人行不通。即使在1947年訂定《阿爾及利亞現行法》(Statut de l'Algérie)這個非常有限的改革之後，選舉仍被行政機構操控偏袒殖民者。暴力成為唯一的選擇。結果，法國在軍事和政治上被人民解放聯盟擊敗而失去阿爾及利亞帝國，正如同法國被武元甲和胡志明打敗而失去中南半島的帝國，同時也正如同葡萄牙人在非洲被卡布拉爾和「幾內亞比索與維德角非洲獨立黨」、被蒙德蘭（Mondlane）和「莫三比克解放陣線」、以及被內圖和「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打敗一樣。

如果英國人在他們的殖民地沒有在軍事上完全被擊敗的話，愛爾蘭會是英國第一個因為面臨民眾和軍事抵抗導致無法治理而撤退的例子（接下來也有許多例子，雖然在該地區宣稱軍事上戰勝起義者，例如對付肯亞的「茅茅運動」，後來卻很快地從政治上撤退）。1912到1914年，北方的武裝基督教徒阻擋了西敏寺議會所通過的「地方自治法案」的實施，在這些事件之後，英國政府放棄以政治方式解決整個

<sup>譯註5</sup> 位於阿爾及利亞東北部的商業城。

愛爾蘭的問題，而訴諸於它向來最常用的去殖民化策略——分治，這種解決方法對英國人來說是毫不困難的，因為英國人自己的島上就一直是在分治的狀態。在阿爾及利亞和愛爾蘭，反殖民抗爭的暴力一直延續到獨立之後。如果在這兩個個案裡的暴力都具有宗教派系的性質，兩者之間的差異是，在阿爾及利亞不同的派系和族群結合起來組成「民族解放陣線」，然而在愛爾蘭，人民內部的分裂在民族獨立可能達成之前就已經產生分治。雖然愛爾蘭並非完全和阿爾及利亞相似，它們之間具有的相似性卻引出一個一般性的問題：拓居式殖民地在去殖民化過程裡是否會比剝削式殖民地帶來更多的暴力？同化總會帶來更多的暴力：在兩個層面均是如此，首先是一開始的統合，把本土文化轉化成宗主國文化，然後是在去殖民化的過程，要脫離戰爭勢必更加困難，同時反抗方式也更加多元和複雜。矛盾的是，如同前面所指出的，同化在本質上同時是更為自由開明的，因為它是最初所依據的假設就是平等：至少在理論上每一個人都應是國家裡平等的國民。另一方面，英國的不干涉政策、表面上對本土文化表示文化尊重的政策、以及讓本土制度或多或少維持不變的政策，這一切卻是以層級等地和低劣地位的假設為基礎。

英國人一直鄙夷法國人殖民同化的理念，但事實上他們卻在不列顛群島上相鄰的領土上施行這種理念，藉由一連串「合併法案」(Acts of Union)合併威爾斯、蘇格蘭和愛爾蘭，把幾個不同的王國併入英國的一部分。在性質上，英國的同化永遠會維持某些以前的制度不變（例如，英國駐愛爾蘭總督公署）：雖然以憲法的說詞，下屬的英國族國（nation）可派代表到倫敦的議會，它們並不像在法國那樣一直被整合到各個層級，結果是，英國到了19世紀實際上成為一個由資產階級所領導的多國中產國家（multinational bourgeois state）。英國的自由派政府有意以提供給其他白人移民殖民地的模式，在19世紀以自治的形式把權力下放給蘇格蘭和愛爾蘭（1990年代末期，英國則排除掉把此模式用在下放權力給蘇格蘭和威爾斯的案例裡）(Kendle 1989)。然而，英國在不列顛群島上所一直在施行的移居和同化的方式，使得自治在這個群島上比在加拿大、南非和澳洲更難以處理。以愛爾蘭為例，自治比較接近如印度和西非等剝削式殖民地的情境，英國鼓勵將地方對帝國統治的反抗轉向憲法改革主義者的路線，例如在1885年英國積極參與成立「印度國大黨」，或是安妮·貝森的「自治權聯盟」並且維持地方自治，將這種改革路線視為仍舊在帝國聯邦的廣大架構中運作，是最終但顯然是永遠無法實現的獎賞。

英國這種較為鬆散的結盟系統意味著，從1867年加拿大開始一直到1997年香港的去殖民化過程，比在法國系統的殖民地更容易實現，因為法國殖民地被融入的程度較高，即使在去殖民化之後它們在文化上和經濟上仍然和法國保持緊密關係（例如，前法國在西非的殖民地仍使用一種緊釘住法郎的共同貨幣）。一旦那些在英國政府裡的人終於接受這種理念，大部分的大英帝國殖民地就較容易去殖民。除了

在愛爾蘭，遲來的自由政府此一立憲行動於1912到1914年遭到由英國政府默許而成立的武裝「北愛爾蘭防衛軍」(Ulster Defence Force)所阻撓。

## 五、愛爾蘭和後殖民理論

愛爾蘭一直是在一個異常情勢中的一個異常國家(Lloyd 1993)。不僅是因為它尚未完全去殖民化，以致在今日的後殖民理論裡愛爾蘭僅占了一個相對而言不起眼的位置。還有部分原因是，愛爾蘭似乎不符合一般的模式。後殖民理論源自於阿爾及利亞和印度，奇特地綜合了法農和甘地——法農關於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處於以暴力鬥爭求取控制權的辯證觀點，結合了甘地使用心理遊戲的資源來智取敵人等等——而形成後殖民理論。結果，後殖民理論是以辯證的方式在兩種極度不同的殖民體系裡進行，使後殖民理論的涵蓋面廣泛，即使有時它似乎好像由法農和沙特所發展出來的法國理論，被運用到完全不同歷史情境中的英屬印度，彷彿把印度當做阿爾及利亞來分析。換言之，後殖民理論的發展所依據的就是用來擊退法國拓民主義和英國剝削式殖民主義的策略。因此，在後殖民理論裡的爭論把焦點放在兩種極端的無以並比事物的綜合體之間關係的動態變化，可能不致令人驚訝。然而，這並不僅是一種學院的、理論的融合。它也代表著在英國最早的殖民地—愛爾蘭—反殖民抗爭實際的歷史基礎。雖然在許多後殖民主義者之中，愛爾蘭傾向被視為(一直是)邊緣的個案，在許多方面它的角色卻是重要的。這在理論和歷史的層次上都是成立的。

技術上，有時候愛爾蘭也許並不全然是個殖民地；但愛爾蘭人用來反抗英國貴族和資產階級所掌控的那種根深蒂固的自我利益的革命和文化行動的形式，對19世紀末和20世紀所有反殖民運動而言，一直是個標竿。特別的是，各種持續推動憲法改革的壓力在同一時間的結合，與殖民者本土中心激進分子的連結，一種充滿活力且表達清晰的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加上如同在土地戰爭(the Land wars)和絕食罷工等普遍的消極抵抗的行動形式(這是甘地所仿效並把效果發揮到極致的策略)，再結合策略性的行動分子的革命恐怖主義和起義，這些除了提供給所有後來的反殖民抗爭完全以軍事叛亂為主的戰術之外，也提供了最為有效的混合戰術的典型。

稍早我曾問道，為何一直都沒有一種類似法農對暴力在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的基本角色的分析，針對愛爾蘭的暴力政治去進行理論工作。事實上，大多數愛爾蘭的著作毫無疑問都充斥著這類的主题。以暴力達成英雄殉難的傳統，如托恩(Wolfe Tone)、埃米特(Robert Emmet)、「曼徹斯特殉難者」(the Manchester Martyrs)、皮爾斯(Padraic Pearse)，長期以來一直做為愛爾蘭民族的神話。然而，對暴力政

治所做的理論敘述沒有在愛爾蘭之外成為一種普遍的神聖的地位，並且可以用來和法農所做的分析相比擬。雖然法農是「民族解放陣線」的主要成員，他有關阿爾及利亞的著作有個優勢，就是他沒有直接參與戰爭。這些著作則是有意的以扼要和一般的方式表達給一般人看，這種作法有利於應用到其他地方。法農贊同列寧和托洛斯基所主張革命具有普遍轉譯性(universal translatability)的論點，而反對卡斯楚和卡布拉爾所堅持的革命的不可轉譯性。更準確地說，法農弔詭地意圖把三大洲馬克斯主義那種地方的、不可轉譯的原則，變成可以轉譯的、普遍的。就以暴力來論，法農把暴力在阿爾及利亞是唯一的政治選擇這個歷史事實，轉化成一種普遍的反殖民主義的哲學，一種殖民地經驗的存在形式，以及被殖民者超越他或她在殖民環境中所受羞辱感覺的手段：「被殖民者在暴力中以及經由暴力來找到他的自由」(Fanon 1965: 67)。在愛爾蘭，歐馬力(Ernie O'Malley)在這方面最接近法農：「只有藉由戰鬥，」他說：「愛爾蘭才有可能獲取它自己的自尊或是任何實際的好處」(English 1998: 203)。注意這裡的結合，這對法農也是重要的，暴力所提供的是政治的好處和自尊的產生。

## 六、「愛爾蘭敗了，不列顛『帝國』走了」：康納利和1916年復活節叛變

相反地，社會主義者康納利在他對於暴力的想法則較少絕對主義的色彩，同時在他的1899年的文章中對「在愛爾蘭政治中身體的力量」提出更為謹慎的評估。康納利對那些沒有清楚分辨所要對抗的不同狀況，而一味主張暴力(或「身體力量」，以他所用的憲章主義者的語言來說)為唯一可能選擇的人表示懷疑。他認為，一個不實行社會主義的獨立的愛爾蘭，自然地會發現自己受到英國新殖民主義的主宰。康納利對暴力的態度比法農更受到歷史的影響、也更實際，他認為暴力會排除掉存在的榮耀，這種地位他或許可以接受，因為社會主義已經提供給他自尊以及道德的優勢，這在他那篇對英國帝國主義的虛偽作為的有力分析裡可以明白顯示：

我們對於(在群眾運動裡的身體力量)的立場是，實現進步理念要或不要使用武力，一直是、未來也一定是受態度所決定，但不是進步這一方的態度而是反對進步這一方的統治階級的態度，如果進步這一方已經用盡所有可用的和平手段，來向人民和他們的敵人證明，新的革命理念擁有大多數人的投票權；然後，代表著革命理念的進步這一方，有正當的理由採取行動來使用政府的武力，以及使用武器來驅逐奪權的階級或掌權的政府。(Connolly 1998b: 208)

這段說明讀起來幾乎像 19 世紀愛爾蘭獨立抗爭的一段理論史，從憲政議會的渴望，走向自治，再走向暴力的革命政治。康納利在 1899 年寫下這段話，到了 1915 年他已經更接近索雷爾認為工人階級暴力擁有「一種非比尋常的效能」的信念，而且也更加同情索雷爾所稱「直接並且革命的方法」：『「那些靠劍維生的人必將在劍下滅亡」經文如此說』，康納利寫道：「非常有可能出現的是，在事件發展的過程中，愛爾蘭工人階級會被要求去面對使用劍（或來福槍）的不可妥協的必要性，來對抗另一個階級，這個階級的行事準則已經在他們身上和這個世界招來當下歐洲戰爭那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懼」（Sorel 1999: 62; Connolly 1988b: 210-11）。已經到了讓資產階級的武力來嚙嚙無產階級的暴力的時候。策略的情境已經大幅度改變，在那個時刻，他相信，愛爾蘭代表著大英帝國最脆弱的點，可能帶來最大壓力的殖民地。當他向著郵政總局邁進時，康納利非常清楚，他是在走向他的死亡之路。同時，從一種國際主義反帝國主義的觀點來看，1916 年復活節並不是如它後來所表現出的那種天真的主張。到了 1916 年，許多被俄國所殖民的東歐國家也到了盼變的階段，而且許多歐洲帝國的殖民地也已經揭竿起義——例如，1914 年德國的喀麥隆，1915 年有尼亞薩蘭（Nyasaland）<sup>譯註 6</sup>，1916 年有達荷美、法屬中南半島和尼日，1917 年葡萄牙所屬東非（莫三比克），以及查德、埃及、印度、象牙海岸、肯亞、奈及利亞、塞內加爾、突尼西亞、烏干達、和最為成功的利比亞（Boahen 1985; Marr 1971）。在復活節起義的前一年，印度錫克教軍人在新加坡叛變並且成功地奪取該城市。他們希望，在德國的幫助之下，能把英國人趕出馬來半島，最後把他們從整個遠東地區趕出去。由於獲得法國和日本的協助，英國弭平了叛變，400 名軍人遭送軍法審判，41 人被處死（Riddell 1986a: 383）。在 1942 年，故事可能要改寫。

康納利之所以轉向暴力，絕不是因為讚賞它為一種存在的情境，或是像皮爾斯一樣把它當做達成英雄殉難的手段，而是因為它是一個特定的時刻裡的策略性行動（Moran 1994: 128; Pearse 1917-22）。1945 年，他開始瞭解到被殖民的愛爾蘭人的矛盾，就像印度人、非洲人和大英帝國其他殖民地的人民，被要求自願或是被隨即抽調，以大英帝國主義的名義為保衛比利時人的自由而去打戰，以及保衛英國軍事位置的弱點。他也因為下列的事件而做出回應：推動自治的人在拋棄自治法案之後轉向支持戰爭，他自己的黨——愛爾蘭工黨（the ILP）——的瓦解，更不用說第二國際瓦解之後其成員大部分在大戰爆發的時候都回去支持他們自己的國家——康納利

<sup>譯註 6</sup> 尼亞薩蘭是馬拉威共和國的前身，1891 年起成為英屬保護地，1953 年英國政府將尼亞薩蘭與南北羅德西亞合併成立羅尼聯邦（Federation of Rhodesia and Nyasaland）；但受到尼亞薩蘭人反對。1958 年起尼亞薩蘭人在班達博士領導下積極爭取自治，1963 年 12 月羅尼聯邦解體，尼亞薩蘭獲英國同意於 1964 年 7 月 6 日正式獨立，改名為馬拉威，1966 年 7 月 6 日頒行共和憲法，定名為馬拉威共和國。

是少數堅持反對戰爭的社會主義者之一。在這種環境之下，他認識到有必要激烈地去轉變愛爾蘭民族主義者的行動事項。議會成功地抵擋了北愛爾蘭的自治，這個結果指出了英國願意去殖民的限度（相對於戴高樂在面對來自殖民地移民的同樣的軍事抵抗時，即決定撤離阿爾及利亞）。這個問題必須使用武力——用「直接且革命性的方法」。康納利在 1913 年都柏林運輸工人大罷工的餘映中創立愛爾蘭國民軍（Irish Citizen's Army）；1916 年經由「愛爾蘭共和兄弟會」（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軍事委員會的中介，和愛爾蘭志願軍成立聯盟。不論是否一種恐怖之美，1916 年的起義完全改變了愛爾蘭政治接下來的路線，然而事實上，並不是以直接的方式來改變。如同陸思迪克所觀察到的：「阿爾斯特（Ulster）新教徒和英國政府本身，為了在 1916 年的政權危機中享受一段相對安逸的逃避，以及隨之而來為了迫使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去承擔 1921 年和談的政治重擔，而繼續付出代價」。在 1948 年英國的撤退和分治可能把另一個國家推入移居者暴力的軌道裡，並且隨意地讓一個民族一無所有。「甜美的巴勒斯坦土地……」，

這是誰的無頭身體  
誰的腥紅色裹屍布  
誰的被撕裂和受重創的披風  
誰的破裂的聲音

（Faiz Ahmad Faiz and Ahmad Faraz, in Jamal 1986: 32, 100）

康納利對同化政治的回應是經過仔細思考的、歷史的和策略的，然而他的行動的聰明之處，卻很少受到後殖民理論和底層階級歷史等萬神殿的接受（他遭修正主義歷史所斥，倒不令人訝異；Howe 2000: 62-4）。從後殖民的觀點，康納利——他的名字本身聽起來像是故意阻止 colony（殖民地）這個字反著寫——乃是首先在殖民地的地方上結合社會主義政治以及民族自決要求的人之一。他的革命的反殖民暴力一直是固著在更廣大的社會主義目標的政治觀點裡。如同他在「在印度即將發生的抗暴」（The Coming Revolt in India [1908]）、「小民族的朋友們」（Friends of Small Nationalities [1914]）、「什麼是個自由的國家？」（What is a Free Nation? [1916]）所提出的犀利分析顯示，康納利在他那個時代也是很尋常，可以在不列顛和歐洲帝國主義這種全球的範圍內，去理解愛爾蘭的政治（Connolly 1973; 1988a, 1988b）。他在 1896 年成立愛爾蘭社會主義共和黨，如他所說的，「要把所有勞工的力量聚集起來，對社會進行一場革命性的改造，並且附帶摧毀不列顛帝國」（Connolly 1973: 167）。雖然民族自決和社會主義之間爭取優先順序的問題，從 1890 年中葉在歐洲社會主義者圈子裡激烈地爭辯著，康納利是第一位被殖民民族的領導人，主張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是可以並比的，如此做的結果催生了一種立

場，不僅啟發了列寧以及經由他帶來第三國際，接著也成為勝利的三大洲馬克思主義民族解放運動的明確特性，包括法農的馬克思主義，以及毛澤東、卡布拉爾和格瓦拉的馬克思主義（例如，Mao 1965, II: 195-211）。這個三大洲馬克思主義，普遍地但錯誤地被當做是馬克思主義的民族主義，最好是跟著恩格斯稱為民族主義的國際主義（恩格斯本人贊同愛爾蘭人「他們實際上雖是民族主義的取向，卻是最具國際主義色彩的」；Marx and Engels 1971: 332）。這並不是在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之間做選擇的問題，而是，法農也有同樣的看法，在一種跨文化連結的國際主義架構裡的一種反殖民的民族主義（Fanon 1967: 199）。在這樣的脈絡之下，康納利也是第一位開啓後來大致成為三大洲反殖民馬克思主義的明確傳統，甚至是文學上的類型（其他還包括毛澤東、武元甲、恩克魯瑪、卡布拉爾和格瓦拉）：那些後來結集成冊討論有關游擊戰戰術的文章寫作（Connolly 1968）。在1919到1921年之間，在Michael Collins領導下的愛爾蘭人有可能成功地採取一種康納利在死前完整勾勒出來的游擊戰戰術（Coogan 1990）。如同他那個時代可以稱得上社會主義者的那些人，性別平等也是康納利的一個核心原則。他認為在任何反殖民抗爭中婦女解放的必要性的信念，起源於他認識到，如同事實所顯示的，在愛爾蘭的女性是雙重被殖民的——奴隸的奴隸，以他的話來說（Connolly 1988b: 191）。雖然有人抱怨，康納利的馬克思主義的民族主義有所修改來配合天主教教義，這種做法事實上只有增加他在反殖民以在獨立及傳統中的重要性（Garvin 1987: 126）。

306 當康納利參與1916年起義的事情為大家所知時，許多歐洲的社會主義者據說感到困惑，無法理解他為何會參與愛爾蘭民族主義。康納利事實上已經很小心地說明了他對於在葛理飛領導下的原初的新芬黨（Sinn Fein）的立場：雖然批評它的意識形態的資產階級面向，他呼籲在新芬黨和愛爾蘭社會主義者之間建立起政治聯盟（Connolly 1977; Faligot 1978）。這次起義主要是由民族主義者所主導，在起義之後，流傳著康納利已經放棄社會主義的說法；因為這些說法，康納利受到劇作家歐凱西（Sean O'Casey）強力的譴責（Howell 1986: 141）。在第二國際的政治環境裡，當時第二國際已調整它自己來支持戰爭，許多不在愛爾蘭的社會主義者，例如普列漢諾夫（Plekhanov），就譴責這次的起義。叛變之後所發展出來對新芬黨的支持，普遍地然而並不正確地和它關聯在一起，的愛爾蘭欠缺對應的社會主義，也使得評論家例如霍布斯邦把康納利描寫成一個失敗者（Hobsbawn 1977）。整個有關康納利生平的敘述，也用來解釋一般所說他參與民族主義的不尋常現象，或是相反地去指證康納利「放棄他的政治投入一般的民族主義運動」（Allen 1990: 159）。然而在反對英國的起義裡，康納利一直跟隨著馬克思的處方，馬克思在1870年寫道：

要在歐洲加速社會革命，必須在英國的災難上來推進。要達到這個目標，

必須在愛爾蘭攻擊她。這是她最脆弱的地方。愛爾蘭失敗了，不列顛帝國離開了，同時在英格蘭沈寂而且令人不快的階級戰爭，將採取嚴重的形式。（Marx and Engels 1971: 290）

康納利一直認為「愛爾蘭爭取自由的運動不能和散布全世界的世界的民主運動脫鉤」（Connolly 1973: 150）。這是康納利表面上投入「民族主義」的政治基礎。共產主義者對1916年起義的反應更透露出某種信息：托洛斯基採取溫和的支持態度，列寧更是如此。在面對社會主義者對叛變的指責，他寫道：

在愛爾蘭藉由叛變對英國主張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加以重擊，在政治上的意義是10倍於以同樣力量在亞洲或非洲所施加的重擊。……歷史的辯證法則就是弱小民族，縱使在反抗帝國主義上市個無力的獨立（independent）因素，扮演著酵母或是桿菌的角色，幫助真正的反帝國主義力量——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在舞台上出現。……愛爾蘭人的不幸在於，提早在歐洲無產階級的反叛醞釀成熟之前，便挺身而出。（Riddell 1986a: 378-9）

列寧因此強調此次叛變在革命的反帝國主義觀點中的意義，不僅把它放在歐洲的脈絡裡，也放在戰爭爆發以來，在各殖民地裡所發生的反抗運動來看。同時，列寧並沒有排除愛爾蘭叛變的民族主義基礎，由於他讚揚此叛變在國際上的意義，他認為此叛變如同普世運動的更大而又不平均的過程的一部分，經由這個叛變群眾也獲得了達到成功的革命的知識和專門技術。對康納利也一樣，1916年的起義同時是民族主義的和國際主義的——就如同一年之後在完全不同的國際脈絡裡發生的1917年的布爾希維克革命，好像是它先做了預示和演練（Howell 1986: 151）。今天，康納利被認為是愛爾蘭社會主義的創始人之一。雖然他在後殖民理論的辯證法則裡很少出現，康納利以及那些和他一起作戰的人，也應該公正地在反殖民主義歷史和它的理論傳統裡被擺上重要的位置。然而，康納利之所以能和那些從事反殖民抗爭的偉大人物並列，不僅是因為民族的自決，而且是因為正義、平等、消滅貧窮和尊重人性尊嚴。

不！我盼望我的同胞在他們面前所建立的理想中的共和國，應該具有這樣的特質，只要提到它的名稱，無時無刻都會提供在所有土地上受壓迫的人一盞明燈，而且無時無刻堅持自由和富足的承諾做為他們為它所付出的努力的回饋。（Connolly 1988b: 122）

「我們知道他們有夢想；足夠／知道他們曾經夢想過而現在已經死去」：康納利的願景是期盼愛爾蘭會成為土地上受壓迫者的明燈，此將永遠遭到世上暴行的短促敘

事所縈繞，這個敘事終結了他人生的每一個故事。由於在復活節起義期間腿部所受的槍傷惡化成壞疽而生命垂危，他被固定在病床上然後接受軍法審判。三天後英國軍隊用擔架把他帶到都柏林凱明（Kilmainham）監獄的廣場，先綁在椅子上讓他直立，然後槍決。

他們緊抓我們的手，我們的身體被管制，並且奮力去掌管心靈

地獄本身無法越過他們對人類的邪惡的行徑——

以及那些爲了人權奮力要去打破他們身上受詛咒的桎梏的人——

我們人類中最爲高貴的，我的小孩，在他們的打擊之下倒下。

（〈遺蔭：垂死之社會主義者致兒書〉；Connolly 1998b: 299）

## 22.

# 印度 I： 馬克思主義在印度

### 一、印度獨立運動的獨特性

古哈指出印度的獨立並沒有經過民族的解放運動（Guha 1997）。印度的解放採取一種獨特的形式——雖然這個獨特形式真正的內容爲何一直是辯論的主題。這些解放運動都是個別的，但印度的自由運動無論在參與者意識形態的範圍或是運動的執行方式都是獨特的。從它那概括的輪廓來看，它和大英帝國當代其他地區的解放運動並沒有不同：在1857年的起義之後，印度的反殖民運動大部分和愛爾蘭及大英帝國其他地區要求自治的策略一致。許多特點和其他的解放運動類似：隨著1885年「印度國大黨」的成立、「穆斯林聯盟」在1906年建立、及「基拉法運動」<sup>譯註1</sup>和其他形式的泛伊斯蘭主義的影響，開始展開一場憲政改革運動，同時也掌握1917年布爾什維克的革命，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打敗帝國勢力之後，和國際以及機會主義所施加的巨大壓力相連結的共產黨的發展，他們所提出的另一種激進的路線。印度成功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接著也受到非洲和其他反殖民的行動主義分子的模仿，例如恩克魯瑪。然而，有兩種要素和其他自由的鬥爭有明顯的差異：成立的「國大黨」其組織結構、技巧和控制黨員的能力，剝奪了「共產黨」在其他地方所能得到的最大利益；第二，由目前可說是最有名的反殖民領袖甘地在國會黨之外扮演一個獨特的、怪異的、和獨一無二的角色。甘地號召到的廣大擁護者的程度是「共產黨」所無從勝過的。這些要素一直到現在都還在印度人的政治和生活產生迴響，對左派特別如此。

引人注目的是，受到它堅定的反民族主義立場的影響，有些權威的印度民族主義歷史甚至不認爲有必要提到「共產黨」（例如，Masselos, 1993）。然而，印度的正統的和其他類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印度長期的獨立鬥爭中扮演了一個儘管是從屬的卻是重要的角色。這個運動主要藉由以甘地和尼赫魯的理念爲中心的印度民族主

<sup>譯註1</sup> Khilafat movement：「基拉法」是土耳其伊斯蘭教主，由土耳其王兼任。土耳其戰敗後，印度穆斯林發起基拉法運動，要求英國保護基拉法的權利。這是一個受到印度民族主義影響的泛伊斯蘭運動，爲了挽救伊斯蘭在政治上的影響力。由Ali兄弟等人所發動，從1919年持續到1924年。

義來作戰，並且藉由「印度國大黨」和透過「穆斯林聯盟」來傳達「基拉法運動」所存續的精神來組織。起初，「印度國大黨」是一個溫和的組織，堅持聲稱效忠英國統治者。然而，從大約1900年，它的領導權受到提拉克（Tilak）和高絲（Ghose）所領導的激進分子的挑戰，這兩個人結合了印度的精神傳統復興和一種武裝的政治激進主義，並且試圖把國會轉變成一個真正的反帝國主義的工具（Wolpert 1989）。在他們的影響之下，國會採取了自治（*swaraj*）的目標——在大英帝國裏施行自治。雖然如此，國會維持一種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菁英組織，直到甘地在1920年行使領導權並開始擴大民眾的基礎。即使跟隨甘地和尼赫魯，國會一直是處在一種情境，試著去控制和引導組織的或群眾的戰鬥精神，而這些形式經常是由下向上竄起，不僅來自左派，而且來自印度右派的準武裝地方自治主義組織（paramilitary communalist organizations），例如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RSS），以及農民運動，例如農民組合（Kisan Sabha）（Curran 1951; Gupta 1982; Jaffrelot 1993; Madhok 1996; Malkani 1980; Rasul 1974）。

## 二、印度的社會主義：從社會主義到全民福利（*Sarvodaya*）

除此之外，「國大社會主義黨」（Congress Socialist Party, CSP）這個「國大黨」的社會主義派系，從它在1934年創立之後就開始推動國會採取左派的政治議題和群眾動員的形式（Bairathi 1987; Ghosh 1996; Sarkar 1989; Sharma 1984）。「國大社會主義黨」開始進行定義一種本土的印度社會主義。起初，它和「印度共產黨」（CPI）的主要差異，乃是它採取著親民族主義的立場。「國大社會主義黨」的社會主義綱領，在Merrut和Frizpur的1936和1937年題綱中有詳細的論述，一直是此政黨直到獨立之前的理論基礎（Prasad 1974: 279-84）。這些題綱的〈馬克思社會主義〉事實上是納拉揚（Jayaprakash Narayan）<sup>譯註2</sup>（‘J. P.’）的作品，他是「國大社會主義黨」早期領導人裏最具馬克思主義色彩的，而且是因為「印度共產黨」反民族主義的立場才加入「國大社會主義黨」。納拉揚是在美國的時候學習到共產主義；就如這些題綱所指出，對他以及對「印度共產黨」而言，反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形成一個完整的綱領的其中部分。

尼赫魯是積極支持「國大社會主義黨」的，雖然他自己從來沒有加入過。從他早年成為「反帝國主義和支持獨立聯盟」的主席就參與激進的共產主義，他在1927年到蘇聯，1930年代在監獄裡的激進化，以及被英國人稱為「共產主義的大祭司」，尼赫魯一直批評著甘地的經濟理念是一種倒退的反工業社會主義。執政時，他全力投入社會改革。由發展出印度國家的政治認同，再加上結合現代化、進

<sup>譯註2</sup> Jayaprakash Narayan（1902-1979）：印度政界領袖和理論家。

口替代的經濟政策以及強勢的中央集權國家計畫和控制，尼赫魯式的國家社會主義可以說最接近戰後英國的勞工政府。尼赫魯從來無法為他那種以技術進步、計畫和自足為基礎的經濟民族主義提供一種哲學和道德基礎，就像用來作為桑戈爾（Senghor）或尼雷爾（Nyerere）的非洲社會主義的那種基礎（Ali 1985; Chatterjee 1986: 131-66; Khilnani 1997; Nehru 1936, 1946; Sarkar 1989: 252-3）。這主要是甘地普遍的影響力所致，甘地的理念逐漸主導著在尼赫魯主政下的社會和經濟思想的哲學基礎。尼赫魯也肯定這些理念，他一直強調著個人和「生命的倫理和精神層面的重要性，這些終極是文化和文明的基礎」（Sampurnanand 1961: 77）。

「國大社會主義黨」本身一直採納由羅伊亞（Ram Manohar Lohia）<sup>譯註3</sup>所主導的一種強烈的甘地觀點（Arumugam 1978; Lohia 1978; Shastri 1985）。雖然像納拉揚和狄瓦（Nandre Deva）這些人更明確地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取向，羅伊亞和帕渥丹（Achyut Patwardhan）則考慮如何修改社會主義的原則來適應印度的情境，這在實際作法上就是納入甘地的思想。甘地的「社會主義」主要等於全民幸福（*Sarvodaya*）所界定的，這是他從羅斯金的《留給後來者》（*Unto This Last*, 1862）隨意翻譯過來的（Gandhi 1951）。羅斯金的書激發了由莫里斯所領導的「英國藝術和工藝社會主義運動」（British Arts and Crafts Socialist movement），他的夢想乃是回到一種烏托邦式的家庭手工業社會。在這個論點上，甘地又再強調精神價值的重要性，以及非暴力道德改革和精神更新的必要性。還有其他的影響因素共同推動著「國大社會主義黨」往這個方向發展，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維韋卡南達（Swami Vivekananda）的神智論（theosophy），和「國大社會主義黨」建立者三普納南德（Sampurnanand）的吠陀思想的（Vedantic）傾向（Biswas 1986; Sampurnanand 1961）。當納拉揚從1940年開始轉向甘地思想的方向，這種協調的關係明確地轉變了。雖然他曾在《為何要社會主義？》（*Why Socialism?*, 1936）中主張只有一種社會主義，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到了1946年他接受可能有一種印度的社會主義，同時也附和著羅伊亞問道：「我們為什麼不能結合馬克思主義思想和甘地的思想與實踐，而達到一種我們自己的綜合體？」到了1957年，在《從社會主義到全民福利》（*From Socialism to Sarvodaya*），他明確地以甘地式的語言來界定社會主義（Mehrotra 1986; Prasad 1974: 146）。獨立之後，「國大社會主義黨」愈來愈甘地主義靠攏，特別是它和克里藍霓（J. B. Kripalani）的「共產主義人民黨」（KMPP）<sup>譯註4</sup>合併，而且所有的主要社會主義者都強調結合甘地的精神價值的必要。如果印度的社會主義成為印度的，這表是它更

<sup>譯註3</sup> Ram Manohar Lohia（1910-1967）：柏林大學哲學博士，1933年回印度，是國大社會主義黨1934年成立時主要的理論建構者。Nehru當國大黨主席時，任命他當外交部門的第一書記。

<sup>譯註4</sup> KMPP的全名是Kisan Mazdoor Praja Party。



受到甘地的全民福利的主導，而不是社會主義。依據甘地的名言「對人類而言，捨棄是一種享受」，在獨立的印度實現全民福利，實際上是延續大多數印度人民受迫的貧困（Gandhi 1993: 381）。

311

### 三、馬克思主義在印度

馬克思主義在印度並沒有演進成印度的馬克思主義。它一直以維持嚴格的正統來顯現它自己。首先，這是它反民族主義立場的結果，第二，它同時也需要和甘地主義劃清界限，並且使「國大社會主義黨」的「馬克思的社會主義」顯得崇高純潔。所以，不同於其他殖民的地域，在那些地域裏馬克思主義不論是在共產黨內或黨外，都和民族主義結合成為形成民族解放運動過程的一部分，而在印度並沒有發展出一種特定的印度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一種為適合印度社會環境而重新詮釋的馬克思主義。雖然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組織在印度的政治和社會鬥爭中格外活躍，並且印度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例如柏曼（Reboti Borman）、杜特（R. Palme Dutt）（終其一生都住在劍橋）和寶韋尼·盛（Bhowani Sen）（「印度共產黨」的書記），都是非常具有創造力的作者，但他們並不像非洲、中國、拉丁美洲或西歐馬克思主義那樣，把馬克思主義發展成具有特定的和地方的形式。印度的馬克思主義，如同納亞爾（Raj Nayar）所指出的，一直比較受到「共產政黨裏政治從事者的規劃所主導，而不是由學者」（Pantham: 1995: 75）。在「印度共產黨」趨於維持跟隨蘇聯官方路線的情況下，印度的馬克思主義明顯地墨守成規，直到共產黨分裂成「印度共產黨」（CPI）和「馬克思主義印度共產黨」（CPI（M）），這是由於1964年戰爭之後對中國的不同態度所產生的結果，後者隨後在1969年又分裂成「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CPI（M））和納薩爾派（Naxalite）的「印度共產黨—馬克思—列寧主義」（CPI（M-L））<sup>譯註5</sup>，在此之後強大的毛澤東思想運動開始發展開來（Dasgupta 1974; Mohanty 1977; Sen Gupta 1979）。由於印度是馬克思本人唯一細加分析的少數被殖民國家，這更加強化印度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性：所以因應本土進行調整或轉化並不是必要的（Marx and Engels 1959）。直到1970年代末期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才開始認真使用古典馬克思理論的範疇來分析印度社會的特殊性質，無論是當前的或是殖民主義前印度的社會構成，而不是嘗試去發展具有他們自己特色的馬克思理論的傳統（例如，Dutt 1940; Karnik 1957）。對「印度共產黨」而言，它在1964年分裂時，這個情況更加嚴重，分裂之後「印度共產黨」更加緊緊抓住蘇維埃路線。然而，三大洲的毛澤東馬克思主義在印度的發展，也開啓了理

<sup>譯註5</sup> 這是印度主張通過農民武裝鬥爭奪取政權的共產黨人，因最初活動於西孟加拉邦薩爾巴里地區而得名。

論和政治創新的可能性。沿著由「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印度共產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其他毛澤東主義的團體所領導的革命運動，一種新的公開辯論的文化，其中最富深意的是刊載於具影響力的《經濟與政治週刊》上，逐漸顯示一個活躍的理論環境，同時也標示出它自己的理論—政治的發展軌跡，不僅關注農民的反抗，也關注諸如亞細亞或封建生產模式，列寧的非資本主義的發展路線（一個由「蘇聯共產黨」（CPSU）在1970年代為三大洲社會所推廣的概念）殖民地資本主義對前資本主義農民社會產生「保存—瓦解」的作用，葛蘭西的被動的中產階級革命，土地重分配，低度發展等等概念對印度社會的適用性（Alavi and Shanin 1982; Bagchi 1982; Banerjee 1985; Byres and Mukhia 1985; Kurian 1975; Patnaik 1991, 1995; Sau 1978）。在學術的方面，這類理論的創新和轉化則以1980年代底層階級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歷史學家的出現最為顯著。

312

然而，這是馬克思主義在印度幾乎快一個世紀的時候才出現。因此，羅伊針對列寧的非正統觀念——無產階級政黨應該支持中產階級民族解放運動，而和列寧本人進行辯論的時候，是一個先期但帶有徵兆的時刻（Carrère d'Encausse and Schram 1969: 151, 162; Riddell 1991, 2:851-5）。印度共產黨在莫斯科共產國際大會上的干預，以及它對塔什干進行沒有成功的遠征，都已在第10章討論過。羅伊的真名是 Narendra Nath Bhattacharya，他起初並不是個共產黨員，而是20世紀初孟加拉和國貨運動分裂時期，參與發展自孟加拉的恐怖團體之一的積極分子（Anushilan Samity 成立於1902年，the Dacca Anushilan 則在1908年開始活動），這些恐怖團體並且迅速和國際連結，特別是那些革命流亡分子在海外所建立的基層組織（Chandra 1979; Sarkar 1973; Singh and Singh 1986）。印度恐怖分子大部分出身自菁英家庭，他們的歷史以及他們透過印度和全世界革命組織所進行的連結，是一段極為吸引人的故事，所幸這些故事都完整保留下來（Bose 1971; Dublisch 1982; Heehs 1993; Sareen 1979; Sarkar 1989: 247-53; Sinha: 1994）。這個時期印度革命分子向德國，接著向蘇聯和日本尋求協助（Patnaik 1992; Sareen 1993）。兩次在爪哇和載有德國武器的船隻會和失敗之後，羅伊流亡到美國，並開始拜訪海外的一些團體。他的第一站是加州，他接觸了由印度革命家戴爾（Har Dyal）所創立的「加德爾黨」（Ghadr，意為「抗暴」）的流亡分子。這個黨在上海和曼谷也很活躍。在倫敦，由克里遜瓦瑪（Shyamaji Krishnvarma）所創立，隨後由印度民族主義者塞佛卡所領導，並以海格區（Highgate）的「印度之屋」（Indian House）為基地的激進革命運動，則在威廉·韋力爵士（Sir William Curzon Wylie）於1909年被塞佛卡的同夥政治暗殺之後被關閉。即使是在戰爭的壓制和困難之下，有些團體仍繼續運作，包括「自治權聯盟」（Home Rule League），此聯盟以沙拉瓦拉（Shapurji Saklatvala）最為有名（Hunt 1993; Ker 1973; Visram 1986: 102-12）。「自治權聯盟」也有一個支部

在紐約，是由雷依所領導，他和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合作緊密。在東京有一群人聚集在包斯（Rash Behari Bose）周圍，他爲了躲避「德里—拉合爾」（Delhi-Lahore）密謀案件的審判而逃離印度。在巴黎有一個由拉納（S. R. Rana）和卡瑪（Bhikaji Cama）領導並且存在已久的團體，後者以在1907年「司圖加特社會主義大會」上展開印度國旗而聞名。在柏林，流亡團體是由恰托巴爾亞耶（Virendranath Chattopadhyaya）和杜塔（Bhupendranath Dutta）所領導。同時，德國政府也邀請戴爾去領導柏林印度獨立委員會—然而雙方並沒有任何協議，像凱斯曼爵士一樣於1914年獲得德國總理支持愛爾蘭「民族自由」的公開聲明，因而地得到國際對愛爾蘭獨立的承認（Inglis 1973: 282）。在喀布爾「印度臨時政府」是由普拉塔（Mahendra Pratap）和其他人所領導，然而在塔什干泛伊斯蘭的「印度革命同盟」由納柏（Mohammed Abdur Rabb）和哈莫德（Muzaffar Ahmad）所領導的一個大支隊，則準備由阿富汗向印度攻擊。後來普遍不受歡迎的羅伊帶著兩列車的武器和黃金加入後者。這些不同的團體相互爭奪，試圖獲取柏林和莫斯科政府承認自己才是主要的印度解放組織。他們在海外基地的國際範圍，逐漸促成印度和愛爾蘭民族主義者之間的重要連結，這些連結大都是經由倫敦、紐約和南非進行聯繫（Brasted 1980; Hunt 1993; Jayawardena 1988: 94; Ker 1973; Overstreet and Windmiller 1959）。印度—愛爾蘭在「從屬同胞」和「受難者同胞」之間所進行的民族主義的連結，在1860年代就已開始發展：愛爾蘭人一直對1857年印度的「兵變」（Mutiny）極爲欽佩；他們從孟加拉1874年的飢荒，再次看到在1840年代他們自己的帝國的歷史。所以他們和印度民族主義團體進行聯盟，並不是出於利他的精神來支持這類的印度民族主義〔雖然也有例外，例如卡森恩（Margaret Cousins）〕，而是來自歐布來恩（William O'Brien）廣爲人知的原則，「英國的困境就是愛爾蘭的機會」（Brasted 1983: 89, 96; Sarkar 1989: 135, 144-7; Viswanathan 1998: 203-7）。

羅伊想要將「印度共產黨」建立成有力的政治力量的意圖，在1922年之後並不太成功：由於是從國外來組織，因此很容易受到已在殖民地國家遂行蒐集情報資料已超過一個世紀的英國情報局的控制和壓制（Bayly 1996）；到1934年「印度共產黨」的黨員幾乎不到三位數。爲了回應共產國際的指令，羅伊企圖進行一種打入國大黨來改變國大黨的形式，卻極爲不成功（Haithcox 1971）。以他的孟加拉《劃時代報》（*Yugantar Bengali*）恐怖主義分子的背景，他對甘地和非暴力原則特別充滿敵意。當甘地以「喬里喬拉事件」（Chauri-Chaura incident）爲理由而終止不合作運動時，他極爲憤怒。從他在柏林的基地，他替共產國際安排送出底下的信息給1922年大會在Gaya<sup>譯註6</sup>的會議，這個信息事實上是他自己寫的：

譯註6 位於印度東北部的城市。

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是以武力來達成，並以武力來維持；所以，它只能以武力的革命才能夠也才會被推翻。……就自衛而言，印度的人民必須採取暴力的手段，否則以暴力爲基礎的外來統治就不可能被終止。（Overstreet and Windmiller 1959: 55）

在他明顯地無法在印度建立一個有力的共產黨之後，共產國際派羅伊到中國做爲共產國際的特使（他被迫得去進行他早期所反對的政策—和中產民族主義團體聯盟），主要原因是要在英國共產黨的一位代表到加爾各答去掌管時，不讓他在現場。一直到令人敬畏的喬旭（P. C. Joshi）在1934年掌控時，「印度共產黨」才成爲一個認真的政黨，黨員也開始成長。羅伊本人在1930年代再度竄起成立一個他自己的工會組織，這個組織可說是比他早期的政治組織更爲成功。羅伊傳留下來一項最著名的餘蔭，就是對民族主義的不信任以及在爲自由抗爭時要共產黨和民族主義運動保持距離，這大部分和後來的國際共產的路線相符合（Bairathi 1987; Ghosh 1996）。不同於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在由史達林指導下的共產國際政策和地方共產黨民族主義觀點的發展之間，並沒有決裂。

「印度共產黨」在孟加拉最爲成功；弔詭的是，這可說是在孟加拉監獄裡「共產黨團體運動」的結果。因爲參與諸如1930年的「吉達港軍械庫搶劫」（Chittagong Armoury Raid）事件而被英國人監禁的恐怖主義分子，他們在監獄裡卻得到這個專制君主制同時也是自由主義的英國政府允許在監獄裡閱讀馬克思和列寧；他們從同牢房裡的共產黨員學習到當代的共產主義。其結果是這些恐怖主義分子被吸收進入共產黨，他們將組織機構的基礎帶入黨的知識分子分部，這些知識分子主要來自孟加拉的中上階級家庭（*bhadralok*）（Ahamada 1959; Franda 1971; Laushey 1975; Sarkar 1989: 336）。在孟加拉的「印度共產黨」起初是由哈莫德、可罕（Abdur Rezzak Khan）和哈林（Abdul Halim）所成立，他們在「基拉法運動」期間離開印度到阿富汗和塔什干（Ahamada 1962）。哈莫德一回來就立刻被逮捕，理由是他和共產國際有連結關係；即使受到英國政府的禁止，這個政黨仍在哈林的領導下繼續運作，但侷限在出版和讀書會的活動上。這些帶有冒險性質的事業，特別是報紙《前進》（*Forward*）和雜誌《耕耘》（*The Plough*）以及此雜誌的後繼者《群眾之聲》（*Ganavani*），再加上1923年之後有關共產主義書籍的出版和將馬克思主義文本翻譯成孟加拉文，對共產黨在1930年期間的發展有實質的貢獻。除此之外，共產國際對於政黨組織和訓練的強調，也助長「印度共產黨」勝過左派路線的黨派，例如「前進集團」（Forward Bloc）、布爾什維克和革命的社會主義黨。如同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共產黨的政治技巧更能在地方以左派組織滲透的方式施展開來。在1936年1月，由於群眾陣線的政策，「印度共產黨」和國會社會主義黨結

合，並且開始掌控工會、農民組織、以及大學。同時，它開始在更為廣闊的草根層面上擴散它的活動，並且創造出成功的所謂先遣組織。在 Franda 的描述裡，這包括

印度人民戲劇協會，進步作家工作坊，蘇聯之友，Mahila Atma Raksha (一個婦女組織)，兒童的社團，讀書會，體育館，救濟活動，以及許多其它的文化和運動團體。……到 1942 年 10 月他們已完全掌控 All-India Kissan Sabha [印度最大的農民組織；到 1940 代末期他們已掌握「全印度工會代表大會」(All-India Trade Union Congress)] (Franda 1971: 28-9)

315 一步一步地，這些活動為共產黨發展出一個廣大的群眾基礎。

然而，不像其他地方共產黨類似的組織活動那樣，這並沒有直接匯聚成獨立運動，部分原因就如前面所指出的，「印度共產黨」從來沒有將民族主義融入它們反殖民的目標裏，並且拒絕將殖民地的衝突擺在內部階級的衝突之上。結果，「國大社會主義黨」從左派攫取較大的支持，並且把它帶入這個最為強大的組織中較大的結構裏，以致力於民族的解放。雖然在殖民時期，在「國大黨」之外的左派在許多方面似乎一直被邊緣化，事實上，它進行許多工作來增加對英國的政治壓力一經由極左派團體的「恐怖共產主義」(Terro-Communism)，由各方的共產黨員和工會組織所策動的全面罷工，特別是 1930 年代在鐵路、紡織和黃麻纖維工業裡，以及從 1935 年起在聯合陣線政策下進行的全面罷工，一直到 1946 年 2 月由「皇家印度海軍」發動的「大孟買海軍罷工」，到此刻印度事實上已無法治理。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對共產黨而言是一個最差的狀態：它最初是因為希特勒—史達林條約而反對英國的戰事；然而，在德國入侵蘇聯之後，「印度共產黨」開始反對 1942 年的「殖民者滾離印度運動」(Quit India Movement)，並且支持英國對抗由前「國大黨」領袖波士所領導的日本和印度國家軍隊，它也因此而得到合法化做為回饋。在幾次有關獨立的協商之間，由於「共產黨」支持史達林個別民族有自治權的立場，因而以穆斯林為一獨立的民族而支持分裂。結果，「印度共產黨」在政治上變得不受歡迎而且信用掃地 (Chandra 1979; Masani 1954; Sarkar 1989: 413; Sen and Ghosha 1991)。它最後於 1967 年在西孟加拉取得國家權力，後來在喀拉拉邦 (Kerala)，但是，就像「革命共產黨」和「革命社會主義黨」，或甚至像成立逾 1942 年的「布爾希維克—列寧主義黨」(BLP) (它是支持放棄印度運動)，從來沒有在國家的層次上拿到權力 (Alexander 1991; Kaye 1971; Namboodiripad 1994; Sen Gupta 1972)。

「印度革命共產黨」和「革命社會主義黨」一般被認為是托洛斯基派，即使它們和第四國際沒有任何隸屬關係。托洛斯基派政黨是在印度的不同區域發展的，起初是因為拒絕接受 1935 年將共產國際的戰略轉換為「人民陣線」(要求共產黨要支持國會黨)。由於來自「蘭卡平等社會黨」(Lanka Sama Samaja) 譯註 7 的支持，一

個全國性的政黨在 1940 年代出現；到了 1950 年代已有三個托洛斯基派的政黨，它們隨後合併為「革命工人黨」，後來又以「社會主義工人黨」和「印度共產黨聯盟」等不同的形式來呈現 (Alexander 1991)。因此，有許多共產黨活動在印度 (和印度四周) 出現於殖民時期的最後 30 年以及獨立之後。其傾向是使用既有的政治信條來支持一種實際的政治取向，然而卻迴避任何大規模的民族主義的認同。雖然這個政治活動在許多方面都令人刮目相看，共產黨和其他極左派的政黨從來無法建立起群眾支持的基礎，來對抗「國大黨」或「穆斯林聯盟」。同時，以它實際做事取向和必須和「國大社會主義黨」區別開來，和許多非洲解放運動對照之下，「印度共產黨」所留下的理論餘蔭實不能相提並論。印度左派最重要的理論創新是在獨立之後才出現，隨著「印度共產黨」的分裂和重新爆發的農民反抗。這是第一次，印度的馬克思主義開始發展出三大洲的觀點。

316

譯註 7 斯里蘭卡第一個建立的政黨，建立於 1935 年。這是一個托洛斯基派的社會主義政黨，要求斯里蘭卡從英國的殖民統治中獨立出來。

## 23.

印度II：  
甘地的抗現代性

英國人並沒有占領印度；是我們拱手給他們的。

317

甘地（1997: 39）

如果我們要獲取自治，我們一定要去爭取。……大家不妨從波爾戰爭（Boer War）中汲取教訓。

甘地（1958-84: 13, 216）

## 一、文化民族主義

和大多數殖民世界裡的情境完全相反的是，馬克思主義在印度從來沒有以它自己本地的形式做為主導的政治意識形態，同時共產黨也和獨立運動保持一段距離。印度的解放運動反而是由一位觀點和作為都以非常不同的方式、以及本土的模式來進行自由抗爭的人所領導：聖雄甘地。然而，從許多方面來說，這比較是一種表現方式的問題，而不是真實性（authenticity）的問題。如同他生活中的其他事物，他的觀點無可救藥地是綜合的，同時在實際的操作上經常是辯證的，即使他以肯定的態度否認。這構成了他所推動的強而有力的抗現代性隱匿的力量。

如同許多反殖民和後殖民的激進主義分子，甘地是個離散歷程的結果：他18歲離開印度，一直到46歲才重回定居。他在英國完成法律的教育，並且花了21年的歲月在南非，像許多離散的知識分子一樣，他是在海外認識到他自己的文化，以及發展出他自己基本的政治觀點。波頓（Antoinette Burton）觀察到：

甘地到處流動的青年時期，以及這樣的經歷程對創造、持續和普及一種民族主義意識所帶來的影響，似乎指出在帝國主義統治下做為一位流落在外的屬民，此一傷痛對其政治行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處在短暫或永久放逐的情境，會藉著改變殖民主義暴力所依據的條件與基礎，去滋養反抗行為。（Burton 1998: 73）

318 波頓的洞見也可解釋為何如此多激進的後殖民思想是由離散的知識分子所催生的。甘地的政治生涯於1894年在南非開始，當時他策動「那塔爾印度人大會」(Natal Indian Congress) 譯註<sup>1</sup>為印度人爭取民權 (Gandhi 1950; Huttenback 1971)。儘管他在當時受到歧視，甘地卻是大英帝國強烈的支持者 (Guha 1997: 43-7)。他認為他自己是個英國人而不是殖民地的屬民，因此，他為南非的印度人要求公平正義 (「我們完全是以英國人的資格居住在南非。在我們所提出來的每一個紀念儀式，我們一直主張我們有這樣的權利。我們一直以自己是英國公民而感到驕傲。」) (Gandhi 1950: 66; Tabili 1994)。為了證明南非的印度人是英帝國忠誠的公民，所以應該和其他南非人同樣被視為該國的公民，甘地參與波爾戰爭對抗波爾人，他為英方做抬擔架的工作，他同時也鼓勵其他南非的印度人效法他 (和愛爾蘭民族主義者麥克布萊德 (John McBride) 完全相反的是，麥克布萊德率領了一隊愛爾蘭人為波爾人而戰)。雖然如此，波爾人的抵抗卻給了甘地永遠無法忘記的教訓。甘地是在南非發展出他那套抵抗的政治策略的機制，然而他同時把他抵抗的基礎轉換成反種族主義國家的法律，也用來反對這個國家所賴以建立的西方資本主義的根本前提。

甘地從愛爾蘭反殖民鬥爭上學到許多，這個鬥爭如前面已提到的，已經和印度獨立運動發展連結關係。在愛爾蘭結合自治運動和文化復興的模式上 (甘地甚至宣稱，他希望成為印度的奧康內爾)，甘地強調把文化民族主義的運作當作反殖民抵抗的一個主要策略。雖然在一方面他修改印度的價值和道德以適應新的情境，另一方面他採納當時歐洲在墮落的意識形態，為印度和西方提出一種道德重生的形式 (Pick 1989)。這種認為歐洲在墮落的意識形態，也是歐洲右派和左派政治家們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用來譴責當時社會狀態的意識形態。回歸到純粹、本土的傳統，同時強調某種道德和倫理力量的形式，是這個時期許多種民族主義的共通點。甘地認為，印度的墮落有一部分是印度人給自己招來殖民主義，並且與此殖民主義共謀，在他們每日的日常活動上接受殖民主義持續對他們的生活的宰制。他們已接納並且從西方的制度，如醫療和法律，得到好處，並且開始依賴西方的貨品，最重要的是英國機器所製造的棉布已經消滅了印度的紡織工業。他指出，即使是印度人所慣用的抵抗形式，特別是暴力的主張，也是由西方政治模式中所衍生出來的論述。甘地本身也實驗過以一種仿效的形式去進行抗爭：例如，在他早年，他記起一首學童時候的詩，提出英國人由於吃肉得到超強的力量，因此能夠統治印度人，他因而主張「如果整個國家都來吃肉，英國人就會被制伏」 (Gandhi 1982: 35)。他後來徹底改變這個策略，指出西方文明本身就是墮落、低下和有病的，因此殖民主義

319

譯註<sup>1</sup> 那塔爾是南非東部靠印度洋的邦。這個會議是甘地在1894年5月22日所創立。他將移民到南非的印度人組織起來，為當地的印度人爭取權力。

絕非將優越的文明帶到世界其他地方來嘉惠「低等種族」。所以，英國在印度的統治並不是進步的，而是一種毒害並進而帶來腐壞。反抗英國的殖民主義必須從反抗它的意識形態和物質的慣行開始。這將讓印度人脫離出來，並且體驗到重生，在重生之中使他們能夠重新體現在印度漫長文明歷史中發展出來的文化價值。甘地認為，只有每個人透過個人自治得到重生，才能夠促成整個印度在政治上達到自治治理。

這種回到根本的論點，是甘地第一次接觸本土的印度宗教哲學時發展出來的。反諷的是，這發生在他還停留在倫敦的時候，他是透過英語的翻譯形式來認識印度哲學的。在加入後來也成為「素食協會」(Vegetarian Society) 秘書的時候，甘地認識了許多他那個時代反抗文化的著名人物，並且經由後來薩依德所批評的那種東方主義來習得他自己的「神智學」(theosophical) 文化。他詳細描述如下：

到了我在英國第二年底的時候，我遇到兩位神智學者，他們兩位是兄弟，並且都未婚。他們向我談論「薄伽梵歌」。他們朗讀了阿諾德 (Edwin Arnold) 的翻譯—《天國之歌》(The Song Celestial) —然後他們邀請我和他們一起讀原文。我感到很羞愧，因為我沒有用梵語或古吉拉特語讀過聖詩……

這對兄弟也推薦了阿諾德的《亞洲之光》(The Light of Asia) 給我……這本書讀起來比薄伽梵歌更加有趣。我一開始讀，就無法把書放下。有一次他們還帶我去布拉瓦茨基精舍 (Blavatsky Lodge)，並且介紹我認識布拉瓦茨基夫人和貝森夫人譯註<sup>2</sup>。(Gandhi 1993: 65-6)

所以，和後殖民的假設不同的，是在甘地的東方主義裡產生出對殖民統治的反抗。貝森後來成為第一位女性國會主席，並且在1916年創立印度地方自治同盟 (Besant 1915)。貝森和甘地兩人日後一直引用布拉瓦茨基夫人的教義 (即使今天，甘地仍然是「新世紀」政治的偶像)。雖然從來沒有加入，甘地和神智學會裡親印度的人時有交往，這個學會也是葉慈和晚期的泰戈爾經常會去的地方。這個團體提供給他一個現成的對當代西方文化的物質主義的批判，而和這種物質主義相對的就是東方的精神價值。甘地立即認識到神智學者所做的工作在政治上的潛在意義。他對印度文化的無知，有部分來自於他所受的教育將這視為一種迷信，卻引導他去質疑印度教育系統所依據的英國中心主義的價值。當他1909年在倫敦的時候，甘地也開始認識到洛伊·喬治 (Lloyd George) 主張把威爾斯語言重新納入威爾斯學校的意

譯註<sup>2</sup> 原名是 Annie Wood Besant (1847-1933)，曾經是社會主義者，也是費邊社的創社成員，1889年轉向跟隨布拉瓦茨基成為神智學的信徒。

義，從這個現象他所得到的結論是：「印度人對於保存他們的語言的需要，比威爾斯人保存他們語言的需要多出多少，同時我們也需要多出多少的熱情？」（Gandhi 1997: 103）從此以後，他主張使用本土的印度語言以取代英語，他本身幾乎一直以他家鄉的古吉拉特語書寫，這對於印度內部到現在都還未減弱的關於語言、翻譯、文化和教育辯論的政治，造成重大的影響（Bassnett and Trivedi 1999; Dallmayr and Devy 1998; Gandhi 1956; Rahman 1996; Trivedi 1993; Trivedi and Mukherjee 1996）。甘地的聰明之處乃是使用神智學思想來批判現代西方文明——也就是所謂現代性，而不是用來針對殖民主義（Nandy 1987: 127-62）。他使用其他當代西方人對西方文化的批判（羅斯金、梭羅、托爾斯泰、卡本特）作為範例，來揭示支撐英屬印度政府的意識形態的弱點。藉由論證印度文明在道德和文化上的優越性，甘地排除了維繫英國統治在意識形態上的論點——也就是印度沒有能力治理自己。因此他提出第一個持續不斷、而且在許多方面來說仍然是對西方殖民主義和其背後的文化最為充分的三大洲的批判。甘地對於現代性的批判的遺緒，以及他對那種毫不猶豫的、踏襲的使用西方文明的批判，依舊不失為是一股強大的力量，啟發了當代一些印度思想家，特別是 Partha Chatterjee（1986）、G. N. Devy（1992, 1998）、Ashis Nandy（1983, 1987）和 Makarand Paranjape（1993）。弔詭的是，甘地是經由綜合西方不同的對抗文化思想家而達到這種立場的。

沿著民族自治（*swaraji*）的目標和文化的重新肯定，甘地強調印度經濟的「自給自足」（*swadeshi*）<sup>譯註3</sup>。甘地並沒有發明或創始這些概念：它們早就位於民族主義者自由抗爭的政治思想中心。然而，從《印度的自治》（*Hind Swaraj*）（1910）開始，也就是他把民族自治和自我治理結合在一起的時候，他開始發展出對這些概念的解釋，並且把這些概念變成他自己的。他描述 *swaraji* 和 *swadeshi* 運動在概念上可以和愛爾蘭新芬黨（Sinn Fein 愛爾蘭語的意思是「我們自己的」）的意識形態相提並論（Gandhi 1997: 21）。在抵抗工業化和科技方面，他隨著卡萊爾稱之為純粹是「機械」以及工業化非人性化的結果，甘地發展出一種和西方兩種主流意識形態非常不一樣的模式，但仍高度借重烏托邦社會主義和羅斯金的經濟學，特別是羅斯金在《留給後來者》（1862）中藉由對手工藝的擁護而主張抵抗工業化（Gandhi 1997: 164-70）。由於甘地認為這本書非常重要，當他在1904年在南非第一次讀此書之後，他自己就以一種適合印度人的意譯方式，把它翻成古吉拉特文（標題 *Sarvodaya* 意思是「全民福利」），接著又把它重新翻成英文（Gandhi 1951; Lakshmi 1965）。比羅斯金更激進的是，羅斯金是以高傲「保守黨」（Tory）的姿態拒斥商業主義，如同英國中產階級經常做的，也勢力地抵賴掉自己的收入來源，甘地則同時

<sup>譯註3</sup> *swadeshi*：意為自給自足，愛用本地產品，抵制外國貨。

拒斥商業主義和財富，並且主張「自願貧窮」（voluntary poverty）。他認為，人類應該緊緊取用足夠他們維生的最少資源，這個舉動預示了1990年代生態政治學中環境主義的趨向。甘地的理念目前也在後發展研究中獲取重要的位置（Rahnema and Bawtree 1997: 306-8）。同時，甘地自己認同那些在印度國民生活的公共世界中被遺棄的人，那些今日被描述為底層階級的赤貧人民——特別是農民和那些在種姓制度中被排斥的人——所謂的賤民（untouchables）。在他的衣著和文化的識別上，甘地在邊緣化和社會遺棄的邊緣建構起一種怪異的主體位置，一種反對菁英主義和正統階級政治的激進宣言。沒有一位反殖民的領袖比甘地更公開、更絕然地和世界上的受苦者站在一起。恰特吉（1986）指出，甘地以農民作為行動的取向，在印度自由運動史上成為關鍵的一步，藉由這個行動取向，農民和底層階級的抗爭，經常是針對印度的地主而不是英國的殖民政府，和由民族資產階級菁英所主導的獨立運動扣連在一起。當然，他突顯出後來成為他政治權力基礎的農民，讓甘地站穩在三大洲的意識形態陣營裡，即使他的某些理念，例如 *ahimsa*（不殺生）或 *shakti*（心靈力量），有些笨拙地與其他三大洲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並列。

甘地介入資產階級菁英的民族主義政治，他認為這些人的新殖民統治和英國的統治沒有差別，因此甘地在精神上是類似於羅伊和法農後期。他自己對於民族主義的立場頗複雜。在《印度的自治》裏他把印度的民族主義視為是隨著反殖民主義自然而生的。他認為印度民族最終應該包容所有不同民族和宗教，這種普世思想在他從南非回來沒多久就破碎，在南非他大致是和印度民族會議裏的穆斯林領袖緊密合作。在1920年，他藉由聲明支持早已進行和英國人不合作路線的穆斯林「基拉法運動」而取得「國大黨」的領導權，儘管稍早英國已讓步，（使得穆斯林有其特定選舉議員權）。然而，他後來擱置不合作運動，終止了他和「基拉法」的聯盟關係以及他想促成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聯合的民族運動的希望，這個希望在1922年莫普拉人（Moplah）<sup>譯註4</sup>叛亂完全摧毀。同時，甘地帶有機會主義態度的支持「基拉法委員會」，也摧毀了與溫和的真納聯盟的機會，真納反對「基拉法委員會」的策略。真納後來利用了舊「基拉法運動」的資源建立了「穆斯林聯盟」，以及另一種較少為人所知的印度獨立運動歷史：也就是建立一個獨立的穆斯林國家，巴基斯坦（Bamford 1974; Chopra 1988; Hasan 1981, 1991; Jalal 1985; Khairi 1995; Minault 1982; Muzaffar Imam 1987; Ram Gopal 1959; Shakir 1970）。

甘地具有贏取群眾支持的卓越能力，但他本身卻因太過急躁而無法成功整合不同的政治派系。他對於穆斯林分離主義者的回應，乃是去論證民族主義的理念並不適用於印度，因為印度比較是一個文明而不是一個國家，因而能夠包容差異性和多樣性。這個理念終究沒有成功，同時甘地後來似乎也接受了印度的分割是不可避免

<sup>譯註4</sup> 印度人和阿拉伯人混血種後裔，大部分為穆斯林。

322 的，即使他其實反對。他並沒有藉由絕食來反對分割，他的絕食是針對分割所導致的暴力。印度做爲一個國家的弔詭性質——做爲一個世俗的國家，它是從以宗教爲理由所造成的分割中誕生的——延續出現在社群主義的遺緒和印度人持續不斷所執著的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的問題中，特別是在右翼回應的脈絡中，右翼一直在模仿著巴基斯坦明顯地強調整體的穆斯林民族認同，要把印度回歸到一個想像的印度教徒對過去獨特的認同（Hansen and Jeffrelot 1998; Jeffrelot 1993）。在印度國家是一個雙重的難題：首先，它從來沒有存在過，如同古哈所論證的，因爲印度獨立和隨之出現的邦的形式，是由社群主義那一派所決定的（Guha 1982b）。第二，由於國家並不曾存在，接下去建國的所有努力，因爲解放運動裡勢必缺乏團結一致的文化 and 政治轉化力量，而成爲帶有壓迫的凝聚和排斥的形式。同時，大多數左派的印度知識分子在實際行動上試著重新把甘地認爲印度文化中不同成分具有多樣性和異質性的主張，闡釋爲國家的可能世俗模式——在這類模式裏邦本身的聯邦結構包含不同層次的從屬關係，超國家的和地方的，或更簡單說，一個沒有民族主義的國家（Chatterjee 1993; Guha 1982a）。

甘地的民族主義是頗爲複雜的，因爲它反對英國殖民主義的同時也在反對西方的現代性：也就是是，印度的自由必須同時拒絕這兩者（Chatterjee 1986: 85）。這也意味著拒絕接受其他和現代性有緊密關係的政治意識形態，特別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和女性主義（雖然，我們即將提到，他鼓勵在他的運動中有女性的政治參與）。相對於「印度共產黨」政策，甘地的興趣是在於農民抗爭：他從南非回去之後就開始著手爲那些在查姆帕蘭（Champaran）、在比哈爾（Bihar）、以及後來爲那些在凱達（Kheda）和巴多力（Bardoli）的槐藍屬植物種植園工作的農民爭取福利（Hardiman 1981）。起初，甘地也參與工人階級的抗爭運動，特別是1918年在阿默達巴德（Ahmedabad）的工廠罷工，在這個運動中他創立的「阿默達巴德勞工協會」。然而，他的立場是複雜的，因爲他自己位於阿默達巴德的薩伯爾默蒂（Sabarmati）修行所（ashram）事實上是由一位最有勢力同時也是他的私交的工廠主人所資助建造的；甘地因而像是一位調解者或協商者。他後來逐漸離開工人階級的抗爭運動，例如拒絕隔一年在孟買領導工廠工人的罷工，一方面是為了疏遠提拉克和貝森的「自治權聯盟」，一方面是他的策略在於先從古吉拉特建立起地方和鄉村的權力基地，因而遠離孟買、德里和加爾各達（Copley 1987: 40; Sen 1994: 33）。值得注意的是甘地並沒有參與成立1920年的「全印度工會大會」（All India Trade Union Congress），印度第一個全國性的工會組織——這和尼赫魯、安妮·貝森、真納和他的好朋友安德魯（C. F. Andrews）有所不同。事實上，甘地對於資本和勞動之間關係的看法，主要來自於羅斯金（因此和狄更斯的看法也很接近）。1925年他在賈姆謝德布爾（Jamshedpur）的一場演講裡宣稱：

323 我的理想是，資本和勞動應該相輔相成。他們應該是住在一個和諧一致的大家庭裡，資本不僅應照顧勞工的物質福利，也應照顧他們的道德福祉——資本家應該是他們所僱勞工的福利的信託人。（Sen 1994: 96; Gandhi 1958-84, 28: 47）

資本家是個信託人的理念也讓甘地的立場尷尬地近似殖民官員的立場，例如盧押勳爵，他以大英帝國爲對象詳細闡述相同的論點（Lugard 1922）。甘地至少曾提出另一種比羅斯金—莫里斯（Ruskin-Morris）那種唯美藝術和工藝社會主義的家長式管理更全面的政治解決辦法：他那種不同的知識論包含有一整體的社會系統，有它自己的經濟、道德和精神文化。整合了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和一種宗教的保守主義中的各種成分，甘地的政治哲學幾乎同等地反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因此也經常被指爲一種「第三條路」。

## 二、不殺生（AHIMSA）<sup>譯註5</sup>：暴力和非暴力

揚棄暴力是比暴力本身更爲浪漫。……不幸的是，革命並不是經由禁食來達成。（Mariategui 1996: 49）

儘管法農是從分析殖民主義的心理暴力所造成的傷害，轉向主張以武裝暴力來反抗殖民政權，甘地則結合非暴力不合作的策略和一種影響更廣的心理抵抗，指出這兩種比任何種暴力都更合乎倫理，也更有效。1920年的不合作運動也是他指稱印度人在殖民主義的日常實況裡具有同謀關係的一種反應。甘地起初是受梭羅（Thoreau）的《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一書，以及他所說，在英國主張女性應有參政權的婦女的影響，而在南非發展出來的策略；這個策略毫無疑問也受惠於1840年代英國工人階級「憲章運動」（Chartist Movement）中對「道德力量」和「有形力量」的政治策略所做的區別。在南非很難說服印度人從日常的商業和制度的生活裡完全抽離，因此他在南非一直以 *satyagraha*（真理力量）或他原先所稱的「消極抵抗」，來發展他的公民不服從的觀念。相對於任何暴力的形式，甘地明智地把真理力量的行動視爲他對西方所做道德批判的自然結果。他認爲，儘管是他自己一開始就使用的名詞，「消極抵抗」在許多方面都不是一個恰當的名詞，因爲真理力量永遠是展演的、積極的反對。如同採取絕食做爲一種政治抗議的手段，這是甘地從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和英國主張女性參政權的婦女所學來的，真理力量做爲一種陳述，其力量是心理的。就像以沈默來拒絕溝通，絕食發揮一種壓力的形式，

<sup>譯註5</sup> *Ahimsa* 意指「不傷生」，是印度耆那教的基本倫理，也是許多世紀以來，印度教和佛教所崇尚的情操。

324 甚至是力量 (Sunder Rajan 1993: 87)。做為一種策略，它讓殖民政府感到窘迫和難堪，做為一種私下的抗議形式殖民政府是無法去控制或鎮壓，雖然如此它卻像一個公共的事件，有非常有效的作用。藉由這個方法，甘地也以道德的高度水準，來拒絕達成他的英國敵人的道德再生。如同法農，他強調對殖民主義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身上所產生的主體性、認同和性取向造成具有破壞力的心理效果，他認為，最重要的是殖民者會因為殖民統治所施行的誠律和行為而在道德和倫理上被貶低。

同時，甘地反對暴力的立場假設了它每日存在的實際狀況：在此意義之下，非暴力是以一種否定辯證法和持續的可能性以及暴力的現實產生作用：社群暴力 (communal violence)，以及面對真理力量運動的殖民暴力，如同 1919 年最為惡名昭彰的「阿姆利則大屠殺」，為了這件事，就性格上甘地比杜葉 (Dwyer) 將軍<sup>譯註 6</sup>更加責怪自己。還有起義的反殖民暴力：他自己反暴力的驅力則反映在「國大黨」的組織企圖用來對它的支持者施加規訓和控制的詞彙上，這是想從將他們身上的政治能動性和主動性去除，用一種向心力防止甘地群眾支持常出現的爆發成暴力示威的離心趨勢，特別是在面對暴力鎮壓的時候，例如 1922 年的「喬里喬拉事件」(Amin 1995)。有些人則認為，事實上甘地的政治理念產生和非暴力相反的結果：安妮·貝森宣稱，真理力量「為革命行動開始了一扇門」，而在《甘地與無政府主義》(Gandhi and Anarchy, 1922) 耐爾 (Chettur Sankaran Nair) 爵士蒐集了一份很詳細的名單，他把超過 30 頁發生在 1919 至 1922 年的暴動和動亂都歸因於甘地的影響 (Phadke 1967; Sankaran Nair 1995)。即使是在甘地最親近的政治跟班裡，對於他反對暴力的禁令也有較寬鬆的解釋，並解釋成不得對人施以暴力，但允許對財產施加暴力。以政治的角度來說，甘地的立場清楚區別出他不同於孟加拉印度教徒 (Bengali Hindu) 的暴力、Maharashtran Chitpavan Brahmin<sup>譯註 7</sup>、以及共產黨恐怖主義分子，例如 1930 年進行「吉達港彈藥庫攻擊」的那群在 Surjya Sen 領導下的受歡迎團體，塞佛卡的跟隨者，或帶有領袖魅力的辛格的「印度斯坦社會主義共和聯盟」(Hindustan Socialist Republic Association)。雖然這類恐怖主義是由一些小團體所進行，而且從沒有嚴重到威脅英國的統治，但它的好戰程度從 1930 年以來逐漸增加的頻率，以及它受到歡迎的程度，卻讓印度的英國政府憂心忡忡，因而導致更猛烈的鎮壓 (Chandra 1979; Franda 1971; Ram Chandra 1986; Sarkar 1989)。它也使得印英政府更能接受採取甘地非暴力立場的自由派「國大黨」。就像在解放鬥爭中經常出現的，武裝的「極端主義者」會鼓勵政府和溫和派協商。事實上，甘地自己

<sup>譯註 6</sup> Michael O'Dwyer，當時是旁遮普代理省督。

<sup>譯註 7</sup> 這是來自印度西部 Maharashtra 邦的婆羅門種姓。這個種姓的大多數人皮膚白皙，眼睛色淺，以致有人推測他們是失事船隻倖存的歐洲水手的後裔。甘地就是被 Chitpavan Brahmin 所刺殺。

對於採行戰鬥的立場，如果不是暴力，在運動的過程中也不斷改變。例如，在 1930 年，他對於發生在吉達港、帕盧瓦 (Peshawar) 和紗樂柏 (Shalapur) 的暴力事件的容忍程度，比對當年「喬里喬拉事件」還要高，且未曾取消公民不服從運動。在 1938 年，如同在南非的「非洲民族會議」在 1961 年採取武裝抗爭時所要強調的，甘地描述在何種情況之下暴力是他的優先選擇 (Braganca and Wallerstein 1982, 2: 43)。這種態度的極致，就是憤怒的、毫不妥協的「滾離印度」運動，或是甘地在 1942 年著名的「行動或死」(do or die) 演講。這完全是甘地的典型，他自己創造用來反對英國的最為激烈和戰鬥的言詞，應該是來自於丁尼生 (Tennyson) 325 的詩〈輕騎兵的進攻〉(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sup>譯註 8</sup>。

甘地的夢想在 1947 年印度獨立的時候並沒有得到實現。他把印度教政治化為一種反殖民的民族的認同，促成真納和「穆斯林聯盟」同樣政治化伊斯蘭認同，而呈現兩極化。印度在獨立時所帶來的分裂，是英國殖民政府的處理不當，但也同樣證明民族主義菁英、甚至是甘地本人無法掌控印度大多數的人民，這帶來了激烈的社群暴力，導致超過 100 萬人死亡，好幾百萬人無家可歸，此後，印度從沒有能夠免於掙脫這個分裂的現象。在甘地的影響之下，在反殖民抗爭中經常避免使用暴力，但暴力早已在各地的社群中發生，而 1947 年 8 月出現一件讓印度的民族獨立比其他國家受到更大創傷的事件。甘地被暗殺僅是是這個令人痛心的事件的一個單一面，大多數當代印度政治和文化思想也必須從這個角度來理解。許多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的家庭承受著移居、分離和漂泊，這個現象顯示移民的文化經驗的關聯性絕不限於那些從次大陸 (subcontinent) 移居到西方的印度人。移民和離散也在印度次大陸內部形成一種明顯的歷史經驗。

### 三、甘地的另一類政治策略

#### 3.1 藉由性別進行抵抗

藉由超越俗套的政治範疇和形式，以及其背後對公共和私有空間所做的規範性區別，甘地的政治觀點開啓了一些可能性，這些可能性逐漸被後殖民的左派所援用。如一些評論者所指出的，他的非暴力政策伴隨著一種策略性的、在性別層次上越界角色的扮演，讓殖民政府較難以一般處理反殖民反抗的方式來回應。

甘地和後期的法農認為，殖民主義的心理是在一種單一的文化中運作，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在這種文化中發展出一種相互因應的心態。對這兩方面而言，殖民文化

<sup>譯註 8</sup> 英國詩人 Lord Alfred Tennyson (1809-1892)，此詩寫於 1845 年紀念在克里米亞戰爭的 Balaklava 戰役中犧牲的英國士兵。



要求一種特定的心態，具有它自己的但必須經過學習的意識形態、符碼和規則，不同於殖民者或被殖民者的本土文化。以19世紀末期英國帝國主義為例，殖民文化的架構是藉由一種陽剛氣概的意識形態來維繫的：南迪是最早注意到「西方殖民主義所一貫使用的性別和政治支配之間的相應性（homology）」此一理論的學者之一（Nandy 1983: 4）。隨著帝國在18世紀的擴張，英國清楚地再發展一種特殊的基督新教模式化的陽剛氣概，做為英國政治和社會經濟統治的基礎。伴隨著殖民征服的行動和暴力，這種父權制的支配是在一種同樣日益受限制的「本國與殖民地」對女人與陰柔特質的意識形態之上運作，這種區隔是女人本身經常挑戰的。帝國文化在19世紀也藉由各種種族理論來擴大，這些種族理論把歐洲人描繪成具有男性特質的種族，非歐洲人則是具有女性特質的種族；對男性特質的崇拜占盡優勢。英國公立學校，對體育、比賽的重視，把同性戀視為非法，成立童子軍，甚至男性割除包皮的時髦性，在在證明於軍事帝國主義期間裡，一種帶有限制性對性別認同的窄化（Hyam 1976, 1990）。結果，男性身上任何帶有女性特質的記號，都被認為比女性特質本身還要危險。辛赫透過對19世紀末期特殊的政治對化的分析，認為：「1880年代和1890年代出現在印度的殖民和民族主義政治之間的動態關係，最能夠以殖民的男性氣質的邏輯來掌握」（Sinha 1995: 1）。

依據南迪的論點，印度人對這種男性氣質崇拜和做為其理想的普羅米修斯般的男人的反應，乃是創造出一種存在於尚武種族中相類似的男性氣質意識形態，他指出這種意識形態仍可以在今天好戰的印度教和錫克教國族主義裡發現到。這種意識形態也支持著印度軍隊裡陰謀非法的派系：英國統治的整個時期裏，佛斯特（Forster）所稱英國在印度的「占領軍」裏絕大多數是印度人——在羅馬人之後，英國的殖民策略是一直在帝國的軍隊裏重新部署和調整本地的男性特質，這個機制最明顯的諷刺就是在印度使用愛爾蘭的兵團。以印度為例，1857年，對抗暴力的反抗行動起義失敗之後，此一策略就被鄙棄。雖然以民族主義者的說法，如塞佛卡首先在1909年論證的，1857年起義是一場獨立的戰爭，不變的事實是，如悉禮所強調的，其失敗是因起用印度軍隊所造成的結果（Savarkar 1947; Seeley 1971）。儘管恐怖主義的激進行動已經詳細被記錄了下來，軍事抵抗再不會對英國統治印度構成嚴重的威脅。南迪論證說，與其以征服者本身的方式來抵抗他者，無論是仿效或是對抗英國陽剛氣概至上的理想，印度人不如以另一種反應——即對陽剛氣概發展出一種新的定義，這個新定義在某種程度上呼應了西方對女性化的印度男性的刻板印象，但也汲取了內在於印度文化更為廣泛意義的陽剛氣概、陰柔氣質和男女同質。這種向本土回轉的回應，伴隨著一種觀點的轉變，把殖民者重視陽剛氣概的文化視為是道德上和文化上低劣的。而且是甘地成功地把這種轉化具體化，並且把它發展成一種反殖民的抵抗形式，並且在汲取本土的性別化文化形式的資源的同時，培養

一種從容的像赤子般的陰柔氣質（Nandy 1983: 52-5）。然而，即使是這樣，甘地依賴西方社會中的「改革者」（come outers）<sup>譯註9</sup>，他們對於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文化所表達出來的以曖昧的雙義性（ambivalence）來表達，可以被挪用來反對帝國主義。王爾德（Oscar Wilde）藉由他的同性戀傾向來表達他的不滿意見，也開啓了一個性政治的新領域，對於這種可能性，甘地本身在他生涯的早期也認識到，這可以由甘地對Edward Carpenter和R. H. Sherard的著作的關注判斷出來（他們的書列在《印度的自治》書後推薦讀物中）。他採取主張婦女參政權的婦女的反抗策略，並支持某些女性主義者的目標，以及在他的公開與私下生活中有意地朝向一種男女不分的認同，這些都顯示他的非暴力的中心主旨以及一種性別政治之間的連結關係，他藉由顛覆英國殖民者的超陽剛氣概以及利用它對女性的反應來抵抗英國的帝國主義。

甘地抗現代性的立場，就印度的女性主義而言，是極具爭議的；但他其實也強調陽剛特質，並以此一規範的政治情境去挪用和重新部署「女性」策略，並且在這種情形下藉由性別來動搖政治。他引入心理學做為弱勢者的武器，他的方式比法農更加激進，法農主要關注的是揭露西方民族心理學所依據的意識形態，同時對他而言，殖民主義的神經質的情況只能經由一種陽剛氣概的暴力來治療，這種情況他曾強而有力地加以闡述。如此一來，甘地開拓了整個心理學的領域，使它成為一種用來做為反殖民的政治實踐的能動手段，這在後殖民對反殖民抗爭的形式和手段的歷史重新評估中已經有了很完整的發展。他也是首先發言闡明另一類抵抗模式在政治上的可能性，這種模式也許可以名之為市民形式的游擊戰，這也扣連著受壓迫者，女人、男人和小孩一直在做的事。甘地在使用性別認同做為反殖民戰略上，比法農更為前進（就他的例子而言，這些戰略更延伸到他那更廣泛的社會政治上）。法農主張以暴力的超陽剛氣概來回應殖民主體的女性化，甘地則以他的「真理力量」的觀念在這兩者之間進行一種複雜的遊戲，或是一種「具女性特質」的消極抵抗；「心靈力量」*shakti*也是一種具女性特質的原則。在一個以男性特質為規範的政治情境中藉由召喚女性特質，甘地同時攪亂了性別和殖民政治。雖然在西方人看來甘地女性化他自己，對印度人而言，他卻是擔負著文化上受到認同的男女同質的創造者。從當地的觀點來看，甘地是闡割了他自己而不是女性化他自己：造成他普遍受歡迎的神秘特質的一個原因，是他公開聲明棄絕和他太太的性關係。如同下一章所要提出的，他也積極地鼓勵女人參與政治，認同許多女性主義的目標，並且承認女性主義政治策略的潛力。

<sup>譯註9</sup> 指因主張改良而脫離組織或宗教的改革分子。

### 3.2 甘地和衣著的政治學

甘地的對抗政治的一個頗具特色的策略就是衣著的政治學。縱使他強調精神的領域，甘地事實上表現他的身體的程度是任何其他反殖民領袖所無法相比的。塔洛 (Emma Tarlo) 對他在衣著上的變化有非常精彩的紀錄，從 1888 年一個優雅的英國上層階級紳士的穿著，到 1915 年古吉拉特農民上等質料的 Kathiawadia 衣服，都充溢著意義象徵。甘地是一位衣著符號學的專家，他運用衣著比軍刀和步槍更有效果。雖然主張一種非物質主義的生活形態，幾乎沒有一位政治人物像他那麼注重他們穿著的方式，或那麼大量地書寫他們的衣著應該如何來詮釋 (Tarlo 1996: 72-82)。再加上他使用紡織機做為印度永續發展的實際象徵，甘地的衣著乃用來反對陽剛氣概和現代性所結合起來的意識形態。這個意象也強化了他反對西方形式而支持印度形式的政治和哲學立場，同時強化了他對「經濟自給自足」運動的投入；同時這也鮮明地標誌著他對農民的認同，他從農民得到支持的程度是「國大黨」和「共產黨」都難以捕捉的。對英國人而言，甘地的衣著象徵著所有這一切，同樣重要的是，它也象徵了拒絕政治領域的規範，以及一位接受過英國價值教育的菁英拒絕心甘情願的合作。所以，甘地的在都會中心的主要敵人，邱吉爾曾有一個廣為人知的描述，他對「一個半裸的托鉢僧大步走在總督府的階梯上來和大英帝國國王的代表談判平等的條件，這個令人作嘔的景象」感到非常憤怒 (Desai 1995: 483)。這也許很令邱吉爾反感，但他在感官上的戰術卻是極為奏效的。甘地經由違反西方在正式場合穿著適當服裝的禮節所進行的抵抗 (相對於在自強中西化的日本人在法庭裏採用歐洲人在極隆重的場合所穿的禮服)，在他 1931 年訪問英國時成為焦點。當甘地起身前往圓桌會議時，即使是同行的「國大黨」領袖蘇巴希·強達拉·波士也納悶：「是否這位聖雄會接受建議穿上他獨樹一幟的纏腰布 (loin-cloth) 去訪問歐洲」 (Bose 1997: 241)。當甘地要去晉見國王的時候，媒體事先所感興趣的幾乎完全關注在他會穿什麼衣服；事實上，國王也多少因為他不會穿得體的衣服，而一直不願意接見他。甘地藉由拒絕妥協來取得象徵的勝利。

甘地那種幾乎無法蔽體的衣著和半裸的狀態對他的對手所引起的尷尬，可說達到最大的效果。塔洛紀錄下在甘地衣著轉變的長期過程中，在 1921 年，他帶著些許的猶豫而踏出終極的一步，從質料好的 dhoti 到纏腰布，但還不到完全裸體的地步。他也清楚知道，這種衣著不僅讓他的敵手感到尷尬，也讓他的支持者感到尷尬。它也勢必有著進一步疏離穆斯林的結果。然而在全世界的眼前，他逐漸簡化的衣著和習慣讓他帶有一種苦行的神秘特質的光環，甚至帶有基督的光環——一種在被暗殺的切·格瓦拉身上以不同方式重複出現的身分。依據法農的觀點，甘地利用衣著的心態和阿爾及利亞女人使用面紗的心態一樣，都是工具性的。他的衣著可以

讓他一眼就被認出，但這主要是因為每個人都知道，雖然他雖然他穿得像一個古吉拉特的農民，但他並不是。他的衣著的景觀所達到的效果，就是他的衣著永遠是不相稱的，並且在於可以辨識出他穿衣服的方式和他是誰之間的差異 (Tarlo 1996: 70-8)。這種對於形象的關注是促成甘地和媒體維持親近和高度重要關係的主因。弔詭的是，就像奈都經常被引用的評語所指出的，到底要花多少代價才能讓他一直維持貧窮狀態，如果沒有形象和表徵的科技，離開了印度甘地的穿著可能會毫無任何效果。

### 3.3 甘地、科技和媒體

避免暴力意味著甘地對於操作另一種武器必定是一位行家。他的抗現代性的系列行動本身，在許多方面是依賴現代性的資源，這個現代性的科技大體上是看不見的。甘地對於科技的態度永遠是實用取向的：例如，針對 1913 年大遊行提供給「朝聖者」必需品，甘地事先就和一位歐洲的麵包商談好，利用火車沿線送麵包到每一個點 (Gandhi 1950: 273)。弔詭的是，羅斯金那本在他的生命「帶來一種即時的和實際的轉化」，並且引導他放棄都市的生活方式而就簡樸的鄉村修行所生活的書，《留給後來者》，起初是由一位記者朋友送給他做為從約翰尼斯堡到度班 (Durban) 長途火車旅程的讀物 (Gandhi 1982: 274-5)。儘管在《印度的自治》中有一整章是用來攻擊鐵路系統，火車一直是他感到舒適並且應用得最廣的一種現代的科技形式，特別是就他所從事的政治活動而言，他是採取美國總統短暫停留 (whistle-stop) 的模式，這使得他能在短暫的時間內接觸到廣大的群眾 (Gandhi 1997: 46-50)。

不同於火車，甘地很明顯地並沒有把印刷機包括在他對現代性所做的社會批判之中。他在阿默達巴德 (Ahmedabad) 所創立的 Navajivan 出版社，就裝備有印度最先進的印刷機。甘地對自己在許多事物上都很節制，但他從不拒絕文字。他的隨從記載他經常在寫作；他會在每天清晨一點半起床寫作。即使在他發願保持沈默的時期，他也會寫作：「寫作是要達到解脫 (moksha) 的境界」，他說。無論他去哪裡，他都會持續寫作。當他搭火車橫越國家的時候，他會在路途中的車站拿出他寫的文章，然後交給信差送回阿默達巴德；他的助理們，特別是德賽 (Desai) 就會藉由電報來做校對，這是一個非常方便的科技資源。打從早期在南非，就像那個時期許多反殖民的激進分子，甘地就瞭解生產一份報紙的重要性，它能清楚傳達他的觀點以及他所代為爭取利益的社區的觀點。他所出版的各種雜誌，《印度輿論》 (Indian Opinion)、《真理鬥士》 (Satyagrahi)、《青年印度》 (Young India)、《民報》 (Navajivan) 和《神的子民》 (Harijan)，再加上友好報紙，如《印度教徒報》 (The Hindu)，最後都成為他每天和全世界交流的管道。他回憶說：「在那些日子

《印度輿論》就像今天的《青年印度》和《民報》一樣，是我反映我一部分生活的一面鏡子，每一星期我把我的靈魂在它的專欄盡情表達，詳細闡述我所瞭解的真理力量的原理和實際作法……如果沒有《印度輿論》，真理力量可能就無法成功」（Gandhi 1982: 263）。

因此，持續出刊一直是擺在優先位置。在1913年，當他「思索犧牲所有在鳳凰（Phoenix）的居民」，計畫把他們都送進監獄，他排除了那些出版《印度輿論》不可少的人（Gandhi 1950: 253）。當英國政府在1930年查禁了《青年印度》和《民報》，甘地指示他的追隨者用手寫來繼續這份報紙，讓這份報紙能散發出去，然後被傳印。他們接著秘密地把一台油印機運到鄉下，以非法的方式出版。這些雜誌從來沒有過大量的訂戶：這些雜誌裏詳述和傳遞甘地觀點的文章，則透過報業聯合組織不計版權傳播到全印度，並且在印度大部分的報紙上自由轉載；它們也經由路透社的報導散播到英國、美國和其他地方。藉由這個管道，這些文章傳播到全印度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在甘地的時代，很少有政治家像他那樣運用新聞的力量。他利用印度廣泛的印刷文化到達最大效果。他在《南非的真理力量》（*Satyagraha in South Africa*）的說明，詳細指出他如何瞭解到報紙的力量，以及他自己本身如何利用它做為傳播的管道。報紙特別的好處是，經由路透社的幫忙，報紙可以讓他同時和不同的支持者交流：地方團體、在國家層次的人民、殖民政府、以及在英國的政府。甘地是活見證，證明底層階級能夠，而且曾經出聲過。甘地後來被他的同胞批評，他都是透過國際新聞機構來宣布重要的信息，而不是透過地方報紙，並且批評他偏愛外國記者。他則回答：「我所做的事，以及就我目前所知道其他人所做的事，乃是他們和我都發現，為了共通目標的利益有必要將信息傳送到海外」（Bhattacharyya 1965: 61）。報紙回報了他對它們的偏愛。1920年以來，由於《紐約時報》和其他報刊雜誌上一系列的文章，以及許多本書的出版，包括梅友（Katherine Mayo）備受爭議的「印度之母」（*Mother India*, 1927），J. T. Sunderland的《印度枷鎖》（*India in Bondage*, 1928），Bishop Frederick Fisher的《甘地：棕皮膚的小怪人》（*That Strange Little Brown Man Gandhi*, 1932），以及瑪祖達爾（Haridas T. Mazumdar）的《甘地對抗帝國》（*Gandhi Versus the Empire*, 1932）（只有第一本書是在英國出版），甘地在美國和全世界成爲一位備受歡迎的人物。在他的晚年，他已經較少在媒體上下功夫，因爲記者會來找他，並且無論他做什麼或說什麼，都會成爲新聞。他的生活成爲公開的事件。結果，他的生活全面地被紀錄在相片、影片和錄音帶裏：甘地一定是20世紀被拍最多照片的政治人物之一。

婦女爭取投票權的運動證明了，像暴力一樣，非暴力藉由把自己轉變成功共注意的目標，也可以做爲一種和統治者溝通的一種形式，並且可以對統治者施加壓力。由於非暴力的行動無法造成軍事上的衝擊力，因此需要透過不同的管道來達到

效果。到20世紀早期的時候，媒體在科技上已進步到足以產生這種作用的程度。對甘地而言，靈魂的力量也是媒體的力量：藉由印刷、相片、收音機和影片，幾乎可以在瞬間內和全世界溝通。媒體的角色，以及甘地對與媒體相關的現代科技的使用，是他在運動上的成功所不可或缺的，縱然明顯地背反他的反現代立場。在甘地的手中印度的解放鬥爭採取了第一個媒體戰爭的形式，也是第一個媒體革命。如同卓別林對科技的角色也有同樣的矛盾心態，這也成爲他們在1931年相見時討論的基礎，甘地進行他的非暴力運動時，使用引發社會的注目做爲他的秘密武器。數年之後，卡翁達提及了他如何模仿這一點：

就一方面而言，聖雄甘地和我同樣幸運地面對一個不夠成爲殘酷的暴君的殖民者。英國一直是非常在意民眾的意見——這是英國令人尊崇的原因之一。所以印度總督允許記者，甚至攝影記者進入甘地的住所，無意中促成了聖雄消極抵抗運動的效力。我也知道，在我們非暴力抗爭時期發生在我和我的同志們的所有事情，都在幾個小時之內在英國的電視上播出，同時也在收音機和報紙上報導出來。在這個管道上我不僅能夠向整個尚比亞，也能在帝國的中心倫敦陳述我的作法。如果我們的抗爭是在南非共和國，或是在沙拉札（Salazar）<sup>譯註10</sup>統治下的葡屬非洲殖民地，情況可能不一樣。（Kaunda 1982: 25）

甘地的方法奏效，因爲他能夠利用英國殖民統治自由主義的一面：英屬印度的政府只是偶而採取行動去控制他接觸媒體，除了「全印度廣播電台」（All India Radio）之外，這個電台一直是由政府控制（在突尼斯、開羅和阿克拉的革命分子電台，後來都被殖民者視爲是主要的問題）（Chatterji 1998; Fanon 1980: 47-75; Thompson 1969: 71）。甘地是第一位反殖民激進分子，利用當代媒體做爲一種論壇來進行他的抵抗的非暴力戰術，並且使用高科技來提升真理力量的靈魂力量的溝通能力。同樣的，流言、口頭傳言、大多數真理力量、絕食和這類策略所造成的影響力，都取決於他們在媒體上再現的力量：儘管他對科技不信任，只要有必要，他就會把媒體科技運用到極致。1930年的「丹地大遊行」<sup>譯註11</sup>，韋伯（Weber 1997）對此有很全面的紀錄，可以說明媒體在鞏固甘地的政治影響力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sup>譯註10</sup> 全名是Antonio de Oliveira（1889-1970），1932到1968年任葡萄牙總理。任內對內實行獨裁統治，對外則鎮壓葡屬非洲殖民地的民族獨立運動。

<sup>譯註11</sup> 指反對英國食鹽法，甘地帶領人民長途跋涉到丹地進行的「食鹽大遊行」。

#### 四、丹地大遊行

卓別林單挑甘地追問他何以會對科技如此反感，此舉更顯得適切，由於他們相見的時間是在這位印度領袖發動他最爲著名的運動之後的隔年，這個運動之所以成功主要因爲它被製造成爲一個國際媒體的事件。就在賽門委員會（Simon Commission）的失敗意味著走向獨立的憲法行動已經陷入僵局的時候，甘地一直在尋找一種方法來復興國大黨所宣告的市民不服從運動。在《年輕印度》上發表一串的要求，並且在一個月的思考之後，甘地宣布鹽稅將是新運動的焦點，這是由政府的專賣機構對鹽的銷售所課徵的稅。早期甘地鼓吹想要穿印度手紡的 Khadi 衣服，而不用進口自英國的機器織造的棉布，但問題是 Khadi 比較貴：雖然和一般布料比起來較粗，但只有中等或上等階級的人才買得起（甘地則自己紡織棉布來解決這個問題）。在日常的領域，khādī 可以有效地做爲一種象徵——例如，Orange Brigade 的女人在 1937 年只要穿上橘色 khādī saris 遊行走過孟買，就能得到抗議的效果——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使用此一象徵表現（Tarlo 1996: 112）。甘地本人逐漸偏愛象徵形式的行動主義，而不是更積極的「被動抵抗」的形式，後者往往有變成暴力或誘發暴力回應的危險，如同反對羅拉特法案（Rowlatt Bills）的不合作運動，甘地在「阿姆利則大屠殺」之後於 1919 年 4 月終止這項反對運動。接著在 1920 年，就鼓勵那些參與在殖民地行政機器的人撤銷支持而言，全印度不合作運動在非暴力的層次運作得非常有效力。然而，當甘地增加賭注的時候，在個個層次的行動主義也愈來愈難控制，並且在很多人看來，印度就在瀕臨革命的關鍵點上，甘地利用農民以暴力攻擊喬里喬拉警察局的事件來取消整個運動。就甘地的眼光來看，這個事件已產生出無法接受的不受控制的暴力。他一直憂心自己的支持者的暴力傾向，甚至在他們成群結隊到他經常停靠的車站去迎接他的時候，他也會感到不安（Amin 1995: 167-70）。

相反地，參與反對政府鹽稅運動的每個人，男人和女人都一樣，沒有派系的區分，都是和平參與，他們收集、製造、販賣、或使用非法的鹽。可以用來抵制鹽稅的方法有很多種，而且法令上所規定的懲罰相對輕微（Bakshi 1981）。就如同甘地其他最爲成功的運動，甘地指出了一項每個人都體認到的苦楚，而且這個苦楚也讓他與他們合而爲一（「貧窮的人是得到祝福的……你是地上的鹽」基督在山上寶訓宣稱道，這是甘地最喜歡的一段文字）。從海裡收集鹽是每個人都能做的事……而且上百萬印度人都做過的事。然而，遊行到大海，這個用來表現蓄意拒絕繳稅的行動，是運動的核心並且組織做爲一個極具象徵意味的行動，這個運動模仿波爾人大跋涉的策略（Boer strategy of the Great Trek<sup>譯註 12</sup>），這個策略甘地早已在 1913 年在

南非領導大遊行進入德蘭士瓦（Transvaal）時用過，當時的大遊行還帶有朝聖以及摩西領導以色列人出埃及進入迦南地的氛圍（Gandhi 1950: 278）。雖然是和平的，這個遊行本身顯示出一種稍微帶有武力的自我主張，這個情況因爲遊行都是男性而更加強化，同時也顯示出一種原則的自我肯定——間守住自己的鹽——以及顯示出邁向一個預期的未來，這個腳步又因爲甘地宣布他將不再回到薩伯爾默蒂的修道所而戲劇性地增強。這個大遊行的策略後來被一位甘地的最偉大仰慕者——馬丁路德·金恩——在美國 1960 年代的民權抗爭中於 1963 年在華盛頓的遊行發揮到最大的效果，從此，這個策略也一直成爲美國人權運動一個主要的戰術（Kapur 1992）。

「丹地大遊行」本身在事先就進行周密的計畫。漫長而迂迴的路線都仔細安排過，因而遊行所到的鎮和村莊，都是早就公開支持和效忠甘地的社區。那些穆斯林占大多數人口的村莊則被避開。由二或三人所組成的先遣人員總是在一天前就派出，到遊行人員即將到達的村莊去預警村民，同時也去安排遊行者的食宿，並鼓勵村莊的公職人員辭掉他們的職務。媒體也非常渴望事先知道遊行的情況；甘地的修道所滿是來自海外和印度的記者（當然還有英國刑事調查部的探員）。甘地和他的夥伴根本不需要去安排他們所接收到的報導內容，但他們很清楚這些報導內容，並且同意這些內容。圍繞著鹽稅的議題經由《年輕印度》和《民報》上的三篇文章而傳播開來。當遊行最後在 1930 年 3 月 12 日展開的時候，至少有三組國際電影的工作人員跑來拍攝甘地和他所選出的 78 位消極抵抗不合作運動者離開修道所的情景（Desai 1995: 445-58; Lyons 1937; Weber 1997: 519）。遊行的長度由阿默達巴德的薩伯爾默蒂到丹地共 230 英里，這在遊行進行的時候有助於提高大加期待，同時也給媒體充分的時間將遊行的信息傳播到整個印度和世界其他地區。結果，遊行者的形象（他們無論到那裡顯然都自發地受到廣大的歡迎），以及甘地的形象（從踏出修道所開始，然後最後到達海邊並且走入海裡雙手捧起滿滿的鹽，做爲公開反抗印度殖民政府的舉動），很快地就透過戲院的新聞影片傳遞到全世界（印度西部是例外，在那裡這些影片是被查禁的）。「丹地大遊行」是 20 世紀最大的政治新聞事件之一，吸引了「高度的曝光率和來自全國、甚至全世界的注意力」（Sarkar 1989: 286）。大遊行立即象徵著一場無法阻擋的印度人的自由鬥爭——並且甘地也一直是朝著產生這種效果在策劃這場遊行。

譯註 12 波爾是荷蘭語裡農夫的意思。荷蘭人爲最早大量移民南非的民族，大多在當地從事農作，因此以「波爾人」（Boer）自稱。他們爲了經濟和不滿英國人的統治，從 1836 年開始約有 1.2 萬至 1.4 萬人駕著牛車離開南非的殖民地，進入辛巴威，並建立了 Natal 和 the Orange Free State 等小國。

## 五、甘地在蘭開夏 (Lancashire)

甘地也許是操作了第一場媒體戰爭，但他並不是一位實質的政治家。確實，他之所以能吸引媒體的主要因素，在於他有特殊的能力以個人獨特的方式和一般民眾中廣大的支持者站在一起。除了他在齋戒或被監禁在監獄之外，甘地在他的運動中永遠是極度活躍的——例如迅速地搭乘火車繞行印度，為他在1919年第一次的全印度不合作運動尋求連署簽名。當他在1931年為第二屆印度圓桌會議來到倫敦時，茱蒂·布朗 (Judith Brown) 記載道，他除了參加會議之外，還賦予他自己另一個任務去完成，主要是

去公布國大黨的聲明以及讓他自己能在英國廣為人知；因為終究影響英國對印度政策的是英國選民。因此，他緊抓住每一個影響英國大眾意見的機會，熱切地向媒體闡述他的觀點，並且安排和個人或團體見面討論 (Brown 1989: 259)。

334

他的宣傳運動遠遠比他的政治談判來得成功。經由英國支持者的協助，他受到帝國國王喬治五世 (不情願地) 的接見，在下議院向支持的勞工黨議員演說，以廣播向美國演說，這是他第一次電台演說，由哥倫比亞唱片公司錄音，給英國媒體寫文章，向皇家國際事務學院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演講，花了一個週末在牛津和有影響力的學者談話，拜訪劍橋、曼徹斯特和諾丁罕 (Nottingham) 大學，以及，很不尋常地，一些「公立」學校，包括伊頓。他會見坎特伯雷 (Canterbury) 的大主教洛伊·喬治，有名的「紅色的教長」(the Red Dean)，同時向一群超過30名的主教、其他教會的領袖以及貴格教友和牧師演說。波士認為整體的訪問是失敗的，他指出甘地一直忙著在英國到處和人見面，以致於參加圓桌會議的印度成員很難找到他 (Bose 1997: 250)。甘地受到英國民眾極大的歡迎。他的宣傳運動是從他在倫敦東區的旅社展開，那裡是倫敦市最貧窮的區，他刻意選擇留宿以表示和窮人站在一起的舉動 (可以比較卡斯楚後來和哈林區的友善關係，以及哈林區和卡斯楚的友善關係)。甘地在這段時間最為感人的一些照片，顯示出他被一群和他住在一起的貧窮的白人勞工階級包圍，人人的臉上都煥發著興奮的神彩。甘地花了許多時間毫不倦怠地去倫敦窮困的區域和一般人見面；這些人也都已極高的熱情歡迎他。他也去到蘭開夏和那些因為他的國貨 (swadeshi) 運動而受到影響的棉花工人。不但沒有對他懷抱敵意，那些女性工人還以相當的熱情來歡迎他。在一張引人注目的照片上，他站著而旁邊圍繞著帶著笑容的女人，年輕的和年老的都伸直手高興且熱烈地歡呼。這些女工的祖父、曾祖父輩是美國內戰

時期的英國棉花工人，儘管他們因為美國南方棉花遭封鎖無法出口，以致於幾乎處於一貧如洗的狀態，他們還是持續支持美國北方，以及北方解放黑奴的戰爭。甘地的到訪讓他對於英國工人對大英帝國的態度有產生一種罕見的觀點：英國工人階級支持並且完全認同印度爭自由的運動。他們長期以來也一直在進行他們自己的自由運動。

印度的解放鬥爭是如此的漫長，以致於它的形式不可避免地是複雜的，而且有時還是相互矛盾的。甘地是一段獨特歷史中非常不尋常的現象。從他自南非回來，他的介入有效地把解放運動帶到一條不同的道路上，迥異於傳統的鬥爭包含極左派和國大黨中產階級民族主義菁英之間不穩定的聯合關係。那種個別的歷史從此就持續再進行著。如果甘地有助於國大黨在爭取獨立鬥爭中的勝利，大部分後殖民時期印度採取反抗長期政治霸權的理論發展路線，不是採取一種重建本土的民族主義的立場，就是走向一種左派的政治，它雖然反對甘地的意識形態，但卻持續攫取他當年抗衡直覺政治策略中的政治形式和技巧。隨著時間，這些理論發展路線似乎逐漸走向現代，並且和21世紀激進的政治實踐有關。甘地的哲學是以批判現代性和科技為基礎，他對於殖民政權的反抗形式，不合作運動，就如他自己所承認的，在於能藉著媒體科技成功地自由利用全世界的溝通管道，並且因為如此他才能同時在地方和國際的層次同時施加政治壓力。在這方面，他的抗現代性證明是所有反殖民的運動者中最為現代的。

## 24.

印度Ⅲ：  
雜揉性和底層階級的能動性

## 一、甘地的低能見度

337

儘管在任何時期都是最廣為人知的反殖民領袖，儘管他在有生之年、以及經由諸如李察艾登保祿（Richard Attenborough）所導演的熱門票房影片「甘地」（1982）所建立起來的媒體聲譽（Sofri 1999: 178），儘管在20世紀革命領袖的歷史分析中是典型的代表人物（Fischer 1947; Fulop-Miller 1927a; Wolfenstein 1967），並且儘管他在理論的和其他類的著作的總量已達到100冊，在後殖民的研究中甘地的名字並沒有廣泛被引用（一個例外，參閱Gandhi 1998）。不像法農，他的著作並不是後殖民讀本和文選所不可或缺的。他對於英國在印度統治合法性的攻擊，他對西方現代性所做廣泛的文化批判，他對文化雜揉的過渡形式的稱許，他用來打擊和抵抗英國強權的那些微妙的政治策略，他熟練地利用他所挑戰的那種現代性的科技，他對於父權統治、種性制度、競爭的資本主義、工業勞動的條件、印度內部財富分配極度的差距等現象的質疑——所有這些特質也許會讓人預期，在那些著作仍在當今受到重視的激進的反殖民思想家中他會列在重要的位置。

甘地從後殖民理論前景中缺席，對照著印度知識分子在後殖民領域中的重要地位，顯得格外奇怪（Dirlik 1997）。然而，他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他的名字不常出現的現象所可能暗示的。是什麼原因造成他的低能見度？解放爭鬥的歷史遺緒一直是把訴諸於暴力革命的政治，以法農為代表，放置在凸顯的位置，而不是甘地早期的非暴力抵抗，以及對所有抗爭形式的抵制，包括那些階級和性別的抗爭。甘地那種不合時尚地支持「政治的精神化」——認為精神擴散到日常生活中的各個層面，包括政治層面，並且應該做為人類生活方式的基礎——更增加了這種不受重視得結果。由於他這種受到聖化的地位，以致於有關討論甘地的文獻都傾向於極度推崇的而不是分析性的，以致於抽象化他的思想和信念而忽略他在政治實踐上物質的面向。在印度，雖然有著由納拉揚、巴葦（Vinoba Bhave）以及較為近期的安特

338

譯註1 這個字最早是由Savarkar於1923年所寫的一本小冊子“*Hindutva: Who is a Hindu?*”所創造，用來描述主張印度教國族主義的運動。

(Baba Amte) 所領導的甘地主義運動，甘地也被一個在文化上倒退的印度教徒主義 (Hindutva) 譯註<sup>1</sup> 意識形態所挪用 (縱使他是被此意識形態的創始者達莫德爾 (Vinayak Damodar) 的同夥所暗殺)，他在西方 (有時在印度也有) 的擁護者一直都以基督教徒居最多數——當他那本民族主義的宣言《印度自治》(1910) 在美國以基督教化的名稱《海上寶訓》(Sermon on the Sea) (Gandhi 1924) 重新出版時，在美國對甘地的興趣也大幅度增加。

甘地這種非尋常的立場，由於它的馬克斯主義取向，在後殖民研究理在物質得和精神的操作之間，造成一種絕對的區隔，這個領域的特徵在於一種未經協調的世俗主義，反對並且持續地排斥那些帶有政治認同的宗教，但也提供給西方人另一種可能的價值體系——廣義地說，伊斯蘭教和印度教。後殖民理論儘管支持底層階級的反抗行爲，很少重視那種沒有依照它本身世俗的條件來操作的底層階級反抗行爲 (Chakrabarty 2000)。雖然甘地自己從來沒有希望被認定和極端主義者或這些宗教的所謂基本教義派有關，他對靈性普遍的強調，意味著他和他們的立場的共同點，其程度至少等同於他和世俗的作法之間的共通性；在他一生中他在印度和共產主義的關係是複雜的。就最正面的角度來看，對於以精神做爲另一種手段如何能發展成爲一種反西方的政治和文化批判形式，甘地提供了一個極爲重要的範例。他強調政治獨立是乃是個體自治 (swaraji) 的結果，他重視義務甚於權力，他對非暴力抵抗的支持，他對於著迷於物質性的西方文化的批判，這些都是激進的觀念，挑戰了廣傳的後殖民倫理的預設，並且證明了後殖民主義浸淫於物質主義背後意識形態的一致性。雖然這些不合時的議題以及顯然是保守的態度是甘地思想的核心，他的許多其他想法卻決定了在後殖民領域裏印度文化和政治思想的形貌，這個結果本身或許是甘地的思想深深親浸於印度文化與政治思想的結構裏所間接產生的。這個明顯的自相矛盾可以部分由甘地自創的世俗化的、講求容忍的印度教來說明。幾乎他生活的其他面向也是如此，甘地創立他自己的宗教，一種獨特地混合印度教、伊斯蘭教、佛教和基督教的理念的產物，這一直沒有成爲一種正式的而且是共同持有的一套信念。結果是，雖然有小眾的信徒印爲他的信念而跟隨著他，他的理念並不是以一種宗教的形式而是以一套文化的、精神的和政治的行爲準則廣泛地來傳布。同時，他的天才在於他創造了這些行爲準則之後，能於公共場域在那些關鍵的策略行動裏加以非常有效的應用，以做爲反殖民抗爭的一部分。甘地的原創性不僅在於訊息也在於傳播媒介。

## 339 二、親密的敵人

在印度獨立運動裏，正統馬克斯主義、尼赫魯社會主義以及民粹式的甘地主義

之間的分裂，持續在後殖民的印度社會裏上演。比甘地更爲關鍵，尼赫魯才是發展都會世俗主義模式的人，這個模式直到現在對印度知識分子而言還是主要的類型。這些傳統的意識形態路線在1970年代可以清楚看到在轉變：雖然指出這種轉變和甘地夫人 (Indira Gandhi) 惡名昭彰的政治實驗——緊急狀態 (the Emergency, 1975-1977) 有直接關係可能過於簡單，然而那些後來大都數在後殖民的批判論述中占有主導位置的印度知識分子所進行的原創的理論和政治更新，並且由這些更新產生轉變，是緊接在緊急狀態之後的時期開始出現。這並不僅是緊急狀態本身所產生的結果，而且對緊急狀態最爲大聲急呼反對的RSS和印度教右派也促成這個結果。在印度，傳統的政治構成和分化開始崩塌，而左翼新的立場開始發展，並且是第一次敢去轉化長期以來做爲印度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正統之間對立的基礎。理論工作中一種新的國際主義可以作爲典範。例如，阿赫默德 雖然明顯地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卻是把自己廣泛地歸類在一個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傳統裡，這個傳統包含有和「印度共產黨」格格不入的民族主義形式；他對葛蘭西的興趣以及他對自己政治立場的定位和美國左派刊物《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 關聯在一起，在在暗示著一種徹底的意識形態和方法論的應變能力 (Ahmad 1992; 1996: 409)。在文化分析的層次，這種創新的知識上的轉變，還包括巴巴、恰特吉、史碧娃克和其他人；同時，在史學的層次，則包括那些「底層階級研究」的歷史學家。這些運作主要將歐洲、非洲、迦勒比海和拉丁美洲所發展的新理論模型加以吸納與改編所引發。

對某些人而言，這種轉化也涉及以一種比往前印度社會主義把甘地—馬克思之結合高度精神化更爲徹底的方式，重新詮釋和納入對甘地思想中某些方面極爲世俗化的解釋。這主要是經由南迪居間促成的，南迪對於甘地抗衡直覺策略的詳細闡釋，呈現在《親密的敵人：在殖民主義理自我的喪失與回復》(The Intimate Enemy: 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ialism) (1983) 這本書裡，此書是在底層階級研究第一冊出版的隔年出版的。南迪的書包含一種對「非英雄」方式的分析，針對印度知識分子和政治家們處理英國殖民主義統治權力的方式，同時也包含分析印度人創造「一種另類的語言或論述」來回應殖民的統治知識的方式。「這是他們的反殖民主義；也有可能把這變成是我們的」(Nandy 1983: xvii)。此種對抗知識是經由重新詮釋甘地的思想所發展出來的，並且提出了許多特別和後殖民理論有關聯的基本原則。雖然遠不及薩依德的《東方主義》那樣受到注意，《親密的敵人》卻是在離散的印度知識分子之間建立起後殖民研究的理論—政治環境的基本架構的最具貢獻的書本之一，並且經由這些知識分子傳遍這個領域。

這個取向在於強調甘地思想和政治策略中心理學和混種性的意義。爲了達到此目標，南迪有效地把印度的後殖民主義和沙特與法農這主要的反殖民法語系傳統串

連起來，這個傳統對於殖民主義在物質上和心理上、外在和內在所帶來的效應，都同等重視。在這個取向上，南迪把兩個迄今為止互不相干的反殖民傳統結合起來，這兩個傳統以往沒有結合在一起的歷史原因，前面討論印度的章節已略有描述。和法農一樣，甘地儘管和馬克思主義的反殖民主義觀點有根本的不同，他認為物質的和心靈的戰爭對於打擊殖民主義都是同等的必要。然而，南迪主要在強調心理的領域而輕忽物質的和精神的因素，因此引發了對每個因素所被賦予的角色不少的爭議。此書所詳述的主要爭論包含一個令人震驚的命題：「殖民主義首要的問題攸關意識，因此終究需要由人的心靈來界定」（Nandy 1983: 63）。南迪所關注的是殖民主義對殖民的和被殖民的文化在心理上所造成的影響，這使他能夠與薩依德的文本論述分析連結，將文本視為支配性的殖民文化之通見形構。這種合併強調論述和心理學的取向，會對後殖民分析明顯地產生祛物質化的結果。雖然如此，南迪的《親密的敵人》提供了一個新的可能性來思索殖民主義的個人經驗，以及針對它的種種抗拒形式，無論是公開的或是隱蔽的，政治的、心理學的、或是性別的。到了南迪才關注到抗拒的政治或是隨後而來的民族主義如何受制於沿襲自西方論述的名詞這個議題上。這是他在序言中所強調的核心問題，同時他也認為這個問題除了甘地之外，很少人可以克服。南迪尤其讚揚甘地的抗現代性所具有的顛覆激進能力。

不同於沙特和法農經常以辯證的方法來思考，南迪那段基本的也是最惹爭議的主張，「殖民主義首要攸關意識」，則認為本體論優先於歷史，並且明顯地認為殖民主義對於意識的作用，比殖民擴張對世界所帶來的擾亂的轉化——無論是物質的、軍事的、經濟的或是文化的——要來得重要。然而，我們並不一定要同意南迪的優先順序，才能認識到他的立論本身的意義。他承認法農是最早「指出殖民地裏歐洲中產階級在心理上的優勢」（Nandy 1983: 4n）。雖然包括法農、門諾尼（Octave Mannoni）和梅米等作家長期來習慣分析殖民關係裏在人與人之間造成變化的動力，但南迪和他們不同的地方在於他跟隨甘地的論點，認為殖民主義除了對個人之外，也同樣對殖民社會和被殖民社會兩者造成文化和心理上的變異；因為這個原因，解放的工作必須由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心靈開始。在這個論點上，南迪引用阿多諾對法西斯主義心理學的分析，以便能瞭解威權政權的運作（在做此引用的同時，南迪也是第一個人將阿多諾引入到後殖民研究的領域）（Nandy 1980: 99-111）。帶著阿多諾和霍克海默的《啟蒙的辯證》（*Dialectic of the Enlightenment*）的精神，南迪認為實際上有兩種反殖民主義：一、馬克思主義，它的批判是以西方自己的自我批判（*autocritique*）的措辭所建構起來的——以它自己的批判自我來反抗西方，並且致力於抵制它自己的帝國的動力。第二，南迪指出，反殖民主義採取一種心理的反抗的形式，可以建構出另一種西方。為了分析第二種他稱之為甘地式的反殖民主義，南迪求助於西方另一個異議的、批判的論述觀點，也就是心理分析，

雖然他決定絕不把它當做一種系統的、支配的觀點。

南迪為後殖民理論引入了心理分析，可說是具有貢獻。然而，使用心理分析並不表示引進最新的西方理論機制：在其他地方，南迪業已指出心理分析的理論和實踐在印度的歷史和在歐洲或美國一樣久：例如，波士於1922年在加爾各答成立了印度心理分析學會，只比英國心理分析學會的成立晚了三年（Nandy 1995: 96; Sheshadri-Crooks 1994）。有效地利用這種雙重觀點，也就是從在主流政治的層次運作的反殖民抗爭的直接歷史這一普遍的架構中，來觀察抗爭的心理形式，其結果是，南迪能夠在一直作為後殖民研究典範的馬克思主義批判這一範圍內，融入心理學和意識形態的分析——即使他本人自認是反對馬克思主義。在這樣的脈絡裡，南迪也把法農引進分析印度的理論的範圍內。

《親密的敵人》包含兩篇可以互相對照的文章：〈殖民主義的心理學：英屬印度的性別、年齡和意識形態〉、以及〈沒受到殖民的心靈：從後殖民的觀點看印度和西方〉。藉此作法，此書把反殖民歷史的遺緒和對現在的關注結合在一起。南迪指出，他這本書「主要在探究支持和反抗英屬印度裏殖民主義文化的心理結構和文化力量」，如他所指出，這本書毫無疑問也是「對後殖民意識的研究」（Nandy 1983: xvi）。在殖民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的分析之間進行這種區別和關聯的結果，南迪建立了後殖民研究的雙重焦點的範圍。他的書設定了四個成為這個領域至關重要的議題：反抗的心理學，借用被反抗對象本身文化中的理念和策略來進行反抗的問題，帝國主義和反抗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實踐的性別化，以及由印度反殖民和後殖民文化經驗中汲取，把混種化做為主要的知識和政治策略的可能性。所有這些主題的討論，是透過以世俗的觀點來閱讀甘地的方式所開啓的。南迪重新詮釋甘地對精神力量的強調，把焦點放在心裡的內在自我，引用心理分析的語言和觀點，取代shakti或是精神能量和力量的語言和觀點。在引用甘地的同時，南迪藉由強調他那種一元論的哲學——宗教思想的心理學面向，重新詮釋甘地。

南迪開始以甘地式的措辭來反對馬克思對殖民主義所提出頗具問題的見解，馬克思認為殖民主義是進步的西方現代性的一部分。南迪所反對的，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政治學本身，而是馬克思主義用來認同現代性的普遍主義觀點，特別是馬克思的論點，殖民現代性的暴力和文化脫離，終究會形成一股解放的力量。南迪援引甘地在一場爭論中所提出的說法來反對此論點：縱使早期的現代化論者，如羅伊（Rammohun Roy）（1772-1883），或是民族主義者如查托帕迪亞雅（Bankimchandra Chattopadhyay，1838-1894），都把印度受殖民統治的問題歸諸於落後或是欠缺現代性，對甘地而言，印度的孱弱是其人民太過耽溺於殖民現代性的誘惑的結果。南迪以阿多諾的說法重新詮釋甘地的疑問為，廣泛意義下的西方科技觀點的宰制。跟隨著甘地對於現代西方文明黑暗和暴力面向的強調，南迪認為，世界大戰、諸如越



南的殖民戰爭、「種族滅絕、環境災難和族群滅絕，乃是腐敗的科學和精神病理的科技和新的世俗的階層體制緊密結合所導致」。這使得他去質疑對進步的肯定，以及進步所附加的規範性和男性氣概的價值，他也質疑科學和技術的發展，並且質問一般人對「非現代文化」的持續存在無情的攻擊，是否即為西方殖民的意識形態的延續。他宣稱，現代性本身也許就是「殖民的第二形式」，這也包含內化在殖民與後殖民人民心裡的意識形態，認為現代性是走向自由的必要途徑：

……這是第三世界裏至少六代的人一直視之為他們解放的必要條件。殖民主義除了殖民身體之外，也殖民心靈，並且它也在被殖民社會釋放力量來完全改變他們對文化優先順序的看法。在這個過程，它也協助將現代西方的概念，從一種地理的和時間的實體擴大成為心理的範疇。西方現在是無所不在，存在於西方和西方之外；存在於結構，也存在於心靈裡。  
(Nandy 1983: xi)

南迪認為，即使那些反抗殖民主義的人，也經常「帶著罪惡感地」擁抱和支持現代性：「因循傳統進行的反殖民主義……可能在為心靈的殖民辯護。」殖民主義會設法去創造「一種文化，在這種文化裡被統治者不斷地受誘發去反抗他們的統治者，但卻是在統治者所設定的心理範圍裡」(ibid.: xi, 3)。因循傳統的反抗所依據的核心價值，是從殖民者的世界觀中篩選而來的；例如，印度國大黨的憲政自由主義。相反地，南迪所關心的是從殖民一直沒有間斷到後殖民這段時間裡，對第二種，也就是心理和意識形態的殖民形式的反抗模式。這類反抗並不容易，因為西方早已經建立它自己的反對模式：所以，對殖民主義進行的意識形態的反抗，大多在運用西方自己的反殖民傳統：

我們不要忘記法農對於西方最強烈的譴責是以沙特那種優雅的文體所寫成的。西方不僅製造出現代殖民主義，也提供最多對殖民主義的詮釋。  
(ibid.: xii)

- 343 法農的作法是和西方自己本身批判的、他者的自我，形成一種聯盟，狄奧尼索斯的自我對抗阿波羅的自我，援用阿多諾的說法，被撕裂的兩半構成資本主義裡無法前後一致的脫位元素 (Young 1996: 21)。對甘地也一樣，在東方和西方之間無法清楚劃分，而是在各自裡面或兩者之間有一中辯證的混種構成。

同時，南迪把這種聯盟和他所稱的某種非共謀的「無知」做對比，他宣稱在印度就是此種「無知」擊敗了殖民主義。依據南迪的說法，此種非暴力的「無知」編造了它自己用來抵抗殖民主義和現代性的手段。在此處，他援用甘地的不合作運動的策略為例：印度的經驗意味著反抗也可以在心理的層面操作，而且此種反抗形式

在某種脈絡裏，會比武裝抗爭更為有效。同時，南迪反駁了甘地原來對印度人的指控，認為英國人會在印度，是印度人邀請他們進來的，而且印度人也一直沒有抱怨地而且還經常以自己的利益為考量來接受英國統治的事實，他認為就整個殖民時期而言，即使在表面上安靜並接受殖民統治的時期，也有一種心靈的戰爭在進行著。他把這種心靈戰爭擴大到對殖民主義意識形態更為普遍的反抗；和法農不同，他認為這種意識形態一直在心理和文化層次被抗拒，並且有效地受到抵制。法農大致上把心理學和以革命形式所進行的暴力反抗區別開來，南迪則把這兩者結合起來。經由嚴謹地採取甘地內在反抗的觀念，南迪把殖民區域內部推動變化的力量複雜化，同時這種巧妙的作法也可以讓他引進心理分析的思想來做為一種對抗直覺的策略，這個策略是巴巴著作的先驅 (Bhabha 1994)。

### 三、衍生論述

甘地的非暴力抵抗的思想引發南迪提問，在各種反對的名目之中，這種思想在什麼時機、甚至這是否是反殖民主義對有效的策略，依據法農對殖民者和本地人之間所採取的黑格爾辯證法，後者是以同等的暴力來回應前者的暴力。甘地認為，這樣的回應事實上等同於內在化殖民主義的價值——然而法農則反駁指出，非暴力本身是一種西方殖民的概念，因此是只對殖民者和本地的資產階級菁英有利 (Fanon 1965: 49)。南迪認為，傳統抵抗形式在策略上的問題，乃是這些形式採取殖民政權的結構和規則，因此一般而言會容易地受到鎮壓。如果以我們現在稱之為解構的模式來進行，並挑戰遊戲規則，難道不會更好嗎——玩另一種遊戲規則來搞亂殖民政權所建立的權力結構？最為聰明並且有效的步驟也許是採取不同的規則，以智取勝殖民者，以不同的方式玩殖民者的遊戲來搞亂他們，例如藉由不斷改變規則，藉由援用或顛覆殖民者意識形態中的其他部分 (例如，基督教、法治、以及甘地所援用的陽剛性質)。南迪指出，在統治的情境裡，只要你用其他人的規則來玩遊戲，你就不可能打敗他。就民族主義抗爭在意識形態和文化形式方面而言，他們使用的概念是可以讓殖民政權摸清楚他們的想法因而受到掌控。菁英民族主義者成為南迪冷諷下的「誇飾用的反對者」(ornamental dissenters) (Nandy 1983: xiv)。

經由這個論點，南迪強調甘地的「衍生論述」的問題，這個主題三年後在恰特吉的《民族主義思想與殖民世界：一種衍生論述》(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1986) 有更大篇幅的討論。儘管這個書名的對象很廣泛，恰特吉的分析主要是以印度為例，印度在1857年之後，軍事抵抗一直不是反殖民抗爭幕後的推手。當然，在其他地方的許多殖民地，恐怖主義和反殖民游擊戰事實上運作非常成功，無論是不是衍生而來的。然而，恰特吉主要是在強

烈批評民族主義的基礎，他認為在殖民世界民族主義的作用在一方面是支持那個它必然要去反對的宰制性計畫，來反對另一個計畫。反殖民族主義希望強烈表達和殖民政權一樣且平等，然而在另一方面，它卻希望主張它的民族認同和民族文化是和殖民政權有所不同的。這意味著反殖民族主義肯定「兩種相衝突卻又彼此不可或缺趨勢」。和南迪一樣，恰特吉也是環繞著現代性的問題來闡述這種矛盾：傳統上，民族主義一直認同殖民國家對於現代性敘述的掌握。同時，反殖民主義則採取以本土民族文化為名來排斥現代性的形式——這種方式首先由愛爾蘭發展出來。這種雙重的宣稱又由它的述說的雙重性所強化：如恰特吉所說的，

民族主義文本所訴諸的對象既是被認為是建構了此國家的「人民」，又針對那些宣稱統治此民族主義的殖民主人。對這兩者而言，民族主義意圖拆穿殖民者所做的宣稱，在現代世界的情境裡落後的人民在文化上是沒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民族主義駁斥被殖民人民乃是低等人的說法；它也堅稱，一個落後的國家在「現代化」它自己的同時也能維持它的文化認同。它因此產生了一種論述，這種論述甚至挑戰殖民者的政治統治，它也接受殖民統治所依據的同一個「現代性」知識前提。（Chatterjee 1986: 30）

根據恰特吉的論點，邁入現代性、發展的理念、進入脫離傳統和不振的歷史時刻，標示出從馬克思到尼赫魯以降反殖民族主義的普遍假設。甚至對法農來說，只有學到來自統治國家現代性的政治意識形態，無論是菁英或是大眾的反殖民族主義的宣稱才能持久。這種作法不僅使得脫離殖民之後的國家在意識形態上受到束縛，也必然和文化差異的主張相互矛盾。換言之，宣稱具有一種不同的民族文化和要成  
345 為一個不一樣的國家，這種作法卻弔詭地在運用那些來自他們號稱有所不同的體制和文化的概念。

南迪因此引發了一個許多被殖民文化揮之不去的議題；也就是，西方的現代性以及其概念上的政治機制，除了回歸傳統，回到一個相當大程度被幻想的前現代過去的主張之外，還可以如何去抵擋？法農認為一個新的民族文化要經由抗爭和摧毀舊的才能出現，就抵抗現代性而言，這種論點顯然並不是一個完全令人滿意的解決辦法（Fanon 1965: 197）。針對民族主義，恰特吉最近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法來解構「民族」概念的整體性（Chatterjee 1993）。其他最近的分析指向殖民現代性的發展，就是殖民文化本身的產物，而不是僅僅出自於對西方衝擊的一種反應：「非歐洲殖民地的現代性」，巴羅（Tani Barlow）寫道：「和歐洲現代性的殖民核心是同樣真確無可爭辯」（Barlow 1997: 1; Burton 1999; Chatterjee 1995; Panikkar 1995）。對南迪也是一樣，其答案位於現代性的辯證觀點裡，在於創造一種經由性別和混種性的跨文化過程的轉變潛能所締建的抗現代性，創出新的傳統，不回歸到一種想像中

純粹而又本土的知識，而是從古典與民間知識的辯證交混，此一豐富貯藏中擷取資源，既純粹又混成，高低同生，陽剛與陰柔並融：交混之現代性。

#### 四、雜揉性：做為形式和策略

你高高在上  
你是拿破崙白蘭地  
你高高在上  
你是聖雄甘地

到了1930年代，甘地已經世界聞名，且在美國特別著名（Bhattacharya 1969: 245-62）。在1934年百老匯所上演的戲劇「萬事皆可」（*Anything Goes*）裡，Cole Porter的歌曲「你是高高在上」幽默地把甘地和其他尊貴的類型相比較，包括「蒙娜麗沙的微笑」、嘉寶（Garbo）<sup>譯註2</sup>的薪水、賽璐玢（cellophane）、Pepsodent<sup>譯註3</sup>，華爾道夫沙拉（Waldorf Salad）<sup>譯註4</sup>，和米老鼠。即使他不知道把甘地和白蘭地做押韻並不合適，它卻是一份包羅萬象的名單。甘地自己以弔詭的方式把大眾媒體當做傳達他反殖民的批判現代性的工具，與南迪所強調的另一種具有特性的文化策略相呼應：雜揉性質。南迪在底下描述甘地對殖民主義和印度教所進行的批判認識，以及建立文化的真實性上的特殊成就：

取代印度民族主義的另一種途徑，乃是以特殊的方式混雜古典的和民間的印度教，以及不只非印度教徒還包括大部分印度人和印度教徒所實踐的非自覺的印度教。這就是吉卜齡所憎恨的那種中介性（liminality）<sup>譯註5</sup>。也是在這種中介性上，所有的印度社會和政治領袖在過去兩個世紀以來自我定譯為印度人。

最好的例子就是在甘地的政治風格裡出現民間的和經典的「喜劇」和「荒謬的」混合，以及有效的抗議和「稍微擺個樣子的抗議」之間虛偽的混合，甘地有時也被開玩笑地拿來和卓別林以及米奇貓做比較。（Nandy 1983: 104）

<sup>譯註2</sup> 指的可能是當時最有名的女星葛麗泰嘉寶（Greta Garbo）（1905-1990），她曾演過「安娜·卡列尼娜」（1935）和「茶花女」（1936）。

<sup>譯註3</sup> 這是早期在媒體上廣受歡迎的牙膏品牌。

<sup>譯註4</sup> 這是1986年由紐約飯店界龍頭Waldorf-Astoria所創作出來的經典沙拉，以輕鬆不費事的作法就可以享受到蘋果香脆的美味。

<sup>譯註5</sup> 或譯為閹限、閹域、中間性、中介狀態、邊緣性、識閹性、出格狀態、左右為難的處境等等。

南迪承認，甘地的政治風格就像他的印度教，帶有演藝人把一些不搭調的文類、文化、種性和階級相互混合的技能。這種展演的、混種的模式，乃是他廣受歡迎的秘訣，也是他不僅能獲得印度資產階級菁英，也能獲得他公開認同的廣大印度農民的積極和熱烈支持的秘訣——這些農民從來沒有一位政治家或政黨能在全國的層次上成功地動員。依據南迪，「中介性」不僅是離散的後殖民遷移者所呈現的狀態，如巴巴所一直認為的，也是印度人本質（indianess）本身的原真狀態。把中介性和不純粹性並列，附帶召喚出他加上「本真性」價值的非自我意識到的「印度人本質」的特質，南迪自己就在傳達一種混雜的政治訊息。做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印度教徒主義（Hindutva）在它建構它的本真的印度人本質的觀念時，也可以顯示出是可變通的和雜揉的（Savarkar 1942）；南迪顯然並沒有受到種性的區隔和社群中介性對穆斯林和印度其他少數民族的宗教的影響，他認為所有印度人、印度教徒和飛印度教徒都過著一種符合「非自我意識到的印度教義」的生活，這種格外的堅持引發了一個問題，後殖民印度文化批判在觀點上保有多大程度是出自於印度教的，即使表面上看起來是世俗的觀點。同時，在另一個層次上，藉由強調甘地「喜劇的」和「荒謬的」那一面，南迪開啓了一個非常不同的政治可能性的方向，這些可能性早已出現在甘地自己的文化雜揉的概念裡。

甘地時常辯稱，他的理念從來沒有形成一套系統。他自己的思想在本質上一直是反系統的，並且以一種極端的文化折衷主義（eclecticism）來操作。他對著那教義（Jainist）中真理具有多面向性質的理念提出自己的解釋，並藉由推廣這種解釋在概念的層次上強化他的思想。儘管他排斥西方的現代性以及衍生性的論述，他坦承自己從西方思想家學到不少，並且主張一種文化和知識論多元主義的形式。甘地公開地從不同的宗教借取理念，特別是基督教、佛教，同時也在策略上從伊斯蘭教借取，因而也常常被批評這樣的作法會使得他的印度教不純潔。他所創造出來的是一種經由反系統的混合主義（syncretism），對不同宗教思想的不同層面進行創造性的綜合，這也破除了個別宗教在制度上造成物化（reification）。雖然深植在印度教義裡，甘地對所有宗教的傳統都保持開放，他認為所有的宗教根本上都是源自同一位神。甘地將他對其他的理念和文化形式會有離散的接受態度（diasporic receptivity），歸諸於深根性和開放性——深植於他自己家鄉的印度教的古老傳承，但對世界上所有偉大宗教的性靈遺產保持開放。「願全世界所有尊貴的思想都流傳給我們」是他最喜愛的箴言之一。對於那些反對甘地的折衷主義的論點，帕雷克（Bikhu Parekh）以這樣的方式來為甘地的方法辯護：

甘地和他的批評者之間的辯論凸顯出兩種對宗教和宗教真裡的不同取徑。對他而言宗教是一種資源、一套洞見，可讓人汲取、融合，並以他認為合

適的方式解釋。他對宗教的取向因而是極度地反歷史的、不受限制的、反傳統主義的，並且是自由的，同時他沒有以每個宗教的方式來讀它們的經文以及瞭解該宗教的傳統。（Parekh 1997: 37）

這種雜揉的方法也在某些印度著作的理論層次上產生影響，以一種經常被描述為標誌著後結構主義或後殖民主義影響力的方式產生影響，並且被用來做為責難它吸收西方思想模式的理由。對其他既存的多種文化來源保持開放態度的改變，在文化深根性上所造成的改變，也可描述遷移者的文化情境。對甘地的方法的反對，預先提示了對南迪和巴巴的反對。如果我們把帕雷克對甘地的描述中「宗教」這個詞置換成「理論」，也許可以用來對南迪和巴巴的方法提供適當的描述，這兩位也同樣會以某些合乎他們自己概念上的優先順序的解釋觀點，來竄改理論和歷史。帕雷克繼續說：

對他的批評者而言，宗教就是歷史的傳統，獨特地根植在一個歷史的事件裡，掌握著道德和性靈上的權威，形成一個特定的社群的基礎，並要求對其基本經書做仔細和忠實的研讀。

就像甘地對經文重新解釋一樣，南迪和巴巴也重新解釋理論和政治的文本，鼓勵個別的批評者以尋求創建做為重點，而不是去接受那些廣泛被認為正確的意見或傳統的信條，並且為跨文化對話、交換、轉譯和轉化創造空間。兩位評論者在他們的著作裡頗具個性地違反他們所引用的理論傳統的歷史完整性，並且藉此把它的範圍從制度裡去除。巴巴本人有著「不關心歷史關聯」的傾向，南迪則宣告：「由此我毫不猶豫地鄭重表示，這些文章乃是一種另類的歷史神話集，否定並且拒絕歷史的價值」（Bhabha 1994: 199; Nandy 1983: xv）。歷史的解釋對抗當代的解釋，這兩種方法在最深層處相互規約也相互支持，在系統的、歷史的解釋和學術自由方面，提供共同的但在許多方面是相對立的優點。甘地的批評者只是在要求甘地不要成為甘地，而是在既存的慣習裡當一位宗教的思想家；同樣的道理，如果巴巴以改變他的解釋方法來回應他的批評者的反對意見，他就不再是巴巴，睿智的洞見就會喪失，同時他將成為一位普通的文化或歷史的評論者。

## 五、Samas 和雜揉性

我已經成為東方和西方的奇異混雜體，到處都格格不入，沒有地方感覺像家。（Nehru 1936:597）

就政治立場而言，南迪在許多方面十分接近甘地，裝扮成本土性的領導者。必須強

調的是，巴巴的政治觀點是和任何可以稱得上是甘地思想的有極大的不同，而是和尼赫魯的全世界反殖民社會主義有更為明顯的關係。然而，在概念化和關心另類的政治策略層次，甘地的融合的理論方法和巴巴之間的相似性是有啟發性的。和巴巴相同，雜揉性對甘地而言不僅是一種折衷主義或任意的混合的事情。在《印度自治》裡他指出：

印度不能成爲一個民族，因爲歸屬於不同信仰 (dharma) 的人民住在裡面。引入外國人不必然會回毀滅這個民族。只有在保留這個條件之下，一個國家才是一個民族。這個國家必須有一種同化的能力 (samās)。印度一直是這樣的國家。(Gandhi 1997: 52)

甘地這個翻譯成「同化的能力」(samās)，的古吉拉特名詞，事實上在描述語言混種的能力，藉由引入兩個或更多以前已有的字「在文法上造一個新字的技術」。做爲一種語言學上的作法，samās 典型地帶有連結兩個在口語上因爲發音或韻律相同而可以並存的字，即使第二個字是無意義的 (例如，茶 chabha 這個字)。然而，甘地的例子的力量指向 samās 的相關意義，用來連結隱含著相對立、絕對無法同化的類別的兩個字，例如 sukhdukh 這個字 (快樂與悲傷，意思是快樂—不快樂)。雖然主要在強調接受與同化，這一方面並沒有像在 samavesh 這個連結字裡有那麼強的意涵。以字源學的說法，samās 源自於 sam，意思是平等 (sam 也普遍用做字首，意指平等和平靜的狀態)，以及 aas，意思是在一起。所以，samās 創造出一種結構，它的重點就在於它的組成部分，以同等的條件被容納，並存但在同化的整體裡保存他們自己的獨特性。Samās 的結構可以比擬梵文連音規則 (sandhi) 的系統，意思是協定，這在文法的用法上意味著連結兩個字，並且依據語尾的變化把它們從副詞轉變成形容詞或動詞。基本的差異是，在連音規則裡字詞必然會進行某種改變，而在 samās 裡則不會。所以，在援引 samās 這個名詞的時候，甘地是在暗示著，在因應來自不同宗教的移民方面，印度在文化上有一種類似於形成複合字或是合併詞的能力。雖然 samās 指涉的是在同一種語言裡把相反的兩個字連結在一起，甘地的例子事實上更接近西方語言學裡語言混種的結構，在此結構裡混種意指「一種由屬於不同語言的元素所形成的合成字」(OED)。

349 甘地因此在混雜著不同文化的人群裡把語言和文化的混種性連結起來，這預示了巴巴在斷裂的 (disjunctive) 文化雜揉裡的中心主旨，這種斷裂的文化混種則是從巴赫汀對「有意的」語言混種性的說明裏得到啟發 (Bhabha 1994; Young 1995a)。值得注意的是，「雜揉性」這個名詞是由巴巴和魯西迪 (Salman Rushdie) 引進後殖民論述裡的，這兩位來自少數族裔社群裡的人，是在一個把種族純粹性與種性之間對種族區隔帶有社會強制性做爲日常社會構成的主要的和制度化的特質的

印度成長的；這一個由來已久的「純粹性」政權，也是甘地花費大部分政治精力來反駁，並且在他的思想和日常生活裡處處排斥的對象。雖然沒有提出簡單的或是自發的連結，一直沒有改變的是，在甘地政治思想裡那個混種化的世界，純潔的人變成不純潔的人，而不純潔的人變成純潔的人，不可接觸的人變成可接觸的人，這種概念在物質、歷史和政治上所產生的戰鬥力量變得明顯。在實施混種化的同時，甘地挑戰並且連結了印度文化中衝突的、然而充滿動力的面向，巴巴則接著把這些面向轉化成瞭解現代性的途徑。

「他是一位難以瞭解的人，有時候他的語言幾乎是無法理解」，這是尼赫魯對甘地的抱怨 (Nehru 1936: 73)。雖然他採取一種儉樸的風格來反對在印度普遍流行的浮誇詞藻和華麗的語言，甘地的語言一直是帶有口語和地方方言的特質。評論甘地的文章，特別是他的演說，的評論者也經常會去注意到這些在形式上就是混種的，包括把意思相反的主題以一種奇特的、折衷的方式拼湊在一起，看起來幾乎是當場隨意地湊在一起的。最有名的例子可能是他於1916年在貝瑞納斯印度 (Benares Hindu) 大學建校落成的演說 (Gandhi 1997: 156)。在同一年他對經濟和道德發展的演說引用了，如同他的編撰者所指出：「新約聖經、莎士比亞和達爾文一起發現自然選擇原則的華雷斯 (A. R. Wallace)」(Gandhi 1997: 156)。結果，甘地的思想和毛澤東一樣，一般人最常透過他的著作的精彩段落的選集來瞭解。甘地著作中這種難以理解的折衷主義，和某些後殖民評論者，如巴巴或史碧娃克，那種難懂的、晦澀的風格之間所具有的相似之處，也是令人感到興趣的。

## 六、印度後殖民理論家的歷史的策略

所以，甘地所採取的文化批評的策略和方法，與那些當代印度後殖民的評論者之間的相似處，在內容的層次上僅關聯到南迪所區隔出來的那些方面。雖然他自己以這些因素來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現代性 (比甘地本人更加直接)，相反地，其他的人大都數反對南迪把本體論的地位放置在歷史之上，同時他們發展甘地的見解和策略是爲了干預和轉化馬克思主義正統思想的方法論的前提和概念的假設。結果是，他們有效地以一種或許可稱之爲獨特的三大洲的辯證方法，把來自於由甘地和共產黨所代表的兩種歷史表述方式的元素並存，這兩者在解放鬥爭期間一直是勢不兩立的。隨著印度社會主義的衰微，新的行動開始啓動來發展以農民—無產階級聯合爲基礎的馬克思主義者—甘地支持者聯盟的可能性 (Joshi 1986)。印度後殖民主義所堅持的思想架構和政治見解一直是屬於馬克思主義的，但是這種馬克思主義現在滲入的不僅是對農民、低下的種性階層和部落的重視，而且比以前更加關心有關能動力、性別和心理的問題。一直有人認爲，印度馬克思主義者迄今主要都在馬克思本

人所建立的解釋架構裡運作，這把印度的政治和印度歷史塑造成為傳統價值和現代性價值之間的衝突，並且把馬克思主義和印度歷史發展路線本身視為是殖民地現代性進步的現代化的面向。如沙卡（Sumit Sarkar）所指出的，這忽略了社會改革和文化的領域，在這些領域理現代性的問題對被殖民的印度人是最迫切的（Chakrabarty 1992; Chatterjee 1997: 9; Sumit Sarkar 1989）。先鋒的政治菁英和群眾之間的二分法，以及傳統馬克思主義對無產階級當政的支持和三大洲馬克思主義對農民角色的承認之間的二分法，一直維持不變。因為引進非正統的概念而使得馬克思主義在印度知識分子之間產生變化，是在獨立之後數十年才開始的，部分原因是為了回應三大洲馬克思主義，尤其是毛派於六〇及七〇年代，受到1967年在西孟加拉的納薩爾巴里（Naxalbari）所發生的成功的農民反叛事例所啟發，部分原因是國大黨在實施「緊急狀態」（1975-1977）期間信用蕩然，造成重新對左派，以及另一種左派的可能路線產生興趣。就是在這樣的時刻，主張印度民族主義的歷史學家把印度獨立運動描繪成是菁英政治領導人物的努力結果的說法，才特別明顯受到節制。為了促成這種轉化，是由在國外工作的知識分子，例如阿赫默德、巴巴、查克拉巴帝、古哈、史碧娃克和桑德·芮簡（Sunder Rajan），借重反殖民運動者長久受到尊重的先例，並且回應在他們自己國家邊界之外的發展所帶來的挑戰和機會，因而產生新的印度理論的成果，這些成果則是由它所吸取的國際主義的觀點來界定。

對史碧娃克和特別是巴巴不友善的評論者，典型地批評他們的抽象性或是缺乏歷史和物質的基礎（Parry 1994b）。這類評論本身傾向於把這種著作視為在歷史的虛空中運作，並且完全是在雲端所完成的，而不去注意這種著作背後印度的脈絡。事實上，就像「底層階級研究團體」的著作，史碧娃克和巴巴的著作，應該要和印度的知識分子文化的內在難題（problematics）以及它的政治歷史關聯起來看，才能適當地理解它們。他們全力地挑戰在印度學院的馬克思主義裡施行的理論和政治限制。藉由引入來自左派的另一種可能的概念架構，依據三大洲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以及後來以「後結構主義」出現的理論形式，他們也質疑帝國主義的遺緒，其中一個面向就是印度知識分子生活中的印度中心主義，這持續把焦點狹隘地集中在印度上面。甚至恰特吉對「民族主義思想和殖民世界」的批判，它的焦點實際上還是一直維持民族主義的觀點，從沒有把眼光移到到印度的疆界之外。同樣地，某些評論者認為，史碧娃克或巴巴的著作一直都沒有直接地處理印度的狀況，這樣的紀錄就構成了拒絕他們的著作的理由。這種高度偏狹的假設，認為這就是所有印度人——無論是離散的或是本土的——曾經從事的知識生產的全部，這樣的假設暗示著，查克拉巴蒂的「把歐洲地方化」的計畫有可能在這樣的脈絡裡，遭到解釋成一種不那麼激進的干預，而是一個短視的知識分子的民族主義自我肯定的姿態（Chakrabarty 2000）。

最近的印度後殖民理論以一種瓦解的力量在運作，因為它所挑戰的就是這種假設。它對於印度反殖民運動裡受到一定程度貶低的那種馬克思主義，進行修正和復原。在三大洲其他地方出現在解放過程中的事物，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轉譯、修正與接納，以便能造成它和地方社會與政治條件與歷史的扣連，同時越過階級政治延伸它的影響範圍來包括其他形式的解放鬥爭，這些事物則發生在印度獨立之後，並且為後殖民主義的理論工作提供了大部分的能量。印度在後殖民理論的優勢，有部分是這種理論受延後的行動的結果，在這種受延後行動裡，依據受惠於20世紀三大洲政治運動者著作的發展路線，馬克思主義被重新改寫和轉化，對同樣的基礎重新整理，擴展它的影響力，援用和擴大對於，例如，文化、商品和文化交易的產品的爭論，如同在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的著作中所示範的（Appadurai 1986）；或是擴大政治選民的範圍，以農民為開始，但也很重要地把焦點放在女性、原住民少數團體，以及這所要求的理論重新定位，如同在史碧娃克著作所進行的（Spivak 1993, 1999）；或是併入馬克思主義和沙特、法農以及法蘭克福學派的心理分析之間儘管是越界的，卻是長期的扣連關係，這種心理分析在印度的馬克思主義直到巴巴的著作出現一直是欠缺的（Wolfenstein 1993）；或是包含引進取自於新近出版的文章，例如早期馬克斯或葛蘭西，或是後期三大洲政治理論家，如毛澤東，以及「底層階級研究」歷史學家等人著作裡的概念。大多這類理論創新幾乎同時地在印度，或是可觀地在印度知識和政治環境約束之外產生，並且創造出一種不尋常的知識能量的動態場域，提供給後殖民理論中大多數的先進內容，並且有效地主導後殖民理論的領域。

## 七、底層階級研究

352

史碧娃克和巴巴在理論上的創新，也可以瞭解成依據三大洲抗現代性的理論資源來介入傳統馬克斯模式中歐洲中心主義的內在問題裡，如同我在《白色神話》（*White Mythologies*）（1990）中對他們的著作在大篇幅討論中所論證的。在這一方面，他們在文化領域方面的著作符映了並且逐漸影響到，1980年代初期由古哈和底層階級歷史學家們在史學史的範圍裡朝著個方向所進行的卓越的修飾。這群大部分屬於孟加拉馬克思學派知識分子的著作，現在則生氣勃勃地在重建歷史的領域本身，並且在全世界啟發了相互共鳴的計畫（例如，Beverley et al. 1995: 135-46）。「底層階級研究」歷史學家本身特別提出一個和印度相關的本地問題：他們的計畫所提出的一個中心問題，關注在自由抗爭的期間，底下事件如何產生的歷史問題：

這段時期許多農民起義，其中有些的眼界非常廣闊，反殖民的意識也很濃郁，但都等不到有領導人可以把他們帶出地方主義之外，並且把他們概括

為一種全國性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部分的工人、農民和都市小資產階級的派系鬥爭不是陷入在經濟主義裡，就是只要在受到政治化的地方就欠缺革命的領導人才，而且過於分散以致無法有效形成為一種民族解放運動。（Guha 1982b: 6-7）

「底層階級研究」計畫是為了瞭解一段從來沒有發生的歷史，「民族獨立歷史上的失敗」，或換一種方式說，印度獨特的自由抗爭的形式，這沒有經過激進的社會和政治轉化就達成獨立，這種轉化是由一種成功地主張殖民地屬民有「起義權力」的民族解放運動所促成的（Guha 1997: 47）。這個的重要一面，就是民族解放運動被社區主義和社區主義的派系主義所擊敗，而且由於英屬印度在1947年的分治，這次失敗對許多印度人而言永遠地被制度化（對巴基斯坦人和孟加拉人則不然）。

甘地自己和社群主義對印度獨立所產生的決定性影響之間那種高度受到爭辯的關係，意味著除了南迪之外很少人會沒有相當保留地去為他的政治背書。「底層階級研究」歷史學家基本上在許多方面是贊同甘地的反菁英主義的立場，同時也受到甘地有目共睹地支持農民階級運動、以及窮人、賤民階級（the Dalits）<sup>譯註6</sup>、和所有受逼迫處在印度社會最邊緣的那些人，簡言之就是底層階級所啟發。在另一些方面，他們對甘地的政治實踐和優先順序所抱持的不信任態度，可以比擬安倍德卡（Ambedkar）<sup>譯註7</sup>，他視甘地為印度種姓制度的共有主義領袖，以及「工人和農民黨」領導人，他們不滿甘地和印度資本家親近的（以及可以得到利益的）關係，和甘地不斷在遏止激進的農民行動主義。對「底層階級研究」歷史學家而言，如恰特吉所指證的，甘地開啓了把農民階級納入新印度國家的政治體制裏的可能性，但是儘管他對農民階級給予支持和認同，並且承諾強化他們的權能，實際的情形是，「農民階級注定要成為完全由他人所構想和領導的鬥爭的自願的參與者」（Chatterjee 1986: 124）。「底層階級研究」歷史學家因此特別關注甘地努力要去控制和阻止的事項：底層階級反抗所具有的自主能動性（autonomous agency）。

在印度，關注農民抵抗所具革命意義的著作，除了1960年代由「印度共產黨（毛澤東主義）」（CPI（M））和「印度共產黨（馬克思—列寧主義）」（CPI（M—L））所延續下來的納薩爾派（Naxalite）<sup>譯註8</sup>農民和部落民反叛的路線之外，事實上早

<sup>譯註6</sup> the Dalits 是印度種姓制度裡所有賤民的統稱，包括 the untouchables。

<sup>譯註7</sup> 全名 Bhimrao Ramji Ambedkar（1893-1956），出生於賤民家庭，後成為印度賤民領袖。曾與甘地辯論，並在1945年發表《國大黨和甘地為賤民作了些什麼？》（*What Congress and Gandhi Have Done to the Untouchables*）。1947年任印度政府司法部長，參與制訂印度憲法。

<sup>譯註8</sup> 在印度受到毛澤東思想影響，主張透過農民武裝鬥爭奪取政權的共產黨人（CPI（M）），因起源於西孟加拉邦納薩爾巴里（Naxalbari）地區而得名。主要的領導人是 Charu Majumdar and Kanu Sanyal。

就有從甘地的 Kisan（農民）運動出發的觀點（Dasgupta 1974; Ranga 1949; Sen Gupta 1979）。「底層階級研究」歷史學家很明顯也受到當代農民和部落反叛運動的激進主義的影響。他們在創造一種「納薩爾派史觀」上的作法，乃是去關注處在印度社會階層底層的那些個人和團體，他們的關注點不僅來自於現有的地方觀點，而且來自於強烈受到一位其觀念對三大洲激進分子更具意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影響的那種馬克思主義所最為看重的層面。雖然是以他所領導的共產黨的理論架構為前提，葛蘭西所發展的概念是意圖去說明當代義大利的特殊政治狀況——義大利本身是受到印度和歐洲反殖民運動分子的啟發，因而發起民族解放運動所形成的。在葛蘭西的時期，義大利同樣具有分裂的三大洲殖民社會那種複雜的物質、社會和文化特質，同時如阿默德所指出的，這些特質中有許多是特別類似過去和現在印度所具有的（Ahmad 1996: 221-66）。更且，如同基爾南（Victor Kiernan）所指證的，葛蘭西本人除了對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的情境投以相當的注意之外，更對義大利和印度做了廣泛的比較（Kiernan 1995: 171-90）。他把農業的南方和它周圍群島歸約成受工業的北方「所剝削的殖民地的地位」，並以此對義大利所做的分析——創造出列寧所描述的「內部殖民主義」的結構——很明顯地預示了後來依賴理論以相同的方式對全球做區分。葛蘭西也明確地闡述了三大洲馬克思主義裡關鍵問題的名詞；也就是，無產階級如何能和農民階級聯合行動。

對這個問題有一個答案是經由重新詮釋馬克思所稱的流氓無產階級（*lumpenproletariat*）或是後來的評論者所稱的「下層階級」（*underclass*）。「底層階級研究」歷史學家的中心概念，邊緣的「底層階級」，雖然公認是來自葛蘭西，事實上是經由他們精心再造的。在葛蘭西的階級分析裡，「底層階級」的意思是和「附屬的」（*subordinate*）以及「輔助工具的」（*instrumental*）互通的。它所意涵的「卑賤地位」，意指它特別適於描述被統治者以及不具有普遍「階級意識」的受剝削者的差異。在邏輯上它具備一種特殊的而不是普遍命題的意義，也悄悄地引進三大洲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的理論元素。事實上，對葛蘭西而言，底層階級即是介於中間的階級——是統治階級的代理人而不是群眾。在印度它的同義字會是 Babus（也就是講英文的地方仕紳，同時是殖民政權的主要中介者），而不是農民階級。在〈底層階級研究〉期刊的第一期，古哈延伸這個說明，把底層階級性（*subalternity*）描述為「南亞社會裡附屬地位的普遍性質，無論這種附屬地位是以階級、種姓、年齡、性別和職位或其他任何方式來表示」（Guha 1982b: 8）。後來，底層團體被界定為表示「整個印度人口和所有我們描述為『菁英』之間在人口學上的差異」（Guha 1982b: 8）。古哈把「民眾」（*People*）和「底層階級」當做同義字來使用，雖然在實際做法上「底層階級研究」裡文章的焦點本身，大部分是放在下層階級裡不同團體的社會等級的底部。儘管古哈做了上述的定義，史碧娃克認為有必要堅持將底層

階級性延伸到女人和性別的議題上；在一般的後殖民研究，底層階級已經成爲任何，特別是性別或種族爲原因，被邊緣化或是被剝奪權能的少數團體的同義詞。

把能動力和權能動力分析的計畫延伸來包含尋回底層階級意識，導致「底層階級研究」歷史學家逐漸增加和諸如巴巴以及史碧娃克等文化評論家的著作進行互動，查克拉巴帝和普拉卡希（Prakash）的著作就是明證。從一種三大洲的觀點，底層階級概念最大的作用，是提供一種比起階級更不會受到限制的社會類別和權力結構，同時能讓注意力放在那些抵抗和鬥爭形式一直受到民族主義者以及馬克思主義印度歷史學家忽視的團體。儘管在《現代君王》（*The Modern Prince*）裡，葛蘭西考慮詳細闡述先鋒政黨和人民自發性反抗的關聯，古哈使用底層階級這個概念重寫印度的爭自由運動，因而最早有關反抗殖民政權的歷史可能是出現在農民起義的運動裡，這早在如甘地這些仕紳領導人對他們強加領導權之前，就已經在進行（Gramsci 1957; Guha 1983）。從這個最先由沙卡提出具有濃厚毛澤東思想的觀點來看，傳統上印度獨立的歷史被當做是一個全民的民族國家的傳記來撰寫，事實上這部歷史以葛蘭西的語言來說，包含封建和資產階級仕紳的消極革命（passive revolution），這些人處心積慮要來吸收和控制人民最初用來反抗他們勢力的那些革命的和轉化的能量。印度的獨立結果並不是帶來社會的轉化，而是經由複製殖民國家繼續在爲資本主義服務的機制來重新獲取利益。針對「底層階級研究」的計畫引發了許多理論的和歷史的問題，特別是有關底層階級意識、能動性和霸權、性別的差異和地方性等議題。它對馬克思主義正統論述、民族主義的歷史學家和劍橋學派的批判，激發了在後殖民理論裡可說是非常重要的廣泛的理論討論和爭辯（這些討論和爭辯的批判整理，參考 Moore-Gilbert 1999）。在這裡需要強調的是，如同在這整本書裡所看到的，馬克思主義所起源的歷史架構是特別關注在 19 世紀工業化的英國裡明確區隔的階級政治，把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轉譯到具有不同社會構成和權力結構的三大洲社會，在這個過程中所產生的許多政治的和分析的問題，都匯聚在有關無產階級做爲唯一的革命階級的種種問題上。古哈的介入爲早已用在許多三大洲民族解放運動的政治操作，在理論和概念上提供重要的新闡釋。底層階級的概念賦予那些以前被描繪爲大地上受苦的人、受壓迫者和流離失所的人，新的具有爆發力的能動性。藉由底層階級，受壓迫者擔起政治能動性來成爲歷史的主體，而不是歷史的賤斥客體。

古哈和「底層階級」歷史學家們的著作，如 Shahid Amin（1995）、David Arnold（1997）、Partha Chatterjee（1986, 1993, 1997）、Dipesh Chakrabarty（1989）、David Hardiman（1981, 1993, 1995）、Gyan Pandey（1978）、Gyan Prakash（1990, 1995, 1999）、Sumit Sarkar（1973, 1989）、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1987, 1998, 1993, 1999）、Susie Tharu（1993）以及其他，因而可以被視爲在後期印度

迂迴離開馬克思主義正統論述的過程中，代表著個人不同的立場。但是不管他們的立場離開有多遠，他們都是以使用取自於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政治和知識詞彙開始的，並且在許多方面依然沒有離開它的架構，對它的壓力也很敏感。自從馬克思主義在南非做爲用來反對種族隔離唯一可靠的知識形式破滅之後，印度可說是少數幾個古典馬克思主義仍在今天存在的地方之一。所以，最強烈批評後殖民理論爲一種三大洲馬克思修正主義的，是來自於次大陸的政黨忠誠分子，這種現象並不是巧合。最具說服力的反對乃是，如古哈所指出，正因爲底層階級團體從沒有成功建立過一次民族解放運動，關注點就從革命轉向個人的、或純粹地方的反抗行動。但請不要忘記，「底層階級研究」的計畫也包含對失敗的分析。如同司達姆（Robert Stam）所說的：「與列寧的政治有關，主張由先鋒部隊掌管國家和經濟的理念，早已讓位給和葛蘭西有關的抵抗霸權」（Shobat and Stam 1994: 338）。在這個情境裡，不像現代的葛蘭西學派政治理論，例如拉克勞和慕芙的著作（1985）專注在發展新的組成反抗霸權政治聯盟的手段，後殖民理論有時候更關心於闡明對霸權做爲的抵抗。這個趨勢特別明顯地出現在某些對心理的抵抗、越界的行動、顛覆等等文學的形式進行的細緻分析裡。抵抗在殖民的情境裡有一種清楚的功能，然而在後殖民的情境裡激發抵抗的名義則沒有那麼清楚。這種結果有部分是推斷自「底層階級研究」計畫把聚焦放在在印度缺乏民族獨立運動，和 1857 年之後資產階級沒有意願抗暴之上。葛蘭西認爲甘地的心理策略可作爲「陣地戰」的準備行動，他自己對甘地的觀點，可以提供一個有用的政治架構，用來重新思考現今抵抗形式的目標：在用處上，抵抗只是更大的奪權抗爭中一個策略性的步驟。古哈將底層階級性放到傅柯式的宰制與從屬的辯證關係裡重新詮釋，在殖民的情境，霸權在這樣的關係裡永遠是不完整的，古哈從這裡又進一步強調顛覆政權，縱使他不斷專注於相對無法達成此目標的歷史案例。

雖然大多數左翼反殖民和返帝國運動在自由鬥爭期間，會以地方歷史、文化和經濟條件的需求來進行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轉化，這並沒有在印度發生。在政黨內部逐漸造成的意識形態上的分裂，並導致托洛斯基派和毛澤東派團體的出現，這所反映的是共產主義運動在國際上的分裂，而不是藉由印度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政治實踐的連結，所產生的一種轉化。在印度，這是獨立之後經由在學院層次所發展出來的理論工作，政治理論的重新界定才開始。這並沒有促成一股新的進入學院的行動，或是在政治和知識活動的範圍有新的擴展——最後還是帕爾米多·杜特從遙遠的英國劍橋一直投稿對印度提出政治和史學的分析。稱得上新的，乃是有意願運用甘地的思想和實際作爲中激進的面向，來建構更適合印度情境的分析形式，並且把這些分析形式和其他理論的發展，從葛蘭西到法農連結起來。換言之，「底層階級研究」歷史學家已準備好重新思考印度獨立運動歷史中的所有面向，並且去發展出

一種新的左派政治，可以關注到那些一直被嚴格的馬克思正統派排除在他們的政治考量之外的人。然而，即使在這裡，性別的問題和底層階級婦女的角色也受到忽視，直到史碧娃克在第四卷介入才有改變。遲至第九卷，才有維斯威思華倫（Kamala Visweswaran）注意到「雖然『底層階級研究』的實踐開啓了底層階級能動力的重要假設，但卻一直無法證明這種能動力如何能由性別來建立」（Visweswaran 1996: 85）。就19世紀後期以來印度婦女運動展現的力量而言，這個遺漏確實讓人訝異。

## 八、底層階級的底層階級：性別化新的歷史和政治

357 女性在反殖民運動中的角色，會立即在下一章檢視。在這之前，目前這個階段要強調的，乃是婦女抗爭所引發的那種歷史形式的轉化的走向，比起「此層階級研究」歷史學家他們所已經達到的，還要激進。女性主義者對「底層階級研究」歷史學家的批判引發了一個問題，殖民主義和對手反殖民主義的策略有多大程度它們本身是性別化的，以及它們受到另類的實踐和另一種性別化歷史挑戰和轉化的程度有多少。史碧娃克指出：有一個附屬於底層階級的底層階級。同時，女性主義運動者指證，藉由採取另類的做法和優先考量，女性所發展出的那種現實（de facto）理論的政治立場，非常不同於男性民族主義者在政治過程的前導位置所建構出來的那種帶有渴望的解放敘述。女性參與反殖民民族主義運動的歷史較傾向於資產階級或工人階級的社會化活動，關注的是公開的群眾遊行，或於生命的故事中、在主體形成的過程中在個人的層次運作，並且和地方的行動主義與充實權能相連結。同時，女性在反殖民時期所進行的運動，就像農民階級反對地主、或特定的領域，如醫療（Basu 1995; Vaughan 1991）。這些歷史並不是由廣泛的政治理想主義的美麗詞藻所建立的，而是由平凡的女性對抗特定的壓迫形式所發展出來的，其中大部分沒有受到她們自己社區之外的人幫助。因為如此，她們提供了可以被其他少數團體使用的模式，並且可以帶到不同的政治情境裡。

在解放運動中女性行動主義的歷史，其運作方式在許多方面可比擬於農民、部落族群、遊民的反抗歷史，以及其他低等種姓階級反抗（這些通常都由女性發起）的歷史：關注對地方壓迫形式的抵抗，這類運動只有在策略性的時刻她們有考慮加入時，才會加入更大的民族主義形式（Boahen 1985: 596, 638; Omvedt 1993; Roy 1992; Sen 1985）。這種地方的、小規模的形式必須要認識長時期本土抵抗的歷史，如同在菲律賓的女性抗爭或是游擊戰爭，這經常從殖民時期持續到獨立時期，這中間則時常受到干擾（Rafael 1998）。認識到小規模運動和反對行動的價值，讓她們開始重視反抗，而不是較大型的解放運動形式。這適合婦女運動，對她們而言，也

許沒有單一的革命時機，而是一系列顯然無止境的戰鬥要去進行。同時，在殖民時期，如同在阿爾及利亞或肯亞，這種對抗霸權的行動主義能夠和革命的暴力攜手進行，而發展出革命的意識，這種革命的意識在戰略的時機，又會促成一種革命的情境。

回去整理和理解這些挑戰傳統的、大規模的解放鬥爭，對史觀本身的形式也具有意義，開啓了以不同的方式來寫反殖民運動的、以及一般歷史的可能性。而且，它們促成對那些在主流反殖民政治之前或之外進行的種種反對運動有新的瞭解和認可。在近幾年來，歷史學家已經把他們的注意力轉向在被殖民的領土上，農民和一般人民日常生活中那些無法單純等同於較大規模反殖民運動的反抗形式，詹姆斯·司考特（James C. Scott）（1985）則把這類反抗形式稱為「弱勢者的武器」，這些全重渥爾夫（Eric Wolf）、古哈、和其他人（Cohen, Gutkind and Brazier 1979; Guha 1983; Hardiman 1993; Ranger 1985; Wolf 1971）。反殖民的抵抗經常採取較為非正統的形式，例如在法國占領的時期裡，阿爾及利亞被迫遷離森林的居民以令人害怕的持續性在森林放火。一份1865年的官方報告總結：「一個明顯的事實就是，森林縱火者的火炬就像刺客的伏擊或是反抗者的槍，都來自於同樣的原因，同時也有同樣要達成的目標：讓殖民地毀滅」（Crummey 1986: 239）。其他反抗的形式則是在抗議的工作歌曲裡，女性的巫靈的抗議歌，例如在馬拉威和尚比亞的Vimbuza（通常用來反對男人），歌曲—戲劇（通常由男性和女性工人各自發展）歌頌著另一種沒有紀錄的反抗歷史，而殖民地的工人則清楚述說著悲傷和反對公司以及公司制度的要求（Glassman 1995; Vail and White 1980: 339-71）。這些類的歌在南部非洲建立了一種廣泛流行的美學，這種美學的運作如同歷史，如同一幅「人民的經驗的『地圖』」，可以被世代所記憶和繼承，並且如同一種政治的干預，因為歌手經常在殖民地官員面前唱歌的時候，如維爾（Vail）和懷特（White）所說的那樣，這些歌「尖刻和精準地說出他們受剝削的情境」（Vail and White 1991: 41）。Allen和Barbara Isaacman指出，除了抗暴運動以及在獨立運動之前，反殖民的反抗分成地方抵抗的五個廣泛類別：日常的抵抗形式（包括文化上的習慣行爲、不法行爲和各式各樣違抗的行爲），透過冷漠和移民、逃亡、社會搶劫和農民反叛來抵抗。在所有這些案例裡，團體和個人積極地試圖去改變或逃避現存的殖民社會秩序，其中大部分並沒有大規模的、把反殖民主義當做一種民族運動來進行的政治規劃（Crummey 1986; Haynes and Prakash 1992; Isaacman and Isaacman 1976: 97-125; Wright 1993）。這類由一般群眾所進行的非革命性抵抗行動已經逐漸受到高度重視，因為評論者已經試圖把歷史從特別看重民族敘述，轉向去注意尋常老百姓所進行的各種地方性反抗行動。

這些不同種類的歷史，通常是透過取自於個別的反抗歷史案例作為範例來充分



記錄，在今天可能描述成底層階級，同時也因為這個原因，就歷史的寫作如同底層階級的能動性而言，印度的「底層階級研究」團體在許多方面是解放運動在知識和政治上的繼承人，縱使他們本身在思考女性行動主義的歷史，以及性別議題影響歷史本身的寫作的方式上，一直是有所侷限的。來自於一個沒有經歷社會革命而達成獨立的國家，「底層階級研究」歷史學家試圖改變那些尋常百姓抗爭的外貌，這些百姓通常被遺落在歷史敘述之外的，也通常會概括地被描繪成群眾，這些人的抵抗一直持續著，同時也尚未達到解放或社會平等。就此意義而言，底層階級歷史本身就是對抗男性主義歷史中被性別化的價值，例如公／私，國家／地方，城市／鄉村，家庭／世界，精神／物質。甘地已經指出，這種對立有多大程度也會在殖民主義和反殖民運動中引發性別角色的問題，並且要求重新瞭解在多大程度上，性別認同是殖民情境的基本產物，以及可以被用在反殖民主義的策略裏。這個接著進入到的問題是，性別議題是以何種方式被銘刻在帝國主義、種族主義和反殖民主義以及接續下去的歷史上（Grewal 1996; Radhakrishman 1992）。底層階級歷史的涵意一直是激進的和影響深遠的。女性和反殖民運動的歷史也是同樣重要。

359

## 25.

## 婦女、性別與反殖民主義

近些年來，有越來越多的著作探討女性在帝國主義時期所扮演的角色（Burton 1994; Callway 1987; Chaudhuri and Strobel 1992; Davin 1978; Jayawardena 1995; Midgley 1998; Trollope 1983; Ware 1996），其中有許多把焦點放在帝國西方女性的角色，而不是受帝國主義之苦的婦女活動。究其原因，有部分是因為都會觀點以及檔案資料的取得，但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西方婦女能夠比較直接參與帝國的計畫和機制。相較之下，被殖民的婦女不一定能夠直接加入反對帝國主義的活動：殖民時期的婦女通常將其它的事列為優先，例如教育或公民權。從帝國的觀點來看，檢視婦女的角色在某方面平衡了傳統的歷史再現——男性創造了帝國，而且各種形式的陽剛特質的運用和發揮都展現在帝國的場域中（Bleys 1996; Hoganson 1998; Rutherford 1997）。傳統的歷史再現以主要角色的角度出發，以此觀之，殖民主義的歷史可說是一齣非常男性的戲碼，而爭取自由的運動史也幾乎如此。正如殖民史是由男性、將軍、司令、郡長、總督和地方官員所主導，主導反殖民史和解放鬥爭史的是政治理論家、共產主義的行動派、民族主義組織的領導人，這些人大部分（但絕對不是完全是）男性。因此葛瑞飛（George C. Griffith）的《創造帝國的（男）人》（*Men Who Have Made the Empire*, 1897），或者史特勞斯（Strauss）的《創造新德意志帝國的（男）人》（*Men Who Have Made the New German Empire*, 1875），在一個世紀之後出現了丁克（Tinker）的《瓦解帝國的（男）人》（*Men Who Overturned Empires*, 1987）。

360

針對殖民和反殖民歷史上女性的缺席，有兩本標竿性的著作開啓了女性的回應：加亞瓦爾丹娜（Kumari Jayawardena）的《第三世界的女性主義與民族主義》（*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Third World*, 1997），對於19世紀末以來，亞洲和中東女性參與民族主義運動有通盤的描述；桑戈里（Kumkum Sangari）和瓦依德（Sudesh Vaid）的《重塑女性：殖民史文集》（*Recasting Women: Essays in Colonial History*, 1989）關切的是殖民國政治和解放運動中，女性主義和父權的辯證關係，並提出以下的問題：第一，殖民主義和反殖民鬥爭中的男性主義特質（masculinist nature）如何限制了女性的參與；第二，歷史陳述以及歷史檔案中女性缺席的現象，如何在後來的歷史學中被「再生產」（reproduced）。這類著作清楚闡述必須要生產新的女性歷史和理論，才能重新檢視婦女的地位，扣連女性所致力各種解放

361

政治的形式，並證明她們具有屬於自己的能動性。

在反殖民鬥爭中，女性有不同的一面，此乃由於性別差異而產生的不平等，而這也正是女性主義政治的根源。性別所造成的不平等包括：被殖民社會中女性通常扮演的附屬角色；無論是在自己國家或是在殖民國的都會，女性受教育的機會被限制；不懂英語或法語這類國際性的殖民帝國的語言，相對地，接觸出版著作或媒體的管道也有限；參與公共領域中的教育和政治機構受到限制；再加上殖民統治者——以及後來的歷史學家——的男性主義的態度。女性奮鬥的特質就是她們通常站在極端邊緣的位置，往往是在國家政治領域之外，這就意味她們的歷史不能夠以我們所習慣的反帝國主義角度來書寫或理解，勢必要用不同的記載方式。同樣地，婦女的運動不是爲了要發展某個主要的理論性文化，而是把焦點特別放在一些影響女性的實際社會和政治議題。這麼一來，她們的故事絕大部分就在地方性鬥爭中運作的特定歷史，以及某些行動派的個人歷史。她們之中鮮少有人可以接觸到國家政治和媒體或是在公領域有突出的表現，不像那些反殖民運動的男性領袖們，可以出版各式各樣的著作，可以詳述他們紮實的理論或見解。她們之中沒有一個人可以像甘地或恩克魯瑪，在女性主義反殖民中占據特殊的地位。即使像桑切思（Celia Sánchez）在「古巴革命」的組織工作中扮演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並且在後來的政治和社會規劃中和卡斯楚密切合作，但是她也無法像卡斯楚或切·格瓦拉一樣，留下有關女性主義或其他方面的公開論述（Randall 1992）。針對女性主義和反殖民民族主義或社會主義的關係，很少有通泛性的理論可供其他人在後來接續發展，進而有新的脈絡。後獨立時期之前顯然缺乏國際性的女性公眾人物，也沒有民族黨派的領導人或政治理論家，這意味著一直到近幾年，女性在解放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被忽視的。歷史性的鬥爭所造成的後果，及其對女性所帶來的爭議性影響，現在根據當代女性主義後殖民理論並加以轉變，因而理論性的觀點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藉此，我們可理解殖民主義對被殖民地的女性造成什麼效應，並且可以在對反殖民時期有性別化的分析。這方面的發展一直和歷史研究並行，後者已經爲新的歷史檔案奠定了基礎（Alexander and Mohanty 1997; Etienne and Leacock 1980; Franco 1989; Jayawardena 1986; Lowe 1991; McClintock 1995; Mohanty, Russo and Torries 1991; Omvedt 1993; Shepherd, Brereton and Bailey 1995; Spivak 1999; Strobel 1979; Tharu and Lalita 1993）。

### 362 一、反殖民運動中的女性角色

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儘管女性的個別公共形象較不易得見，但是無論是參與軍事活動或是非正統的抗爭形式，她們都扮演了重要的——在許多方面可說是複

雜的——角色。在印度，多位女性曾領導1857年的武裝叛變，其中最著名的有占西城（Jhansi）的白依（Rani Lakshmi Bai），也就是藍佳（Ramgarh）王妃，以及瑪哈（Begum Hazrat Mahal）。之後幾年陸續出現許多公眾的政治行動派和政治家，如1890年代的拉瑪拜（Pandita Ramabai）和岡古莉（Kadambini Ganguli），20世紀初期的革命行動派卡瑪，以及1920年代和1930年代「公民不服從」運動時的卡瑪拉微·恰托巴底亞耶（Kamaladevi Chattopadhyaya）以及舒齊（Lado Rani Zutshi）；在錫蘭有德蘭尼亞加拉（Ezlynn Deraniyagala），在印尼有卡爾蒂尼（Raden Adjeng Kartini）。在印度，女性不只參與甘地和「國大黨」的運動（奈都（Sarojini Naidu）在1925年成爲「印度國大黨」第一位女性黨主席），她們也籌組一些政治性組織，歸屬於「國大黨」或「民族義勇團」（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如在孟加拉有RSS（Rashtriya Stree Sangha）、DSS（Desh Sevika Sangha）、MRS（Mahila Rashtriya Sangha），在加爾各答有NSS（Nari Satyagraha Samiti），還有Rastra（Rashtriya Sevika）、Samithi（Sarkar 1995）。印度婦女在各種不同形式的「恐怖」暴力行動中也積極參與：例如卡盼娜·杜特（Kalpana Dutt）參與1930年的「吉達港軍械庫搶劫」；1931年，喬賀瑞（Suniti Choudhry）和高絲（Samiti Ghose）射殺庫米拉（Comilla）的行政長官。隔年，達思（Bina Das）在加爾各答大學企圖刺殺孟加拉總督，但沒有成功；教師瓦黛塔（Pritilata Waddedar）在1932年領頭突擊「帕哈塔力鐵路官員俱樂部」（Pahartali Railway Officers Club），但在行動中犧牲。在「殖民者滾離印度」運動中，許多婦女擔任地下工作，如阿如娜·阿里（Aruna Asaf Ali）、克里藍霓（Sucheta Kriplani）和鄂夏·梅賀塔（Usha Mehta）。1942年8月梅賀塔協助成立一個秘密的自由電台，儼然成爲「國大黨廣播電台」。一直到11月中才被關掉。在蘇巴西，強達拉·波士的「印度民兵」（Indian National Army）中，史娃米那坦中校（Lt-Colonel Lakshmi Swaminathan）被任命爲占西王妃軍團的司令；婦女分部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和緬甸開始設立（Bala and Sharma 1986; Forbes 1996: 121-56; Franda 1971: 17; Jayawardena 1986: 94-105; Kaur 1968）。而在其他地方，和阿爾及利亞的婦女在「民族解放陣線」中勇猛激進一樣，巴基斯坦婦女，如卡勒德（Leila Khaled）也加入最活躍的恐怖組織「巴解」（PLO）；晚近，在斯里蘭卡激進社會主義組織「塔米爾之虎游擊隊」（Tamil Tigers, LTTE）也很活躍耀眼，這是她們對抗政府（和印度）在1977年之後一連串的反塔米爾計畫和大屠殺行動的共同反應，雖然有些行動——例如鼓吹藉由自殺式的炸彈攻擊恢復個人的榮譽——是否代表女性的進步則有待商榷（Amrane 1994; Gadant 1995; Khaled 1973; Maunaguru 1995; Peteet 1991; Ponnambalam 1983; Uyangoda and Biyanwila 1997）。在對抗法國和美國的越戰中，女性在反殖民戰爭中扮演一個主要的角色。越南的共產主義行動派Nguyen Thi

363 Nghia、Nguyen Thi Minh Khai和Minih Khai被法軍逮捕，遭受刑求後處死。在馬來西亞、古巴、尼加拉瓜，以及許多拉丁美洲國家，女性也參戰（Jayawardena 1986: 208-9; Taylor 1999; Yuval-Davies 1997: 98）。在阿爾及利亞，婦女所參與的行動因電影「阿爾及爾之戰」而聞名。殖民當局一直把她們看成不具威脅性，認為她們默默地負擔家務，但她們通常能夠利用這樣的形象做掩護，執行一些男性無法達成的任務（Fanon 1980）。

在非洲，女性所參與的反殖民運動範圍廣泛，從領導軍事活動對抗歐洲殖民者——例如奈漢達（Mbuya Nehanda）領兵攻擊羅德士帶進邵納（Shona）的軍隊和軍備（她在1897年被捕後處死），或如達荷美的女戰士最後在1894年被法軍大肆屠殺——到1920年代西非（現代的奈及利亞）的農夫和市場女販激烈抵抗殖民國的稅制，到整個非洲以許多不同形式的正面行動而發動的經濟、文化抗爭，到參與20世紀南非各種合法或非法的公民權運動，甚至加入各地的武裝鬥爭，包括安哥拉、厄利垂亞、幾內亞比索、莫三比克、奈米比亞和辛巴威（Coquery-Vidrovitch 1997; Mba 1982; Ranger 1956; Schmidt 1992）。在西非，女性在地方性的黨派組織上，在競選活動和政治性活動都扮演核心的角色，同時也被選為代表（Mba 1982）。恩克魯瑪觀察道：

非洲女性已經在革命鬥爭中顯示出她們絕對的重要性。她們在自己國家的獨立運動中提供了主動積極的協助；某些時候，她們所勇敢的參與示威和其他政治行動對運動的成果具有決定性的影響。（Nkrumah 1957: 89）

科瓦梅·恩克魯瑪偏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思想，這一點的確足以教他對女性在解放鬥爭中所扮演的角色表示欽佩，但他也承認她們的參與確實有美中不足之處。他評論道，服膺甘地的婦女們主要是負責野外活動的組織工作，「以宣傳秘書的身分在無數的市鎮和村莊穿梭，大部分負責的是如何讓黨更緊密團結」。值得注意的是，恩克魯瑪認定女性從未在革命領導的階層中工作，也沒有成為留名的行動派，他認為女性只是在地方性的行動主義中扮演協助的角色。他所提過的所有英國和非洲女性中，只有提到一個人的姓名，那就是在昆拉西（Kumrasi）的一名女黨員，「她用的名字是阿曼·恩克魯瑪（Ama Nkrumah）〔就是「科瓦梅」（Kwame）的女性名「阿曼」〕」（Nkrumah 1957: 89-90）。

364 在某些殖民地，尤其是肯亞和南非，民族主義的抗爭無法以結合示威行動和爭取選區代表做為重心，女性在這種情況下所進行的反抗活動就特別引人注目。這是因為在非洲的社會結構中，婦女享有相當大的經濟和社會的自主性：婦女在許多領域中扮演了基本的角色，例如農耕、處理穀物甚至挑水、收取木材、割草餵養動物、甚至在貿易和市場經濟中。這一切顯示她們在許多領域中具有傳統的自主性，

她們是土地的守護者，是食物的製造者；更重要的是，從游擊戰的觀點來看，她們很有流動性（mobility），殖民當局無法將她們限制在家庭領域中。

這個結果就是女性可以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加入自由鬥爭的行列。例如在辛巴威，隨著戰爭的進行，越來越多的年輕男女離家加入游擊隊。雖然大部分的女性都報告說，總是會有些人不願意接受女性成為自由鬥爭的戰士，或者有些人會不出所料地利用她們，但是她們也肯定，大致而言，游擊隊中充滿了平等的氣氛：

對於我們的軍營的生活，我有話要說：男女之間沒有什麼差別待遇。如果有什麼事情要做，比方說男女都會被分派去取水或木材，儘管傳統上取木材和水是女人的工作。只有一點不同：男性在使用武器方面有比較好的訓練。他們的武器也比較多。但是女軍官和男軍官受到一樣的尊敬。（Weiss 1986:90）

對某些游擊隊來說，營區中2000名男性聽命於一個23歲的女性長官，這樣的景象還是蠻叫人震驚的；這和其他公領域生活所帶來的後果是一樣：女性首長感覺到必須要比男性表現得更好。許多辛巴威婦女在回顧的時候主張，除了自由戰士，在武裝鬥爭上女性比那些留在鎮上工作或尋求庇護的男性更政治化，也更投入。許多女性以行動證明這一點：鄉村婦女們為自由戰士提供食物和衣服——或者直接在她們家裡，或者把熱騰騰的食物送到戰士們在山區的藏身處。如果在嚴密警戒的情況下，她們把食物藏在貨車中，或是藏在她們的衣服底下，例如把乾肉圈在乳房下面。傳統婦女的流動性表示她們如果被政府兵質問時，往往可以找到正當的理由解釋她們為何在外面活動。她們提供食物、衣服，以及為游擊隊清洗等服務，這一切通常都在分部委員會的結構組織中，井然有致地進行，在公有的基礎上由一些人擔任監督者，負責督導執行。「辛巴威非洲人民聯盟」的成員庫馬洛（Khumalo）曾評論道：

如果沒有女性的參與，我們不可能贏得這場戰爭。她們在戰爭中做了很偉大的事。如果這些同志們沒得吃的話，他們不可能拿槍射敵。我們為他們煮飯，為他們洗衣服，甚至保護了他們，因為是我們提供了政府守衛軍的訊息。女性非常努力貢獻心力。（Staunton 1990: 71-2）

365 在自由戰士以及留在家中提供食物者兩類之間，青年男女還有一個模糊的類別：*mujiba*和*chimbwido*。男生擔任*mujiba*，就是童子軍、信差、把風者，以及充當「叛徒」——那些勾結（或被指控為勾結）政府軍——的線民。而女性所擔任的*chimbwido*就是供差遣的跑腿，或者更意有所指的意思就是「野地的水果」。在工作的執行上，她們負責照料自由戰士，讓他們吃飽穿暖，同時也陪他們睡覺；這些女

孩通常因此就懷孕了。有時候，是女孩子們志願當 *chimbwido*；但是有時候當戰士們留守村莊附近時，他們就挑些女孩當 *chimbwido*，然後要所有的年輕人陪她們睡，以此方式來確定所有的村民不會通知守衛軍他們在何處。當女孩子懷孕時，村民也不敢抱怨，即使從他們的觀點來看，最糟的就是他們連小孩的父親是什麼姓名都不知道，因為為了安全起見，自由戰士都是用假名字。

大多數非洲社會中的正式政治組織都是由男性所主導；殖民當局重新組織的時候常常忽略了女性的非正式權力結構，因此造成女性被剝奪原本所具有的自主性，被迫要接受新層面的父權統治 (Likimani 1985: 15)。但是，殖民當局在政治結構重整的時候所造成的這種「斷裂」(disruption)，也為女性帶來另一種政治空間。例如，肯亞的格理亞瑪族 (Giriama) 在 1913 年的抗爭活動由一位女性所發動，其中有部分的原因就是傳統政治系統的崩解。這名女性叫做麥卡塔利莉 (Mekatalili)，她是一位具有領袖魅力的女性，但是在此之前看不出她有什麼特出之處。麥卡塔利莉運用 19 世紀格理亞瑪族的傳統中，先知梅波后 (Mepoho) 預言格理亞瑪族在白人到來之後就會斷裂、毀滅，呼籲族人抵抗英國人想要正式統治的企圖，尤其是想藉著挑戰傳統長老的裁決權，並且利用徵稅取得勞工。殖民當局的地方首長親臨說明新法令之後，麥卡塔利莉召集族裡的婦女進行一項儀式，提醒眾人說格理亞瑪的傳統習俗被破壞，並且告訴她們被英國人帶去當工人的男人將不會回來。這個活動吸引附近地區許多女性和年輕男子，他們發下重誓，英國的行政法令遭到抵制——沒有搬運工、沒有酋長會議、沒有稅、沒有勞工。殖民當局的反應就是逮捕麥卡塔利莉，但是那時候格理亞瑪族人已經團結共同抗拒殖民者的要求，因此在麥卡塔利莉被一名警員強暴之後，族人在 1914 年 8 月發動一場公開的戰役 (Brantley 1981, 1986)。

長久以來，女性在肯亞獨立運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1895 年正式殖民統治之後，環繞在鬥爭的第一個主要議題是強迫勞力的使用。女性在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的抗爭中十分積極，尤其是對抗影響她們甚巨 (超過對男性的影響) 的房屋稅 (hut taxes)，以及其他殖民稅——為強迫肯亞人變成咖啡農場的薪資勞力而設計的稅制。從 1930 年代開始，沒有靠男性主導的貿易工會聯盟之類的組織，婦女在農場籌畫進行罷工和停工活動。女性主動加入由杜庫 (Harry Thuku) 在 1921 至 1922 年領導的「東非協會」(East African Association, EAA) 所進行的、以戰鬥反抗「工作登記」(kipande)。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尼安紀如 (Mary Muthoni Nyanjiru)，她和杜庫一起工作，在 1922 年領導群眾，抗議杜庫被捕入獄。「東非協會」發動罷工，抗議杜庫被逮捕；大約有 7,000~8,000 名群眾聚集在杜庫被監禁的耐若比 (Nairobi) 警局前，要求釋放杜庫。尼安紀如不滿男性不採取行動，帶領群眾衝進警局。當她衝到牢房要釋放杜庫的時候，尼安紀如和其他人 (人數在 20 到 55 人之間) 被射死。「東非協會」因此被禁，但是民眾由此學得戰鬥抗議行動的好處。另一個肯亞抗爭

行動的主要議題是土地的剝奪。1950 年代所謂的「茅茅」起義真正持續長期對抗白人拓居者掠奪土地及強制實施的稅制，鄉村婦女們被「移置」到「受控制的村莊」，為的就是要將她們和游擊隊隔離；有段時間甚至有高達 3 萬 5 千名婦女被拘禁：這個作法更激起她們的反抗 (Kanogo 1987; Presley 1992)。同樣地，基庫尤和其他婦女也在地方上對後來在辛巴威的戰事積極投入，成為基層組織的中堅。但是不像辛巴威的情形，「茅茅」的游擊隊禁止和村子面的女孩有性關係。在每個村子裡都設有一個「茅茅委員會」，其主要任務就是協調組織，將補給品運送到林區的軍營，包括食物、醫藥和彈藥。同時，她們每人要負責檢舉曾在戰後受訪的村婦一名，「以細密的監視體系來確保山裡戰士們的安全」(Likimani 1985; Maina 1987: 124)。以「茅茅」的信條起誓過後，女性才可被選來攜帶物資轉送到另一些婦女手中，然後再由她們轉送到前線。「我們運用聰明的辦法：kiondo (基庫尤傳統的籃子)，然後上面覆蓋麵粉。如果我們碰巧遇到士兵——「民兵」(homeguards)——我們就假裝是從玉米碾磨廠來的，民兵幾乎不會懷疑我們；你知道，他們又蠢又笨」(Maina 1987: 123)。女性同時也參與一些活動，帶來性別角色改變：特別是她們被賦權，可以為宣誓忠誠的儀式做見證；正如肯亞人熟知的，女性也可以加入「土地與自由之軍」的游擊隊中作戰。佳伽卡 (Elizabeth Gachika) 把自己形容成「自由戰士」；她在 1953 至 1955 年之間是奈安度讓 (Nyandura) 林區的游擊隊的一員。她說在游擊隊中，工作的分配沒有男女之別：「我們像男人一樣擔任所有的工作。舉槍射殺之類的是我們也做……我殺了許多 [歐洲人]……我和男人一樣突襲」(Presley 1992: 136)。有許多女性在全國性的軍隊中表現傑出，最有名的就是慕索尼特級上將 (Field-Marshal Mboni Muthoni)。肯亞當局對女性參與各層級的抗爭活動所發揮的力量感到震驚。被捕的婦女太多，以致於需要為她們建造新的特別監禁所；他們在監禁所中接受一套嚴厲的「洗腦」，也就是要說服她們宣布放棄「茅茅」。

在所有自由鬥爭中，在南非進行得最長久，到最晚才實現的鬥爭中，我們看到女性最積極主動的參與。在許多情況下，尤其是她們對「通行證法」的憎恨而加入抗爭時，她們站在最前面，反對採行隔離政策的政權。女性對「通行證法」的抗爭早在 1913 年就開始：該年 5 月 28 日在「橘自由邦」的布隆方丹 (Bloemfontein)，在一次群眾聚會後，由莫利薩波利夫人 (Mrs. Molisapoli) ——在英語系報紙《布隆方丹之友》(Bloemfontein Friend) 中被形容為「一個強健的、本土的潘克赫斯特夫人」(Mrs. Pankurst) 譯註<sup>1</sup>——領導 600 名婦女衝到鎮上要求見鎮長。第二天，她們面對的就是警察。《布隆方丹之友》報導：

譯註<sup>1</sup> Emmeline Pankhurst (1858-1928)：英國人，為英國女性的解放不遺餘力，曾成立「婦女社會政治聯盟」。1889 年成立「婦女選舉協會」，為婦女爭取投票權。曾多次被捕入獄，毫不畏縮。

大批黝黑的阿必格爾人 (Abigails) 圍在當地警察局前。她們撕毀通行證，把碎片丟在地上，她們用非常不敬不雅的語言對警察挑釁，告訴情報機關，她們不會攜帶通行證，她們寧願任受不可名狀的痛苦折磨與監禁。(Wells 1986: 253-8)

這個事件典型地呈現女性的行動主義所關切的是一些限制到她們生活的特定議題，同時這樣的行動主義也有一種換喻的功用，代替並表達對整個系統的普遍反抗，這樣以行動表達的抗爭也就成爲一種特殊的宣示。「通行證法」就像在殖民的羅德西亞要求挖等高溝一樣，象徵著殖民的壓迫：對抗它們就代表對抗整個系統。馬若瑞拉 (Anna Madzorera) 針對挖等高溝的命令評論道：「戰爭都是因此而起的」(Staunton 1990: 117)。女性所運用的方式——請願、街頭示威和唱歌，都有一種表示賦權的作用，並且代表團結奮鬥的經驗，另外還有因爲甘地在南非的活動而激發的消極抵抗，以及甘地本身所受到啓發的愛爾蘭爭取女性參政權，以及令人聯想到馬友 (Mayo) 聯盟在愛爾蘭土地之爭所採用的杯葛策略——和「非洲民族會議」的方式不相同，但毫不遜色 (Wells 1982, 1993)。到了1920年，「非洲民族會議」已經認清這一點，並開創婦女分部；到了1949年，「非洲民族會議婦女聯盟」成立，由姆瓦納 (Ida Mtwana) 負責，在聯合行動方面，以及對抗越來越廣泛而頑強的「通行證法」，採積極、戰鬥路線 (Coquery-Vidrovitch 1997)。南非的婦女運動從來就不只是「非洲民族會議」的一個次級的分部而已；它和1954年就已經成立的「南非婦女聯盟」——一個爲所有女性而成立的組織，其目標就是南非婦女的解放——密切合作。這兩個組織攜手合作，共同發動了一個大型的抗議活動，反對她們所痛恨的「通行證法」，該法到了1963年的實施對象涵蓋所有的南非女性。此次「通行證法」抗議行動提到全國性的層次——兩萬名婦女聚集在比陀勒利亞 (Pretoria) 的聯合大廈，她們的領導人送交一份請願書給 (沒有出現的) 史垂頓 (Strijdom) 首相，在外面的人就高唱：

史垂頓，你觸犯女性  
你打擊岩石  
你移除巨石  
你必死無疑

(Meli 1988: 133)

抗爭也透過城市和鄉鎮在分布各地的當地組織而發展；由於在德蘭士瓦 (Transvaal) 的吉斯拉 (Zeerust)、那塔爾、蓬多蘭 (Pondoland) 以及其他地方發生的起義事件，以及全國各地所進行的示威，許多婦女被捕入獄，或者被強制驅離到班圖斯坦

(Bantustans)，而許多婦女所隸屬的全國性組織——「婦女聯盟」被禁。婦女的抗爭的運作模式是由下而上，不是由上而下，因此吸引許多一般婦女，得到廣泛的支持，也因此讓女性抗爭所散發的力量和影響得以持續，甚至在「婦女聯盟」以及1960年「非洲民族會議」被禁之後仍然存在。到了1970年代，行動主義越來越傾向黑人貿易工會的行動派所採用的戰鬥形式，有色人種的女性和印度婦女團結合作，對抗雇主和男性在工廠的剝削。尤其是在紡織工業的「非洲成衣女工工會」在慕烏貝洛 (Lucy Mvebelo) 的激進、戰鬥的領導風格下，以及玻敦 (Harriet Bolton) 所領導的「那塔爾成衣及家具工會」，在1970和1980年代期間所進行的廣泛罷工和抗議行動最突出 (Berger 1992: 264-90)。現在，在民主化的南非政府中女性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現代南非政治文化強調性別相關的議題，在在都證明了在對抗種族隔離政策以及被制度化和正當化的剝削時，女性所占的地位。

對照她們對政治行動主義所做的奉獻，叫人更爲驚訝的是在反殖民運動的男性領袖和理論家眾多的著作中，少有對女性的貢獻表達謝意。有關性別議題的討論更是付之闕如。這個特點清楚地顯現在1974年「第六次泛非洲代表大會」的矛盾中。該此大會的會議召集通知詳述了「泛非洲代表大會」從1900年以來的歷史，提及泛非洲運動中的幾個偉大的名字——布萊頓、加維、恩克魯瑪、尼雷爾、塞傑爾、潘得墨、法農、詹姆士等。另外還肯定美國境內所發生的鬥爭有其深遠的意義，並引述了一些人名，包括梅爾肯·艾克斯、金恩 (Martin Luther King)、以萊嘉·穆罕默德、凱米歇爾、布朗 (H. Rap Brown)、傑克生 (George Jackson)、巴拉卡 (Imamu Barak)，最後還有安琪拉·戴維絲——第一個，也是唯一被提到的女性。泛非洲主義的歷史所呈現的就是偉大男性的歷史，他們之中有許多人是漂泊離散的一群，或者被放逐者。被放逐的男性和留在家鄉的女性等到「泛非洲代表大會」最後在非洲舉行時，才有了機會共聚一堂。一直到1974年「第六次泛非洲代表大會」，女性議題才特別被提出，大會被要求考量女性的角色和需要。一位來自圭亞那的加勒比海拉丁美洲代表在以〈女性對泛非洲世界的貢獻〉爲題的演說中，提出有關女性的議題。和1920年「巴庫會議」土耳其女性主義者所做的要求，或者「共產國際」的任何一次要求比起來，這個演說幾乎沒有什麼激進的要求。演說的開頭承認在傳統非洲社會中，女性比較平等地被視爲 *mntu* (具有人性的人類)，她認爲非洲女性在殖民主義之下被剝奪了她們原有的經濟和農業地位，因爲歐洲對男女角色原先就有設定。而另一方面，在反殖民的民族主義中，典型的觀念就是以傳統的角度視女性爲本土文化和文化實踐的核心，也就是「民族之母和鑄模者」。同時，圭亞那女性代表主張要承認非洲婦女在自由鬥爭中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她們特別提到幾內亞比索的馬巴麗雅 (Camara M'Baliala) 和和卡門·佩蕾拉 (Carmen Pereira)，這兩位都是在行動中身亡。代表們一方面接受民族主義者的論

點，認為「黑人婦女對泛非洲世界的貢獻將會和以往一樣，主要是在家庭的領域，並影響我們民族的道德成長」，但是他們也同時鼓吹改變一些假設的觀念、態度和法令，提議不應該將女性的貢獻限制在這些範圍（Sixth Pan African Congress 1976: 190-7）。結論中的「黑人婦女決議案」中擴大主張：「歷史上，黑人婦女一直承受三種壓迫：種族、階級和性別」，因而決議：

#### 「第六次泛非洲代表大會」

1. 決議對黑人婦女要求平等的政治鬥爭全力支持。
2. 特別要呼籲各國家和組織參加此次大會，共同對此問題提出徹底而深遠的解決之道。（ibid.: 197）

此決議案溫和而且不夠明確，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決議支持黑人婦女的政治鬥爭，但是女性的鬥爭仍舊和大會主要的活動與政治目標分開，其本質不屬於這些活動和目標。圭亞那代表對此議題的介入凸顯女性和反殖民運動之間，兩者關係的關鍵所在：女性為反殖民運動而戰，為此犧牲，但是在反殖民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中，往往得不到進一步的正面肯定，因此必須再肯定她們為平等而奮鬥，而且即使在獨立之後，仍舊還要堅持奮鬥。民族解放運動漸漸成為婦女抗爭，以及她們的行動主義和鬥爭的場域。這其中的問題一直是，婦女的鬥爭和反殖民主義能夠相輔相成到什麼地步？兩者在合作的張力之下，能夠維持多久？

## 二、女性主義與自由鬥爭意識形態之關係

做為一個政治活動，女性主義的國際性特色代表有些女性主張女性無國界，以此回應父權的社會結構，因為國家本身就是父權體系。因為共產主義的關係，女性主義是政治論述中最有國際主義觀點者之一。但是和共產主義不同的是，女性主義不是原本就是反帝國主義的。女性加入反殖民民族解放運動，因而引發許多理論上和政治上的議題，最先的問題就是，女性運動和解放所要求的國家民族之間的關係到底為何。兩者之間在本質上看不出來有必定的關聯，即使從歷史上來看，兩者在實踐上通常有所結合。英文中第一次記載使用「女性主義者」和「女性主義」分別是在1894年和1895年，剛好是要求殖民獨立的政治活動開始出現的時候。女性可以是民族主義者兼女性主義者；她們也可能是民族主義者，但不是女性主義者，反之亦然。女性的地位既是殖民的從屬，屈從於性別的區分。女性對抗父權體系，但可能對父權壓迫者之間的民族或族群差異比較不關心，或者就像許多改信基督教的人，她們可能在基督教思想中找到一些為爭自由而奮力掙脫地方性社會壓迫的各種形式。例如印度的薩提雅娜翰（Krupabai Satthianadhan），她的雙親是婆羅門階

級，19世紀中期改信基督教。薩提雅娜翰在基督教中找到她對印度上層階級的「安排性婚姻」（arranged marriage）的批評基礎；她的批評焦點特別鎖定女性在這種婚姻中的地位，也包括她們有限的教育管道。但是強烈的民族感讓她從未認同過英屬印度殖民政府的立場。因此，比較典型的作法就是攻擊這兩者：在1887年，拉瑪拜就以批評印度父權的意識形態聞名，她嚴詞指責神父和父權至上的印度人（「整個國家，每一年就有成千上萬的年輕寡婦和無辜的幼童正忍受著無法名狀的痛苦，無助地走向死亡。但是沒有一個哲學家或聖人勇敢地站出來捍衛他們的宗旨，幫助這些人」），同時也攻詰殖民政府沒有保衛印度婦女，她說：

期待英國政府為印度女兒帶來正義根本就是自欺欺人，政府不會對女性友好，事實證明，它對待印度女性的態度和本地社會和宗教比起來，是更差勁的暴君。（Kumar 1994: 102）

但是，像有些在殖民的阿爾及利亞的婦女曾經支持，或者願意支持殖民勢力，因為殖民當局提供了達到平等目標的方式——法國人很快地利用這一點直接吸引阿爾及利亞婦女（但是仍舊有許多阿爾及利亞婦女積極參與武裝鬥爭）（Gordon 1968）。女性主義因此和父權的地方與殖民形式產生辯證性的關係。在19世紀，殖民地的對抗父權制度，結合對抗帝國壓迫形式的鬥爭：兩者的配合不是毫無根由地任意結合，而是因為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本身就是非常的父權心態。而另一方面，婦女持續對抗地方上各種形式的父權壓迫，策略性地利用殖民改革的規劃，要落實它文明教化任務的主張。因此，女性複雜地被放在雙重的位置。為了國家，女性和男性一起參與解放的民族鬥爭，但是她們也同時為她們的性別解放而奮鬥，爭取她們的權力、平等、現身公共地區與公開行動的管道，甚至要有教育的機會。這些訴求和解放運動的訴求（解放運動絕大部分是以社會主義為基礎）不謀而合，因此，兩者的合作有相輔相成的作用。但是，在一些解放運動的政治規劃沒有那麼徹底的走社會主義路線的國家，例如印度，兩者之間的關係就比較有衝突。獨立之後，殖民的勢力消除了，但這絕對不表示新的政府將婦女的解放當成它政治規劃中的主要部分。

371

許多在反殖民時期的婦女應該體認到，她們和男性所賭注的都是脫離殖民主義的政治。她們必須瞭解，獨立是政治上的第一優先，國家的自由必須先於一切。在這樣的結構下，其它的事項就延緩下來，獨立之後的發展通常讓女性覺得這是一種對她們的背叛，雖然有人會說，後殖民政府無法達成自由的許諾是更大的挫敗，而背叛本身就是這個失敗中的一部分。

在德黑蘭最後一次的二月起義，婦女積極參與，或者負責後援工作：幫助傷兵、發送食物、在街頭設置路障、準備汽油燃燒彈，或者就真的拿起槍

進攻警察局和其他戰略點……無論如何，事件之後，很快地就明顯感受到，女性不可能透過新政權得到進一步的解放。相反地，前一個政權所認可的那些已嫌不足的權力和讓步，可能還會被翻盤。革命之後迅速出現的女性運動就是回應新政權對女性的特殊問題所採取的負面態度。（Davies 1983: 144）

這是三大洲自由鬥爭後司空見慣的故事。現在，在獨立的目標達成之後，民族解放運動和婦女運動的關係，似乎常常會從互相支持突然變成敵對。雖然女性在獨立運動時都十分積極活躍，獨立之後，她們的地位會因為解放運動不同的意識形態而有差別。大略而言，反殖民主義依據三個可能的模式：社會主義派、改革派、民族主義派。女性主義有它自己的政治認同，因此和這三個模式都不同。反殖民主義的社會主義目標和自我現代化的形式在許多方面都和女性運動的政治目標幾乎完全相符；主要的差異就是優先順序的問題，以及持續存在但仍隱而未顯的父權形式。但是，像是在伊朗等地方，反殖民主義結合當地文化形式或宗教的復興主義，宣稱女性就是「民族之母和鑄模者」，在此情況下，事情就更棘手，兩者關係更複雜、更是彼此較勁。有時候，婦女解放在轉向以另類形式對抗西方的時候，婦女規劃的社會改革方向，和解放運動的方向或者政府的方向，都已經不再相合了。

反殖民主義的三種形式：透過反帝國社會主義的對抗，殖民現代性，或者意識形態上回歸本土形式的民族主義，這三種路線很少完全截然劃分清楚，它們之間有許多聯盟和合併。例如，殖民的現代性有一種形式就是結合傳統文化和價值的復興，透過閱讀古代伊斯蘭或梵文肯定古文明事實上具有許多特色：一神論（印度教）、理性而科學（根據阿富汗尼以及後來許多人的觀點，伊斯蘭文明理性而科學）、民主、母系社會、社會主義（桑戈爾、塞傑爾、尼雷爾等都主張傳統的非洲就已經是社會主義；馬力亞特吉也肯定印加文明也是社會主義）。同樣地，現代性和社會主義的擘畫有許多結合和連續性，藉著這樣的聯合，社會主義以改革和自我現代化順勢將被殖民者對抗西方移接到它的規劃中：社會主義提供了一種對殖民者批判的現代性形式。雖然有這些結合，廣義來看，這三種路線闡述了政治的可能性，這些可能性在後殖民時期仍舊沒有實質性的改變。

### 三、社會主義

在西方六〇年代女性解放運動的發展，雖然在其名稱上自我意識地指涉民族的解放運動，意味著她們的路線即使相關卻是各自分離。做為一種解放運動的女性主義和民族解放的關係，在許多方面所引發的問題，和它們兩者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

所引發的問題一樣，其中個別的政治計畫在某些方面重疊，但在其他方面卻暗中互有衝突。民族主義者對獨立和民主國家的要求，一般也會擴展到對女性在法律和政治方面具有平等權利的要求。資產階級女性主義者會停止在這個結果上，對政治的改變感到滿意，但是這種政治改變大多只影響到菁英分子，並且不會損及到她們所屬階級的特權。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把平等的政治權利看做只是為所有女性達到更大規模的社會重建的第一個階段，這項社會重建將挑戰並轉化地方的、工業的、社會的和家庭的常規，因為女性在其中仍處於從屬地位。雖然民族主義和女性主義不具有內在的關聯，縱使這兩者在民族解放運動期間經常結盟，相反地，馬克思主義則有如第11章所指出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一直全力支持和貫徹女性的權利，這種權利一直被認為是邁向平等不可或缺的部分。共產主義和女性主義之間的關係，雖然沒有和民族主義的關係裡的難題，卻一直帶有政治和理論的困難性，必須要把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女性主義區別開來，後者所反對的是對女性不公正的事務，而不是女性之間的不公正，或是其他的壓迫形式。由於強調共產主義必然要完全實現女性的解放，共產主義在邏輯上成為更大的目標。這逐漸被看成是難題，特別是在事實上，共產主義雖然一直主張平等，實際上共產主義的政黨在決策的優先順序上並沒有充分反映出這種理念。同時，女性主義的目標實際上也需要某種社會主義，如果要終止女性之間的不公正，例如在階級和國際勞力分工的層面上的不公。

一直到1960年代女性運動崛起，令人震驚的是，只有來自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陣營的男性才認為，女性平等的問題是內在於其他政治解放的形式裏。同樣地，也只有共產黨的革命，例如在中國或在古巴，會在獨立之後的國家綱領中加入法律和社會的平等。儘管如此，許多不平等的領域都被忽視了。女性主義的主要目標因而集中在挑戰持續不斷的壓迫性社會日常行為和態度。採取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形式的反帝國主義，對一般意義下的女性主義是最沒有問題的，它們做為政治哲學，除了種族平等還包含性別平等，這些是內在於它們對一個公正社會的看法裡。無論是地方上處於對抗一個特定殖民政權的位置，或是全球性地對抗帝國主義體制，社會主義形式的解放抗爭認為它們的目標基本是和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抗爭目標相通。女性和男性一起從事抗爭，而女性的運動成為抗爭不可或缺的部分。

反殖民統治的抗爭在它們自己本身進行解放。它們有助於改變女性的社會角色，並且造成對公共事務更高程度的參與。所以，如同「莫比克民族解放陣線」的領導蒙德蘭所寫的，招募女性進入軍隊如何促成社會變遷：

接受女性當兵，[軍隊]已經使她們的社會地位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女性現在非常積極地在組織人民的國民自衛隊，同時也有許多游擊隊裡有女

性。經由軍隊，女性開始在許多領域負起責任；她們也學習到要站起來，並且在公開的聚會上講話，在政治裡扮演積極的角色。事實上她們在動員上從事了許多重要的工作。當一個女性小隊第一次到一個尚未加入莫三比克民族解放組織的村莊，這些武裝女性站起來並在一大群聽眾面前講話的景象，引起極大的驚奇。（Mondlane 1969: 47-8）

蒙德蘭記錄道，對於那些看到女游擊隊員和敵人作戰而驚訝不已的男性，其結果就是刺激他們全體志願參軍，然而他對於在這種情境中真正鼓勵他們的原因，仍然十分謹慎。並不是只藉由這些角色模範，軍隊就能為男性和女性帶來重大的社會變遷：莫三比克民族解放組織——就像許多其它的解放運動——既是軍事的也是教育的機構，特別是教導新進成員如何讀和寫。例如，孟東多（Tainie Mundondo）在莫三比克太特（Tete）北方「莫三比克民族解放陣線」的陣營裡也接受軍事訓練的同時，也在當小學老師；她接著被送到丹麥接受更高等的教育（Weiss 1986: 89）。儘管「莫三比克民族解放陣線運動」具有人人平等的架構，一直存在著的女性議題是，她們是否能以她們的要求參與民族的解放運動，或是她們是否發現自己因為女人的身分而受到剝削，或是受到同等的對待。如同在蘇聯或中國，社會主義也許會把平等的形式納入制度裡，但這並無法在一夕之間轉化預設父權的意識形態的男性傳統。然而，原則上社會主義沒有理由不應該繼續朝向一個更具有深遠意義的新目標來努力。

因此在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反殖民主義裡，和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沒有實質的意識形態衝突。彼此長期的差異之處在於，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目標一直想要對社會主義思想和實踐造成轉化性的結果，例如，就像女性在解放軍隊裡作戰的同時，也在這些軍隊內部為地位的平等而戰（Maunaguru 1995）。對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者而言，獨立所代表的是朝向一個仍然必須去努力的更大目標的手段。第二種反殖民主義的形式也就是殖民地的現代性形式，認為解放是經由自我的現代化和改革來達成，對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女性主義兩者相對而言是較沒有問題的，只要兩者的目標是一致的：實現女性主義的目標是一項現代性明確的特徵。

#### 四、現代性

在她那本開創性的書《第三世界的女性主義和民族主義》，加亞瓦爾丹娜以令人印象深刻的細節證明，從1880年代開始許多三大洲女性主義者如何在民間和軍事的情境裡，成為積極參與在反帝國主義抗爭中的反帝國主義者。她認為，亞洲女性的解放與反帝國主義的民族抗爭有三項共通的面向：

首先，為了現代化她們的社會而進行內部改革的慾望，大家感覺到，如果想要成功地消滅帝國主義，這是有必要的；第二，瓦解那些前資本主義的結構，特別是統治的政權和宗教的正統教派，這些都阻礙了必要的內在改革；第三，所堅持的民族認同，是以能夠被動員來反帝國主義的人民為基礎。（Jayawardena 1986: 3）

在這三個共通的女性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目標當中，明顯地，前兩項並沒有直接含括嚴格意義下的反帝國主義的目標，而是關心改革的議題。雖然從後殖民的觀點來看，這種透過自我西化所進行的間接抵抗的方法有違運動的原意，經由改革和自我現代化來來打擊西方的戰略，乃是早期反殖民抗爭的主要模式，特別是在面對西方軍事優勢的情況下。許多被殖民社會裡有抱負的領袖人物到西方遊歷之後帶回西方的觀念，以及相信他們的國家要能達成自決必須先現代化的信念。這種信念典型地會伴隨著對本土文化的許多面向進行自我批評，這些本土文化被視為是必須被剷除的落後封建制度的遺跡。反殖民主義除了是一種政治的工作之外，也是一種經濟的、科技的和 cultural 的工作。除了印度之外，這種思想方式的最好例子就是1919年發生在中國的五四運動：它對現代性的渴望活生生地表現在它要把中國書寫文字羅馬拼音化的計畫上（Dirlik 1989, 1991）。在19世紀成功的改革運動中最為突出的例子是埃及和日本，埃及是在穆罕默德·阿里的領導下從1805年開始，日本則在1868年明治維新之後，在一個極為短暫的時間內以非凡的程度達成自我現代化的偉業，它們的成就讓印度、愛爾蘭和其他急切想要趕上的民族欣羨不已。

加亞瓦爾丹娜對於女性主義理念在印度改革主義運動裡的發展的說明，指出了女性主義對特定印度政治論述的積極貢獻所維持的時間；這些改革運動就像在伊斯蘭社會裡的改革運動一樣，一開始通常受到男性的支持，著名的有拉莫漢·洛伊（Raja Rammohan Roy）和維耶撒佳（Isvarachandra Vidysagar）（Jayawardena 1986; Mernissi 1985）。自我現代化成為改革運動特徵的對現代性的渴望，以及把成為「現代」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這些理念發展的歷史自從1820年代梵社（Brahmo Samaj）<sup>譯註2</sup>在孟加拉創立以來，就成為印度社會的一個議題且它本質上堅信，歐洲強權之所以成功必然和現代性的某些方面緊密相關——科技、理性、女性的地位、平等、教育、世俗主義等等（Kpof 1979; Nanda 1976）。相對於亞洲資本主義的各種意識形態，意圖沿著並且獨立於西方文化的規範去發展現代資本主義的科技，那些在改革運動裡的人下定決心嘗試拋開和資本主義的關係來現代化他們自己的文化，以排除掉社會中那些他們認為不可彌補的腐敗狀態。這包括使用西方的服

<sup>譯註2</sup> 印度教內部主張一神論的改革派組織，1828年由洛伊（Ram Mohun Roy）在加爾各答創建，加爾各答是西孟加拉邦的首府。



裝和飲食；對傳統制度的敵意，特別是封建統治者，宗教的工作人員；民間迷信；暴虐的文化慣習，如 *sati*<sup>譯註3</sup>、殺害女嬰、寺廟娼妓、一夫多妻、渴望受教育和在學校或大學進行英語教學。這項早期的民族主義認為經由現代化的進步是向前進的方式，一般而言和女性解放的目標相一致，因為女性解放被認為是西方成功必要的特質之一。所以任何一種女性主義者成為民族主義者並不會有衝突，反之亦然。

然而，女性的權利和現代化的結合會產生一個實質的問題，也就是改革通常不會深入到上層階級，這些人越來越會界定自己是「現代人」，對下層階級的女性而言，情況則和以前沒有什麼不同（Chatterjee 1993: 135-55）。同時，社會改革運動從沒有直言是反殖民的。雖然在印度，例如女性的社會改革和復興運動，傳統上是在自由抗爭的脈絡中討論，兩者間的連結關係是微不足道的（Kaur 1968）。像拉瑪拜這樣的人物，主要是支持女性的權利和教育；她的基督教信仰使她讓許多人（特別是男性）認為她是同情殖民政權的（Chakravarti 1998; Forbes 1996; Ramabai Sarasvati 2000; Viswarathan 1998）。事實上，如同歐翰儂（Rosalind O'Hanlon）在她為香德（Tarabai Shinde）的《男性與女性的比較》（*A Comparison Between Women and Men*, 1882）所寫的導言中指出，對19世紀某些印度女性主義者而言，殖民統治被視為「供給女性許多好處的來源」，即使香德同時也會責罵她那個時代的人拋棄印度傳統和模仿英國人的行為（O'Hanlon 1994: 47）。

376 在印度，改革運動一直受到強硬派民族主義者的反對，直到甘地才促成這種轉變，使得肯定印度本土文化成為意識形態爭論中的主導形式，明白地推廣和肯定印度人民的價值和他們的文化，同時排斥現代性這個概念。然而，甘地也宣揚他自己的改革理念，例如種姓制度，並且一直在政治上由尼赫魯來加以折衷，尼赫魯是世俗的、現代的、社會主義的、和西方取向的。甘地本人詳細敘述早年如何受到「改革的『熱枕』」的影響，並且開始吃肉和接受其他西方的慣習，例如抽煙、跳舞、以及英國紳士的穿著（Gandhi 1982: 33-63）。在隨後的歲月裡，他則藉由民族主義的自治運動來彰顯他自己，這像是逆向的步驟，取行地方的慣習，肯定民間的印度文化形式，並且公開反對某些改革主義者和現代化的趨勢。這種脫離改革主義立場的改變，讓婦女運動和反殖民運動的結盟產生了某些問題。甘地的理念和行為無論怎麼想都無法稱做女性主義者。雖然如此，就如前面已經指出過的，他認同許多女性主義的目標，並且承認她們的政治策略的潛在力量。更為不尋常的是，從一種當代反殖民的觀點來看，許多女性參與了他的運動：從他早年在南非開始，他鼓勵女性全心參與不合作運動，同時也逐漸認為她們最適合使用不合作運動的技巧。他也嘗試從完全是由都市菁英女性參與的情形，走向支持由農村女性和工人的行動主

譯註3 又稱 *suttee*，即寡婦自焚，印度舊俗要求妻子在丈夫死亡火化時要陪著跳入火中，或是在丈夫火化後不久自焚。

義。一般都承認，公民不合作運動在印度女性解放的道路上，標示著重要的一步。女性在組織層次的參與，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928年的巴多利（Bardoli）運動，在該次運動裡，巴克提巴（Bhaktiba）、夏大·賀塔（Sharda Mehta）和普提特（Mithiben Petit）在許多女性的支持下，扮演非常突出的角色，因此女性參與的人數高過男性。甘地自己的隨從也有高比例的女性支持者，其中最有名的是米拉班（Miraben）、尼維德修女和奈都夫人——後者是這三位中唯一的印度女性。然而，奈都和許多女性民族主義者極力批評甘地不允許任何女性參與丹地大遊行的決定。甘地堅定地拒絕改變他的心意，這和他後來宣稱「我關於非暴力的實驗如果能得到女性的支持，就有可能立即成功」，顯得格格不入（Gandhi 1993: 387）。女性主義者也對他關於性和女性角色的觀念，給予非常重大的批判，他的觀念在許多方面體現出傳統印度和清教徒式維多利亞時代有關女性和女性特質的觀念。他以和年輕的女性工作夥伴以及親戚一起睡覺來考驗他的純潔的作法，也引發直接的和持續不斷的爭議（Bakshi 1987; Jayawardena 1986; Kaur 1968; Kishwar 1986; Mehta 1990; Nanda 1976; Parekh 1997; Patel 1988; Sarkar 1989）。

就印度的獨立運動而言，他所開啓的文化復興是高度有影響力的，但有關女性的地位方面就有許多的問題，他往往以傳統的角色來表現女性的地位，即使在他使用「陰柔化」的抗爭模式時也是如此。改革運動主要是經由社會主義來繼續進行，社會主義主要是由尼赫魯代表，他在女性議題上較為進步（Jayawardena 1986: 95-9）。印度獨立運動的高明之處，在於「國大黨」藉由尼赫魯和甘地的結盟，把現代性和文化復興這兩股勢力結合在一起。然而，這個雜揉政治的犧牲品乃是女性的議題，這在19世紀有關印度改革運動的辯論上仍占據著非常重要的位置，卻於20世紀初期在公共辯論中大幅度消失了。恰特吉認為，其原因在於民族主義的政治與印度女性主義的政治之間的關係，在這點上變得難以解決；女性問題因此是以一種可以讓這兩者並存的方式來解決：

家是表達民族文化的精神品質的主要場所，而女性必須負起保護和滋養這個品質的主要責任。無論女性外在生活條件有何改變，她們一定不能失去她們固有的精神（也就是陰柔的）德行；換言之，她們一定不能在本質上被西化……有別於男性，在民族的現代世界裡，在女性西化的程度和態度上，必定要有明顯的差異（*difference*）。（Chatterjee 1993: 126）

377 這種意識形態在印度以外的地方也同樣由民族主義者廣泛地發展開來，而在這種意識形態裡，女性和現代性開始彼此分離，從此，這兩者的合一就成了對民族主義路線的背叛。相反地，如恰特吉所觀察的，有關於印度女性的社會地位，「民族解放的故事必然是一段背叛的故事」（*ibid.*: 154）。1929年的「兒童婚姻限制法」（Child

Marriage Restraint Act) 提供了一個民族主義者和女性主義者分裂的好例證，前者有許多反對這個法案，而後者則如辛赫所指出：以「『印度的』現代性」的名義來支持這個法案 (Sinha 1999: 207)。在後殖民時期，許多關於女性的問題可以說起源於這個方便但代價很高的解決辦法。就在民族主義開始以文化復興的概念表述，而不是以改革來表達，女性主義者開始把現代性的元素接收為她們所有，並用來做為反對民族主義者的論調 (Barlow 1997)。並非只是在極為保守的國家裡女性的目標才需要在獨立時重新主張，同時也是一個新的解放鬥爭的開始。

378 在後殖民理論裡一個顯著的新的鬥爭，就是三大洲婦女對於當代西方資產階級女性主義的批判，認為這個理論是歐洲中心主義的。女性主義和(後)殖民的現代性之間結盟的瓦解，是強大的政治質問的特徵，這些政治質問則是後殖民思想的特色。藉由非裔美籍女性類似的批判，其中以貝爾·胡克斯 (bell hooks) 所做的批判最為出色，默罕特 (Mohanty)、史碧娃克和其他人的著作質問了一些預設，這些預設認為對於西方女性也許是進步的自由主義立場，對於其他地方的女性也必然是最好的 (hooks 1991; Mohanty 1984; Mohanty, Russo and Torres 1991; Spivak 1987)。認為在西方之外的女性需要由慈愛的西方女性主義者來拯救，這個觀念是女性主義的帝國意識形態的核心 (Midgley 1998)。後殖民女性主義的挑戰也同時在證明，這類觀點有多大程度是受文化的影響。衣著提供一個好的例子：由穆斯林展示出來頑固地堅持用衣服把全身包住，在西方這被視為是一種他們所承襲的落後和壓抑的標誌。戴面紗的慣習更是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如葉根諾古魯 (Yegenoglu) 在一篇出於同情理解的分析裡所指出的，戴面紗／不戴面紗這種二分法本身就是由東方主義的思想所建構出來的，這和穆斯林女性的文化經驗或政治並沒有必然的關係。如法農所指出的，在阿爾及利亞革命裡，面紗並不是頑強固定在過去的一種一成不變的形式，或是如歐洲人經常假設的，像一種原始的文化遺跡般存留下來，而是變動的、對外在環境會做出反應的，並且在解放抗爭中起了作用 (Fanon 1980: 13-45)。女性會策略性地運用面紗，在西方和穆斯林的衣著之間來回轉換，以便規避殖民的控制 (同樣地，在阿爾及爾戰爭期間的「民族解放陣線」指揮官亞瑟夫 (Saadi Yacef)，就經常地打扮得像一個穆斯林婦女，為了能自由地在城市各處活動)。然而，像西方的女性主義者，法農仍然帶有和法國殖民政府相同的假設，把不戴面紗等同於一種進步的現代性。許多當代西方的或三大洲的女性主義者，仍然會同意這種立場。相反地，葉根諾古魯認為，面紗是一種衣著形式「扣連著穆斯林女性的認同。只有在我們瞭解到女性戴面紗在穆斯林文化裡是一種獨特的文化經驗，我們才能真正學習到女性戴或不戴面紗是什麼意思，而不是僅僅重新安排自由主義的場景，以普世解放的名義重複著常識的以及陳腔濫調的行為準則 (Yegenoglu 1998: 119)。也許可以加上，即使在這裡，戴面紗是以一種併合的現象

來呈現。戴面紗事實上含括著不同文化中許多各種非常不同的慣習。有些也許是暴虐的；有些則不是。

## 五、文化民族主義

女性運動和反殖民主義的關係豐富複雜，特別是後者把自己呈現出一種民族主義的文化或宗教復興的形式時候。女性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關係一直就像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關係那樣，是很含混的，特別在創立殖民地民族主義中觸及到父權體制對於性別的看法的重要性時，更是如此。歐洲女性主義者可能會追隨潘赫絲特把女性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擺在一起，或是追隨吳爾夫 (Virginia Woolf) 把女性主義等同和平主義，父權體制等同民族主義，因而設想這兩者是完全分離的，但在殖民地的場域裡事情並沒有如此單純。在殖民地裡推動民族主義發展的歷史力量，和促成女性主義的歷史力量是相似的。這兩者是相互扶持同時出現的，雖然它們的目標和欲涉有時候是相互衝突的。實際上，女性主義做為一種意識形態經常被當做一種鼓勵婦女參與解放抗爭的方式，而得到容忍和支持。然而某些類型的反殖民的民族主義，例如在中亞，這些都以反現代的、反世俗的文化和宗教復興的面貌出現，卻把女性主義描繪成殖民地現代性初期腐化的事物之一。阿富汗是個從來沒有成為改革主義的或「進步的」民族主義者。因為這個原因，就像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治家偏好認同處於他所謂處於前殖民本土模式的社會主義，在許多三大洲女性運動公開表示要跟隨它們自己的文化形式和目標，同時否認和西方女性主義或西方現代性有任何關係。另一方面，不可否認的，任何反殖民民族主義運動對現代性的態度，不論是殖民地的或是西方的，乃是它和本地女性運動處於何種關係的關鍵。

379 女性解放和民族主義的關係是依據兩者各自所採取的形式而定。對女性而言，問題的核心在於，她們發動來反對的情況是兩種壓迫行為的產物，這讓民族主義抗爭的對手站在同樣的陣營裡：父權體制的剝削系統同樣出現在殖民的政權和本土的社會裡。女性因此必須對抗雙重的父權統治的殖民，一個是以地方的形式，一個是以帝國的形式出現。在許多女性的生活中，第一項是遠比第二項切身。在某些三大洲的社會裡，女性仍受制於各種不同形式的家庭約束，在各種不同的層次處於法律的附屬地位、身體的殘損、或在嬰兒時期就被殺害。結果，女性主義者，例如那些在土耳其或埃及的，支持以西方社會為範本而建立的社會存在的形式，並且聯合起來強力推動現代化，這也受到民族主義者的支持，用來抵抗那些屈服於帝國主義統治並做為帝國主義深入或增加它們在地方影響力的封建或君主制度 (Beck and Keddie 1978)。然而，這也可能往另一個方向發展。在穆罕默德·阿里 (Mohamed Ali) 領導的埃及，以及在凱末爾領導的土耳其裡，由一個專制政權在不同的時期

推動現代化的精神以及女性的平等地位，卻引起人民的反對（Yegenoglu 1998）。在伊朗，女性主義和民族主義在1905至1911年的政治事件中意見一致，但接下來在1924年之後又產生分歧，這時專制君主Shah<sup>譯註4</sup>，其統治是受到英國和美國的支持，為女性強力制訂進步的法案，包括在1936年禁止使用查爾達巾（*chador*）<sup>譯註5</sup>（Halliday 1978; Keddie 1981）。結果是，在1979年的伊朗革命把這類政策等同於帝國主義。另一方面，女性在社會上較為獨立的地方，例如在非洲的有些部分，殖民政權所帶有的父權體制，意味著女性在殖民統治底下經常是不斷地失去權利，例如失去她們的土地權〔在羅德西亞的辛巴威恩德貝勒族（Ndebele），在肯亞的盧奧人（Luo）〕，或是都市化帶來的社會變遷的結果是，她們在非正式經濟部門的活動受到嚴苛的控制（Coquery-Vidrovitch 1997）。

在20世紀，愈來愈強調民族文化認同的主張，對女性主義者而言就顯得更加困擾，因為肯定本土的文化認同而反對殖民者所強加的文化，傾向重新援引取自社會結構中更為傳統的形式來反對她們所努力要去爭取的東西；例如，要女性向 *Bharat Mata*（亦即印度之母），或是 *sati*（亦即好的自焚殉夫的妻子）認同。在女性某些例子裡，例如衣著，傳統文化中遺留下來的這些要素當能被當做策略來應用。在另外的例子裡，民族認同的強化包含要認同那些維護社會中傳統和家庭價值的角色，這卻和引進平等教育和女性有法律的平等權利相衝突，或是和傳統中壓迫女性的那些慣習相衝突，例如一夫多妻、嫁妝、童婚、禁止寡婦再嫁、以及殺害女嬰。這些都是歐洲女性主義積極關心的主題——宰制和被宰制文化中女性之間這種自我認定的連結，在許多方面是有充滿問題的，而且持續到今天（Burton 1994; Kim and Choi 1998; Mayo 1927; Mohanty 1984）。在這些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就是印度 *sati-daha* 或是焚燒寡婦的慣習，由於這種慣習被納入民族主義者的論爭裡的方式對女性高度有問題，而引發廣泛的討論（Mani 1989; Nandy 1980; Spivak 1999; Sunder Rajan 1993; Weinberger-Thomas 1996）。雖然英國在印度的政策一直是對地方的風俗和法律施加最少的干預，在面對如佩各斯（James Peggs）在《印度向英國的人道哭訴》（*India's Cries to British Humanity*）所描寫的，英國在潘迪首長（Chief Pandit）宣布沒有印度教聖典的（*shastric*）權威之後開了先例，並在1829年正式宣布「焚燒寡婦」的慣習是犯法的（Peggs 1830）。結果是，地方的孟加拉改革主義者對「焚燒寡婦」的反對，諸如洛伊的改革主義和梵社運動<sup>譯註6</sup>，轉變成由本土仕紳讚揚它是一種文化民族主義的形式（Gaur 1989）。如同英國傳教士於1920年在東非意圖限制女性性器官切除，或是印度政府的《同意年齡法案》（*the*

譯註4 波斯帝國皇帝的尊稱，直譯是萬王之王的意思。

譯註5 在伊朗，婦女用來當面紗或披巾用的大塊方布。

譯註6 原書上印成 *Brahmo Saraj*，應該是 *Brahmo Samaj* 之誤植，見本章前面的譯註。

*Age of Consent Bill*），把女孩同意性行為的合法年齡由10歲提升到12歲，則受到印度民族主義運動的領袖提拉克的極力反對，殖民者的干預會帶來把虐待女性的慣習轉化成等同於民族主義抵抗的議題以及對文化權利的主張（Hyam 1990; Jayawardena 1986）。在《面對肯亞山》這本書裡，肯亞塔對於陰蒂切除的慣習給予正面的肯定，並且指責傳教士和其他反對此慣習的醫生是「不負責任」，並且認為這種慣習應該「要被憐憫而不是被譴責」（Kenyatta 1938）。肯亞塔對 *irua*（陰蒂切除）的讚揚，說明了女性解放和解放的民族主義之間充滿問題的關係：雖然這兩者會彼此結盟從事活動，但並無法合而為一。肯亞民族主義者在爭辯中介入，把焦點轉移到殖民抗爭的議題上；從1927到1933年女性抗議的焦點集中在她們對於做為女人的權利，也就是在她們認為是成為成人不可或缺的通過儀式，婚姻以及完全參與基庫尤社會（Presley 1992: 89-93）。

## 六、獨立之後女性主義政治的問題

獨立的時候，許多脫離殖民的國家紛紛在它們的憲法裡賦予女性平等的權利，但這並不代表女性在實際上有享受到平等權利，或是她們不再成為各式各樣社會壓迫形式的受害者。政治的獨立並不是抗爭的終結，因此後殖民的批判在憲法的政治平等權利之外，也去支持女性有獲取教育、工作和參與社會領域中其他方面的權利。如同在西方，政治上的解放並沒有帶給女性社會上的解放，正如格瓦拉所指出，政治的解放一定要帶來社會和經濟的解放，所以女性主義者堅持，國家的政治解放一定要給女性帶來社會和經濟的解放。和女性運動的主要目標比起來，獨立在許多方面只是一個微小而脆弱的成就。女性的解放一直是後殖民時期為完成的事業的主要部分。在許多區域裡，女性運動的主要敵人一直是民族主義和宗教基本教義派的意識形態，這些意識形態持續在推動可能對女性是暴虐的社會慣習和文化認同形式（Ahmed 1992）。因為這個原因三大洲女性主義成為後殖民政治一個核心的而不是邊緣的部分。

阿爾及利亞的例子有力地說明了，從長期來看，在那些統治者利用他們的權力來推翻女性已經達到的社會進步的世俗型式的社會裡，政治獨立如何也有可能變得對女性不利（Knauss 1987; Lazreg 1994; Messaoudi and Schemla 1998; Moghadam 1994; Perez Beltran 1997; Vandeveld-Dailliere 1980）。在埃及，許許多多女性參與1919年華夫托（*Wafd*）反對英國的民族主義示威遊行；當1924年新憲法完全漠視女性的時候，她們再次被迫上街示威遊行。然而這並沒有達成什麼，而女性行動主義者自此一直努力要去改變社會制度和態度（Beck and Keddie 1978; El-Sadaawi 1980; Jayawardena 1986; Mayer 2000; Wilford and Miller 1998）。女性主義者以為，她

們的社會目標會因為女人無私地投入獨立抗爭中而會得到回饋來達成，但這些期望並沒有實現。所以辛巴威的女性自由戰鬥者注意到，「現在我們這些女人……都被遺忘了」、「是的，女人做了很多事，但沒有人會感激她們所做的一切」。「女人在抗爭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現在女性必須去解放她們自己」，這已成為那些支持在辛巴威的自由戰鬥者、卻受創最大的女性共通一再重複的話（Staunton 1990: 156, 144, 66）。不知感恩，認為女人毫無疑問會再回到她們原來的角色，是許多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戰鬥的西方女性所共有的經驗。接著所產生的，正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殖民地軍人「以血還債」會帶來殖民地的獨立，其結果卻是失望的。因此，後殖民女性主義分析的一個論辯是：女性經常是在解放運動期間得以賦權，卻在在她們所希望去創造的國家裡發現帶她們自己被解除了權能。甚至在諸如幾內亞比索的國家裡，在那裡法律的平等權在獨立的時候是受到保護的，同時像席拉（Ernestine Sila）和法蘭西卡·佩蕾拉（Francisca Pereira）之類的女性也形成了革命的「幾內亞暨維德角非洲獨立黨」內很出色的部分，在實行上如同卡布拉爾所預見到的，社會結構內必要的變遷要花一些時間才會產生，而且需要有進一步的行動。

雖然女性可以而且也確實參與過反殖民的運動，不論是在憲法或是軍事方面，不可否認的，在其他種新成立的民族國家裡女性的公民和社會地位，經常複製殖民的、封建的或西方的控制和壓迫結構（Chatterjee 1993; Kandiyoti 1991; Yuval-Davis and Anthias 1989）。如尤凡爾戴為思（Yuval-Davis）等人所指出的，在國家的形成過程中，性別的角色往好的方面說是一種充滿問題的角色（Mosse 1985; Parker et al 1992; Yuval-Davis 1997）。有跡可尋地，許多出色的民族主義理論家，如蓋爾納、克度理（Kedourie）或史密斯，完全沒有考慮這個問題。就政治抗爭而言，後獨立時期讓女性主義者從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裡分離出來，因為民族主義把它的角色從反殖民抗爭中的主要部分轉變成國家權力中的主要部分。新的國家往往無法調整來配合解放之後新的需要和優先要處理的事，不然就是屈從於那些把殖民統治機器據為己有的資產階級菁英的貪婪。一種對民族國家父權價值和社會結構逐漸增強的爭奪戰在出現，經常一開始就把焦點集中在有關身體和生理繁殖的議題。女性運動的政治最能夠清楚闡述反殖民和後殖民時期之間的不同。無論她們多麼支持反殖民抗爭，女性主義運動在過去和現在主要都是一股爭取平等權利和在社會各個層面都能平等取得資源的力量，她們的目標絕對無法僅僅因為國家的政治獨立就能達成。政治獨立僅僅是女性推動社會變遷的長期抗爭中的一個階段，而且經常是啟動一個新的行動主義階段的時刻（Park and Sunder Rajan 2000; Davies 1983; Jelin 1990; Mikell 1997; Moghadam 1994; Mumtaz and Shaheed 1987）。從這個觀點而言，即使所關聯的是不同的政治歷史，三大洲後殖民女性都具有一種共通的政治使命和目標。

## 26.

## 薩依德與殖民論述

承繼反殖民運動裡迥異的知識論與其遺緒，三大洲抗現代性究竟是如何以另類的知識形式，成功地滲透到那些以「後殖民理論」為名的學術界裡，或是如何滲透到那些迄今在全球仍被帝國主義西方的優勢位置及判準所宰制與把持的建制化知識場域呢？接續第五章討論的物質性制度因素，我們現在要在理論上做的事，是重新認識整個殖民現代性的計畫與實踐，它不單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所進行的特定軍事與經濟策略，同時它也透過對知識的特定歷史論述不斷地自我建構與被產生出來，而這種論述扣連政治權力的運作：簡而言之，殖民不只是實體的暴力，也包括在知識上的暴力。主張殖民主義不只是以軍事統治的形式的操作，同時也將它視為一種宰制的論述，這種觀念的引介是薩依德的成就，他的介入不但有非比尋常動力，同時在理論方面也頗有可議之處。

雖然後殖民理論的系譜在歷史上看來，不但是複雜、廣泛的，同時本身就是自己時常研究的跨文化混雜產物的最佳例子，但是直到薩依德在《東方主義》（1978）裡，以自己身為一個「東方人」在兩個英國殖民地成長的經驗為基礎，對學術知識中的文化政治提出批判後，才成功地將後殖民研究發展為一個學科，裡頭的成員都充滿著政治使命感以及地方定位的認同（Said 1985: 25）。同時，薩依德最早開始正式將政治使命感與反殖民運動的意識形態批判，扣連其他的理論著作，像是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Said 1983）。這件事本身並不是非比尋常，畢竟如同之前所看到的，反殖民行動派往往等著利用他們所接觸到各種可資利用的理論或政治知識。除此之外，其他政治知識分子，隨意提幾個名字，如阿敏、法農、格利桑、洪通基、里貝羅、聖提亞哥等人，當然也使用過當代的素材，其中也有一些可以算是結構主義或後結構主義，但卻未意識到這些東西與「本土的」思想、馬克思主義思潮、解放的政治之間存在著本質性的歧異。然而，薩依德在語言問題的議題上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這個議題在1970年代時一直是當代左派的激進知識分子主要的關注所在。卡韋（Calvet）（1974）、恩古吉（1981）及其他人都曾在殖民主義的語言政治這個議題上有顯著的貢獻。就薩依德這一方面而言，他則是藉著把分析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與對抗這兩者的鬥爭帶向論述的議題，完成了理論的闡述。在薩依德的論述觀念從來不是反殖民主義和語言學這個完全分離的理論體系扣連的問題。因為如今眾所熟知的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的理論，其源頭本身就與對西方的宰制進行的

抵抗緊密糾纏在一起。在此，我們將以一些與德希達相關的論點為準深入討論，其他的則會其他地方再做討論。

有關《東方主義》，最令人感興趣的一點是儘管它影響深遠（其影響力再怎麼高估幾乎都不為過），仍被視為在理論上與政治上有其爭議之處。很少有書籍能像《東方主義》一樣，經得起多年以來大量猛烈的批評火力而能存活下來。事實上我們可以說，後殖民研究做為一個學術領域，正是透過對薩依德的著作所進行形形色色的駁斥、重構、和完全不同的來界定自身的範圍。從阿赫莫德（1992）到巴巴（1994），從修姆（1986）到麥克林托（McClintock 1995），從洛依（Lowe 1991）到葉根諾古魯（Yeğenoğlu 1998）再到羅伯·楊（Young 1990），這些後殖民批評家，竭力想從只剩半條命的傳統學科掙脫出來的人，哪一個不是從批評薩依德開始重獲他們在後殖民研究的嶄新生命呢？即便到今日，對「東方主義」的批評仍具有入門儀式或表演的作用，這個領域的新進人士藉此才能在「後殖民情境」的論述場域裡宣稱取得發言的位置。就像伊格頓（Eagleton）所說的，眾所公認這種入門儀式所必備的要件，勢必就是新進人士要針對開山始祖的文本裡的一個面向，或者最好是幾個面向，加以嚴肅批評，同時也批判後殖民這個概念，之後他或她才能宣稱自己站在外部來進行批判（Eagleton 1998: 24）。這個儀式如今甚至發展出了一種如「迷宮結構」<sup>譯註1</sup>（*mise-en-abyme*）不斷反覆的效果，想進入這個領域的新進批評者進行批評的對象不單是薩依德，還包括所有之前的評論者，把他們的文本與薩依德並列起來，然後指責他們再犯了或忽視了原本存在於薩依德文本裡自相矛盾的問題……而唯有藉此你才能證明，自己在論述上如傅柯所言，與後殖民者「站在真理的一方」（in the true）。

尤其，把「東方主義」的概念當做一般意義的論述，創造出一套概括性的思考範型（paradigm），藉此透過分析殖民、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文化形式，也讓《東方主義》能如此突出成功，同時也建立了一個全新的學術研究的領域。正統馬克思主義者正確地強調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發展中經濟的重要性，然而經濟情況的多樣性，殖民地之間歷史及地理的差異（例如，要如何拿美國與印度做比較呢？）意味  
385 著並沒有其他的普遍架構，可以拿來分析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具體而微的文化效應。薩依德使用論述的概念去解釋知識的各種形式如何在特定種類的語言之中被建構出來，而這個語言也充斥著各種文化的假設，使得東方主義，乃至更廣泛的殖民主義能從意識形態可以被分析，洞察到在從古到今，來自各種不同機構、學科以及地理區域所生產的各種不同的文本中意識形態下的產物。同時，薩依德的文本之所

<sup>譯註1</sup> *mise-en-abyme*：源自法文，意為“placing into infinity”（置入無限）或“placing into abyss”（墜入深淵）。是一種藝術手法，文本中某個意象內含與本身相同，具體而微的意象，如此不斷重複，像迷宮或深淵般，永遠流動接續，沒有底部終點的類比或指涉。

以引發強烈批判，許多問題的原因可回溯到薩依德在《東方主義》裡闡釋論述這個概念的方法。儘管被後殖民理論當成基本的概念加以運用，但殖民的論述從未被全面地理論化，或更明確地說是歷史化，尤其是透過薩依德，殖民論述通常是與傅柯的作品有所關聯，但兩者之間的理論關係也從未有實質性的探討。

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能說薩依德不應該依照自己的旨趣來修正傅柯，但基於對薩依德文本的理論基礎有諸多爭議，以及薩依德的論述概念常被認定與傅柯的雷同，我們必須要問的是這兩者的關係究竟有多密切。如上所言，一般來說後殖民的批判是從批判薩依德開始的，然後又發掘到薩依德在某個方面有所不足，繼而建立自己的知識領域，以至產生某些以共同議題或觀點為核心的一套詮釋文本。另一條路徑（也是在此所遵循的途徑）則是回到傅柯，檢視是否某些問題的根源是來自薩依德對傅柯的運用，並且查看如果根據傅柯自己對論述的說法進行重構後，問題是否會少一點。但我們幾乎可以確定的是，這種重構所產生的成果不會更豐碩：就後續相關的研究數量來看，《東方主義》已然成為近年來最具豐富創意的書籍之一，或許此書中難解的理論疑難就是這個多產的基礎。

## 一、薩依德著作中的論述與權力

那麼，到底什麼是「論述」呢？「殖民論述分析」源自傅柯、經由薩依德加以發展，它的所關心的並不是語言本身，而是關心知識的論述體制（a discursive regime of knowledge）。就如我們在薩依德於《東方主義》一開始引介這個概念時所看到的，他概略提及《知識考掘學》（*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與《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也引用了《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然而，實際上他似乎從傅柯1970年所寫的另一篇論文〈論述的秩序〉（*The Order of Discourse*）（薩依德也引用了此文）裡掘取了許多自己對「論述」的想法，然而此文在收錄於由US Pantheon出版的《知識考掘學》英譯本的書末，其文章名稱有點被誤導地被譯為〈關於語言的論述〉（*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Foucault 1981; Said 1986: 150）。在這篇論文裡，傅柯的「論述」描述一種特定的語言，針對此一語言，專業化的知識必須與之相符才能被認為是真（例如，醫學論述、核子物理學理論的論述、電腦的論述、歷史的論述、文學批評的論述，或是愛的論述）。薩依德從傅柯那裡取用了這樣的概念：論述的發展與一個學科的形成，以及此學科研究目標的訂定界線密不可分。學科研究在劃定界線的過程剛開始會有限制性——但薩依德也指出，這種限制隨後在學科發展上會變成生產性（Said 1985: 14）。根據傅柯所言，論述總是涉及一種暴力的形式，即它會把自身的語言秩序強加於世界：為了被承認為正當合法，知識必須符合論述的範型。歷史學家對殖

民論述分析感到不安，恰是上述觀點的實際範例：在歷史學家的耳中聽起來，殖民論述分析所使用的語言並非「站在真理的一方」。論述被建構的方式所牽涉的不只是一種語言的特殊形式的發展（例如法律語言），還有一套眾所認定的程序，同時還有合法化及排他性。

薩依德在《東方主義》的一開始便這樣鋪陳他的論點。他概述「東方主義」的各種想像與學術意義如何相交流，然後從第三種方式去闡明東方主義乃是被遠較上述兩種方式更為歷史與物質的方式所界定：

若是粗略地以18世紀末為討論的起點，東方主義可以被當成集團機制（corporate institution）而加以分析和討論，就是為了找出經營東方的方式——經營它就是提出有關東方的陳述、將其觀點權威化、描述東方、講授東方、安頓東方、統治東方。簡而言之，東方主義便是為了宰制、再結構、並施加權威於東方的一種西方風格。在此，我覺得引用傅柯在《知識考掘學》和《規訓與懲罰》中的「論述」概念，將會有助於指認東方主義。我的論點是，若不將東方主義視為一套論述，將無法使我們理解歐洲文化何以能在這後啟蒙時期，透過極為系統化的規訓（discipline），在政治、社會學、軍事、意識形態、科學和想像各方面，管理——甚至生產——東方。（Said 1985: 3；中文翻譯依據立緒中譯版修正）

據此，薩依德將此書裡所使用最重要的概念立基在傅柯之上；如今這個概念就是廣為人之「殖民論述」。雖然薩依德在此指出《知識考掘學》與《規訓與懲罰》是其「論述」概念的根源，但他所發出來的討論卻跟傅柯在《知識考掘學》裡發展完全的「論述」理論，關係僅算鬆散。在薩依德的作品裡「殖民論述」的概念裡，日後被指出的許多問題，尤其是論述的概念過於決定性與單義，界定過於狹窄而且同質性太強，如果比較直接從傅柯《知識考掘學》推導殖民論述理論，薩依德這些問題其實和傅柯的論述不相關。問題是評論家們都偏愛去修改薩依德，而不是回到傅柯原初對這個概念實質的處理，據此將「殖民論述」重新理論化。薩依德本人當然沒有先宣稱要提出一個「殖民論述」的理論來——他所做的是將東方主義視為論述來加以分析。

將「東方主義」的概念當做一個具有其論述的集團機制，這個觀點十分接近傅柯。當薩依德討論到東方主義是什麼時，他援用傅柯在《規訓與懲罰》裡對權力、規訓與宰制的強調：

尤其重要的，它是一套論述，它絕不是與原純的政治權力形成直接與呼應的關係，而是於一種不均的各式權力交易中被製出、生存，並在與下列諸

權力的交換過程中被形塑：政治性權力（例如關聯著殖民或帝國建制）、知識性權力（例如關聯一些主流的科學如比較語言學或解剖學，或其他的當代政策科學等）、文化性權力（例如關於何謂品味、文本與價值的正統與典律），還有道德性權力（如一些概念有關「我們」做什麼和「他們」不能做什麼，或無法理解「我們」所瞭解的）。（Said 1985: 12；中文翻譯依據立緒中譯版修正）

在此，東方主義被描繪為和其他各種形式的其他制度性論述權力「不均的交易」而生產出來的一種論述，近似於傅柯所謂的「實證性」（positivity），雖然傅柯也強調構成實證性的不僅是論述的互動而已，還有論述與物質事件和外在情況之間的互動，一直以來，論述正是藉由這些形式糾纏在物質世界中。薩依德本身認為在這種權力的形式裡，東方主義論述不只是以結果推論原因的模式（*post-hoc*）辯護殖民統治，同時也更具工具性地操作。「單是說東方主義就是將殖民統治合理化的說法，忽略了殖民統治的正當性早在事前就在一定程度上被證成，而不是在事後才發生。」（Said 1985: 39）因此，薩依德視東方主義為「一種西方對東方的投射，也是一種西方想治理東方的意圖」（*ibid.*: 95）。當然，沒有人會認為薩依德過度簡化地將東方主義視為只是歐洲殖民主義在意識形態上的輔助，只是為了替帝國主義直接服務而被有意識地製造出來。實際上，在知識本身的形塑過程裡，還有求真意志（*will-to-truth*）在「白色神話」的學者裡運作著。薩依德所說的是求知識的意志，以及生產知識的真理的意志，也是一種權力意志。學術的知識也是西方權力機器裡的一環，就像傅柯所說的：「權力與知識結合在論述中。」（Foucault 1978: 100）也正是將學術知識從它所宣稱的客觀性和自主性重新定位（*repositioning*）的這個基本論點，使得《東方主義》據此一基礎在學術界中造成影響。

這麼一來，薩依德透過傅柯來概念化這套權力／知識的結構，尤其是《規訓與懲罰》，另外還有一些來自於葛蘭西的協助。雖然就像許多批評家指出的，他所強調的「霸權」（*hegemony*）因為沒有任何反霸權的（*counter-hegemonic*）抵抗的討論，仍然有所不足。在上面徵引的例子裡薩依德為解釋這個概念而提及了傅柯時，也大抵根據傅柯的精神，在不同的書寫和制度之間無懈可擊地來回穿梭：「經營它就是提出有關東方的陳述、將其觀點權威化、描述東方、講授東方、安頓東方、統治東方……。」然而，薩依德分析的材料逐漸集中在特定作者的文本上，而不是機構的生成及機構之間的關係。這種對文本的強調已成為這本書所引發出的學術知識裡很重要的核心。薩依德運用「論述」的概念分析東方主義，使他得以證明在某些特定的觀念、語彙及各種再現的形式中，都具有一致的論述對應印記（*discursive register*），這是各式各樣的文本中常見的，其範圍之廣橫跨人文與社會科學的領域

388 —從旅行見聞到歷史，從文學作品到種族理論，從經濟學到個人自傳，從哲學到語言學。所有的文本的分析都可以從它們的語言及主題中共有的，一致的殖民意識形態來著手，這種知識形式是在權力結構——也就是殖民宰制——的配置與運用之同時發展出來。

在《東方主義》裡，薩依德強調了他的所謂「雜揉觀點」(hybrid perspective)，其方法就是把焦點放在「東方主義論述所做的陳述，其物質層面的效應」。與這個立場相關的是在他另一篇發表於同年的論文——〈文本性的問題：兩個足為示範的立場〉，文中他將傅柯比為德希達(Said 1978)。薩依德特別選擇傅柯而不偏向德希達；薩依德在「文本性」的標題之下來討論傅柯的作品，包括他的論述的理論，這一點頗具意義的。儘管沒有人會指控薩依德採了解構的方法，但在《東方主義》進行分析的過程裡確逐漸把焦點放在文本之上。薩依德討論了特定的東方主義文本，而這些文本集體地建構出他所描述的——追隨傅柯——東方主義的「論述形構」(discursive formation)。在此，他強調東方主義的論述是與它宣稱將提供知識的物質環境間有一段差距，並轉而更強調東方主義的文本如何由一些「做為再現」的再現所構成，這些再現無法描述東方的真相。更確切地說，他們採用了「各式各樣西方的再現技巧，讓東方在關於它的論述中成為可見、清晰、『存在那兒』。這些再現為了效果，它們依據的是機構、傳統、約定俗成的常規、眾所同意的理解準則，而不是依據一個遙遠的、難以名狀的東方」(Said 1985: 23, 28)。東方於是被建構為從這個文本中不斷被傳遞到另一個文本的再現；結果是東方主義的書寫上一再複製自己對一個永不改變的東方永不改變的刻板印象。做為一種論述的東方主義成為一種不斷重覆再現的語言結構，它所依據的真實來自文本重複的權威，而不是攸關它們所宣稱要再現之事物的真理價值(truth-value)。就這一點而言，東方主義開始被認為主要並不是在論述的學科(discursive discipline)中運作，而是在一個再現的傳統的層次上運作，而薩依德也因為它是在一種霸權的權力／知識結構中對真實的錯誤再現而加以批評。薩依德從論述轉移到意識形態再現的概念，就是他文本中有關理論的爭議的關鍵所在。

我們可以從薩依德對「東方」(the Orient)這個概念的立場看出再現的問題是如何取代傅柯式的論述概念。在本書一開始，他認為，雖然做為一種實踐，東方主義製造出自己的知識形式，「就因此總結說東方本質性上是個概念，或是沒有對應真實的創造，這些都是不對的。」(Said 1985: 5)薩依德從《知識考掘學》擷取的論點是：論述是一種知識論上的設計，透過建立一特定語言的對應印記(linguistic register)的實踐來建構它的知識對象。論述並不是僅如實地描述世界，就好像語言直接地中介現實世界，論述建構了真實世界的事物，以及這些事物被感知與被理解的方式；就像薩依德說的：「這類文本所創造的不只是知識，還有它們彷彿要去描

述的真實。」(Said 1985: 94)然而，知識是由論述所中介的說法，實迥異於「沒有真實對應於論述之指述」，乃至「東方主義因而與真相毫不相干」的見解。在本書的最後，他說：

我們不能將東方主義在方法論上的失敗解釋為真正的東方不同於東方主義者所描繪的……本書的論點並非主張有一個真正的或真實的東方……相反地，我一直主張「東方」本身是一個被建構出來的實體，而且以為東方就是住著一群非常『不同』的當地居民的地理空間，可以根據某個宗教、文化，或是只有在這種地理環境才會有某種種族特質來界定出這群人，這種觀念同樣是高度可議的。(ibid.: 322)

換句話說，東方如今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再現，並沒有對應的真實。不可能有「真正」的東方，因為「東方」本身就是東方主義者建構的產物。過去的東方主義是個意符(signifier)，它的所指(signified)所對應的只是一個西方的幻想世界——「東方」。它是過去西方對「他者」(the Other)的投射，只製造出了關於「他者」的知識。因此，薩依德在兩個觀點之間遊移，其一是東方主義的描述，其知識是以論述的方式產生，另一個則是把東方主義當成不過是一個虛擬真實的再現。上述我所強調的差異，有人或許會反駁說這不過是吹毛求疵罷了：薩依德的意涵再清楚不過了。就像是「第三世界」一樣，「東方」在某個層次上是真實的名稱，但在另一個層次上，做為知識客體的通泛形式並不存在。即便如此，在這一點上，薩依德就是把傅柯置諸腦後，因為傅柯的論述理論不是文本或文本再現的理論，不是在詮釋那些大量構成所謂殖民論述分析的元素。它其實是一種言說宣稱(announcement)的理論，是論述事件(discursive events)的理論，它的目的是要根據這些論述事件的出現來建立出規則。

## 二、對「殖民論述」的反駁

就像之前所言，許多作者相繼發表反駁薩依德的論點，有的更提出其中的問題所在。而光看這些批判和駁斥的數量恰恰是其論述權力的證明。現在，我要特別把重點放在一些從薩依德作品衍生出的，一般對「殖民論述分析」的反駁，尤其是來自歷史學家們的觀點。在此我必須強調這些反對意見並非我自己也有的看法，而只是提出我們在討論中會遇到的一些反對聲音。許多這類反對論點都先把矛頭指向論述本身的地位問題，這一點我們將留待最後再討論。

從少數文本的例子看「宣稱」(claims)的地位問題 常見於歷史學家的反對

意見就是認為殖民論述分析一般都只是檢視有限的、多半是文字書寫的文本，然後就根據這些文本針對整個歷史做出普遍化的推論。在理論的層次上，此論點涉及了關於證據、「代表性」、是否成為典型，或者是例證的地位等問題的差異，同時還有關於個別文本的歷史地位的問題：個別文本的重要程度如何？以及對誰來說是重要的？這個問題是否應該是：要將個別文本視為隱含歷史效應或具有明顯可見的衝擊，或是應該將文本看成是文本之外的某一段歷史產物或影響？

**歷史性的問題** 假如傳統歷史書寫 (historiography) 不去處理自己的歷史性的問題，那麼反對殖民論述分析的學者 (常是針對《東方主義》本身的反駁) 就是認為它有「去歷史化」的傾向，將所有的文本視為同時代的產物，就好像它們都存在於一個非歷史、不變動、空間化的文本連續 (textual continuum) 裡。與此相關的反對意見還包括了認為殖民論述的分析常常沒有扣連論述的素材和各種非論述的歷史，沒有證明即便個別文本以論述的形式參與其中，它仍是非文本歷史 (non-textual) 裡的一部分，它與非文本歷史產生連結、互動，受其影響，或者由其決定。

**對歷史的文本特質的強調** 歷史學家們通常謹慎地自認為他們學科涵括或參與了「文學」(literary) 的問題，像是敘事或是詮釋，而當歷史分析過於明顯地成為一個詮釋的問題，而不是歷史證據的搜集與判斷時，他們開始感覺到不安。許多歷史學家喜歡將自己的學科模式歸屬到法律，而不是文學研究。殖民論述分析有凸顯這些議題之虞，因此可能侵害歷史做為一客觀研究的學科認同。這個問題在於「殖民論述」的分析意謂著分析者將文本視為是文本來檢視，而非視為提供歷史事件之證據的文件。殖民論述分析就是仔細審視文件裡客觀的真實的再現，與文件所描述的事物幾乎沒有直接的關係，也就是說所有的知識都是片面的；更進一步地說，歷史本身因此必須從少數族群或底層階級的觀點來重新書寫，這一點又一次地威脅了歷史做為一門客觀學科的概念。隨之而來的問題往往就是如果所有的歷史都是片面的，我們如何能知道某段歷史到底是不是「真的」？或許我們根本不能。就像傅柯所說的，真理可能只是一個效應 (effect)。同時，像阿赫莫德、默罕特、帕瑞 (Benita Parry) 等批評家也批評了殖民論述分析裡的文本主義 (textualism) 與唯心主義 (idealism)，因為這種傾向犧牲唯物歷史方面的探究以及政治化的理解 (Ahmad 1992; Lazarus 1999; Mohanty 1984; Parry 1987, 1994a, 1998)。

**再現的問題** 粗略地說，殖民論述的分析者將再現當成是再現來分析，然而歷史學家則是以再現的事物來分析再現。就像大多數歷史形式一樣，殖民論述檢視語言的證據，但它主要關切的是去分析再現的形式、再現如何被構築出來、再現包含

了什麼設想——如種族或歐洲中心主義，以及再現投射出什麼樣的西方意識形態等等。如此說來，它主要的關切並不是拿這些文本的再現去跟文本可能或可能沒有再現的指涉對象做比較，它不會問這樣的問題：「它是否精確呢？」、「這個文本真的告訴我們事件發生的真相嗎？」等等，雖然，如薩依德所言，它總是預設說可能有更真實的歷史形式。當然，因為歷史做為一個學科，其對象實際上是不在場 (absent)，因此這一直是個受爭議的領域。讓我們再說一遍，殖民論述分析是針對再現的分析，而不是試圖尋找事實或評估證據的探索工作。這也意味著殖民論述的分析可能得出迥異於傳統歷史研究的結論來，雖然實際上兩者的再現、事實、證據或許都一模一樣。此外，再現的研究對於沒有被陳述的和有被陳述的事物保持同等的興趣。

就像前面所提的，薩依德的文本裡存在著某種曖昧多義的元素，遊移於歷史做為再現以及真實是如何發展這兩者之間。他針對東方主義的論述發展出一個運作於再現層次的概念來，同時根據霸權的知識／權力結構下的真實被錯誤地再現，批評東方主義的論述。然而，他後來也承認，對任何人來說，不論用任何方法，或許都不可能精確地再現其他文化。在《東方主義》裡花了大半篇幅批判東方主義者的再現之後，薩依德說：

真正的問題在於是否任何事物確實可能有真實的再現，或者任何的再現就因為它們是再現，所以就必須先鑲嵌在再現者的語言，然後是他的文化、機制以及他所身處的政治氛圍裡。如果後者的說法是正確的 (一如我所相信的)，那麼我們必須要準備接受一個事實，即再現本身就與許許多多「真理」之外的其他事物有關係，同時牽連、交織、糾纏在一起，而真理本身就是一種再現。(Said 1985: 272)

在此，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如果真理是個再現，薩依德或其他人如何能知道事物是否被錯誤地再現呢？如果東方主義是個錯誤的再現，那麼就像薩依德在本書的結尾處所提問的，「人們如何再現其他文化？」(ibid.: 325) 就這或許也回答了下述問題：如果東方主義的再現是大錯特錯的——誠如薩依德不斷堅持的——，他為何沒有提供任何方法，以使幫助底層階級說話 (以史碧娃克的用詞來說) 的反再現 (counter-representation) 成為可能——他也自承這項任務凸顯他自己的研究是「令人難堪地不完整」。

**批評論述構成一同質化的整體性 (totality)**，凌駕歷史與地理差異的特殊性反對者認為「宣稱」有一個普遍的「殖民主義的論述」，這是一種化約統合 (totalizing) 的作法，並未考慮到存在於真實世界裡——無論是過去或當前——歷



史與地理位置的差異的程度有多大。「殖民主義」這樣的類別適合嗎？「殖民論述」在多大程度上能符合它本身所宣稱那樣，是一個具有正當性的一般範疇，能提供我們方法處理殖民主義本身及其有關論述的整體性？在殖民時期，它是個單一的論述嗎？還是像修姆所說，有各種論述在運作？現代殖民主義受到歐洲的或衍生自歐洲的勢力所影響，這個事實是否意味著在各地的殖民主義論述以類似的方式運作，而殖民論述分析的理論範型同樣適用於它們全部嗎？

392 **論述的理論** 以上問題絕大多數都衍生自薩依德引進的理論範型，此後「殖民論述分析」就廣泛的採用它，習以為常地拿它來檢視某種論述如何被發展出來，以便描繪、再現及統轄殖民地。許多評論家——最耳熟能詳的就是巴巴——都曾批評薩依德所採用的論述概念決定性太強而且過於單義（univocal），這也構成了批評判《東方主義》裡論述概念的主要基礎。薩依德堅持東方主義的論述體制的一致性，認為沒有任何西方人能擺脫它；但是他所討論的作者有其複雜性，而且採取的立場各異，他對這樣的複雜歧異所做的分析不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他所宣稱論述體制的一致性。他並未告訴我們個人如何藉由使用語言及取得論述位置成為主體，這就成為巴巴修訂殖民論述模型的基礎。巴巴強調論述具有含混多義及異質的特性，而非它固定不變的同質性以及總能成功地被實現的意圖。

雖然針對薩依德在歷史性、文本性、再現、同質性及決定論等面向，一直有許多實質的批評，但令人訝異的是卻沒有多少的著作試圖跨越薩依德建立的殖民論述最初的範型，重新思考殖民論述這個概念。與其去反駁薩依德或嘗試在某方面調整他的概念以使他的論點更完美，真正需要去做的是重新理論化所謂的殖民論述。

### 三、語言學的論述

一般對「殖民論述分析」的瞭解常常僅止於認為它檢視了特定種類的論述如何發展出來，以便描繪、管轄殖民地。「殖民論述分析」容許自我定義上的模糊，因為「論述」本身就是如此含糊不清。即使在語言學裡，這個詞彙仍被使用來指稱許多不同的意義；例如，有時論述被用來區分口說與書寫的語言；然而更常見的是用它來指稱上述兩者之中任一者的分析中所徵引的實際範例（Fairclough 1992）。一般而言，語言學家會把它定義為對話的或文字實例（例如，從報紙得來）中有組織性的特點。無論是對話或文字的本體都被視為一種互動性的社會產物：它往往是在特定情境下，講者和聽者或讀者之間的對話裡的一部分，而這些人不但詮釋語言，同時也生產語言。語言學家也使用「論述」這個詞彙來描繪語言的不同語域，也就是當人們從家裡用完餐後轉而去報新聞、看醫生、與好友通電話、談生意、幫小孩

洗澡的過程裡，人們在使用或處理的語言種類上採用的各種不同的調整。「殖民論述」這個詞彙常很寬鬆地指稱那些被用來討論殖民相關事務的典型語言；但是，這只能適用為一般的描述性字眼，而不能做為一個分析的工具。

令人困惑不解的是，殖民論述分析並沒有和社會語言學家口中的論述分析有任何直接的關聯。在語言學裡的論述分析本身是一個極度分歧多樣的領域，充斥著各種的研究取徑（其中有一些取徑，可參考Dijk 1985; Fairclough 1992）；根據特定語言理論架構所衍生出的方法論來看，一般來說，它包含描述性及批判性的文本分析在內。雖然有些例證的論述分析乃集中在它的意識形態功能的問題上（Fowler 1979; Pêcheux 1982），只有卡韋曾特別針對殖民主義的議題加以討論，並為殖民情境下的語言分析創造出一個理論架構。然而，他的作品在後殖民領域中仍鮮為人知。卡韋採用了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架構，將殖民主義視為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極端演變：根據物質上的不平等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衝突來構築。國家藉由直接的武力來維持權力，隨之而生的司法與法律結構也是將國家的宰制合法化。國家的論述強化了其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而這上層建築在殖民的情況下將包括一套利於殖民者的語言和文化的價值體系，並貶抑被殖民者的這一切。這種貶抑被殖民者語言的實際作法有詳盡的記載，殖民者最終的目標不外乎滅絕該語言，卡韋將這種現象稱為「語言噬菌」（glottophagie），意即啃蝕語言。「語言噬菌」建立一套意識形態的分析，研究文化在相互接觸時（這常常是殖民主義產生的直接結果）的語言操作，在語言混雜的洋經濟和克里奧語言學中，大致上以中立客觀的角度做分析。

關於殖民主義的語言以及文化效應，法語系的後殖民理論比起其他地方有著更高度的發展；以英語寫作的作者較傾向於強調語言的互動，以此隱喻文化的混合，就像在柏列維特分析中提到的克里奧化（Brathwaite 1971）。英語系的後殖民分析把「語言問題」的焦點集中在更廣義的意識形態運作：採用階層化語言的制度性權力結構，將（過去或當前的）殖民勢力的宰制語言強加在當地語言之上（Larbi Korang and Slemon 1997; Ngugi 1983）。除了考量研究宰制語言及當地語言間的翻譯所造成的影響外，學者們也根據巴力巴（Balibar）對法國本地的語言階層制度的運作所做的研究而發展出的範型，針對強制施用外國語言在殖民地造成（至少是）雙語的情境，分析其中的社會政治意涵，這方面的研究成果豐碩（Balibar and Laporte 1974; Balibar Merlin and Tret 1974; Cheyfitz 1991; Niranjana 1992; Rafael 1988）。這些語言學用法的「論述」並非與社會學或政治科學，像阿圖塞、哈伯瑪斯（Habermas）、紀登斯（Giddens）等人所用的「論述」的互不相容，但兩者仍是大不相同的。這並非以詳盡的方法學分析語法形式的問題，也不是從語言學的觀點來看的高階組織或互動的問題，這毋寧是語言做為社會與政治生活一部分，或成為其障礙，它的功能為何的問題。要討論這個問題，可以從更廣的意識形態功能的觀點

(Althusser 1971; Crowley 1989, 1991; Habermas 1984-7; Gramsci 1971)，或是它與性別相關的意識形態功能 (Cameron 1985; Spender 1985) 來探討。

394 薩依德本人在《東方主義》對論述的理論層面的討論著墨甚少，而後殖民批評家有樣學樣。對照於眾多對薩依德的批判，除了巴巴的著作外，相對少有殖民論述的實質性討論，在理論或概念的層次上重新定義、重新形構 (Bhabha 1994; Hulme 1986; Lowe 1991; Mills 1991; Niranjana 1992; Pratt 1992; Spivak 1987; Young 1995)。許多使用這個詞彙 (甚至在書名上) 的著作似乎從不覺得需要去探問他們所討論的「殖民論述」到底是什麼 [例如 Berman (1998) 便是眾多之一]。一般普遍都認定殖民論述分析是從傅柯的作品裡發展出來，但事實上一般的殖民論述分析都包含特定文本例證的分析，如此一來便回到文學批評家的傳統詮釋技巧。結果就像之前所說的，殖民論述主要傾向強調文本性質。例如蜜兒思 (Sara Mills) 將殖民論述化約地界定為「針對由西方人撰寫的，有關被殖民國家的文本的分析」(Mills 1991: 2)。殖民論述分析在此已變成僅是一種將焦點放在特定範疇的文本的文學批評形式。

這又將我們帶回到那些反對殖民論述分析者所提出的，對文本主義的不滿。諷刺的是傅柯自己在《知識考掘學》裡提出的論述模式可說是回答了反對殖民論述者所提出的許多基本質疑。然而，後殖民理論家從未認真看待他對論述的性質最持續、最徹底的分析與表述。我們很難就此譴責他們，畢竟許多傅柯的評論者也略而不提 (欲知更全面詳盡的分析，請參考 McNay 1994: 66-84)。這是傅柯最難懂的一本書，也提供了關於論述這個概念最奇特的見解。

## 27.

## 傅柯在突尼西亞

## 一、傅柯的沉默：希底布薩伊德村 (Sidi-Bou-Said) 以及《知識考掘學》的脈絡 395

對後殖民分析而言，傅柯對理論探討的重要性不只侷限在與「論述」相關的部分。無論早年或晚期，傅柯的許多論點似乎都可應用在研究殖民的場域裡——例如他所強調的權威與排除 (exclusion) 的形式，以及他分析權力技術、監控機制、治理性 (governmentality) 等的運作 (Bhabha 1994; Scott 1995)。傅柯的概念本身就頗具生產性，讓各種形式的知識權力得以產生，甚至他的意象也是非比尋常地富於啟發性：例如在《瘋癲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的開頭描述「愚人船」上面搭載了被驅逐離開自己故鄉的瘋癲人士，行駛過一個個港口。此後，「愚人船」代表了被迫遷徙的形式，將過剩人口載往美洲、澳洲，或是代表猶太難民在地中海漂泊流浪的船隻，因為巴勒斯坦的英國當局同意巴勒斯坦人停止猶太人移入的要求。這些離散的意象吻合傅柯自己在1967發表演說時的論點：20世紀乃空間與空間組織之各種概念所主導 (Foucault 1986)。因此，傅柯的許多概念都含有豐富空間與地理隱喻：位置、換置 (displacement)、間隙 (interstice) 位址 (site)、場域 (field)、領土、地理政治——這些空間化的概念由後殖民批評家 (倘若沒有間隙，他們會在哪裡?)，如費邊 (Johannes Fabian) 之後的後殖民人類學家，以及寫《殖民空間》(Colonial Space) 的諾伊斯 (John Noyes) 之類的歷史學家進一步發展 (Fabian 1986: 78; 1991: 198; Noyes 1992: 52)。

相較之下，傅柯的著作裡明白討論殖民主義或種族的部分實質上是缺席的 (Young 1995b)。傅柯很奇怪地不願多談在這些場域裡權力如何運作的問題。史托勒 (Laura Ann Stoler) 曾挑戰這種缺席的說法，她試圖把梳傅柯的「生命權力」(bio-power) 概念所隱含的意義來解釋殖民種族化實踐的歷史 (Stoler 1995)。而傅柯自己對這些議題的沉默頗令人吃驚。事實上，他的著作似乎十分謹守歐洲中心論，以致你會懷疑是否有其刻意營運的策略：畢竟，請想想這些背景脈絡：沙特、法農與阿圖塞的巴黎，法國在1954年奠邊府留下創傷的敗戰<sup>譯註1</sup>，阿爾及利亞的

譯註1 這場戰役發生1954年越南北部的奠邊府村，是始自1946年的第一次中南半島戰爭中，法國與越南間的最後一場戰役，以法軍的徹底失敗並從此退出戰場告終。

獨立戰爭，1950與1960年代的民族解放運動，更甬提他自己曾到巴西，盤算著要搬到薩伊（Zaire）、以及最重要的是他在突尼西亞定居了兩年。

事實上，傅柯撰寫《知識考掘學》時，正是他居住突尼西亞的時期。書中的觀念是他在1966到1968年期間，在任教的突尼斯大學所發表的演講發展而來。他居住在名為希底布薩依德的小村子裡，在早晨好幾個小時專注獨處的時光裏專心思索，撰述這本書。他也目睹了1967年的以阿戰爭時期裡支持巴勒斯坦的激烈示威遊行，後來在1968年3月演變為學生對布爾吉巴（Habib Bourguiba）政府<sup>譯註2</sup>的反對運動，同時也預告了同一年5月巴黎發生的事件。傅柯與一些學生運動分子頗有來往，同時也因此接觸到他們把托洛斯基模式與毛澤東模式的馬克思主義變成十分激進的形式。因為這些參與，他開始重讀馬克思、盧森保、和托洛斯基的《俄國革命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Miller 1994: 171）。傅柯後來說道：「對我來說，突尼西亞在某個意義上象徵著一個契機，我重新將自己嵌入政治爭議。」就像他的傳記作者所傳譯的：「正是在突尼西亞的這些經驗，一個在言論上更富戰鬥性格的傅柯得以出現」（Macey 1993: 204, 206）。在突尼斯以及之後在巴黎發生的事件堅定了傅柯這樣的信念：「假使一個人有志於從事有政治意義、有用途、有效益的歷史工作，那麼唯有當此人以某種形式參與此一領域所進行的鬥爭才有可能。」（Foucault 1980: 64）

同時，在一個後殖民的國家裡工作，讓他能在遠離法國的情況下更順利地發展出看待法國文化的民族學觀點。對傅柯而言，民族學唯有在研究自己的文化時才有用：他認為把民族學運用到研究其他文化就和人類學一樣，基本上是誤解的結果。在《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的結尾，他提到民族學是一種以相同性的假設為依據的結構科學，也正是這個特點使它能夠「以純理論的方式與其他文化產生連結」。因此，民族學容許各文化之間有一種比較同源性（comparative homology）：

西方理性（ratio）有某種位置，這是在西方的歷史裡被打造出來，提供它和其他社會產生關係的基礎……顯然，這並非表示殖民的情況就是民族學不可或缺的……但是……民族學唯有在歐洲思想具有歷史上的統治權——永遠克制的，但永遠現身（present）——以及歐洲思想和其他文化面對面時產生關係時，才能承擔其適當面向。（Foucault 1970: 377）

傅柯在此暗示，民族學並不一定要仰賴殖民主義的權力關係，但它的確需要「歐洲思想具有歷史上的統治權」。做為一個在學科上實踐的知識，它為了自身的存

<sup>譯註2</sup> Habib Bourguiba 帶領突尼西亞建國運動，於1957年建立共和國，並任總統長達30年。

在而仰賴歐洲霸權的權力關係。民族學製造出一個普遍的模式來解釋文化如何組織與界定自身，因此對傅柯來說，它並非討論其他文化的特殊差異，而是在討論這樣的差異如何遵循著一個根據歐洲思想制定的理論模式做為基礎。也就是說：

民族學……避開任何文明裡的人們在語言中對自身、對自己的生活、對自己的需要以及意義（signification）的再現；……民族學所看到的是在那些再現背後，讓人們能履行生活機能的規範，他們所體驗以及維繫各種需要的種種規則，一切他們所被賦予的意義的背景下的各種系統。（ibid.: 378）

在《事物的秩序》——他的這本《人文學科的考掘學》（*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sup>譯註3</sup>——的結尾，傅柯稱民族學與心理分析是通泛的人文學科之基礎。他認為民族學應該依據他的觀點來描述——不是在研究沒有歷史的社會，而是研究「如何形塑既存文化體系的各種無意識的過程」。民族學適當的用處不在於研究其他文化，而是在發展巴巴為後殖民批評家所界定出的主要任務之一，即「對西方從事批判性的民族誌研究」（a critical ethnography of the west）（Bhabha 1991: 54）。《事物的秩序》本身代表著一個民族誌研究，其研究對象是傅柯一直特定地描述為「西方知識體系」（Western episteme）（Foucault 1970: 378; cf. Honneth and Jonas 1988: 131）。雖然《知識考掘學》裡完全是方法論上的討論，但它仍是對歐洲權力的制度性實踐進行民族誌研究的最佳範例之一。

因此，突尼斯（Tunis）確實有助於傅柯強化他以批評的眼光去觀看法國文化。在政治方面，突尼斯也提升了傅柯對三大洲政治運動的參與，這樣的參與一直持續到他生命的最終那一刻。相對地，在學術領域中，他對這類議題大多保持著審慎的沉默，因此也招致眾多的批評，指責他具有歐洲中心主義的傾向（Said 1986: 149-55; Spivak 1987: 210）。傅柯對民族學研究其他文化的歐洲中心主義頗不以為然，這種不採信的態度顯然是造成這個矛盾的因素之一。在個人的層次上，他本身是沙特之後的哲學家，在政治上最積極的一位，他與沙特——這位當代法國在三大洲議題上主要的發言人——的公開爭論無疑地也讓傅柯更不願意在這個領域裡與之競爭，進行公開介入（Satre 1971: 110 Caruso 1969: 109; El Kabbach 1968）。事實上，他之所以搬到突尼斯，一部分的原因也是想遠離巴黎大眾興致勃勃地看待他們的爭辯。他定居在突尼西亞有不同的作用：首先，對於比較有效力的西方民族學研究，以及它的權力機制有了批判的距離；其次，使他重新反思著作中「他者」、異己的概念，變得更加激進。結果就是不同於他在較早期《瘋顛與文明》裡發展出的思潮，傅柯開始否定他者被隔離生存的可能性，也否認他者可能歸於沈默。在他批

<sup>譯註3</sup> 即《事物的秩序》的副書名。

評《瘋顛與文明》的主要論點時，《知識考掘學》標示傅柯在思想上重要的轉折。

398 傅柯早期的著作為「沉默考掘學」提供了理論模式，藉此重新拾回薩依德的東方主義裡所排除的：他者。從主體的社會生產來看，傅柯的《瘋顛與文明》（1961）是一個奠基型的研究，探討社會如何生產出排他的形式。傅柯自己把《事物的秩序》描繪為一段關於類似與雷同、關於將他者併為相同的歷史；但是，他說《瘋顛與文明》裡所談的是關於差異以及排拒異己性的歷史。

瘋顛的歷史是關於他者的歷史——對一個特定文化，他者身在內部，又同時是陌生異質的（interior and foreign）因此要被排除（以便驅除內部的危險），但卻是藉由阻絕的方式（以便消滅它的他者性）（Foucault 1970: xxiv）。

一如我們所之前所談見，薩依德的東方主義就是以這樣類似的方式描繪東方的表面知識系統，但在這個系統中來自這個東方的「他者」卻從未被允許，或被邀請發言：東方的他者毋寧是一個幻想與建構的對象。在後殖民批評家之中，有關東方主義論述的再現後來之所以有了平衡而不再偏頗，是因為他們轉而注意被再現所遺漏或排除的真實，這也就引發整個運動轉為致力於為那些被噤聲的底層階級找回他們的歷史：包括以底層階級、被宰制或邊緣化的群體而發的客觀的歷史及其「抗歷史」（counter-histories），以及將殖民主義與宰制的主觀經驗做為訴求的歷史。這顯示他們絕非「他者」，問題出在東方主義的論述是根據二元化的（binaristic）邏輯去呈現他們。傅柯的論述概念修正了早期異己性的討論，沒有根據這個具排他性的機制而運作。

## 二、傅柯談論述

傅柯在《知識考掘學》所闡釋的論述理論，與語言學中的論述理論截然不同。相較之下，傅柯強調構築事物的知識時，或是在建構知識中，論述所扮演的角色是形成科學性學科的一部分，例如規範背離（deviance）、心理疾病或性特質（sexuality）等論述範疇的創造，透過各種論述，社會得以組織起來。這是他最為人知的論點，事實上薩依德在《東方主義》裡所援用的也正是這個部分。然而，傅柯的論述與論述實踐的理論遠遠超過薩依德所引用的，我們必須說他並未使這理論變得較易懂些。如他所揭示的，嚴格說來，他的論述理論並非是一項理論，毋寧應稱之為一「進行描述之一貫領域」（coherent domain of description）（Foucault 1972: 114；以下有關《知識考掘學》的徵引將只以頁碼表示）。傅柯排斥規範性範疇、概念以及分析形式，不可避免地使他的論述理論神秘難懂，最主要是因為他在整個

過程中不斷精煉、限定、修正自己的論點。傅柯最激進的論述概念根本不採用任何形式的文本主義、文本唯心主義（idealism）、把文本當成脫離具體事物的人為產物（disembodied artefacts），也拒絕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而是偏向每個面向中的語言的物質性的概念。傅柯想將語言的每個舉動（act）——包括書寫的或言說的——視為一個歷史事件、單一性裡獨一無二的一點，並追溯它如何與物質情況互動與互相關聯。因此，他的論述概念透過其他概念而更加精鍊，而這些概念也讓我們更清楚瞭解這個論述概念大部分與傳統上的文本上觀念迥異。論述指的不是句子、命題或再現，也不是根據任何心理學上、邏輯上、文法上的範疇而組成或結合。傅柯的論述並不是建立詮釋的文本體系，以便探討文本中常見的主題或概念、語言或意識形態、意義（有意或無意識到的）或再現。他主張的是，論述的分析「避免」所有的詮釋。

399 傅柯認為，論述基本上是知識被建構為特定實踐一環的方式，而實踐的知識形成是在語言與物質世界交接的共界面（interface）。因此，醫學或精神病學試圖建立的知識就是那種在語言與身體的互動場所運作的知識。大抵而言，知識並非以論述形態被含納，而是存在語言和其他的物質性真實之間的邊緣。論述是一個邊界的概念（border concept），是一個穿越知性與物質的界線的跨文化實踐，這不但是因為從實際的觀點來看，論述裡的知識將成為日常實踐的一部分，也是因為物質條件也將在知識的概念形構過程中運作。因此傅柯分析知識的形式，但這種知識從未被視為是抽象、脫離實體的：它從未變成普遍的「論述性場域」（field of discursivity）裡的一部分，就像拉克勞（Laclau）與莫芙（Mouffe）所研究（1985）的那樣。知識是在概念與物質性的接觸地帶的空隙中運作。他的分析之所以困難——這也是它的價值所在——在於他極力想將論述描述為一物質的、歷史的存在實體（entity）。語言可以只從文本的美學觀點考量，而知識也可以從哲學的抽象、超驗的領域思考，然而論述卻是在物質性與身體的範圍裡，在物體與具體的歷史實踐的領域內產生作用。

《知識考掘學》的續集原本計畫分析歷史論述之形式，不幸的是它並未完成。但是在《知識考掘學》裡，傅柯所感興趣的並非抽象的概念與其歷史，而是醫學、精神病學、懲罰、結算等概念如何做為物質性實踐（material practices）的一部分。他將論述形成視為是分析規訓與規訓性實踐的方法，這與一般所理解的《東方主義》、殖民論述有十分明顯的差異。東方主義乍看之下似乎與傅柯進行的那種規訓性、制度性分析有些類似，它涵蓋一套知識體系而且具有共同的概念領域（conceptual terrain）。然而重點是，在薩依德所描述的東方主義，原先是做為一個想像的、學院內的實踐而發展的，是涉及錯解真實事物的一種再現形式。這當中隱含著意識形態與真實之間的區別，或是意符—所指之間的區別，而這正是傅柯明確

排拒的。事實上，薩依德對再現問題的強調使他避開所有對論述做為一種物質性力量的強調。而傅柯所關切的是知識如何被運用，成為物質性實踐的一部分或功用。400 薩依德的主張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東方主義的確包含一種脫離具體事物的知識，一種可以先於任何東方的物質經驗而發展的再現。他認為東方主義的學術知識不但使後來殖民主義的發展成為可能，同時將東方主義的知識付諸實踐。他的確強調並廣泛地提及東方主義論述中機構建制化的架構，但卻從未把它當成一種物質性實踐來分析，這造成一些問題，不單是因為這麼做暗指錯誤的再現雖然面對它所扭曲的真實，卻仍能有效地運作下去，也是因為這就是薩依德與傅柯的分析的根本差異，因為傅柯認為論述絕對不是發聲在與真實有互動之前，脫離具體事物的想像性再現；反之，論述的形成往往就是知識在物質世界中，或是根據物質世界而作用之際。論述是已經創造出歷史的語言。

### 三、論述形構

在《知識考掘學》裡，傅柯透過概念的設置 (conceptual apparatus) 來發展他論述的模式，而這個設置本身的界定又是根據一系列複雜的專有名詞：論述形構 (discursive formation)、陳述 (statements, 法文為 *énoncés*)、陳述過程 (énonciations, 法文為 *énonciations*)、論述實踐、檔案 (archive) 以及考掘學。這些新造的或重新定義的詞彙的用處在於使他的描述更加明確——只有單一意涵 (singularity)，讓大家對於什麼不是論述的理解，能夠和對於什麼是論述一樣清楚。他曾說論述一詞本身是非常模糊且流動的——傅柯寫《知識考掘學》以界定其意義，但他也承認最終他仍以多種方式使用這個詞，

有時將它當做所有陳述的通泛領域，有時當做各種陳述可被單一化的群組，還有時又當成說明某些陳述之管制性實踐 (regulated practice) (80)。

頭兩種用法符合一般的使用，而第二種描述是薩依德之後的殖民論述時常被認定的意義，而最後一個涵意才符合傅柯的分析性描述。論述是說明被管制、規矩化的實踐。它並非含納一切、無所定形的範疇，既不是同質的也不是統一一致。論述毋寧是由傅柯所形容為四散的陳述所構成，雖然以位置的角度來看是擴散、到處播撒的，但仍構成一規則性 (regularity)。《知識考掘學》中大多在討論四散的要素如何扣連為一論述形構，一種「由各種系統性所形成的具有極高稠密性 (an immense density of systematicities)，且由多重關係所組成的緊密體」(76)。

傅柯拒絕直接將論述的形成看做是由各種不同的陳述所組成，以為它用來描述

同一事物、同一風格、樣態或概念系統，或認為論述可以發展成具有主題性的連貫 (thematic continuity) (這恰好也就是大多數的人所認為的「殖民論述」)。即便我們所考量的是醫學、經濟學或文法等熟悉的論述，它們的對象、針對它們所做的陳述、它們的概念與關切的主題完全是異質的、在不同的層次上運作，同時不具有任何通盤統一的邏輯結構。因此，傅柯所追求的是將論述放在功能性的層次上，依據 401 某些策略的可能性好讓各種不同群組的陳述中各種不相容元素能夠相互作用。傅柯並未使用他認為當代過度確定的詞彙，像是「科學」、「意識形態」、「理論」來描述這些「四散的系統」，他反而發明了「論述形構」這個詞彙。薩依德以不同的方式使用這個詞彙來描繪他所謂的「整體的文本建立出其論述形構——如東方主義」(Said 1985: 23)。

傅柯將論述形構界定為「屬於單一論述系統」的一組陳述所依據的「四散與再配置的原則」。論述形構並非同質的，也沒有預設歷史或地理的延續的一致性。論述形構的形成是因為它們共有特定的「規則性」，才能使其中元素的存在與修正 (modification) 有了得以辨認的條件。傅柯詳盡地以四章的篇幅闡明他所謂的「形構法則」(rules of formation) 的功用。這一點特別重要，因為這些規則性構成某一特定論述的元素形成所根據的存在條件。所以，論述的形構 (可以用回溯的方式加以界定) 並非藉由援引相同的對象或是相同的一組構念或再現，而是藉由某些更加抽象的東西，也就是某些法則、條件，然後運作、形成它所建構的對象或概念。論述的規則性在對象形成、陳述過程的功能，以及概念與策略形成的層次上運作。論述分析的工作即在指認這些條件。

### 四、陳述

對傅柯來說，論述的物質性是由個別的「陳述」所構成的。傅柯所謂的「陳述」(*énoncés*) 所指為何？做為整個論述理論的樞紐，「陳述」是最困難的一個概念。唯有巴巴 (1994) 完整處理傅柯對「陳述過程」(énonciation) 的見解，並將它發展為獨特而具有理論與歷史洞見的工具。對英語世界的讀者來說，法文裡因 *énoncés* 與 *énonciation* 的差異所引發的問題，在英文裡並不存在。在《知識考掘學》的英譯採用 statement (陳述) 與 énonciation (陳述過程) 以資區別。我們可以加註說這兩者分別為陳述的動作/陳述的內容，或是言說表述 (the saying) / 表述的內容 (the said)。其實我們很難將二者截然劃分清楚，尤其是傅柯自己也曾將兩者的意義交替使用——或是他自己也搞混了。這兩者構成了論述事件的兩個方面，做為個別主體以及做為歷史行動而共同運作，而在他寫作《知識考掘學》期間發表的一場演說裡，傅柯認為將此項研究描述為 *deixologie*——此字由語言學的指示語

(deixis) 理論及發聲 (enunciation) 所鑄成的新字 (Macey 1993: 507)。

402 傅柯試圖釐清的是在此脈絡下，陳述絕不只是文本或一段語言而已。陳述本身構成了一特定的物質事件、一個展演性 (performative) 的行動或功能，一種影響情勢或切入情勢的歷史性爆發 (eruption)。因此，它的效應基本上具有不連續性，有一種指示性介入 (deictic intervention)，會造成改變，但它也與規則性之間有一種生產性的張力。它涉及語言，但卻不可被化約為語言，因為語言也是情勢中的物質情境的一環。舉個例子來說，陳述就如一個演說題目被宣布為「即將宣布」(to be announced) 時，這樣的陳述就是允諾題目將會公告周知，這本身不但是個事件，同時也提供了訊息或評論——這正是傅柯所謂陳述的性質。論述的構成不但包含事件與事物的陳述，同時也包含一段段的語言。此一類的陳述是向國會或新聞界所做的公告：是一項宣布，本身是一構成新聞的事件，必然攸關整個更大的情勢，同時會衝擊這些外在情況；陳述即被這些情勢所制約，但隨後卻又形塑這些情勢。一項新聞陳述一方面代表切入一論述場域，同時也是構成新聞的事件。

我們也可以想想警方是如何使用「陳述」這個詞彙：有人對警方做一陳述，是因為有一系列的情況，並且有法律的邀約，所以能被放置在陳述者的位置。因此，成為法庭上有形的物質證據的陳述並不只是一組字詞而已：陳述的決定因素是它所處的外在情況，為什麼有如此情況，而它是如何運用這些情況。因此陳述的功用就是做為機構性設置 (institutional apparatus) ——法律——的一部分，而且不可與此作用分開。雖然產生陳述，或者使陳述得以成形的每一個特定陳述過程仍然是獨特的，而且是單一的事件，但其陳述內容則可以被引用、重覆並和其他陳述連結。陳述以及和它相關的各種證據形式由來自不同範圍的可能證據所建構，其位址的範圍廣泛，可以是四散各處的陳述，以及所有種類的文件。它們之中並沒有內在的一致性，也不是由單一的作者所發，更不是某一種意義的表述。因此，論述是由多種的、異質的陳述所構成的，這些陳述雖然在形式上都是語言，但它們本身是語言與世界互動之下的產物。

以法庭的陳述做的類比告訴我們，法律文件、警方陳述、證人證據等之間存有一個核心，所有這一切的形成都根據機構性設置的約束，並且在構成法律一環的法律論述中被援用，它本身也由議會制定的法案及先前案例所構成。其他文件將被援引為證據，也會和那個重要的核心有所關聯，但它本身也是根據其他的情況與限制構成（例如，一封書信、傳真、電子郵件，電話中的交談、信用卡帳單以及小說）。其中有些會被接受為證據，有些則不會；有些已構成法律機器中的一部分，但有些是在非常不同的情況下形成，與在法律論述的關係中僅占不著邊的地位。如此一來，論述將引入的元素雖然不是由這個論述的需要來決定，但是這些元素構成了它物質性實踐的一部分，並且依據論述的規則被帶入它的領域。因此論述的界線

403 將是可滲透的，但這並不會破壞它自身形成規則的一致性；它反而強化了任何論述與語言、事件與情況，甚至與其他論述不斷維持互動的狀態，成為它本身運作中內有的一部分。傅柯使用「實證性」這個詞來描繪陳述的模態 (modality)，它的存有 (being) 形式、存在的狀況，也就是「糾結團」(tangled mass) 的語言陷入物質世界的功用中——此概念預示傅柯後來在《性史》裡描繪權力時所使用的「配置」(dispositif) 觀念。薩依德自己也曾援引，但薩依德的使用並非為了描繪物質—語言之間的互動，而用來描述他所謂的「潛隱的東方主義」(latent Orientalism)，而他特別將之形容成非物質性的：「幾乎無意識（並肯定是摸不著）的實證性」(Said 1985: 206)。

## 五、規則性、陳述過程的模態與對象的構成

傅柯說：「論述是一複雜而有區別性的實踐，由一些可分析的規則與轉變所支配」，在《知識考掘學》裡，他花了很多篇幅將這些規則的形式加以概念化，說明它們如何運作成為論述形構的結構——相對於對象的構成（本書論點裡最為人所知的部分，也是薩依德援引的部分），乃是個人被授權的方式，取得與陳述相關的位置，在特定的機構建制化位址 (institutionalized sites)（「陳述過程的模態，陳述過程的功用」）援引論述，以及概念如何出現，在論述形構中如何擁有理論與實踐的選擇（「策略的形成」）。在這些詳盡的說明過程中，傅柯強調論述是在變動與轉換的不穩定情境中運作；論述的對象很可能是互相矛盾的。

404 在各種論述形構的規則中，那些「陳述過程的模態」以及概念的形成尤其影響深遠。首先，構成論述中一組組的關係群組的性質可以從它主體的觀點來瞭解；從論述分析的觀點來看，主體的問題可總結為「誰在發言？」在整體的發言者中，是誰被授予權利使用這種語言系統 (langage)？換句話說，誰擁有機制上、法律上以及專業上的地位，讓發言者能占有這個論述位址？傅柯以醫生擁有的複雜地位為例：他的資格、他所隸屬的機構所代表的權威、法律上的認可，以及授權他工作的種種條件。這也包括「那些可能被稱為是歸屬『書檔』(library) 或文件的範圍裡的東西，不單是書籍與被公認是有效力的論文，也包括了所有觀察報告、出版或傳發的個案歷史，以及可公共機構、其他醫生、社會學家與地理學家……所補充的……眾多統計資料。」(51-52) 除此之外，醫生依據他各樣的專業活動就有不同的位置：他將是位提問者、觀察者、詮釋者、開處方者以及諮詢人員。因此像臨床醫學這種嶄新的科學論述並不僅是一種新的觀察技術的建立，同時更是一個新關係建立的產物，這種新關係是在一系列獨特而歧異的元素之間而產生，有些是內在於此學科的概念中，有些則與參與者的專業地位、機構位址以及主體位置等議題相關。在

它的實踐中，臨床論述不斷運用不同的異質關係體系，其中陳述過程的模態不斷在變化。陳述過程各有不同的類型，對於必須採取一連串主體位置的個別的主體造成四散的效應：「各種不同的陳述過程的模態顯現出他的他的四散」。將這些四散的陳述過程連繫在一起的並不是個人的意識，而是論述實踐的獨特具體性（specificity）。

因此，論述的分析所關切的不是回溯至個人主體經驗中的特殊真理，而是將論述視為一表達個人意識的場域，傅柯宣稱說他自己將

尋求一個為各種主體性位置而生的規則性場域。這麼看來，論述並非宏偉地揭示某個思考、知道、或發言的主體；相反地，論述是一個總體，藉此其中主體的四散以及和它本身的不連續性才可能被決定。它是一個外在的空間，各種獨特位址所形成的網絡在這個空間中布署。（54）

因此，論述建構出一種統合的力量，形成「一個匿名的場域，其中的結構形態（configuration）界定發言主體的可能位置」（122）。就像麥肯涅（McNay）所觀察的，傅柯並未提供一套方法告訴我們哪些主體何以取得這些位置，而哪些則不能（McNay 1994: 77-9）。儘管如此，他的模式也沒有排除分析或凸顯社會授權（social authorization）的形式與步驟，不論決定這個社會授權的因素是性別、階級或政治地位。

## 六、論述的異質性

在所有各種活動、關係、主體位置、位址、授權形式當中，只有論述像一個系統性網絡的運作，將它們連結起來，也由此構成占據這個論述場域的對象。一個論述很少就是一整套具有邏輯完整性或融合一貫的整體性概念；而且，論述的概念並非靜止不變，而是永遠在變化，永遠處於轉變的狀態中。論述的形構不是在本質上具有單一性或唯一性；一個論述很少就是一整套具有邏輯完整性或融合一貫的整體性概念。論述是片段的、四散的、不完整的。論述是異質的，不均衡的：此外，論述的概念並非靜止不變，而是永遠在變化，永遠處於轉變的狀態中。傅柯認為「在相同的論述實踐裡，人們有可能持相反的意見、做出相反的決定的」。在構成一特定的實踐時，所有各種活動、關係、主體位置、位址、授權形式當中，只有論述像一個系統性（雖然也是衍射的）網絡的運作，將它們連結起來，也由此構成占據這個論述場域的對象。譯註<sup>4</sup>論述形構是相異的實體或活動之間的一組關係（a set of relations）所帶來的產物，它不是以隨意做表面上的文本組合，而一個結合性的產

譯註<sup>4</sup> 此段在原文中重複處甚多。

物，由高度四散的機構位址、作用、活動與主體等組成。在特定論述的場域裡運作的一組組規則是在一種「前概念層次」（a pre-conceptual level）上如此進行。

這前概念層次的組成就是在某一特定論述領域內運作的一組組規則——不只是在個人的心中，也在論述本身中：「因此，這些規則組有一致的匿名性質，在所有在這個論述場域裡進行發言的個人身上運作。」這些論述規則性與限制並未（在此要對不起薩依德！）因而產生一致性，反倒可能帶來「概念的異質多樣性，除此之外，甚至可能帶來豐富的主題、信念與再現，這些都是通常撰寫歷史上的思想時所必須處理面對的」（63）。這麼一來，論述分析建立了界定「表相場域」（field of appearance）的規則性，並建立了在運作中的實踐基礎。傅柯所再次強調的就是論述不只由四散的陳述所構成，而且，即使成為一特定的論述，它也絕不是同質的：

吾人在處理各種不同類型與層次的事件，陷於獨特的歷史網絡中；建立陳述過程時的同質性絕非意味著在過去數十載，或是未來的世紀的人們，說的或想都就是同一件事；也不意味著界定其他一切據以衍生的許多原則的定義——不論是明言的或是隱含的——乃是不可避免的結果。（146）

傅柯這段話顯示他的論述概念和薩依德在《東方主義》裡闡述的觀念幾乎完全相反。他認為「陳述過程中的規則性」是一種「內部的階層架構」（interior hierarchy），以樹狀的結構發展，而「支配的陳述」（governing statements）就是它的根，但在樹枝的部分發出不同活動的嫩芽來（147）。在一個論述中，雖然是通泛的場域——具有「可觀察結構的定義，以及可能對象的場域」——是以支配的陳述來運作，但所有的策略性選擇——其中有很多彼此迥異甚或完全不相容——則在邊緣地帶發展。

如果將論述形構的分析看成是想要做一種統合一切的分期（totalitarian periodization），以為某時刻或時代的每個人儘管表面上有差異，但還是以同樣的方式思考，透過一種多形態的字彙說同樣的事，並製造出一種能放諸四海的大論述，如果是以這樣的角度分析就大錯特錯了。

除此之外，論述本身是由與其他論述的關係所構成，所謂龐大、表面平順的單一普遍化論述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反而是變化多端、截然不同的陳述系統。傅柯將它們稱為「檔案」（archive）。

因此，論述的統一性不在其概念、再現與主題，而在它底下的規則系統。論述實踐在其他異質的物質性要素（「機構、技術、社會團體、感知組織、各種論述之間的關係」）之間建立互動的關係（72）。儘管這關係具有決定性，但卻不是沒有彈性；尤其，傅柯強調它的彈性讓它成為轉變的歷史過程裡的一部分：

這些形構系統絕對不能被視為不變動之物塊 (blocks of immobility)，由外強加於論述的靜態形式，一旦界定就永遠成為它的特色和可能性……一個論述形構……所扮演的角色並非將時間封鎖，而後將之凍結數十年或好幾世紀；論述形構決定一個適用於時間 (temporal) 過程的規則性；它所呈現的是在一系列論述事件與其他系列的事件之間的扣連原則，其中的轉變、變形與過程。論述形構不是一種非時間性的 (atemporal) 形式，而是幾個時間系列之間的對應基模 (schema of correspondence) (73-4)。

只是因為論述具有決定性，並不意謂它的決定性是固定不變的，也不表示論述不受歷史與時間轉變的影響。同時，也不要求每個人都採取有相同的位置或立場：傅柯寫道：「我的目的是要彰顯其中差異的內涵，以及在相同的論述實踐裡，人們如何可能談及不同的對象，持有相左的意見，做出相對立的選擇」(200)。

## 七、《性史》裡的論述與權力

在《知識考掘學》中闡釋的論述之特質在隨後的《性史》(1976)裡再次重申，傅柯在裡頭這麼寫道：

我們必須將論述視為一連串不連續的片段，這些片段在技術上的功能既不一致也非穩定的。更精確地說，我們不可將論述的世界想像成被二分為被接受的論述與被排除的論述，或是主導的論述與被支配的論述；而是視之為具多樣性的論述元素，能在各式各樣的策略上操作。(Foucault 1978: 100)

根據上述觀點，想要再現被東方主義論述所噤聲與排除的「其他聲音」，所有這樣的嘗試都犯了概念上的錯誤。傅柯的論述排除所有有關發言主體的考量。對傅柯來說，論述是一個途徑，一條藉以脫離當時因循傳統的思考方式，因為這些思考都是以書本、作者、學科訓練的一致性的角度出發，或者從那種以人類主體為基礎的歷史哲學或人類學的範疇（不管是作者或發言主體的）思考。論述有效地「去主體」(desubjectifies)，排除整個心理學領域。因此，論述分析要做的與重拾底層階級的「聲音」，扣連主體經驗（即他所謂「活生生的豐富經驗」）等形式的嘗試恰好相反。論述並無涉於經驗的直接再現或錯誤再現。後殖民書寫以被殖民者的主體聲音對抗殖民者客體化的論述，對於這樣的見解和努力，傅柯的論述代表一種直接反對的立場。

正如權力與對抗必然是彼此互相交錯重疊，論述也產生許多去穩定的效應：

我們必須考量到這是複雜而不穩定的過程，藉此論述才能成為權力的工具與成果，同時又是權力的阻礙、它的絆腳石、對抗點，甚至是反抗策略的起始點。論述傳送並生產權力；它強化權力但同時毀損它、揭發它，使它變得脆弱，並可加以阻撓。同樣地，緘默與隱秘是權力的庇護，將種種限制禁令安置其中；但此二者也鬆綁了權力的箝制，提供了一塊相對朦朧的容忍地帶 (Foucault 1978: 101)。

這種賦予論述較有彈性、異質的說法顯示傅柯比較謹慎地處理他在《瘋顛與文明》所提出的，早先德希達就質疑他有關於含納／排除 (inclusion/exclusion) 的辨證 (Derrida 1978: 31-63; Foucault 1979)。結果是他否認有宰制／顛覆的範型的存在：

並非這一邊有個權力的論述，就會有與之對抗的另一個論述。論述是力量關係的場域裡中運作的技術性元素或是障礙；在相同的策略下可以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論述；反之，論述可在不改變其形式的情況下，從一個策略移到另一個相對立的策略。

用古哈的話來說，權力透過一種「無霸權的宰制」起作用的，而「底層階級研究」的歷史學家所成功運用的正是權力生產的這個特性 (Guha 1997)。對傅柯而言，權力既不是意向性的 (intentional)，也不會被完全實現；它毋寧是「一種多重且具動態性力量的關係所形成的場域，因而產生的宰制效應影響廣泛，但絕非完全是穩定的」(Foucault 1978: 101-2)。《性史》的論點更進一步的指出，壓抑其實無法達到制約，它會產生全然相反的效果，甚至引生豐富多樣的論述。這一點所隱涵的意義是，殖民宰制與壓迫絕對無法使任何人噤聲不語，反而讓底層階級論述產生多樣的面貌——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在許多例子中，他們陳述過程的位址與論述的形式，不同於殖民主人的位址和形式 (Bolton and Hutton 1995)。在其他一些像反殖民主義的例子裡，底層階級的論述則成為「抗論述」(counter-discourse)。對傅柯而言，底層階級不得不發言。印度寡婦自焚陪葬的例子告訴我們，可以有「抗論述」，但要在特定論述設置 (discursive apparatus) 的限定之下，只有特定的底層階級才被授權發言。這並不代表在其他不同組成和不同機構下運作的其他論述中，底層階級也無法發言。

## 八、傅柯模式的殖民論述

如果我們考量稍早討論的關於殖民論述的一些問題，可以發現若根據傅柯的模式來發展殖民論述，將不會對大部分的反對批駁顯得那麼不堪一擊。歷史性的問



題，對殖民論述去歷史化的異議，或認為殖民論述製造一種文本化的歷史；再現以及再現和真實之關係的錯綜問題，指責殖民論述的單一同質性凌駕歷史與地理差異的特殊性，以及獨大的論述造成決定性影響及單音的力量所帶來的問題，所有這些問題都不適用於傅柯原初的模型。

同時，根據傅柯的原則所敘述的殖民論述，迥異於以殖民論述為名的大多數研究。殖民論述分析不再把殖民主義當成是主要的知識及再現的結構，也不是去詮釋任何與殖民主義的關係老舊而且不著邊的本。事實上，從傅柯模式的觀點來看，所謂「殖民論述分析」怪誕之處就在於它把論述當成是主要的分析對象，而不是引用論述來分析一特定實踐——在此就是指殖民主義。當然，也有可能根據殖民主義的論述形構來分析它，但仍必須將殖民主義的論述場域視為一歷史實踐，認定殖民主義也包含了政治活動與組織在內，這些活動與組織會發展出自己的知識形式，成為宰制與剝削行動的一部分。我們必須從殖民主義在歷史上之崛起看待論述的陳述，將它視為一個根據連續的統轄政體而運作的特定實踐。殖民論述將必然不同於傅柯所分析的醫學或精神病學之類的論述。首先，它並非是專業的論述，不是一種學科的，也不是自我建立起的知識體系。然而，殖民主義的確產生出一些特殊的實踐，而這也使得要在一場域中討論它的多樣性變得很具挑戰性。是什麼使它連結在一起？它出現之際有哪些表象？什麼樣的一組規則才適合它的論述實踐？它如何安排它的對象？不同國家的殖民實踐是否以不同的殖民論述運作？

這樣的殖民論述將不涉及一般所理解的文本分析；相反地，它把殖民主義的論述實踐視為侵占與統轄的一種物質形式。殖民主義做為一種實踐是在知識與物質文化的共界面運作的，它的運作從歷史與地理的角度來看，是高度分散、相互矛盾、異質的。它的論述形構很有可能也是同樣地異質，並且因為需要回應特定事件而產生連續性的轉變（例如，1857）。我們不會試圖去詮釋這些論述以便揭露它們潛藏的心理意義或所謂的帝國的無意識（imperial unconscious），而是為了找出統御其中情況的可能性的規則，然後形成陳述過程，並且使特定的陳述過程得以產生。

409 就以英國為例，這包含整個宗主國機構位址系統中的整套關係：「殖民部」（Colonial Office）、「印度事務部」（India Office）、國會、新聞界、與殖民利益相關的各式各樣的特許公司及工廠、海麗貝利（Haileybury）與牛津之類的教育機構、宗教組織、帝國會議等；而在殖民地中，總督府（Government House）以及整個行政、軍事、法律、刑罰、商業、醫療、宗教、教育等機構。大量的陳述都是從這些位址發出，包括國會發言、公告、法案、法令、條例、地方議會的命令、條約、文件、指示、電訊稿、執行說明、決議、貿易協定、書信、文書記錄、備忘錄、議事錄、編年史記載、決議、請願書、演說、記事、報導，以及殖民地總督、地方行政官員的官方日誌、外交上的交涉記錄、關於殖民治理與移民出境的文字記錄等。

英國的殖民主義做為一實踐是異質而且迭有爭議，但它的論述規則性卻仍有待探究。傅柯式敘述的角度就是必須把焦點放在各類的陳述，考量它們在四散的「機構、技術、社會團體、感知組織」及其他論述（政府、商業、經濟、戰爭、法律、醫學、精神病學、人類學及語言學各種論述）關係所發展出來的陳述。因此，如果殖民論述與歷史相關，那它必然有關殖民主義的歷史實踐，但在這種情況下，這類陳述不需要與歷史扣連，因為它們已經是歷史過程、事件與策略性實踐的一部分。揭示殖民論述形構的陳述所產生的條件與規則並不代表殖民的論述形構是在歷史之外，相反地，它證明了傅柯所說的：

論述……自始至終都是歷史的——是歷史的一個片段，歷史本身之中的整體性（unity）和不連續性（discontinuity）。（117）

同時，殖民主義的文化與文學上的文本，例如一直被細心琢磨詮釋的《印度之旅》（*Passage to India*）、《所羅門王的寶藏》（*King Solomon's Mines*）、《金姆》（*Kim*），還有積蘊鄉愁的旅遊書寫、自傳、書信等，所有這一切到現在為止一直是殖民論述分析的主要焦點所在，將被移向邊緣當做一般實證性的元素。雖然文學文本或旅遊書籍的確可影響行政官員，但大致相當於在法庭上被當成證據而成為法律論述中的一部分的私人信件，都不是殖民論述本身的一環：文學文本或旅遊書籍與殖民論述只有在某個特定事件的那段期間才有互動。它應未曾受制於殖民論述的形成規則（它的形成毋寧更受到文學實踐的論述條件所影響），而且不會得到機構位址的授權，藉此取得合法地位——「正當性的來源與應用的關鍵（它特定的對象與證明的工具）」。文化與文學的文本在其與殖民主義的論述形構相關的範圍內，仍與它的陳述有關係，但必須歸屬於非官方、次要的文本體系來分析，以殖民實踐的物質、歷史、論述效果之一部分的形式而被生產出。這樣的觀點似乎令那些主要興趣在文學領域的人感到沮喪，但畢竟傅柯是位歷史—哲學家，因此會這麼強調並非完全讓人不感到驚訝。然而還有另一種正面的可能性：那些被列為次要的文本具有一個潛在的斷裂力量（disruptive force），因為它們是根據不同的規則而建構，因此將不會直接在殖民論述本身的內部之中運作。然而，這樣的分析要把焦點放在證明兩種形式的論述之間有辯證性的解構活動在運作，並不只是透過華麗的語言學抽象化，以及孤立於歷史和物質的方式，詮釋文學文本的豐富與含混多義性。殖民論述絕不是只涵蓋一套意識形態的（錯誤）再現（（mis）representations）：它的陳述過程永遠是做為歷史行動在運作，在殖民統治的高壓機制下產生特定的物質效應，殖民論述陳述過程的位址與權力的形成也同時在被殖民的從屬身上引發物質與心理效應。

剩下的有關理論性的議題就是傅柯以歷史物質主義與機構建制化的觀點敘述論

述事件，以及其他現有的唯物論的立場，尤其是馬克思主義觀點，兩者之間的差異。傅柯立場和德勒茲的著作一樣拒絕辯證法，以致於產生概念性的困難。弔詭的是，最具挑戰性的後殖民理論，例如巴巴與史碧娃克的著作，往往是因為兩股力量之間無法調解的張力而產生多種作用，這兩股力量就是將殖民主義當做權力知識的制度性展演論述，以及根據三大洲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性形構理解殖民主義。事實上，因為他們著作中的這種張力，這類斷裂性的扣連（disjunctive articulation）才能成為後現代理論本身的理論性核心。

## 28.

## 主體性與歷史： 德希達在阿爾及利亞

開始有了學校，只為了教導我們如何用他們的語言說「是的」。

薩利赫《北徙時節》(Tayeb Salih, *Season of Migration to the North*, 1969: 95)

### 一、再談《白色神話》

「假使我自己不公開說，我不相信有誰可以靠閱讀發現我是一個阿爾及利亞裔法國人」(Derrida 1998: 46)。確實如此，我也是因為寫《白色神話》(*White Mythologies*)時，才知道你是在法國入侵的百年紀念慶祝活動（這件事對阿爾及利亞人來說確實要慶祝）的那段時間出生於阿爾及利亞。你曾經一點一滴地談及你的童年回憶——你的「鄉愁」，雖然比起西蘇（Hélène Cixous）回憶她的「阿爾及利亞」簡短多了（Derrida 1985; Cixous 1998）。然而，那只是我唯一的線索，除了在1979年初見你時立刻明瞭你並非「純正血統的法國人」(*français de souche*)。還好，至少不是「呆頭」。即使在那時候之前，我已經知道有某種嚴肅的事情正在發生。即使當時我無法確知它來自何方，但它彷彿札札實實地給了我一擊。可以確定的是它在另外某個地方，它不斷製造出一種強烈的迷惘失向（disorientation）〔或者該說是去西方（disoccidentation）〕感。當時你訪問牛津，我們問你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你如何使用「西方」以及「西方的形上學」這些字眼：我們抱怨道：「『西方』這個範疇，以及從柏拉圖至今的哲學論述的連續性，都沒有在你的著作中闡述或證明。」你回答說，那種「被認為是西方哲學中西方的本質」的東西根本不存在，你也不相信西方哲學裡存在著連續性，你認為「西方哲學」的統一性只是個幻覺，是再現的效應所帶來的產物，是一種教條；你在你的著作裡總是堅持，浩繁文集（corpus）裡存在的是分裂、裂痕、不連續。「它是一種矛盾、衝突的結構，必須壓制那些嘗試從內外摧毀統一性的各種形式」(Derrida 1979)。20年後，你還是得做同樣的對抗（Derrida 1998: 70）。在牛津的那一天，你並未進一步談論「西方」這個字眼，但其間的關聯不難發現：

形上學就是重新組合、反映西方文化的白色神話：白人將自己的神話、印歐神話、自己的邏各斯（logos）——也就是他的理性（reason）的神話傳奇（mythos）——當成普世共通的形式，這個形式他們必然還是要將它稱為絕對理性（Reason）。這並非毫無爭議……白色神話——形上學已經將其本身所製造出來的荒誕情景抹去，儘管如此，這種荒誕仍活躍、仍舊挑動人心，它被白色的墨水銘刻上去，這種讓人看不見的設計蓋滿了羊皮重騰紙。（Derrida 1982: 213）

數年後，當我把《白色神話》的稿子寄給你時，你說我確實找到了穿梭在你著作裡的「一條線」。我努力追隨的那條「線」最後成為你近來一些較自傳性著作裡的明確主題。我一直知道那樣的一條線，因為你從一開始就在著作裡告訴過我：儘管其他的哲學家都在寫「哲學」，但對你來說，它永遠都只是「西方的哲學」。白色、他者、邊緣、去中心：我清楚你所關切的是什麼，你竭力要嘗試有哪些可能性，你一直要試圖擺脫的預設（presupposition）是什麼。這也是為何我的書名取了一個與你的文章遙相呼應的名稱，自此我就常常被人指稱為「白色神話」。請允許我在此重述這本書的開頭部分：

假使所謂的「所謂後結構主義」是單一歷史時刻的產物，那麼這個時刻或許不是1968年5月，而是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無疑地，它本身即是個徵兆也是結果。由此可以很明顯地看出，沙特、阿圖塞、德希達與李歐塔等人，他們若非生於阿爾及利亞，就是個人參與了與這場戰爭相關的事件（Young 1990: 1）。

「後結構主義」——請恕我再引用這個怪異的詞彙——做為一種知識論上的暴力形式，代表著阿爾及利亞暴力的一道回聲，阿爾及利亞在對抗帝國平靜的哲學與政治確定性的反叛抗爭中精力耗盡。正如你所說的，一場革命就此開始，就在「希臘—歐洲人的冒險所帶來的基本概念體系逐步襲占所有的人類」，並且達到「廣及全世界的宰制」的時候。這就如你現在所說的，就是強行施加一種「一直是殖民本質的統治權」（Derrida 1978: 82, 297; 1998: 39-40, 59）。從最初開始，你的目標就是我們今日所謂的西方的全球化——形式上是全球化概念，但效果是物質性的，另外還有西方文化的歐洲中心主義——「在把自己強加在世界上的過程中，徹徹底底就是那個最原初、最有力的歐洲中心主義」（Derrida 1976: 3）。我的那本書試圖從我那時候尚未明瞭的源頭，但已廣被推崇、被視為解構的哲學或文學策略出發，將之重新轉譯到殖民與後殖民歷史的這個更艱困的架構中。當歷史的模式幾乎就是我想重新書寫的歷史的產物時，我該如何重新書寫歷史？當然，這就是你提出的問題。是你

對始自胡塞爾（Husserl）的哲學及歷史概念的批判，為我指出了一條最先的可能路徑，提供我一個能「動搖西方歷史之總體」的一套「批判體系」；你的後殖民復仇與顛覆的策略，無法脫離那個曾在以傳統殖民教學法為本的阿爾及利亞學校，被教導把「歷史」（History）當成是法國的歷史的你分開：「一個讓人難以置信的規訓、虛構神話與聖經，但這樣的灌輸對我那一代的孩子來說幾乎是永難抹去的教條」（Derrida 1978: 235; 1998: 44）。

或者是像阿赫默德所描繪的：

從10年前在不列顛群島上開始投注幾乎全部精力，宣揚法國後結構主義的羅伯·楊（Robert Young），幾乎未曾「勻出」一點空來思考過去的殖民地，突然間，他已躍然成為所謂「後殖民批判」的首要理論家：即使他並未在他的《白色神話》裡使用這個詞彙，這本書意味著他第一次真正意識到帝國主義這個事實，不過是在一個已經充斥著後結構主義思想的世界裡（Ahmad 1995: 8）。

阿赫默德在此用簡化的對人不對事（*ad hominem and ad feminam*）的批評，他這種特有的批評方式推翻了自己所宣稱的信仰馬克思主義客觀論——事實上他對我在不列顛群島上寫作《白色神話》之前「勻出」多少空來思考殖民地的問題顯然知之甚微，一如我不甚瞭解他在美國寫作《在理論上》（*In Theory*）之前勻出多少空來思考一樣。在他這本書裡，阿赫默德「幾乎投注了所有的精力在宣揚」北美的烏都（Urdu）詩作的轉譯（有何不可？）（Ahmad 1992, 1969）。在這可愛的個人主義的背後，阿赫默德的批評預設了一前提：「法國後結構主義」和過去的殖民地毫無關係，而且，我就像濟慈（Keats）般，對帝國主義的事實「如夢初醒」，但為時已晚，因為這個世界已經充斥著做著白日夢、提倡理想主義的後結構主義者。阿赫默德在此用一個常見的反後殖民的比喻，重覆已被法農徹底分析的文化劣等性的預設：任何在西方被視為是知識上或政治上重要的東西，不可能與（所謂的）第三世界有關聯，即使它本身是由三大洲裡眾多地點與位置中的某一個為基礎，進行對西方的批判。換句話說，後殖民理論「必然」是歐洲的，倘若它會對西方造出如此大的衝擊。就像莫爾吉伯特所觀察到的：「在攻擊後殖民理論模式太過依賴歐洲方法論時，德希達通常被對手醜化成主要的作怪者（bogyman）」（Moore-Gilbert 1997: 163，轉引自 Ahmad 1992 以及 Slemon and Tiffin 1989）。然而，那些因為當代後殖民理論是西方的，而以「第三世界」之名排斥它的人本身也正做同樣的事，否定了第三世界的投入——從德希達開始——，否定了他們的批判中所宣稱要發揚的非歐洲作品。有一種相關的論點因而在西方理論與第三世界經驗的特殊性之間，建立了一種對立。這種觀點在傲慢自大或謙卑恭敬的心態下，預設的立場就是理論本身完

完全全是西方的，而第三世界唯一能提供的就是經驗，而不是自己的理論與哲學，或任何概念上或政治上有效的東西。殖民意識形態的核心中，成人對小孩的關係就因為這樣的論點在無意識中不斷地延續下去。

414 結構主義來自東方，而後結構主義來自南方。許多發展出自己理論位置而後來被歸類為後結構主義的人，要不是來自阿爾及利亞，就是曾參與過那場獨立戰爭。法農、梅米、布爾迪厄、阿圖塞、李歐塔、德希達、西蘇——他們全都待過，或者來自阿爾及利亞。的確，他們之中沒有任何一個是嚴格意義上的阿爾及利亞人，也就是說他們並不是來自以下這幾個構成現代獨立的阿爾及利亞人口的民族：阿拉伯、柏柏爾族、卡比爾人（Kabyle）、沙維雅人（Chaouia）、札姆派（Mzabite）（Bourdieu 1958）。因此他們可說是非嚴格意義上的阿爾及利亞人，那些並不輕易地歸屬任何一邊的阿爾及利亞——這是往後的阿爾及利亞歷史所顯示的阿爾及利亞人獨特之處，許多不同類屬的本土阿爾及利亞人亦不輕易地歸屬阿爾及利亞政府。他們之中有些人是混血的「黑腳」<sup>譯註1</sup>，來自貧窮白人集結的混種社區，這些白人都是從極困頓的地中海盆地區域遷移至此，像德希達在法國高等師範學院跟著阿圖塞學習哲學，還有卡謬也是。在1871年「普法戰爭」後，德國併吞亞爾薩斯—洛林後，阿圖塞全家與數以千計的人一樣被驅逐到阿爾及利亞。其他像德希達與西蘇都來自所謂的當地猶太社群，這些猶太人最初是在15世紀時在費迪南與伊沙貝拉的命令下，連同摩爾人一併逐出西班牙，他們這些人的財產充公後被用於資助哥倫布的新大陸遠征（Laloum and Allouche 1992; Wood 1998）。在此有個異想：假如沒有來自這樣背景的德希達與西蘇的祖先，就不會有「拉丁」美洲。梅米是另一位馬格里布的猶太人，出生於突尼斯，在赴索邦<sup>譯註2</sup>前曾就讀於阿爾及爾大學。另外像法農或李歐塔也待過阿爾及利亞，在當地工作或服兵役，並積極參與革命（布爾迪厄也曾在1950年代時於阿爾及利亞進行人類社會學的研究（Bourdieu 1958, 1979; Bourdieu and Darbel 1963; Bourdieu and Sayad 1964），而當他重返阿爾及利亞服兵役時，也曾時常拜訪德希達）。因此，與這些人名相關的後結構主義或許改稱為「法屬馬格里布（Franco-Maghrebian）理論」要更為恰當，畢竟後結構理論中的介入所一直積極關切的就是消除法國殖民主義意識形態的遺緒，並重新省思法國帝國文化的中心主義的前提、預設與成規。在《謀殺他者》（*Murder of the Other*）裡西蘇曾回憶自己如何從自身的經驗來闡述這些想法：

回溯起來，我來自一場叛亂，是一種激烈、痛苦的悍然拒絕，不願接受在

<sup>譯註1</sup> pied-noirs：過去居住在阿爾及利亞而於1960年代獨立後返回法國的法阿混血後裔，之所以得到這略帶貶義的代稱是因為這些人雖然臉部的膚色與白人相近，但雙腳的膚色略深。

<sup>譯註2</sup> Sorbonne：即巴黎第四大學。

台上正發生的事情——在這個台上，我發現自己被放在邊緣的位置……在阿爾及利亞，我學會讀書、寫字、尖叫、嘔吐。今日，我從經驗上瞭解人們無從想像一個阿爾及利亞裔的法國女孩：你必須曾去過那裡，並且曾經歷過這一切。你必須曾經以「帝國主義者的盲目」（imperialist blindness）——站在這樣的「高度」——來看待「法國人」，必須曾在這樣的國度待過：雖然住的是人類，但卻宛如非人或天生的奴隸。我從這樣最早的景象學會了每件事：我見識過這個白種人（法國人）的、優越的、財閥的、文明的世界如何壓迫人們以建立自己的權力。這些被壓迫的人突然變成「隱形人」，就像無產階級、移民勞工、擁有不正確的「膚色」的少數族裔。女人，有如「隱形」的人類；但是，當然被視為工具——骯髒、愚蠢、懶惰、卑鄙等。另外，多虧有一套根除方言的魔法。我見識到偉大、高貴、「進步」的國家如何藉由驅逐「陌生」的事物以建立它們自己；排除它而非去除它；奴役它（Cixous and Clément 1986: 70）。

「儘管它可能有許多有用的洞見，後殖民主義的哲學都仍是壓迫的女僕（handmaiden of repression）」，澳洲批評家蒂芬（Helen Tiffin）這麼宣告，「而且請容我將兩個隱喻混合，身為1980年代的地區總督（District Commissioner），他的書名從《下尼日之原始部落的綏靖》（*The Pacification of the Primitive Tribes of the Lower Niger*）改為現在的《享有他者：或被馴服的差異》（*Enjoying the Other: or Difference Domesticated*）」（引自Moore-Gilbert 1997: 21）。事物瓦解<sup>譯註3</sup>：在此的預設是「後結構主義哲學」僅是歐洲的白人神話，蒂芬顯然從未想像「他者」如今可能為自己寫本書。她以為只有白人拓居者被允許使用理論來回覆。女人、原住民，仍舊是他者。史碧娃克曾回應某些對她的作品所做的類似批判：「當白瑞（Benita Parry）責備我們〔史碧娃克、巴巴、真莫漢默德（Jan-Mohammed）〕無法傾聽原住民或讓原住民發聲，或者讓原住民發聲，她忘了我們三個後殖民人士也是『原住民』……抵抗的後殖民已成為一件醜事」（Spivak 1993: 60）。蒂芬的評論僅僅要求主體位置進行一種顯然是難以想像、醜事般的逆轉：被她歸為壓迫的女僕的後結構主義，事實上是由壓迫所製造出來的，因為它有大一部分是發展自殖民主義的經驗。「後」結構指的結構是殖民的機制，帝國的機器。後結構解構整體性觀念，其來源乃是對晚期殖民政府的總體化政權的經驗以及抵抗形式，尤其是法屬阿爾及利亞。那台機器的運作不像任何其他的，通常是在後來重新部署，這也就是柏克以降的自由主義者一直害怕在帝國中會發生的狀況。若法西斯主義是回到歐洲體現的

<sup>譯註3</sup> Things Fall Apart：原為奈及利亞小說家阿契貝（Chinua Achebe, 1930-）的小說名，書名中譯有兩種：一為《瓦解》，另一譯為《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殖民極權主義，那麼極權主義將永遠是殖民的——不論對內部或外部。帝國主義之後，法西斯主義之後，史達林主義之後，阿爾及利亞之後，也就是挑戰總體性的時刻。這個總體性正是國家與政黨的概念的基礎所在，也是盧卡奇（Lukács）引起爭議的主張——它是挑戰資本主義的工具。被穆丁比歸為非洲哲學家的沙特曾努力想重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在達到總體性和集權化的歷史過程中，讓歷史的施為者能更積極的介入。沙特自己也是法國抵抗納粹的一分子，他必定知道這個理論很難被接受，所以他沒有完成這個想法的哲學論證也不致讓人太吃驚。沙特的關鍵一舉只把事情弄得更複雜，在《辯證理性批判》（*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第一卷出現的，似乎是一個永遠無法結束的開頭——要最先製造出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哲學，其中殖民主義與殖民政權的地方性暴力皆是核心組成成分：「暴力，資產階級的存有（*exis*）〔即遲滯、穩定，相對於實踐（*praxis*）的狀態〕是存在於對無產階級的剝削之中，成爲一種宰制階級對被宰制階級的既存固有關係……而這個資產階級世代的實踐就在殖民」（Satre 1976a: 719; 1991; Young 1990: 28-47）。沙特對暴力的強調使他與法農聯合，法農是阿爾及利亞最著名的「養子」，直截了當地主張「被殖民者發展暴力和被威脅的殖民政權所運用的暴力成正比」（Fanon 1965: 69）。

416 在1962年之後，更多來自阿爾及利亞的拓居移民、混血的黑腳與流亡者抵達巴黎：極少「後結構主義者」是「純正血統的法國人」或「擁有良好的血統」，也就是很少是法國本地的白種男人或女人。阿圖塞以他關於意識形態的哲學踏出了第一步。阿圖塞描述的意識形態的首要場景——在這個場景裡，主體因爲警察喊「嘿！就是你！」而被召喚（*interpellated*）——並不是被理論化爲無意識地吸收制度中所有價值的那種意識形態，一如歐洲馬克思主義者將「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概念化。阿圖塞的意識形態一開始是針對暴虐的殖民者對待被視爲低劣的屬民的手法，這些來自被貶抑的文化體系統的一分子，必須在權力機器裡理解他們。像李歐塔一樣，阿圖塞也曾經歷過阿爾及利亞裡殖民機器的「相對自主性」，在最後階段才由巴黎爲之做決定的自主，而這也說明了後殖民政府絕非像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影響般處於被動的位置，它可分享經濟主義（*economism*）的解放——被認爲是透過核心、半邊陲、邊陲的各個區域而在帝國運作的經濟主義（Meynier 1981; Prochaska 1990）。他對本質主義的批判爲後來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奠定了基礎。在一般熟知爲小本通俗版的阿圖塞之《閱讀資本論》是由「民族解放陣線」的托洛斯基主義支持者馬伯樂（Maspero）出版的一系列叢書裡的一本，此系列前30本書也包含了肯亞塔、毛澤東、武元甲、胡志明、切·格瓦拉、法農與梅爾肯·艾克斯——還有阿圖塞自己的學生，革命者德柏艾（Régis Debray）。德希達走得更遠，重新發展沙特憂心觀察到情況：「總體化從未達成，而總體充其量只存在於一種去總體化的總體性」（*detotalized totality*）中（Satre 1963: 78）。德希

達認爲總體化事實上不只在經驗上是不可能的，在概念上也是如此：「也就是說，因爲它不像古典的假設般無窮無盡，也不是太過龐大，而是有某種東西從中散佚了：將不斷替代的活動扣住並固定的那個中心」（Derrida 1978: 289）。就像葉慈（Yeats）在愛爾蘭獨立前夕所觀察到的，中心無法掌握。德希達指出，殖民主義與殖民機器的運作一般都會生產出政治上與概念上都難以統馭的結果。這樣的結果又會被拿來重新部署來對抗它。德希達既非法國人也非阿爾及利亞人，而他永遠反對民族主義及世界主義。從《論文字學》（*of Grammatology*）的第一頁開始，他就不斷批判西方種族中心主義，他執著於正義與非正義的問題，將解構發展爲帝國在知性上與文化上去殖民的一步驟。他在1949年時從阿爾及爾城啓航前往的這個帝國，也是他在1957至1959年間在阿爾及利亞服完兵役後重返的法國，但他對這個法國卻沒有什麼愛恨的矛盾情感，儘管它曾拒絕他、不承認他，隨後才又恢復了他的法國公民身分。解構的外科手術所針對的一直是本質論暴力的認同，因爲這種觀念以力量與實際的暴力維繫西方形上學與意識形態的體系，而暴力的行動也正是維繫西方國家的殖民與帝國政策之所在。如果想顛覆這結構性的權力關係，勢必得先將它拆解。從德希達早期的作品——《論文字學》（1967）、《書寫與差異》（*Writing and Difference*, 1967）、《哲學的邊緣》（*Margins of Philosophy*, 1972）——一直到現在，他所念茲在茲的就是如何面對這樣的力量和暴力，以及兩者在歷史、政治、倫理、語言所產生的影響，甚至導致它們在歷史、政治、倫理、語言裡產生的效應。

## 二、擊碎舊殼

417

令我感興趣的正是那些模糊、跨越界線的現象，使他們的歷史伎倆得以現形，並顯出他們的暴力，我指的是一些集結在那裡的力量關係，並無止無休地將自己真正地資本化。那些對所有「克里奧化」敏感的人們比起別人而言更能評估這點。（Derrida 1998: 9）

德希達本人從邊緣——位在阿爾及爾市邊緣的愛荷貝——來到了都會中心的巴黎。在殖民移位（*dislocation*）的政治地理上，英國殖民主義就像英國人一樣，都是非常怪異的，而法國殖民主義的運作總是根據索緒爾的哥哥，這位在中南半島法國海軍裡服役後而成爲「歸化的」法國人的理奧波（Léopold）所說的「過度中心化」（*excessive centralization*）（de Saussure 1899: 16）。他主張法國文化具有：

一種朝向一致、簡約與對稱的傾向；對一切的差異、複雜、不對稱感到反感……它已危及了行政管理上的極端中心化（*ibid*: 307）。

托克維爾 (de Tocqueville) 在 1841 年，也就是法國第一次入侵阿爾及利亞後 11 年這麼寫道：「試試看，先生，我請你想像這些在沙漠之中機靈又不受約束的孩子們，纏困在我們階層化組織中數以千計的繁文縟節裡，被迫屈服在我們中心化的教育下所製造出來的拖拖拉拉、規則化、書寫成的文件與小細節之中。」(de Tocqueville 1988: 40-1) 法國侵略者摧毀了當地的行政系統，取而代之的是一套以文字書寫 (écritures) 的生產做為基礎的世俗中心化行政組織。書寫與帝國主義，文字的暴力：這個主題也曾在拉瑪以西班牙殖民下的美洲為例來討論時，以「文字之城」(lettered city) 譯註<sup>4</sup>精闢地闡釋過 (Rama 1996)。德希達的滲透和解放行動的方式就是透過重新將書寫與中心化的關係概念化，他對此主題的處理是放在哲學而非歷史的層次上，但從未放棄對歷史的批評。要解構各種中心主義的形式——理性中心、男性霸權的或是結構性的，唯有在極端理性化與中心化的法國行政體系的脈絡下才具有完整的意義。法國從阿爾及利亞撤退的四年後，德希達想運用他的「書寫」概念提出無中心結構的想法——如果這是難以想像的，換個方式說，他質疑人類科學中總認為結構必然圍繞著中心、起源、在場 (presence) 點以及權力而組織起來，同時它們的界線既是牢不可破又是開放的。向他這種人開放，向那些跨越國界的人們——吉普賽人、游牧民族、瓦解國家所強制的長期束縛的部落民族——開放。阿爾及利亞的歷史就由這種本土對抗殖民與後殖民政府的權力所構成的。所謂對法國文化認同的「伊斯蘭威脅」是法國人為自己招惹來的 (Hargreaves 1995; Hargreaves and Mckinney 1997)。在中心與邊緣之間，德希達找到餘裕之處，也就是錯置的經濟中側向、偏離的游移與曲折的行動，這是來自一種對抗，反抗一致性系統，而它的崩解就在它試圖劃出自己界線，藉以標誌出它搖擺不定的範圍的邊界時。在任何的力量體系裡，總是存在著被施加力量的位址 (the site of force)，因此才可能施予壓力與干涉。力量以及它在語言上的痕跡——從這其中必然有解放，或至少必然要臣服於抵抗——，在理性運作中被排除的他者的瘋顛，以及內／外的結構、相同者與他者、暴力統治在相同者與他者的差異、對他者的倫理關係、異己、差異、認同中的差異、不同於自身的認同，還有翻譯、換置 (displacement)，再加上邊緣者去穩定化的侵蝕、顛覆的底層階級、核心對邊緣者與被排除者的構成性依賴 (constitutive dependency)、沒有最終回歸的結束點的離散的散布與概念，尤其重要的是做為一種暴力的歷史，不論是本體論上、倫理上、概念上的暴力——以上一切構成了德希達早期著作的主題。正是「抹除」(erasure, rature) 這個概念回應、並拒絕畢吉歐將軍首先試圖壓制阿爾及利亞內部所使用的暴力襲擊 (razzias)。後來進入畢吉歐中學的德希達因而帶有那場侵略的痕跡，如今這場侵略

譯註<sup>4</sup> *The Lettered City* 為 Angel Rama 著作的書名。

在它自己的系統中自食其果了。

這所有概念提供重新界定底層階級的位置的可能性——無論是西方文化規範之內或之外的底層階級，但卻顯然限於「第五縱隊」式的政治，「為摧毀它而必定要暫時投居傳統概念之中」(Derrida 1978: 111)。德希達體認到後殖民的延遲性 (belatedness)，後殖民體系根據恰特吉所謂的衍生性論述來運作，換句話說，也就是殖民主義的遺緒就是留下來的後殖民政府被銘刻上西方的制度與政治概念，以及殖民與後殖民的現代性 (Chatterjee 1986)。如史碧娃克所言，後殖民主體的處境是，他／她必須置身於殖民主義的概念、文化、意識形態的遺緒裡，而這些遺緒是固著在形成去殖民化條件的制度與結構中，史碧娃克稱這種處境為「誤置」(catachresis) 譯註<sup>5</sup>——後殖民者不想要，但卻別無選擇必須棲身其間的空間 (Spivak 1993)。就是歷史本身。解構的基礎是建立在「論述的地位問題，因為論述需要從歷史傳承中借用某些資源，而這些資源卻又是解構這個傳承本身不可或缺的」(Derrida 1978: 282)。它代表著一種策略性的另外選擇，除了依賴理論的被动性，或是民族主義基本教義派欲重返那個不受西方制肘的真正傳統之外。民族主義的基本教義派試圖以否定過去來回應現在，而同時又援引歐洲浪漫主義，做為回歸真實、真正、本土文化的譬喻。

### 三、結構主義、「原始」理性與解構

419

在 1955 年，阿爾及利亞對我來說並未成為革命政治的一個「問題」，它也是一個負債的名字。我欠康士坦丁，我短暫的覺醒受惠於康士坦丁。歧論 (differend) 如此尖銳地顯示，同儕之間常見的慰藉方式 (立場不明的改革派、虔誠的史達林主義、徒然的左派) 拒絕我。這種受屈辱的人一旦奮起就不會妥協；但同時，他們仍沒有方法能達到所謂的自由。(Lyotard 1993: 170)

當德希達來到巴黎之際，所有左派攻黨，包括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在內，都致力於延續法國對阿爾及利亞的統治 (在這種普遍的情勢下，李歐塔所屬的托派團體「社會主義或野蠻」(Socialisme ou Barbarie) 是其中一個極少數值得稱許的例外)；沙特獻身追求獨立，這也是他拒絕加入共產黨的主要原因 (Lyotard 1993; Lamouchi 1996)。這讓所有阿爾及利亞人與法屬馬格里布人在面對法國馬克思主義時左右為難，因為當時在法國知識分子間最流行的意識形態就是馬克思主義 (Derrida 1980: 22)。德希達，一個承載著法屬殖民地阿爾及利亞近年來複雜的歷史

譯註<sup>5</sup> *catachresis*：原指語言學上的字詞或比喻的誤用

所帶來的效果與影響的被殖民者，立即被放在邊緣的位置，相對於這個位置的就是大都會巴黎——仍舊是帝國的社會與文化政治。德希達對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保持距離，沒有什麼正面直接的關係，這一點時常被人拿出來批評，然而鮮少有人從以下的脈絡來理解：「法國共產黨」——包括它在阿爾及利亞的支部，大半由法國拓居移民和法國化的阿爾及利亞人所組成——一直都反對阿爾及利亞獨立，主張它應同化為法國。這也不是什麼新鮮事。在1928年，「第四次共產國際大會」曾接到來自阿爾及利亞的西迪貝勒阿拔斯的法國共產黨員的一封信，因而引起批評討論。信的內容是抗議「共產國際」訴諸法屬北非穆斯林，因為他們那些人是禁錮在倒退的「穆斯林封建主義」，特別是被他們自己的民族主義宗教領袖與地主所剝削——這些共產黨員令人難以致信地宣稱，他們根本不是被法國拓居移民所剝削（Carrère d'Encausse and Schram 1969: 196-8）。即便被大會一致譴責，阿爾及利亞共黨人士以穆斯林抵抗進步觀念為由拒絕同意殖民地獨立，反過來想依靠在法國的共產黨的勝利來建立在北非的共產主義，他們提出的這個策略透過阿爾及利亞的獨立，成為阿爾及利亞共產黨實行的政策。「法國共產黨」對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地屬民的態度既帶著家長權威心態又有施恩庇護的意味，與法國政府的態度幾乎沒有差別：兩者在立場上或多或少有一致之處，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解放後的法國新聯合政府裡任職的共產黨籍部長，批准派遣軍事武力再次征服甫由胡志明共黨政府領導而獨立的越南。哈吉——「北非之星」的溫和派領袖，也是它被鎮壓後成立的「阿爾及利亞人民黨」的領導——評論說，在阿爾及利亞，人們永遠深知這一點：「經驗與歷史會證明法國的領導者，不管是政府的極左派或是極右派，有著相同一致的殖民主義政策。」（Padmore 1956: 333-4）在戰前，「法國人民陣線」所領導的政府裡的共產黨人士，對哈吉與其他「北非之星」的領袖被逮捕一事姑息以對；在戰後，拉馬迪埃（Ramadier）聯合政府裡的共產黨人士支持鎮壓阿爾及利亞「恐怖分子」。在獨立之後，「民族解放陣線」立即將阿爾及利亞共產黨逐出。

420

德希達到巴黎時，正是結構主義主導當時的知識思潮時——結構主義最初由二位旅居布拉格的俄國人所發展出的反西方方法論。他很快地體認到，1945年結構主義的出現，在理論上引發了戰後的文化去殖民化，這是藉著原本用來分析非西方文化的批判人種學（critical ethnography）來研究西方文化本身。尤其是李維史陀，他承繼了鮑亞士（Franz Boas）——最早的反種族主義人類學家，並啟發早期布拉格學派的結構主義者們——的傳統，而且置身在1945年之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聲明的種族平等的氛圍下，他所關注的是強調所有的人類有相同的心智結構，其心智能力也是普世共同的，並未有不平等的高下之分。雖然後現代拒斥普世主義，但在此普世共通的觀念一定要拿來來對抗種族主義（Malik 1996）。一如貶抑結構主義的人時常指出的，做為一個方法的結構主義並未在不同文化間（西方或非西方）

或西方內部不同形式的文化間（「高級」與「低劣」的）做價值判斷：因此它在本質上是民主的、平等主義的、刻意與資產階級的價值、喜好、區辨、品味的美學觀——這些在西方常被用來支持其文化（繼而是階級與種族）優越性的宣稱——保持距離。同樣地，李維史陀指出所謂原始思維邏輯與西方理性主義同樣是有根有據，在方法上也是有所控制的，藉此質疑種種西方對文明的概念，包括文明的／原始的、男性的／女性的等區分所產生的不良後果（Lévi-Strauss 1968）。李維史陀的著作具有反歐洲中心的意涵，反對文明優越性以及西方獨特性的預設。

德希達對結構主義的所謂「批判」——一般認為開啓了後結構主義的整個思潮——分析李維史陀，以闡明這兩種思維邏輯的可能性存在他自己的論點裡。德希達告訴我們，李維史陀的文本即藉由不同形式的多重邏輯來運作：像是後來成為解構策略核心概念的誘導式（heuristic）方法，就是採用他要消除的概念，這是一種「想保存他所批判不具真值（truth value）的東西，以做為工具使用」的兩面手法式的意圖（double intention）。換句話說，他將方法的工具性從方法所設想的真理裡切割出來。就像沙特曾在1948年時這麼描述：「當黑人用法文公開宣稱自己放棄了法國文化的同時，原本被他用手丟開的東西其實只是用另一隻手拿著」（Sartre 1976b: 23）。

德希達認為李維史陀製造出既是科學的又具神話詩學意涵的（mythopoeic）文本，這個兩面手法式的意圖在本質上構成了論述運作的模型，產生的意義就是「即便我們生活在同一時代並調和在一模糊的經濟架構下，也絕對無法調解」（Derrida 1978: 285, 293）。進一步來說，他彰顯出這種多重、有差異的思維邏輯不但在非西方的神話或李維史陀論證的方法中，甚至也在西方哲學傳統下最崇高的西方思想與理性主義這些表達形態裡起作用。事實上就如我們所知，西方藉以界定部分自我的西方哲學正是藉由這種用一普遍真理來收併神話，同時將理性（reason）的神話置換為絕對理性（Reason）的兩面方法式的邏輯來運作：

421

形上學就是集結、反映西方文化的白色神話：白人將自己的神話、印歐神話、自己的邏各斯（logos）——也就是他的理性（reason）的神話傳奇（mythos）——當成普世共通的形式，這個形式他們必然還是要將它稱為絕對理性（Reason）。這並非毫無爭議（Derrida 1982: 213）。

解構本身是一種文化與知識去殖民化的形式，就是要把理性方法從真理區分出來的兩面手法式意圖揭露出來。德希達將李維史陀這個方法的特色單獨挑出分析之後，重新利用它，讓它成為解構的重要步驟。

德希達所發展出的許多相關概念迅速地延伸到少數族群的社會與政治經驗上，像是邊緣性、離散、差異等觀念，我們很難說這純粹是巧合而已；這些觀念正是來

自少數族群的經驗。少數族群與多數族群之間有一種解構的關係：「所有改革的根源都來自於少數起而對抗多數」（Gandhi 1988: 92）。問題就在於這裡的少數族群不同於民族解放運動——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間的對立——的辯證裡的少數。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民族解放的反抗將被殖民者凝聚在一起，它所憑藉的只是因為結構而使原本相異的認同轉為單一認同，也就是以反抗共同的敵人——殖民者——為訴求。當這個相同的敵人已移交權力並離開，它的角色便被民族國家取而代之：在後殖民時期裡，差異又再度被確定，並再度被扣連，以對抗新國家所意圖建立的霸權，將其方法從真理中區分出來。

#### 四、鹽柱<sup>譯註6</sup>

我愛死了話語（words），因為我沒有自己的語言，只有造假的傷口（*escarres*）、造假的痂（*eskhara*）。（Bennington and Derrida 1993: 92-3）

422 話語：你的盾牌，或是覆蓋在你傷口上的疥癬？不論你的著作中有多大部分是「後殖民的」，並成為許多後殖民理論的基礎，你對殖民主義的體驗絕不平凡，不管那個經驗是什麼。一開始，阿爾及利亞就不是個平凡的殖民地，雖然它對法國而言，就像印度對英國，是個典型的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的歷史事實上是相當獨特的：1830年在宗主國帝國主義精心擬定的戰略下，首先受到一支遠征軍入侵，但在接下來的130年裡卻從未有效地被征服——在阿爾及利亞的例子裡，聰明的評論者並不需要刻意去研究，想找出底層階級細緻的反抗策略——這塊殖民地上早已住滿了肥沃平原上定居、以農維生的當地居民，從第一天起到這個時刻它們擁有一段最暴力的歷史，這也正是法農《受詛咒的大地》（1961）的靈感來源與基礎。在1962年之後，你既無法重覆他對革命的偉大禁令，也不能像個獨立後被流放的猶太人，以革命行動的名目來簡化那個情境和人民。對梅米而言你是屬於一個獨特的類屬，來自「一個瓦解的『社區』」。你的認同既不固著在此也非在彼，但卻寧可置身認同的失序（*trouble*）裡，這種情況乃導因於在1870年克里米厄（Crémieux）下達授予阿爾及利亞猶太人法國公民身分的敕令之後，阿爾及利亞當地的猶太人在兩代之內過快的同化，而這項重新分類在1940年突然被撤消（Derrida 1998: 55, 14）。猶太人在1870年後的文化同化與布爾喬亞化讓他們被隔絕，無法適應他們自己的文化甚至是文化記憶，無法適應阿拉伯與柏柏爾文化，還是對他們習得的法國

譯註6 在聖經《創世紀》第19章，耶和華派兩名天使去毀滅罪惡的所多瑪城，兩名天使遇到城裡的義人羅得，就帶領他、他的妻子、和兩名女兒出城門，以免同時被剿滅。兩名天使要他們趕快逃命，並且不可回頭看。羅得的妻子不聽，在耶和華毀滅所多瑪的時候回頭看，結果就變成了一根鹽柱。

文化與語言來說都是如此。你這麼評論說：「在任何情況下，這將會是完全失去文化（*inculture*）了，而我毫無疑問地從沒有完全由這樣的情境中脫離。」（*ibid.*: 53）

鹽柱：為了在殖民文化裡成功，就必須丟棄猶太人、阿拉伯人或非洲人的認同。就像梅米所言，當阿爾及利亞的猶太人以各種方式被拒絕時，他們「永遠都是猶豫不絕是否該拒絕同化的人」，雖然他們終究是被拒絕了，這種難以下決定的模式如下所述：

他們不變的以及具有充分理由的志向，就是脫離他們被殖民的狀態……

為了達到這樣的目標，他們竭力模仿著殖民者，誠摯期盼殖民者不再視他們不同於己。因此，他們努力去遺忘過去，改變集體的習慣，熱情地擁抱西方語言、文化與習俗。然而，即便殖民者並未公開地阻礙這些人進行模仿，但也沒有許諾讓他們達成目標。這麼一來，他們生活在持續不斷的和痛苦的矛盾當中。（Memmi 1967: 15）

猶太人就身處在混種的國家裡最為深切的矛盾狀態中，這是一種兩頭皆不著岸、不確定的世界（*in-between limbo world*），在這樣的世界裡，這些猶太人一方面認同永遠無法與之完全相似的殖民者，卻又卑躬屈膝地想模仿後者的生活；另一方面，卻又注定永遠要過著被殖民者的生活。正是這種文化上兩頭不著岸的狀態讓他們得以在獨立戰爭時，一如法農所說：「在敵人機構內部成為『這場革命的眼與耳』」。這兩個方面都起了作用：就像你所說的，「包括我自己在內的一些人都曾從這兩面經歷過殖民的殘暴。」（Derrida 1998: 14, 39）當然，殖民也帶來契機：你，和梅米、法農以及許多領導獨立運動的人一樣，都為了接受大學教育而前往帝國的首都。

423 梅米首先發難，反對沙特與法農提出的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嚴格的二元區分，主張要去瞭解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間的相互心理關係，以及如他所說，「描繪出殖民大戲裡兩大要角的樣貌以及緊緊兩者的關係」，同時藉由強調那些流動在兩個範疇間游移角色如影隨行的存在，來解消兩者間的辯證關係（Memmi 1967; Derrida 1998: 62）。探索緊緊著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關係，結果就是解構的必要性。整個情節是從殖民政權強迫使用法語開始，以致於阿拉伯語在自己的家鄉變為外來的外國語，這正是卡韋所謂「話語噬菌」——即殖民者試圖藉由貶抑當地語言以逐漸吞滅它們——的第一階段（Calvet 1974; Fabian 1986）。而今天阿爾及利亞與摩洛哥的政府們則接著藉由吞滅本地語言以壓制它們（Hargreaves 1995: 101-2）。一如你在當前所揭示的，你講法語但卻不當它是母語，你仍對它一無所知，是法語掌握了你而非被你掌握，以致於你總是生存在法文的邊緣，它既是你的，但對你又是他者的語言：「看吧，這語言永遠不會是我的；而且老實說，它過去也未曾是。」



(Derrida 1998: 2) 你並未能有相對的奢侈來選擇以自己母語來寫作，或是屈從於國際市場的語言的必要性。所有語言都被剝奪，只能棲身於外來語言——「法語、英語、德語、希臘語、拉丁語、哲學語言、後設哲學語言與基督教語言等等」——你被擲入「絕對翻譯 (absolute translation) 之中，而此翻譯裡沒有指涉的一端、沒有原初的語言、沒有做為源頭的語言存在。」(Derrida 1987a: 562n; 1998: 61) 你的言語 (speech) 在一個不是你自己的陌生語言裡轉成密碼，讓你對自己來說是個陌生人：「它是不對稱地存在，永遠為了他者、來自他者、為他者所把持。從他者而來，與他者並存，並且回歸到他者。」你的著作代表了探索法語做為一種殖民論述的經驗，而這種殖民論述也是你的論述：無庸置疑地，以非自己母語的英語寫作的喬依斯，對你自己和西蘇都是一位重要的人物：「是的，我只擁有一種語言，然而它不是我的。」因此，你寫作，並非如傅柯所要求的，想生產出殖民論述的規則，而是來自棲身於它的經驗，來自做為陳述過程的主體的經驗，這種陳述過程是被置於沒有源頭的永無止盡的翻譯中。因此這也就不會太令人驚訝：你希望從它明晰散文的單語主義中解放，定位於一些既是你的但對你來說是陌生的異己的異質性、「做一些事情來影響語言」。主人、殖民者的語言也是你的語言，你的語言是從他奪取來的、以不適當的手段從他據為己有。他們稱呼你「冒充內行的人！」一位藏匿在主人的語言裡難以被理解的不速之客，「一位無法給予歸屬來源的新進入者，[他] 把被使用的語言變成他的，強迫此語言本身透過它自己來講它自己，以另一種方式，以他的語言。透過它自己來說話。然而為他而講，並且是以他的方式。」(Derrida 1998: 40, 51)。然而為你而講，並且是以你的方式。

## 424 五、馬拉諾<sup>譯註7</sup>：「小黑人，非常阿拉伯的猶太人，對它根本不瞭解」

什麼是法屬馬格里布 (Franco-Maghrebian) 人？……這個字中間的連字號靜默地橫在中間，沒有平撫、也沒有止息任何傷痛、任何折磨。那段記憶絕不會因為這個連字號而沈默；它甚至會讓恐懼、損害和傷口更深更劇。一個連字號藏不住抗議、憤怒和苦難的怒吼，以及武器、戰鬥機及炸彈的喧囂。(Derrida 1998: 11)

所以如今你直接了當地說出來，並將解構與你的「猶太—法國—馬格里布的系譜」結合在一起：

<sup>譯註7</sup> Marrano：指中世紀時在伊比利半島上因迫害而改信基督教的猶太人與摩爾人，是帶貶義的稱呼。

的確，每件讓我長期感到興趣的事情——因為寫作、痕跡、男權中心主義與「這個」西方形上學的解構……等等，所有這一切不可能不從陌生的指涉「他處」(elsewhere)——這個地方與語言對我自己來說都是未知，且受限制的——而開始進行，就好像我嘗試要轉譯成那個唯一我能夠運用自如的語言、唯一的法國西方文化，那個我自出生以來被擲入的文化，一個我自己無法達成的可能性。(ibid: 70-1)

這一點非常清楚，因為據我所知，你已重覆了好幾次，至少在1983年的《新觀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1980年的《明信片》(*La Carte postale*)、1987年的《心理：發明他者》(*Psyché: Invention de l'autre*)、1991年的《另類航向》(*L'Autre cap*)、1996年的《他者的單語論》(*Le Monolingualisme de l'autre*)以及1999年的《關於言語》(*Sur parole*)，而這種經驗縈繞著《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1991*)一書裡的〈割禮／懺悔〉(*Circumfession*)<sup>譯註8</sup>以及其他許多文本：在1940年是真正「被降格」的時刻，在未被占領的阿爾及利亞，法國維琪政府撤銷了1870年頒定的「克里米厄法令」(*Crémieux decree*)<sup>譯註9</sup>，因而撤銷你的法國公民身分。這在你心中所產生的，「一方面……是做為進步形式的一個必要的——或者說造成重大傷害的——「被貶抑」這個主題；另一方面是對這種被貶抑之前所懷抱的鄉愁，針對抵抗之島所懷抱的情感衝動。」(Derrida 1976: 134) 對你而言，這個解構的立即效應就是在新學年的第一天，你被告知得離開學校返家，只因校長將學校內的猶太人比率從14%調降到7%（「名額限制條款」*Numerus Clausus*）。這個時刻是你著作中的憤恨之情的那一個帶給你不安的原初場景，是無所歸屬的一刻，既在局內又在局外的一刻：「那段經驗讓我體會到沒有任何事物能夠原封不變，這樣的感覺是往後我永遠無法停息的一種感受」(Derrida 1985: 113)。你不願意進入由同樣被學校體系驅逐出來的猶太老師所設立的學校，後來就在逃學遊晃的狀態中度過一年。你感覺自己是雙重的流離失所：

德希達：這種惘嚇所產生的吊詭效果或許是讓我有一種想被接納，進入非猶太社群的渴望，這是一既誘人、但是又痛苦、不被信任的渴望，有一種緊張不安的警覺，小心翼翼地察言觀色，以便在種族主義中最謹慎的構成，或者最公然的拒絕中，辨察出它的徵兆。相對地，當我覺得各類猶

<sup>譯註8</sup> Circumfession一字是circumcision（割禮）和confession（懺悔錄）兩字合成。

<sup>譯註9</sup> 1879年，法國通過「克里米厄法令」，宣告除了居住在阿爾及利亞南部的猶太人之外，所有阿爾及利亞的猶太人都是法國公民。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1940年法國被德軍擊敗，被迫求和，成立傀儡政權「維琪政府」(Vichy regime)，廢除阿爾及利亞猶太人的法國公民權。1940年，德希達成了無國籍者，直到1943年戴高樂領導的法國流亡政府與盟軍登陸北飛後，阿爾及利亞的猶太人才恢復公民身分。

425 太社群有自我封閉的傾向時，我就感受到自己急切地想和他們保持距離……這些經驗讓我有一種無所歸屬的感覺，我所轉達的無疑就是這種感覺。

訪問者：在哲學中嗎？

德希達：在每個地方。（Derrida 1985: 114）

就如本寧頓（Geoffrey Bennington）所說，這種「歸屬的困難」是在這個時刻開始的，並且貫穿他所有的著作（Bennington and Derrida 1993: 326-7）。你已經將這個被貶抑的憤恨之情回轉，將它運用在文化制度上，藉由解構被貶抑者、底層階級、被剝奪者、被迫改宗者、隱性的猶太人（crypto-Jews）等的脆弱語言，誘使這些文化機制進入圈套。你自稱是馬拉諾（Marrano），是大家口中的「豬」，這個名稱是指那些伊比利半島的猶太人在「天主教裁判所」的統治之下被迫改宗並食用豬肉，但仍秘密地持續他們信仰。但即便在當時，你也算不上是個純正的馬拉諾：「如果我是法國天主教文化下的馬拉諾人的話……我是那種即使在心靈深處也不再自稱是猶太人的馬拉諾。這並不是爲了要在任何一邊的公共場域成爲真正的馬拉諾，而是因爲他們懷疑每一件事。」（ibid, 170-1）

官方對你的公民身分的撤銷與恢復只是將你的地位制度化、形式化，成爲一個文化與政治上的馬拉諾。你已經是馬拉諾，生於馬拉諾的殖民匱缺（colonial lack）中（Marranic colonial lack）。「我們就是馬拉諾，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管我們想不想要，不管我們知不知道。」（Derrida 1993: 81）你的界線總是模糊的——歷史對你而言正是如此。就像巴巴所說，你在「轉譯的來生」中繼續留存，以「生存在邊界的方式」（Bhabha 1994: 226-7）。你對於內化的暴力以及殖民權力中的文化與政治體系的歷史伎倆已了然於胸，他們視你爲他者，並使你成爲他者，因此你試圖找出、或銘刻他們的「異己」，你要顯現給他們看，你可以找到它，就在他們的心理你找到你自己。

當你提及這些事時，卻被斥爲「冒充內行的人」，只是大言不慚的虛偽騙子。這個來自阿爾及利亞、馬拉諾化的隱性猶太人，竟然膽敢挑戰西方經典的傳統，或說是東方與南方知識分子的特權傳統？你的想法被認爲是非哲學的、非政治的，因爲根本不符合被認定的哲學或左派政治的範疇，或者更糟的是因爲你挑戰了這些範疇賴以建立的基石，所以你的想法被棄斥。正是這樣的想法！出現了這樣的呼聲：「那麼解構的政治是什麼呢？」就是另一種唯心論！然而你衝破一切困境，對抗那些具有庇護心態的預設——認爲唯有最簡明的語言與概念才可能啓發人們對自我的肯定，爲社會和政治的轉變而努力，你的觀念被許多難民與少數族裔、遷移者與移民團體所採納，因爲他們感受到了你的想法正表達、體現出了他們自己那種未具體

化、被貶抑的文化與政治處境（並且不讓任何人將少數族裔、遷移者及移民認定是西方所排斥的）。你用一種屬於他們的語言來說話。因爲你是他們之中的一分子，426 所以你與他們一同從邊緣的主體位置來發言，用這樣的語言，透過這樣的語言，你從他們的觀點重新將這世界概念化，並肯定在西方機制的心臟地帶的邊緣力量。你讓新的政治組成得以在它們不斷發展自己政治的過程裡，清楚闡明他們的認同。這絕對不是一個涵蓋所有一切的政治，可以適用於每一種情況的每一個人（這是不可能的要求），而是一種到那時爲止，一直是沒有母國、沒有語言、沒有字彙、沒有觀念的政治，可以讓世上那些被控制者、被剝削者，以及被孤立者和遷移的馬拉諾，讓他們用來肯定自己的訴求和目標的政治，可以用文字或者用隱喻來對抗日益加深、越來越充分展現其宰制權力的白色神話。

## 尾聲

# 三大洲主義： 爲求跨國性的社會正義

如同前一章在扣連不同殖民歷史與個人歷史時顯示的，在許多方面本書可說是重寫《白色神話》(White Mythologies)，將它放到更寬廣的、具有歷史挑戰性的觀點——三大洲的反現代性。沙特仍是一個支點，但如今，新的三大洲的形成乃是由歷史性反殖民鬥爭直接產生的理論性批評而開始出現，並不是因爲歐洲形式歷史的不可能，與後殖民激進的知識論並行而有新的形成。

反殖民主義絕非只是一個概念、一個理論的位置或是一種哲學的世界觀；它的概念是鑲嵌在動態輸入物質性政治與社會組織的基本結構的一部分。三大洲主義就像後殖民主義，都是產生自離散與本土脈絡的結合；然而，不像一些後殖民主義者，反殖民的知識分子並不是只專注在擔憂該保持客觀立場，還是應該有反思的角度 (JanMohamed 1992)。他們是有機的知識分子，爲了政治議題而活，並爲之奮鬥，他們的生活就圍繞這些議題，並在日常生活的基礎上，將這些議題實踐。

在撰寫《白色神話》時，我住在北倫敦的坎登 (Camden)；就在研究調查時，我發現我的住處隔壁就是創立於 1924 年的「西非學生會」(West African Students Union)，目前是由來自奈及利亞的索藍克 (Lapido Solanke) 負責。肯亞塔、恩克魯瑪、詹姆士、潘得墨和羅貝森等都踏過門前小路進入我隔壁的這間由加維買給「西非學生會」的房子。儘管在倫敦幾乎每間房子都有藍色飾牌，各式各樣的牌子，以這些地點紀念一些相關人士的成就，無論是赫赫有名或名聲不大的人。但在這棟房子上卻未見任何飾物標誌出曾經有過意義重大的、革命性的反殖民活動。這是刻意想抹去有革命意義的反殖民抵抗歷史——至少在歐洲是如此。

本書呈現的只是眾多歷史、叛變、政治運動、文化認同過程、理論形構中爲數有限的一部分，這一切在 20 世紀發展成爲反殖民鬥爭的一環，在人類付出重大代價的情況下，在極短的時間內將世界從殖民宰制中解放出來。今日，三大洲理論，或者一般所說的「後殖民」理論，及其政治實踐仍試圖以這些豐富的傳承中繼續建設，包括它政治決定的激進理念、拒絕安於現狀、它對知識論的轉化，以及建立新的論述與政治權力的形式。雖然到現在已經有了許多成就，但不公義、不平等、無地無產、剝削、貧窮、疾病與飢荒仍舊是這世界上許多人日常生活中的經歷。三大

洲主義所根據的知識由是這樣的實際狀況而形成：權力—知識的政治所堅持的就是改變它們的意志。

## 參考書目

- Abadan-Unat, Nermin, ed. (1981), *Women in Turkish Society*. Leiden, E. J. Brill.
- Abdel-Malek, Anouar (1981), *Social Dialectics*, 2 vols, trans. Mike Gonzalez.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Adas, Michael (1979), *Prophets of Rebellion: Millenarian Protest Movements against the European Colonial Orde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Adderley, Charles Bowyer (1861), *Letter to the Right Hon. Benjamin Disraeli, M.P., on the Present Relations of England with the Colonies*. London, Parker, Son, and Bourn.
- Adderley, Charles Bowyer (1869), *Review of 'The Colonial Policy of Lord J. Russell's Administration', by Earl Grey, 1853, and of Subsequent Colonial History*. London, E. Stanford.
- Adderley, Charles Bowyer (1903), *Imperial Fellowship of Self-Governed British Colonies*. London, Rivingtons.
- Adelman, Jeremy, ed. (1999), *Colonial Legacies: The Problem of Persistence in Lat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 Adler, John, ed. (1980), *Theses, Resolutions and Manifestos of the First Four Congresse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trans. Alex Holt and Barbara Holland. London, Pluto Press.
- Ageron, Charles Robert (1973), *L'Anticolonialisme en France, de 1871 à 1914*.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Agostinho Neto, António (1980), *Speeches*. Luanda, MPLA-Partido do Trabalho, Department of Politico-Ideological Education, Propaganda and Information.
- Aguilar, Luis E., ed. (1968), *Marxism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Ahamada, Mujaphphara (1959),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Years of Formation: 1921-1933*. Calcutta, National Book Agency.
- Ahamada, Mujaphphara (1962),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and its Formation Abroad*. Calcutta, National Book Agency.
- Ahmad, Aijaz (1969), *Poems by Ghalib*, trans. Aijaz Ahmad et al., with a forenote by Aijaz Ahmad. New York, Hudson Review.
- Ahmad, Aijaz (1992), *In Theory: Classes, Nations, Literatures*. London, Verso.
- Ahmad, Aijaz (1995), '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Postcoloniality', *Race and Class* 36: 3, 1-20.
- Ahmad, Aijaz (1996), *Lineages of the Present: Political Essays*. New Delhi, Tulika.
- Ahmed, Akbar S. and Donnan, Hastings (1994), *Islam, Globalization and Postmodernity*. London, Routledge.
- Ahmed, Leila (1992), *Women and Gender in Islam: Historical Roots of a Modern Debat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Ajayi, J. F. Ade (1969), 'Colonialism: An Episode in African History', in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ed. L. H. Gann and P. Duignan.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Colonialism*,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97-509.
- Ajayi, J. F. Ade, ed. (1989), *Afric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until the 1880s*.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Vol. 6. Oxford, Heinemann.
- Alavi, Hamza and Shanin, Teodor (1982),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London, Macmillan.
- Alavi, Hamza et al. (1982), *Capitalism and Colonial Production*. London, Croom Helm.
- Albertini, Rudolf von (1971), *Decoloniz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Future of the Colonies, 1919-1960*, trans. Francisca Garvie. New York, Doubleday.
- Albright, David E., ed. (1980), *Africa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London, Macmillan.
- Alexander, M. Jacqui and Mohanty, Chandra Talpade (1997), *Feminist Genealogies, Colonial Legacies, Democratic Futures*. New York, Routledge.
- Alexander, Robert J. (1957), *Communism in Latin America*.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Alexander, Robert J. (1973), *Trotskyism in Latin America*.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 Alexander, Robert J. (1991), *International Trotskyism 1929-1985: A Documented Analysis of the Movement*.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Ali, Tariq (1985), *The Nehrus and the Gandhis: An Indian Dynasty*, foreword by Salman Rushdie. London, Putnam.
- Ali, Tariq, ed. (1984), *The Stalinist Legacy: Its Impact on Twentieth-century World Poli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 Allen, Chris and Williams, Gavin (1982), *Sub-Saharan Africa*. London, Macmillan.
- Allen, Kieran (1990), *The Politics of James Connolly*. London, Pluto.
- Allison, Roy (1988),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Strategy of Non-alignment in the Third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llworth, Edward, ed. (1980), *Ethnic Russia in the USSR: The Dilemma of Dominance*.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 Althusser, Louis (1966), 'Sur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Cahiers Marxist-Léninistes* 14, 5-16.
- Althusser, Louis (1971),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New Left Books.
- Althusser, Louis (1977), *For Marx*,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Verso.
- Althusser, Louis (1993), *The Future Lasts a Long Time; and, The Facts*, ed. Olivier Corpet and Yann Moulier Boutang, trans. Richard Veasey. London, Chatto & Windus.
- Althusser, Louis and Balibar, Etienne (1970), *Reading Capital* (1968),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NLB.
- Alvarez, Sonia E., Dagnino, Evelina and Escobar, Arturo, eds (1998), *Cultures of Politics, Politics of Cultures: Re-visioning Latin American Social Movement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Amate, C. O. C. (1986), *Inside the OAU: Pan-Africanism in Practice*. Basingstoke, Macmillan.
- Amin, Samir (1973), *Neo-colonialism in West Africa*, trans. Francis McDonagh. Harmondsworth, Penguin.
- Amin, Samir (1974),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Amin, Samir (1977), *Imperialism and Unequal Development*. Hassocks, Harvester Press.
- Amin, Samir (1981), *L'Avenir du maoïsme*.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 Amin, Samir (1988), *Eurocentrism*. London, Zed Books.
- Amin, Shahid (1995), *Event, Metaphor, Memory: Chauri Chaura 1922-1992*.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mrane, Djamilia (1994), *Des Femmes dans la guerre d'Algérie: entretiens*. Paris, Karthala.
- Anderson, Benedict (1983), *Imaginary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Anderson, Perry (1962), 'Portugal and the End of Ultra-Colonialism', *New Left Review* 15: 83-102; 16: 88-123; 17: 85-114.
- Anderson, Perry (1976-7), '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New Left Review* 100, 5-79.
- Andersson, Efraim (1958), *Messianic Popular Movements in the Lower Congo*. Uppsala, Almqvist & Wiksells.
- Andrade, Mário de (1980), *Amilcar Cabral: essai de biographie politique*. Paris, Maspéro.
- Andrade, Mário de (1997), *Origens do nacionalismo africano: continuidade e ruptura nos movimentos unitários emergentes da luta contra a dominação colonial portuguesa, 1911-1961*. Lisbon, Publicações Dom Quixote.
- Andrew, Christopher M. and Kanya-Forstne, A. S. (1981), *France Overseas: The Great War and the Climax of French Imperial Expansion*. London, Thames & Hudson.
- Apffel-Marglin, Frédérique and Marglin, Stephen A., eds (1996), *Decolonizing Knowledge: From Development to Dialogu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Appadorai, Angadipuram (1955), *The Bandung Conference*. New Delhi, Indian Council of World Affairs.
- Appadurai, Arjun, ed. (1986),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ppiah, Kwame (1992), *In My Father's House: Africa in the Philosophy of Culture*. London, Methuen.
- Arendt, Hannah (1970), *On Violence*. London, Allen Lane.
- Arndt, Heinz (1987),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History of an Ide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rnold, David (1977), *The Congress in Tamilnad: Nationalist Politics in South India, 1919-1937*. London, Curzon Press.
- Arumugam, M. (1978), *Socialist Thought in India: The Contribution of Rammanohar Lohia*. New Delhi, Sterling.
- Ashcroft, Bill, Griffiths, Gareth and Tiffin, Helen (1989),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London, Routledge.
- Ashcroft, Bill, Griffiths, Gareth and Tiffin, Helen (1998), *Key Concepts in Post-coloni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1955),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Bandung Conference: Texts of Selected Speeches and Final Communique of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Bandung, Indonesia, April 18-24, 1955*.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 Avineri, Shlomo, ed. (1968), *Karl Marx on Colonialism and Modernization*. New York, Doubleday.
- Aylmer, G. E. (1975), *The Levellers in the English Revolution*. London, Thames & Hudson.
- Azikiwe, Nnamdi (1968), *Renascent Africa*, London Cass.
- Bagchi, Amiya Kumar (198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nderdevelop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irathi, Shashi (1987),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in India: A Study in Interrelationship, 1919-1947*. Noida, Anamika Prakashan.
- Bakshi, S. R. (1981), *Gandhi and Salt Satyagraha*. Malayattoor, Kerala, Vishwavidya Publishers.
- Bakshi, S. R. (1987), *Gandhi and Status of Women*. New Delhi, Criterion Publications.

- Bala, Usha and Sharma, Anshu (1986), *Indian Women Freedom Fighters, 1857–1947*. New Delhi, Manohar.
- Balibar, Etienne and Wallerstein, Immanuel (1991), *Race, Nation, Class: Ambiguous Identities*. London, Verso.
- Balibar, Renée and Laporte, Dominique (1974), *Le Français national: politique et pratiques de la langue nationale sous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Hachette.
- Balibar, Renée, Merlin, Geneviève and Tret, Gilles (1974), *Les Français fictifs: le rapport des styles littéraires au français national*. Paris, Hachette.
- Bamford, P. C. (1974), *Histories of the Non-Cooperation and Khilafat Movements*. Delhi, Deep Publications.
- Banerjee, Diptendra (1985), *Marxian Theory and the Third World*.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 Baran, Paul (195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Barker, Francis, Hulme, Peter and Iverson, Margaret (1994), *Colonial Discourse / Postcolonial Theo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Barlow, Tani E. (1997), *Formations of Colonial Modernity in East Asi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Barone, Charles A. (1985), *Marxist Thought on Imperialism: Survey and Critique*. Basingstoke, Macmillan.
- Bassnett, Susan and Trivedi, Harish (1999),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 Basu, Amrita, ed. (1995), *The Challenge of Local Feminism: Women's Movement in Global Perspectiv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Battistini, Lawrence H. (1955),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 Baulin, Jacques (1962), *The Arab Role in Africa*. Harmondsworth, Penguin.
- Baumgart, Winfried (1982), *Imperialism: The Idea and Reality of British and French Colonial Expansion, 1880–1914*, revd edn, trans. by the author with Ben V. M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yart, Jean-François (1993), *The State in Africa: The Politics of the Belly* [1989], trans. Mary Harper, Christopher and Elizabeth Harison. London, Longman.
- Bayly, C. A. (1988), *Indian Society and 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yly, C. A. (1989), *Imperial Meridia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World 1780–1830*. London, Longman.
- Bayly, C. A. (1996), *Empire and Information: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India, 1780–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ck, Lois and Keddie, Nikki, eds (1978), *Women in the Muslim Worl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ecker, David G. and Sklar, Richard L., eds (1999), *Postimperi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Westport, CT, Praeger.
- Becker, David G., et al. (1987), *Postimperialism: 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Lynne Rienner.
- Becker, Marc (1993), *Mariátegui and Latin American Marxist Theory*. Athens, OH, Ohio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 Behbehani, Hashim S. H. (1986), *The Soviet Union and Arab Nationalism, 1917–1966*. London, KPI.
- Bell, Kenneth N. and Morrell, W. P. (1928), *Select Documents on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1830–186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Bennett, George, ed. (1953), *The Concept of Empire: Burke to Atlee, 1774–1947*. London, Adam and Charles Black.
- Bennigsen, Alexandre (1958), 'Sultan Galiev: The USSR and the Colonial Revolution', in Walter Laqueur, ed., *The Middle East in Transi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398–414.
- Bennigsen, Alexandre and Broxup, Marie (1983), *The Islamic Threat to the Soviet State*. London, Croom Helm.
- Bennigsen, Alexandre and Lemerrier-Quelquejey, Chantal (1981), *Les Musulmans oubliés. L'Islam en Union soviétique*. Paris, Maspero.
- Bennigsen, Alexandre and Lemerrier-Quelquejey, Chantal (1986), *Sultan Galiev, le père de la révolution tiers-mondiste*. Paris, Fayard.
- Bennigsen, Alexandre and Quelquejey, Chantal (1961), *The Evolution of the Muslim Nationalities of the USSR and their Linguistic Problems*. London, Central Asian Research Centre.
- Bennigsen, Alexandre and Wimbush, S. Enders (1979), *Muslim National Communism in the Soviet Union: A Revolutionary Strategy for the Colonial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ennington, Geoffrey and Derrida, Jacques (1993), *Jacques Derrida* [199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entham, Jeremy (1843), *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 ed. J. Bowring, 11 vols. Edinburgh, William Tait.
- Benton, Gregor (1996), *China's Urban Revolutionaries: 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otskyism, 1921–1952*.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 Berger, Iris (1992), *Threads of Solidarity: Women in South African Industry, 1900–1980*. London, James Currey.
- Berman, Russell A. (1998), *Empire or Enlightenment: Colonial Discourse in German Culture*.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Bertrand, Louis and Petrie, Sir Charles (1952), *The History of Spain*, 2nd edn.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 Besant, Annie (1915), *Self-government for India*. Madras,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 Betts, Raymond F. (1961), *Assimilation and Association in French Colonial Theory 1890–191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everly, John, Oviedo, José and Aronna, Michael, eds (1995), *The Postmodernism Debate in Latin Americ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Bhabha, Homi K. (1991),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Arena* 96: 47–63.
- Bhabha, Homi K.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Bhattacharya, Bhabani (1969), *Gandhi: The Writer (The Image as it Grew)*. Delhi, National Book Trust.
- Bhattacharyya, S. N. (1965), *Mahatma Gandhi, The Journalist*. Bombay, Asia Publishing House.
- Biko, Steve (1978), *I Write What I Like*. London, Bowerdean.
- Biswas, Arun Kumar (1986), *Swami Vivekananda and the Indian Quest for Socialism*. Calcutta, Firma KLM.
- Bitterli, Urs (1989), *Cultures in Conflict: Encounters Between European and Non-European Cultures, 1492–1800*.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lackburn, Robin (1988), *The Overthrow of Colonial Slavery, 1776–1848*. London, Verso.
- Bleys, Rudi C. (1996), *The Geography of Perversion: Male-to-male Sexual Behaviour Outside the West and the Ethnographic Imagination, 1750–1918*. London, Cassell.
- Bliss, Robert M. (1990), *Revolution and Empire: English Politics and the American Colonie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Bloch, Ernst, et al. (1977),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Debates Between Bloch, Lukács, Brecht, Benjamin and Adorno*. London, Verso.
- Blomström, M. and Hettne, B. (1984), *Development Theory in Transition: The Dependency Debate and Beyond. Third World Responses*. London, Zed Books.
- Boahen, A. Adu (1987),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olonialism*.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Boahen, A. Adu, ed. (1985), *Africa Under Colonial Domination, 1880–1935*.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7. Oxford, Heinemann.
- Bodelsen, C. A. (1960), *Studies in Mid-Victorian Imperialism*. London, Heinemann.
- Bolton, Kingsley and Hutton, Christopher (1995), 'Bad and Banned Language: Triad Secret Societies, the Censorship of the Cantonese Vernacular, and Colonial Language Policy in Hong Kong', *Language in Society* 24: 159–86.
- Borkenau, F. (1938),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London, Faber & Faber.
- Borsa, G. and Brocchieri, P. B., eds (1984), *Garibaldi, Mazzini e il Risorgimento nel risveglio dell'Asia e dell'Africa*. Milan, Angeli.
- Bose, Arun (1971), *Indian Revolutionaries Abroad, 1905–1922, in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 Patna, Bharati Bhawan.
- Bose, Subhas Chandra (1997), *The Indian Struggle, 1920–1942*, ed. Sisir K. Bose and Sugata Bose.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ttomore, T. and Goode, P. (1978), *Austro-Marx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Bottomore, Tom, Harris, Laurence, Kiernan, V. G. and Miliband, Ralph, eds (1991),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2nd ed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Bourdieu, Pierre (1958), *Sociologie de l'Algéri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Bourdieu, Pierre (1979), *Algeria 1960: Essays*,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ierre (1998), *Acts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New Myths of Our Time*,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ourdieu, Pierre and Darbel, Alain (1963), *Travail et travailleurs en Algérie*. Paris, Mouton.
- Bourdieu, Pierre and Sayad, Abdelmalek (1964), *Le Déracinement: la crise de l'agriculture traditionnelle en Algérie*.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 Bozzoli, Belinda and Nkotsie, Mmantho (1991), *Women of Phokeng: Consciousness, Life Strategy, and Migrancy in South Africa, 1900–1983*. London, James Currey.
- Bragança, Aquino de and Wallerstein, Immanuel, eds (1982), *The African Liberation Reader*, 3 vols. London, Zed Books.
- Brailsford, H. N. (1961), *The Levellers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London, Cresset Press.
- Brandt, C., Schwartz, B. and Fairbank, J. K., eds (1952),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London, Allen & Unwin.
- Brandt, W. et al. (1980), *North–South: A Programme for Survival.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ssues*. London, Pan.
- Brantley, Cynthia (1981), *The Giriama and Colonial Resistance in Kenya, 1800–19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rantley, Cynthia (1986), 'Mekatalili and the Role of Women in Giriama Resistance', in *Banditry, Rebellion and Social Protest in Africa*, ed. Donald Crummey. London, James Currey, 333–50.
- Brasted, H. V. (1980), 'Indian Nationalist Development and the Influence of Irish Home Rule, 1870–1886', *Modern Asian Studies*, 14: 1, 37–63.
- Brasted, H. V. (1983), 'Nationalism and Empire, 1873–91', in O. MacDonagh, W. F. Mandle and P. Travers, eds, *Irish Culture and Nationalism, 1750–1950*. London, Macmillan, 83–103.
- Brathwaite, Edward (1971), *The Development of Creole Society in Jamaica 1770–182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Braun & Cie (1931), *Promenade à travers l'exposition coloniale internationale. 24 cartes détachables*. Paris.
- Braunthal, Julius (1966),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1864–1914*, trans. Henry Collins and Kenneth Mitchell. London, Nelson.
- Breckenridge, Carol A. and van der Veer, Peter, eds (1993), *Orientalism and the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 Perspectives on South As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Brennan, Timothy (1989), *Salman Rushdie and the Third World: Myths of the Nation*. London, Macmillan.
- Brennan, Timothy (1997), *At Home in the World: Cosmopolitanism Now*.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etton, Henry L. (1967), *The Rise and Fall of Kwame Nkrumah: A Study of Personal Rule in Africa*. London, Pall Mall Press.
- Breuilly, John (1993),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2nd ed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Brewer, Anthony (1980), *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A Critical Surve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Brinkley, Douglas and Facey-Crowther, David R. (1994), *The Atlantic Charter*. Basingstoke, Macmillan.
- Brown, Judith M. (1989), *Gandhi: Prisoner of Hop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uchan, John (1921–2), *A History of the Great War*, 2 vols. London, Thomas Nelson.
- Bukharin, Nikolai Ivanovich (1972), *Imperialism and World Economy [1915]*, introduction by V. I. Lenin. London, Merlin Press.
- Bull, Bartle (1992), *Safari: A Chronicle of Adventure*. London, Penguin.
- Burke, Edmund (1981),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 5, India: Madras and Bengal 1774–1785*, ed. P. J. Marshall and William B. Tod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Burke, Edmund (1991),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 6, India: The Launching of the Hastings Impeachment 1786–1788*, ed. P. J. Marshall and William B. Tod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Burkholder, Mark A. and Johnson, Lyman L. (1998), *Colonial Latin America*, 3rd ed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urton, Antoinette M. (1994), *Burdens of History: British Feminists, Indian Women, and Imperial Culture, 1865–191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Burton, Antoinette M. (1998), *At the Heart of the Empire: Indians and the Colonial Encounter in Late-Victorian Britai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urton, Antoinette M., ed. (1999), *Gender, Sexuality and Colonial Modernities*. London, Routledge.
- Bute, E. L. and Harmer, H. J. P. (1997), *The Black Handbook: The Peopl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Africa and the African Diaspora*. London, Cassell.
- Butler, Jeffrey (1968), *The Liberal Party and the Jameson Rai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Byres, T. J. and Mukhia, Harbans, eds (1985), *Feudalism and Non-European Societies*. London, Frank Cass.
- Caballero, Manuel (1986), *Latin America and the Comintern 1919–194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bral, Amilcar (1969), *Revolution in Guinea: An African People's Struggle*. London, Stage 1.
- Cabral, Amilcar (1973), *Return to the Source: Selected Speeches by Amilcar Cabr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with Africa Information Service.

- Cain, P. J. and Hopkins, A. G. (1993a), *British Imperialism: Innovation and Expansion, 1688–1914*. London, Longman.
- Cain, P. J. and Hopkins, A. G. (1993b), *British Imperialism: Crisis and Deconstruction, 1914–1990*. London, Longman.
- Callaway, Helen (1987), *Gender, Culture, and Empire*. Basingstoke, Macmillan.
- Calvet, Pierre (1974), *Linguistique et colonialisme: petit traité de glottophagie*. Paris, Payot.
- Cameron, Deborah (1985), *Feminism and Linguistic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 Campa Mendoza, Víctor (1999), *Las insurrecciones de los pueblos indios en México: la rebelión zapatista en Chiapas*. Guadalajara, Jal., México, Ediciones Cuéllar.
- Camus, Albert (1983), *The Outsider*, trans. Joseph Laredo. Harmondsworth, Penguin.
- Canclini, Néstor Garcia (1995), *Hybrid Cultures: Strategies for Entering and Leaving Modernity*, trans. Christopher L. Chiappari and Silvia L. López.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Cardoso, F. and Faletto, E. (1979),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197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arr, E. H. (1966),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3 vols. Harmondsworth, Penguin.
- Carrère d'Encausse, Hélène (1992), *The Great Challenge: Nationalities and the Bolshevik State 1917–1930*, trans. Nancy Festinger. New York, Holmes & Meier.
- Carrère d'Encausse, Hélène and Schram, Stuart R. (1969), *Marxism and Asia: An Introduction with Readings*. London, Allen Lane.
- Caruso, Paolo (1969), 'Conversazione con Michel Foucault', in *Conversazioni con Claude Lévi-Strauss, Michel Foucault, Jacques Lacan*. Milan, Mursia.
- Casely Hayford, J. E. (1911), *Ethiopia Unbound: Studies in Race Emancipation*. London, C. M. Phillips.
- Casement, Sir Roger (1997), *The Amazon Journal of Roger Casement*, ed. Angus Mitchell. London, Anaconda Editions.
- Castro, Fidel (1972), *Fidel Castro Speaks*, ed. M. Kenner and J. Petras. Harmondsworth, Penguin.
- Castro, Fidel (1996), *Cuba at the Crossroads*. Melbourne, Ocean Press.
- Césaire, Aimé (1972), *Discourse on Colonialism [1955]*, trans. Joan Pinkha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Chabal, Patrick (1983), *Amílcar Cabral: Revolutionary Leadership and People's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akrabarty, Dipesh (1989), *Rethinking Working-class History: Bengal, 1890–194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hakrabarty, Dipesh (1992), 'Postcoloniality and the Artifice of History: Who Speaks for "Indian" Pasts?', *Representations* 37: 1–26.
- Chakrabarty, Dipesh (2000),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hakravarti, Uma (1998), *Rewriting History: The Life and Times of Pandita Ramabai*. New Delhi, Kali for Women.
- Chaliand, Gérard and Rageau, Jean-Pierre (1995), *The Penguin Atlas of Diasporas*, trans. A. M. Berrett.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 Chambers, Iain and Curtis, Lidia, eds (1996), *The Post-colonial Question: Common Skies, Divided Horizons*. London, Routledge.
- Chandhoke, Neera, ed. (1994), *Understanding the Post-colonial World: Theory and Method*.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 Chandra, Bipan (1979), *Nationalism and Colonialism in Modern India*. New Delhi, Orient Longman.
- Chatterjee, Partha (1986),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London, Zed Books.
- Chatterjee, Partha (1993),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hatterjee, Partha, ed. (1995), *Texts of Power: Emerging Disciplines in Colonial Bengal*.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Chatterjee, Partha (1997), *The Present History of West Bengal: Essays in Political Criticism*.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atterji, P. C. (1998), *The Adventure of Indian Broadcasting: A Philosopher's Autobiography*. Delhi, Konark Publishers.
- Chaudhuri, Rosinka (2000), 'Young India: A Bengal Eclogue; or Meat-eating, Race, and Reform in a Colonial Poem', *Interven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2: 3: 421–38.
- Chavarría, Jesús (1979), *José Carlos Mariátegui and the Rise of Modern Peru, 1890–1930*.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 Cheyfitz, Eric (1991), *The Poetics of Imperialism: Translation and Colonization from the Tempest to Tarz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ilcote, Ronald H. (1972), *Emerging Nationalism in Portuguese Africa: Documents*.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 Chopra, P. N., ed. (1988), *Indian Muslims in Freedom Struggle*. New Delhi, Criterion Publications.
- Cixous, Hélène (1998), 'My Algeriance, in other words: to depart not to arrive from Algeria', in *Stigmata: Escaping Texts*. London, Routledge, 153–72.
- Cixous, Hélène and Clément, Catherine (1986), *The Newly Born Woman*, trans. Betsy Wing.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Claudin, F. (1975), *The Communist Movement: From Comintern to Cominform*. Harmondsworth, Penguin.
- Clayton, Anthony (1994), *The Wars of French Decolonization*. London, Longman.
- Coggiola, Osvaldo (1986), *El trotskismo en la Argentina (1960–1985)*. Buenos Aires, Centro Editor de América Latina.
- Cohen, Robin and Rai, Shirin M. (2000), *Global Social Movements*. London, Athlone Press.
- Cohen, Robin, Gutkind, Peter C. W. and Brazier, Phyllis (1979), *Peasants and Proletarians: The Struggle of Third World Workers*. London, Hutchinson.
- Colley, Linda (1992),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Collotti Pischel, Enrica and Robertazzi, Chiara (1968), *L'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et les problèmes coloniaux, 1919–1935*. Paris, Editions Mouton.
- Comaroff, Jean and Comaroff, John L. (1991), *Of Revelation and Revolution: Christianity, Colonialism, and Consciousness in South Af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omaroff, Jean and Comaroff, John L. (1997), *Of Revelation and Revolution: The Dialectics of Modernity on a South African Frontier*, vol. 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omintern (1929a), *The Programme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ogether with the Statute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London, Modern Books.
- Comintern (1929b), *Commun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heses o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 task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dopted at the Sixth World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28*. London, Modern Books.
- Comintern (1929c),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the Colonies. Thesis on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the Colonies, adopted by the Sixth World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London, Modern Books.



- Committee on Africa, the War, and Peace Aims (1942), *The Atlantic Charter and Africa from an American Standpoint: A study by the Committee on Africa, the War, and Peace Aim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eight points" of the charter to the problems of Africa, and especially those related to the welfare of the African people living south of the Sahara, with related material on African conditions and needs.* New York City, Committee on Africa, the War, and Peace Aims.
- Congress of the Toilers of the Far East (1970), *The First Congress of the Toilers of the Far East, held in Moscow, January 21st–February 1st 1922.* London, Hammersmith Bookshop.
- Conklin, Alice L. (1997), *A Mission to Civilize: The Republican Ideal of Empire in France and West Africa, 1895–193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nnolly, James (1968), *Revolutionary Warfare.* Dublin, New Books.
- Connolly, James (1973),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ed. Owen Dudley Edwards and Bernard Ransom. London, Jonathan Cape.
- Connolly, James (1977), *Should the Workers of Ireland Support Sinn Féin?* Cork, Cork Workers' Club.
- Connolly, James (1988a), *Collected Works.* 2 vols. Dublin, New Books Publications.
- Connolly, James (1988b), *Selected Writings*, ed. P. Berresford Ellis. London, Pluto Press.
- Connolly, James (1997), *The Lost Writings*, ed. Aindrias Ó Cathasaigh. London, Pluto Press.
- Connor, Walker (1994), *Ethnonationalism: The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onrad, Joseph (1923), *Youth: A Narrative, and Two Other Stories.* London, J. M. Dent.
- Constantine, Learie (1954), *Colour Bar.* London, Stanley Paul.
- Coogan, Tim Pat (1990), *Michael Collins: A Biography.* London, Hutchinson.
- Copley, Antony (1987), *Gandhi: Against the Tid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Coquery-Vidrovitch, Catherine (1997), *African Women: A Modern History [1994]*, trans. Beth Gillian Rap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Courrière, Yves (1968–71), *La Guerre d'Algérie*, 4 vols. Paris, Fayard.
- Crocker, W. R. (1949), *Self-government for the Colonie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Crowder, Michael (1971), *West African Resistance: The Military Response to Colonial Occupation.* New York, Africana Publishing.
- Crowley, Tony (1989),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The Standard Language Question in British Cultural Debates.* Basingstoke, Macmillan.
- Crowley, Tony (1991), *Proper English? Readings in Language, Hist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 Crummey, Donald, ed. (1986), *Banditry, Rebellion and Social Protest in Africa.* London, James Currey.
- Cullen, Mary, ed. (1998), *1798: 200 Years of Resonance. Essays and Contributions on the History and Relevance of the United Irishmen and the 1798 Revolution.* Dublin, Irish Reporter Publications.
- Culler, Jonathan (1975), *Structuralist Poetics: Structuralism, 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Curran, Jean Alonzo (1951), *Militant Hinduism in Indian Politics: A Study of the R.S.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 Curtin, Philip D. (1989), *Death by Migration: Europe's Encounter with the Tropical Worl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Curtin, Philip D., ed. (1972), *Imperialism.* London, Macmillan.
- da Campos, Haroldo (1986), 'The Rule of Anthropophagy: Europe Under the Sign of Devoration', *Latin American Literary Review* 14: 27, 42–60.
- Dallmayr, Fred R. and Devy, G. N. (1998),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dia's Search for Identity: A Twentieth Century Anthology.*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 Darby, Phillip, ed. (1997), *At the Edg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stcolonialism, Gender and Dependency.* London, Pinter.
- Dasgupta, Biplab (1974), *The Naxalite Movement.* Bombay, Allied Publishers.
- Davenport, T. R. H. (1991), *South Africa: A Modern History*, 4th edn. Basingstoke, Macmillan.
- Davidson, Basil (1969), *The Liberation of Guiné: Aspects of an African Revolution*, foreword by Amílcar Cabral. Harmondsworth, Penguin.
- Davidson, Basil (1992), *The Black Man's Burden: Africa and the Curse of the Nation-State.* London, James Currey.
- Davies, Miranda, ed. (1983), *Third World, Second Sex: Women's Struggles and National Liberation.* London, Zed Books.
- Davin, Anna (1978), 'Imperialism and Motherhood', *History Workshop* 5, 9–65.
- Davis, Angela, Magee, Ruchell, the Soledad Brothers, and other political prisoners (1971), *If They Come in the Morning: Voices of Resistance.* London, Orbach & Chamber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Angela Davis Defence Committee.
- Davis, Lance E. and Huttenback, Robert A. (1986), *Mammon and the Pursuit of Empir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60–191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wson, Graham (1994) *Soldier Heroes: British Adventure, Empire and the Imagining of Masculinities.* London, Routledge.
- de Beauvoir, Simone (1968), *Force of Circumstance*, trans. Richard Howard. Harmondsworth, Penguin.
- de Beauvoir, Simone and Halimi, Gisèle (1962), *Djamila Boupacha: The Story of the Torture of a Young Algerian Girl which Shocked Liberal French Opinion*, trans. Peter Green. London, André Deutsch,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 De Graft Johnson, J. W. (1928), *Towards Nationhood in West Africa: Thoughts of Young Africa Addressed to Young Britain.* London, Headley Brothers.
- de Saussure, Léopold (1899), *Psychologie de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s sociétés indigènes.* Paris, Félix Alcan.
- de Silva, K. M. (1981), *A History of Sri Lanka.*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 Tocqueville, Alexis (1988), *De la Colonie en Algérie, présentation de Tzvetan Todorov*, Brussels, Editions Complexe.
- Debray, Régis (1967), *Revolution in the Revolution? Armed Struggle and Political Struggle in Latin America*, trans. Bobbye Ortiz.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Deleuze, Gilles and Guattari, Félix (1977),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Vol. 1 [1972], trans. Robert Hurley, Mark Seem and Helen Lane. New York, Viking.
- Dennett, Tyler (1963),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A Critical Study of United States' Policy in the Far Eas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Barnes & Noble.
- Derrida, Jacques (1976), *Of Grammatology [1967]*, trans.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Derrida, Jacques (1978), *Writing and Difference [1967]*, trans. Alan Bass. London, Routledge.
- Derrida, Jacques (1979), Seminar with the *Oxford Literary Review*, unpublished transcript.
- Derrida, Jacques (1980), 'An Interview with Jacques Derrida', with J. Kearns and K. Newton, *The Literary Review*, no. 14, April 18–May 1.
- Derrida, Jacques (1981), *Positions [1972]*, trans. Alan Ba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errida, Jacques (1982), *Margins – of Philosophy [1972]*, trans. Alan Ba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errida, Jacques (1985), 'An Interview with Derrida' ['Derrida l'insoumis', 1983], in *Derrida and Difference*, ed. David Wood and R. Bernasconi. Warwick, Parousia-Press, 107-27.
- Derrida, Jacques (1987a), *Psyché: Invention de l'autre*. Paris, Galilée.
- Derrida, Jacques (1987b), *The Post Card* [1980], trans. Alan Ba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errida, Jacques (1992), *The Other Heading: Reflections on Today's Europe* [1991], trans. P. A. Brault and M. Naa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Derrida, Jacques (1993), *Aporias*, trans. Thomas Dutoi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rrida, Jacques (1998), *Monolingualism of the Other, or the Prosthesis of Origin* [1996], trans. Patrick Mensah.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rrida, Jacques (1999), *Sur parole: instantanés philosophiques*. La Tour d'Aigues, Aube.
- Desai, Narayan (1995), *The Fire and the Rose: Biography of Mahadevhai*. Ahmedabad, Navajivan Publishing House.
- Deutscher, I. (1970), *The Prophet Armed. Trotsky: 1921-192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vy, G. N. (1992), *After Amnesia: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Indian Literary Criticism*. Hyderabad, Orient Longman.
- Devy, G. N. (1998), 'Of Many Heroes': *An Indian Essay in Literary Historiography*. Hyderabad, Orient Longman.
- Dewitte, Philippe (1985), *Les Mouvements nègres en France, 1919-1939*. Paris, Harmattan.
- Dia, Mamadou (1961), *The African Nations and World Solidarity*, trans. Mercer Cook.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 Díaz Polanco, Héctor (1997), *La rebelión zapatista y la autonomía*. México, D.F., Siglo Veintiuno Editores.
- Dijk, Teun A. van (1985), *Discourse and Communication: New Approaches to the Analysis of Mass Media Discourse and Communication*. Berlin, W. de Gruyter.
- Dilke, Charles Wentworth (1868), *Greater Britain: A Record of Travel in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London, Macmillan.
- Dilke, Charles Wentworth (1890), *Problems of Greater Britain*. [1890], 4th edn. London, Macmillan.
- Dillon, Dorothy (1962),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and Latin America: Perspectives and Prospects*. Gainesville,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 Dillon, Martin (1994), *The Enemy Within: The IRA's War against the British*. London, Doubleday.
- Diop, Alioune (1947), 'Niam n'goura, or *Présence Africaine's raison d'être*', trans. Richard Wright and Thomas Diop. *Présence Africaine* 1: 185-92.
- Diop, Cheikh Anta (1955), *Nations nègres et culture*. Paris, Éditions africaines.
- Diop, Cheikh Anta (1989), *The Cultural Unity of Black Africa: The Domains of Matriarchy and of Patriarchy in Classical Antiquity*, introduction by Ife Amadiume. London, Karnak House.
- Dirlik, Arif (1989),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irlik, Arif (1991),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irlik, Arif (1997), *The Postcolonial Aura: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Dirlik, Arif, Healy, Paul Michael and Knight, Nick (1997),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 Donaldson, Robert H. (1981),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Third World: Successes and Failure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Dreyfus, Herbert L. and Rabinow, Paul (1982),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Brighton, Harvester Press.
- Du Bois, W. E. Burghardt (1965), *The World and Africa: An Inquiry into the Part which Africa has Played in World History*, enlarged ed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Du Bois, W. E. Burghardt (1989),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1903]. New York, Bantam Books.
- Dublish, Kaushalya Devi (1982), *Revolutionaries and their Activities in Northern India*. Delhi, B.R. Publishing.
- Duhalde, Eduardo Luis (1994), *Chiapas, la nueva insurgencia: la rebelión zapatista y la crisis del Estado Mexicano*. Buenos Aires, Ediciones del Pensamiento Nacional.
- Duse, Mohamed (1911), *In the Land of the Pharaohs: A Short History of Egypt from the Fall of Ismail to the Assassination of Boutros Pasha*. London, Cass.
- Dutt, R. Palme (1940), *India Today*. London, Victor Gollancz.
- Eagleton, Terry (1998), 'Postcoloni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Interven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1: 1, 24-6.
- Echenberg, Myron J. (1991), *Colonial Conscripts: The Tirailleurs Sénégalais in French West Africa, 1857-1960*. London, James Currey.
- Eddy, John J., Schreuder, Deryck and MacDonagh, Oliver (1988), *The Rise of Colonial Nationalism: Australia, New Zealand, Canada and South Africa First Assert Their Nationalities, 1880-1914*. London, Allen & Unwin.
- Eickelman, Dale F. and Piscatori, James (1996), *Muslim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El Kabbach, Jean-Pierre (1968), 'Foucault répond à Sartre', *La Quinzaine littéraire* 46: 20-2.
- El-Ayouty, Yassin (1994), *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After Thirty Years*. Westport, CN, Praeger.
- Eliot, T. S. (1948), *Selected Poems*. Harmondsworth, Penguin.
- Elliott, Gregory (1987), *Althusser: The Detour of Theory*. London, Verso.
- Elliott, J. H. (1970), *Imperial Spain 1469-1716* [1962]. London, Penguin.
- El-Nasser, Gamal Abd (1954), *The Philosophy of Revolution. Book I*. Cairo, Dar Al-maaref.
- El-Sadaawi, Nawal (1980), *The Hidden Face of Eve: Women in the Arab World*. London, Zed Books.
- Emmanuel, Arghiri (1972), *Unequal Exchange: A Study of the Imperialism of Trade*, trans. Brian Pearc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English, Richard (1998), *Ernie O'Malley, IRA Intellectua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Escobar, Arturo (1995),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Esedebe, P. Olanwuche (1994), *Pan-Africanism: The Idea and Movement, 1776-1991*, 2nd edn. Washington, DC, Howard University Press.
- Etienne, Mona and Leacock, Eleanor, eds (1980), *Women and Colonizatio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Praeger.
- Eze, Emmanuel Chukwudi (1997), *Postcolonial African Philosophy: A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Fabian, Johannes (1986), *Language and Colonial Power: The Appropriation of Swahili in the Former Belgian Congo 1880-193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abian, Johannes (1991), *Time and the Work of Anthropology: Critical Essays 1971-1991*. Chur, Switzerland, Harwood.
- Fairbank, J. K., ed. (1983),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2: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airclough, Norma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Faligot, R. (1978), *James Connolly et la mouvement révolutionnaire irlandaise*. Paris, Maspero.
- Fanon, Frantz (1965),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1961], trans. Constance Farrington. London, MacGibbon & Kee.
- Fanon, Frantz (1967), *Toward the African Revolution* [1964], trans. Haakon Chevali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Fanon, Frantz (1980), *A Dying Colonialism* [*L'An cinq de la révolution Algérienne*, 1959], trans. Haakon Chevalier. London, Writers and Readers Cooperative.
- Fanon, Frantz (1986), *Black Skin, White Masks* [1952], trans. Charles Lam Markmann. London, Pluto.
- Femia, Joseph V. (1981), *Gramsci's Political Thought: Hegemony, Consciousness and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Ferguson, Moira (1992), *Subject to Others: British Women Writers and Colonial Slavery, 1670–1834*. London, Routledge.
- Ferrari Bravo, Giuliano (1981), *San Francisco: Le origini del sistema coloniale delle nazione unite*. Venice, Marsilio Editori.
- Ferro, Marc (1997), *Colonization: A Global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 Fessehazion, Tekie, ed. (1999), *Eritrea and Ethiopia: From Conflict to Cooperation to Conflict*. Lawrenceville, NJ, Red Sea Press.
- Feuchtwanger, E. J. and Nailor, Peter (1981),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ird World*. London, Macmillan.
- Fieldhouse, D. K. (1982), *The Colonial Empires: A Comparative Survey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Macmillan.
- Fields, A. Belden (1988), *Trotskyism and Maoism: Theory and Practice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Praeger.
- Fink, Carole, Gassert, Philipp and Junker, Detlef, eds (1998), *1968: The World Transform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ischer, Louis (1947), *Gandhi and Stalin: Two Signs at the World's Crossroads*. Delhi, Rajkmal Publications.
- Fisher, Frederick B. (1932), *That Strange Little Brown Man Gandhi*. New York, Ray Long and Richard R. Smith.
- Forbes, Geraldine (1996), *Women in Modern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ord, James W. (1938), *The Negro and the Democratic Front*.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Forgacs, David (1982), 'Marxist Literary Theories', in *Modern Literary Theory: A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 ed. Ann Jefferson and David Robey. London, Batsford Academic, 166–203.
- Foster, R. F. (1988), *Modern Ireland 1600–1972*. London, Allen Lane.
- Foucault, Michel (1970),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1966], trans. anonymous.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 Foucault, Michel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1969], trans. A. M. Sheridan Smith. London, Tavistock.
- Foucault, Michel (1977a),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1975], trans. Alan Sheridan. London, Allen Lane.
- Foucault, Michel (1977b),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ed. Donald F. Bouchard, trans. Donald F. Bouchard and Sherry Sim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Foucault, Michel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One: An Introduction* [1976], trans. Robert Hurley. London, Allen Lane.
- Foucault, Michel (1979), 'My Body, This Paper, This Fire', *Oxford Literary Review* 4: 1, 9–28.

- Foucault, Michel (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ed. Colin Gordon, trans. Colin Gordon et al.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Foucault, Michel (1981), 'The Order of Discourse', in *Untying the Text: A Post-Structuralist Reader*, ed. Robert J. C. Young.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48–78.
- Foucault, Michel (1986), 'Of Other Spaces' [1967], *Diacritics* 16: 1, 22–7.
- Fowler, Roger (1979), *Language and Contro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Fox, Ralph Winston (1974), *Marx, Engels and Lenin on the Irish Revolution*. Cork, Cork Workers.
- Franco, Jean (1989), *Plotting Women: Gender and Representation in Mexico*. London, Verso.
- Franda, Marcus F. (1971), *Radical Politics in West Bengal*.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Frank, A. G. (1969),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le and Brazil* [1967], revd ed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Franklin, Vincent P. (1992), *Black Self-determination: A Cultural History of African-American Resistance*, Brooklyn, NY, Lawrence Hill Books.
- Fredrickson, George M. (1996), *Black Liberation: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Black Ideolog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Af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reire, Paulo (1972),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trans. Myra Bergman Ramos. Harmondsworth, Penguin.
- Freyre, Gilberto (1946), *The Masters and the Slaves: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Brazilian Civiliza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Friedland, William H. and Rosberg, Carl G., eds (1964), *African Socialis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Froude, James Anthony (1886), *Oceana: or, England and her Colonies*. London, Longmans, Green.
- Froude, James Anthony (1909), *The English in the West Indies, or The Bow of Ulysses* [1887]. London, Longmans, Green.
- Fülöp-Miller, René (1927a), *Lenin and Gandhi*. London, G. P. Putnam's Sons.
- Fülöp-Miller, René (1927b), *The Mind and Face of Bolshevism: An Examination of Cultural Life in Soviet Russia*, trans. F. S. Flint and D. F. Tait. London, G. P. Putnam's Sons.
- Füredi, Frank (1994), *Colonial Wars and the Politics of Third World Nationalism*. London, I. B. Tauris.
- Furtado, Celso (1964),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trans. Ricardo W. de Aguiar and Eric Charles Drysda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uss, Diana (1994), 'Interior Colonies: Frantz Fano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fication', *Diacritics* 24: 2–3, 20–42.
- Gadant, Monique (1995), *Le Nationalisme Algérien et les femmes*. Paris, L'Harmattan.
- Gadea, Hilda (1973), *Ernesto: A Memoir of Che Guevara*. London, W. H. Allen.
- Galeano, Eduardo (1973), *The Open Veins of Latin America: Five Centuries of the Pillage of a Continent*, trans. Cedric Belfrag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Gall, Olivia (1991), *Trotsky en México: y la vida política en el periodo de Cárdenas, 1937–1940*. México, Ediciones Era.
- Gallet, Paul (1972), *Freedom to Starve*. Harmondsworth, Penguin.
- Gálvez, William (1999), *Che in Africa: Che Guevara's Congo Diary*, trans. Mary Todd. Melbourne, Ocean Press.
- Gandhi, Leela (1998), *Postcolonial Theo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Gandhi, M. K. (1924), *Sermon on the Sea*. Chicago, Universal Publishing.
- Gandhi, M. K. (1950), *Satyagraha in South Africa* [1928], revd edn, trans. Valji Govindji Desai. Ahmedabad, Navajivan Publishing House.

- Gandhi, M. K. (1951), *Ruskin's Unto This Last: A Paraphrase*. Ahmedabad, Navajivan Publishing House.
- Gandhi, M. K. (1956), *Thoughts on National Language*. Ahmedabad, Navajivan Publishing House.
- Gandhi, M. K. (1958–84),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hatma Gandhi*, 90 vols. Delhi, Publications Division,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Broadcasting, Govt. of India.
- Gandhi, M. K. (1982), *An Autobiography or 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 [1927]. Harmondsworth, Penguin.
- Gandhi, M. K. (1993), *The Essential Writings of Mahatma Gandhi*, ed. Raghavan Iyer.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andhi, M. K. (1997), *Hind Swaraj, and Other Writings*, ed. Anthony J. Par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ndhi, Rajmohan (1999), *Revenge and Reconciliation*, New Delhi, Penguin India.
- Garvin, Tom (1987), *Nationalist Revolutionaries in Ireland 1858–192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Gaur, Meena (1989), *Sati and Social Reform in India*. Jaipur, Publication Scheme.
- Geiss, I. (1974), *The Pan-African Movement*. London, Methuen.
- Gelder, Ken and Jacobs, Jane M. (1998), *Uncanny Australia: Sacredness and Identity in a Postcolonial Nation*.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 Gellner, Ernest (1993), 'The Mightier Pen? Edward Said and the Double Standards of Inside-out Colonialism', *TLS* 19 February, 3–4.
- George, Susan (1988), *A Fate Worse Than Debt*. London, Penguin.
- George, Susan (1992), *The Debt Boomerang: How Third World Debt Harms Us All*. London, Pluto Press.
- Gerassi, John, ed. (1971), *Towards Revolution*, 2 vol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 Ghosh, Utpal (1996),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and India's Freedom Struggle, 1937–1947*. Calcutta, Pearl Publishers.
- Giap, General Vo Nguyen (1962), *People's War People's Army: The Viet Cong Insurrection Manual for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1961].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 Gibbons, Luke (forthcoming), *The Colonial Sublime: Edmund Burke, The Enlightenment, and Ireland*.
- Gilroy, Paul (1993),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London, Verso.
- Glassman, Jonathon (1995), *Feasts and Riot: Revelry, Rebellion, and Popular Consciousness on the Swahili Coast, 1856–1888*. London, James Currey.
- Glissant, Édouard (1989), *Caribbean Discourse: Selected Essays* [1981], trans. Michael Dash.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 Glissant, Édouard (1997), *Poetics of Relation* [1990], trans. Betsy Wing.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Gordon, David C. (1966), *The Passing of French Alger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rdon, David C. (1968), *Women of Algeria: An Essay on Chan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orriti Ellenbogen, Gustavo (1999), *The Shining Path: A History of the Millenarian War in Peru*, trans. Robin Kirk.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Gott, Richard (1973), *Rural Guerrillas in Latin America*. Harmondsworth, Penguin.
- Gouda, Frances (1995), *Dutch Culture Overseas: Colonial Practice in Indonesia 1900–1942*.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 Graham, Richard, ed. (1990), *The Idea of Race in Latin America, 1870–1940*.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Gramsci, Antonio (1957), *The Modern Prince, and Other Writings*, trans. Louis Mar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Gramsci, Antonio (1971), *Selections from Prison Notebooks*, trans. Que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 Gramsci, Antonio (1989), *Letters from Prison*, trans. Lynne Lawner. New York, Noonday Press.
- Grewal, Inderpal (1996), *Home and Harem: Nation, Gender, Empire, and the Cultures of Travel*.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 Grey, Henry George (1853), *The Colonial Policy of Lord John Russell's Administration*, 2 vols. London, Richard Bentley.
- Griffith, George Chetwynd (1897), *Men Who Have Made the Empire*. London, Arthur Pearson.
- Grinker, Roy Richard and Steiner, Christopher B., eds (1997), *Perspectives on Africa: A Reader in Culture, History, and Representa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Gruber, Helmut (1974), *Soviet Russia Masters the Comintern: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in the Era of Stalin's Ascendancy*. New York, Anchor Books.
- Guevara, Ernesto Che (1965), *Colonialism is Doomed*.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11 December 1964. Havana, Ministry of External Relations Information Dept.
- Guevara, Ernesto Che (1968a), *Bolivian Diary*, introduction by Fidel Castro. London, Jonathan Cape.
- Guevara, Ernesto Che (1968b), 'Song to Fidel', in *Our Word: Guerrilla Poems from Latin America*, trans. Edward Dorn and Gordon Brotherston. London, Cape Golliard Press, 2–3.
- Guevara, Ernesto Che (1969), *Che: Selected Works of Ernesto Guevara*, ed. Rolando E. Bonachea and Nelson P. Vald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Guevara, Ernesto Che (1971), *Oeuvres*, 4 vols. Paris, Maspero.
- Guevara, Ernesto Che (1987), *Che Guevara and the Cuban Revolution: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rnesto Che Guevara*, ed. David Deutschmann. Sydney, Pathfinder.
- Guevara, Ernesto Che (1995), *The Motorcycle Diaries: A Journey Around South America*, trans. Ann Wright. London, Verso.
- Guevara, Ernesto Che (1996), *Episodes of the Cuban Revolutionary War, 1956–58*. New York, Pathfinder.
- Guevara, Ernesto Che (1997), *Che Guevara Reader: Writings on Guerrilla Strategy, Politics and Revolution*, ed. David Deutschmann. Melbourne, Ocean Press.
- Guevara, Ernesto Che (1998), *Guerrilla Warfare*.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Guha, Ranajit (1982a), 'On Some Aspects of the Historiography of Colonial India', *Subaltern Studies I: Writings on South Asian History and Society*, 1–8.
- Guha, Ranajit (1982b), 'Preface', *Subaltern Studies I: Writings on South Asian History and Society*.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ii–viii.
- Guha, Ranajit (1983), *Elementary Aspects of Peasant Insurgency in Colonial India*.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uha, Ranajit (1997), *Dominance without Hegemony: History and Power in Colonial Ind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upta, Akhil (1998), *Postcolonial Developments: Agriculture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Indi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Gupta, Rakesh (1982), *Bihar Peasantry and the Kisan Sabha, 1936–1947*. New Delh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Gutiérrez, Gustavo (1988), *A Theology of Liberation: History, Politics and Salvation* [1971], revd edn: London, SCM Press.
- Gutiérrez, Gustavo (1993), *Las Casas: In Search of the Poor of Jesus Christ*.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 Habermas, Jürgen (1984–7),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3 vol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adjor, Kofi Buenor (1993), *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Third World Terms*. London, Penguin.
- Haithcox, John Patrick (1971),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in India: M. N. Roy and Comintern Policy, 1920–1939*.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alévy, Elie (1951), *Imperialism and the Rise of Labour (1895–1905)* [1926] 2nd edn, trans. E. I. Watkin. London, Ernest Benn.
- Halliday, Fred (1978), 'Revolution in Afghanistan', *New Left Review* 112, 3–44.
- Hannerz, Ulf (1996),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Culture, People, Places*. London, Routledge.
- Hansen, Thomas Blom and Jaffrelot, Christophe (1998), *The BJP and the Compulsions of Politics in India*.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rdiman, David (1981), *Peasant Nationalists of Gujarat: Kheda District, 1917–1934*.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rdiman, David (1993), *Peasant Resistance in India, 1858–1914*.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rdiman, David (1995), *The Coming of the Devi: Adivasi Assertion in Western India*.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rgreaves, Alec G. (1995), *Immigration, 'Race' and Ethnicity in Contemporary France*. London, Routledge.
- Hargreaves, Alec G. and McKinney, Mark, eds (1997), *Post-Colonial Cultures in France*. London, Routledge, 1997.
- Harlow, Vincent and Madden, Frederick (1953), *British Colonial Developments 1774–1834: Select Documen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Harmand, Jules (1910), *Domination et colonisation*. Paris, Flammarion.
- Harris, Lillian and Worden, Robert L. (1986), *China and the Third World: Champion or Challenger?* London, Croom Helm.
- Harris, Nigel (1986), *The End of the Third World: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and the Decline of an Ideology*. Harmondsworth, Penguin.
- Hasan, Mushirul (1991), *Nationalism and Communal Politics in India, 1885–1930*. New Delhi, Manohar.
- Hasan, Mushirul, ed. (1981), *Communal and Pan-Islamic Trends in Colonial India*. New Delhi, Manohar.
- Hassan, Hamdi A. (1999), *The Iraqi Invasion of Kuwait: Religion, Identity and Otherness in the Analysis of War and Conflict*. London, Pluto Press.
- Haupt, G. (1972), *Socialism and the Great War: The Collapse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Havinden, Michael and Meredith, David (1993), *Colonialism and Development: Britain and its Tropical Colonies, 1850–1960*. London, Routledge.
- Hay, Margaret and Wright, Marcia, eds (1982), *African Women and the Law*. Boston, Boston University Press.
- Haynes, Douglas E. and Prakash, Gyan (1991), *Contesting Power: Resistance and Everyday Social Relations in South Asia*.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ehs, Peter (1993), *The Bomb in Bengal: The Rise of Revolutionary Terrorism in India, 1900–1910*.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ilferding, Rudolf (1981), *Finance Capital: A Study of the Latest Phase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1910], trans. Tom Bottomor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Hirson, Baruch (1993), 'The Trotskyist Groups in South Africa: A Retrospective View', *Revolutionary History* 4: 4, 25–56.
- Ho, Chi Minh (1962), *Prison Diary*, trans. Aileen Palmer. Hanoi,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 Ho, Chi Minh (1967), *Ho Chi Minh on Revolution: Selected Writings, 1920–66*. New York, Praeger.
- Hobsbawm, E. J. (1977),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Break-Up of Britain"', *New Left Review* 105, 3–23.
- Hobsbawm, E. J. (1987), *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 Hobson, J. A. (1938), *Imperialism: A Study* [1902] 3rd ed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Hodgkin, Thomas (1833), *An Inquiry into the Merits of the 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 London, J. & A. Arch.
- Hodgkin, Thomas (1834), *On the British Af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 to which are added some particulars respecting the 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 and a letter from J. Hubbard on the same subject*. London, printed for Dr Hodgkin.
- Hoganson, Kristin L. (1998), *Fighting for American Manhood: How Gender Politics Provoked the Spanish–American and Philippine–American War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olland, R. F. (1985), *European Decolonization 1918–81: An Introductory Survey*. London, Macmillan.
- Honneth, Axel and Jonas, Hans (1988), *Social Action and Human Nature*, trans. Raymond Mey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ogvelt, Ankie (1997),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stcolonial World: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Hooker, James R. (1967), *Black Revolutionary: George Padmore's Path from Communism to Pan-Africanism*. New York, Praeger.
- Hooker, James R. (1975), *Henry Sylvester Williams: Imperial Pan-Africanist*. London, Collins.
- hooks, bell (1991), *Yearning: Race,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 London, Turnaround.
- Horkheimer, Max and Adorno, Theodor W. (1982),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1944], trans. John Cumming. New York, Continuum.
- Horne, Alistair (1996), *A Savage War of Peace: Algeria 1954–62*, revd edn. London, Macmillan.
- Hountondji, Paulin J. (1977), *Sur la 'Philosophie africaine'*. Paris, Maspero.
- Hountondji, Paulin J. (1996), *African Philosophy: Myth and Reality*, 2nd edn, trans. Henri Evans and Jonathan Ré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Howe, Stephen (1993), *Anticolonialism in British Politics: The Left and the End of Empire, 1918–196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Howe, Stephen (2000), *Ireland and Empire: Colonial Legacies in Irish History and Cul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well, David (1986), *A Lost Left: Three Studies in Socialism and Nationalis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Howitt, William (1838), *Colonisation and Christianity: A Popular History of the Treatment of the Natives by the Europeans in All Their Colonies*. London, Longman, Orme,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 Hoy, David Couzens, ed. (1986), *Foucault: A Critica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Hudson, G. H. (1971), *Fifty Years of Communism: Theory and Practice 1917–1967*. Harmondsworth, Penguin.
- Hudson, W. J., ed. (1971), *Australia and Papua New Guinea*.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 Huizer, Gerrit (1973), *Peasant Rebellion in Latin America*. Harmondsworth, Penguin.
- Hulme, Peter (1986), *Colonial Encounters: Europe and the Native Caribbean, 1492–1797*. London, Methuen.
- Hume, David (1932), *The Letters of David Hume*, 2 vols, ed. J. Y. T. Greig.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Hunt, James D. (1993), *Gandhi in London*, revd edn. New Delhi, Promilla.
- Huttenback, Robert A. (1971), *Gandhi in South Africa: British Imperialism and the India Question, 1860–1914*.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utton, Christopher M. (1999), *Linguistics and the Third Reich: Mother-Tongue Fascism, Race and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London, Routledge.
- Hyam, Ronald (1976), *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1815–1914: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London, Batsford.
- Hyam, Ronald (1990), *Empire and Sexuality: The British Experienc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Hyndman, Henry Mayers (1886), *The Bankruptcy of India, an Enquiry in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India under the Crown*. 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 Hyndman, Henry Mayers (1887), *The Indian Famine and the Crisis in India*. London, Edward Stanford.
- Hyndman, Henry Mayers (1907), *The Ruin of India by British Rule. Being the Verbatim Report of the Social-Democratic Federa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Conference at Stuttgart*. London, Twentieth Century Press.
- Hyndman, Henry Mayers (1919), *The Awakening of Asia*. London, Cassell.
- Ikoku, S. G. (1971), *Le Ghana de Nkrumah: autopsie de la 1ère république, 1957–1966*, trans. Yves Bénot. Paris, Maspero.
- Illiffe, John (1995), *Africans: The History of a Contin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nglis, Brian (1973), *Roger Casement*.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 Isaacman, Allen F. and Isaacman, Barbara (1976), *The Tradition of Resistance in Mozambique: Anti-colonial Activity in the Zambesi Valley 1850–1921*. London, Heinemann.
- Isaacman, Allen F. and Isaacman, Barbara (1983), *Mozambique: From Colonialism to Revolution, 1900–1982*.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Jack, Belinda (1996), *Negritude and Literary Criticism: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Negro-African" Literature in French*.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 Jackson, Henry F. (1977), *The FLN in Algeria: Party Development in a Revolutionary Society*.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 Jacobs, Jane (1996), *Edge of Empire: Postcoloniality and the City*. London, Routledge.
- Jacobs, Jane M. (1997), 'Resisting Reconciliation: The Secret Geographies of (Post)colonial Australia', in Steve Pile and Michael Keith, eds, *Geographies of Resistance*. London, Routledge, 201–18.
- Jaffrelot, Christophe (1993), *Les nationalistes hindous: idéologie, implantation et mobilisation des années 1920 aux années 1990*. Paris, 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 Jalal, Ayesha (1985), *The Sole Spokesman: Jinnah, the Muslim League and the Demand for Pakist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amal, Mahmood, ed. (1986), *The Penguin Book of Modern Urdu Poetry*, trans. Mahmood Jamal. Harmondsworth, Penguin.
- James, C. L. R. (1937), *World Revolution 1917–1936: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London, Martin Secker & Warburg.
- James, C. L. R. (1938), *History of Negro Revolt*. London, Fact Monographs.
- James, C. L. R. (1969), *A History of Pan-African Revolt*, 2nd edn. Washington, Drum and Spear Press.
- James, C. L. R. (1977), *Nkrumah and the Ghana Revolution*. London, Allison & Busby.
- James, C. L. R. (1980), *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 London, Allison & Busby.
- James, C. L. R. (1987), *C. L. R. James and British Trotskyism: An Interview*. London, Socialist Platform.
- James, C. L. R. (1992), *The C. L. R. James Reader*, ed. Anne Grimshaw.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James, Winston (1998), *Holding Aloft the Banner of Ethiopia: Caribbean Radicalism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London, Verso.
- JanMohamed, Abdul R. (1992), 'Worldliness-without-World, Homelessness-as-Home: Toward a Definition of the Specular Border Intellectual', in *Edward Said: A Critical Reader*, ed. Michael Sprinker.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96–120.
- Jansen, G. H. (1966), *Afro-Asia and Non-alignment*. London, Faber & Faber.
- Jayawardena, Kumari (1986), *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 Zed Books.
- Jayawardena, Kumari (1988), *The Origins of the Left Movement in Sri Lanka*. Colombo, Sanjiva Books.
- Jayawardena, Kumari (1995), *The White Woman's Other Burden: Western Women and South Asia during British Colonial Rule*. New York, Routledge.
- Jebb, Richard (1905), *Studies in Colonial Nationalism*. London, Arnold.
- Jeffery, Keith (1996), *An Irish Empire? Aspects of Ireland and the British Empir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Jeganathan, Pradeep and Ismail, Qadri, eds (1995), *Unmaking the Nation: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and History in Modern Sri Lanka*. Colombo, Social Scientists' Association.
- Jelin, Elizabeth (1990), *Women and Social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London, Zed Books.
- Jenkins, Roy (1965), *Dilke: A Victorian Tragedy*, revd edn. London, Collins.
- Jenks, Edward (1937), *The Government of the British Empire*, 5th edn. London, John Murray.
- Jinadu, Adele and Mandaza, Ibbo (1986),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the Non-aligned Movement*. Harare, African Associa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 Jones, Ernest Charles (1857), *The Revolt of Hindostan, or The New World*. London, G. Routledge.
- Jones, Jean (1996), *The 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 London, Socialist History Society.
- Joshi, P. C. (1986), *Marxism and Social Revolution in India, and Other Essays*. New Delhi, Patriot Publishers.
- July, Robert W. (1968), *The Origins of Modern African Thought: Its Development in West Africa during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London, Faber & Faber.
- Kahin, George McTurnan (1952),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Indone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ahin, George McTurnan (1956),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Bandung, Indonesia, April 1955*.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andiyoti, Deniz, ed. (1991), *Women, Islam and the State*. Basingstoke, Macmillan.
- Kanogo, Tabitha (1987), *Squatters and the Roots of Mau Mau*. London, James Currey.
- Kapur, S. (1992), *Raising up a Prophet: The African-American Encounter with Gandhi*. Boston, Beacon Press.
- Karnik, V. B., ed. (1957), *Indian Communist Party Documents, 1930–1956*. Bombay, Democratic Research Service.
- Kaunda, Kenneth D. (1967), *Humanism in Zambia and a Guide to its Implementation*. Lusaka, Zambia Information Services.
- Kaunda, Kenneth D. (1974), *Humanism in Zambia and a Guide to its Implementation. Part 2*. Lusaka, Division of National Guidance.
- Kaunda, Kenneth D. (1982), *Kaunda on Violence [1980]*. London, Sphere Books.
- Kaur, Manmohan (1968), *Role of Women in the Freedom Movement, 1857–1947*.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 Kautsky, Karl (1975), *Socialism and Colonial Policy: An Analysis* [1907]. Belfast, Athol Books.
- Kautsky, Karl (1983),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ed. and trans. Patricke Goode. London, Macmillan.
- Kautsky, Karl (1988),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abridged John H. Kautsky, trans. Raymond Meyer, with John H. Kautsk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Kay, Cristóbal (1989), *Latin American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 Kaye, Sir Cecil (1971), *Communism in India*. Calcutta, Editions Indian.
- Keddie, Nikki (1981), *Roots of Revolution: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Modern Ira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Kedourie, Elie (1971), *Nationalism in Asia and Africa*.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 Keith, Arthur Berriedale (1916), *Imperial Unity and the Domin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Keith, Arthur Berriedale, ed. (1932), *Speeches and Documents on the British Dominions 1918–1931: From Self-government to National Sovereignt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elley, Robin D. G. (1994), *Race Rebels: Culture, Politics, and the Black Working Class*. New York, Free Press.
- Kelly, G. A. (1965), *Lost Soldiers: The French Army and Empire in Crisis, 1947–1962*.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Kendle, John (1989), *Ireland and the Federal Solution: The Debate over the United Kingdom Constitution, 1870–1921*. Kingston and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 Kendle, John (1997), *Federal Britain: A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 Kenyatta, Jomo (1938), *Facing Mount Kenya: The Traditional Life of the Gikuyu*.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 Ker, James Campbell (1973), *Political Trouble in India, 1907–1917* [1917]. Calcutta, Editions India.
- Khairi, Saad R. (1995), *Jinnah Reinterpreted: The Journey from Indian Nationalism to Muslim Statehood*.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haled, Leila (1973), *My People Shall Live: The Autobiography of a Revolutionary*, ed. George Hajjar.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 Khilnani, Sunil (1997), *The Idea of India*. London, Hamish Hamilton.
- Kiernan, V. G. (1995), *Imperialism and its Contradictions*, ed. Harvey J. Kaye. New York, Routledge.
- Kim, Elaine H. and Choi, Chungmoo, eds (1998), *Dangerous Women: Gender and Korean Nation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 Kinsbruner, Jay (1994), *Independence in Spanish America: Civil Wars, Revolutions, and Underdevelopment*.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 Kishwar, Madhu (1986), *Gandhi and Women*. Delhi, Manushi Prakashan.
- Knauss, Peter R. (1987), *The Persistence of Patriarchy: Class, Gender, and Ideology in Twentieth Century Algeria*. New York, Praeger.
- Knorr, Klaus E. (1944), *British Colonial Theories, 1570–1850*.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Koebner, Richard and Schmidt, Helmut Dan (1964), *Imperialism: The 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a Political Word, 1840–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oehn, Nancy F. (1994), *The Power of Commerce: Economy and Governance in the First British Empir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opf, David (1979), *The Brahmo Samaj and the Shaping of the Modern Indian Min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rishnamurty, Jayasankar, ed. (1989), *Women in Colonial India: Essays on Survival, Work and the State*.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umar, Nita, ed. (1994), *Women as Subjects: South Asian Histories*. New Delhi, Book Review Literary Trust.
- Kurian, K. Mathew, ed. (1975), *India – State and Society: A Marxian Approach*. Bombay, Orient Longman.
- Laclau, Ernesto (1971), 'Feudalism and Capitalism in Latin America', *New Left Review* 67, 19–38.
- Laclau, Ernesto and Mouffe, Chantal (1985),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Democratic Politics*, trans. Winston Moore and Paul Cammack. London, Verso.
- LaGuerre, John Gaffar (1984), *Enemies of Empire*. St Augustine,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 Extra-Mural Studies Unit.
- Lakshmi Menon, V. (1965), *Ruskin and Gandhi*. Varanasi, Sarva Seva Sangh Prakashan.
- Laloum, Jean and Allouche, Jean Luce (1992), *Les Juifs d'Algérie: Images et textes*. Paris, Éditions du Scribe.
- Lamouchi, Nouredine (1996), *Jean-Paul Sartre et le tiers monde. Rhétorique d'un discours anticolonialiste*. Paris, L'Harmattan.
- Langley, J. Ayo, ed. (1979), *Ideologies of Liberation in Black Africa 1856–1970: Documents on Modern African Political Thought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London, Rex Collings.
- Langley, J. Ayodele (1973), *Pan-Africanism and Nationalism in West Africa 1900–1945: A Study in Ideology and Social Class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Laqueur, Walter (1956),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Laqueur, Walter (1959),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iddle East*.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Laqueur, Walter, ed. (1958), *The Middle East in Transi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Larbi Korang, Kwaku and Slemon, Stephen (1997), 'Postcolonialism and Language', in *Writing and Africa*, ed. Mpalive-Hangson Msiska and Paul Hyland. Harlow, Longman, 246–63.
- Las Casas, Bartolomé de (1992), *A Short Account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es* [1542], trans. Nigel Griffin. London, Penguin.
- Laushey, David M. (1975), *Bengal Terrorism and the Marxist Left: Aspects of Regional Nationalism in India, 1905–1942*. Calcutta, Firma KLM.
- Lawler, Nancy Ellen (1992), *Soldiers of Misfortune: Ivoirien Tirailleurs of World War II*.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 Lazarus, Neil (1999), *Nationalism and Cultural Practice in the Postcolonial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zreg, Marnia (1994), *The Eloquence of Silence: Algerian Women in Ques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 (1931),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 London, 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 and f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 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 (1935),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 and f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 Lee, Francis (1988), *Fabianism and Colonialism: The Life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Lord Sydney Olivier*. London, Defiant Books.
- Lenin, V. I. (1962), *The National-Liberation Movement in the East*.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 Lenin, V. I. (1964), *Questions of National Policy and Proletarian Internationalism*.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Lenin, V. I. (1965),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A Popular Outline* [1917].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Lenin, V. I. (1968), *Selected Work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 Lenin, V. I. (1973), *On Imperialism and Imperialist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Lenin, V. I. (1988), *What is to be Done?* [1902], trans. J. Fineberg, G. Hanna and R. Service. London, Penguin.
- Leroy-Beaulieu, Pierre Paul (1874), *De la Colonisation chez les peuples modernes. Ouvrage couronné par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Paris, Guillaumin.
- Lerski, Jerzy J. (1968), *Origins of Trotskyism in Ceylo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Lanka Sama Samaja Party, 1935–1942*.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 Lévi-Strauss, Claude (1966), *The Savage Mind* [1962], trans. anon.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 Lévi-Strauss, Claude (1968),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Vol. 1, trans. Claire Jacobson and Brooke Grundfest Schoepf. London, Allen Lane.
- Lewin, Moshe (1969), *Lenin's Last Struggle*, trans. A. M. Sheridan Smith. London, Faber & Faber.
- Leys, Colin (1996), *The Rise and Fall of Development Theory*. London, James Currey.
- Lienhard, Martin (1991), *La Voz y su huella: escritura y conflicto étnico-social en América Latina, 1492–1988*. Hanover, NH, Ediciones del Norte.
- Likimani, Muthoni (1985), *Passbook Number F.47927: Women and Mau Mau in Kenya*. Basingstoke, Macmillan.
- Lipsitz, George (1997), "'Frantic to Join . . . the Japanese Army': The Asia Pacific War in the Lives of African Soldiers and Civilians", in Lisa Lowe and David Lloyd, eds,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the Shadow of Capital*.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324–53.
- Lloyd, David (1993), *Anomalous States: Irish Writing and the Post-colonial Moment*. Dublin, Lilliput Press.
- Loew, Raimund (1979), 'The Politics of Austro-Marxism', *New Left Review* 118, 15–51.
- Loomba, Ania (1998), *Colonialism/Postcolonialism*. London, Routledge.
- Louis, William Roger, ed. (1976), *Imperialism: The Robinson and Gallagher Controversy*. New York, New Viewpoints.
- Lowe, Lisa (1991), *Critical Terrains: French and British Orient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ubenow, W. C. (1988), *Parliamentary Politics and the Home Rule Crisis: The British House of Commons in 1886*.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Lucas, C. P., ed. (1912), *Lord Durham's Report on the Affairs of British North America*, 3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Lugard, Frederick John D. (1922), *The Dual Mandate in British Tropical Africa*. Edinburgh, Blackwood.
- Luk, Michael Y. L. (1990), *The Origins of Chinese Bolshevism: An Ideology in the Making, 1920–1928*.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umumba, Patrice (1972) *Lumumba Speaks: The Speeches and Writings of Patrice Lumumba, 1958–1961* [1963], ed. Jean Van Lierde, trans. Helen R. Lane, introduction by Jean-Paul Sartre. Boston, Little Brown.
- Lustick, Ian (1993), *Unsettled States, Disputed Lands: Britain and Ireland, France and Algeria, Israel and the West Bank–Gaz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uxemburg, Rosa (1951),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trans. Agnes Schwarzschild.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Luxemburg, Rosa and Bukharin, Nikolai Ivanovich (1972), *Imperialism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 Capital*, ed. K. J. Tarbuck. London, Allen Lane.
- Lynch, John (1986), *The Spanish American Revolutions, 1808–1826*, 2nd edn. New York, Norton.
- Lynch, John and Humphreys, R. A. (1994), *Latin American Revolutions, 1808–1826: Old and New World Origins*.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Lyons, Eugene (1937), *We Cover The World*. London, G. Harrap.
- Liotard, Jean-François (1993), *Political Writings*, trans. Bill Readings and Kevin Paul Geiman. London, UCL Press.
- McClintock, Anne (1994), 'The Angel of Progress: Pitfalls of the Term "Postcolonialism"', in *Colonial Discourse / Postcolonial Theory*, ed. Francis Barker, Peter Hulme and Margaret Iverse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53–66.
- McClintock, Anne (1995), *Imperial Leather: Race,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Colonial Context*. New York, Routledge.
- McClintock, Cynthia (1998),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in Latin America: El Salvador's FMLN and Peru's Shining Path*.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 Maccoby, S. (1938), *English Radicalism 1853–1886*.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Maccoby, S. (1953), *English Radicalism 1886–1914*.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McCulloch, J. R. (1837),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British Empire*, 2 vols. London, Charles Knight.
- McCulloch, Jock (1983), *In the Twilight of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Amílcar Cabra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McDermott, Kevin and Agnew, Jeremy (1996), *The Comintern: 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from Lenin to Stalin*. Basingstoke, Macmillan.
- Macdonell, Diane (1986), *Theories of Discourse: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Macey, David (1993), *The Lives of Michel Foucault*. London, Hutchinson.
- McIntyre, W. David (1977), *The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Origin and Impact 1869–1971*.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ack Smith, Denis (1994), *Mazzini*.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McKay, Claude (1929), *Banjo: A Story Without a Plot*. New York, Harper.
- MacKenzie, John M. (1984), *Propaganda and Empire: The Manipulation of British Public Opinion 1880–196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MacKenzie, John M. (1995), *Orientalism: History, Theory and the Art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McNay, Lois (1994), *Foucaul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McVey, Ruth T. (1957), *The Soviet View of the Indonesian Revolution: A Study in the Russian Attitude towards Asian Nationalism*. Ithaca, NY,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 Cornell University.
- McVey, Ruth T. (1965), *The Rise of Indonesian Commun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Maddox, Gregory, Giblin, James L. and Kimambo, Isaria N., eds (1996), *Custodians of the Land: Ecology and Culture in the History of Tanzania*. London, James Currey.
- Madhok, Balraj (1996), *R.S.S. and Politics: Story of Rashtriya Swayamsewak Sangh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ts Role in Indian Politics*, revd edn. Nagpur, Hindu Rajya Prakashak.
- Maina wa Kinyatti, ed. (1987), *Kenya's Freedom Struggle: The Dedan Kimathi Papers*. London, Zed Books.
- Malik, Kenan (1996), *The Meaning of Race: Race, History and Culture in Western Society*. Basingstoke, Macmillan.
- Malkani, K. R. (1980), *The RSS Story*. New Delhi, Impex India.
- Malley, Robert (1996), *The Call from Algeria: Third Worldism, Revolution, and the Turn to Isl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mdani, Mahmood (1996), *Citizen and Subject: 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Legacy of Late Colonialism*. London, James Currey.
- Mani, Lata (1989), 'Contentious Traditions: The Debate on Sati in Colonial India', in *Recasting Women: Essays in Colonial History*, ed. Kumkum Sangari and Sudesh Vaid. Delhi, Kali for Women, 88–126.
- Mao Zedong (1965),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5 vols.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Mao Zedong (1970), *Mao Papers. Anthology and Bibliography*, ed. Jerome Ch'e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o Zedong (1989), *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 From the Hundred Flowers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 ed. Roderick MacFarquhar, Timothy Cheek and Eugene Wu.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arcos, Subcomandante (1995), *Shadows of Tender Fury: The Letters and Communiqués of Subcomandante Marcos and the Zapatista Army of National Libera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Marcum, John A. (1969–78), *The Angolan Revolution*, 2 vols. Cambridge, MIT Press.
- Mariátegui, José Carlos (1971), *Seven Interpretive Essays on Peruvian Reality*, trans. Marjory Urquidí.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Mariátegui, José Carlos (1996), *The Heroic and Creative Meaning of Socialism*, trans. Michael Pearlman.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 Marighella, Carlos (1971), *For the Liberation of Brazil*. Harmondsworth, Penguin.
- Marighella, Carlos (1985), *Manual of the Urban Guerrilla*. Chapel Hill, NC, Documentary Publications.
- Markovitz, Irving Leonard (1969), *Léopold Sédar Senghor and the Politics of Negritude*. New York, Atheneum.
- Marr, David G. (1971), *Vietnamese Anticolonialism, 1885–192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rtí, José (1977), *Our America: Writings on Latin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Cuban Independence*, trans. Elinor Randal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Marx, Karl (1973a), *Surveys from Exile: Political Writings* Vol. 2, trans. Ben Fowkes and Paul Jacks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 Marx, Karl (1973b),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Martin Nicolaus. Harmondsworth, Penguin.
- Marx, Karl (1974),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nd After: Political Writings* Vol. 3, ed. David Fernbach. Harmondsworth, Penguin.
- Marx, Karl (1975), *Early Writings*,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and Gregor Bent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 Marx, Karl (1976–81), *Capital*, 3 vols, trans. Ben Fowkes and David Fernbach. Harmondsworth, Penguin.
- Marx, Karl (1977), *Selected Writings*, ed. David McLell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rx, Karl and Engels, Friedrich (1934),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1846–1895*, trans. Dona Torr.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 Marx, Karl and Engels, Friedrich (1952),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1848]*.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Marx, Karl and Engels, Friedrich (1959), *The First Indian War of Independence, 1857–1859*.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 Marx, Karl and Engels, Friedrich (1968), *On Colonialism*, 4th edn.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Marx, Karl and Engels, Friedrich (1971), *Ireland and the Irish Question*.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 Marx, Karl and Engels, Friedrich (1982), *Collected Works*, 50 vol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 Masani, Minocheher Rustom (1954),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A Short History*. London, D. Verschoyle.
- Masselos, Jim (1993), *Indian Nationalism: An History*, 3rd edn. New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 Maunaguru, Sitralega (1995), 'Gendering Tamil Nationalism: The Construction of "Woman" in Projects of Protest and Control', in Pradeep Jeganathan and Qadri Ismail, eds, *Unmaking the Nation: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and History in Modern Sri Lanka*. Colombo, Social Scientists' Association, 158–75.
- Mayer, Tamar, ed. (1994), *Women and the Israeli Occupation: The Politics of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 Mayer, Tamar, ed. (2000), *Gender Ironies of Nationalism: Sexing the Nation*. London, Routledge.
- Mayo, Katherine (1927), *Mother India*. London, Jonathan Cape.
- Mazrui, Ali A. (1990), *Cultural Forces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James Currey.
- Mazrui, Ali A., ed. (1993), *Africa Since 1935*.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Vol. 8. Oxford, Heinemann.
- Mazrui, Ali A. and Tidy, Michael (1984), *Nationalism and New States in Africa: From about 1935 to the Present*. Nairobi,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 Mazumdar, Haridas T. (1932), *Gandhi Versus the Empire*. New York, Universal Publishing.
- Mba, Nina (1982), *Nigerian Women Mobilized: Women's Political Activity in Southern Nigeria 1900–196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ehmet, Ozay (1995), *Westernizing the Third World: The Eurocentricity of Europea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ies*. London, Routledge.
- Mehrotra, Nanak Chand (1986), *Indian Socialist Thinking: From Dayananda to J. P.* New Delhi, M. N. Publishers.
- Mehta, Shirin (1990) 'The Role of Women in the Peasant Movement of Gujarat: A Study in Gandhian Phase', in *Gandhi: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ed. Nageshwar Prasad. Delhi, Segment Book Distributors, 56–70.
- Mehta, Uday Singh (1999), *Liberalism and Empire: 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Though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eli, Francis (1988), *South Africa Belongs to Us: A History of the ANC*. Harare, Zimbabwe Publishing House.
- Memmi, Albert (1967), *The Coloniser and the Colonised [1957]*, introduction by Jean-Paul Sartre. Boston, Beacon Press.
- Mercer, Kobena (1994), *Welcome to the Jungle: New Positions in Black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 Merivale, Herman (1861), *Lectures on Colonization and Colonies (Oxford Lectures 1839–41)*, revd edn. London, Longmans, Green.
- Merle, Marcel (1969), *L'Anticolonialisme européen, de Las Casas à Marx*. Paris, Colin.
- Mernissi, Fatima (1985), *Beyond the Veil: Male–Female Dynamics in Modern Muslim Society*, revd edn. London, Al Saqi.
- Messaoudi, Khalida and Schemla, Elisabeth (1998), *Unbowed: An Algerian Woman Confronts Islamic Fundamentalism*, trans. Anne C. Vil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Meynier, Gilbert (1981), *L'Algérie révélée. La guerre de 1914–1918 et le premier quart du XXe siècle*. Geneva, Droz.
- Midgley, Clare (1992), *Women against Slavery: The British Campaigns 1780–1870*. London, Routledge.
- Midgley, Clare, ed. (1998), *Gender and Imperialis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Mikell, Gwendolyn, ed. (1997), *African Femin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Mill, John Stuart (1984), *Essays on Equality, Law, and Education*, ed. John M. Robson. London, Routledge.
- Miller, Christopher L. (1990), *Theories of Africans: Francophone Literature and Anthropology in Afric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Miller, Christopher L. (1998), *Nationalists and Nomads: Essays on Francophone Af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Miller, James (1994), *The Passion of Michel Foucault*. London, Flamingo.
- Mills, Sara (1991), *Discourses of Difference: An Analysis of Women's Travel Writing and Colonialism*. London, Routledge.
- Milton, David, Milton, Nancy, and Schurmann, Franz, eds (1977), *People's China: Social Experimentation, Politics, Entry on to the World Scene 1966-72*. Harmondsworth, Penguin.
- Minault, Gail (1982), *The Khilafat Movement: Religious Symbolism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India*.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nh-ha, Trinh (1989), *Woman, Native, Other: Writing Postcoloniality and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Mirza, Heidi (1997), *Black British Feminism: A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 Mitchell, Timothy (1988), *Colonising Egyp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oghadam, Valentine, ed. (1994), *Gender and National Identity: Women and Politics in Muslim Societies*. London, Zed Books.
- Moguel, Julio (1998), *Chiapas: la guerra de los signos: del amanecer zapatista de 1994 a la masacre de Acteal*. Mexico City, Juan Pablos Editor: La Jornada Ediciones.
- Mohanty, Chandra Talpade (1984), 'Under Western Eyes: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 *Boundary 2* spring/fall, 71-92.
- Mohanty, Chandra Talpade, Russo, Ann and Torres, Lourdes, eds (1991),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Mohanty, Manoranjan (1977), *Revolutionary Violence: A Study of the Maoist Movement in India*. New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 Mohanty, Manoranjan, Mukherji, Partha N. and Törnquist, Olle (1998), *People's Rights: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State in the Third World*. New Delhi, Sage.
- Mondlane, Eduardo (1969), *The Struggle for Mozambique*. Harmondsworth, Penguin.
- Monteil, Vincent (1982), *Les Musulmans soviétiques*. Paris, Seuil.
- Montgomery, Michael (1987), *Imperialist Japan: The Yen to Dominat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Moore-Gilbert, Bart (1997), *Postcolonial Theory: Contexts, Practices, Politics*. London, Verso.
- Moore-Gilbert, Bart (1999), 'Postcolonial Cultural Studies and Imperial Historiography: Problems of Interdisciplinarity,' *Interven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1: 3, 397-411.
- Moran, Seán Farrell (1994), *Patrick Pearse and the Politics of Redemption: The Mind of the Easter Rising, 1916*.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 Morel, Edmund Dene (1903), *The Congo Slave State, A Protest Against The New African Slavery*. Liverpool, J. Richardson & Sons.
- Morel, Edmund Dene (1904a), *King Leopold's Rule in Africa*. London, Heinemann.
- Morel, Edmund Dene (1904b), *The Scandal of the Congo, Britain's Duty*. Liverpool, John Richardson & Sons.
- Morel, Edmund Dene (1906), *Red Rubber: The Story of the Rubber Slave Trade Flourishing On the Congo in 1906*. London, T. Fisher Unwin.
- Morley, John (1893), *The Life of Richard Cobden [1879]*. London, T. Fisher Unwin.
- Mortimer, Robert A. (1964), *The Third World Coali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Mosse, George L. (1985), *Nationalism and Sexuality: Respectability and Abnormal Sexuality in Modern Europe*. New York, Fertig.
- Msiska, Mpalive-Hangson and Hyland, Paul, eds (1997), *Writing and Africa*. Harlow, Longman.
- Mudimbe, V. Y. (1988), *The Invention of Africa: Gnosis, Philosophy, and the Order of Knowledge*. London, James Currey.
- Mudimbe, V. Y., ed. (1992), *The Surreptitious Speech: 'Présence Africaine' and the Politics of Otherness, 1947-198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ukherjee, A. (1990), 'Whose Post-colonialism and Whose Postmodernism?' *World Literature Written in English*, 30: 2, 1-9.
- Müller, Joachim W. and Sauvart, Karl P. (1993), *Chronology, Bibliography and Index for the Group of 77 and the Non-aligned Movement*. New York, Oceana.
- Mumtaz, Khawar and Shaheed, Farida, eds (1987), *Women of Pakistan: Two Steps Forward, One Step Back?* London, Zed Books.
- Munck, Ronaldo (1986), *The Difficult Dialogue: Marxism and Nationalism*. London, Zed Books.
- Munck, Ronaldo and O'Hearn, Denis, eds (1999), *Cr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 Contributions to a New Paradigm*. London, Zed Books.
- Muzaffar Imam, Md. (1987), *Role of Muslims in the National Movement, 1912-1930: A Study of Bihar*. Delhi, Mittal Publications.
- Myers, Ramon H. and Peattie, Mark R., eds (1984), *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 1895-194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Naldi, Gino J. (1999), *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An Analysis of its Role*, 2nd edn. New York, Mansell.
- Namboodiripad, E. M. S. (1994), *The Communist Party in Kerala: Six Decades of Struggle and Advance*. New Delhi, National Book Centre.
- Nanda, B. R., ed. (1976), *Indian Women from Purdah to Modernity*. London, Sangam.
- Nandy, Ashis (1980), *At the Edge of Psychology: Essays in Politics and Culture*.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andy, Ashis (1983), *Intimate Enemy: 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ialism*.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andy, Ashis (1987), *Traditions, Tyranny and Utopias: Essays in the Politics of Awareness*.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andy, Ashis (1995), *The Savage Freud, and Other Essays on Possible and Retrievable Selves*.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apier, Colonel Charles James (1835), *Colonization; Particularly in Southern Australia: with some remarks on small farms and over population*. London, T. & W. Boone.
- Narayan, Jayaprakash (1936), *Why Socialism?* Benares, All India Congress Socialist Party.
- Narayan, Jayaprakash (1957), *From Socialism to Sarvodaya*. Rajghat, Akhil Bharat Sarva Seva Sangh Prakashan.
- Nederveen Peterse, Jan P. (1990), *Empire and Emancipation: Power and Liberation on a World Scale*. London, Pluto Press.
- Nehru, Jawaharlal (1936), *An Autobiography; With Musings on Recent Events in India*. London, John Lane.
- Nehru, Jawaharlal (1941), *The Unity of India: Collected Writings 1937-1940*. London, Lindsay Drummond.
- Nehru, Jawaharlal (1946), *The Discovery of India*. London, Meridian Books.

- Neuhauser, Charles (1968), *Third World Politics: China and the Afro-Asian People's Solidarity Organization, 1957-196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New York State Legislature. Joint Committee Investigating Seditious Activities (1920), *Revolutionary Radicalism: Its History, Purpose and Tactics, with an exposition and discussion of the steps being taken and required to curb it*, 4 vols. Albany, NY, J. B. Lyon.
- Ngugi, Wa Thiong'o (1981), *Decolonizing the Mind*. London, James Currey.
- Ngugi, Wa Thiong'o (1983), *Barrel of a Pen: Resistance to Repression in Neo-colonial Kenya*. London, New Beacon Books.
- Ngugi, Wa Thiong'o (1993), *Moving the Centre: The Struggle for Cultural Freedoms*. London, James Currey.
- Nimni, Ephraim (1991), *Marxism and Nationalism: Theoretical Origins of a Political Crisis*, preface by Ernesto Laclau. London, Pluto.
- Niranjana, Tejaswini (1992), *Si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Nkrumah, Kwame (1957), *The Autobiography of Kwame Nkrumah*. Edinburgh, T. Nelson.
- Nkrumah, Kwame (1961a), *I Speak of Freedom: A Statement of African Ideology*. London, Heinemann.
- Nkrumah, Kwame (1961b), *Building a Socialist State*. Accra, Government Printer.
- Nkrumah, Kwame (1965), *Neo-Colon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 London, Heinemann.
- Nkrumah, Kwame (1968), *Handbook of Revolutionary Warfare: A Guide to the Armed Phase of the African Revolution*. London, Panaf Books.
- Nkrumah, Kwame (1970), *Consciencism: Philosophy and Ideology for Decolonization* [1964], revd ed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Nkrumah, Kwame (1973), *Revolutionary Path*. London, Panaf Books.
- North, Robert C. and Eudin, Xenia J. (1977), *M. N. Roy's Mission to China: The Communist-Kuomintang Split of 1927*. New York, Octagon Books.
- Noyes, John (1992), *Colonial Space: Spatiality in the Discourse of German South West Africa 1884-1915*. Chur, Switzerland, Harwood.
- Nussbaum, Martha and Glover, Jonathan (1995), *Wome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A Study of Human Capabilit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Nyerere, Julius (1968), *Ujamaa: Essays on Socialism*. Dar es Sala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Balance, E. (1966), *Malaya: The Communist Insurgent War 1948-60*. London, Faber.
- O'Hanlon, Rosalind, ed. (1994), *A Comparison Between Women and Men: Tarabai Shinde and the Critique of Gender Relations in Colonial India*. Madra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lorunsola, Victor A., ed. (1972),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Sub-nationalism in Africa*. New York, Anchor Books.
- Omvedt, Gail (1993), *Reinventing Revolution: New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Socialist Tradition in India*. Armonk, NY, M. E. Sharpe.
- Omvedt, Gail (1994), 'Reconstructing the Methodology of Exploitation: Class, Caste and Gender as Categories of Analysis in Post-Colonial Societies', in *Understanding the Post-colonial World: Theory and Method*, ed. Neera Chandhoke.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117-31.
- Ortiz, Fernando (1995), *Cuban Counterpoint: Tobacco and Sugar*, trans. Harriet de Oní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Osterhammel, Jürgen (1997), *Colonialism: A Theoretical Overview* [1995], trans. Shelley L. Frisch. Princeton, NJ, Marcus Wiener; Kingston, Ian Randle.
- Ottaway, David and Ottaway, Marina (1970), *Algeria: The Politics of a Socialist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Overstreet, Gene D. and Windmiller, Marshall (1959) *Communism in Ind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admore, George (1931), *The Life and Struggles of Negro Toilers*. London, RILU Magazine.
- Padmore, George (1936), *How Britain Rules Africa*. London, Wishart Books.
- Padmore, George (1937), *Africa and World Peace*. London, M. Secker & Warburg.
- Padmore, George (1949), *Africa: Britain's Third Empire*. London, Dennis Dobson.
- Padmore, George (1956), *Pan-Africanism or Communism? The Coming Struggle for Africa*. London, Dennis Dobson.
- Padmore, George, ed. (1963), *Colonial and Coloured Unity: A Programme of Action: History of the Pan-African Congress*, 2nd edn. London, Hammersmith Bookshop.
- Padmore, George and Pizer, Dorothy (1946), *How Russia Transformed Her Colonial Empire: A Challenge to the Imperialist Powers*. London, Dennis Dobson.
- Pagden, Anthony (1990), *Spanish Imperialism and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Pandey, Gyanendra (1978), *The Ascendancy of the Congress in Uttar Pradesh, 1926-34: A Study in Imperfect Mobilization*.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anikkar, K. M. (1995), *Culture, Ideology, Hegemony: Intellectuals and Social Consciousness in Colonial India*. New Delhi, Tulika.
- Pankhurst, E. Sylvia (1921), *Soviet Russia As I Saw It*. London, Workers' Dreadnought Publishers.
- Pantham, Thomas (1995), *Political Theories and Social Reconstruction: A Critical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on India*.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 Paranjape, Makarand R. (1993), *Decolo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Hind Swaraj Revisited*. New Delhi, Sage.
- Parekh, Bikhu (1989), *Colonialism, Tradition and Reform: An Analysis of Gandhi's Political Discourse*.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 Parekh, Bikhu (1997), *Gandh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ark, You-me and Sunder Rajan, Rajeswari (2000), 'Postcolonial Feminism/Postcolonialism and Feminism', in Sangeeta Ray and Henry Schwarz, eds, *A Companion to Postcolonial Studie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53-71.
- Parker, Andrew, Russo, Mary, Sommer, Doris and Yaeger, Patricia, eds (1992), *Nationalisms and Sexualities*. London, Routledge.
- Parliamentary Peace Aims Group (1941), *The Atlantic Charter: A Criticism*. London, Parliamentary Peace Aims Group.
- Parry, Benita (1987), 'Problems in Current Theories of Colonial Discourse', *Oxford Literary Review* 9: 27-58.
- Parry, Benita (1994a), 'Resistance Theory/Theorising Resistance, or Two Cheers for Nativism', in *Colonial Discourse / Postcolonial Theory*, ed. Francis Barker, Peter Hulme and Margaret Iverse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72-96.
- Parry, Benita (1994b), 'Signs of Our Times', *Third Text* 28-9, 5-24.
- Parry, Benita (1998), 'Liberation Movements: Memories of the Future', *Interven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1:1, 45-51.
- Pasture, Patrick and Verberckmoes, Johan, eds (1998), *Working-Class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Appeal of National Identity: Historical Debates and Current Perspectives*. Oxford, Berg.
- Patel, Sujata (1988), 'The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Women in Gandhi',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23: 8, 377-87.
- Patnaik, Ashok Kumar (1992), *The Soviets and the Indi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1917-1929*. Delhi, Anamika Prakashan.

- Patnaik, Prabhat (1991), 'Marxism in India', in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2nd edn, ed. Tom Bottomore, Laurence Harris, V. G. Kiernan and Ralph Miliban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359–61.
- Patnaik, Prabhat (1995), *Whatever Happened to Imperialism and Other Essays*. New Delhi, Tulika.
- Patouillet, J. (1904), *L'Impérialisme américain*. Paris, A. Rousseau.
- Pearse, Pádraic Henry (1917–22), *Collected Works*, 3 vols. Dublin, Maunsel and Roberts.
- Peberdy, Max (1985), *Tigray: Ethiopia's Untold Story*. London, Relief Society of Tigray Support Committee.
- Pêcheux, Michel (1982), *Language, Semantics and Ideology: Stating the Obvious*, trans. Harbans Nagpal. London, Macmillan.
- Peggs, James (1830), *India's Cries to British Humanity, relative to the suttee, infanticide, British connexion with idolatry, ghaut murders, and slavery in India: to which is added humane hints for the melioration of the state of society in British India*, 2nd edn. London, Seely & Son.
- Penvenne, Jeanne Marie (1995), *African Workers and Colonial Racism: Mozambican Strategies and Struggles in Lourenço Marques, 1877–1962*. London, James Currey.
- Pérez, Louis A. (1986), *Cuba under the Platt Amendment, 1902–1934*.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 Pérez Beltrán, Carmelo (1997), *Mujeres argelinas en lucha por las libertades democráticas*. Granada, Editorial Universidad de Granada.
- Pérez Firmat, Gustavo (1989), *The Cuban Condition: Translation and Identity in Modern Cuban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teet, Julie Marie (1991), *Gender in Crisis: Women and the Palestinian Resistance Move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Phadke, Y. D. (1967),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Mass Violence in India', in S. P. Aiyar, ed., *The Politics of Mass Violence in India*. Bombay, Manaktalas, 44–52.
- Phillips, Anne (1989), *The Enigma of Colonialism: British Policy in West Africa*. London, James Currey.
- Phillips, Richard (1996), *Mapping Men and Empire: A Geography of Adventure*. London, Routledge.
- Pick, Daniel (1989), *The Faces of Degeneration: A European Disorder 1848–19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ieterse, Jan P. Nederveen (1990), *Empire and Emancipation: Power and Liberation on a World Scale*. London, Pluto Press.
- Pineda Gómez, Francisco (1997), *La irrupción zapatista, 1911*. Mexico, D.F., Ediciones Era.
- Pipes, Richard (1997), *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1917–1923*, revd ed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laatje, Sol T. (1990), *Mafeking Diary: A Black Man's View of a White Man's War*, ed. John Comaroff, Brian Willan and Andrew Reed. Cambridge, Meridor.
- Plekhanov, G. V. (1962),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Marxism* [1908].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Ponnambalam, Satchi (1983), *Sri Lanka: National Conflict and the Tamil Liberation Struggle*. London, Zed Books.
- Poppino, Rollie E. (1964),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in Latin America: A History of the Movement, 1917–1963*.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 Porter, A. N. (1991), *Atlas of British Overseas Expansion*. London, Routledge.
- Porter, Andrew (1994), *European Imperialism, 1860–1914*. Basingstoke, Macmillan.
- Porter, Bernard (1968), *Critics of Empire: British Radical Attitudes to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95–1914*. London, Macmill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Porter, Bernard (1975), *The Lion's Share: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50–1970*. London, Longman.
- Porter, Bernard (1983), *Britain, Europe, and the World 1850–1982: Delusions of Grandeur*. London, Allen & Unwin.
- Prago, Albert (1970), *The Revolutions in Spanish America: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s of 1808–1825*. New York, Macmillan.
- Prakash, Gyan (1990), *Bonded Histories: Genealogies of Labour Servitude in Colonial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rakash, Gyan (1999), *Another Reason: Science and the Imagination of Modern Ind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rakash, Gyan, ed. (1995), *After Colonialism: Imperial Histories and Postcolonial Displacemen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rasad, Rai Akhilendra (1974), *Socialist Thought in Modern India*. Meerut, Meenakshi Prakashan.
- Pratt, Mary Louis (1992),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Routledge.
- Pratt, Mary Louise (1994), 'Transculturation and Autoethnography: Peru 1615/1980', in *Colonial Discourse / Postcolonial Theory*, ed. Francis Barker, Peter Hulme and Margaret Ivers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4–46.
- Presley, Cora Ann (1992), *Kikuyu Women, the Mau Mau Rebell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Kenya*.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Prochaska, David (1990), *Making Algeria French: Colonialism in Bône, 1870–1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Quayson, Ato (2000), *Postcolonialism: Theory, Practice or Proce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Radhakrishnan, R. (1992), 'Nationalism, Gender and the Narrative of Identity', in Andrew Parker, Mary Russo, Doris Sommer and Patricia Yaeger, eds (1992), *Nationalisms and Sexualities*. London, Routledge, 77–95.
- Rafael, Vicente L. (1988), *Contracting Colonialism: Translation and Christian Conversion in Tagalog Society under Early Spanish Rul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Rafael Vicente L., ed. (1995), *Discrepant Histories: Translocal Essays on Filipino Culture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Rahman, Tariq (1996), *Language and Politics in Pakistan*.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ahnema, Majid and Bawtree, Victoria, eds (1997), *The Post-Development Reader*. London, Zed Books.
- Ram Chandra (1986), *Naujawan Bharat Sabha and Hindustan Socialist Republican Association/Army (H.S.R.A.)*. New Delhi, Ram Chandra.
- Ram Gopal (1959), *Indian Muslims: A Political History (1858–1947)*. Bombay, Asia Publishing House.
- Rama, Angel (1982), *Transculturation narrativa en América Latina*. Mexico, Siglo Veintiuno Editores.
- Rama, Angel (1996), *The Lettered City*, trans. and ed. John Charles Chastee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Ramabai Sarasvati, Pandita (2000), *Pandita Ramabai Through Her Own Words: Selected Works*, ed. Meera Kosambi.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andall, Margaret (1992), *Gathering Rage: The Failure of Twentieth Century Revolutions to Develop a Feminist Agend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Ranga, N. G. (1949), *Revolutionary Peasants: A Survey of the Various Revolutions that Peasants have Staged against Capitalism all over the World*. Delhi, Amrit Books.
- Ranger, T. O. (1956), *Revolt in Southern Rhodesia, 1896–97*.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Ranger, Terence (1985), *Peasant Consciousness and Guerrilla War in Zimbabwe*. London, James Currey.

- Rasul, Md. Abdullah (1974), *A History of the All India Kisan Sabha*. Calcutta, National Book Agency.
- Recham, Belkacem (1996), *Les Musulmans algériens dans l'armée française, 1919–1945*. Paris, l'Harmattan.
- Renan, Ernest (1896), *The Poetry of the Celtic Races, and Other Studies*, trans. William G. Hutchinson. London, Walter Scott.
- Retamar, Roberto Fernández (1989), *Caliban and Other Essays*, trans. Edward Baker. Minneapolis,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 Ribeiro, Darcy (1977), *Fronteras indígenas de la civilización*, 4a ed. Mexico, Siglo Veintiuno.
- Ribeiro, Darcy (1978a), *La cultura latinoamericana*. Mexico,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 Ribeiro, Darcy (1978b), *O dilema da América Latina: estruturas de poder e forças insurgentes*. Petrópolis, Brasil, Editora Vozes.
- Rich, Paul B. (1986), *Race and Empire in British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iddell, John, ed. (1986a),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in Lenin's Time. Lenin's Struggle for a Revolutionary International. Documents: 1907–1916. The Preparatory Years*, 2nd edn.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 Riddell, John, ed. (1986b),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in Lenin's Time. The German Revolution and the Debate on Soviet Power. Documents: 1918–1919. Preparing the Founding Congress*.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 Riddell, John, ed. (1991),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in Lenin's Time. Workers of the World and Oppressed Peoples, Unite! Proceedings and Documents of the Second Congress, 1920*, 2 vols.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 Riddell, John, ed. (1993),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in Lenin's Time. To See the Dawn. Baku, 1920 – First Congress of the Peoples of the East*.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 Rigney, Lester Irabina (1998), 'Native Title, The Stolen Gener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The Struggle Facing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Peoples in Australia', *Interven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1: 1 125–30.
- Robbins, Bruce (1999), *Feeling Global: Internationalism in Distres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Roberts, Stephen H. (1929), *The History of French Colonial Policy 1870–1925*. London, P. S. King.
- Robinson, Cedric J. (1983), *Black Marxism: The Making of the Black Radical Tradition*. London, Zed Books.
- Robinson, Ronald, Gallagher, John and Denny, Alice (1981), *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The Official Mind of Imperialism*, 2nd edn. Basingstoke, Macmillan.
- Rodinson, Maxime (1973), *Israel: A Colonial-Settler State?* New York, Monad Press.
- Rodinson, Maxime (1979), *Marxism and the Muslim World* [1972]. London, Zed Books.
- Rodney, Walter (1989), *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 [1972]. Nairobi, Heinemann Kenya.
- Roebuck, John Arthur (1849), *The Colonies of England: A Plan for the Government of Some Portion of our Colonial Possessions*. London, John W. Parker.
- Romulo, Carlos Pena (1956), *The Meaning of Bandung*.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Ronfeldt, David F. (1998), *The Zapatista 'Social Netwar' in Mexico*. Santa Monica, CA, Rand.
- Rosberg, Carl G. and Nottingham, John Cato (1966), *The Myth of 'Mau Mau': Nationalism in Kenya*. New York, Praeger.
- Rostow, W. W. (1960),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

- 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tberg, Robert I. and Mazrui, Ali A., eds (1970), *Protest and Power in Black Af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ux, Edward (1948), *Time Longer Than Rope: A History of the Black Man's Struggle for Freedom in South Africa*. London, Gollancz.
- Rowe, William (1995), 'Against Single Vision', *Bulletin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14: 1, 71–5.
- Roy, Debal K. Singha (1992), *Women in Peasant Movements: Tebhaga, Naxalite and After*. New Delhi, Manohar.
- Roy, M. N. (1922), *India in Transition*,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Abani Mukherji. Geneva, J. B. Target.
- Roy, M. N. (1938), *My Experiences in China*. Bombay, Renaissance Publishing.
- Roy, M. N. (1954), *Memoirs*. Bombay, Allied Publishers.
- Rutherford, Jonathan (1997), *Forever England: Reflections on Masculinity and Empir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 Said, Edward W. (1978), 'The Problem of Textuality: Two Exemplary Positions', *Critical Inquiry* 4: 4, 673–714; revised version in *The World the Text the Critic*.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78–225.
- Said, Edward W. (1983), *The World the Text the Critic*.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aid, Edward W. (1985), *Orientalism: 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the Orient* [1978]. Harmondsworth, Penguin.
- Said, Edward W. (1986), 'Foucault and the Imagination of Power', in *Foucault: A Critical Reader*, ed. David Couzens Ho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49–55.
- Said, Edward W. (1993),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London, Chatto & Windus.
- Sainsbury, John (1987), *Disaffected Patriots: London Supporters of Revolutionary America 1769–82*. Gloucester, Alan Sutton.
- Saivetz, Carol R. (1989),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Third World*.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Salih, Tayeb (1969), *Season of Migration to the North*, trans. Denys Johnson-Davies. Oxford, Heinemann.
- Samim, Ahmet (1981), 'The Tragedy of the Turkish Left', *New Left Review* 126: 60–85.
- Sampurnanand (1961), *Indian Socialism*. London, Asia Publishing House.
- San Juan, E. (1998), *Beyond Postcolonial Theory*. Basingstoke, Macmillan.
- Sangari, Kumkum and Vaid, Sudesh (1989), *Recasting Women: Essays in Colonial History*. New Delhi, Kali for Women.
- Sankara, Thomas (1988), *Thomas Sankara Speaks: The Burkina Faso Revolution, 1983–87*, trans. Samantha Anderson.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 Sankaranh Nair, Chettur (1995), *Gandhi and Anarchy*. Reprint of 2nd edn, 1922. New Delhi, Mittal Publications.
- Santiago, Silvano (1978), *Uma literatura nos trópicos: ensaios sobre dependência cultural*. Sao Paulo, Editora Perspectiva.
- Sardar, Zia, Nandy, Ashis and Wyn Davies, Meryll (1993), *Barbaric Others: A Manifesto on Western Racism*. London, Pluto Press.
- Sareen, Tilak Raj (1979), *Indi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Abroad, 1905–1921*. New Delhi, Sterling.
- Sareen, Tilak Raj (1993), *Indian Revolutionaries, Japan and British Imperialism*. New Delhi, Anmol Publications.
- Sarkar, Sumit (1973), *The Swadeshi Movement in Bengal, 1903–1908*. New Delh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Sarkar, Sumit (1989), *Modern India, 1885–1947*, 2nd edn. Basingstoke, Macmillan.
- Sarkar, Tanika (1989), 'Politics and Women in Bengal – the Conditions and Meaning of Participation', in *Women in Colonial India: Essays on Survival, Work and the State*, ed. Jayasankar Krishnamurty.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31–41.
- Sarkar, Tanika and Butalia, Urvashi, eds (1995), *Women and the Hindu Right*. New Delhi, Kali for Women.
- Saro-Wiwa, Ken (1992), *Genocide in Nigeria: The Ogoni Tragedy*. London, Lagos and Port Harcourt, Saros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Sartre, Jean-Paul (1948), *Existentialism and Humanism* [1946], trans. Philip Mairet. London, Methuen.
- Sartre, Jean-Paul (1958), *Being and Nothingness: An Essay on Phenomenological Ontology* [1943], trans. Hazel E. Barnes. London, Methuen.
- Sartre, Jean-Paul (1963), *The Problem of Method* [1960], trans. Hazel E. Barnes. London, Methuen.
- Sartre, Jean-Paul (1964), *Situations, V. Colonialisme et néo-colonialisme*. Paris, Gallimard.
- Sartre, Jean-Paul (1966), 'Sartre répond', *La Quinzaine littéraire*, 15: 4–5.
- Sartre, Jean-Paul (1968), *The Communists and Peace, with a Reply to Claude Lefort*, trans. Martha H. Fletcher.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 Sartre, Jean-Paul (1976a),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Theory of Practical Ensembles* [1960], Vol. 1, trans. Alan Sheridan-Smith. London, Verso.
- Sartre, Jean-Paul (1976b), *Black Orpheus*, trans. S. W. Allen.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 Sartre, Jean-Paul (1991),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The Intelligibility of History* [1985], Vol. 2, ed. Arlette Elkaim Sartre, trans. Quintin Hoare. London, Verso.
- Sartre, Jean-Paul and Dedijer, Vladimir (1970), *War Crimes in Vietnam*. Nottingham, Bertrand Russell Peace Foundation Publications.
- Sastri, Prakasa (1985), *Socialist Thought in Indi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Lohia's Quest for Indigenous Socialism*. Jaipur, Printwell Publishers.
- Sau, Ranjit (1978), *Unequal Exchange, Imperi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An Essay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orld Capitalism*. Calcutt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avarkar, Vinayak Damodar (1942), *Hindutva: Who is a Hindu?*, 2nd edn. Bombay, Veer Savarkar Prakashan.
- Savarkar, Vinayak Damodar (1947), *The Indian War of Independence, 1857* [1909]. Bombay, Phoenix Publications.
- Scammell, G. V. (1989), *The First Imperial Age: European Overseas Expansion c.1400–1715*. London, HarperCollins.
- Schmidt, Elizabeth (1992), *Peasants, Traders, and Wives: Shona Women in the History of Zimbabwe, 1870–1939*. London, James Currey.
- Schneider, William H. (1982), *An Empire for the Masses: The French Popular Image of Africa, 1870–1900*.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 Schram, Stuart R. and Bastid, Marianne (1973), *Authority,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 Ess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uyler, George S. (1991), *Black Empire* [1937–8], ed. Robert A. Hill and R. Kent Rasmussen.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 Schuyler, Robert L. (1945), *The Fall of the Old Colonial System: A Study in British Free Trade 1770–187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warz, Roberto (1992), *Misplaced Ideas: Essays on Brazilian Culture*, ed. John Gledson. London, Verso.
- Scott, David (1995), 'Colonial Governmentality', *Social Text* 43: 191–200.
- Scott, James C.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cott, James C. (1990),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eeley, John Robert (1971),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1883], ed. John Gro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eers, D., ed. (1981), *Dependency Theory: A Critical Reassessment*. London, Pinter.
- Semmel, Bernard (1960), *Imperialism and Social Reform: English Social-Imperial Thought, 1895–1914*. London, G. Allen & Unwin.
- Semmel, Bernard (1962), *The Governor Eyre Controversy*. London, MacGibbon & Kee.
- Semmel, Bernard (1970), *The Rise of Free Trade Imperialism: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Empire of Free Trade and Imperialism 1750–18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emmel, Bernard (1993), *The Liberal Ideal and the Demons of Empire: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from Adam Smith to Leni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Sen, Amartya (1982), *Poverty and Famine: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Sen, Arindam and Ghosha, Partha (1991), *Communist Movement in Indi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Important Documents*. Patna, Samkalin Prakashan.
- Sen, Sunil Kumar (1985), *The Working Women and Popular Movements in Bengal: From the Gandhi Era to the Present Day*. Calcutta, K. P. Bagchi.
- Sen, Sunil Kumar (1994), *Working Class Movements in India, 1885–1975*.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en Gupta, Bhabani (1972), *Communism in Indian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en Gupta, Bhabani (1979), *CPI-M, Promises, Prospects, Problems*. New Delhi, Young Asia Publications.
- Senghor, Lamine (1927), *La Violation d'un pays*. Paris, Bureau d'Éditions, de Diffusion, et de Publicité.
- Senghor, Léopold Sédar (1964a), *On African Socialism*, trans. Mercer Cook. London, Pall Mall.
- Senghor, Léopold Sédar (1964b), *Négritude et humanism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 Senghor, Léopold Sédar (1983), *Liberté*, 6 vols. Paris, Seuil.
- Serequeberhan, Tsenay (1994), *The Hermeneutics of African Philosophy: Horizon and Discourse*. New York, Routledge.
- Seton-Watson, Hugh (1967), *The Russian Empire 1801–1917*.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Shakir, Moin (1970), *Khilafat to Partition: A Survey of Major Political Trends among Indian Muslims during 1919–1947*. New Delhi, Kalamkar Prakashan.
- Shapiro, Michael J. (1981), *Language and Political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s of Discursive Practic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harma, T. R. (1984), *Communism in India: The Politics of Fragmentation*. New Delhi, Sterling.
- Shaw, A. G. L. (1966), *Convicts and the Colonies: A Study of Penal Transportation from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to Australia and other parts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Faber.
- Shepherd, Verene, Brereton, Bridget and Bailey, Barbara (1995), *Engendering History: Caribbean Wome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Kingston, Ian Randle Publishers.
- Sheshadri-Crooks, Kalpana (1994), 'The Primitive as Analyst: Postcolonial Feminism's Access to Psychoanalysis', *Cultural Critique* 28: 175–218.
- Shivji, Issa G. (1989), *The Concept of Human Rights in Africa*. London, CODESRIA.
- Shohat, Ella (1992), 'Notes on the "Post-Colonial"', *Social Text* 31/32, 99–113.
- Shohat, Ella and Stam, Robert (1994), *Unthinking Eurocentr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Media*. London, Routledge.

- Singelmann, Peter (1980), *Structures of Domination and Peasant Movements in Latin America*.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 Singh, Nahar and Singh, Kirpal (1986), *Struggle for Free Hindustan: Ghadr Movement*, 3 vols. New Delhi, Atlantic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
- Singham, A. W. and Hune, Shirley (1986), *Non-alignment in an Age of Alignments*. London, Zed Books.
- Sinha, Bejoy Kumar (1994), *Indi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Pune, Lokamanya Tilak Smarak Trust.
- Sinha, Mrinalini (1995), *Colonial Masculinity: The 'Manly Englishman' and the 'Effeminate Bengali'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Sinha, Mrinalini (1999), 'The Lineage of the "Indian" Modern: Rhetoric, Agency and the Sarda Act in Late Colonial India', in *Gender, Sexuality and Colonial Modernities*, ed. Antoinette M. Burton. London, Routledge, 207–21.
- Sinha, Mrinalini, Guy, Donna and Woollacott, Angela (1999), *Feminisms and Internationalism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Sivanandan, A. (1982), *A Different Hunger: Writings on Black Resistance*. London, Pluto Press.
- Sixth Pan African Congress (1976), *Resolutions and Selected Speeches from the Sixth Pan African Congress*. Dar es Salaam, Tanzania Publishing House.
- Slemon, Stephen (1994), 'The Scramble for Post-Colonialism', in *De-Scribing Empire: Postcolonialism and Textuality*, ed. Chris Tiffin and Alan Lawson. London, Routledge, 15–32.
- Slemon, Stephen and Tiffin, Helen, eds (1989), *After Europe: Critical Theory and Post-Colonial Writing*. Sydney, Dangaroo Press.
- Smith, Adam (1910),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 2 vols, ed. E. R. A. Seligman. London, Dent.
- Smith, Anthony D. (1986),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Smith, Anthony D., ed. (1992),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Leiden, Brill.
- Smith, Goldwin (1863), *The Empire: A Series of Letters Published in 'The Daily News'*. Oxford, J. Henry and J. Parker.
- Smith, Linda Tuhiwai (1998), *Decolonising Methodologies*. London, Zed Books.
- Smith, Woodruff D. (1986),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Nazi Imperi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Bell, Sydney (1859),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Longmans & Roberts.
- Soekarno (1969), *Nationalism, Islam, and Marxism*, trans. Karel H. Warouw and Peter D. Weldon. Ithaca, NY,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 Southeast Asia Program, Dept. of Asian Studies, Cornell University.
- Sofri, Gianni (1999), *Gandhi and India*. Moreton-in-Marsh, Windrush Books.
- Sofri, Gianni, Rainero, Romain, Giovana, Mario, De Santis, Sergiò, Collotti Pischel, Enrica and Del Boac, Angelo (1968), *Lotte di liberazione e rivoluzioni in Africa Nera, Egitto, Algeria, Cuba, Cina, Vietnam*. Turin, G. Giappichelli editore.
- Soga, Tiyo (1983), *The Journal and Selected Writings of the Reverend Tiyo Soga*, ed. Donovan Williams. Cape Town, A. A. Balkema.
- Sorel, Georges (1999), *Reflections on Violence*, ed. Jeremy Jenn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pector, Ivar (1958),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uslim World, 1917–195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Spector, Ivar (1962), *The First Russian Revolution: Its Impact on Asia*.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Spender, Dale (1985), *Man Made Language*, 2nd ed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1985),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Speculations on Widow Sacrifice', *Wedge* 7/8: 120–30.
-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1987),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New York, Methuen.
-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1993),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London, Routledge.
-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1999),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pratt, Philip (1955), *Blowing Up India*. Calcutta, Prachi Prakashan.
- Sprinker, Michael, ed. (1992), *Edward Said: A Critica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Srivastava, Gita (1982), *Mazzini and his Impact on the Indian National Movement*. Allahabad, Chugh Publications.
- Stalin, Joseph (1936), *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and Colonial Question*. London, Martin Lawrence.
- Stalin, Joseph (1939), *Foundations of Leninism* [1924].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Staunton, Irene, ed. (1990), *Mothers of the Revolution: The War Experiences of Thirty Zimbabwean Women*. London, James Currey.
- Stavenhagen, Rodolfo, ed. (1970), *Agrarian Problems and Peasant Movements in Latin America*.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Stern, Steve J. (1999), 'The Tricks of Time: Colonial Legacies and Historical Sensibilities in Latin America', in *Colonial Legacies: The Problem of Persistence in Latin American History*, ed. Jeremy Adelman. New York, Routledge, 135–50.
- Stern, Steve J., ed. (1998), *Shining and Other Paths: War and Society in Peru, 1980–1995*.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Stevens, Christopher (1976), *The Soviet Union and Black Africa*. London, Macmillan.
- Stoler, Laura Ann (1995), *Race and the Education of Desire: Foucault's History of Sexuality and the Colonial Order of Thing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Strauss, Gustave Louis M. (1875), *Men Who Have Made the New German Empire: A Series of Biographical Sketches*. London, Tinsley Brothers.
- Strausz-Hupé, Robert and Hazard, Harry W., eds (1958), *The Idea of Colonialism*. London, Atlantic Books.
- Strobel, Margaret (1979), *Muslim Women in Mombasa, 1890–1975*.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turgis, James L. (1969), *John Bright and the Empire*. London, Athlone Press.
- Suleri, Sara (1992), *The Rhetoric of English Indi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Sultan-Galiev, Mir Said (1984), *Stati*. Oxford, Ob-vo issledovaniia Srednei Azii.
- Sunder Rajan, Rajeswari (1993), *Real and Imagined Women: Gender, Culture, Postcolonialism*. London, Routledge.
- Sunder Rajan, Rajeswari (1997), 'The Third World Academic in Other Places; or the Postcolonial Intellectual Revisited', *Critical Inquiry* 23: 3, 596–616.
- Sunderland, Jabez Thomas (1932), *India in Bondage: Her Right to Freedom*. Calcutta, R. Chatterjee.
- Sundkler, Bengt (1961), *Bantu Prophets in South Africa*, 2nd ed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uny, Ronald Grigor (1998), *The Soviet Experiment: Russia, the USSR, and the Successor S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bata, I. B. (1974), *The Awakening of a People* [1950]. Nottingham, Spokesman Books.
- Tabili, Laura (1994), 'We Ask for British Justice': *Workers and Racial Difference in Late Imperial Britai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Tarlo, Emma (1996), *Clothing Matters: Dress and Identity in India*. London, Hurst.
- Taussig, Michael T. (1986), *Sham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Wild Man: A Study in Terror and Heal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aylor, Sandra C. (1999), *Vietnamese Women at War: Fighting for Ho Chi Minh and the Revolution*. Lawrence,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 Tharu, Susie J. and Lalita, Ke (1993), *Women Writing in India: 600 BC to the Present*, 2 vols.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homas, Alan, et al. (1994), *Third World Atlas*, 2nd edn.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 Thompson, V. B. (1969), *Africa and Unity: The Evolution of Pan-Africanism*. London, Longmans, Green.
- Thornton, A. P. (1985), *The Imperial Idea and its Enemies: A Study in British Power*, 2nd edn. Basingstoke, Macmillan.
- Tiffin, Chris and Lawson, Alan (1994), *De-Scribing Empire: Postcolonialism and Textuality*. London, Routledge.
- Tinker, Hugh (1987), *Men Who Overturned Empires: Fighters, Dreamers and Schemers*. Basingstoke, Macmillan.
- Todorov, Tzvetan (1993), *On Human Diversity: Nationalism, Racism, and Exoticism in French Though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örnquist, Olle (1984), *Dilemmas of Third World Communism: The Destruction of the PKI in Indonesia*. London, Zed Books.
- Törnquist, Olle (1999),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Touré, Ahmed Sékou (1959), *Expérience guinéenne et unité africaine*.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 Touré, Ahmed Sékou (1976), *Révolution, culture, panafricanisme*, 3rd edn. Conakry, Bureau de presse de la présidence de la République.
- Towa, Marcien (1971), *Essai sur la problématique philosophique dans l'Afrique actuelle*. Yaoundé, Editions CLE.
- Trivedi, Harish (1993), *Colonial Transactions: English Literature and India*. Calcutta, Papyrus.
- Trivedi, Harish and Mukherjee, Meenakshi (1996), *Interrogating Post-colonialism: Theory, Text, and Context*. Shimla, Indian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
- Trollope, Joanna (1983), *Britannia's Daughters: Women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Hutchinson.
- Trotsky, Leon (1932),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Pioneer Publishers.
- Trotsky, Leon (1934),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rans. Max Eastman. London, Victor Gollancz.
- Trotsky, Leon (1941), *Stalin: An Appraisal of the Man and His Influence*. New York, Harper.
- Trotsky, Leon (1945),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24]*. New York, Pioneer Publishers.
- Trotsky, Leon (1970), *Where is Britain Going? [1925]*. London, Socialist Labour League.
- Trotsky, Leon (1978), *Leon Trotsky on Black Nationalism and Self-Determination*, 2nd edn.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 Tucker, Vincent (1997), *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Development*. London, F. Cass.
- Tucker, Vincent (1999), 'The Myth of Development: A Critique of a Eurocentric Discourse', in *Cr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 Contributions to a New Paradigm*, ed. Ronaldo Munck and Denis O'Hearn. London, Zed Books, 1-26.
- Turner, Bryan S. (1974), 'The Concept of Social "Stationariness": Utilitarianism and Marxism', *Science and Society* 38, 3-18.
- Turner, Bryan S. (1978), *Marx and the End of Orientalis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Turner, Bryan S. (1994), *Orientalism, Postmodernism and Globalism*. London, Routledge.
- Twain, Mark (1992), *Mark Twain's Weapons of Satire: Anti-Imperialist Writings on the Philippine-American War*, ed. Jim Zwick.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 Ulyanovsky, Rostislav (1978), *National Liberation*.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Urdang, Stephanie (1979), *Fighting Two Colonialisms: Women in Guinea-Bissau*.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Uyangoda, Jayadeva and Biyanwila, Janaka (1997), *Matters of Violence: Reflections on Social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n Sri Lanka*. Colombo, Social Scientists' Association.
- Vail, Leroy and White, Landeg (1980), *Capitalism and Colonialism in Mozambique: A Study of Quelimane Distric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Vail, Leroy and White, Landeg (1991), *Southern African Voices in History*. London, James Currey.
- Vaillant, Janet G. (1990), *Black, French and African: A Life of Léopold Sédar Sengho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Van, Ngo (1995), *Revolutionaries They Could Not Break: The Fight for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in Indochina 1930-1945*. London, Index.
- Van Deburg, William L. (1997), *Modern Black Nationalism from Marcus Garvey to Louis Farrakha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Vanden, Harry E. (1986), *National Marxism in Latin America: José Carlos Mariátegui's Thought and Politics*. Boulder, CO, L. Rienner.
- Vandeveld-Daillière, Hélène (1980), *Femmes algériennes à travers la condition féminine dans le constantinois depuis l'indépendance*. Alger, Office des publications universitaires.
- Vatikiotis, P. J. (1978), *Nasser and His Generation*. London, Croom Helm.
- Vatikiotis, P. J. (1991), *The Modern History of Egypt: From Muhammad Ali to Mubarak*, 4th edn.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 Vaughan, Megan (1991), *Curing Their Ills: Colonial Power and African Illnes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Vieira, Else Ribeiro Pires (1999), 'Postcolonialisms and the Latin Americas', *Interven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1: 2, 274-81.
- Visram, Rozina (1986), *Ayahs, Lascars, and Princes: The Story of Indians in Britain 1700-1947*. London, Pluto Press.
- Visvanathan, Nalini, Duggan, Lynn, Nisonoff, Laurie and Wiegersma, Nancy (1997), *The Women, Gender and Development Reader*. London, Zed Books.
- Viswanathan, Gauri (1998), *Outside the Fold: Conversion, Modernity, and Belief*.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Visweswaran, Kamala (1996), 'Small Speeches, Subaltern Gender: Nationalist Ideology and its Historiography', *Subaltern Studies IX*, 83-125.
- Von Eschen, Penny M. (1997), *Race against Empire: Black Americans and Anticolonialism, 1937-1957*.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ade, Peter (1997), *Race and Ethnicity in Latin America*. London, Pluto Press.
- Wadstrom, C. B. (1794), *An Essay on Colonization, particularly applied to the West Coast of Africa, with some free Thoughts on Cultivation and Commerce*, 2 vols. London.
- Wakefield, Edward Gibbon (1914), *A View of the Art of Colonization, in Letters Between a Statesman and a Colonist: With present reference to the British Empire [184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Walker, Cheryl, ed. (1990), *Women and Gender in Southern Africa to 1945*. London, James Currey.
- Walker, Cheryl (1991), *Women and Resistance in South Africa*, 2nd edn. Cape Town, David Philip.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61), *Africa: The Politics of Independenc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4–89),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3 vol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9),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Ess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84),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 The States, the Movements, and the Civilizations: Ess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95), 'The Insurmountable Contradictions of Liberalism: Human Rights and the Rights of Peoples in the Geoculture of the Modern World-System',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94: 4, 1161–78.
- Wallerstein, Immanuel, ed. (1975), *World Inequality: Origins and Perspectives on the World System*.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 Wallerstein, Immanuel, Guido Béjar, Rafael, Fernández Reyes, Otto and Torregrosa, María Luisa (1990), *El Juicio al sujeto: un análisis global de los movimientos sociales*. Mexico, FLACSO, M. A. Porrúa.
- Walston, Sir Charles (1920), *The English-Speaking Brotherhood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2nd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re, Vron (1992), *Beyond the Pale: White Women, Racism and History*. London, Verso.
- Ware, Vron (1996), 'Defining Forces: "Race", Gender and Memories of Empire', in *The Post-colonial Question: Common Skies, Divided Horizons*, ed. Iain Chambers and Lidia Curtis. London, Routledge, 142–56.
- Warren, Bill (1980), *Imperialism: Pioneer of Capitalism*, ed. John Sender. London, Verso.
- Waterman, Peter (1998), *Globaliza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isms*. London, Mansell.
- Weber, Thomas (1997), *On the Salt March: The Historiography of Gandhi's March to Dandi*. New Delhi, HarperCollins.
- Weinberger-Thomas, Catherine (1996), *Cendres d'immortalité: la crémation des veuves en Inde*. Paris, Seuil.
- Weiner, Myron (1966), *Modernization: The Dynamics of Growth*. New York, Basic Books.
- Weisbord, Robert G. (1973), *Ebony Kinship: Africa, Africans, and the Afro-American*.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 Weiss, Ruth (1986), *The Women of Zimbabwe*. London, Kesho Publications.
- Wells, H. G. (1920), *Russia in the Shadows*.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 Wells, Julia C. (1982), 'The History of Black Women's Struggles Against Pass Laws in South Africa, 1900–56', in *African Women and the Law*, ed. Margaret Hay and Marcia Wright. Boston, Boston University Press, 145–68.
- Wells, Julia C. (1986), 'The War of Degradation: Black Women's Struggle Against Orange Free State Pass Laws, 1913', in *Banditry, Rebellion and Social Protest in Africa*, ed. Donald Crummey. London, James Currey, 253–70.
- Wells, Julia C. (1993), *We Now Demand!: The History of Women's Resistance to Pass Laws in South Africa*. Johannesburg, Witwatersrand University Press.
- Werbner, Richard and Ranger, Terence (1996), *Postcolonial Identities in Africa*. London, Zed Books.
- Whelan, Frederick G. (1996), *Edmund Burke and India: Political Morality and Empire*.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 Wilford, Rick and Miller, Robert L. (1998), *Wome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The Politics of Transition*. London, Routledge.
- Willetts, Peter (1978), *The Non-aligned Movement: The Origins of a Third World Alliance*. London, Frances Pinter.
- Williams, Raymond (1988),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Fontana.
- Williamson, Edwin (1992), *The Penguin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London, Allen Lane.
- Wilson, Edward Thomas (1974), *Russia and Black Africa before World War II*. New York, Holmes & Meier.
- Wilson, Edward Thomas (1980), 'Russia's Historic Stake in Black Africa', in *Africa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ed. David E. Albright. London, Macmillan, 67–92.
- Wolf, Eric R. (1971),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Faber & Faber.
- Wolfenstein, Eugene Victor (1967), *The Revolutionary Personality: Lenin, Trotsky, Gandhi*.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olfenstein, Eugene Victor (1981), *The Victims of Democracy: Malcolm X and the Black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olfenstein, Eugene Victor (1993), *Psychoanalytic-Marxism: Groundwork*.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 Wolpert, Stanley A. (1989), *Tilak and Gokhale: Revolution and Reform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India*.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mack, John, Jr. (1972), *Zapata and the Mexican Revolu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 Wood, Nancy (1998), 'Remembering the Jews of Algeria', in *Translating 'Algeria'*, *Parallax* 7, 169–84.
- World Development Movement (1999), 'In the Real World of the WTO the Sun Does Not Always Shine', *Financial Times* 22 November 1999.
- Wright, Marcia (1993), *Strategies of Slaves and Women. Life Stories from East/Central Africa*. London, James Currey.
- Wright, Richard (1956), *The Colour Curtain: A Report on the Bandung Conference*. London, Dobson.
- Wrong, E. M. (1926), *Charles Buller and Responsible Governme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X, Malcolm (1992), *By Any Means Necessary*, 2nd edn. New York, Pathfinder.
- Yeğenoğlu, Meyda (1998), *Colonial Fantasies: Towards a Feminist Reading of Orient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Young, Robert J. C., ed. (1981), *Untying the Text: A Post-Structuralist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Young, Robert J. C. (1990), *White Mythologies: Writing History and the West*. London, Routledge.
- Young, Robert J. C. (1995a), *Colonial Desire: Hybridity in Culture, Theory and Race*. London, Routledge.
- Young, Robert J. C. (1995b), 'Foucault on Race and Colonialism', *New Formations* 25, 57–65.
- Young, Robert J. C. (1996), *Torn Halves: Political Conflict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Young, Robert J. C. (1998), 'The Overwritten Unwritten: Nationalism and its Doubles in Post-Colonial Theory', in *(Un)writing Empire*, ed. Theo D'haen. Amsterdam and Atlanta, Rodopi, 15–34.
- Young, Robert J. C. (1999), '"Dangerous and Wrong": Shell, Interven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national Companies', *Interven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1: 3, 439–64.
- Yuval-Davis, Nira (1997), *Gender & Nation*. London, Sage.
- Yuval-Davis, Nira and Anthias, Floya, eds (1989), *Woman – Nation – State*. Basingstoke, Macmillan.
- Zavala, Iris M. (1992), *Colonialism and Culture: Hispanic Modernisms and the Social Imagina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Zavala, Iris M. and Rodríguez, Rafael (1980), *The Intellectual Roots of Independence: An Anthology of Puerto Rican Political Essay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Zhang, Yongjin (1991),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1918-20: The Middle Kingdom at the Periphery*. Basingstoke, Macmillan.

# 索引

(索引上頁碼為原文書頁碼；引用時請對照本書頁編碼檢索)

- Abd-el-Krim 阿布杜勒·克里姆 153
- Abdel-Malek, Anouar 阿布代·馬力克 170-5, 178, 180, 181, 190, 191, 212
- Abolition Society 廢除協會 77
- Aboriginals Protection Society 原住民保護協會 77
- Adomo, Theodor 阿多諾 111, 340
- Afghanistan 阿富汗 49, 91, 135, 136, 143, 153, 37
- Africa 非洲 217-92  
and African-American politics 與非美政治 219, 221  
anti-colonialism 反殖民主義 180, 217-19, 225, 226, 230  
communist activity 共產活動 226-30, 232-3  
cultural politics 文化政治 8, 291  
diasporic activists 離散行動派 219, 226-7  
legacy of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遺緒 291  
liberation movements 解放運動 180  
messianic movements 彌賽亞運動 229  
nationalism 民族主義 218, 219, 230, 240  
postcolonial states 後殖民國家 291-2  
religious protest movements 宗教反對運動 229-30  
socialism 社會主義 217-35, 241-2  
women activists 女性行動派 363-8  
youth movements 青年運動 227, 228, 229, 230  
*see also* specific countries/regions 另見特定國家/地區
- African Blood Brotherhood 非洲血誓弟兄 222
- African consciousness 非洲意識 221
-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 非洲民族會議 162, 213, 230, 231, 232, 238, 249, 250, 324, 367
- African Service Bureau 非洲事務局 227
- African socialism 非洲社會主義 50, 166, 239-42, 244-8, 251, 252, 253-73, 280, 283, 291
- aims and objectives 宗旨與目標 242, 244
- Francophone African socialism 法語系非洲社會主義 253-73
- gendered account 性別化陳述 247
- Nkrumah on 恩克魯瑪談非洲社會主義 244-6
- Nyerere on 尼雷爾談非洲社會主義 246-8
- scientific form 科學形式 247
- Senghor on 桑戈爾談非洲社會主義 272-3
- values 價值 251
- African-Americans 非裔美人 133, 142, 220, 221-3, 225, 226
- Afrikaner nationalists 南非白人民族主義者 178-9
- Afro-Asian Latin American People's Solidarity Organization 非、亞、拉美人民團結組織 213
- agency 能動性 45, 49, 354  
subaltern agency 底層階級能動性 353, 358
- Aggrey J. E. K. 阿格雷 221
- agrarian question 土地問題 137, 149, 157, 182, 188, 196
- ahimsa 不殺生 248, 323-5
- Ahmad, Aijaz 阿赫默德 62, 167, 170, 172, 339, 413
- Ahmad, Muzaffar 哈莫德 134, 312, 314

- Ainu 愛努族 4, 59  
 Al-AfghanT, Jamal el-Din 阿富汗尼 138, 175  
 al-Qadhdhafi, Muammar 爾卡紮菲 190, 277  
 Alaska 阿拉斯加 3, 42  
 Albania 阿爾巴尼亞 58, 59  
 Aleutian Islands 阿留申群島 42  
 Alexandria 亞歷山大港 29  
 Algeria vii-ix, 阿爾及利亞 16, 17, 20, 22, 30, 86, 88, 104, 164, 179, 191, 243, 254, 293-9, 363, 411, 419-23  
 communism 共產主義 147, 156, 231, 419  
 'defrancification' 去法國化 298-9  
 disenfranchisement of Muslim population 剝奪穆斯林人口的參政權 299-300  
 European minority 歐洲少數族裔 279  
 Fanon and 法農與阿爾及利亞 277-80  
 FLN 民族解放陣隊 277-8, 280, 298, 362, 420  
 independence 獨立 280  
 indigenous resistance 原住民抵抗 167, 250, 275, 358, 417  
 Islamic nationalism 伊斯蘭民族主義 147, 173, 278  
 Jews 猶太人 22, 414, 422, 424  
 'pacification' of 平定 294-5  
 pieds-noirs 黑腳 414, 415  
 torture viii 折磨 295, 298, 424  
 violence 暴力 276-7, 282, 294, 295, 296, 297-9, 300, 412  
 women activists 女性行動派 362, 363  
 women's equality 婦女平等 370, 38  
 Algerian war of independence 阿爾及利亞獨立之戰 ix, 167, 253, 275, 276-7, 283  
 Ali, Aruna Asaf 阿如娜·阿里 362  
 alienation 異化 270, 271  
 All African Convention 全非洲人大會 232  
 All India Radio 全印度廣播電台 331  
 All-India Non-Cooperation Movement 全印度不合作運動 332  
 Allende, Salvador 阿連德 194, 213  
 alterity 異己 271, 418  
 Althusser, Louis 阿圖塞 185, 187, 295, 414, 416  
 Alvarado, Salvador 阿瓦多 196  
 Amanullah, King 阿馬紐拉國王 136, 153  
 American Civil War 美國內戰 91  
 American colonies 美國殖民地 16, 78, 79, 83, 85, 92  
 America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美國獨立宣言 86  
 American Negro Labor Congress 美國黑人勞工協會 222, 224  
 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美國獨立戰爭 35, 78, 82  
 Amin, Id 亞明 251  
 Amin, Samir 阿敏 48, 62, 111  
 Amritsar Massacre (1919) 阿姆利則大屠殺 96, 296, 324, 332  
 Anderson, Benedict 安德森 172  
 Andrews, C. F. 安德魯 322  
 androgyny 327 雌雄同體  
 Angola 安哥拉 162, 166, 213, 214, 219, 240, 247, 250, 251, 283, 284, 363  
 annexation 併吞 94, 117  
 anthropophagy 食人想像/食人主義 201, 272  
 Anti-colonial Conference (1927) 反殖民會議 176  
 anti-colonialism 反殖民主義 2, 3, 6, 10, 11, 19, 28-9, 35, 37, 65, 66, 73-87, 133, 161  
 and agency 與能動性 45  
 common project 共同規劃 164-5  
 cultural nationalism and 文化民族主義 318-23  
 cultural resistance 文化抵抗 18-19  
 diasporic activists 離散行動派 177-8, 218, 219, 257, 264, 350  
 discourse of rights and justice 權利與公義論述 86-7  
 economic argument 經濟主張 73-4, 82-7, 88, 99, 165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century revolutions 18與19世紀革命 79  
 focus on white settler colonies 以白人拓居殖民地為焦點 94

- forms of 形式 371  
 gendered 性別化 77, 327, 356-7, 359  
 ideology 意識形態 75  
 internal activism 內部行動派 100  
 liberal anti-colonialism 自由派反殖民主義 92  
 male perspectives 男性觀點 178, 360, 361  
 and Marxism 與馬克思主義 111-12, 341  
 metropolitanism 帝國都會觀點 61  
 moral and humanitarian argument 道德與人道主張 15, 73-4, 75-82, 88  
 and nationalism 79, 119 與民族主義  
 non-revolutionary forms of resistance 非革命形式的抵抗 358  
 non-violence strategy 非暴力策略 297  
 playing by different rules 藉由改變規則 343-4  
 political, cultural and theoretical positions 政治、文化和理論位置 164, 165-6  
 pre-Second World War critique 二次大戰前之批判 130  
 psychological resistance 心理抵抗 341-2  
 reversal into indigeneity 向本土回轉 326  
 tradition of 反殖民主義的傳統 74, 75, 161-3, 168  
 tricontinental anti-colonialism 三大洲反殖民主義 218-19  
 two measures' 兩套標準 86  
 women's role in 女性的角色 178, 356, 357, 360-82  
 see also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s 另見民族解放運動  
 anti-slave trade movement 反奴隸運動 76-7  
 apartheid 種族隔離政策 231  
 Apithy, Sourous 阿皮蒂 219  
 Appiah, Kwame 阿皮耶 62  
 Argentina 阿根廷 20, 156, 194, 195  
 Armand, Inessa 阿曼德 140  
 Armenia 亞美尼亞 122, 124, 135  
 Arusha Declaration (1967) 阿魯沙宣言 247  
 assimilation 同化 30, 32, 33, 34, 75, 80, 164, 254, 259, 264, 268  
 British assimilation 英國的同化 300-1  
 bureaucratic centralization 階層化中央集權 34  
 contradictions 矛盾 260  
 ethnocentric egalitarianism paradox 種族中心平等主義的弔詭 32  
 Francophone colonies 法屬殖民地 17, 30, 32, 81, 164, 254, 264, 284, 299, 334, 417  
 political and cultural 政治與文化 81  
 and political rights 和政治權利 94, 264  
 samas 348-9  
 and violence 暴力 300  
 association 聯合 32, 33, 254, 301  
 Atlantic Charter (1941) 大西洋憲章 180  
 Australia 澳洲 17, 19, 23, 31, 39, 95, 130  
 Aboriginal peoples 原住民 4, 20, 77  
 decolonization 去殖民化 3, 163  
 immigration policy 移民政策 62, 79, 149  
 independence 獨立 97  
 nationalism 79 民族主義  
 participatory government 直接參與政府 164  
 Australian Natives Association 澳洲本土協會 20  
 Austro-Hungarian Empire 奧匈帝國 2, 115, 118  
 Awooner-Renner, Bankole 阿烏納雷那 227  
 Azerbaijan 亞塞拜然 122, 124, 135, 136  
 Azevedo, Luis de 阿塞維多 213  
 Azikiwe, Nnamdi 阿茲基拿 45, 68, 221, 227  
 Babus 巴布斯 354  
 Baghdad Pact (1955) 巴格達協定 190  
 Bahamas 巴哈馬群島 179  
 Bai, Rani Lakshmi 白依王妃 362  
 Baku 巴庫 135, 136  
 Baku Congress (1920) 巴庫會議 134-9, 141, 142, 143, 144, 147, 152, 198

- Bakunin 巴枯寧 120  
 Balino, Carlos 巴里諾 195  
 Baltic states 波羅的海國家 118, 122  
 'banana republics' 香蕉共和國 50  
 Banda, Kamuzu 班達 221  
 Bandung Conference (1955) 萬隆會議 51, 59, 119, 157, 191-2, 213  
 Bangladesh 孟加拉 4  
 Baran, Paul 巴倫 50, 111  
 Barq, Mohammed Abdur Rabb 巴葛 134, 137, 312  
 Barthes, Roland 巴特 187  
 Basmachi 巴斯馬其 139  
 Bastiat, Frederic 巴斯夏 89  
 Batavia 巴達維亞 17  
 Ba'thism 復興主義 190  
 Bauer, Otto 包爾 115, 120  
 Bavaria 巴伐利亞 129  
 Bay of Pigs invasion (1961) 豬羅灣入侵事件 194, 216  
 Beckford, William 貝克福德 83  
 Belgium 比利時 2, 3, 31, 117  
 Belorussia 白俄羅斯 122  
 Ben Bella, Mohammed Ahmed 班貝拉 156, 178, 278  
 Benin 貝南 41  
 Bentham, Jeremy 邊沁 85-6, 92  
 Berlin conference (1884-1885) 柏林會議 31  
 Bernstein, Eduard 伯恩斯坦 116  
 Besant, Annie 貝森 91, 94, 319, 322, 324  
 Bevin, Ernest 貝文 116  
 Bhabha, Homi K. 巴巴 62, 69, 339, 343, 354, 392, 397  
 challenges Indian theoretical orthodoxies 挑戰印度理論正統 339, 350, 351  
 dialectical method 辯證方法 410  
 hybridity in 巴巴的雜揉 347, 348, 349  
 revisionary model of colonial discourse 殖民論述調整的模式 392  
 use of Foucault's concept of enunciation 傅柯「陳述過程」概念之運用 401  
 Biko, Steve 畢克 220, 232, 280  
 Black Atlantic 黑色大西洋 218, 219, 253  
 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 黑人意識運動 220, 232, 280  
 black nationalism 黑人民族主義 220, 240  
 Black Panthers 黑豹 215, 223  
 Black Power 黑人權力 219, 221, 280  
 Black Zionism 黑人錫安建國主義 218, 219-20  
 Blavatsky, Madame 布拉瓦茨基夫人 319  
 Bloncourt, Max 布朗寇 176  
 Blum-Violette plan 布魯姆-維奧萊 147  
 Biyden, Edward W. 布萊頓 217, 218  
 Boas, Franz 鮑亞士 420  
 Boer War (1899-1902) 波爾戰爭 41, 95, 98, 116, 296, 318  
 Boers 波爾人 79  
 Bolivar, Simon 博利瓦 76, 106, 161  
 Bolivia 玻利維亞 156, 166, 199, 207, 211, 214, 215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 布爾什維克革命 10, 59, 100, 119, 120, 130, 170, 185, 307  
 Borkenau, F. 博坎納 154, 155  
 Borman, Reboti 柏曼 311  
 Bose, Girindrasekhar 波士 341  
 Bose, Rash Behari 包斯 312  
 Bose, Subhas Chandra 蘇巴希·強達拉·波士 179, 315, 328, 334  
 Boupacha, Djamilia 布帕吉 viii  
 Bourdieu, Pierre 布迪厄 414  
 bourgeoisie 資產階級 103-4, 106, 131, 147, 148  
 Brathwaite, Kamu 伯列維特 68  
 Brazil 巴西 1, 17, 193, 194, 195, 202-3, 215  
 Bretton Woods agreement 布列頓森林協議 49, 53  
 Briggs, Cyril 布立格茲 220, 222, 226  
 Bright, John 布萊特 80, 91, 95  
 Brissot de Warville, Jacques Pierre 布里索 76, 81  
 Britain 英國 (大不列顛) 135, 143, 165  
 anti-colonialism 反殖民主義 76-7, 89-95  
 anti-slavery campaign 反奴隸運動 76-7  
 class politics 階級政治 9-10, 355  
 Commonwealth 大英國協 39

- Communist Party 共產黨 147, 148, 232, 313  
 decolonization 去殖民 3  
 democracy 民主 9  
 Navigation Laws 航海法 23, 36, 83  
 radical populist tradition 激進民粹派傳統 97  
 shift from anti-colonialism to imperialism 從反殖民主義轉變成帝國主義 90-1  
 universal suffrage 普遍參政權 9  
 British colonialism 英國殖民主義 2, 17, 18, 21, 22, 23, 90  
 assimilation 同化 300-1  
 association doctrine 聯合原則 33, 301  
 Burke's critique of 柏克的批判 78-80  
 colonial discourse 殖民論述 408-9  
 domestic resistance 國內的抵抗 34, 35, 74, 82, 90  
 idiosyncrasy 奇特性 18, 34  
 significant dates 重大日期 35  
 successive expansion 連續擴張 34-5  
 British Empire 大英帝國 16, 18, 26, 31, 41, 180  
 British Guiana 英屬圭亞那 173, 179, 193, 234  
 British imperialism 英國帝國主義 9-10, 29, 31, 32, 34-6, 117, 136  
 Comintern activities against 共產國際對抗活動 145  
 deconstruction 解構 92-3  
 despotism and democracy 專制與民主 38, 95  
 dualistic system 二元化系統 35, 40  
 'empire and commerce' imperialism 「帝國與商業」帝國主義 39, 41  
 imperial federation 帝國聯邦 35-6  
 internal anti-imperialist critique 內部反帝國主義的批判  
 liberalism/radicalism 自由主義/激進主義 37  
 minimal/non-interference 最低/不干涉策略 300, 380  
 reformulation as racial not commercial entity 視為種族實體而非商業實體 36-7  
 Roman Empire analogy 羅馬帝國的類比 33  
 working-class attitudes towards 工人階級對英國帝國主義之態度 334  
 Brockway, Fenner 布洛葛威 177  
 Brunn Congress (1899) 布隆會議 107, 115  
 Brussels Congress (1904) 布魯賽爾會議 116  
 Buchan, John 布肯 42  
 Buganda 布干達 179  
 Bugeaud, General 畢吉歐將軍 294  
 Bukharin, Nikolai Ivanovich 布哈林 99, 109  
 Bunting, S. P. 邦亭 230  
 Burakumin 部落民 4  
 Burke, Edmund 柏克 78-80  
 critique of colonialism 對殖民主義之批判 79-80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法國革命之反省》 78  
 Burma 緬甸 102, 162, 163, 179  
 Butt, Isaac 巴特 95, 96  
 Byzantine empire 拜占庭帝國 16  
 Cabral, Amilcar 卡布拉爾 68, 105, 188, 210, 213, 246, 283-9  
 and cultural reconversion 和文化回歸 288, 290  
 on identity 談身分認同 291  
 on liberation 談解放 286  
 on role of culture 談文化的地位 288-92  
 'The Weapon of Theory' 武器理論 285  
 theoretical formulations 理論陳述 284-5, 286  
 California 加州 104  
 Calvet, Pierre 卡韋 393, 424  
 Cama, Bhikaji 卡瑪 115, 312-13, 362  
 Camara, Helder 卡麥拉 297  
 Cambodia 高棉 213  
 Cameroons 喀麥隆 162, 304  
 Camus Albert 卡繆 294, 295, 414  
 Canada 加拿大 4, 19, 23, 34, 80, 91, 92, 95, 166, 301

- constitutional moves towards 立憲行動  
 decolonization 去殖民化 163  
 dominion status 自治領 39, 92  
 immigration policy 移民政策 79, 149  
 independence 獨立 97  
 participatory government 直接參與政府 164
- Canary Islands 加拿利群島 3  
 Candace, Gratien 康代思 264  
 Cape Verde Islands 佛得角群島 251, 291  
 capitalism 資本主義 7, 9, 24, 101, 103, 136, 147, 148, 343  
 free-market capitalism 自由市場資本主義 59  
 Gandhi on capital-labour relations 甘地談資本—勞動關係 322-3  
 and imperialism 與帝國主義 27-8, 110, 290, 311  
 Marx on 馬克思談資本主義 101, 102, 103, 105, 109  
 monopoly capitalism 壟斷性資本主義 110, 125  
 resistance to 對抗資本主義 170
- Cardenas, Lazaro 卡德納斯 196  
 Carmichael, Stokeley 凱米歇爾 220, 223  
 Carnarvon, Earl of 卡爾納馮伯爵 92-3  
 Carpenter, Edward 卡本特 326  
 Carpentier, Alejo 卡彭鐵爾 193  
 Carrere d'Encausse, Helene 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 118-19  
 Casablanca group 卡薩布蘭加集團 243  
 Casely Hayford, Joseph 卡斯利·海佛 217  
 Casement, Sir Roger 凱斯曼爵士 1-2, 25, 116, 312  
 caste 種姓 4, 349  
 Castro, Fidel 卡斯楚 169, 196, 204, 206, 211, 212, 215, 216, 223, 288, 302, 334  
 Caucasus 高加索山 122, 135, 136  
 centrism 中心主義 417  
 Cesaire, Aime 塞捷爾 2, 30, 225, 246, 255, 265, 266, 268, 269, 270, 272, 275, 276  
 Ceuta 休達 3  
 Chad 查德 304
- Chakrabarty, Dipesh 查克拉巴帝 62, 351, 354, 355  
 Chamberlain, Joseph 張伯倫 41, 90  
 Champion, George 查皮安 231  
 Chaplin, Charlie 卓別林 330  
 Charles X of France (法國) 查理十世 88  
 Chatterjee, Partha 恰特吉 203, 320, 321, 339, 344, 345, 351, 377, 418  
 Chattopadhyaya, Bankimchandra 查托帕迪亞雅 342  
 Chattopadhyaya, Kamaladevi 卡瑪拉微 362  
 Chattopadhyaya, Virandranath 恰托巴底亞耶 176, 312  
 Chauri Chaura 324, 332  
 Che-Lumumba Club 切—蘆巴蒙組織 223  
 Chen Duxiu 陳獨秀 150  
 Chiang Kai-shek 蔣介石 148, 151, 153, 177, 182  
 Chile 智利 20, 53, 156, 194, 195, 213  
 China 中國 3, 44, 47, 59, 92, 130, 135, 148, 149, 182-8, 213  
 China-Soviet split 中蘇分裂 157, 188  
 Comintem policy in 共產國際對中政策 150-1, 181, 183  
 Communist Party 共產黨 134, 148, 150, 151, 155, 181, 184  
 Cultural Revolution 文化大革命 8, 182-4, 186-8, 288  
 Guomindang 國民黨 150-1, 152, 183, 184, 188, 195  
 independence movements 獨立運動 180  
 legal and social equality 法律與社會平等 373  
 Marx on 馬克思論中國 106  
 nationalism 民族主義 166  
 revolutionary elements 革命元素 100, 150-1, 157, 181  
 rural-urban dichotomy 城鄉二元化區分 183  
 self-modernization 自我現代化 374  
 tricontinental communism 三大洲共產主義 239

- 義 239  
 Chittagong Armoury Raid (1930) 吉達港軍械庫搶劫 296-7, 314, 324, 362  
 Choudhry, Suniti 喬賀瑞 362  
 Christian ideology 基督教意識形態 370  
 Churchill, Winston 邱吉爾 180, 328  
 CIA 美國中央情報局 194, 297  
 civil rights movement 公民權運動 79, 223, 332  
 civilization and 'primitivism' 文明與「原始主義」 33, 104, 420  
 civilizing mission 開化使命 22, 30, 31, 33, 73, 88, 89, 105, 116, 266  
 Cixous, Helene 西蘇 294, 411, 414  
 class 階級 9, 132, 137, 142, 143, 286, 288  
 Claudin, F. 克勞定 154  
 Cobden, Richard 柯布敦 80, 91, 95-6, 105  
 Cold War 冷戰 29, 59, 150, 154, 157, 180, 192, 223  
 Collins, Michael 柯林斯 305  
 Colon, Jesus 高倫 226  
 colonial armies 殖民軍隊 165  
 colonial discourse 殖民論述 18, 385-9  
 cultural and literary texts 文化與文學文本 409-10  
 Foucauldian model 傅柯模式 407-10  
 linguistics 語言學 392-4  
 objections to 反駁殖民論述 389-92, 408  
 retheorizing 重新理論化 392  
 revisionary model 調整的模式 392  
 Said's analysis 薩依德的分析 385-9  
 textual analysis 文本分析 394  
 colonial inferiority mentality 殖民自卑心態 65  
 Colonial Reform movement 殖民改革運動 77  
 Colonial Seamen's Association 殖民海員協會 227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15-24, 57-8  
 colonizer-colonized relationship 殖民者—被殖民者之關係 19, 20, 325, 423-4  
 defining 界定 15-19, 27  
 derogatory term 貶抑之詞 26-7  
 destructive and transformative analysis 解構與轉變性分析 6, 108, 109  
 divide and rule tendency 區分而後統治 18  
 and domination 和宰制 17, 19-24, 383  
 economic motive 經濟動機 15-16, 21, 104  
 exploitation colonies 剝削殖民地 17, 23, 24, 27, 32, 35, 164, 301  
 gendered 性別化 356-7, 359  
 geographical violence 地理的暴力 20  
 intellectual resistance 知識的反抗 100  
 internal colonialism 內部殖民主義 9, 20, 60, 79, 198, 279, 353  
 liberal colonialism 自由派殖民主義 92  
 major forms 主要形式 17  
 male perspectives 男性觀點 360-1  
 Marx on 馬克思談殖民主義 101-9  
 and modernity 與現代性 5, 6  
 'nervous condition' 令人焦慮不安的狀況 298, 327  
 and population theory 與人口理論 22  
 psychology of 殖民主義的心理學 274, 323-4, 325, 340, 341  
 resistance to 反抗殖民主義 28-9  
 settler colonies 拓居殖民地 17, 19, 22, 23, 24, 27, 32, 35, 36, 92, 164, 166  
 socialist condemnation of 社會主義者對殖民主義的譴責 116  
 socialist style 社會主義趨向 77-8  
 see also specific countries 另參見特定國家  
 colons 拓居殖民者 19, 282-3, 299, 415  
 Columbia 哥倫比亞 213, 215  
 Columbus, Christopher 哥倫布 21  
 Comintern 共產國際 10, 29, 100, 127, 128-9, 130, 133, 137, 139, 143-4  
 and African politics 與非洲政治 226, 228, 229, 230, 231, 232  
 and African-American politics 與非美政治 222  
 and anti-colonial activities 與反殖民行動 154, 176, 177  
 anti-fascist policy 反法西斯策略 152  
 and anti-imperialist politics 與反帝國主義政治 154

- Central Asiatic Bureau 中亞分部 134  
and China 和中國 150-1, 181, 183  
and colonialism 和殖民主義 153  
Fifth Congress (1924) 第五次大會 149-51  
First Congress (1919) 第一次大會 127, 128, 130, 139, 140  
Fourth Congress (1922) 第四次大會 145-9  
hostility towards Muslim nationalism 對穆斯林民族主義的仇視 153  
International Women's Secretariat 國際婦女秘書處 140  
and Latin America 和拉丁美洲 195  
League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East 東方解放同盟 149, 177  
mobilization of the peasantry 動員農民 183-4  
and realpolitik 和現實政治 144, 145  
Second Congress (1920) 第二次大會 129-34, 135, 152, 153  
Sixth and Seventh Congresses (1928, 1935) 第六次大會 148, 152-5, 176, 222, 226  
theoretical and organizational achievements 理論和組織的成就 154-5  
Third Congress (1921) 第三次大會 143-4  
United Front policy 「聯合陣線」策略 145, 148, 151, 152, 153  
women's organizations within 共產國際中之婦女組織 140, 143  
Comite Syndical International des Ouvriers Negres 黑人勞工國際聯合會 263  
Comite Universel de l'Institut Negre de Paris 巴黎黑人學術全球委員會 263-4  
Commonwealth 大英國協 39  
communalism 共有主義 247, 352  
communism 共產主義 29, 59, 100, 106, 119, 120, 129, 133  
anti-racism 反種族主義 224, 264  
and colonialism 與殖民主義 132  
marginalization of Asian and Latin American communists 亞洲和拉美共產黨的邊緣化 152-3  
Muslim communist organizations 穆斯林共產組織 138-9, 146  
and nationalism 與民族主義 131, 147  
targets imperialism 以帝國主義為目標 29  
and women's rights 與婦女權利 140-3, 372  
Communist League of South Africa 南非共產聯盟 231  
Communist University of Toilers of East (KUTVU) 東方共產主義勞動者大學 154, 177, 227  
CONCP (Conference of Nationalist Organizations of the Portuguese Colonies) 葡屬殖民地民族組織會議 250, 283  
Congo Free State 剛果自由邦 1, 25, 213, 214  
Congo Reform campaign 剛果改革運動 77  
Congress of the Toilers of the Far East (1922) 遠東勞動人民大會 145  
Congress of Vienna (1815) 維也納會議 90  
Connolly, James 康納利 35, 95, 117, 127, 303-7  
Conrad, Joseph I, 康拉德 25, 33  
consciencism 內在覺醒 244-5  
Constantine, Learie 康士坦丁 222  
Corn Laws 玉米法 91  
Council of African Affairs 非洲事務委員會 223  
creolization 克里奧化 68, 393  
criminal transports 罪犯遣送 22  
Croce, Benedetto 克羅齊 197  
CrummeU, Alexander 克拉梅爾 217, 218  
Cuba 古巴 17, 42, 44, 50, 161, 166, 169, 173, 204-5, 207, 215-16, 219  
Bay of Pigs invasion (1961) 豬灣入侵事件 194  
communism 共產主義 195  
legal and social equality 法律與社會平等 373  
'open door' policy 「開門」政策 288  
revolution 革命 194, 209, 210, 211, 214, 215, 235, 250, 361

- revolutionary socialism 革命社會主義 210, 211  
transculturation 文化互化 202  
cult of personality 「非洲性格」的熱切倡導 291  
cultural activism 文化行動主義 164  
cultural chauvinism 文化沙文主義 104  
cultural dependency 文化依賴 197, 200-3  
cultural identity 文化身分認同 266, 285, 291, 379  
cultural and literary texts 文化與文學文本 36, 262, 409-10  
cultural nationalism 文化民族主義 318, 378-80  
cultural politics 文化政治 7-8  
cultural reconversion 文化回歸 288, 290  
cultural resistance 文化反抗 18-19, 199, 290  
cultural revolution 文化革命 8  
culturalism 文化主義 7, 8  
Cyprus 塞浦路斯 191  
da Gama, Vasco 達伽瑪 21  
Dahomey 達荷美 257, 258, 259, 304, 363  
Dalits 印度的賤民階級 59, 352  
Damas, Leon 達馬士 266  
Dandi March (1930) 丹地大遊行 331-3  
Dangaremba, Tsitsi 丹佳蘭加 298  
Danton, Georges Jacques 丹東 81  
Das, Bina 達思 362  
David, Eduard 大衛 116  
Davis, Angela 戴維絲 220, 368  
Dayal, Har 戴雅爾 312  
de Andrade, Mario 安德拉德 283  
de Beauvoir, Simone 波娃 170, 295, 298  
de Gaulle, Charles 戴高樂 241  
de Saussure, Leopold 417  
de Tocqueville, Alexis 417  
decolonization 去殖民 3, 4, 9, 45, 57, 86, 89, 91, 93, 162, 251, 281, 416  
British and French processes 英國和法國的過程 391  
divide and rule policy 區分而後統治的策略 291  
federal decolonization 聯邦的去殖民

- 93  
political and cultural 政治與文化 65  
psychological effects 心理效應 274  
violence 暴力 251, 281  
deconstruction 解構 294, 416, 418, 421  
degeneration, ideology of 墮落的意識形態 318-19  
degradation 貶抑 293, 324, 425, 426  
denigration 261 降低  
Denmark 丹麥 3, 31  
departements d'outre mer 海外部門 32  
dependencies 附屬 17, 35  
dependency theory 依賴理論 44, 48, 50-1, 54-5, 194, 200-3, 204, 205, 418  
Deraniyagala, Ezlynn 德蘭尼亞加拉 362  
derivative discourse 衍生論述 344  
Dernda, Jacques 德希達 187, 272, 293, 295, 387, 407, 411-26  
on colonial violence 談殖民暴力 295  
critique of structuralism 結構主義的批判 420  
on totalization 談整體化 416  
dette de sang 以血還債 254  
Deva, Narendra 狄瓦 310  
Development Studies 發展研究 8, 56  
development theory 發展理論 44-5, 49-56  
Devy, G. N. 戴威 320  
Dia, Mamadou 狄亞 269  
Diagne, Blaise 迪亞涅 217, 254, 256, 257, 258, 264  
diaspora 離散 2, 4, 36, 422  
Dickinson, John 狄金森 104  
difference 差異 255, 418, 422  
Dilke, Charles 狄爾克 35, 36-7, 94, 100  
Diop, Cheikh Anta 迪奧普 268, 273  
Dirhk, Arif 德力克 62  
discourse 論述 385-9  
discursive formation 論述形構 400-1, 403, 405, 406  
enunciative modalities 陳述的模態 403-4  
epistemological device 知識論的設計 388  
formation of objects 對象的構成 403  
Foucauldian concept of 傅柯式概念

- 388  
 Foucault and 傅柯與論述 398-410  
 heterogeneity 異質性 404-6  
 and knowledge 和知識 388, 399  
 linguistics 語言學 392-4  
 Orientalism as 東方主義做爲論述 388  
 permeable boundaries 可滲透的界線 402  
 and power 和權力 406-7  
 preconceptual level 前概念層次 405  
 regularities and constraints 規則性與限制 405  
 of the state 國家的論述 393  
 'statement' 陳述 401-3  
 theory of 理論 392  
 see also colonial discourse 另見殖民論述  
 disempowerment 去權 62, 221, 354  
 displacement 換置 418  
 Disraeli, Benjamin 狄斯瑞里 34, 35, 90  
 domination 宰制 15, 17, 19-24, 29, 32, 44, 55, 142, 221  
 domination colonies 宰制殖民地  
 see exploitation colonies 另參見剝削殖民地  
 Dominican Republic 多明尼加共和國 42, 213  
 dominions 自治領 17, 19, 34, 38, 94, 95, 100  
 domino theory 骨牌理論 170  
 dress, politics of 衣著的政治哲學 327-8, 331, 377-8  
 Du Bois, W. E. B. 杜博斯 179, 218, 220-1, 223, 235, 236, 237, 257, 264-5, 274  
 'dual mandate' argument 「雙重委任統治」 116  
 Durham Report (1839) 德翰報告 92, 94, 96  
 Duse, Muhammed 杜思·穆罕默德 189, 220  
 Dutch Antilles 荷屬安地列斯山 3  
 Dutch East Indies 荷屬東印度 17, 130, 146  
 Dutch Guiana 荷屬圭亞那 193  
 Dutt, Clements 克里曼·杜特 176  
 Dutt, Kalpana 卡盼娜·杜特 362  
 Dutt, R. Pahne 帕爾米多杜特 176, 311, 356  
 East India Association 東印度協會 95  
 East India Company 東印度公司 23, 40, 78, 79, 80, 84, 104, 106  
 East Timor 東帝汶 3  
 ecopolitics 生態政治 320  
 Ecuador 厄瓜多爾 195  
 Egypt 埃及 29, 60, 91, 102, 148, 188-91, 243, 304  
 anti-colonialism in 反殖民主義 136, 188-9  
 cultural nationalism 文化民族主義 189  
 deindustrialization 去工業化 189  
 feminism in 女性主義 379, 381  
 independence 獨立 189  
 nationalism 民族主義 166  
 self-modernization 自我現代化 189, 374  
 Egyptian Revolution (1952) 埃及革命 175  
 Einstein, Albert 愛因斯坦 176  
 El Salvador 薩爾瓦多 46, 215  
 Elgin Marbles 埃爾金石雕 3  
 Eliot, T. S. 艾略特 119  
 ELN 哥倫比亞民族解放軍 215  
 emerging markets 新興市場 53-4  
 Emmanuel, Arghiri 伊曼紐爾 111  
 Engels, Fredrich 恩格斯 9, 104, 305  
 and nationalism 與民族主義 106-7, 119, 120, 121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共產黨宣言 102, 106, 119-20, 121  
 Enlightenment 啓蒙時期 30, 89  
 environmentalism 環境主義 320  
 EOKA 戰鬥者全國組織 191  
 epistemology of the postcolonial subject 後殖民主體認識論 212  
 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discourse 平等與人權論述 7, 76, 80-1, 86  
 Eritrea 厄利垂亞 162, 363  
 Ethiopia 衣索匹亞 4, 162, 233-4, 247, 296  
 ethnic nationalisms 族群民族主義 59,

- 118, 121  
 ethnocentrism 種族中心主義 65, 122, 390  
 Etoile Nord-Africaine 北非之星 256, 260, 263, 265  
 eurocentrism 歐洲中心主義 45, 56, 65, 168, 351, 352, 390, 395-6, 397, 416  
 evangelism 福音主義 47, 90  
 exploitation colonies 剝削殖民地 17, 23, 24, 27, 32, 35, 164, 301  
 extermin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滅絕原住民 20, 24, 75, 76, 79  
 Eyrc, Edward John 艾爾 40  
 Falklands/Malvinas 福克蘭/馬爾維納斯群島 3  
 Fanon, Frantz 法農 8, 18, 30, 66, 68, 178, 185, 188, 194, 196, 221, 225, 235, 253, 274-83, 285, 351, 414  
 and Algeria 與阿爾及利亞 277-80  
 and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 與反殖民主義 344  
 biography 生平 275  
 class dynamics 階級動力 279  
 on colonial violence 談殖民暴力 295-6, 297-8, 302, 343, 415  
 and colonialism's nervous condition 和殖民主義的焦慮狀況 327  
 engagement with Marxism 與馬克思主義 278  
 and Francophone African political thought 與法裔非人的政治思想 276-7  
 Hegelian dialectic of native and settler 本地人與殖民者的黑格爾辯證法 343  
 and nationalism 與民族主義 278  
 and Pan-Africanism 與泛非洲主義 276  
 political radicalism 政治激進主義 255  
 psychopathology of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的精神病理學 276, 340, 341  
 racial analysis 種族分析 278-9  
 and resistance to modernity 與對抗現代性 345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受詛咒的大地》 249, 269, 270, 278, 280, 281, 283, 285, 298, 422-3  
 and veiling/unveiling 戴面紗/不戴面紗 378  
 and violence 與暴力 250, 280-3  
 Farouk, King 法魯克國王 189  
 Fan'akhan, Louis 法拉肯 220  
 fascism 法西斯主義 2, 3, 129, 152, 340, 415  
 Faure, Emile 佛瑞 259, 260, 263  
 Fawcett, Henry 費塞特 80, 95  
 federalism 聯邦主義 35-6, 120, 121, 122, 123  
 feminism 女性主義  
 and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 與反殖民主義 357, 361  
 black women 黑人婦女 369  
 bourgeois feminism 資產階級女性主義 372  
 eurocentrism 歐洲中心主義 377  
 Gandhi and 甘地和女性主義 322, 326, 327, 376  
 Indian feminism 印度女性主義 327, 370, 375, 376-7  
 lower-class women 下層階級的女性 375  
 and modernity 和現代性 375-9  
 and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s 和民族解放運動 371, 372  
 and nationalism 和民族主義 378-80  
 and patriarchy 和父權制度 360, 369, 370, 379, 382  
 post-independence politics 後獨立政治 380-2  
 postcolonial feminism 後殖民女性主義 377, 381  
 relation to the freedom struggles 和自由鬥爭之關係 369-72  
 response to women's absence from colonial histories 對於殖民史女性缺席之回應 360-1  
 socialist feminism 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 372-4  
 tricontinental feminism 三大洲女性主義 381  
 feminization of the colonial subject 殖民主體的陰性化 326, 327  
 Ferdinand and Isabella of Spain 費迪南與

- 伊沙貝拉 (西班牙) 21  
 Fergusson, William 弗格迪 217  
 Fernando Po 費南多波島 42  
 feudal and semi-feudal societies 封建與半封建 147, 148, 149, 279, 284  
 Fiji 斐濟 77  
 Finland 芬蘭 122, 124  
 First Congress of the Peoples of the East 東方民族第一次大會 135  
 First International 第一國際 107, 115-17  
 First International Working Women's Congress 第一國際勞動婦女大會 140-1  
 First World War 一次世界大戰 10, 132, 219  
 and increase in nationalist unrest 民族主義的動盪漸增 100  
 product of imperialism 帝國主義的產物 31, 117, 132  
 recruitment of colonial soldiers 殖民兵的徵召 10, 219, 254, 256, 260, 262  
 FLN 民族解放陣線 164, 191, 276, 277-8, 280, 298, 300, 362, 429  
 Florida 佛羅里達洲 3  
 FMLN 馬蒂民族解放陣線 215  
 Ford, James W. 福特 226  
 foreign aid 外援 47, 53  
 Forgacs, David 佛加克斯 167  
 Foucault, Michel 傅柯 384, 385  
*Discipline and Punish* 《規訓與懲罰》 385, 386, 387  
 dispute with Sartre 與沙特的論爭 397  
 and ethnology 和民族學 396-7  
 eurocentrism 歐洲中心主義 395-6, 397  
 History of Sexuality 《性史》 403, 406, 407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瘋顛與文明 395, 397, 398, 407  
 and the Other 和「他者」 397-8  
 positivity 實證性 386-7  
 spatial and geographical metaphors 空間與時間隱喻 395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知識考掘學》 385, 386, 388, 394, 396, 397, 399, 400, 401, 403, 410

- The Order of Things* 《事物的秩序》 396, 397, 398  
 theory of discourse 論述理論 398-410  
 in Tunisia 在突尼西亞 396, 397  
 Fourth International 第四國際 155-7  
 Four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outh Africa 南非第四國際組織 231  
 'fourth world' politics 「第四世界」政治 59  
 Fox, Charles 福克斯 78  
 France 法國 9, 135, 165  
 and Algeria *see* Algeria 和阿爾及利亞, 另見阿爾及利亞  
 anti-colonialism 反殖民主義 76, 255-7  
 Communist Party 共產黨 129, 256, 419  
 decolonization 去殖民 3  
 départements d'outre mer 海外部門 32  
 French Revolution 法國大革命 80-1  
 imperialism 帝國主義 26, 29-30, 31, 32, 117, 136  
 International Colonial Exhibition (1931) 國際殖民博覽會 43  
 and liberation movements 和解放運動 180  
*see also* French colonialism 另見法國殖民主義  
 Franco-Maghrebians 法屬馬格里布 419, 424  
 Franco-Prussian War (1870) 普法戰爭 90, 91  
 Francophone Africa 法語系非洲 253-73  
 Frankfurt School 法蘭克福學派 7, 351  
 free trade 自由貿易 23, 35, 39, 80, 82, 84, 89, 91, 92, 99, 104  
 free-market economics 自由市場經濟 84  
 FRELIMO 莫三比克解放陣線 162, 164, 300, 373  
 French colonialism 法國殖民主義 2, 18, 22, 23, 80-1, 86, 88-9, 241  
 assimilation doctrine 同化原則 17, 30, 32, 33, 34, 81, 164, 254, 264, 284, 299, 417  
 between the wars 兩次大戰之間 255-7  
 dette de sang 以血還債 254  
 Francophone Africa 法語系非洲 253-

- 73  
 metropolitan-colonial relation 帝國—殖民地關係 255  
 mission civilisatrice 開化任務 30, 31, 33, 88, 89, 105, 266  
 French Equatorial Africa 法屬赤道非洲 253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3, 193  
 French West Africa 法屬西非 240, 253, 301  
 Froude, James Anthony 佛勞德 36, 37, 94  
 Furedi, Frank 傅瑞迪 165, 172, 179, 233-4  
 Gachika, Elizabeth 佳伽卡 366  
 Galeano, Eduardo 迦略諾 193  
 Gandhi, Indira 甘地夫人 339  
 Gandhi, Mahatma 甘地 68, 95, 96, 168, 172, 174, 178, 180, 236, 255, 256, 297, 301, 302, 308, 309, 310, 317-24, 340, 341  
 ahimsa 不殺生 248, 321, 323-5  
 anti-elitism 反菁英主義 352, 376  
 anti-modernity 反現代性 320, 327, 329, 342, 345, 346  
 argues for 'voluntary poverty' 主張「自願貧窮」 320-1  
 in Britain 在英國 319-20, 328, 333-4  
 on capital-labour relations 談資本與勞工的關係 322-3  
 Comintern condemnation of 「共產國際」譴責甘地 148, 149  
 cultural and epistemological pluralism 文化和知識論多元主義 346-7, 348, 349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與文化民族主義 318  
 Dandi March (1930) 丹地大遊行 331-3, 376  
 diasporic product 離散的產物 317  
 and feminism 與女性主義 322, 326, 327, 376  
 gender role-playing 性別角色扮演 325, 326-7  
 ideology of degeneration 貶抑的意識形

- 態 318-19  
 invisibility in postcolonial theory 在後殖民理論中的低能見度 337-8  
 on militancy 戰鬥路線 249-50, 324  
 and nationalism 與民族主義 321-2  
 non-violent non-cooperation 非暴力, 不合作 296, 323-4, 330, 343  
 performative, hybrid mode 展演的、雜揉的模式 345-6  
 political career 政治生涯 318  
 political strategies 政治策略 325-31, 334  
 politicization of Hinduism 印度教的政治化 325  
 politics of dress 衣著的政治哲學 327-8, 331  
 and preservation of Indian languages 印度語的保存 319-20  
 and religion 和宗教 347  
 and *samas* 同化的能力 348-9  
 satyagraha 真理力量 238-9, 323-4, 331, 332, 334, 343, 376  
 shift away from reformism 從改革主義脫離 376  
 socialism 社會主義 310, 339  
 in South Africa 在南非 95, 318, 323  
 'spiritualization of politics' 「政治的精神化」 337, 338  
 suspends non-cooperation movement 中止不合作運動 149, 313, 321, 332  
*swaraj and swadeshi* 自治與國貨運動 309, 320, 328, 338, 376  
 and theosophy 神智學 319, 320  
 use of technology and the media 科技與媒體的使用 329-31, 332-3, 345  
 and working-class activism 和工人階級的行動主義 321, 322, 353  
 writings 著作 329-31, 349  
 Ganguli, Kadambini 岡古莉 362  
 Garan Kouyate, Tiemoho 加藍·庫雅特 176, 227, 236, 237, 257, 259, 260, 262, 263-5, 266  
 Garvey, Amy Ashwood 艾美·加維 233  
 Garvey, Marcus 加維 219-20, 221, 222, 225, 226, 236, 237, 258



- Garveyism 加維主義 225, 256, 258, 266  
 Gellner, Ernst 蓋爾納 5  
 gender 性別 360-82  
   gendering of experience 經驗的性別化 274  
   identities 身分認同 359  
   ideology of masculinity 陽剛氣概的意識形態 325-6  
   narrowing of gender identity 性別認同的窄化 326  
   politics 政治 142, 209, 327  
 genital mutilation 陰蒂切除 380  
 George V 喬治五世 328, 333  
 Georgia 喬治亞 122, 124, 135, 155  
 Gei-many 德國 94, 129, 135, 144, 165  
   anti-colonialism 和反殖民主義 178-9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2, 118  
   communism 共產主義 129, 144, 152  
   imperialism 帝國主義 30, 31, 117  
   League of Non-Native Peoples 外來民族聯盟 118  
   Lebensraum 生存空間論 2  
   Nazi anti-imperialism 納粹反帝國主義 179  
 Ghana 加納 45, 46, 117, 162, 164, 219, 227, 228-9, 242-6, 248, 363  
 Ghana-Guinea union 加納-幾內亞聯盟 241  
 Ghose, Samiti 高絲 362  
 Giap, Vo Nguyen 武元甲 297  
 Gibraltar 直布羅陀 3, 17  
 Gladstone, William 葛拉斯登 84, 90-1, 93-4, 97  
 Glasgow 格拉斯哥 85  
 Glissant, Edouard 格利桑 255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2, 5, 54, 105-6  
 'glottophagie' 語言噬菌 393, 424  
 Gobetti, Piero 葛貝提 197  
 Gobineau, Joseph Arthur, Comte de 葛比諾 33  
 Gool, Jaineb 古爾 232  
 Gorbachev, Mikhail 戈巴契夫 121  
 Gorky, Maxim 高爾基 127  
 Gramsci, Antonio 葛蘭亞 45, 195, 197, 199, 311, 353, 354, 355, 387  
 Grant, William 葛蘭特 217  
 Greater Britain 大英國 35, 36-41, 94  
 Greenland 格陵蘭 3  
 Grenada 格瑞那達 49  
 Griffith, Arthur 葛理飛 97, 306  
 Group of 七七集團 77, 192  
 Guadeloupe 瓜地洛普 32  
 Guam 關島 17, 42  
 Guantanamo 關塔那摩灣 17  
 Guatemala 瓜地馬拉 213, 215  
 guerrilla warfare 游擊戰事 154-5, 196-7, 214, 215, 251, 305  
 Guevara, Ernesto Che 切·格瓦拉 170, 175, 182, 185, 188, 196, 200, 204-15, 288, 328, 381  
 Guha, Ranajit 古哈 62, 308, 322, 352, 354, 355, 356, 407  
 Guinea 圭亞那 42, 213, 241, 243  
 Guinea-Bissau 幾內亞比索 162, 214, 250, 251, 283, 284, 285, 286, 291, 363, 381  
 Gumede J. T. 古米德 176, 231  
 Guomindang 國民黨 150-1, 152, 183, 184, 188, 195  
 Gupta, Akhil 古帕塔 56  
 gypsies 吉普賽人 59  
 Hadj, Messali 哈克 176, 256, 277, 420  
 Haggard, Rider 哈賈德 36  
 Haiti 海地 81, 161  
 Halim, Abdul 漢林 314  
 Hall, Stuart 霍爾 62, 225, 281  
 Hanum, Najiye 哈奴曼 141-2  
 Harbi, Mohammed 哈比 277, 278  
 Hardie, James Keir 哈迪 98  
 Harris, Wilson 哈瑞斯 68  
 Harrison, Hubert 哈里遜 226  
 Hastings, Warren 賀士丁 78  
 Hatta, Mohammed 哈達 176  
 Hawaii 夏威夷 3, 17, 42  
 Hayford, Caseley 卡斯利·海佛 218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黑格爾 108  
 Hereros 赫雷羅人 116  
 Hilferding, Rudolf 希佛丁 99  
 Hindu Conspiracy Case (1917) 印度謀反案

- 131  
 Hindu nationalism 印度民族主義 163, 345  
 History 歷史  
   colonial history 殖民史 4  
   colonial negation of 殖民的否定 288  
   counter-histories 抗歷史 357, 398  
   culture as product of 文化做為歷史之產物 289  
   gendered values 性別化價值 358-9  
   subaltern perspectives 底層階級觀點 358, 390, 398  
   textual nature 文本的特質 390  
 Hitler, Adolf 合特勒 152  
 Ho Chi Minh 胡志明 30, 68, 150, 156, 166, 176, 180, 182, 255, 256, 260, 297  
 Hobsbawm, E. J. 霍布斯邦 306  
 Hobson, V. J. A. 霍布森 80, 85, 98-100  
 Hodgkin, Thomas 霍奇金 77  
 Holy Roman empire 神聖羅馬帝國 16  
 Honduras 宏都拉斯 193  
 Hong Kong 香港 17, 301  
 hooks, bell 貝爾·胡克斯 377  
 Horton, James Africanus 侯頓 217  
 Houenou, Tovalou 胡努 3, 257, 258-9, 265, 266  
 Huchard, Louis 胡查 217  
 Hughes, Langston 休斯 222  
 Hugo, Victor 雨果 88  
 humanism 人文主義 185, 267, 270-1, 280  
 Hume, David 休謨 85  
 Hungary vii, 匈牙利 129, 139, 161  
 hunger strikes 絕食罷工 302, 323  
 Hunkanrin, Louis 韓康林 259  
 Hunton, Alphaeus 韓頓 223  
 hybridity 雜揉 201, 202, 341, 345-7  
   cultural hybridity 文化雜揉 346, 349  
   as form and strategy 做為形式和策略 345-7  
   linguistic hybridity 語言的雜揉 348-9  
   samās and 同化的能力 348-9  
 Hyndman, H. M. 海德曼 96, 116  
 identity 身分認同 291, 418  
 Ifni 伊夫尼 42  
 Il-song Kim 金日成 182  
 imperialism 帝國主義 9, 10, 25-43, 58, 290  
 19th and 20th century imperial powers 19世紀和20世紀帝國列強 31  
 and capitalism 與資本主義 27-8  
 characteristics 特色 17, 27  
 civilizing claims 開化的主張 1, 98-9, 105  
 and colonialism contrasted 和殖民主義的對照 16-17, 25, 27, 74  
 costs of 帝國主義的代價 99  
 cult of masculinity 崇拜陽剛氣概 325-6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imperialism 文化和教育的帝國主義 22, 30, 40, 47, 89  
 defining 界定 15-19, 26  
 desire for knowledge of other cultures 對其他文化知識的渴望 290  
 Dual Mandate 雙重委任統治 40  
 economic and ethical critique of 以經濟與道德批判 98-9  
 economic imperialism 經濟帝國主義 26, 27, 41, 47, 59, 91, 104, 131  
 empire as brotherhood 帝國的兄弟之情 94  
 extended nationalism 延伸的民族主義 93  
 federation model 聯邦模式 35, 84, 85, 94  
 'formal' and 'informal' imperialism 「正式」與「非正式」帝國主義 41  
 gendering of 帝國主義的性別化 341  
 and global power politics 全球權力政治 28  
 heterogeneity 異質性 74  
 ideologies 意識形態 16, 17, 27, 28, 30, 31, 32  
 jingoistic imperialism 強硬派帝國主義 37, 42, 98  
 liberal imperialism 自由派帝國主義 84  
 major forms 主要形式 17  
 Marxist analysis 馬克思主義的分析 99, 109-12  
 'new' imperialism 「新」帝國主義 41, 98

- object 目標 31
- racialized ideology of empire 帝國的激進意識形態 37
- rival powers 敵對勢力 31
- target of anti-colonial struggle 反殖民鬥爭的目標 29
- unequal dialectic of centre and periphery 中心與邊緣不均等的辯證 111
- see also specific countries 另見特定國家
- indentured labourers 契約勞工 20
- India 印度 9, 17, 19, 24, 28, 52, 54, 59, 80, 95-6, 102, 108, 128, 130, 134, 135, 161, 179, 308-51
- AH India Trade Union Congress 全印度工會大會 322
- anti-colonialism 反殖民主義 95-6, 164
- British India 英屬印度 17, 21, 24, 38, 40, 86, 95-6, 108, 116, 380
- caste 種姓制度 4, 320-1
- Civil Disobedience campaign 公民不服從運動 362, 376
- class struggle 階級鬥爭 9
- colonial impact 殖民的影響 60
- communism in 共產主義在印度 132, 147, 148, 152, 168, 309
-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CPI) 印度的共產黨 308, 309, 311, 313, 314-15, 316
-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rxist) (CPI (M)) 馬克思主義印度共產黨 311
- Congress Party 國大黨 (國民大會黨) 96, 131, 168, 172, 324, 350, 376-7
- Congress Socialist Party (CSP) 國大社會主義黨 309, 310, 311, 314, 315
- denotified tribes 「撤除通知」部落 4
- economic nationalism 經濟民族主義 309-10
- Emergency (1975-7) 緊急狀態 339, 350
- ethnic nationalisms 種族民族主義 59
- feminism 女性主義 327, 370, 375, 376-7
- Home Rule demands 要求自治權 39, 40, 115-16
- Home Rule League 自治權聯盟 94, 131, 301, 312, 322
- independence 獨立 3, 96, 97, 162, 325
- independence movements 獨立運動 168, 308
- Indian Marxism 印度馬克思主義 109, 309, 310-16, 317, 341, 350, 351, 355, 356
-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印度國民大會 96, 131, 152, 301, 308, 309, 342
- Indian-Irish nationalist links 印度與英國民族主義者之連結 313, 318
- Indocentrism of intellectual life 知識分子的印度中心主義 351
- and Kashmiri independence 與喀什米爾的獨立 3
- Khilafat movement 基拉法運動 134, 308, 309, 321
- Marx on 馬克思談印度 104, 106, 108
- Marxist-Gandhian alliance 馬克思主義與甘地思想的結合 350
- Muslim League 穆斯林聯盟 308, 309, 321, 325
- 'Mutiny' (1857) 兵變 35, 38, 91, 95, 161, 165
- nationalism 民族主義 38, 96, 100, 166, 172, 309, 321-2
- non-violent non-cooperation 非暴力不合作 96, 149, 308
- partition 分治 297, 321, 325, 352
- politics of violence 暴力政治 296-7, 325
- postcolonialism 後殖民主義 339-40, 349-51
- Quit India movement 「殖民者滾離印度」運動 152, 315, 324, 362
- revolutionary bases abroad 海外革命基地 312-13
- self-modernization 自我現代化 375
- socialism 社會主義 309-10
- strikes and civil disobedience 罷工與公民不服從 315
- subalternity 底層階級性 352-6
- supports British war effort 支持英國戰爭 315
- terrorism 恐怖主義 312, 324, 326, 362
- Trotskyist and Maoist groups 托派與毛派團體 315, 356
- women activists 女性行動派 362
- Indian Liberation Army 印度解放軍 179
- Indian Revolutionary Association 印度革命協會 134-5, 312
- indigenismo movement 印地安原住民主義 199, 200
- indigenous culture 本土文化 20, 24, 374
- Indochina 中南半島 30, 32, 88, 128, 181, 297, 304
- Indonesia 印尼 3, 156, 179
-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Workers' Union of Africa (ICU) 非洲工商勞工聯盟 230-1
- Intel-dependency theory 相互依賴理論 215-16
- International African Friends of Abyssinia (IAFA) 阿比西尼亞國際非洲之友 233
- International African Service Bureau (IASB) 國際非洲事務局 234, 237
- international capital, and global autonomy 國際資本與全球自主性 45-6, 47-8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ocialist Women (1915) 社會主義國際婦女會議 140
-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國際勞工分工 46, 47
-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國際金融集團 53
- International Labour Defence 國際勞工防衛部 176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國際貨幣基金 46, 47, 48
- International of Seamen and Harbour Workers (ISHW) 國際海員及港口勞工協會 227
-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League (ISL) 國際社會主義聯盟 230
-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mmittee of Negro Workers (ITUC-NW) 黑人勞工國際貿易聯合委員會 226
-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國際工人協會 115
- internationalism 國際主義 2, 61, 106, 107, 120, 166, 305
- internationalist socialism 國際社會主義 117
- Ionian Islands 愛奧尼亞群島 90
- IRA 愛爾蘭共和軍 179
- Iran 伊朗 100, 116, 117, 129, 130, 135, 136, 153, 175, 371
- anti-colonialism in 伊朗的反殖民主義 136
- feminism in 伊朗的女性主義 371, 379
- Iraq 伊拉克 49, 59, 136, 148, 190, 293
- Ireland 愛爾蘭 16, 52, 60, 92, 96-8, 102, 108, 115, 130, 296, 299-307
- anti-colonial struggle 反殖民鬥爭 302
- cultural politics 文化政治 7
- dominion status 自治領的地位 34
- Easter Rising (1916) 復活節起義 25, 97, 118, 303-7
- Gaelic revival 蓋爾語文藝復興 7
- heroic martyrdom tradition 英雄殉難傳統 302
- Home Rule 自治權 39-40, 96-8, 301, 304
- Indian-Irish nationalist links 印度與愛爾蘭民族主義者之連結 97, 313, 318
- insurrections 起義, 叛亂 128, 161
- nationalism 民族主義 100, 106-7, 120, 166, 302, 305-6
- partition 分治 97
- passive resistance 消極抵抗 302
- Penal Laws 刑事法 80
- politics of violence 暴力政治 296, 299-301, 302, 303
-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與後殖民理論 301-2
- socialism 社會主義 307
- Ulster Defence Force 北愛爾蘭防衛軍 301
- underdevelopment 低度開發 103
- women in 婦女 305
- Irish Free State 愛爾蘭自由邦 39, 97
- Irish Socialist Republican Party 127
- Islam 伊斯蘭 129, 137, 146-7, 173
- Islamic nationalism 伊斯蘭民族主義 163,

- 173  
 Israel 以色列 3, 190  
 Italy 義大利 3, 31, 117, 129, 155, 353  
 Ivory Coast 象牙海岸 253, 304
- Jamaica 牙買加 52  
 James, C. L. R. 詹姆士 155, 156, 217, 220, 223, 224-5, 228, 232, 233, 234, 235  
 on Nyerere 談尼雷爾 247  
*The Black Jacobins* 《黑色的雅各賓黨人》 224, 234  
 James, Winston 詹木斯 225-6  
 Japan 日本 4, 6, 59, 92, 99-100, 129, 135, 162, 165  
 anti-colonialism 反殖民主義 178, 179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3, 52  
 Communist Party 共產黨 150  
 imperialism 帝國主義 31, 117  
 nationalism 民族主義 179  
 self-modernization 自我現代化 374  
 Java 爪哇 146, 163  
 Jayawardena, Kumari 加亞瓦爾丹娜 374, 375  
 jingoism 強硬派觀點 37, 42, 98  
 Jinnah, M. A. 真納 168, 321, 322, 325  
 Johnson, George W. 喬治·強生 217  
 Johnson, Samuel 薩穆爾·強生 217  
 Jones, Ernest 瓊斯 95  
 Jones, Leroi 強思 223  
 Joshi, P. C. 喬旭 313
- Kabul 喀布爾 312  
 Kadahe, Clements 卡代里 231, 236  
 'Kaffir' wars 「卡非爾戰爭」 161  
 Kartini, Raden Adjeng 卡爾蒂妮 362  
 Kashmir 喀什米爾 3, 59  
 Kaunda, Kenneth 卡翁達 247, 271, 297  
 abandons non-violent resistance 放棄非暴力抵抗 250, 251, 297  
 on Gandhi 談甘地 297  
 on using the media 談運用媒體 330-1  
 Kautsky, Karljohann 考茨基 109, 110-11, 115, 116, 120  
 Kemal, Mustafa 凱米爾 142, 144, 153  
 Kennedy, Robert 甘迺迪 62
- Kenya 肯亞 20, 49, 162, 164, 166, 173, 179, 191, 280, 304, 363, 365-6  
 Kenyatta, Jomo 肯亞塔 68, 176, 178, 220, 221, 227, 230, 233, 234, 380  
 Khaile, E. H. 凱爾 231  
 Khaled, Leila 卡勒德 362  
 Khan, Abdur Rezzak 可罕 314  
 Khartoum Conference (1968) 喀土穆會議 250  
 Khilafat movement 基拉法運動 134, 166, 308, 309, 321  
 Khiva 基瓦 135, 136  
 Khrishnvarma, Shyamaji 克里遜瓦瑪 312  
 Khumalo, Rhoda 庫馬洛 364  
 Kies, Ben 凱斯 232  
 King, Martin Luther 金恩 332  
 Kipling, Rudyard 吉柏林 36, 345  
 knowledge 知識 63-6  
 academic knowledge 學術知識 8, 387  
 counter-knowledge 抗知識 339  
 culturalization of 知識變成文化 8  
 displacement of western knowledge 西方知識的換置 65  
 experiential fomis 經驗知識的形式 271  
 knowledge-formation 知識的形構 19, 384  
 mediated by discourse 由論述所中介 388, 399  
 power/knowledge structure 權力/知識的結構 387, 388
- Kollontai, Aleksandra 柯崙泰 140  
 Korea 韓國 52, 130, 135, 149  
 Korean War (1950-1953) 韓戰 180, 183  
 Kosovo 科索夫 78  
 Kriplani, Sucheta 克里藍霓 362  
 Kristeva, Julia 克莉絲蒂娃 187  
 Kun, Bela 庫恩 129, 152  
 Kurds 庫德族 4, 59  
 Kuwait 科威特 190
- La Comite de Defense de la Race Negre (CDRN) 黑佬防衛委員會 259, 260-1  
 LaGuma, J. A. 顧馬 176, 231  
*La Race negre* 《黑人種族》 264, 266,

- 267, 269  
 Lamartine, Alphonse Marie Louis de 拉馬丁 88  
 language 語言 67-9, 424  
 Creole 克里奧 393  
 double language situation 雙重語言情況 48, 393, 424  
 nationalism as a 民族主義做為一個語言 172, 173  
 Pidgin 洋涇濱 393  
 politics of 語言政治 320  
 of postcolonial theory 後殖民理論的語言 67-9  
 preservation of 語言的保存 319-20  
 privileged language 特許的語言 138, 393  
 problematics of 爭議 383  
*see also* discourse, translation 另見論述、翻譯
- Laos 寮國 213  
 Las Casas, Bartolome de 拉斯卡薩斯 75-6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 24, 188, 193-216  
 alliance of intellectuals and peasantry 知識分子與農民的聯合 197  
 anarchist doctrines 無政府原則 195  
 Balkanization 巴爾幹半島化 199  
 bourgeois revolutions 資產階級革命 194  
 communism in 共產主義在拉丁美洲 152, 155, 156, 195  
 criollos 白人拓居移民者 194, 198  
 dependency theory 依賴理論 48, 194, 200-3, 204  
 feudalism and modernity 封建主義與現代性 194, 196, 201  
 history of resistance 抵抗史 193  
 hybridity 雜揉 202  
 independence movements 獨立運動 193  
 'Indian problem' 「印第安人問題」 198, 207  
 indigenismo movement 「印地安原住民主義」義運動 199, 200  
 liberation theology 解放神學 76, 215
- Marxism in 拉丁美洲的馬克斯主義 195-6, 199, 203  
 neocolonialism 新殖民主義 194  
 peasant revolutions 農民革命 194, 196-7  
 radicalism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激進主義與革命運動 197, 201  
 socialism 社會主義 198-9, 215  
 US imperialism 美國帝國主義 194, 212  
*see also* specific countries 另見特定國家  
 Laurenc Marques 洛朗索馬克 284  
 Le Bon, Gustave 雷朋 33  
 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 and for Colonial Independence 反帝國主義暨殖民地獨立聯盟 96, 100, 116, 176-7, 233, 260  
 League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East 東方解放同盟 149, 177  
 League of Nations 國際聯盟 118, 221  
 League of Struggle for Negro Rights 黑人權利鬥爭聯盟 222  
 Lebanon 黎巴嫩 0  
 Lenin, V. I. 列寧 2, 7, 22, 61, 90, 100, 106, 109, 118, 119, 121, 129-30, 139  
 and black American communist activity 和非裔美人的共產活動 222  
 and colonialism 和殖民主義 116-17, 127, 132  
 doctrinal flexibility 信條的彈性 139  
 eastern orientation 東方導向 7, 129, 131, 149, 241  
 and federation 和聯邦 123  
 and imperialism 和帝國主義 110, 111, 124-5  
 and the Indian Revolutionary Association 和印度革命聯盟 134-5  
 on the Irish Easter Rebellion 談復活節起義 306  
 on Islamic nationalism 談伊斯蘭民族主義 138, 146  
 and liberation movements 與解放運動 132, 133  
 on Marxism 談馬克思主義 167  
 on nationalism 談民族主義 121, 122, 125, 127

- on *Ordine Nuovo* 談《新秩序》 197  
 on the peasantry 談農民 183-4  
 and the Second Comintern Congress 談「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 129-30, 131, 132, 133, 134, 139, 146  
 on self-determination 121, 123, 125, 127  
 United Front policy 「聯合陣線」策略 145  
 and world revolution 和世界革命 150  
 Levi-Strauss, Claude 李維史陀 420, 421  
 liberalism 自由主義 88-100  
 liberation theology 解放神學 76, 215  
 Liberia 賴比瑞亞 218, 219  
 Libya 利比亞 49, 162, 179, 190, 304  
 Lienhard, Martin 萊哈德 202  
 Ligue de Defense de la Race Negre (LDRN) 黑佬防衛同盟 263-5  
 Ligue Universelle de Defense de la Race Noire (LDRN) 全球黑人防衛聯盟 258, 261  
 liminality 中介性 345, 346  
 literature, colonial 文學殖民 36, 262, 409  
 Little Red Book 小紅書 187  
 Lloyd George, David 羅易德 319, 334  
 Locke, Alain 羅克 227  
 Lohia, Ram Manohar 羅依亞 310  
 Long March (1934-5) 長征 161, 181, 183  
 Louisiana Purchase 購買路易斯安娜州 3  
 Lucas, C. P. 盧卡斯 35, 94, 96-7  
 Luxemburg, Rosa 盧森堡 10, 109, 115, 117, 120, 125  
 Lyotard, Jean-Francois 李歐塔 299, 414, 419  
 Macaulay, Herbert 赫伯·麥坎雷 217, 227, 228  
 Macaulay, Thomas 麥考萊 38, 80  
 MacBride, Major John 麥克布萊德上校 95, 318  
 McCulloch, John Ramsay 馬克古樂克 91  
 MacDonald, Ramsay 麥丹諾 98  
 McKay, Claude 麥凱 226  
 McKinley, William 麥金利 42  
 Madagascar 馬達加斯加 128, 162  
 Maghreb 馬格里布 30, 68, 189, 229, 294, 425  
 Mahdi movements 馬赫迪運動 163  
 Makonnen, T. R. 馬康蘭 234  
 Malacca 麻六甲 17  
 Malaka, Tan 陳馬六甲 146, 147, 149, 156, 174  
 Malaysia 馬來西亞 47, 179, 180  
 Malcolm X 梅爾肯·艾克斯 220, 280  
 Mali 馬利共和國 241, 243, 253, 257  
 Malta 馬爾他 17  
 Malthus, Thomas 馬爾薩斯 22  
 Manchester School 曼徹斯特學派 74, 84, 91  
 Manchuria 滿州 179  
 Mandela, Nelson 曼德拉 232, 246, 249, 250, 251-2  
 Mannoni, Octave 門諾尼 340  
 Mao Zedong 毛澤東 7, 134, 137, 151, 157, 173, 175, 181, 182-8, 242, 279  
 on power and worth of the peasantry 論農民的力量和價值 184, 185, 186  
 revision of orthodox Marxism 修正傳統馬克思主義 184-6, 187  
 Maoism 毛澤東思想 156, 187, 200, 311, 350, 354, 356, 396  
 Maori wars (1860-72) 毛利人之戰 161  
 Maoris 毛利人 20, 60, 91  
 Mai-an, Rene 梅林 258  
 march, strategy of the 遊行的策略 332  
 March on Washington Movement 前進華盛頓運動 222, 332  
 marginality 邊緣化 361, 422  
 marginalization 邊緣性 321, 352, 354  
 Mariategui, Jose Carlos 馬力亞特吉 136, 168, 195-6, 197-201, 207, 293, 372  
 maritime enclaves 海上領土 17  
 Marranos 馬拉諾人 425  
 Marti, Jose 馬第 207, 209, 210  
 Martinique 馬提尼克 3, 32, 254, 255, 275  
 Marx, Karl 馬克思 9, 24, 89, 92, 278  
 and alienation 和異化 271  
*Capital* 《資本論》 278  
 on colonialism and imperialism 談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 29, 73, 74, 77, 82, 101-12

- on the Indian 'Mutiny' 談印度「兵變」 165  
 on Ireland 談愛爾蘭 92, 106-7, 120, 306  
 and nationalism 和民族主義 106-7, 119, 120, 121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共產黨宣言》 102, 106, 119-20, 121, 212  
 Marxism 馬克思主義 6-7, 64, 67  
 Abdel-Malek on 阿布代·馬力克談馬克思主義 170-4  
 African Marxism 非洲馬克思主義 271  
 anti-colonial Marxism 反殖民馬克思主義 167-8, 169, 174  
 Che Geuvara on 切·格瓦拉 208  
 and dependency theory 依賴理論 51  
 eurocentrism 歐洲中心主義 168, 352  
 existential Marxism 存在馬克思主義 67, 68  
 hybridization 雜揉化 167-8  
 identification with modernity 認同現代性 341-2  
 Indian Marxism 印度馬克思主義 109, 309, 311-16, 317, 341, 350, 351, 355, 356  
 in Latin America 馬克思主義在拉丁美洲 195-6, 199, 203  
 Lenin on 列寧談馬克思主義 167  
 Mao's revision of 毛澤東修正馬克思主義 184-6, 187  
 and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s 和民族解放運動 167-81  
 and nationalism 和民族主義 119, 120, 169, 171  
 postcolonial Marxism 後殖民馬克思主義 7, 10, 58-9, 60, 168  
 tricontinental Marxism 三大洲馬克思主義 150, 169, 170, 171, 176, 188, 278, 279, 302, 305, 311, 341, 353-4  
 Marxism-Leninism 馬列主義 243-4, 272, 280  
 masculinity, ideology of 陽剛意識形態 28, 325-6, 328  
 Mau Mau 茅茅起義 161, 162, 173, 191, 230, 248, 300, 366  
 Mauritania 毛里塔尼亞 162  
 Mauritius 模里西斯 17  
 Mazrui, Ali A. 馬孜茹 62  
 Mazzini, Giuseppe 馬志尼 119, 229  
 M'Balie, Camara 馬巴麗雅 369  
 media revolution 媒體革命 330  
 Mehta, Sharda 夏大·賀塔 376  
 Mehta, Usha 鄂夏·梅賀塔 362  
 Mekatalili 麥卡塔利莉 365  
 Melanesia 美拉尼西亞 94  
 Melilla 梅利亞 3  
 MeUa Julio Antonio 梅拉 195, 196  
 Memmi, Albert 梅米 295, 340, 414, 423  
 messianic movements 彌賽亞運動 163, 229  
 Mexico 墨西哥 116, 130, 131, 156, 196-7, 215  
 communism 共產主義 131, 195  
 indigenismo movement 印地安原住民主義 199  
 land reform 土地改革 196  
 peasant rebellion 農民反叛 196-7  
 Zapatistas 查巴蒂司塔 196, 215  
 Micronesia 密克羅尼西亞 94  
 Midway Islands 中途島 42  
 migration/migrants 移民 2, 4, 9, 61  
 Mill, James 詹姆士·彌爾 85  
 Mill, John Stuart 彌爾 39, 41, 80, 86-7, 92  
 mimicry 學舌 68  
 Miquelon 密克隆 3  
 mission civilisatrice 文明開化使命 30, 31, 33, 88, 89, 105, 266  
 missionaries 傳教士 24, 77  
 modernity 現代性 75, 105, 109, 374-8  
 anti-modernity 反現代性 320, 378  
 colonial modernity 殖民現代性 194, 345, 350, 371-2, 374, 383  
 counter-modernity 抗現代性 345, 383  
 feminism and 女性主義與現代性 374-8  
 Marxist identification with 馬克思主義對現代性的認同 341-2  
 nationalism and 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 344  
 postcolonial modernity 反殖民現代性 418

- resistance to 抵抗馬克思主義 345  
 'second form of colonization' 殖民的第二種形式 342  
 self-modernization 自我現代化 374-5  
 Mondlane, Eduardo 蒙德蘭 373  
 monetarism 貨幣主義 53  
 Monroe Doctrine 門羅主義 39, 50, 194  
 Montoneros 蒙托內羅斯 215  
 Moore, R. B. 莫爾 176  
 Morant Bay uprising (1865) 莫特蘭灣起義 40, 91, 161  
 Morel, E. D. 莫瑞爾 1, 25, 77, 116  
 Morocco 摩洛哥 42, 149, 153, 243  
 Morris, William 莫里斯 98, 310  
 Mouvement pour la Triomphe des Libertés Democratiques (MTLD) 民主自由勝利運動 277  
 Movement of Non-Aligned Countries 不結盟運動 157, 191-2, 239  
 Movimento Anti-Colonista 反殖民運動 283  
 Mozambique 莫三比克 162, 166, 188, 240, 247, 251, 284, 304, 363  
 MPLA (Popular Movement for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of Angola) 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 162, 213, 251, 283, 300  
 Mtwana, Ida 姆瓦納 367  
 Mudimbe, V. Y. 穆丁比 62, 217, 246, 268, 281-2  
 Muhammed, Elijah 以利亞·穆罕默德 220  
 Mundongo, Tainie 孟東多 373  
 Munzenberg, Willi 慕森伯格 176  
 Musburo 「蘇聯共產黨穆斯林組織中央局」 138  
 Muslim Brotherhood 穆斯林兄弟會 190  
 Mussolini, Benito 墨索里尼 233  
 Muthoni, Mboni 慕索尼 366  
 Muzaffar Hanafi 穆札法爾 175  
 NAACP 有色人種促進會 221, 223, 260  
 Nagy, Imre 納吉 vii  
 Naidu, Saro 奈都(夫人) 71, 328, 362, 376  
 Nair, Sir Chettur Sankaran 耐爾爵士 324  
 Namibia 納米比亞 162, 214, 250, 251, 363  
 Nandy, Ashis 南迪 320, 325, 339-43, 349  
 on countering colonialism 談對抗殖民主義 343-4  
 cultural hybridity 文化的雜糅性 347  
 on derivative discourse 衍生論述 344  
 on Gandhi's strategies 談甘地的策略 339, 342, 346  
 and ideology of masculinity 和陽剛意識形態 326  
 on Indian postcolonialism 談印度後殖民主義 339-40  
 Intimate Enemy 親密的敵人 339, 340, 341  
 on liminality 談中介性 345, 346  
 on psychology of colonialism 談殖民心理 340-1  
 Naoroji, Dadabhai 那羅齊 115  
 Napoleon Bonaparte III 拿破崙三世 30, 41, 88, 89  
 Narayan, Jayaprakash 納拉揚 309, 310  
 Nasser, Gamal Abdel 納瑟 59, 188, 189-91  
 Natal 那塔爾 161-2  
 nation-states 國族；民族—國家 28, 46, 59  
 National Congress of British West Africa 英屬西非國民大會 100  
 national liberation 民族解放 285, 286, 291  
 cultural-historical dimension 文化與歷史面向 289  
 and independence distinguished 和獨立的區分 287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mensions 內部和外部 286  
 object of 民族解放的目標 289  
 relation of socialism to 與社會主義的關係 286  
 two stages 兩個階段 287  
 national liberation armies 民族解放軍隊 164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s 民族解放運動 9, 28, 48, 60, 61, 62, 65, 81, 98,

- 128, 130, 156, 161-81, 163  
 Abdel-Malek on 阿布代·馬力克談民族解放運動 170-4  
 aftermath 後果 371  
 bourgeois 資產階級 131, 133, 149, 286, 287  
 constitutional moves towards decolonization 以立憲去殖民化 163  
 first stage towards socialism 走向社會主義的第一階段 145, 153  
 guerrilla warfare 游擊戰 163  
 heterogeneity 異質性 174  
 identification with nationalism 認同民族主義 157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peasantry 認同農民 183  
 male perspectives 男性觀點 360  
 Marxism and 馬克思主義與民族解放運動 167-81  
 non-communist movements 非共產主義運動 133  
 pluralist approach 多元路線 134  
 religious revivalism 宗教復興主義 163  
 resistance to conquest 抵抗被征服 163  
 women activists 女性行動派 357, 369  
 National Negro Congress 黑人大會 222  
 nationalism 民族主義 2, 61, 93, 94, 287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 反殖民族主義 79, 93, 171-2, 343-4, 378, 379  
 anti-imperial nationalism 反帝國民族主義 93  
 black nationalism 黑人民族主義 220, 240  
 bourgeois nationalism 資產階級民族主義 61, 121, 122, 129, 166, 179, 287  
 Chatterjee on 恰特吉談民族主義 344-5  
 and class conflict 與階級衝突 137  
 and communism 與共產主義 131, 147  
 cultural nationalism 文化民族主義 121, 122, 378-80  
 economic nationalism 經濟民族主義 309-10  
 elite forms 菁英形式 172  
 emancipatory nationalism 解放民族主義 380  
 ethnic nationalisms 族群民族主義 118, 121  
 Islamic nationalism 伊斯蘭民族主義 137-8, 153  
 as a language 做為一種語言 172, 173  
 Lenin on 列寧談民族主義 121, 122, 125  
 Marxist 馬克思主義的民族主義 106-7, 139  
 Nandy on 南迪談民族主義 343-4  
 nationalist internationalism 民族主義國際主義 106, 107, 115  
 socialism and 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 117-20  
 'third-world nationalism' 「第三世界民族主義」 61, 172  
 women's role 女性角色 360  
 native Americans 美洲原住民 3, 4, 79  
 Naxalbari peasant revolt (1967) 納薩爾巴里農民反叛 350  
 negritude movement 黑人精神運動 166, 218, 237, 258, 261-2, 265-9  
 criticisms of 黑人精神運動的批評 265, 267  
 political agenda 政治規劃 266  
 Sartre on 沙特談黑人精神運動 265-6  
 Negro Welfare Association of British West Africa 英屬西非黑人福利協會 227  
 Nehanda, Mbuya 奈漢達 363  
 Nehru, Jawaharlal 尼赫魯 59, 168, 176, 177, 188, 191, 309-10, 339-40, 348  
 on Gandhi 談甘地 309, 349  
 socialist secularism 社會主義的現世主義 168, 309-10, 339, 376  
 and women's issues 與婦女議題 376  
 neocolonialism 新殖民主義 7, 11, 42, 44-56, 58, 194, 246, 288  
 continuation of colonial rule 殖民統治的持續 47  
 cultural neocolonialism 文化新殖主義 48  
 dependency theory 依賴理論 48, 50-1  
 economic neocolonialism 經濟新殖民主義 45, 48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 帝國主義的最

- 後階段 46-9  
 military neocolonialism 軍事新殖民主義 48  
 neocolonial elite 新殖民菁英 45, 48  
 resistance and cultural assertion 抵抗與文化肯定 48, 49  
 socialist solution 社會主義的解方 287  
 neoliberalism 新自由主義 53  
 Netherlands 荷蘭 2, 3, 31, 76, 117, 135, 180  
 Neto, Antonio Agostinho 內圖 283, 284  
 New Caledonia 新喀里多尼亞島 17  
 New Guinea 新幾內亞 39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新國際經濟秩序 192  
 New Social Movements 新社會運動 55  
 New Zealand 紐西蘭 3, 4, 17, 19, 20, 23, 31, 39, 60, 79, 91, 95, 97, 163  
 newspaper and print culture 報紙與印刷文化 162, 229, 329-30  
 Newton, Huey P. 紐頓 220, 223  
 Ngugi, wa Thiong'o 恩古吉·瓦·提安哥 48, 65  
 Nicaragua 尼加拉瓜 42, 46  
 Nigeria 奈及利亞 17, 45, 59, 63, 162, 179, 218, 227-8, 304  
 Nivedita, Sister 尼維德塔修女 97, 376  
 Nkrumah, Kwame 恩客魯瑪 44, 45, 46-7, 48, 50, 52, 68, 178, 190, 191, 218, 219, 221, 225, 228, 235, 242-6, 280  
 abandons non-violent resistance 放棄非暴力抵抗 250, 297  
 on African socialism 談非洲社會主義 244-6  
*Consciencism: Philosophy and Ideology for Decolonisation* 《內在覺醒法殖民的哲學和意識形態》 244-5, 246, 270  
 cult of personality 對「非洲性格」的熱切 291  
 on decolonization 談去殖民 291  
 Ghana-Guinea union 加納幾內亞聯盟 241  
 Manchester Pan-African Congress (1945) 曼徹斯特泛非洲代表大會 238-9  
 Marxism-Leninism 馬列主義 243-4  
 on nationalism 談民族主義 240  
 and neocolonialism 和新殖民主義 50, 52  
*Neocolon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 《新殖民主義的最後階段》 46-7  
 on non-violent resistance 談非暴力抵抗 248, 249, 297, 308  
 and Pan-Africanism 和泛非洲主義 242-6  
 political success 政治的成功 228-9  
 theoretical legacy 理論的承續 246  
*Towards Colonial Freedom* 《邁向殖民的自由》 228, 246  
 on women activists 談女性行動派 363  
 noble savage theme 「高貴野蠻人」之主題 76  
 Non-European Unity Movement (NEUM) 非歐洲人統一運動 232  
 non-violence 非暴力 250, 251-2, 343  
 anti-colonial strategy 反殖民策略 297  
 Gandhi's ideology of 甘地的非暴力思想 296, 323-4, 330, 343  
 western colonial concept 西方殖民觀念 343  
 North America 北美 16, 17, 19, 78, 79, 82  
*see also* United States 另見美國  
 Northern Ireland 北愛爾蘭 4  
 north-south divisions 南北之分 9, 51, 54  
 Nurse, Malcolm 涅斯 *see* Padmore, George Nyanjiru, 另見潘得西墨  
 Mary Muthoni 尼安紀如 365-6  
 Nyasaland 尼亞薩爾 304  
 Nyerere, Julius 尼雷爾 68, 246-8, 251, 269, 271, 372  
 O'Brien, William 歐布萊恩 313  
 O'Casey, Sean 歐凱西 306  
 Oceania 海洋圈 37  
 O'Connell, Daniel 奧康內爾 296  
 O'MaUey, Ernie 歐馬力 302  
 opium trade 鴉片貿易 106  
 Opium Wars (1839-1842) 鴉片戰爭 92  
*Ordine Nuovo* 《新秩序》 197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OAU) 非洲

- 團結組織 8, 243  
 Organization of Solidarity of the Peoples of Africa, Asia and Latin America 非、亞、拉美人民團結組織 5, 213  
 Orientalism 東方主義 319, 378, 383-4, 385-6, 387-9, 391, 392, 398, 399-400, 401, 403  
 Ortiz, Fernando 奧蒂斯 169, 201-2, 267  
 Other 巴書 271, 272, 397-8, 415, 418  
 marginalized otherness 被邊緣化的他者 202  
 Ottoman empire 奧圖曼帝國 16  
 Oussedik, Omar 烏茲狄克 277  
 Padmore, George 潘得墨 7, 39, 156, 221, 223, 224, 225, 226-7, 232-3, 235, 236-7, 243, 244  
 on African socialism 論非洲社會主義 239, 241-2, 269  
 expelled from Comintern 被「共產國際」逐出 264  
 and Garan Kouyate 和加藍·庫雅特 263, 265  
 Manchester Pan-African Congress (1945) 曼徹斯特泛非洲大會 238-9  
*Pan-Africanism or Communism?* 「泛非洲主義或共產主義」 246  
 Pan-Africanism defined by 定義泛非洲主義 236  
 PAIGC (African Party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Guinea and Cape Verde) 幾內亞比索與維德角非洲獨立黨 162, 283, 300, 381  
 Paine, Thomas, *Rights of Man* 潘恩／《人的權利》 86  
 Pakistan 巴基斯坦 3, 164, 166, 322  
 Palestine 巴勒斯坦 3, 136, 153, 251, 362  
 Palmerston Lord 帕麥斯頓 90  
 Pan-African Association 泛非洲協會 218  
 Pan-African Congress 泛非洲代表大會 218, 220, 221, 225, 235, 237, 238-9, 248, 251, 368  
 Pan-African Federation 泛非洲聯盟 234  
 Pan-Africanism 泛非洲主義 166, 190, 217, 218, 221, 225, 233, 235, 236-52, 253  
 absence of female narrative 女性敘述的缺乏 368-9  
 association with negritude 與「黑人精神」的結合 237  
 economic policy 經濟政策 236  
 Fanon and 法農和泛非洲主義 276  
 first articulated 首次表述 236  
 ideology 意識形態 237, 238  
 international independency of states 國際的國家獨立 270  
 new policy of reciprocal violence 以暴制暴的新策略 249, 250  
 Nkrumah and 恩客魯瑪和泛非洲主義 242-6  
 non-violent positive action 非暴力的正面行動 238-9, 248-9  
 political tactics 政治策略 238-9  
 renamed Revolutionary Pan-Africanism 更名為革命泛非洲主義 251  
 socialism 社會主義 236, 239-43  
 pan-Arabism 泛阿拉伯主義 166, 190-1  
 pan-Islamism 泛伊斯蘭主義 138, 146, 166, 175, 190, 308  
 Pan-Russian Muslim Congress (1917) 泛俄羅斯穆斯林大會 138  
 Panama 巴拿馬 42  
 Panama Canal 巴拿馬運河 42  
 Pankhurst, Sylvia 潘赫絲特 140, 378  
 Papua New Guinea 巴布亞紐幾內亞 94  
 Paranjape, Makarand 帕蘭加普 320  
 Parekh, Bikhu 帕雷克 346-7  
 Parnell, Charles 帕奈爾 96, 296  
 paternalism 家長式心態 37, 40  
 patriarchy 父權 360, 369, 370, 378, 379, 382  
 Payne Jackson, John 潘·傑克遜 217  
 Peace Corps 和平服務隊 47  
 peasant insurgency 農民叛亂 166, 194, 196-7, 352-3, 354, 357-8  
 peasantry 農民 157, 182, 183-4, 185, 186, 194, 277, 279, 285, 321, 322, 352, 353  
 Pereira, Carmen 卡門佩雷拉 369  
 Pereira, Francisca 法藍西卡·佩蕾拉 381  
 Persia 波斯 102

- Peru 秘魯 20, 194, 197-9, 213, 215  
 communism 共產主義 195  
 domestic colonialism 國內殖民主義 199  
 Indian 'problem' 印度「問題」 198  
 indigenismo movement 印地安原住民主義 199  
 internal colonialism 內部殖民主義 198  
 Peruvian society 秘魯社會 197-8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革命傳統 198
- Petit, Mithiben 普提特 376
- petty bourgeoisie 小資產階級 287-8
- Philippines 菲律賓 17, 42, 180, 357
- Pidgiguiti massacre (1959) 比幾歸堤大屠殺 249
- Pitt, William (Pitt the Younger) 山畢特 90
- Pizer, Dorothy 卜乃哲 233
- Plaatje, Sol T. 普拉切 95, 220-1
- plantation economies 農場經濟 20, 24, 81, 83
- Platt Amendment 普拉特 215
- Plekhanov, G. V. 普列滿諾夫 306
- PLO 巴解 362
- Poland 波蘭 115, 120, 122, 129, 143, 166
- political suffrage 政治參政權 141
- politics of theory 理論政治 11
- Polynesia 波利尼西亞 30
- Polynesian Islands 波里尼西亞群島 94
- Ponce, Anibal 龐賽 195
- population theory, and colonialism 人口理論與殖民主義 22
- Porter, Bernard 波特 74
- Portugal 葡萄牙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3, 283-4  
 communism 共產主義 155  
 imperialism 帝國主義 16, 31, 117  
 and liberation movements 和解放運動 180
- Portuguese East Africa 葡屬東非 218
- Portuguese Guinea 葡屬幾內亞 249
- positivity 實證性 386-7, 403
- Post-Development Studies 後發展研究 320
- Post-Development Theory 後發展理論 55
- post-independence 後獨立 60, 291-2
- postcolonial critique 後殖民批判 4, 6-8, 19, 27, 166, 270, 355
- concerns 關切點 66, 69, 81
- critique of Said 薩依德的批判 384-5
- diasporic production 離散的產物 318, 350
- focus, object and assumptions 焦點目標和預設 11
- heterogeneity and fluidity 異質性和流動性 68, 69
- historical retrieval 歷史的回復 66
- hostility towards 對後殖民批判的仇恨 65
- institutional origins 建制化的起源 62, 63, 64
- language and terminology 語言和術語 67-9
- linguistics 語言學 393
- and Marxism 和馬克思主義 6-7, 10, 67, 168
- naming 命名 63
- nationalist criticism of 民族主義批評 62
- political and moral consensus 政治和道德的看法 5
- postcolonial Marxism 後殖民馬克思主義 58-9, 60, 67
- shared methodologies and theories 共用的方法和理論 64, 65
- tensions in 後殖民批判的張力 166
- theoretical base 理論基礎 18
- in the western academy 在西方學術中 63, 65
- postcolonial feminism 後殖民女性主義 377, 381
- postcolonial studies 後殖民研究 63
- double focus 雙重焦點 341
- material-spiritual divide 物質—精神之分 338
- secularism 世俗主義 338
- postcolonialism 後殖民主義 2, 5, 15, 27, 57-69, 271
- object of 目標 287
- postcolonial states 後殖民國家 58-9
- situating 居何種位置 57-8, 60

- postcoloniality 後殖民情境 57
- postmodernism 後現代主義 347
- poststructuralism 後結構主義 67, 68, 187, 271, 347, 351, 383, 412, 413, 415
- power 權力 354, 386  
 and discourse 和論述 406-7  
 dominance/subversion paradigm 宰制／顛覆／範型 173, 407  
 power/knowledge structure 權力／知識結構 387, 388  
 and resistance 和抵抗 407
- Prakash, Gyan 普拉卡西 354, 355
- Pratap, Mahendra 普拉塔 312
- Price-Mars, Jean 普里斯·馬爾斯 266
- 'primitive logic' 原始思維邏輯 420, 421
- prophetism 先知主義 163
- protectorates 保護領土 42, 94
- protest songs 抗議歌曲 358
- protest-migration 移動抗議 166
- psychoanalysis 心理分析 341, 343, 351
- Puerto Rico 波多黎各 3, 17, 42
- Putumayo Indians 普圖馬約河的印地安人 1
- Quebec Act, 1774 魁北克法案
- Race 種族  
 and class 和階級 261, 278-9  
 and colonialism/imperialism 和殖民主義／帝國主義 37, 90, 243, 251  
 cultural ideology of 文化意識形態 33  
 French discourse of 法國的種族論述 261  
 paternalistic racial hierarchy 家長式的種族階層 37  
 racial difference 種族差異 33  
 racial theories 種族理論 326
- racism 種族主義 4, 62, 149, 261
- Radek, Karl 拉狄克 129, 144, 145, 148, 150, 152
- Rai, Lala Lajpat 雷依 131, 312
- Raleigh, Sir Walter 羅列爵士 21
- Rama, Angel 拉瑪 202, 417
- Ramabai, Pandita 拉瑪拜 362, 370, 375
- Rana, S. R. 拉納 312

- Rassemblement Coloniale 殖民聯盟 263, 265
- Red Army 紅軍 129, 130, 136, 144, 157
- Reed, John 李德 142, 222
- Reindorf, C. C. 雷多夫 217
- religious communalism 宗教共產主義 168
- religious revivalism 宗教復興主義 163-4
- representation 再現 19, 388, 390-1, 399, 406, 408
- repression 壓抑／壓迫 407, 415
- resistance 抵抗 355  
 cultural resistance 文化抵抗 18-19, 90, 199  
 objectives 目標 356  
 psychology of 抵抗之心理學 340-1, 342, 343, 344, 355
- Retamar, Roberto 雷達瑪 210
- Reunion 再結合 3
- revolution commodification of 商品化 169, 302  
 social and cultural aspects 社會與文化層面 286
- r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 革命意識 288, 357
- Reybaud, Louis 雷鮑德 89
- Rhodes, Cecil 羅德士 22, 35, 38, 39, 90, 94
- Rhodesia 多羅德西亞 20, 34, 164, 250, 280, 297  
*see also* Zimbabwe 另見辛巴威
- Rif Revolt 里夫叛變 147, 162
- Rio de Oro 里奧德奧羅 42
- Robeson, Paul 羅貝森 222, 223, 225
- Robespierre, Maximilien 羅伯士比耶 81
- Robinson, Cedric 魯賓遜 225
- Rodney, Walter 羅德尼 51
- Roman empire 羅馬帝國 15-16, 33
- Romanticism 浪漫主義 81, 89
- Roosevelt, F. D. 小羅斯福總統 180
- Roosevelt, Theodore 羅斯福總統 42
- Rousseau, Jean Jacques 盧梭 76
- Roy, M. N. 羅伊 106, 109, 125, 134, 144, 145, 147-8, 149, 151, 153, 174, 195, 262, 312, 313

- at the Second Congress 和第二次大會 131-2, 134  
 on bourgeois liberation movements 談資產階級解放運動 131, 133  
 in China 在中國 151, 313  
 on class 談階級 286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和印度共產黨 313  
 and the Indian Revolutionary Association 和印度革命協會 134-5  
 on revolution in the East 談東方的革命 132
- Roy, Rammohun 洛伊 86, 342, 375, 380
- RSFSR 俄羅斯蘇維埃聯盟社會主義共和國 123
- Rushdie, Salman 魯西迪 349
- Ruskin, John 羅斯金 310, 320, 329
- Russia 俄國 59, 99-100, 165  
 chauvinism and ethnocentrism 沙文主義和種族中心 122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118, 122  
 imperialism 帝國主義 31, 37, 120  
 Islamic Russia 伊斯蘭蘇維埃 138  
 Russian revolution (1905) 俄國大革命 116  
 Russification programme 俄羅斯化的計畫 121  
 see also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另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 Republics Russo-Japanese war (1905) 日俄戰爭 99-100, 116
- Rwanda 盧安達 218
- Said, Edward W. 薩依德 18, 20, 62, 74, 319, 383-94  
 colonial discourse 殖民論述 383-94  
 discourse and power 論述和權力 385-9  
*Orientalism* 《東方主義》 63, 74, 383-4, 385-6, 387-9, 391, 392, 398, 399-400, 401, 403
- St Pierre 聖皮埃爾 3
- Sajous, Leo 沙如 263, 265
- Saklatvala, Shapurji 沙立瓦拉 96, 312
- samas 同化的能力 348-9
- Samoa 薩摩亞 3, 42
- Sánchez, Celia 桑切思 361
- Sankara, Thomas 黎加拉 286
- Sarbah, John Mensah 薩爾巴 217
- Sarhaoui Democratic Arab Republic 撒哈拉民主阿拉伯共和國 3
- Saro-Wiwa, Ken 薩羅維瓦 46
- Sartre, Jean-Paul 沙特 8, 18, 210, 270, 273, 278, 298, 351, 415, 416, 419  
 on Algeria 談阿爾及利亞 282, 294  
 on colonial violence 談殖民暴力 282, 294, 295, 296, 415  
 dispute with Foucault 和傅柯的論辯 397  
 engagement with colonialism 與殖民主義 281-3  
 existential Marxism 存在馬克思主義 270, 282, 415  
 on Fanon 談法農 281  
 on negritude 談「黑人精神」 265-6  
 'Third World' issues 「第三世界」議題 282  
 on the use of French by Francophone activists 談法語系行動派使用法語 268, 420
- sati-daha 焚燒寡婦 380
- Sattianadhan, Krupabai 薩提雅娜翰 370
- satyagraha 真理力量 180, 238-9, 248, 250, 323-4, 327, 331, 332, 334, 343, 376
- Savage, Akiwande 薩維濟 218
- Savarkar, Vinayak Damodar 塞佛卡 312, 324, 326, 338
- Schuyler, George S. 斯凱勒 222
- Schwarz, Roberto 史華慈 202-3
- Scotland 蘇格蘭 80, 85, 166, 300, 301
- Seale, Bobby 西爾 220
- Second Declaration of Havana 哈瓦那第二宣言 169, 215, 285
- Second International 第二國際 77-8, 105, 107, 109, 115-17, 127
-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mmunist Women 共產婦女第二國際大會 142
- Second World War 第二次世界大戰 44, 117, 162, 181, 296, 315
- Seeley, John Robert 奚禮 23, 34, 36, 37,

- 38, 94, 326
- self-determination 自決 45, 81, 115, 117, 120, 121, 123, 125, 128, 221, 374
- self-empowerment 自我賦權 62, 221, 275
- self-government 自治 39-40, 60, 92, 94, 100
- Sen, Bhowani 寶華尼·盛 311
- Sen, Surjya 森 296-7, 324
- Sendero Luminoso (Shining Path) 光輝之路 200, 215
- Senegal 塞內加爾 162, 218, 241, 253, 254, 257, 259, 304
- Senghor, Lamine 拉明·桑戈爾 66, 176, 218, 237, 257, 259-62  
 La Comite de Defense de la Race Negre (CDRN) 黑佬防衛委員會 259, 260-1  
*La Violation d'un pays* 《侵害家園》 262  
 and the negritude movement 與「黑人精神」運動 261-2  
 radicalism 激進主義 261
- Senghor, Leopold 立歐波·桑戈爾 217, 218, 219, 225, 235, 237, 253, 255, 257, 261, 265, 266, 267, 269-73  
 and African socialism 和非洲社會主義 269, 272-3, 280  
 and being and alterity 與存在和異己 271-2  
 concept of negritude 「黑人精神」的概念 269  
 on culture 談文化 272  
 on difference 談差異 255  
 'elitist cultural polities' 菁英文化政治 269  
 and Pan-Africanism 和泛非洲主義 269-70  
 proposes new 'open' humanism 提倡新「開放」人文主義 270-1
- Serbia 塞爾維亞 49, 78
- settler colonies 拓居殖民地 17, 19, 22, 23, 24, 27, 32, 35, 36, 92, 164, 166
- Seven Years War 七年戰爭 30, 78, 83
- sexual politics 性別政治 326
- shakti 心靈力量 321, 327, 341
- Sharpeville massacre (1960) 夏普鎮大屠殺 249, 297
- Sherard, R. H. 薛瑞德 326
- Siberia 西伯利亞 122
- Sierre Leone 獅子山 52, 92, 162, 228
- Sikhs 錫克人 59
- Sila, Ernestina 席拉 381
- Singapore 新加坡 17, 52, 296, 304
- Singh, Bhagat 辛格 324
- Sinn Féin 新芬黨 96, 97, 306, 320
- slavery 奴隸制度 1, 2, 20, 24, 26, 76  
 abolition 廢除 81, 194  
 economic objection to 經濟的反對 83  
 slave revolts 奴隸反叛 75, 81, 161, 163
- Slovakia 斯洛伐克 129
- Small, E. F. 史莫爾 227
- Smith, Adam 亞當·史密斯 73, 78, 82-5, 89, 105  
 critique of colonialism 批判殖民主義 82-5  
*Wealth of Nations* 《富國論》 82, 85
- Smith Bell, Sydney 史密斯·貝爾 93
- Smith, Goldwin 高德溫·史密斯 9, 91, 95, 96
- social exclusion 社會排斥 321
- socialism 社會主義 6, 100, 115-26, 145, 153  
 black socialism 黑人社會主義 223  
 and colonialism 與殖民主義 116  
 Muslim socialism 穆斯林社會主義 146  
 and nationalism 與民族主義 117-20, 188, 230, 305  
 relation to national liberation 與民族解放之關係 286  
 revolutionary socialism 革命社會主義 210  
 tricontinental socialism 三大洲社會主義 170, 185  
 Utopian socialism 烏托邦社會主義 320
- socialist feminism 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 372-4
- Socialist League 社會主義聯盟 98
- socialist reformism 社會主義改革派 100
- socialist secularism 社會主義世俗主義派



- 168  
Societe des amis des Noirs 黑人之友協會 76  
Soga, Tiyo 索賈 236  
Solomon Islands 所羅門群島 179  
Somalia 薩摩亞 78, 162, 251  
Sorel, Georges 索雷爾 197, 295, 296, 303  
South Africa 南非 19, 20, 42, 91, 95, 170, 188, 213, 214, 218, 230-2, 250, 251, 280, 284  
apartheid 種族隔離政策 3, 231  
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 黑人意識運動 220  
Boers 波爾人 79  
Hertzog Native Bills 何索原住民法案 232  
immigration policy 移民政策 79  
insurrections 叛亂 161-2  
nationalist movements 民族主義運動 94  
Pass Laws 通行證法 366-7  
peasant movements 農民運動 230  
revolutionary intelligentsia 革命派知識分子 231  
socialism 社會主義 251, 252  
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 (SACP) 南非共產黨 230, 231, 232  
violence versus non-violence 暴力與非暴力的對照 251-2  
women activists 女性行動派 363, 366-8  
South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南非國民大會 100  
Southey, Robert 騷西 76  
space and spatial organization 空間與空間組織 395  
Spain 西班牙 21, 59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3, 199  
communism 共產主義 155  
imperialism 帝國主義 16, 25-6, 31, 75-6, 117  
Spanish Sahara 西屬撒哈拉 251  
Spanish-American War (1898) 西美戰爭 42, 116  
Spartacist uprising (1919) 斯巴達克起義

- 128  
'spiritualization of politics' 政治的精神化 337, 338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史碧娃克 62, 69, 355, 415  
catachresis 誤置 418  
challenges Indian theoretical orthodoxies 挑戰印度理論正統性 339, 350, 351  
dialectical method 辯證方法 410  
extends category of subaltern to women 底層階級延伸至女性 354, 357  
Sri Lanka 斯里蘭卡 17, 59, 251, 362  
Sri Lanka (Ceylon) 斯里蘭卡(錫蘭) 9, 156, 164, 3625  
S Windrush 乘風號 62  
Stalin, Joseph 史達林 121, 125, 126, 129, 139, 147, 148, 149-50, 154  
'autonomization' 自主化 123, 124  
demarcation of Soviet Central Asia 蘇維埃在中亞的劃分 138  
intervention in Comintern affairs 介入「共產國際」事務 149-50, 151, 176  
and Muslim Communist organizations 和穆斯林共產組織 138  
on nationalism 談民族主義 121, 122  
purges 整肅 152  
'revolution from above' 由上而下的革命 169  
and secession 和分離/脫離 122  
and world revolution 和世界革命 150  
Stalin-Hitler pact 史達林-希特勒協定 152, 315  
strikes and civil disobedience 罷工與公民不服從 163, 166, 173, 315, 323  
*see also* satyagraha 另見真理力量  
structuralism 結構主義 67-8, 187, 383, 413, 420  
Stuttgart Congress (1907) 史圖加特會議 116  
sub-Saharan Africa 南撒哈拉 30, 50, 157, 161-2, 229  
Subaltern Studies 底層階級研究 311, 339, 350, 352-6, 358-9, 410  
feminist critiques 女性主義的批評 356-7

- interaction with cultural criticism 與文化批評的互動 354  
'Naxalite historiography' 納薩爾派史觀 353  
project 規劃 352, 353, 354, 355  
subalternity 底層階級的狀況 9, 66, 293, 320-1, 352-6, 407, 418  
autonomous agency of subaltern resistance 底層階級抵抗的自主能動性 353  
defining 界定 354  
dialectic of dominance and subordination 宰制和從屬的辯證 356  
and marginalization 和邊緣化 354  
Sudan 蘇丹 49, 162  
Suez Crisis vii, 蘇伊士危機 189-90  
suffragette resistance strategies 參政權反抗策略 323, 326, 330  
Sukarno, Achmad 蘇卡諾 59, 179, 191  
Sultan-Galiev, Mir Said 蘇丹卡里也夫 129, 137, 138-9, 146-7, 152, 174-5, 212, 279  
Sumatra 蘇門答臘 146  
Sun Yat-sen 孫逸仙/孫中山 150, 151  
Survival 倖存 1  
Swaminathan, Lakshmi 史娃米那坦 362  
SWAPO 西南非人民組織 162, 164, 250  
swaraj 民族自治 309, 320, 338, 376  
Switzerland 瑞士 118  
Sylvester-Williams, Henry 席維斯·威廉士 218  
Syria 30, 59, 136, 147, 敘利亞 190  
Tabata, Isaac Bongani 塔巴塔 232  
Tagore, Sir Rabindranath 泰戈爾 319  
Taiwan 台灣 3, 17, 52, 177, 183  
Tamil Tigers (LTTE) 泰米爾之虎游擊隊 362  
Tamils 泰米爾 4, 59  
Tanaka Memorandum (1927) 田中備忘錄 179  
Tanzania 坦尚尼亞 52, 247  
Tashkent 塔什干 134, 312  
Teilhard de Chardin, Pierre 德白進 271  
Tel Quel group 「如是」小組 187  
texts 文本 387-8, 394, 398

- cultural and literary texts 文化與文學之文本 36, 262, 409-10  
historicity 歷史性 389-90  
representation 再現 389, 390-1  
Thierry, Amedee 蒂耶里 278  
Third International 第三國際 105, 109, 118, 127-39, 130, 154, 155  
'Third World' 「第三世界」 4, 5, 46, 54, 55  
Third World Feminism 「第三世界」女性主義 58  
Thomas, J. J. 湯瑪斯 68  
Thoreau, Henry David 梭羅 323  
Thornton, A. P. 松頓 10  
Thuku, Harry 杜庫 365, 366  
Tibet 西藏 3  
Tiffin, Helen 蒂芬 415  
Tilak, B. G. 提拉克 309, 380  
Tito (Josip Broz) 帝托 59, 191  
Togliatti, Palmiro 陶里亞帝 197  
Togo 多哥 17  
Torres Strait Islands 托勒斯島 20  
totalitarianism 極權主義 415  
totalization 整體化 415, 416  
Toure, Sekou 杜爾 218, 241, 269  
Toussaint L'Ouverture 杜桑·盧維 81, 161, 225  
Trade 貿易  
colonial trade 殖民貿易 19, 21, 22-3  
Marx on 馬克思談貿易 102  
monopoly trading rights 壟斷貿易 83, 84, 91  
protective trade tariffs 保護貿易關稅 84, 91  
trade agreements 貿易協定 47  
trade unions 貿易聯盟 177, 226, 227, 228  
trade-union militancy 貿易工會的戰鬥形式 368  
transculturation 跨文化 169, 201-2, 259, 267  
translation 轉譯 320, 393, 418  
absolute 絕對 424, 425, 426  
of Marxism 馬克思主義的轉譯 6, 8, 168, 169, 174, 199, 311, 314, 351, 355  
nationalism as 民族主義的轉譯 173

- postcolonial politics of 轉譯的後殖民政  
治 66, 68  
as transculturation 做為文化互化 202,  
267, 347  
Transvaal/Orange Free State 德蘭士瓦省/  
橘/自由邦 166  
Treaty of Brest-Litovsk (1918) 布列斯特—  
里托夫斯克協會 122  
Treaty of Versailles (1919) 凡爾賽和約  
117, 118, 132, 220  
Tricontinental (Havana) 三大洲 (哈瓦那)  
5, 192, 194, 212-14, 285  
tricontinentalism 三大洲主義 4-5, 57, 58,  
61, 212, 427-8  
see also anti-colonialism, feminism,  
Marxism, Socialism Tripoli 另見反殖  
民主義、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社  
會主義 116  
Trotsky, Leon 托洛斯基 109, 121, 124,  
128, 129, 139, 144, 150, 151, 224, 225  
and the colonies 與殖民地 155, 156  
and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與第四國際  
155-7  
indifference towards nationalism 對民族  
主義的冷漠 155  
and the Irish Easter Rebellion 和愛爾蘭  
復活節起義 306  
'revolution from below' 由下而上的革命  
157  
United Front policy 聯合陣線策略 145  
Trotskyism 托洛斯基派 129, 156  
Tucker, Dean 塔克 83  
Tunisia 突尼西亞 102, 162, 179, 218,  
304, 396, 397  
Tupamaros 圖帕馬斯城市游擊隊 215  
Turgot, Anne Robert Jacques 陀果 79  
Turkestan 土耳其斯坦 122, 134  
Turkey 土耳其 2, 59, 100, 116, 130, 135,  
147, 153, 287  
anti-colonialism in 反殖民主義 136  
communism in 共產主義在土耳其 144  
feminism in 女性主義在土耳其 142,  
379  
nationalism 民族主義 166  
Turner, Bryan 騰納 167  
Turner, Nat 特納 161  
Twain, Mark 馬克吐溫 116  
Uganda 烏干達 304  
Ukraine 烏克蘭 118, 119, 122, 123  
Umkhonto we Sizwe 民族之矛 249, 251  
underclass 底層階級 353  
underdevelopment theory 低度發展理論  
50, 51, 53, 54, 56, 110-11  
UNIA 美國黑人聯合促進會 220, 258  
Union Africaine et Malgache 非洲和馬爾加  
什島聯盟 270  
Union des Travailleurs Negres (UTN) 黑人  
勞工聯盟 264  
Union Inter-coloniale 殖民聯盟 256, 259  
Union of Nationalities 民族同盟 118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蘇維埃  
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3, 44, 59, 120-  
57, 170, 21  
dual foreign policy 雙重外交政策 143,  
144  
federal structure 聯邦結構 123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外交利益 152  
and independence movements 與獨立運  
動 180  
Muslim states 穆斯林國家 123-4  
racial tolerance 種族容忍 222-3  
Soviet policy towards the east 蘇維埃對  
東方的政策 129, 130  
and women's rights 與女性權利 140-1  
Union of West African Socialist Republics  
西非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219  
United Arab Republic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190  
United Nations (UN) 聯合國 180, 192  
United States 美國 3, 4, 20, 29, 44, 130,  
135, 166  
anti-imperialism 反帝國主義 179  
Black Belt state proposal 建立「黑人地  
帶」州之提議 222, 231  
Black Liberation Movement 黑人解放運  
動 220  
colonialist expansion 殖民擴展 3, 9  
Communist Party 共產黨 220, 222,  
223, 224

- focus for anti-imperialist campaigns 反帝  
國主義活動的焦點 181  
immigration laws 移民法 62, 149  
imperialism 帝國主義 26, 32, 37, 41-3,  
117, 212  
and independence movements 和獨立運  
動 180  
McCarthyite purges 麥卡錫主義的整肅  
223  
settler colony and imperial power 拓居殖  
民地和帝國勢力 32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Rights (1948) 人權  
共同宣言 87  
universal human rights discourse 普世人權  
論述 81, 82, 87  
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全球黑人進步協會 219, 221  
Universal Races Congress (1911) 全球各民  
族會議 218  
universal suffrage 普遍參政權 9  
universalism 普世主義 420  
Umguary 烏拉圭 195, 213  
Utilitarianism 實用主義 82, 104  
Uyghur 唯吾爾族 4  
veilmg/unveihng 戴/掀面罩 124, 141,  
328, 378  
Venezuela 委內瑞拉 213, 215  
Vespucci, Amerigo 韋斯普奇 21  
Victoria, Queen 維多利亞女王 90  
Vidyasagar, Isvarachandra 維耶撒佳 375  
Vietcong 越共 164  
Vietnam 越南 58, 59, 156, 162, 166, 173,  
180, 181, 183, 213, 250, 275, 297, 362,  
419  
Vietnam War (1960-1974) 越戰 161, 170,  
181, 212  
Villa, Pancho 維拉 196  
violence 暴力 250, 293-307, 327  
colonial violence 殖民暴力 76, 276-7,  
282, 294, 295, 296, 297-9, 300, 412  
'degradation' 貶抑 293  
Fanoñ and 法農和暴力 250, 280-3  
'pacification' 平定 293  
psychotherapy of the oppressed 被壓迫者  
心理治療 295  
Virgin Islands 維京尼群島 3, 42  
Vivekenanda, Swami 維韋卡南 310  
Voltaire, Francois Marie Arouet de 伏爾泰  
76  
Von Eschen, Penny 凡·艾斯肯 223  
Waddedar, Pritilata 瓦黛塔 362  
wage labour 薪資勞工 101  
Wake Islands 威克群島 42  
Wakefield, E. G. 韋克菲德 23, 92, 101  
Wales 威爾斯 300, 319  
Wallace-Johnson, I. T. A. 華勒士·詹生  
227, 228, 232, 234  
Wallerstein, Immanuel 華勒斯坦 51, 111  
Wangjingwei 汪精衛 148, 151  
Warren, Bill 華倫 55  
Washington, Booker T. 華聖頓 218, 220  
wealth disparities 富有之別 54  
Wedderburn, Sir William 魏德本 96  
West Africa 西非  
anti-colonialism 反殖民主義 217  
Balkanization 巴爾幹半島化 48, 240  
French imperialism 法國帝國主義 88  
Home Rule demands 要求自治權 39  
independence movements 獨立運動 92,  
162  
nationalist movements 民族主義運動  
94, 229  
slave trade 奴隸交易 77  
women activists 女性行動派 363  
West African Congress 西非會議 217,  
238  
West African National Secretariat 西非民族  
會議秘書處 228  
West African Students Union 西非學生聯  
會 228, 237, 260, 427  
West African Youth League (WAYL) 西非  
青年聯盟 227  
West Bank 西岸 3  
West Indies 西印度 16, 162  
white man's burden 白人的負擔 38, 89  
White, Walter 懷特 223  
widow burning 焚燒寡婦 380  
Wilde, Oscar 懷爾德 326

- women 女性 140-3, 360-82
- anti-colonial activists 反殖民行動派 178, 360-82
  - anti-imperial activism 反帝國行動主義 374
  - benefits of colonial rule 殖民統治的好處 375
  - communist women's movement 共產婦女運動 140-3
  - double colonization 雙重殖民 305, 370, 379
  - freedom fighters 自由戰士 364, 366, 373
  - gender role transformation 性別角色的改變 364, 366, 373
  - 'home and colonial' ideology 「本國」與「殖民地」對女性的意識形態 325-6, 368, 371, 377, 379
  - in Ireland 在愛爾蘭 305
  - liberating effect of anti-colonial struggle 反殖民鬥爭的解放影響 373
  - marginality 邊緣性 361
  - oppressive practices 壓迫的實踐 379-80
  -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政治組織 362, 367, 368
  - post-independence disempowerment 後獨立時的去權 371, 381
  - role in anti-colonial movements 在反殖民運動中的角色 362-9
  - suffrage 參政權 141
  - and terrorism 與恐怖主義 362
  - see also* feminism 另見女性主義 378
- Woolf, Virginia 吳爾夫
- Wordsworth, William 華滋華斯 76
- Workers International League 工人國際聯盟 231
- Workers Party of South Africa (WPSA) 南非工人黨 231, 232
- World Bank 世界銀行 46, 47, 48, 53
- world systems theories 世界體系理論 44, 51, 171, 20
-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世界貿易組織 46
- Wounded Knee (1890) 傷膝河事件 161
- Yacef, Saadi 亞瑟夫 378
- Yeats, W. B. 葉慈 319, 416
- Yergan, Max 葉根 223
- Young Ireland 青年愛爾蘭 96
- Young Italy movement 青年義大利 229
- Yousseff, Ibrahim 尤錫夫 176
- Zaire 薩伊 179, 213
- Zambia 尚比亞 188, 250
- ZANU 辛巴威非洲民族聯盟 162, 164
- Zapatista Manifesto 查巴帝司塔宣言 193
- Zapatistas 查巴帝司塔 196, 215
- ZAPU 辛巴威非洲人民聯盟 162, 213, 250
- Zetkin, Clara 蔡特金 140
- Zimbabwe 辛巴威 162, 165, 188, 213, 214, 240, 250, 251, 363, 364, 381
- Zinoviev, Grigori 季諾維也夫 100, 125, 129, 130, 136, 141, 144, 151, 152
- Zutshi, Lado Rani 舒齊 362